肖甦◎著

中共党史百人百事

（第2版）上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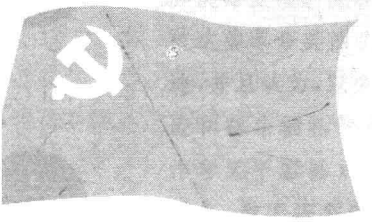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肖甦◎著

中共党史百人百事

（第2版）上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前言

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走过了长达28年光辉而曲折的历程，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先进人物和英雄业绩。我在数十年的中共党史教学工作中，时常被这些革命英烈们的丰功伟业，所动容、振奋、鼓舞和启迪，并且认为，以先辈们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英勇感人事迹和奋斗牺牲精神，去教育和影响后生晚辈，是党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2006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85周年，为了庆贺党的华诞，缅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继承、弘扬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编写《中共党史百人百事(1919—1949)》一书，以志纪念。

这里，需要着重说明的，有以下3个方面：

首先关于选题。近些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硕果累累，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其中有关党史人物传记、评传等著述，更是层出不穷，数以千计。但在已出版的人物传记著作中，或多全面介绍传主的一生，或专门介绍传主的某个侧面，而将诸多传主最精华、最突出的事迹汇编在一起，写成一本综合的书，尚属鲜见。

其实，对于撰写这类综合性著作，自己较早就萌生过念头，只因在职期内，教学与研究任务繁忙，力不从心，抽不出时间去进行这项工作。退休以后，才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去思考和收集、整理相关资料。经过5年的努力，终成此书，将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共产党人及其所作的最重要事件融合一起，这也算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吧。

在一本书里，究竟该写多少人物为宜？自然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或现成的模式。最初，我读过美国迈克尔·H.哈特著的《千秋功罪——世界最有影响的100人》(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1月第一版)，此书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平心而论，可写的有影响的中共党史人物何止成百上千?!不过这类书，写少了，可能会走全面介绍传主的老路，缺少新意；写多了，限于篇幅，可能造成对传主的蜻蜓点水，意思不大。所以想

来想去，还是觉得写“百人百事”为好，一则按照我国民俗，以“百”为吉利，二则迄今国内已有不少以“百人”、“百事”、“百种”、“百篇”、“百部”为体裁的各种著作问世，如《影响中国历史的100个人》、《影响世界历史的100个人》，等等。

选定编写《中共党史百人百事》，需要精选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有影响的100个人及其所经历的100件最重要的事，融于一书。当然，如前所述，民主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史人物，其重要者，远远不只是“百人”，就中所经历的重要之事，也决不会只有“百事”，但还是希望通过所选之“百人百事”，力求能够大体上涵盖党史基本问题的主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影响中共历史的100个人。

其次关于选择人物和事件。确定“百人百事”之后，接下来就碰上选哪些人最为合适的问题。就我个人水平而言，很难选得那么准确、恰当。但总体设想是，绝大多数应以讴歌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业为主，极少数也可侧重总结某些历史教训。

书中所选人物，一部分是有文献依据的，即党史文献上经常提及的英烈人物。如(一)最早提到的烈士名字，是1927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致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的信》，信中列举被军阀屠杀者有：李大钊、邓培、李森(启汉)、刘尔崧等。(二)中央档案馆编的《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书中汇集了1928年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期间组织代表所写的材料和1929年中国济难总会编辑的小册子《牺牲》的烈士传记。在200多位英烈中，知名者有：向警予、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罗亦农、宣中华、王一飞、李大钊、王荷波、张太雷、萧楚女等烈士的事略。(三)张闻天1937年5月2日在苏区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提到牺牲的中华民族的最优秀的儿女有：李大钊、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罗亦农、王一飞、彭湃、杨殷、张太雷、苏兆征、王荷波、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邓中夏、向警予、方志敏、何叔衡、宣中华、赵博生、刘伯坚、谢子长、刘志丹等英名。(四)1948年8月1日李立三在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致开幕词中提到英勇牺牲的烈士有：赵世炎、邓中夏、李启汉、罗亦农、王荷波、张太雷、苏兆征、项英、杨殷等英名。选定这些人，是理所当然的。但加在一起，也不过30人。

除此之外，还需要去综合、权衡其他人选，经过反复考虑，觉得应

有下列标准：一是重要性或权威性。人与事的关系最为密切，甚至可以说，非其莫属，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如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杨明斋与上海外国语学社；彭湃与广东海丰农民运动；邓培与唐山早期工人运动；乌兰夫与内蒙古自治政府，等等。二是代表性。有些人虽说也相当重要，但因限于“百人”，并未能列入其中。如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人，有王尽美和邓恩铭，因写了王尽美，不好再写邓恩铭，而再去写邓的其他事情，又显得不那么重要。又如，熊雄曾任黄埔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因写了周恩来与黄埔军校，故不便再去写熊雄与黄埔军校。诸如此类，黄公略、韦拔群、邓发、罗登贤、陈昌浩、董振堂、张浩、杨尚昆等，都存在这种情况。书中写了十大元帅，这是无法回避的。但10名大将，就难以都写进去，不得不将黄克诚、萧劲光、许光达、王树声“割爱”，这也是十分遗憾的。三是平衡性。实际上是人与事的关系，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处理好存在的碰撞。因受一人一事的限制，除了要看选谁或选什么事最为合适外，还要兼顾这些人与其他事件的关联。因在同一事件上，往往不会是一个人，某甲可能比某乙更重要，但因在另一事件上同样重要，故只好放弃某甲，将某乙选入。如周恩来与黄埔军校、南昌起义、西安事变这3个事件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作用和地位至关重要，将周放在其中任何一处都顺理成章，但因只能写一处，周究竟与哪件事连在一起更好，还要看其他人的选位而定。经过权衡，决定写周恩来与黄埔军校，而南昌起义、西安事变改写他人。南昌起义可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联系，因决定写贺龙，其他人就得改写别的题目了。当然，贺龙也可以与湘鄂西苏区根据地相连，但因写了南昌起义，湘鄂西苏区根据地就让位给了周逸群，如此类推。其二，要照顾五湖四海。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各地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军事运动，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各苏区根据地建设，各路红军长征，三年游击战争的各游击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各大战役，等等，都要有代表人物，尽量能照顾方方面面。总之，尽管缜密权衡，所选人物仍只具有相对意义。

最后关于体裁。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约500种以上的相关书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力求做到求真、直书。严格地说，这是一本学

术著作，而非纪实文学或文艺史学，但又希望能写成通俗读物。努力做到既要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又要力求文字朴实、易懂。限于篇幅，每人每事以三四千字左右为宜，较大的题目写得笼统些，较小的题材写得具体些。繁简力求搭配得当，因人因事而定。基本上是按传主事迹的时间排序，以叙事为主，个别地方作些少许的评议。每位传主，都有一个三五百字的简历。

本书的选目，尽可能多出一些新意。如沈玄庐与衙前农民运动，罗章龙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李立三与五卅运动，王一飞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彭公达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曾山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王稼祥与红军政治工作，博古与西安事变，李富春与延安大生产运动，陈潭秋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彭真与国共争夺东北等，都是鲜为人知的。

本书的撰写，多方面吸收了亲历者的回忆和党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参考书目附后）。在此向亲历者、老前辈和党史同仁，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最后，本书的撰写得到了一向热心扶助学术著作出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贵社审读室副主任、第一图书编辑部主任陆宗寅先生对本书的编写与出版始终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帮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肖　蛰

2006 年 1 月 28 日于国防大学二号院

补记

本书于 2006 年出版后，得到学界同仁和其他读者的好评，我也深受鼓舞。为弥补受百人所限而未能将许多重要人物涵盖进去的缺憾，2007 年 11 月起我依据本书的体例，续写了一百人一百事。接受出版社的建议，将原书作为上卷，新写内容作为下卷，在建党 90 周年之际合并推出，以答谢读者的厚爱，并向中国共产党 90 周年献礼！

肖　蛰

2011 年 6 月

目录

前　言

1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传播**／1
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1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3
影响整个青年一代／5

2 **何叔衡与新民学会**／7
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7
“驱张运动”的胜利／9
参与领导湖南新文化运动／9
主持长沙会友会议／10

3 **马骏与“五四”天津学生运动**／12
学生运动领袖／12
“马天安”的由来／14
被捕入狱前后／15

4 **赵世炎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7
远渡重洋／17
发起成立“勤工俭学学会”／19
“拒款斗争”和“进占里大”／20
创建“旅欧少年共产党”／21

5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 23
浙江一师风潮/ 23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问世/ 25
非同凡响的《共产党宣言》/ 26

6 **李汉俊与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28
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28
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 29
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重要贡献/ 31

7 **俞秀松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33
上海青年团首任书记/ 33
青年团临时中央书记/ 35
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36

8 **杨明斋与上海外国语学社**/ 38
上海外国语学社校长/ 38
外国语学社的活动/ 39
选送优秀学生赴俄深造/ 41

9 **李达与《共产党》月刊**/ 43
主编《共产党》月刊/ 43
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主将/ 45
呕心沥血办刊物/ 46

10 **谭平山与广州共产党组织**/ 47
建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 47
创办《广东群报》/ 48
广东共产党支部书记/ 49

11 **王尽美与济南共产党组织**/ 52
发起成立“励新学会”/ 52
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4
创建济南共产党组织/ 55

12 **施存统与旅日共产党组织**／57
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57
留学日本的革命活动／58
旅日共产党组织负责人／59

13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成立**／61
“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领军人物／61
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首任书记／63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65

14 **沈玄庐与衙前农民运动**／67
发动家乡农民开展斗争／67
成立衙前农民协会／68
为农民领袖树碑立传／69

15 **李启汉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71
领导上海工人运动／71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72
编辑《劳动周刊》／73
被捕入狱／74

16 **苏兆征与香港海员大罢工**／76
罢工的中心人物／76
谈判中挺身而出／77
欢呼罢工的胜利／79

17 **邓培与唐山早期工人运动**／81
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81
站在工人斗争最前列／82
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84

18
何孟雄与京绥铁路工人罢工/ 86
关注京绥铁路工人运动/ 86
京绥铁路密查员/ 87
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 88

19
林育南与武汉早期工人运动/ 90
指导武汉工人罢工/ 90
领导粤汉铁路工人二次罢工/ 91
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93

20
彭湃与海丰农民运动/ 94
在家乡组织“六人农会”/ 94
海丰总农会会长/ 96
海丰农民运动的指导者/ 98

21
宣中华与浙江早期革命运动/ 100
领导浙江学潮/ 100
参与指导衙前农民运动/ 101
筹建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 102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勇士/ 103

22
高君宇与山西早期革命运动/ 104
心系山西的革命运动/ 104
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105
筹建山西共产党组织/ 106

23
蔡和森与《向导》周报/ 108
主编《向导》周报/ 108
《向导》的灵魂/ 109
中国革命的真正向导/ 111

24 **刘少奇与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13
参与领导安源罢工斗争／113
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115
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116

25 **罗章龙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18
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118
参与领导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119
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121

26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123
军校政治部第三任主任／123
关心军校的党组织建设／125
开展东征军的政治宣传工作／126

27 **杨阁公与四川早期革命运动**／128
结识志同道合者／128
开展各种革命活动／129
迎接大革命风暴的到来／131

28 **向警予与早期妇女运动**／132
负责党中央的妇女工作／132
杰出的妇女领袖／134
五卅运动中的妇女旗手／135

29 **王荷波与早期铁路工人运动**／137
领导津浦铁路工人运动／137
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139

30 **李立三与五卅运动**／141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41
“五卅”游行总指挥／143
领导上海全市总罢工／144

31 **周士第与铁甲车队**／146
改组铁甲车队／146
支援广宁农民运动／147
铁甲车队队长／148

32 **刘尔崧与广东早期工人运动**／150
发动领导广东工人罢工／150
组建广东工团军／153
推动广东工运不断发展／153

33 **阮啸仙与广东早期农民运动**／155
足迹遍布广东农村／155
广州农讲所第三届主任／157
广东农运的主要领导人／157

34 **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160
赴香港发动罢工／160
中共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162
全面总结经验教训／163

35 **杨匏安与广东国共合作**／165
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165
参加审讯“廖案”案犯／166
推动广东国共合作迅速发展／167

36 **王若飞与中共豫陕区委**／169
帮助国民二军开展工作／169
关注河南工农运动／170
中共豫陕区委书记／171
注重总结斗争经验／171

37 **陈延年与中共广东区委**／173
参加广东区委工作／173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174
领导广东工农运动／175
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斗争／177

38 **陈乔年与北方革命运动**／178
中共北京区委书记／178
参与发动“首都革命”／179
“三·一八”惨案的勇士／180

39 **吴玉章与国共首次合作**／182
做四川国民党的统战工作／182
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大／183
坚决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185

40 **萧楚女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187
农讲所惟一的专任教员／187
编写多科教学大纲／189
扶病回答学员的提问／190

41 **叶挺与北伐战争**／192
北伐先遣队威名大振／192
两湖战场连战皆捷／193
攻占武昌城／194
赢得“铁军”的荣誉／195

42 **王一飞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197
专心中央军事部的工作／197
向中央作北伐江西战地报告／198
参与指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200

43 **刘伯坚与冯玉祥国民军**／201
在莫斯科初识冯玉祥／201
促进国民军的新生／203
开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204

44 **刘伯承与泸顺起义**／206
主持四川军事工作／206
川军各路起义总指挥／207
举义泸顺／209
一代名将战孤城／209

45 **罗亦农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211
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211
第三次起义的最高领导成员／213
“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215

46 **魏野畴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217
协助杨虎城解西安之围／217
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218
对驻陕总部的贡献／219

47 **恽代英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221
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221
武汉中央军校的实际负责人／222
参加讨伐夏斗寅叛乱／223

48 **贺龙与南昌起义**／225
跟着共产党走革命之路／225
南昌起义总指挥／227
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228
实现了平生最大的夙愿／229

49 瞿秋白与八七会议／231
参与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231
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233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234

50 彭公达与湘赣边秋收起义／236
湖南新省委书记／236
筹划湖南秋收暴动／237
决定停止长沙暴动／238
主动承担起义失败的责任／240

51 谢子长与清涧起义／241
潜入军阀部队秘密活动／241
酝酿发动武装起义／242
西北地区的第一面红旗／243

52 谭震林与湘赣边第一个红色政权／245
茶陵县总工会主席／245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247
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248

53 张太雷与广州起义／249
草拟广州暴动计划／249
起义总指挥／251
红旗在广州上空飘扬／252
倒在苏维埃政权火花中／253

54 朱德与湘南起义／255
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255
点燃湘南革命烈火／257
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259

55 **毛泽东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261
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261
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 263
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264
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265

56 **刘志丹与渭华起义**/ 267
发动领导起义/ 267
建立革命军队和苏维埃政权/ 269

57 **滕代远与平江起义**/ 271
赴平江接上党的关系/ 271
参与领导平江起义/ 273
红五军党代表/ 274

58 **陈为人与中共满洲省委**/ 276
组建中共满洲临时省委/ 276
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277
为东北地区革命做出贡献/ 278

59 **方志敏与赣东北苏区根据地**/ 280
领导弋横农民起义/ 280
开辟苏区根据地/ 281
抵制“立三路线”/ 283
创建“苏维埃模范省”/ 284

60 **张云逸与红七军**/ 286
准备武装起义/ 286
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288
领导红七军转战千里/ 289

61
周逸群与湘鄂西苏区根据地/ 292
点燃湘鄂西革命烽火/ 292
开辟鄂西苏区根据地/ 293
红二军团总政委/ 295

62
冯白驹与琼崖苏区根据地/ 297
开辟琼崖苏区根据地/ 297
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299
母瑞山的艰难岁月/ 300

63
邓子恢与闽西苏区根据地/ 302
从龙岩暴动到创建闽西红军/ 302
中共闽西特委书记/ 304
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305

64
曾山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308
赣西地区的主要领导人/ 308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委员长/ 309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310

65
王明与六届四中全会/ 312
投反"立三路线"之机/ 312
抛出《两条路线》的"左"倾纲领/ 313
依仗米夫扶持上台/ 314

66
赵博生与宁都起义/ 317
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 317
组织策动部队起义/ 318
起义胜利实现/ 320

67
王稼祥与红军政治工作/ 322
总政治部首任主任/ 322
创办《红星》报/ 324
主持红军首次全国政工会议/ 325

68
徐海东与红二十五军长征／327
撤离鄂豫皖苏区／327
开辟鄂豫陕游击根据地／329
最先与陕北红军会师／330
红十五军团军团长／331

69
张闻天与遵义会议／332
不满“左”倾错误的领导／332
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333
作“反报告”批评“左”倾军事错误／335
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336

70
张国焘与长征左右两路军／338
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338
提出分成左右两路军／339
走上分裂红军的道路／341

71
任弼时与红二方面军长征／343
红二、六军团会师／343
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344
组成红二方面军／345
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作斗争／346
促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347

72
徐向前与红四方面军长征／349
撤离川陕根据地／349
力促一、四方面军的团结／351
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352

73
陈毅与粤赣边游击区／355
留守中央苏区／355
突围到油山／357
“北山事件”／359
梅岭遇险／359
“南天一柱”／360

74
张鼎丞与闽西游击区／362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362
粉碎敌人的“清剿”／363
积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364

75
薄一波与山西牺盟会／366
开展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366
改组牺盟会／368
组建“决死队”／369

76
博古与西安事变／371
中共谈判代表成员／371
研究应付西安事变的对策／373
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374

77
李先念与西路军／377
奉命西渡黄河／377
苦战河西走廊／379
血战倪家营子／380
败走祁连山／381

78
杨靖宇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383
从磐石游击队到东北人民革命军／383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385
为抗日救国壮烈牺牲／387

79 **罗瑞卿与抗日军政大学**/ 389
从“红大”到“抗大”/ 389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391
惜别抗大寄深情/ 393

80 **谭政与八路军政治工作**/ 395
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建树/ 395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397
全党全军重视《报告》/ 398

81 **彭雪枫与豫东敌后抗日**/ 400
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400
创造豫皖苏边抗日新局面/ 401
总结豫皖苏边的斗争经验/ 402

82 **罗炳辉与新四军华中抗战**/ 405
奉派到新四军工作/ 405
三打来安城/ 406
开辟淮宝根据地/ 407
迎来华中抗战的最后胜利/ 408

83 **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410
创建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410
建立模范抗日根据地/ 411
辉煌的战绩/ 414

84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政府**/ 416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416
领导陕甘宁边区建设/ 417
陕甘宁边区的大发展/ 419

85 **李富春与延安大生产运动**／422
负责领导大生产运动／422
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423
大生产运动的巨大成就／425

86 **罗荣桓与山东前期抗战**／427
开辟泰西根据地／427
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429
渡过最困难的日子／430

87 **彭德怀与百团大战**／433
提出大破袭战的设想／433
定名为“百团大战”／435
奇袭的巨大成功／436
书写抗战史上的辉煌一页／437

88 **左权与华北敌后抗战**／439
战斗在晋东南／439
参与指挥百团大战／442
血染太行／443

89 **项英与皖南事变**／445
蒋介石预谋聚歼皖南新四军／445
项英对北移踌躇不决／446
皖南部队奋起抵抗／448
项英惨遭谋害／449

90 **陈潭秋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450
中共驻新疆代表／450
与军阀盛世才作斗争／451
惨遭杀害／453

91 **彭真与国共争夺东北**／455
先机进入东北／455
力争控制东北／456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458

92 **叶剑英与军事调处执行部**／461
“军调部”中共代表／461
与国民党据理力争／463
完成光荣使命／466

93 **乌兰夫与内蒙古自治政府**／467
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467
统一东蒙和西蒙／469
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470

94 **陈云与东北解放战争**／472
开辟北满工作／472
坚持南满根据地／475
创建东北解放区／476

95 **邓小平与千里跃进大别山**／478
鲁西南大捷／478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479
在大别山立住脚跟／481

96 **林彪与辽沈战役**／484
对南下作战顾虑重重／484
发起辽沈战役／487
第一个决战胜利／488

97 **粟裕与淮海战役**／490
建议举行淮海战役／490
制定战役的作战方针／492
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493

98 **董必武与华北人民政府**／496
关注华北财经建设／496
华北人民政府主席／497
领导华北人民政府工作／498

99 **李维汉与新政协召开**／501
主管新政协的筹备工作／501
成立新政协筹备会／503
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505

100 **陈赓与南部边疆追歼战**／507
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507
解放两广／508
挺进滇南／5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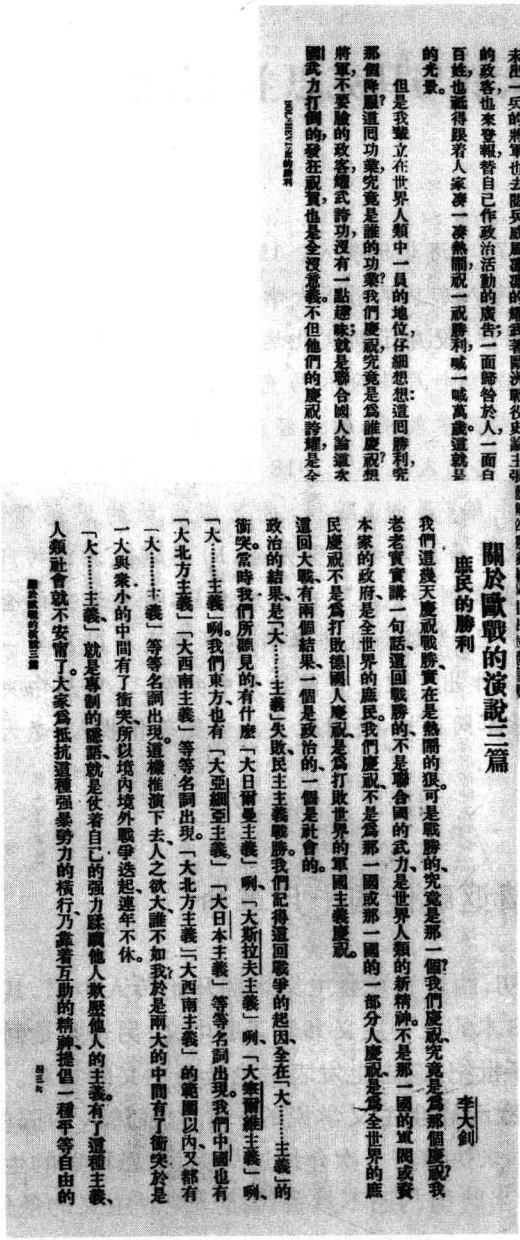
附录　参考书目／511

1. 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传播

李大钊(1889—1927) 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学校。1913年东渡日本,考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16年回国后,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率先旗帜鲜明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主任。参加编辑《新青年》,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1918年与陈独秀等共同创办《每周评论》。1919年主编《晨报》副刊,是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1920年3月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创建北京共产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党成立后,负责北方的全面工作,任中共北方区委书记,为领导北方革命和军事运动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是中共第三、四届中央委员。1927年4月被奉系军阀逮捕,英勇就义。主要著作收入《李大钊选集》、《李大钊文集》。

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开始传入中国,其主要渠道有二:一条是将日本的社会主义书籍译成中文;另一条是回国后的留法中国学生在《新世纪》杂志上发表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起初,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欧洲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流派传入中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梁启超、朱执信等多次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著作片断。但由于当时国内还不具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条件,人们对它的认识和理解也十分粗浅,所以影响不大,未能引起社会的反响。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特别是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之后,中



BOLSHEVISM 的勝利

李大釗

「勝利了！勝利了！聯軍勝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國降服了！」家家門上插的國旗，人人口裏喊的萬歲，似乎都有這幾句話在那顏色上音調裏隱隱約約的透出來。聯合國的士女，都在街上跑來跑去的慶祝戰勝。聯合國的軍人，都在市內大吹大擂的高唱凱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聲音，忽而有拆毀「克林德碑」碼瓦的聲音，和那些祝賀歡欣的聲音，遙相應對。在留我國的聯合國人，那一種高興，自不消說。我們這些和世界變局沒有很大關係似的國民，也得强顏取笑：拿人家的歡笑當自己的歡笑，把人家的光榮做自己的光榮。學界舉行提燈，政界舉行祝典，參戰年餘未出一兵的將軍，也去閱兵，威風凜凜的耀武。著歐洲戰役史論主張「協約必勝」的威爾遜，又在紐約對眾宣佈他的政客，也來登報，替自己作政治活動的廣告；一面歸咎於人，一面自居。也難得眾人家湊一湊熱鬧，祝一祝勝利，喊一喊萬歲，這就是的光景。

但是我輩立在世界人類中一員的地位，仔細想想：這回勝利，究竟是誰的功業？究竟是爲誰慶祝？想那個降服的，這回功業，究竟是誰的功業？我們慶祝，究竟是爲誰慶祝？想將軍不要臉的政客，靠武詩功，沒有一點趣味；就是聯合國人論這次聯合國武力打倒的，發狂祝賀，也是全沒意義。不但他們的慶祝詩，是令

BOLSHEVISM的勝利

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

李大釗

庶民的勝利

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實在是熱鬧的很。可是戰勝的，究竟是那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爲那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黨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爲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爲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爲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爲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祝。

這回大戰，有兩個結果，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社會的。

政治的結果，是「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我們記得這回戰爭的起因，全在「大……主義」的衝突。當時我們所瞧見的，有什麼「大日耳曼主義」咧、「大斯拉夫主義」咧、「大塞爾維主義」咧、「大……主義」咧。我們東方，也有「大亞細亞主義」「大日本主義」等等名詞出現。我們中國也有「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等等名詞出現。「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的範圍以內，又都有「大……主義」等等名詞出現。這樣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誰不如我？於是兩大的中間有了衝突，於是一大與衆小的中間有了衝突，所以境內境外，戰爭迭起，連年不休。

「大……主義」就是專制的隱語，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壓制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有了這種主義，人類社會就不安寧了。大家爲抵抗這種强暴勢力的橫行，乃拿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種平等自由的

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

李大釗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

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认真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宣传与研究，使之在中国真正传播开来，而李大钊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早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

辛亥革命后，面对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国家危亡和社会黑暗，激发起爱国热忱的青年李大钊，含愤留学日本，决心寻求救国救民的出路，立志献身于民族解放事业。留日期间，他通过阅读进步学者幸德秋水、河上肇等的著作，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回国1年半以后，听到关于俄国十月革命的报道，更受到极大的震动和鼓舞。可是，阶级敌人和一切反动势力却视十月革命为“洪水猛兽”，诬蔑布尔什维克党为“过激党”。在这种险恶的环境里，李大钊不畏危难，刻苦自励，经过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鉴别、比较，于1918年7月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文章阐明了俄国革命的本质及其对于世界的影响，认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这是中国最早讴歌和介绍十月革命的文字。11月，为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的胜利，北京大学在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3天讲演大会，大多数讲演者无不高谈阔论“公理战胜强权”的抽象道理，惟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之演讲，欢呼十月革命是“庶民的胜利”，是“劳工主义的战胜”，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指出中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接着，李大钊又撰写《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一文，论证了十月革命的道路是世界各国革命的必由之路，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当时，宣传十月革命同传播马克思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这些脍炙人口的语言文字，虽然没有涉及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但实开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河，为五四运动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也标志着李大钊由急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

国运动，社会主义思潮纷至沓来，在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唤起人们的浓厚兴趣。“五四”前后，国内创办的进步刊物犹如雨后春笋，多达150种。这些期刊，几乎都在广泛讨论科学、文学、哲学、社会主义及社会等各种问题，而在大量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同时，也都程度不同地宣传和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1918年1月，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除轮流编辑《新青年》外，还和陈独秀等于1918年12月创办了《每周评论》，主张公理，反对强权，鼓吹新思潮，在该刊第16号登载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纲领部分。《每周评论》是继《新青年》之后，指导五四运动的又一面旗帜。此外，李大钊协助北大学生出版了宣传新文化思想的《国民》、《新潮》等刊物，特意把北大图书馆的1个房间拨给了新潮社用。1919年5月5日，李大钊协助北京《晨报》副刊新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连载马克思的《雇用劳动与资本》等译文。10月，由李大钊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全部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6篇文章。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篇文章，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3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在李大钊指导与帮助下，上述刊物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之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李大钊在1919年一年里发表了几十篇文章，最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和奠基人。五四运动前后，以李大钊为代表先进知识分子，经过对各种新思潮的研究、鉴别与比较，最终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使马克思主义得以迅速传播开来，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日益增多。

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不断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向马克思主义提出公开挑战。胡适以反对“空谈主义”为幌子，否认改造中国社会问题需要“根本解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胡适的错误观点，蓝公武率先发表《问题与主义》一文，逐条予以批驳。8月，李大钊回到河北昌黎五峰山，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对胡适鼓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了有力地批驳，提出：“问题”与“主

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任何社会问题的解决，要靠多数人的努力，而要动员多数人，就“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问题与主义的争论，是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一次思想交锋。当然很难用当时的社会影响来判断胜负，但李大钊旗帜鲜明的态度，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帮助广大青年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改良主义的界限，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影响整个青年一代

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除办刊物、写文章外，还通过成立研究团体和讲授课程等途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 年冬，他在北京大学，对外以研究马尔萨斯人口论作掩护，秘密组织了“马客士主义研究会”。1920 年 3 月，在李大钊领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等北大学生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建立了图书室，取名“亢慕义斋”（“亢慕义”是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到 1921 年 11 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公开征集会员，达一百数十名。每星期开 1 次讨论会，每月开 1 次讲演会，搜集和编译马克思主义的著述。李大钊在题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讲演中，语重心长地对青年人说：“倘若各位能于读书之余去研究马克思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产出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这实在是我最大的希望。”从 1919 年下半年开始，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女子高等师范等 5 所高等学校开设《现代政治》、《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和《社会主义和社会运动》等课程，系统地讲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内容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等，向青年学生灌输新思想、新理论。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他为人诚实、谦和，学识渊博，思想深邃，深受广大青年的敬仰和爱戴。在他的引导下，当时许多青年，如毛泽东、周恩来、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范鸿劼、何孟雄、缪伯英、张太雷、王尽美、赵世炎、蔡和森、瞿秋白等，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逐步成为马克思主义

者。这些知识青年的进步成长，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帮助下，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是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体具体实现的。1920 年春，经陈独秀和李大钊商定，两人分别负责南方和北方的建党筹备工作。陈独秀征求并赞同李大钊将党定名为共产党的提议，于 5 月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发起组，李大钊亦于 10 月组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后派人到天津、唐山和济南等地，帮助那里开展工人运动，建立了党、团组织。李大钊和陈独秀作为党的主要创始人，赢得了“南陈北李”的美誉。1920 年 8 月，赵世炎在一张李大钊和陈独秀合影照片上写道：“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

李大钊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重大贡献，为世人赞颂。诚如鲁迅在《守常全集题记》所说：“他的遗文却将永驻，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李大钊的挚友林伯渠早年留学日本期间，也赋诗赞颂李大钊：“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

2. 何叔衡与新民学会

何叔衡(1876—1935) 湖南宁乡人。早年在长沙楚怡小学和第一师范附小任教。1918年任湖南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积极参加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1920年参与筹办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主办《湖南通俗报》。是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回湘后,参与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继续从事教育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到上海坚持地下斗争。1928年至1930年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检察人民委员、代理内务人民委员、临时政府法庭主席等职。1933年遭受王明"左"倾错误的打击,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斗争,1935年2月突围时壮烈牺牲。

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

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国内新思潮的启发,1917年冬,在湖南长沙的青年学生蔡和森、毛泽东等十几人,经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的理念,并取得了"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的共识,于是他们决定发起成立革命团体,取名为"新民学会"。

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召开新民学会成立会,蔡和森、毛泽东、萧子昇等12人出席。会上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等起草的《会章》,填写了会友录,选举萧子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何叔衡参加了成立会,因为他自愧年长才退,不配与20岁左右的青年为伍,所以提出不入会,后经毛泽东多次劝说,才第二批加入新民学会,是会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个,时已42岁。

1919 年 11 月，新民学会部分会员在长沙合影。第三排左起第八人为何叔衡

新民学会会员绝大多数是先进青年，他们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强烈愿望走到一起来了，但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开始并不明确，认识也不统一。为此，1918 年 6 月，蔡和森、毛泽东、何叔衡和萧子昇等在长沙第一师范附小召开一次会议，决议了两件事：一会友向外发展，二进行留法运动。会后不久，蔡和森等北上入留法预备班，做留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等 20 余人去北京，进行留法的宣传和组织活动。

何叔衡是前清的秀才，老成持重，谦虚谨慎，1914 年入长沙第一师范讲习科就读，结识了毛泽东，彼此建立了亲密友谊。这时，何叔衡受聘于长沙楚怡小学主事，留了八字胡，人们戏称他为“何胡子”。他自加入新民学会后，对会务工作非常负责，尽心尽力。1918 年夏季，蔡和森、毛泽东等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赴北京后，长沙的会务和通讯联络，实际上都由何叔衡负责。毛泽东当时评价何叔衡：“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叔翁做事，可当大局”。

在五四运动浪潮中，新民学会吸收了一批会员，1919 年下半年，领导班子改选，何叔衡当选为执行委员长，毛泽东等为评议员。不久，因湖南政局动荡和会友多数外出，新民学会的会务停顿了整

整1年。

“驱张运动”的胜利

“五四”时期的湖南，以新民学会为领导核心，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湖南军阀张敬尧实施残暴统治，蹂躏百姓，激起了湖南3 000万人民的强烈反抗，“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成了广大群众共同的呼声。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新湖南》等报刊的启发和号召下，全省各界人民首先是青年学生和文化教育界，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驱逐张敬尧出湖南的斗争。1919年八九月间，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民众举行焚烧日货大会，遭到张敬尧军警的镇压，并悍然解散了湖南学联。12月4日，何叔衡在楚怡小学主持召开了长沙市各校师生代表会议。会上，他在讲话中阐明了驱张的意义和策略，提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师一日不受聘”的斗争口号。12月18日，新民学会会友罗宗翰、毛泽东、彭璜、何叔衡等以湖南公民代表的名义，与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联名上书直系军阀头目吴佩孚，揭露张敬尧的恶劣行为，并发出通电称：张逆“暴戾酷虐，毒我湘人，已成惯技”。同时，何叔衡、匡日休等还向吴佩孚递交了《请愿书》，控诉张敬尧镇压爱国运动的罪恶，“纵兵殃民，媚外仇学”，“倒行逆施，无恶不做”。接着，湖南学生界教育界组成“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衡阳、常德、郴州、广州等处活动。何叔衡受命负责衡阳代表团的工作，于1920年3月1日到达衡阳，他以衡阳第三师范学校为基地，发动学生，联络湘南各界召开驱张大会，举行示威游行，发行《湘潮》周刊，争取社会舆论。由于群众斗争的压力和直皖两系军阀之间的矛盾，6月，张敬尧终于被赶出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参与领导湖南新文化运动

6月17日，何叔衡从衡阳回到长沙。因不少会员外出求学储能，

无人来经理学会之事。萧子昇 8 月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希望“叔翁迟点出外游历，暂顿湘教学，联络教育界中之同志，并执行会务。”“尽分工之责，收互助之益”。此后，何叔衡一直留守长沙，参与领导湖南新文化运动。

为传播新思想，何叔衡与毛泽东、彭璜等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8 月 22 日在长沙召开成立大会，何叔衡代表筹备组在会上宣读《简章》，并被指定暂时担任研究会主席。与此同时，何叔衡与毛泽东、彭璜等还发起了留俄勤工俭学运动。不久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湖南青年，经过到上海外国语学社的短期培训，奔赴苏联留学。随后，何叔衡还以文化书社总社社员的身份，参与了易礼容、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的工作。9 月 9 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何叔衡在楚怡小学设立了贩卖部，随后与老友姜梦周在宁乡创办了文化书社的分社。

9 月，何叔衡被省教育委员会委任通俗教育馆馆长，负责书报编辑工作，并主办《湖南通俗报》。何叔衡利用这个职务，一面参与领导了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一面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何叔衡和毛泽东经常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在通俗教育馆商谈建党事宜，以何叔衡为中心的湖南通俗教育馆，实际上成了革命活动的联络站。1921 年 5 月，湖南赵恒惕政府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撤了何叔衡的馆长职务，新民学会会员从此撤离了通俗报馆。

主持长沙会友会议

新民学会成立第三年，会员由十几人增加到五十几人，会员的足迹由湖南一省遍及国内外各地。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认真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确定未来的发展方针。为此，1921 年一二月间，新民学会在潮宗街文化书社开了 3 次会，着重讨论新民学会的目的与方法等问题，何叔衡均担任会议主席。

1921 年 1 月 1 日至 3 日的新年大会，共有 10 余人到会。第一天，何叔衡先请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接着讨论各种问题，发言异常热烈。在讨论“会友如何研究学术”时，何叔衡提议“开办平民饭

店”，主张“每月聚会一次，研究有得的可来谈，其余的可来听。”

第二天，集中讨论学会共同目的。何叔衡第一个发言，主张学会共同目的应为“改造世界”；毛泽东发言则认为：应为“改造中国与世界”。经表决，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接着，在讨论采用什么方法达到目的时，何叔衡又是第一个发言，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断言：“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他的主张，得到毛泽东等大多数与会者的赞同。

第三天，讨论用什么方法着手即刻进行。何叔衡还是第一个发言，指出：“一方面成就自己，多研究；一方面注重传播，从劳动者及兵士入手。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专利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络。如陈炯明之类，亦宜接洽。”这表明，何叔衡较早提出了依靠工农、联俄政策及建立联合战线等思想。

在1月16日的常会上，讨论会友个人计划和生活方法时，何叔衡说：“我的计划狭小，将来仍当小学教员。想在我的本乡办一学校。在三年以内要往国内各地调查一次。同时不忘看书研究。从前想学外国文，但现觉年纪大了，不能学好。然还想学习日本文，以能看日本书为主。做事从最小范围起。”他还表示：“自身个人的生活很简单，容易解决。惟须兼筹子女的教育费。自己拟作教育上的事业，期得到低额的报酬，以资生活。至于别的不正当的发财法子，无论如何，不愿意干。”

新民学会是当时国内颇有影响的革命团体之一，不少会员后来成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革命领袖人物，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对萧三说：“新民学会实际上起了联共党小组的作用。”李维汉回忆说：“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新民学会在湖南地区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湖南地区的建党建团工作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何叔衡在新民学会的工作成绩，得到了会友的首肯和回报。1921年6月29日傍晚，何叔衡和毛泽东一起乘轮船离开长沙，代表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前往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3. 马骏与“五四”天津学生运动

马骏(1895—1928) 吉林宁安(今黑龙江)人。回族。1915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五四运动时期,担任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兼执行部长,参与领导天津学生总罢课。1919年6月,以天津各界联合会总代表的身份赴北京向北洋军阀政府请愿;8月,又以京津等地学生运动总指挥的身份,率领5 000多学生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9月,与周恩来等成立天津进步青年团体“觉悟社”。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被派往哈尔滨、吉林等地工作,参与领导东北地区革命活动。1925年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1928年2月在北京被奉系军阀杀害。1945年在党的七大会上,被审定为烈士。

学生运动领袖

在五四运动的感召下,1919年5月7日,天津中等以上10所学校代表在北洋大学开会,决定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选举张鉴暄为会长,马骏为副会长。14日,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等14所学校代表80余人在直隶水产学校开会,在马骏的主持下,正式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谌志笃当选为会长,马骏为副会长。为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天津学联领导15所中等以上学校的万余学生,于23日一律罢课,并发表宣言书,散发传单,向北京政府提出6项要求。25日,以刘清扬为会长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宣告成立。于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这两大进步团体,和全国学生一致行动,成为“五四”时期天津反帝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和中坚力量。

从6月3日起,北京又有大批学生上街讲演而遭到北洋军阀政府

1920 年天津觉悟社部分社员合影。后排左起第三人为马骏

逮捕。为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天津学联于 5 日在南开学校召集有千余学生参加的集会，马骏在会上带领大家宣读了《宣誓书》：一、誓保国土；二、誓挽国权；三、誓雪国耻；四、誓除国贼；五、誓共安危；六、誓同始终。《宣誓书》充分表达了爱国学生将反帝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会后游行示威，赴省公署请愿，学生推举马骏等 5 人为代表，晋见直隶省长曹锐，提出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争回青岛，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3 项要求，但遭到拒绝。

请愿虽然失败了，但斗争方兴未艾。6 月 9 日，天津学生联合会在河北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公民大会，到会各界民众达 2 万余人。公园内分设 21 处讲演台，在八角亭的柱子贴有楹联一副，格外引人注目，上联“振民气合民力万众一心”，下联“御国敌除国贼匹夫有责”。学联副会长马骏致开幕词，他说：“今日开会承各界同胞踊跃到会，足见爱国热诚，无任钦仰。然必须群策群力，坚持到底，始能达到目的。”还说今日开会有两个目的：“一为要求商会罢市，电请政府严惩卖国贼，以平民怒；一为保护各省爱国学生，不得妄加蹂躏。”是时，天津总商会正在开全体董事紧急会议，研究罢市问题，决定再推迟两日罢市。由公园会场赶来出席旁听的学联代表马骏等 7 人，要求即刻罢市。说毕，马骏返回会场，向大会报告了总商会的决定。随后，马骏等代表再来商会，要求商界即刻罢市，不然全体将均往商会要求。在马骏和广大民众的推动下，总商会当晚贴出布告，决定自 10 日起罢市。至此，天津实现了学校罢课，商民罢市的大好局面。

但是，总商会屈服于反动当局的高压和欺骗，决定 11 日开市。马骏等 40 余人闻讯后于当日上午赶来，再向总商会提出质问，马骏说：

“国人奔走呼号原为救国，目前公民大会全体公民一致表示‘誓死救国’，商界诸君，竟不能牺牲眼前利益，使罢市坚持到底，请问诸君爱国良心何在？国民资格何在？”有一个商董问他，天津有无财产时，马骏坚定地说：“鄙人本吉林人，天津故无财产，然鄙人尚有生命烈血可流于诸君面前……惟有一死以谢同胞。”话音刚落即以头向大柱子猛力撞去，幸好被旁边的商会文牍长夏琴西拦腰抱住，免于命案。总商会被马骏和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感动，又担心引起全市人民的义愤，不得不赞成自 12 日起继续罢市，至 14 日复市。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天津广大民众的爱国斗志。

“马天安”的由来

五四运动的爆发，引起反动当局的极端仇恨和变本加厉的镇压。在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的消息传来后，山东宣布全省戒严，济南镇守使马良兼山东戒严总司令，变本加厉地枪杀爱国游行队伍的领导人，大肆逮捕学生。“马良鲁祸”的滔天罪行，激起山东和全国人民的公愤。

为抗议马良的暴行，天津第一批请愿代表于 1919 年 8 月 23 日，与北京、济南、烟台、唐山等地代表共 35 人，齐集北京新华门求见总统徐世昌，提出 3 项要求：一取消山东戒严令；二惩办马良；三立即释放被捕代表。徐世昌非但不予理睬，反而令军警拘禁请愿学生。

消息传到天津，马骏捶胸顿足，焦虑不安。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派马骏带领第二批请愿团 14 人赶速赴京，营救被捕代表。26 日，天津和北京各界代表开联席会议，公推马骏为总指挥。京津两地请愿代表 30 余人再次齐集新华门前，要求请见徐世昌。徐仍拒不接见，军警反将请愿代表拦阻并看守起来。面对荷枪实弹的军警，马骏毫无畏惧地演说：“各界激起义愤，始有进京请愿之举，而所要求之目的，不过解除戒严令，惩办马良而已。乃政府不谅，且将初次代表拘禁，抑压民气，莫此为甚。”还说：“吾人此次如被捕而死，死亦甘心尽愿。吾人死为国死，死为争国不亡而死，死后惟愿全国父老以及后之来者，万不可把国忘了。”听者无不黯然悚动，百余名代表当天入夜露

宿新华门外。27 日，又有北京学生千余人及天津代表齐集新华门声援，亦被阻在门外。

请愿代表于 28 日，分新华门、西苑门、福华门国务院 3 路行动。马骏带领请愿代表沿途向群众宣传、讲演，愈加激起群众的爱国热忱。傍晚，警察厅将请愿代表及各校学生 300 余人驱至天安门内加以看管。马骏慷慨激昂地继续发表讲演，成为请愿团中最惹人注目之人。请愿斗争已坚持了 3 天 3 夜，反动当局恼羞成怒，决定逮捕马骏。但警察们在天安门内转了两小时，仍未能将其拿获，因马骏被请愿学生团团围住，保护起来。学生们为了掩护马骏，与军警冲突，宁肯忍着毒打，谁也不肯说出马骏的名字，结果有 6 人受伤。马骏不忍心学生被挨打，挺身而出，自报姓名，被捕归案。第二天，又有数百京津学生包围了警察厅，要求释放马骏等请愿代表。在全国各地民众的声援下，30 日，反动当局被迫将马骏和前两次被捕的请愿代表共 52 人全部释放。

马骏等于 31 日由京返津。当天，天津各界代表数百人不顾当局的严密戒备，齐集天津火车站以及城内各主要街道，热烈欢迎马骏等从北京归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以显著标题“请愿被捕代表回津”发刊号外。在上千人参加的总商会欢迎会上，马骏发表了激烈的演说：“我人当时被迫至天安门时，一切甚属快乐，当即改天安门为‘天安村’。”“各代表无不以一种乐观之精神，于痛苦被迫聊自振作。”人们赞颂马骏大闹天安门的果敢行动，称他为“马天安”。

被捕入狱前后

为防止事态扩大，自 1919 年 8 月底起，内务部、教育部和天津警察厅等不断发出限制学生活动的禁令。但是，以周恩来、马骏为代表的天津学生不顾反动当局的禁令和恫吓，始终没有停止斗争。此前不久，马骏邀请刚从日本归来的南开学校同学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该报于 7 月 21 日正式出版，成为领导学生进行爱国斗争的犀利武器。

9 月 12 日，上海、烟台、天津等地请愿代表在天津老西开秘密集

会，马骏、谌志笃、韩麟符、马千里等出席，决定第三次秘密晋京请愿，提出归还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密约，取消山东戒严令等 5 项要求。16 日，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邓颖超、郭隆真等 20 名男女青年开会，秘密成立了进步青年社团“觉悟社”，成员多是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从此天津青年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马骏和刘清扬等受天津各界联合会的委派，9 月下旬，赴上海发起成立全国各界联合会，马骏当选为全国各界联合会评议部干事。马骏返回天津后，为了推动抵制日货，声援福州反日爱国斗争，和各界代表一起，发起筹备“国民大会”，于 1920 年 1 月下旬率领各界代表到省公署请愿，结果全体被捕，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遭查封。面对反动当局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广大民众的愤慨，1 月 29 日，周恩来率领各校学生千余人包围了省公署。当局让马骏“劝告”群众自行解散，马骏提出 3 个条件：一、须先恢复各团体原状；二、准他邀请外面的人来谈话；三、准他随同时被拘的人谈话。反动军警恼羞成怒，用刺刀和枪托驱散学生，制造了“一·二九”流血惨案。

之后，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下令将马千里、马骏、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等 26 人先后逮捕入狱。马骏无论在拘留所还是在检察厅，始终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难友们一起进行“绝食”斗争，发表政治讲演，以及开展多种文体活动。在被拘押的半年中，他蓄起了很长的胡须，被大家戏称为“美髯公”。至 7 月，马骏和其他难友获得“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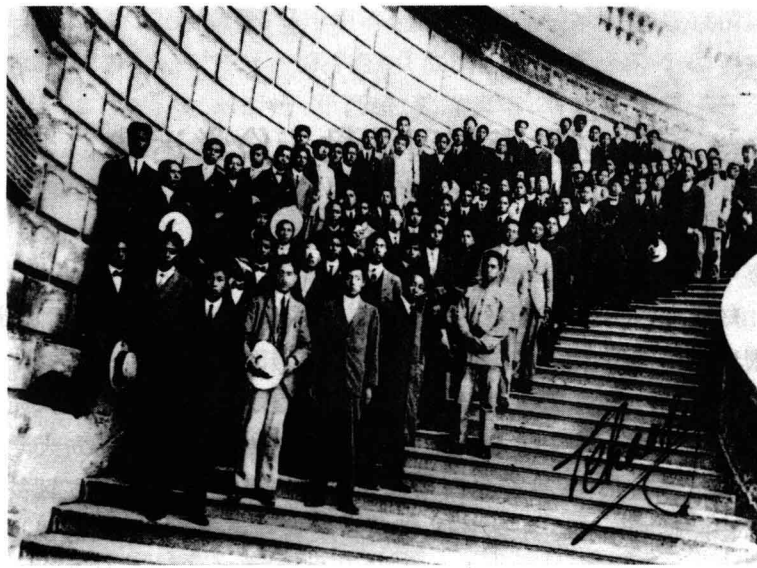
经过革命风暴的洗礼与锻炼，马骏迅速成长起来，1920 年 9 月考入了新创办的南开大学文科。是年冬，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转年冬，又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战斗征程。

4. 赵世炎与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赵世炎(1901—1927)　四川酉阳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一。1922年，与周恩来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总书记，又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1923年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秋回国，先后担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和中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兼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6年调到上海，任中共江浙区委组织部长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五大中央委员，代理江苏省委书记。因叛徒出卖被捕，于7月19日英勇就义。主要著作收入《赵世炎选集》。

远 渡 重 洋

五四运动以后，赵世炎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在李大钊的关怀与指导下，决定赴法国勤工俭学。1919年9月，先到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吴玉章在北京主办的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学习法文。1920年5月9日，赵世炎从上海搭乘法国“阿尔芒勃西”号船启程，同船的共有学生126名，以湖南、浙江和四川3省的人居多。毛泽东和部分留法勤工俭学生到杨树浦码头送行。从华法教育会1919年3月派送的第一批赴法勤工俭学算起，这已是第12次了。轮船行至香港前，赵世炎给《北京晨报》写了《航海中之赴法学生消息》，及时报道旅途的情景和心情。在船上，他和王光祈合写了一首歌：“山之涯，海之湄，少年中国短别离。短别离，长相忆，奋斗到底，唯我少年有此志气。”表现了莘莘学子赴法留学的坚定信念。船航行了37天，于6



1920 年 5 月，留法勤工俭学生抵达法国马赛后的合影。第三排右起第一人为赵世炎

月 15 日抵达马赛。次日，赵世炎转至巴黎，被分往沙突居里公学，开始了勤工俭学的新生活。

刚到法国时，赵世炎没有找到工作，除补习法文外，帮助华法教育会做些编辑出版工作。8 月，开始在巴黎西郊工业区赛克鲁的一家铁工厂做杂工。10 月，又转到三德建的 1 家铁工厂作工。勤工俭学的生活异常紧张，每天除劳动 8 小时之外，要利用节假日和工余时间，坚持 3 个小时的学习，埋头攻读法文版《资本论》和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还经常会见朋友，在一起讨论问题，并为国内的《少年》杂志汇集稿件，及时报道勤工俭学的情况。经过几个月的艰苦生活，赵世炎对法国华工的处境和资本主义的本质有了深切的认识，表示要以务实的精神，“于千辛万苦中杀出一条血路”。

其间，赵世炎同从国内先后来到巴黎勤工俭学的陈毅、李富春、李维汉、张昆弟、聂荣臻、蔡和森、向警予、李立三、邓小平、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都见了面，对彼此感兴趣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由于赴法勤工俭学生日渐增多，绝大部分学生无工可做。出路何在？在留法学生内部的认识上不一致。蔡和森等认为勤工俭学

不可能，主张发起一个求学运动，迫使驻法公使拨款，以解决入学问题；赵世炎等则主张应继续勤工俭学，可通过做工，接近留法华工，进行工人运动。

发起成立“勤工俭学学会”

组织起来，是进行斗争的首要出路。1920 年 2 月，李富春、李维汉等已组织了“勤工俭学励进会”；8 月，蔡和森、王若飞等又将“勤工俭学励进会”改名为“工学世界社”，会员有 30 余人。1921 年初，赵世炎和李立三、刘伯坚等共同发起成立“劳动学会”，赵世炎在成立大会上明确表示：要革命，首先要把华工组织起来。

为了要求改善生活，争取中国政府津贴，1921 年 2 月 28 日，蔡和森、向警予等领导勤工俭学生 400 余人向中国驻法国使馆请愿，要求“面包权、读书权、劳动权”。“二八运动”虽迫使使馆答应发放 1 个月的生活维持费，但驻法公使陈箓却勾结法国政府出动军警，驱散和殴打学生。赵世炎等不赞成请愿，没有参加这次活动，但事件发生后，表示十分愤慨，与李立三等 8 人联名发表声明，反对当局殴打中国学生，号召全体勤工俭学生团结起来，共同进行斗争。

赵世炎、李立三等以“劳动学会”为领导核心，于 3 月发起成立“勤工俭学学会”，由赵世炎负责主持，会员很快发展到 200 余人，蔡和森、向警予、李富春、李维汉等没有参加。但两个团体都主张革命，宗旨很接近，他们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分歧，只是做法上的区别。为了促成勤工俭学生两派的团结，赵世炎主动给蔡和森写信，希望交换意见，商讨今后的斗争方略。4 月，赵世炎从巴黎去克鲁梭，专程绕道蒙达尼，与蔡和森在树林里尽情地交谈了 3 天，最终化解了双方的分歧，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团结。经过赵世炎、蔡和森等的努力，赴法勤工俭学的各部分学生很快联合起来，为今后斗争采取统一行动，奠定了基础。这时，留法勤工俭学生已达 1 300 余人。

4 月，赵世炎来到法国最大的铁工厂克鲁梭施乃德钢铁厂作工。下班后，他要写文章、刻蜡版、搞发行，生活与工作相当艰苦和紧张。当年在法国已有华工 10 余万人，克鲁梭是华工的中心，这里的华工是

被北洋军阀政府卖给法国政府的，得不到人身自由。赵世炎十分关切华工的状况，经过与厂方交涉，争取到部分华工脱离合同，获得了自由。5月，赵世炎与李立三等，在克鲁梭组织华工组合书记部，还在华工中建立了消费合作社、工会读书会等组织，主办《华工周报》，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华工斗争开辟了新路。

“拒款斗争”和“进占里大”

北洋军阀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向法国政府借款的消息传出后，立即遭到勤工俭学生及旅法华工的坚决反对。赵世炎和周恩来、蔡和森等联合巴黎的各进步团体，组成“拒款委员会”，1921年6月30日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约300余人，大会主席赵世炎宣布3条开会理由：一为磋商全体反对之办法；二为预防将来借款之阴谋；三为宣布对于法国之态度。会后发表了《拒款宣言》。但是，中法两国政府不顾勤工俭学生的爱国行动，仍然商妥借款，并由3亿法郎增至5亿法郎。为表示抗议，8月13日，赵世炎、蔡和森和周恩来等再次召开拒款大会，迫使陈箓签署了中法借款条约作废的声明。拒款斗争历时两个月，终于取得了胜利。

是时，作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倡导者的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假借勤工俭学生的名义，募捐兴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吴稚晖从国内招收了120名官僚子弟入学，剥夺了勤工俭学生的入学权利，驻法公使馆还宣布即将取消勤工俭学生的维持费，激起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无比愤怒，他们推选赵世炎为总代表向校方交涉，决心“誓死争回里大”。遭拒绝后，在赵世炎、蔡和森等领导下，9月17日各地代表齐集巴黎召开大会，决定将巴黎、圣日尔曼等地100余名学生组织起来，成立勤工俭学生联合委员会，并宣布此次运动：“为谋勤工俭学生全体的根本解决，以开放里昂大学为惟一目标。”“我们的信条是：(一)誓死争回里大；(二)绝对不承认部分解决；(三)绝对不承认考试。”21日，学生们由巴黎等地连夜赶到里昂，准备进占大学校舍。但学生们的行动遭到当局镇压，驻法使馆同法国政府勾结，于22日派来数十名

武装警察，包围了里昂大学，并将围坐地上的学生们强行拖上囚车，扣押在炮台内。而赵世炎利用学生代表出入交涉的机会，找一个和自己模样相似的人进来探望大家，进来后将探望的条子交给赵世炎，这个人留下来，使赵世炎机智地得以逃脱，成为得以留在法国继续进行艰苦的工作的惟一幸运者。10 月 13 日，吴稚晖勾结法国政府将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 104 人强行遣送回国。

创建“旅欧少年共产党”

赵世炎出国前，已在国内参加了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活动。赴法后，他与陈独秀保持着密切联系，并在勤工俭学生和华工中开展活动，培养积极分子，为建党建团工作创造条件。陈独秀曾委托张申府在欧洲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共产党组织。“二八运动”后，根据陈独秀的来信，赵世炎与 1921 年元旦到达巴黎的张申府接上了关系。是年春，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 5 人，组成旅欧共产党组织，成为在法国最早的中共党员。

进占“里大”失败后，赵世炎到法国华工最多的北方作工。1922 年 4 月，陈独秀等曾催促他回国。可是，赵世炎想在国外找一段时间“专门读书”，决定暂不回国。这期间，赵世炎一直和在柏林的周恩来、张申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也经常同在比利时的李维汉、刘伯坚、王若飞、聂荣臻通信，共商组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问题。在赵世炎等发起下，6 月下旬，由旅法、旅德、旅比 3 个支部推选的代表 18 人，在巴黎西郊的布伦森林里召开了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大会。会议由赵世炎主持，他首先报告了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重要意义及建团的筹备经过，并宣读了陈独秀的来信。大会讨论了团的章程，决定组成“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 3 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赵世炎任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会议还决定出版机关刊物《少年》月刊（后改为《赤光》）。“少共”后来和国内中央取得联系，于 1923 年 2 月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亦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之部”），周恩来任书记。此外，赵世炎还帮助陈延年、陈乔年兄弟 2 人，抛弃无政府主义思想，转变为

马克思主义者。是年秋，赵世炎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萧三共5人，经胡志明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是时，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正式成立，张申府任书记，赵世炎为法国组负责人兼中共中央驻巴黎通讯员。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23年3月，赵世炎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等12人前往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结束了长达2年9个月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张申府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赵世炎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恽代英也称赞赵世炎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体现了时代精神"。

赵世炎是在李大钊的关怀下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志士，他回顾自己亲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时，感慨地说："李先生可算是我的导师，也是我的引路人，我来巴黎参加勤工俭学运动完全是由于他的鼓励和赞助。他要我把劳动和学习打成一片；把法国工人当教师，向他们学习语言、技术和工艺，也研究他们的世界观、对生活的态度，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通过同志的关系，在共同劳动中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我每月都要和他通信，向他报告学习情况。李先生回信往往在我的原信上眉批和夹注，另外也给些指示，他对我既是体贴又是细致，时常嘱咐：注意锻炼身体，饮食不可吃得太苦，千万不可染上酗酒和玩弄妇女的恶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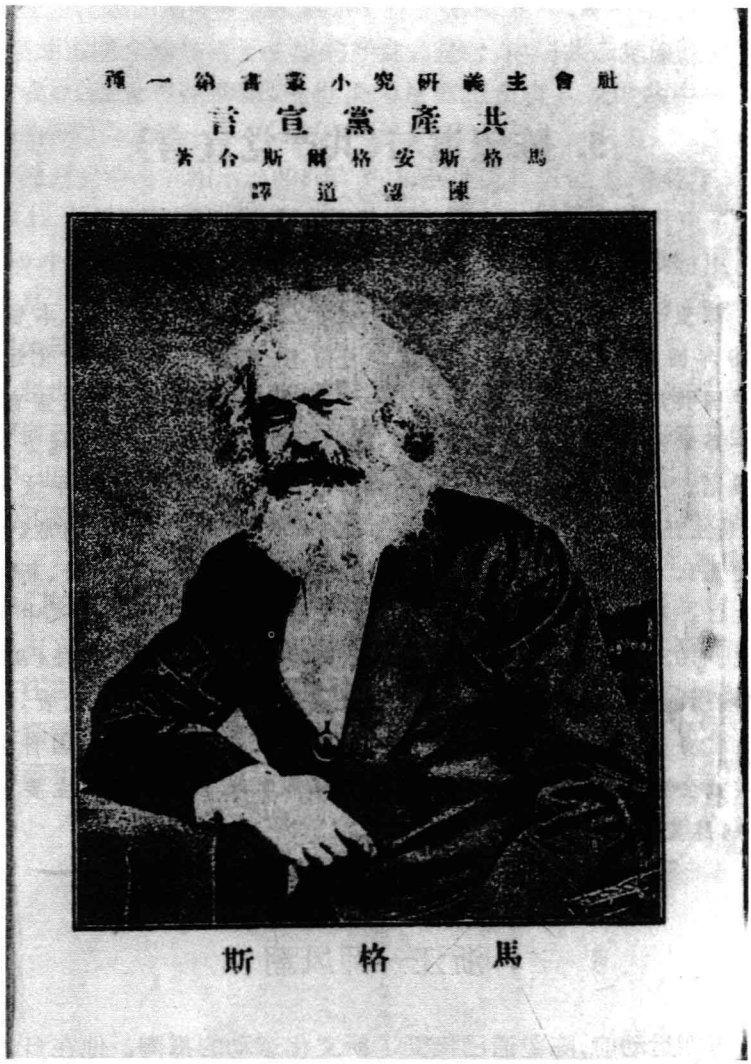
5. 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1891—1977)　浙江义乌人。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后,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最早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年参加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首任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二大后,退出共产党。先后任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上海大学兼任中文系系主任、教育长。1932年出版《修辞学发凡》。抗日战争时期任迁移重庆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新闻系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校长。1957年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1961年任《辞海》编辑委员会主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四届代表,四届人大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四届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主要著作收入《陈望道文集》。

浙江一师风潮

五四运动前,陈望道已接受了新文化运动的熏陶。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结识了日本著名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受他们的启发与帮助,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向往十月革命的道路,逐渐认识到"救国不单纯是兴办实业,还必须进行社会革命",并积极开展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的传播活动。

在五四运动的召唤下,1919年6月初,陈望道毅然返回祖国。途经杭州时,新派人物、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经亨颐聘请其为语文教员,并与该校的3位进步教师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一起提倡白话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文，从事新文化的宣传活动，被仇视新文化运动的顽固势力称为“四大金刚”。正当此时，浙江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 2 期上发表《非孝》一文，宣扬“孝是一种奴隶道德，孝子是奴隶的别名，忠不过是专制主在政策上的一种利用”，提倡“改造社会，非从根本改造不可”，主张推翻封建家庭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这篇文章，在浙江文

化教育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而这 4 名教员因支持新思潮而受到牵连，被反动当局以提倡“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而撤职查办。然而，这种行径却遭到校长经亨颐和进步学生的坚决抵制，经亨颐因不接受省教育厅的命令被撤销其校长职务，学生们愤起抗议，紧紧关闭学校的铁门，将新校长拒之门外。反动当局竟然出动大批军警包围该校，制造了流血事件。这就是风靡一时的“浙江一师风潮”。事态逐渐扩大，激起杭州、北京、上海等城市广大师生的声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纷纷来电，表示“誓为后盾”。风潮过后，陈望道和其他 3 名教员再也不能在杭州任教了，只好“自动离职”。但是，陈望道经过这场风潮的洗礼，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变得更加成熟起来。

《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问世

五四运动前后，国内已有一些进步报刊上陆续介绍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译文的片段内容，首先是先进知识分子渴望能早日见到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以进一步向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1920 年初，陈望道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勇敢地承担起试译《共产党宣言》的重任。

是年 4 月，任教不到半年的陈望道离开浙江一师，回到了景色秀丽的家乡浙江义乌县分水塘村，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为了预防敌人的突然袭击，他躲藏在一间破旧柴屋里，夜以继日地伏案译文，平日只有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陪伴。南方山区的早春，依旧寒气袭人，冰冷潮湿，有时手脚被冻得酸疼发麻。因手头缺乏足够的资料和必要的工具书，只根据“星期评论社”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和陈独秀提供的英文本进行转译，后来又以俄文本校对。在这种环境恶劣和异常艰苦的条件下，他熬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深夜，迎来了一个又一个的黎明，依靠顽强的毅力，花了很大心血，终于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的中文本，全部译成。

《共产党宣言》之所以能够翻译出版，还得到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和陈独秀的大力资助。5 月中旬，陈望道被邀请来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是时，他将试译的《共产党宣言》带到上海，原准备在《星期评

论》周刊上发表，可是该杂志已于6月上旬被迫停刊了，故将“宣言”译本交给了陈独秀。此事在《俞秀松日记》中有详细记载：陈望道此时得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已经成立，6月27日委托上海党的发起组成员俞秀松，将译好的《共产党宣言》送到陈独秀家里去。“这篇宣言底原文是德语，现在一时找不到，所以只用英、俄、日三国底译文来对校了。”次日，俞秀松“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谈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译书的人，每天以译书度生活，总许有八千字，才能生活”。

8月中旬，陈独秀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交送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研究社，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正式出版。陈独秀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由维经斯基拿出一笔经费，帮助建立了“又新印刷所”，负责承印《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这个版本比小32开本略小一点，是平装本，用3号铅字排印，封面上印有水红色的马克思半身坐像，上端印有“共产党宣言”5个大字，下面印有“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的署名。这就是第一部《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

非同凡响的《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出版后，使中国人民第一次看到这个伟大历史文献的全貌，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投书《星期评论》，询问“宣言”的出版发行情况。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星期评论》的编者之一沈玄庐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了一则题为《答人问〈共产党宣言〉底发行所》的公开信，写道：“凡研究《资本论》这个学说系统的人，不能不看《共产党宣言》，所以望道先生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工夫，把彼底全文译了出来，经陈独秀、李汉俊两先生校对，可惜还有些错误的地方，好在初版已经快完了，再版的时候，我很希望陈望道亲自校勘一道！”同时，上海发起组成员还在群众中广泛开展《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共产党宣言》中的口号抄录在1921年贺年片的背面，陈望道等带到“大世界”和南市一带公共场所散发。

《共产党宣言》是当年各地党团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必读书目之一，极大地影响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转变。陈望道看到新文化运动的闯将鲁迅在《新潮》上发表“现在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我们也可告无罪于天下了”的意见，十分赞同，特地把一本《共产党宣言》寄赠给了鲁迅。鲁迅当天就把这本书翻阅了一遍，对它备加赞扬，说这是“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他是真正肯为大家着想的”。为了表达对陈望道的谢意，鲁迅将一册《域外小说集》回赠给陈望道。青年毛泽东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读过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他在1936年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共产党宣言》当时是被反动当局视为“洪水猛兽”的“禁书”，可是真理的声音是无论如何也封锁不住的。该书1920年8月初版，只印刷奉送1 000余册，又于9月再版，而后又多次再版，有很多地方翻印，有的书社翻印近20余次。仅平民书社一家，从1926年1月至5月就翻印了10次。《共产党宣言》在我国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和发展，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必要准备。

6. 李汉俊与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李汉俊(1890—1927) 湖北潜江人。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科,通晓日、德、英、法4国语言。回上海后,从事翻译和撰写工作,担任上海《星期评论》编辑。建党前后,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面成绩卓著。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组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之后主编《劳动界》周刊,并参与指导武汉的建党筹备工作。是年12月任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当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候补委员。之后,脱离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中华大学任教,并主持武昌大学校务工作,兼任湖北省教育厅长和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青年部长,同时积极从事武汉地区的工人运动。1927年12月被国民党桂系军阀杀害。

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与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来往甚密,受之启发良多,因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不从根本上来改变是不行的"。1918年底,李汉俊毕业回国,将许多日、德、英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带到上海,他以旺盛的精力,昼夜伏案翻译和写作,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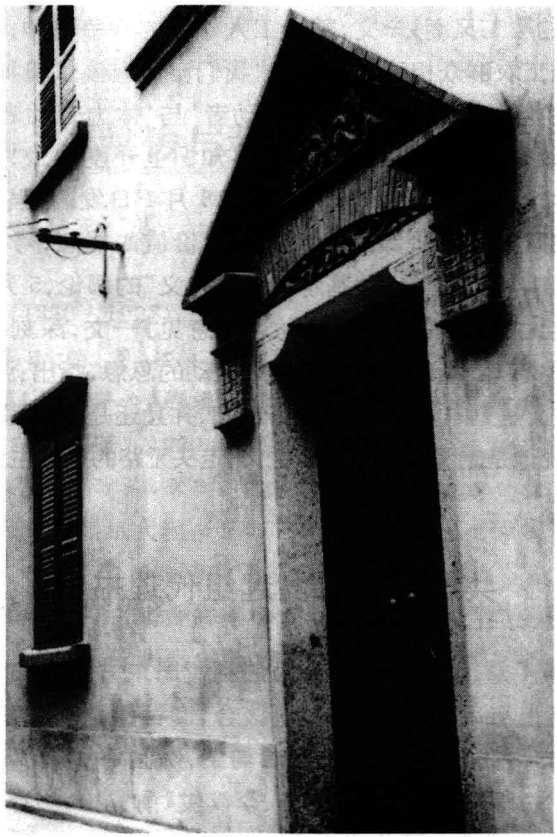
李汉俊回上海不久,参加了《星期评论》周刊的编辑工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从回国到党成立的1年半时间里,李汉俊用多个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支持工人运动的文章与译文,共90余篇。他所发表的文章,着力支持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26日发表

《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一文，赞扬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希望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认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1920 年 5 月 1 日发表《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号召人民觉醒起来，打倒强盗阶级。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谬论，5 月 16 日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一文，深刻批评了张东荪所鼓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劳工运动的思想，指出：张东荪"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无内容的、仅只一个趋向、并且还是一个浑朴的趋向。"我们"只好说他是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

1920 年 4 月，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从北京到上海后，曾多次召集座谈会，商讨建党问题，李汉俊每次都积极参加。在维经斯基的指导参与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 5 人，于 5 月共同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李汉俊为党组织执笔起草了 1 份纲领草案，约有 10 余条，主张社会革命。随后，陈公培和施存统各自抄了 1 份，分别带到了法国和日本。8 月，维经斯基成立了上海革命局，李汉俊是 5 人成员之一。

上海发起组建立后，李汉俊主持组织工人的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努力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 年 8 月，他和陈独秀等创办了工人通俗刊物《劳动界》，李汉俊担任主编。他和陈独秀以发起人的身份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启事：申明办《劳动界》，"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希望该刊"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李汉俊经常给这个刊物撰稿，在发刊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说："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



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主要活动地点：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

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8月22日，发表《金钱和劳动》一文，质问：“钱既然是代表劳力的，何以一天到黑一点事都不做的人，反有钱用，一天做到黑的工人和农夫反没有钱用呢？”9月，李汉俊还和俞秀松、陈独秀共同商议，为上海工商友谊会创办店员周刊《上海伙友》。10月，李汉俊又与陈独秀、杨明斋、李启汉等，出席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并被授予“名誉会员”的称号。

建党之初，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共产党书记由李汉俊代理。陈独秀离开上海后，凡重要之事，多由李汉俊和李达、

陈望道、杨明斋等人讨论决定。《新青年》亦交李汉俊和陈望道主编，并改为党的机关刊物。李汉俊经常通宵为《新青年》赶写稿件，也给上海发起组成员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写了不少稿子。此外，李汉俊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

1921 年 3 月初，上海法商电车工人举行罢工，李汉俊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论《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和评论《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驳斥了诽谤工人“没有团结性”，“没有知识”等论调，高度赞扬工人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说：“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之运动，所以有莫大希望也是在这里。”称赞 4 天罢工的成功，“是因为罢工同人齐心，稳静之所致”。这年的五一劳动节，李汉俊和上海发起组成员分别到沪西、闸北和南京路等处散发传单。这些活动，对于上海工人运动，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

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做出重要贡献

陈独秀离沪赴粤后，李汉俊除主持上海发起组的工作外，其主要精力是忙于中共成立大会的筹备工作。首先是与陈独秀直接指导了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创建，李汉俊从日本回到上海时，遇上湖北同乡的老同盟会员詹大悲和董必武，他将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介绍给他们，使他们茅塞顿开，喜出望外。董必武回忆说：读了李汉俊从日本带回来的许多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后，“逐渐明了俄国革命列宁党的宗旨和工作方法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上海发起组建立不久，李汉俊介绍董必武入党，并给在武汉的董必武、张国恩去信，约他们在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随后，董必武与陈潭秋、赵子健等人商讨建党事宜。同时，陈独秀在上海发展刘伯垂入党并委托其回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联系，于 1920 年秋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其次是为筹备建党而与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得联系，并同李达一起以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名义，给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派 2 人到上海开党的成立大会。再次是设法为党的活动筹措了部分资金；为会议提供了开会场所，一大会场就设在他的寓所（现中共一大会址）。最后为一大

执笔起草了《宣言》，可惜未能在会上获得通过。

建党前，李汉俊同陈独秀产生过思想分歧。陈独秀 1921 年 2 月从广州寄来起草的党章草案意见，主张中央集权制。李汉俊看后十分不满，也起草了 1 份草案，主张地方分权制。并且认为："要搞社会革命，便不得不依靠宣传。因此，我们必须要着手进行著述。"他提倡在党内第一注意是宣传，主要是理论宣传，尤其主张在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办专门的学校，设立马克思主义图书馆，翻译书籍。两人因在民主集中制问题上的意见相左，逐渐加深了裂痕，而党内大多数人赞同陈独秀的主张。于是在党的一大召开前，李汉俊愤然辞去代理书记职务，改由李达代理。

1921 年 7 月，李汉俊和李达代表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出席了党的一大。会上，李汉俊同张国焘之间引起激烈的争论。李汉俊说：马克思是唯物主义依据环境不同而定，中国是否适用无产阶级专政，当须研究；并且认为共产党的基础不必建立在工人上，可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对此，张国焘在会上对他进行了过分的批评。会后，李汉俊又参与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即《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 4 国语言，勤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有相当高的马克思主义水准，在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中被公认是出类拔萃的，受到党内许多人的称赞。董必武曾多次称李汉俊，是他的"马克思主义老师"。由李汉俊介绍入党的沈雁冰回忆说："我很钦佩他的品德和学问。""李汉俊绝顶聪明，他是投身革命后才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但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是相当高的。可惜他忙于组织工作，这方面没有留下什么著作。"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李汉俊是中共党内"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并对李汉俊后来退出共产党，不无遗憾地说，这使"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优秀的理论干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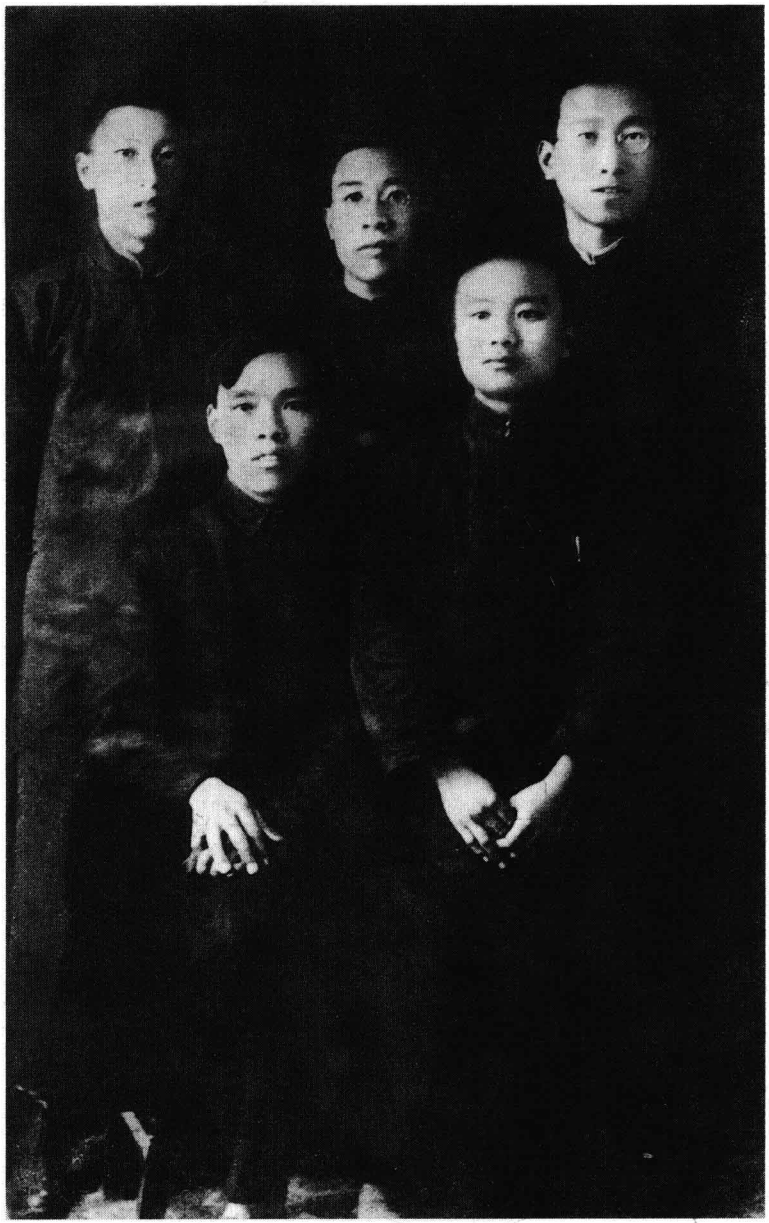
7. 俞秀松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俞秀松(1899—1938)　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参与领导“浙江一师”学生运动，创办《浙江新潮》。1920年初在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5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8月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21年3月赴莫斯科出席少共国际二大。1922年创建杭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兼任书记，相继在杭州、宁波、绍兴、福州等地开展建团工作。1925年再次赴苏，担任党的临时委员会书记，先后入中山大学、列宁学院学习和任教。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至1937年，由苏联派往新疆做盛世才的统战工作，担任新疆反帝总会秘书长、新疆学院院长等职。1937年底，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托派”并遭逮捕，1938年押送苏联而迫害致死。1962年追认为革命烈士。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予以彻底平反昭雪。1996年8月，正式平反，恢复名誉。主要著作收入《俞秀松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上海青年团首任书记

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怀着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热情，离开学校和家庭，来到上海，在陈独秀等主办的“新青年社”、李汉俊等主办的“星期评论社”和邵力子等主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求职，渴望通过这些进步报刊寻找真正的出路。

1920年3月，年仅21岁的俞秀松离开“北京工读互助团”回到上海，参加《星期评论》社工作。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一行到上海后，一面帮助组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一面介绍苏俄青年团的组织情况，积极推动青年团的创建。5月，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委托杨明斋、俞秀松进行筹建青年团的工作，特指定发起组中最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部分团员合影。后排左起第二人为俞秀松

年轻的成员俞秀松担任团的书记，具体负责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筹建之初，在讨论团的名称时，多数人主张由“青年社会革命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建团宗旨是实行社会改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于是一部分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成员退出了组织。

8 月 22 日，俞秀松和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李汉俊、金家凤、袁振英、叶天底共 8 个社会主义者，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编辑部召开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大会。团的机构最初为俞秀松、施存统等 4 人组成的主席团，共同领导团的全部工作。团的办公机关设在法租界霞飞路新渔阳里 6 号（今淮海中路 567 弄 6 号），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以避敌人耳目。此时，青年团书记俞秀松还兼任外国语学社的秘书，具体管理学社的日常行政事务，并在学社攻读俄文。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中国的第一个团组织，在革命史上有重大的意义。正如任弼时后来高度评价说：“1920 年成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先于中国共产党而诞生的，它对建党工作，在某种意义是起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作用。”

青年团临时中央书记

上海青年团建立后，党的上海发起组在前来上海的各地青年学生中间发展团组织，首批团员大都是“外国语学社”的学生，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王一飞、彭述之、柯庆施、傅大庆、梁柏台、李启汉、李中、汪寿华、廖划平、庄文恭、任作民、胡士廉、任岳、周兆秋、谢文锦、吴芳、华林、蒋光慈、曹靖华等共 30 余人。上海青年团重视政治学习，每星期举行 1 次政治报告会，由俞秀松介绍政治形势和团的工作，有时也邀请陈独秀、陈望道、沈玄庐、李达等作演讲。

上海青年团作为全国青年团的发起组，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上海青年团建立后，向各地社会主义者寄出团章和信件，要求发展组织，建立青年团。不到半年，在北京、广州、长沙、武汉、天津、唐山、太原等许多大城市相继建立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截至 1921 年 3 月，全国的青年团员共有 1 000 余人，其中上海的青年团员已达 200 人。随着团员人数逐渐增加，为了统一各地团的组织，4 月在上海成立了青

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仍任书记。委员会内设秘书、教育、组织、编辑、宣传、联络、图书处共8处，每个团员都要在某一处担任工作。随后，遂将上海发起组召开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的工作移交给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

建党初期，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组织，而青年团是半公开的组织，党的许多活动都以团的名义进行，团和党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有许多团员同时也是共产党党员，有许多党的重要成员兼做青年团的工作。青年团在配合党开展各项工作方面，起到了忠实助手的作用。党的上海发起组通过青年团在上海、天津、唐山、长辛店、广州等地区，组织开展了许多罢工斗争。

出席青年共产国际“二大”

1921年春，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部书记格林写信给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邀请上海和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各派1名代表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经上海发起组研究，决定委派俞秀松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他在北上赴俄途经哈尔滨时给父母和家人写信，道出了此次莫斯科之行有3个目的：一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特派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二作为上海留俄学生的代表联系外国语学社派送学生留俄事宜；三早日实现赴苏俄学习求知的渴望。而北京选派的代表何孟雄3月底离北京行至满洲里时，不幸被奉系军阀逮捕，未能成行。

1921年7月，俞秀松代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共产国际二大会上作了报告，详细介绍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情况及任务，他说：“团的基本工作是接近劳动群众和研究共产主义、社会科学等。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许多团员渴望接近工农和研究他们的状况，于是他们离开大学，下到工厂，在那里建立基层鼓动组织。”“在中国工业区开办了一系列日夜学校，每周还组织宣传员小组，在大街上举行群众会，与广大群众交谈。青年团为本团提出的任务是帮助工人争取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等。”还说：“我们的目标是在中

国贯彻和执行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当然要考虑那些并不影响贯彻这些决议本身的性质，但或多或少与中国现实的特点有关系的事务上的问题。”最后说：“青年共产国际下设的远东青年书记处就其任务需要将与我们密切联络。青年团派遣团员赴俄，是打算在最近的将来不仅为本团，而且为上述书记处培养需用的党员工作干部。”希望“并肩携手在青年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把几亿人的苦难深重的中国引向幸福而欢乐的共产主义制度。”从此，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国际青年运动开始发生了联系。

到1922年5月，全国已建立了上海、北京、南京、天津、武昌、长沙、杭州、广州等17个团的地方组织，团员总数达5 000余人，建立全国青年团的条件已经具备。5月上旬，青年团上海临时中央局在广州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施存统任团中央书记，俞秀松等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

8. 杨明斋与上海外国语学社

杨明斋(1882—1938)　山东平度人。1901年赴苏联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做工谋生。十月革命后,加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0年春,随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来华,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转为中共党员,是党的上海发起组成员。先后担任华俄通讯社社长和上海外国语学社校长,并协助创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机器工会和上海工人游艺会。1921年6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党成立后,主要从事翻译和理论研究工作。1925年被委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大革命失败后回国,在平津一带从事教育和写作。1930年秘密越境进入苏联,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938年5月以被捏造"罪名"遭逮捕牺牲。1989年被苏共恢复名誉。著有《评中西文化观》、《中国社会改造原理》等。

上海外国语学社校长

杨明斋出身于山东一个贫苦家庭,早年移民至俄国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做工谋生,后参加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中国最早的俄共(布)党员之一。1920年春,杨明斋作为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的翻译和助手来到中国,在帮助沟通维经斯基同李大钊、陈独秀之间的联系上起了重要作用。他陪同维经斯基到上海后,积极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建工作,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之一。

1920年8月,杨明斋、俞秀松受上海发起组的委托,建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俞秀松任书记,杨明斋负责总务工作。上海发起组将《新青年》改为机关刊物后,杨明斋经常为该刊撰写稿件。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年7月至1921年7月,他在上海报刊上发表文

章共 140 余篇。

为了输送革命青年赴苏俄深造，以储备中国革命的干部力量，在维经斯基的帮助下，上海发起组委派杨明斋负责筹办外国语学社，1920 年 9 月上海外国语学社正式成立，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兼秘书。上海外国语学社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一起办公，为掩护革命活动，以公开的学校形式为名，挂一块“外国语学社”的木牌子。这里还有华俄通讯社、教育委员会等党的公开或半公开的工作机构。

外国语学社设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 6 号，是由杨明斋经手租赁的 1 幢 2 楼 2 底的独院的石库门的建筑，原为戴季陶的住宅，戴起初同上海早期共产党人关系密切，迁出之后，这里就成为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活动场所。选择这个地点，还因为这里离陈独秀寓所老渔阳里 2 号很近，来往方便。楼上是机关办公的地方，杨明斋住在楼上的亭子间里，房间里只放 1 桌 1 床，陈设极其简陋；楼下是教室，不上课时用作其他活动。除俞秀松、李启汉、刘少奇、许之桢、柯庆施等少数学生住楼上外，大部分学生在校外租廉价的民房住。

外国语学社的活动

从 1920 年 9 月 28 日至 10 月 2 日，在上海《民国日报》第一版连续刊登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每人选学一班者，月纳学费银二元。日内即行开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实际上，在外国语学社聚集的大批优秀学生，大多数不是招收来的，而是由各地共产党和青年团选送及有关人士介绍来的，以湖南、浙江、安徽 3 省为最多，少时有二三十人，多时达五六十人。学生的生活很艰苦，每月生活费只有 5 元左右。

根据学社的安排，学生半日上课，半日自修；除学习俄文外，还学习《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党》月刊等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俄语由杨明斋和维经斯基夫人库兹涅佐娃教授；维经斯基夫妇于 1921 年春回

上海外国语学社旧址

伊尔库茨克后，由陈独秀友人老同盟会会员王维祺的女儿王元龄接任俄语教师。李达教授日语，李汉俊教授法语，袁振英、沈雁冰教授英语，俄国新闻记者斯托比尼教授世界语。图书馆是沈雁冰捐赠自己的稿费办起来的，由学生周伯棣兼管。此外，学生还参加一些革命实践活动，如帮助华俄通讯社和《劳动界》作些收发、缮写、校对，以及

参加一些纪念活动的筹备等工作。

除此之外，在维经斯基指导下，上海革命局在新渔阳里 6 号还创办了华俄通讯社，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首先建立起来的一个工作机构，由上海革命局成员杨明斋任社长。该通讯社的工作，一方面是从北京、上海把中国的消息译成俄文，通过电报发往莫斯科；另一方面是把介绍俄国革命的稿子送《新青年》和《民国日报》等报刊登载。该社专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的稿件，为中国 31 家报纸提供消息，每天从美国和苏俄等报刊上发出去的翻译材料都要经杨明斋之手。华俄通讯社在沟通和交流中俄两国情况、传播革命理论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上海发起组建立后，该通讯社改属上海党组织领导，仍由杨明斋主持。

选送优秀学生赴俄深造

前来学社学习的学生思想比较复杂，有的信仰马克思主义，有的信仰无政府主义。针对这种情况，上海发起组首先在学社开展建团工作，发展 20 多名团员，其中有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萧劲光等，他们成为中国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

为了从青年团员中挑选优秀分子提前赴苏俄学习，1921 年初，上海发起组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包惠僧和杨明斋担任正副主任。2 月下旬，四川青年廖划平等 17 名赴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焦急地等待赴俄国的机会，杨明斋耐心地对他们说："学习俄语六个月后，究竟能否过去还未定，因不晓得俄政府的回信怎样。"负责介绍学社学生赴俄的斯托比尼教授，则充满自信地表示：没有问题，"因为俄政府很欢迎学生，所防的是中国政府的侦探。"

从 1920 年冬至 1921 年 3 月，由杨明斋具体安排，外国语学社选派 30 多名学生分 3 批赴苏俄学习。第一批有王一飞、傅大庆、梁柏台、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汪寿华、庄文恭、任作民、胡士廉、任岳、周兆秋、谢文锦、吴芳、华林、曹靖华、韦素园等，他们先到海参崴经赤塔，于 7 月转至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第二批有柯庆施等；第三批有许之桢、廖划平等。他们中的

大多数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未能去苏俄学习的其余学生，被分配到国内各地工作。

建党前，杨明斋由俄共(布)党员转为中共党员。1921 年 4 月，杨明斋赴伊尔库茨克，和张太雷一起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中共建党及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六七月间，他又和张太雷一起，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参加共产国际大会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

1921 年 7 月 7 日至 15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又刊登外国语学社添招新班广告，内称："本社添招英文、俄文、法文、日文学生各一班。有志向学者，请即至法界霞飞路渔阳里六号报名，每班报名者满念(即二十)名以上即行开课。报名费一元；学费每月二元。"从实际结果看，添招新班的计划未能实现。由于杨明斋及留苏学生已离去，外国语学社活动随即结束了，仅存半年多时间。

杨明斋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他主持的外国语学社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所干部学校，为党的早期建设和干部培养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首批赴苏学习的学社学生曹靖华回忆说：杨明斋为"渔阳里开辟了一代人的道路"。"为中国人民铸造了一批英雄，一批顶天立地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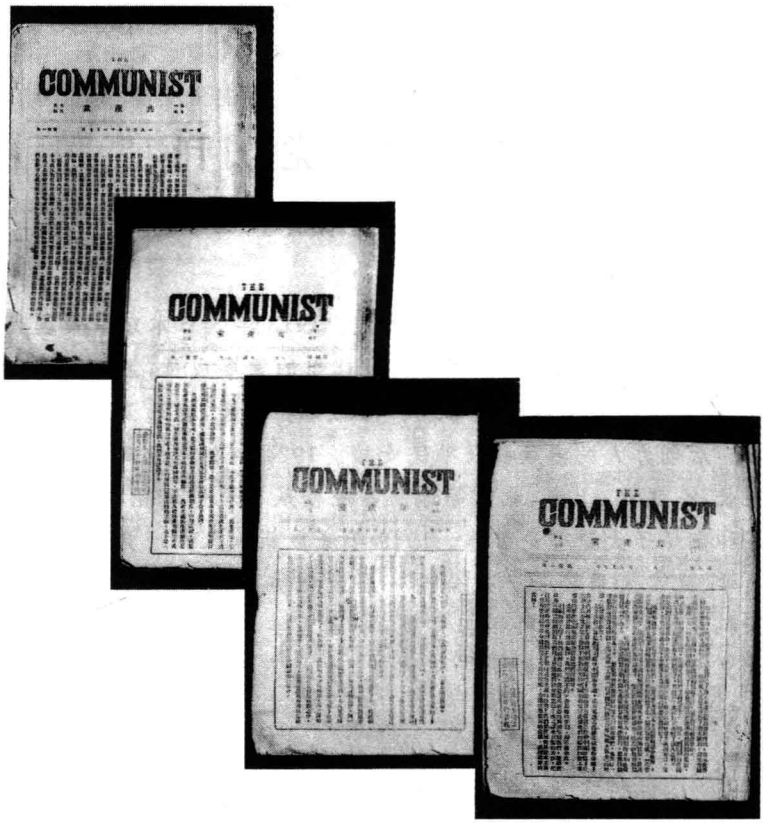
9. 李达与《共产党》月刊

李达(1890—1966) 湖南零陵人。1913年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就读。1920年回国,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主编《共产党》月刊,担任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后创办人民出版社及平民女校。1924年9月脱离共产党。长期在长沙、武汉、上海、北京等地高等院校从事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理论著作。1949年底重新加入共产党。先后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是全国一届政协委员,全国三届人大常委,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委,中国哲学学会会长。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主要著作收入《李达文集》。

主编《共产党》月刊

1920年8月,留学日本的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主义革命之目的回到上海,陈独秀告诉李达,他已与李汉俊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并邀请李达参加,李欣然接受,随即成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一面积极开展工人运动,一面大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从8卷1号起,改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李达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经常为该刊撰稿。在北洋军阀统治下,言论和出版都受到钳制,《新青年》作为公开的刊物,难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同时《新青年》原是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需要继续发挥其学术性强的特色,所以仅有这样一份杂志已远远不能满足筹建共



李达主编的《共产党》月刊

产党的需要，必须要有一个内部的理论刊物。

为了宣传党的主张，统一建党思想，上海发起组决定创办理论性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向各地共产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的建党学说。该刊由陈独秀、李达、俞秀松、杨明斋等筹办，李达担任主编，陈独秀、袁振英等参加了编辑工作。编辑部设在李达的寓所，先是在老渔阳里 2 号，后移至南成都路辅德里 625 号。

根据形势的需要，《共产党》月刊创刊号选定在 1920 年 11 月 7 日，即俄国十月革命 3 周年纪念日，表明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政党。该月刊着重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和俄国共产党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共产党的基本知识和列宁的建党学说，旗帜鲜明地

揭露和批判无政府主义和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思潮，探讨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明确显示中国共产主义者要按照列宁的建党思想，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思想理论战线上的主将

李达每期都为《共产党》月刊撰写社评性的《短言》、消息和重要文章。在《短言》中明确宣布："我们共产党在中国有二大使命，一是经济的使命，一是政治的使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就是"担当这改造政党改造政治改造中国底大责任"。还指出："共产党底根本主义，是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就是用共产主义的生产制度来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号召中国无产阶级"举行社会革命，建设劳工专政的国家"，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

建党前后，在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激烈论争中，李达充当反对无政府主义主将的角色。针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倡导"绝对自由"的谬论，李达以"江春"的笔名在《共产党》月刊上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这些文章阐明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组织和纪律、集中和领导的必要性，指出："共产主义的生产组织是集中的，无政府主义的生产组织是分散的。共产主义的原则主张把一切农业工业的生产机关，都移归中央管理"，"要使各地方各职业的生产力保持均平，无论如何，非倚赖中央的权力不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否定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诬蔑这是共产党故意造成的不平等，文章指出："以这有限制的生产，听各人消费的自由得其平等，是绝对办不到的。"当生产事业若是发达到了极点，"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但"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文章深刻揭露和批判无政府的理论渊源和哲学基础，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他坚定地表示："我奉劝我们相信无政府主义的朋友们，总要按照事实上理论

上去为有效的努力，不要耗费有益的精神。”为了干革命事业，他大声疾呼：“我要推荐马克思主义了。”

呕心沥血办刊物

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下，随时都有刊物被查封和人员被搜捕的危险。李达在十分困难的秘密工作环境里，将其主要精力和全部心血都投入到主编《共产党》月刊上面，在最紧张的时候，从写稿、审稿，到校对、发行，全部工作几乎都由他一人承担。刊物的经费虽然由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支付，但遇到拮据时，李达仍要四处奔波，设法筹措，有时把自己译著的稿酬拿出来垫支。

为了掩人耳目，《共产党》的名称不便对外使用，曾以《康敏主义周刊》（“康敏主义”即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无政府》、《安那其》等封面出版，发表文章也多不署真名。《共产党》月刊还出现过不能如期出版的情况，如第 3 号本应 1921 年 1 月 7 日出版，结果到 4 月 7 日才出来，间隔了 3 个月，原因是付印前，稿件曾被法国巡捕房没收，所以该期的首篇文章的头一页以“开天窗”的方法，用醒目的大号字写上“此面被法捕房没收去了”，以作抗议的警示。

《共产党》月刊是一个半公开的刊物，共出刊 6 期，于 1921 年 9 月停刊，最高发行量达到 5 000 份。该刊的历史使命虽然暂短，但作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必读材料之一，在广大革命者中广泛流传，争相阅读，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贡献。上海发起组要求其成员除阅读《共产党》月刊外，每星期还组织一次学习会，由李达和杨明斋两人负责讲解，再组织大家进行讨论。李大钊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一则《通知》中，向会员和进步学生推荐这个刊物。毛泽东当年在给蔡和森的信中，称誉《共产党》月刊“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并将该刊发表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文章推荐给长沙《大公报》发表。

1921 年 2 月，李达接替李汉俊代理上海党的书记，主持上海发起组的全面工作。由于李达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党的宣传工作上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使之得以在党的一大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

10. 谭平山与广州共产党组织

谭平山(1886—1956)　广东高明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1921年发起组织广东共产党,先后任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书记、中共广东支部书记。是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任中共驻国民党中央的党团书记,出席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均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主席。1927年11月被开除党籍。1930年参与组织反对蒋介石集团的第三党。抗日战争回国后,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发起组织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为该会主要负责人。1948年在香港参与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常务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是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以及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收入《谭平山文集》。

建立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

谭平山与陈公博、谭植棠,既是广东同乡又是北京大学同届同学。他们在五四运动时期,直接受到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思想的教育和影响,转变成为社会主义者。谭平山于1920年3月发表《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一文,阐明组织政党,应以一定的主义为中心,党内应注重政治问题的研究,提出明确的政纲。7月,谭平山与陈公博、谭植棠毕业后,3人一起回到了广州,谭平山被分配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从此开始了他在广东的革命生涯。

谭平山等回广州不久,根据陈独秀的函约,着手组建广东社会主

义青年团。他们经常同先进的知识分子刘尔崧、阮啸仙、周其鉴、张善铭等一起，探讨中国的前途和广东的时局问题，并于1920年8月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发起组织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制定章程，成立干事局，选举谭平山等为职员。团的章程宗旨规定："研究社会主义，并采取直接行动的方法，以达改造社会的目的"。最初团员有10余人，以高师学生最多，也有一中、农业学校的学生。11月，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与多数主张社会主义的"互助团"合并为一，团员增至数十人，谭平山仍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谭平山等为团员们专门设立一个图书馆，一面学习研究理论，一面从事社会主义运动。

1921年1月中旬，在广州公开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以青年学生为主体。青年团成立后，特别注意吸收工人和农民加入，以推动工农运动。早期的团员有：林祖涵（伯渠）、刘尔崧、阮啸仙、杨匏安、罗绮园、周其鉴、彭湃等。建团初期，因缺乏明确的思想和具体的计划，团的活动于三四月间一度停止下来。到10月，上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对广东青年团提出改组要求，谭平山受上海青年团中央的委托，再次负起组建广东青年团的重任，使广东青年团最终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心思想，不少团员后来转为共产党员。

此外，广东社会主义者还十分注意开展宣传教育工作。谭平山除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外，也是沈玄庐主编的《劳动与妇女》周刊的主要撰稿人。谭平山还担任"注音字母教导团"教员，他和陈独秀、陈公博、谭植棠等一起，向100余名青年灌输进步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

创办《广东群报》

1920年9月，俄共（布）委派米诺尔（又名斯托扬诺维奇）和别斯林，以建立俄罗斯通讯社名义前往广州，计划组建广州革命局，协助开展工人运动和建立广东党组织。当时以区声白、梁冰弦、刘石心等为代表的无政府派在广东声势很大，俄共（布）两代表由北京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陪同，首先同广东无政府主义者建立联系，进行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工人运动的教育，成立了无政府派占大多数的"共产党"组织。10月初，由米诺尔和别斯林出资，创办无政府主义刊物《劳

动者》周刊，以梁冰弦、黄凌霜等为主要撰稿人。因政见不同，谭平山和陈公博、谭植棠，拒绝参加这个组织。所以，出席党的一大广东代表陈公博在《广州共产党的报告》中评价广东最早的“共产党”时说：“与其称作共产党，不如称作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

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北大读书时，曾立志毕业后回广州创办报纸，在华南宣传新思想新文化。他们回广州后，积极筹办一份日报，取名为《广东群报》，于1920年10月19日出版，陈公博任总编辑，谭平山任新闻编辑，谭植棠任文学副刊编辑。陈独秀从上海来信，对《广东群报》的出版，表示支持与恭贺，并特意为创刊号撰写《敬告广州青年》一文，对广州青年寄予殷切的期望。《广东群报》设有评论、研究、杂著、马克思研究、特别记载、工人消息、留法通讯等专栏。该报以宣传新文化，主张改造社会相号召，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无政府主义，指导工人运动等。

谭平山以《广东群报》为宣传阵地，用大量篇幅报导各国共产党及工人阶级的组织活动，介绍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同时自己也撰写了许多战斗性很强的政论与时评。他在创刊号上发表《对于文化宣传的我见》，提出要打破保守遗习，主张“应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我国固有的古代文化……求个补充和改革办法，使之成为一种新生的文化。”在时评《废娼问题》中指出：“想实行社会改造，必要自扑灭私有财产制度始”。在《万国庆祝声中我们中国劳动界的鏖战声》一文，强调劳资双方利益的冲突，“是万不能调协的。简直说来，劳动阶级，与资本阶级，是势不两立的。”

《广东群报》在广东地区影响很大，成为广东各地群众运动的领导者。有不少进步青年团结在它的周围，建立了工会、学生会、妇女会等。《新青年》杂志对《广东群报》曾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该报是“中国南部文化运动的总枢纽，介绍世界劳动消息的总机关，是在广州资本制度下奋斗的一个孤独子，是广东十年来恶浊沉霾空气里的一线曙光。”

广东共产党支部书记

1920年12月，陈独秀应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邀请，

由上海来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谭平山任副委员长兼《广东教育会杂志》撰述员。共产国际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同期来到广州，积极推进广东党组织的创建工作。是时，无政府主义者因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党纲”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内容而退出“共产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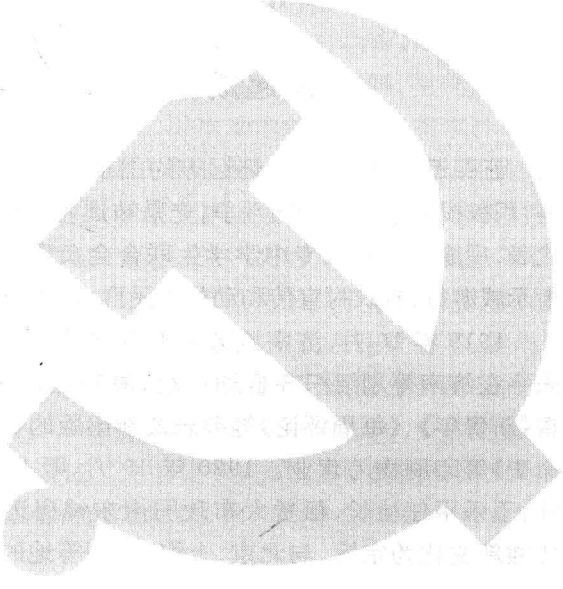
陈独秀利用在广东的合法地位，约集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开会，并对他们3人说：现在孙中山在广东建立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机会；为使民众运动获得发展，必须像上海、北京那样，建立共产主义者的组织。谭平山同意陈独秀的意见，表示“实在需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组织，以宣传和组织民众，为振兴中华做出努力”。经过酝酿，1921年3月，在广州开始成立真正的共产党组织，党员有：陈独秀、米诺尔、别斯林、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9人，先后由陈独秀、谭平山担任书记。广州共产党组织建立后，正式决定把《广东群报》改为党的机关报。

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吸收新党员，1921年春，广州共产党组织设立了“宣传员养成所”，由陈公博任所长，谭植棠任教导主任，谭平山和陈独秀、谭天度等都在该所任教。陈公博出席中共一大从上海返回广州后，由谭平山主持，在宣传员养成所召开党员大会，听取陈公博关于党的一大精神的传达。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谭植棠分别负责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为了对工人进行教育，党组织在广州河南机器工会开办了几期机器工人夜校，谭平山担任夜校董事长。他还着手在广州组织土木建筑、裁缝、茶居等各行业的工会，并派梁复燃、王寒烬等到佛山组织工会，先后成立了拥有1 500多人的佛山市土木建筑工会、佛山理发工会等。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在广州设立南方分部（后称“广东分部”），谭平山任南方分部主任。此后，在南方分部的领导下，广东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土木建筑工人、车衣工人、广三铁路工人、纸业工人等，举行了一系列罢工斗争，均取得了胜利，并且最终导致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爆发。

中共成立后，广东共产党支部陆续吸收了一批先进青年加入共产党，刘尔崧、阮啸仙、张善铭、杨匏安、冯菊坡、罗绮园、周其鉴、冯菊

坡、梁复燃、王寒烬、谭天度等，都是广东共产党支部成员。后来，在中共广东支部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仍以谭平山为书记。1922 年 3 月，谭平山主持召开有 3 000 多人参加的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大会，并当选为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书记。



11. 王尽美与济南共产党组织

王尽美(1899—1925) 山东莒县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是山东大专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与邓恩铭成立进步学生团体“励新学会”，创办《励新》半月刊，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组建济南共产党组织，出席中共一大。建党后，任山东支部书记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和北方分部副主任。1922年1月出席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参与领导了京奉铁路山海关罢工和开滦五矿总同盟罢工。1923年任中共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年主办《山东劳动周刊》。1925年任山东地委组织部长。2月与邓恩铭等领导胶济铁路工人罢工。8月在青岛病逝。

发起成立“励新学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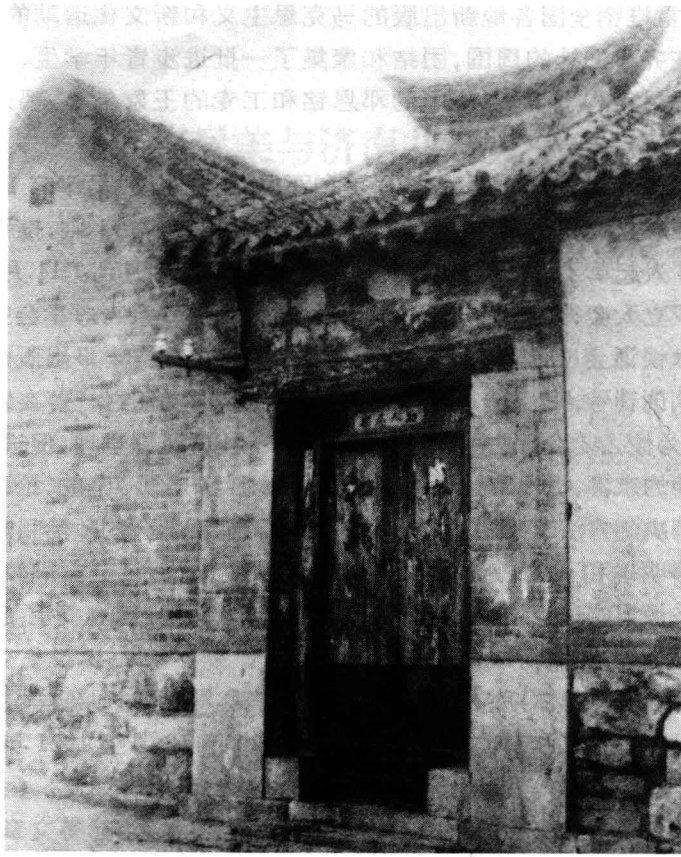
五四运动爆发后，少怀远志的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王尽美，积极投身于这场爱国斗争，先是被选为济南一师北园分校的学生代表，后成为山东大专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他带领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到农村宣传和动员农民群众，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号。

1919年10月，济南地区著名的进步人士、山东省议会议员王乐平在济南筹划组织齐鲁通信社，最初在社内附设贩书部，专以销售《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及新出版的《资本论入门》、《俄国革命史》等印刷物为营业。1920年10月，贩书部逐渐扩充为齐鲁书社，王乐平任社长，租赁大布政司街东铺房正式营业。该社确定以传播新文化为宗旨，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出版界建立广泛的联

系，着重推销全国各地新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的书刊。于是在齐鲁书社的周围，团结和聚集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其中一师的王尽美和王志坚、一中的邓恩铭和工专的王象午等，都是该书社的骨干分子。

1920 年秋季开学之后，王尽美和邓恩铭、王志坚、吴隼等 11 人发起酝酿成立“励新学会”，草拟了《简章》9 条和《宣言》1 则，推举王尽美等 4 人起草了详细《会章》，并决定出版《励新》半月刊。11 月 21 日召开成立大会，会员最初有 19 人，最多时达到 50 余人。学会经常举行学术谈话会、讲读会，发行各种进步刊物。12 月 15 日出版《励新》半月刊创刊号，王尽美是励新学会的两个编辑主任之一。在发刊词《我们为什么要发行这种半月刊》中宣布：要以“研究学理，促进文化”为学会的宗旨，提出“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励新学会的政治目标当时尚不够明确和一致，其成员思想状况比较复杂，但社会影响较大，作为山东最早的进步学术团体，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励新学会的活动，持续到 1921 年 6 月。

《励新》从第二期起，由王尽美担任编辑。他通过励新学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新思潮。从 1920 年 12 月至 1921 年 4 月，王尽美在《励新》等刊物上，连续发表《乡村教育大半如此》、《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和《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等文章，抨击旧教育制度的衰败与黑暗，探讨农村教育的改革问题，明确提出“要普及乡村教育”，“提高平民的文化，以推动泡尔雪帷克（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传播。此外，在《励新》第 1 期发表《女子装束问题》，提倡女子剪发，装束淡朴，以便把修容时间用到事业学问上。他在《励新》第 5 期登载的王全《成年补习班与工学主义》一文的“附志”中写道：“我总以为劳动者所以屈服在资本家之下，那种利权并不是资本家本身所特有的，是以前那些劳动者假给他的，现在劳动家既觉悟了，就马上把这种利权收回来，也就是物归原主的意思，于理论上是很对的，于事实上也没有什么困难。不过当这大多数未觉悟之先，少数觉悟者，不得不先尽传播酝酿的责任。”这些文章表明，王尽美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重要性，标志着他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济南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地点：济南金胜街30号

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在励新学会活动过程中，以王尽美、邓恩铭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春，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王尽美多次赴北京大学参观学习，参加过该会的活动，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并经常与李大钊、罗章龙等取得联系。

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活动，得到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党组织的支持与推动。1920年夏秋之交，王尽美等在读书活动中，尽力

收集和研究共产主义的书籍和理论，秘密发起成立了与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相似的“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随后，王尽美联系邓恩铭和育英中学教师王翔千等人，公开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济南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会员由十几人很快发展到五六十人。会址设在省教育会，门口挂上写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木牌子，会员胸前都佩戴1枚瓷质马克思像的圆形小徽章。王尽美等组织会员阅读《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等马克思主义书籍，开展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每逢周六集会，王尽美都要给大家介绍马克思学说，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以自己思想转变的经历，分析批判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等无政府主义思想，给人们启发和教育。研究会还经常在公园和闹市举办演讲会、报告会和纪念会等活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影响愈来愈大，为创建山东共产党组织，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1年3月，反动当局以“宣传过激思想”为借口，将研究会强行解散。随后，研究会的成员发生了分化，大多数人加入了共产党和青年团。同时，由北京党组织成员宋介主编的进步刊物《曙光》杂志，与山东进步知识界关系密切，王乐平主办的齐鲁通信社和书社成了《曙光》杂志在山东的代办处。

创建济南共产党组织

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最先得到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直接指导。1920年6月，陈独秀函约在山东名望很高的王乐平在济南组织共产党。王乐平本人虽然没有参加，但推荐热衷于革命活动的青年学生王尽美、邓恩铭来完成这项任务。王尽美、邓恩铭等从此开始与上海发起组取得联系。在此过程中，上海发起组成员杨明斋也到过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等会面，商讨建党事宜。大约在1921年春，济南共产党组织成立，最初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

1921年五一劳动节，在王尽美和王翔千的领导下，在济南创办了劳动周刊社，该社在《大东日报》副刊开辟《济南劳动周刊》专栏，这是山东党组织的第一个刊物。《济南劳动周刊》的“出版宣言”申明：“我

们出这周刊，为的是促一般劳动者的觉悟，好向光明的路上去寻人的生活。”提出要坚持3个方针：一“增进劳动者的智识”；二“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三“改造劳动者的生活”。该刊以通俗的语言，向劳苦大众灌输工农进行阶级斗争，争取自身解放的思想。王尽美等还经常深入到济南的津浦铁路机车厂、鲁丰纱厂、新城兵工厂、兴顺福、齐夏等铁工厂，向工人讲述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什么要组织工会，为什么要有工人的政党等，通过组织教育，在工人中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是时，北京党组织派王荷波来山东指导开展工人运动，并于6月在济南津浦铁路机车厂建立了山东第一个工人俱乐部和4处工人补习学校。

鉴于王尽美和邓恩铭在建党中的出色表现，1921年7月，他俩代表济南共产党组织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党的一大以后，成立了共产党山东区支部，王尽美任书记。

王尽美1925年7月病逝。董必武1961年8月21日特作《忆王尽美同志》诗一首：“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舟泛语从容。济南名士知多少，君与恩铭不老松。”表达对这位英年早逝的昔日战友的深切怀念。

12. 施存统与旅日共产党组织

施存统(1899—1970)　又名施复亮。浙江金华人。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因写《非孝》一文而名声大振。1920年5月参加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后赴日本留学,负责组建旅日共产党组织。1922年回国后,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主编《先驱》,后任上海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以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兼教官。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共产党,在上海、北京、广西、山西等地的大学教学和编辑刊物。抗战胜利后,发起组建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和全国政协常委,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基础知识》、《中国现代经济史》、《实用经济学》、《经济科学大纲》及翻译《资本论大纲》等。

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

五四爱国运动从北京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杭州也爆发了学生运动。受新文化新思潮的影响,1919年11月,浙江第一师范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非孝》一文,宣扬"孝是一种奴隶道德,孝子是奴隶的别名,忠不过是专制主在政策上的一种利用",提出"改造社会,非从根本改造不可"的主张。这篇文章所产生的社会轰动效应,在文化界教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也使这位20岁的青年人名声大振。但《非孝》的思想,却被统治当局视为大逆不道,因此刊物遭到北京军阀政府查禁,浙江一师陈望道、夏丏尊等4名进步教师和校长经亨颐,都因支持新思潮而受到牵连,施存统本人在杭州也失去了栖身之地。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浙江一师风潮"。年底,施存统与俞

秀松等来到北京，加入工读互助团。转年3月下旬，又同俞秀松一起到上海，在星期评论社求职。

1920年5月，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陈独秀、李汉俊等正式筹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施存统是最早的5人成员之一。上海发起组起草了纲领草案10余条，主张社会革命。是时，施存统抄了1份，随身带到日本。

留学日本的革命活动

1920年6月19日晚，施存统乘船离开上海，漂洋过海东渡日本留学。出发时，俞秀松等星期评论社的同人为他送行。26日，施存统到达日本东京，经戴季陶的介绍与资助，暂住在日本社会主义者宫崎滔天的家里。不久，又搬到宫崎家附近的高田村1556号的三崎馆居住。

施存统到日本后，入东京同文书院就读，专攻经济学，并开始从事社会主义研究。在留日期间，施存统潜心研究日文版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同时又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河上肇、山川均等的影响，使他的思想产生很大变化。他积极参加国内思想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先后在《民国日报》副刊、《共产党》月刊、《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了《唯物史观和空想》、《经济组织与自由平等》、《我们要怎么样干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首领变节》、《再与太朴论主义底选择》、《马克思底共产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底应用》和《马克斯主义底特色》等文章。当时，施存统竭力将日本社会主义者著述的社会主义宣传杂志及其他印刷品，翻译成中文，寄往国内发表，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留日之初，施存统同国内无政府主义者保持联系，为无政府主义宣传杂志《自由》的通讯人。后来，这些从安徽芜湖寄来的无政府主义宣传品被日本当局截获，便将施存统列入“必须注意的人物”，于是从1921年初起，他受到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和监视，处在被严密的暗中侦察之下。5月之后，更是“每日受日本警察骚扰”。“被警察跟踪，一

举一动皆受约束”。

留学期间，施存统除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近滕荣藏、宫崎滔天及其子宫崎介龙等密切交往外，还经常同国内的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邵力子等保持联系，商讨有关建党事宜。这些都给了他以相当大的帮助。施存统经与李达商议，决定“筹备发行秘密出版物”，“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施存统 1921 年 5 月 26 日给邵力子信中说：“中国是产业落后的国家，现在还不足以实行共产主义。”“要顺利到达共产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我主张颠覆旧社会，建设无产阶级国家。”“中国的无产阶级，多缺乏自觉性，没有训练和组织，要在短时间内使他们有觉悟、有训练、有组织，势必借助于政治力量。”信中表示：“我极力主张在中国实行马克思主义”，“希望您和李达等一起加入讨论，乘机宣传主义。”表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立场。

旅日共产党组织负责人

施存统到日本东京后，经陈独秀介绍，与在日本鹿儿岛留学的上海共产党组织成员周佛海取得了联系。1921 年 4 月下旬，周佛海从鹿儿岛给施存统发来两封信。在 4 月 19 日的来信中，转达了广州陈独秀写给周佛海的来信，信中说：陈独秀已与上海、湖北、北京各处的同志协商，让施存统和周佛海“二人作为驻日代表，和日本同志进行联络”。周佛海表示：“日人中很少知道我们有此团体，我等应竭尽全力。”同时提出自己面临的两个困难：一是“我明年离开鹿儿岛，这一年间，居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什么也未能干。”二是“我大学志愿是在京都，但和日人联络仍然不便。”周请施能将此意转告陈独秀。可见，旅日共产党组织是 1921 年 4 月下旬由陈独秀正式提议成立的，成员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 2 人，施存统被指定为旅日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

在中共建党筹备期间，日本警视厅查获了近期将召开中共一大的情报，更加紧对施存统的监视。此时，施存统接到上海共产党组织的通知，经与周佛海取得联系后，决定由周佛海作为旅日共产党组织

的代表出席7月下旬在上海举行的中共成立大会。

中国共产党建立后，旅日共产党组织发展党员约10人。1921年10月，张太雷受共产国际委派秘密来到日本，邀请日本派遣10名左右进步人士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0月5日，张太雷持周佛海的介绍信来到施存统的住处，在施的陪同下，张与日本社会主义者近滕荣藏等见了面。大约1周时间，张太雷顺利完成了使命，促成日本社会主义者同意参加远东民族代表大会。施存统为沟通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与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也做出了贡献。

1921年12月下旬，施存统因从事革命活动，有所谓参与授受"赤化宣传运动资金"嫌疑而遭拘捕及审讯。北京《晨报》和上海《申报》都曾报道过施存统被捕的消息。在审讯过程中，施存统态度从容，丝毫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及共产主义的信仰。日本当局无奈将施存统驱逐出境，他于1922年1月7日回到了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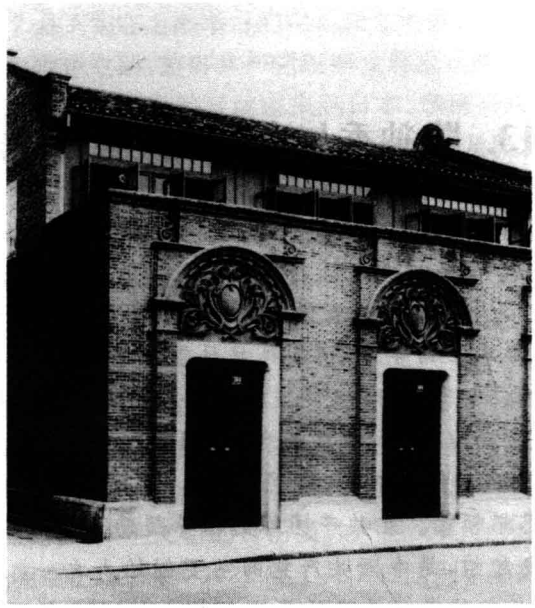
13. 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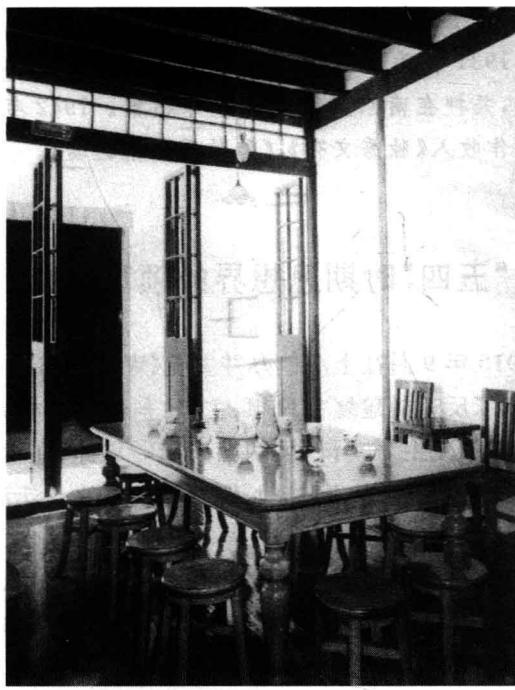
陈独秀(1879—1942)　安徽怀宁人。早年赴日本读书。1903年回国,在上海与章士钊等创办《国民日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辛亥革命后,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积极倡导新文化运动,是五四运动的思想领袖。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帮助下,1920年5月创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当选为书记,之后连续五届为党的最高领导人。1927年因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并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1931年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南京监狱。1937年出狱。1942年在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

“五四”时期思想界的领军人物

陈独秀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了反对封建复古思想,主张“科学与人权并重”的民主主义思想,举起了“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从此,在中国大地吹响了反对封建旧思想、旧道德、旧礼教、旧文学的新文化运动的号角,陈独秀由此名声大噪。

1917年初,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聘请,担任北大文科学长,《青年杂志》社由上海迁至北京,改名为《新青年》,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等新派知名人士,都参与编辑工作。1918年底,陈独秀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促进新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和会场：上海兴业路76号

化运动进一步的发展。在同旧派思想的斗争中，陈独秀于1919年1月发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有力回击旧派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坚定表示：要为拥护“德”（民主）、“赛”（科学）这两位先生继续斗争，“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他欢呼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这次革命“当做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此时，陈独秀由推崇法兰西文明转为崇尚社会主义革命。

“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左翼实际上起了领导作用。陈独秀同情并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1919年6月，他亲自草拟并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而被捕入狱。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巴黎和会的反动实质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12月，他在《〈新青年〉宣言》中提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引者）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人们赞美《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在《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号召和推动下，广大知识青年的觉悟空前提高。陈独秀是进步思想界文化界的领军人物，当时被共产国际视为“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毛泽东当年称赞陈独秀“为思潮界之明星”。后来又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迅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参加工人运动，由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首任书记

从1920年初始，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探讨组建共产党问题。2月，李大钊乘骡车在护送陈独秀从北京至天津的途中，两人商讨了“计划组织中国共产党”之事。到天津以后，曾与革命者秘密聚会，叙谈中国革命和建立革命政党的问题。不久，陈独秀回上海即成立了社会主义者同盟。

为了解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形势，联络革命团体并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派维经斯基和几位助手来华。维经斯基等先在北京同李大钊会面，双方交谈建党意见，后到上海会见陈独秀，进一步商讨建党问题。是时，在陈独秀和《新青年》的

周围，已集聚了一些进步社团及其刊物的骨干分子。维经斯基通过陈独秀，约请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邵力子、戴秀陶、张东荪等，在新青年社多次召开座谈会，共同讨论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改造，以及筹建共产党问题。后又有沈雁冰、周佛海等加入。陈独秀提出建立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多数人的拥护和支持，但戴秀陶、张东荪等因反对成立共产党而声明退出。

在维经斯基的指导帮助下，经过多次酝酿协商，1920 年 5 月，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 5 人筹建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陈独秀为临时书记，并起草了具有党纲、党章性质的纲领 10 条左右。8 月，维经斯基又成立了上海革命局，成员有维经斯基、陈独秀、李汉俊、杨明斋等 5 人。上海发起组的成立，为筹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条件和干部条件。

上海发起组成立后，陈独秀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工作。从 1920 年 9 月起，由他主编的《新青年》改为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系统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编辑部设在陈独秀的寓所法租界环龙路老渔阳里 2 号（今南昌路 100 弄 3 号）。陈独秀在该刊发表《谈政治》一文，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剖析了张东荪、胡适等人的言论实质，指出："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11 月，陈独秀和李达等筹办了党的第一个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由李达编辑。同时，在陈独秀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明确提出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旗帜鲜明地宣布共产主义组织的宗旨和原则。这个宣言曾起过临时党纲的作用。

陈独秀还大力组织和开展工人活动。他一到上海，就跻身于工人运动，深入工厂搞调查研究，参加工人的纪念活动。1920 年 4 月，陈独秀在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劳动者底觉悟》演说，用通俗语言向工人解释了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他称赞社会上各项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只有做工的是台柱子，因为有他们的力量才把社会撑住。"同时，他和上海各工界团体发起成立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筹备会，并被推为顾问。5 月，《新青年》出版

“劳动节纪念号”，比平时篇幅增加了 1 倍多。是年夏天，他和李汉俊等创办了工人通俗刊物《劳动界》周刊，陈独秀参加编辑工作。10 月，他参与创办了店员工人的通俗刊物《伙友周刊》，并写了发刊词，强调工人阶级团结的重要性。他还和工人代表李中一起制定了《机器工会章程》，筹备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陈独秀在该工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称赞：“发起这个上海机器工会，算得是一个很好的事。”并被吸收为名誉会员。秋天，他又和李启汉等在工人集中地区沪西小沙渡开办了“工人半日学校”，采取多种形式，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中去。

从五四运动到建党前后，中国思想领域先后发生过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 3 次大争论，陈独秀担负起后两次争论的主角，他和李大钊、李达等一起猛烈批驳改良主义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坚决捍卫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则，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通过思想争论，巩固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和组织队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

上海发起组建立后，陈独秀与李大钊交换意见，携手创建中国共产党，商定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创建党的早期组织，由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别负责南方和北方的建党筹备工作，因而成为党的两位主要创始人，当时即赢得了“南陈北李”的赞誉。

上海发起组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被公认为党的“中心组”，实际上起着临时中央的作用。党组织的名称，最初叫“社会共产党”，1920 年 8 月，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征求对于党的名称的意见，李大钊定名为“共产党”，陈表示完全同意。

从上海发起组成立起，陈独秀在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指导下，函约各地社会主义者建立党的早期组织，他分别写信给北京的李大钊，济南的王乐平（王没有承担此约，而是推荐王尽美、邓恩铭组党），广州的谭平山、陈公博，湖南的毛泽东，以及在日本的周佛海

和在法国的张申府等，促使国内外早日建立共产党组织。陈独秀还派由他介绍入党的刘伯垂回武汉，与董必武、陈潭秋等组织共产党。不久，这些地区相继成立了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发起组为创建全国性统一的共产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从而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基础。

陈独秀还亲自指导与帮助创建广东党组织。他函约刚刚毕业于北京大学的谭平山和陈公博在广州建党。1920 年 12 月底，他应广东省长陈炯明邀请来广州就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广州着手建立真正的共产党，与无政府派的“共产党”分道扬镳。1921 年春，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有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等。

从 1920 年 9 月开始，上海发起组着手筹备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实际工作。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共同努力，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先是在上海举行，最后一天移至浙江嘉兴闭幕。出席代表 13 人，代表全国党员 57 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伊尔库茨克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会议主席是张国焘，秘书长是毛泽东。会议最后选举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李达负责宣传，张国焘负责组织。党的一大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陈独秀因事未能出席党的成立大会，仍被选为党的首任书记。这表明陈独秀作为“五四”时期的大思想家，其思想之锐敏，魄力之坚强，影响之巨大，非他人所可及，尤其是他在新文化运动的声望，加上共产国际的信任与支持，以及在建党方面的突出贡献，使之成为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陈独秀于 1921 年 9 月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一职，赶回上海，主持党中央的工作。

14. 沈玄庐与衙前农民运动

沈玄庐(1883—1928)　又名沈定一。浙江萧山人。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曾留学日本,在东京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浙江省首届议会议员。1916年任浙江省第二届议会议长。五四运动前后,在上海和广州主编《星期评论》和《劳动与妇女》等刊物。1920年同陈独秀等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重要成员。1921年4月回到家乡萧山衙前,发动以抗租减租为中心的农民斗争,成为党最早领导的农民运动。1923年赴苏俄考察。1924年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后堕落为国民党右翼的"西山会议派",被中共开除党籍。1928年8月在萧山遭刺杀身亡。

发动家乡农民开展斗争

浙江省萧山县衙前村,地处萧(山)绍(兴)平原,这里河港纵横,交通便利,土地肥沃,堪称鱼米之乡。但是广大农民在军阀政府和地主豪绅的欺压剥削下,终年过着牛马般的生活,苦不堪言。沈玄庐出身于萧山颇有名望的大官僚地主家庭,祖父辈拥有大量的土地和房屋。但沈玄庐本人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提倡社会革命,信奉共产主义,同情农民群众,认为"农民在国民中占最大多数,中国底社会革命,应该特别注意农民运动。"他乐善好施,将家中的钱财慷慨资助公共事业,对佃户从不逼租,实际上已背叛了剥削阶级家庭。沈玄庐将田产分给贫农和佃农的举动,深得衙前及其邻近各村农民的信赖和拥戴。

早些时候,沈玄庐在上海主编《星期评论》。1920年5月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立后,沈玄庐是重要成员之一。他和俞秀松等最初计划开展农民运动,曾多次"讨论农村计划"、"组织农村"、"下功夫去改

造”农民，打算几个月后到乡下去试行农村计划。按照原打算，沈玄庐与俞秀松同去萧山衙前，由沈组织农村，由俞办一所农村学校，后因俞赴莫斯科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未能成行，这项计划不得不落到沈玄庐一人的身上。

1921年春，沈玄庐从上海回到衙前，专门从事组织农民运动。回到家乡后，首先出资接济给贫苦农民度过生产难关，他对农民说：“这笔钱本来不是我的，还是你们种我底田还来的租，就是你们农人自己底血汗。现在只好算农人帮助农人，不好算我帮助你们。”本村农民李成虎手捧着40元钱，哽咽地说：“我看得这注钱心痛！”

沈玄庐在家乡时，头戴毡帽，身穿农民服装，口操方言土语，到农民群众中去演说，向农民做宣传和发动工作。他经常对农民说：“一根麻秆容易折断，一捆麻秆就折不断，大家要团结，人多力量大。”1921年8月18日，他在衙前东岳庙，面对百余农民、工人演讲，开场白：“你们用了许多气力，造成世界，而吃世界上一切的痛苦；我想替你们设法，免避痛苦；但这事到底是你们自己切肤的事，所以你们自己须要明白，并且要奋斗！”19日，他在龛山东著草庵戏台发表题为《谁是你底朋友》的讲演，向听众大声疾呼：“攒积金钱的资本家是你们底敌人；专卖气力的劳动者是你们底朋友。”资本家比一只老虎还要凶，使“你们要吃一世的苦痛”。当时听者拥挤不堪，大多数农民工人听了他的讲演，万分感动和兴奋。9月23日，他在萧山山北土地庙戏台向附近二三十个乡村的上千农民，发表了《农民自决》的演说，指出国家是你们劳动者的，国家的主权归你们掌握，你们有了组织，就不怕牺牲。他满怀信心地说：“我的主张，便是废止私有财产，‘土地公有’这个主张，将来必有实现的一天。”号召北山地区农民仿照衙前等村农民协会的组织法，赶快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大地主们总有一天投降你们的。”这次演说揭露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在萧山地区广大农民中引起了广泛强烈的反响。南沙组织农民团体发表《宣言》说：“我们听了他的话，如见天日。”

成立衙前农民协会

沈玄庐回家乡后，常和农民李成虎等接近，谈些农民苦况，萌生

了组织农民协会的动议。在沈玄庐的启发教育下，李成虎等逐渐觉醒起来，愿意与沈共同筹备农民协会。为了促进农协的建立，沈玄庐从自己家里空出数十间房屋，独资兴办衙前农村小学，招收100多名学生，约请杭州第一师范学校进步教师刘大白和进步学生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担任教师。沈玄庐经常和教师们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共同探讨社会变革和农民革命问题。衙前农村小学成为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心。在实际斗争中，各地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如萧山的李成虎、陈晋生等；绍兴的单夏兰等，他们经常出入沈玄庐的家，商议筹备成立农民协会事宜。

1921年9月26日，沈玄庐在衙前农村小学开学典礼上，当众宣布了《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疾呼："照这样下去，不是世界上穷的永远穷，富的永远富，人类最大多数陷于穷困愚笨的一境，这不是人类自杀么？"27日，在衙前东岳庙召开村民大会，正式成立萧山衙前农民协会。会上通过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宣言"提出："我们底觉悟，才是我们底命运。我们有组织的团结，才是我们离开恶运交好运的途径。决定我们底命运，正是决定全中国人底命运。""章程"共14条，明确规定："本会与田主地主立于对抗地位。"大会推举李成虎、陈晋生、单夏兰等6人为农民协会委员。衙前农民协会是中共领导下的全国第一个农民团体，标志着衙前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为农民领袖树碑立传

衙前农民协会的成立，迅速波及到周围三四百里内的农村，每天总有几百名农民前来争索章程，而且要求与沈玄庐见面。在衙前农协的带动下，短短几个月里，萧山、绍兴和上虞3个县的80个乡村，相继成立了农民协会。在此基础上，一个声势浩大的抗捐减租斗争开展起来。农民协会发出告示，作出了"三折还租"的决议（即按原租额的三折交租）。沈玄庐不仅组织农民协会，发动领导农民开展抗捐减租斗争，还带头从自家开始为佃户减租，扩大了影响。有农民协会作主和沈玄庐的支持，这一年萧山县的许多乡村农民都交了六折的租。

农民见到斗争有了初步成果，个个扬眉吐气，心花怒放。

在沈玄庐和衙前农民协会的带动下，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反动当局的极大仇恨与恐慌。绍兴官府趁衙前农民举行集会要求抗租减息之机，派军队进行围攻和封杀。1921 年 12 月 18 日，衙前村及其邻近各村农民协会农民数百人在东岳庙召开联合会，要求抗捐减租。突然遭驻扎绍兴的军队前来镇压，有百余士兵荷枪实弹将东岳庙包围。各村农民一时聚集千余人，一齐拥往庙前，要求军队放回被包围之人。军队以枪刺击伤数人，捕去单夏兰等 3 人，搜去农民协会委员名册，农民被迫撤离。衙前农民协会解散后，沈玄庐作诗歌，写道："杭州城里一只狗，跑到乡间作狮吼；乡人眼小肚中饥，官仓老鼠大如斗。""咫尺家园几万里，班声截断哭声起，狂呼天不理，苍生生命如蝼蚁，呼冤不应除骂无他技。"27 日，衙前农民领袖李成虎被捕，1922 年 1 月 24 日死于萧山县狱中。

沈玄庐对于李成虎之死万分痛心，亲自为其作传，并主持安葬其遗骸于衙前凤凰山，捐款在墓前树碑，碑文上刻有沈玄庐写的"李成虎君墓"，"衙前农民协会委员之一"等大字。后来，沈玄庐特为在东岳庙内设立的"成虎堂"，写了挽联："为群众而牺牲，问耕耘，不问收获；振义声于陇亩，见锄镈，如见须眉。"

衙前农民运动虽然被反动当局镇压下去，但它是中国共产党最早领导农民运动的一次尝试。1922 年 6 月，中共中央执委会书记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报告中，明确记载："浙江方面组织八十农村的农民协会反抗地主，被军警解散，死伤数人。"1926 年 12 月，中共江浙区农民运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议中称赞："萧山农民，正式组织农民协会以反抗地主，实为全国农民运动的历史上最先发轫者。"

15. 李启汉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李启汉(1898—1927) 又名李森。湖南江华人。早年加入湖南进步社团新民学会。1920年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参加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从事工人运动,在沪西小沙渡开办了“工人半日学校”。1921年7月领导上海英美烟厂工人罢工,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兼《劳动周刊》编辑,全力发动和领导上海工人运动。1922年至1924年两次被捕入狱。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委员和干事局长、香港总工会党团书记。1927年在广州惨遭杀害。

领导上海工人运动

上海是中国第一大都市和工商业中心,也是全国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地区。建党之前,上海工人约有四五十万,具有开展工运工作的良好条件,但上海工人运动一直进展得比较缓慢。于是,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决定积极发动和领导了工人运动,派其成员李启汉负责上海工运工作。

为了建立现代工会组织,1920年10月,李启汉等深入到工人集中的海军造船所(今江南造船厂),与共产党员李中等发动工人,发起筹建机器工会。11月,上海机器工会宣告成立,这是党最早组织的工会。与此同时,李启汉在纺织工人集中的沪西小沙渡,主办了“劳工半日学校”,这是党最早组织的工人补习学校。李启汉经常同沪西纺织工人进行联络,一面教工人学文化,一面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为了吸引更多工人参加学习,根据李启汉的建议,将“劳工半日学校”暂改名为“上海工人游艺会”,会员达400余人。12月19日,李启汉

主持了成立大会，并报告开会宗旨及进行方针，他说："现在工人之困苦，由于无智识，无团体，不能互相救济。每人每日除作工以外，什么人生问题，什么世界大事，盲目不知，此即本会成立之原因。至于进行方针，即须解决以上一切困难也。"该组织采取多种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讨论社会问题和人生道路，以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增强工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随后，李启汉还协助成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沪西支部。

1921 年 1 月，为了推动工人运动，上海发起组成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李启汉具体负责。4 月，李启汉主持召开有十几个劳工团体参加的上海各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筹备会，决定发起五一节纪念大会。五一节当天，李启汉、李汉俊、包惠僧等人率领 20 多名积极分子，沿街散发纪念五一劳动节的传单。

上海发起组委派李启汉到浦东，于 7 月下旬组织和领导英美烟草公司 8 000 多名工人举行罢工，这是党领导的第一次罢工。李启汉深入到工人中间，了解情况，与工人广交朋友，一起研究斗争策略。罢工期间，接受厂方贿赂的工头王凤山，诱骗工人擅自上工，但李启汉领导工人坚持斗争，使王凤山的破坏行径未能得逞。历时 3 周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在李启汉的领导下，8 月下旬组织了"上海英美烟草工人会"。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干事

建党后，党的中心工作是开展工人运动。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在全国产业中心上海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早在建党前，李启汉即参加了书记部的筹建工作，参与起草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组织大纲"，并在由马林起草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上签字。"宣言"阐明了书记部的宗旨："是要发达劳动组合，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要联合或改组已成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1921 年 8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作为党领导工人运动公开的总机关，张国焘为主任，李启汉等为干事，其他工作人员有李震瀛、包惠

僧、董锄平等。办事机关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门口挂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牌子。不久,在北京、广州、武汉、长沙、济南设立了5个分部。

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之后,党通过书记部组织和领导了几次工人运动,李启汉大都参与了这些工人斗争的组织和领导工作。

劳动组合书记部通过各种活动对"招牌工会"控制下的工人进行了团结教育工作,加强了工人队伍的团结,提高了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威望。1921年11月,上海各工团举行联席会议,讨论筹组上海各工团联合会。书记部派李启汉、李震瀛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提出预备召集真正工人农民的国是会议;发布全国劳工宣言;成立上海各业工会真正工人的代表团等5项具体主张。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由12个工会团体组成,其中包括一些打着"全国"、"中华"字眼的"招牌工会"。在讨论如何组织上海各工团的总机关问题上,书记部和"招牌工会"之间发生了很大分歧。"招牌工会"主张成立"上海工团联合会";书记部则力主成立"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但"招牌工会"的代表固执己见,利用担任大会执行主席之便,强迫会议通过招牌工会提出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章程》,当即遭到李启汉、李震瀛的严厉驳斥,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11月15日,书记部发表《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的宣言》,声明"我们只知道帮助真正工人组织真正工人的团体,对假借工人招牌来活动他事的团体,皆为最猛烈之攻击。"在书记部的带动下,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工会,均相继退出上海各工团联席会,并组织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展开新的斗争。陈独秀曾高度赞扬书记部的这一行动,认为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居然能够离开非工人的招牌工会,居然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

编辑《劳动周刊》

在党的中央局直接指导下,以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出版全国第一个工会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张国焘任编辑主任,李启汉、包惠僧、李震瀛、董锄平等任编辑。在《劳动周刊》发刊词中说:"我们的周刊

不是营业的性质，是专门本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这个刊物在南方工人群众，尤其是上海、广东、湖南、湖北等地的纺织、海员、铁路、矿山、电车、烟草等工人中销行，为党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很高威信。李启汉在《劳动周刊》上连续发表文章，对上海工人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以各地工人斗争的实际，启发工人按产业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

1921 年 10 月下旬，英美烟草公司再次罢工。党组织发现青帮破坏罢工，为了同工头王凤山作斗争，特派李启汉参加青帮。王凤山经李启汉的说服教育有所觉悟，认识到自己的过错，表示赞成罢工。是时，李启汉在《劳动周刊》上发表《欢迎王凤山君的反悔》短文，写道：“浦东英美烟厂工头有位王凤山君，当七月间该厂大罢工的时候，未免一时糊涂，致受大众的攻击。现在他居然反悔转来与大家工友们有共同生死的感慨，这是一件最可欢迎的事”。还说：我们“对于王君这种的反悔是非常欢迎的！还希望王君从今后同工人一同走，大家紧紧的结合以谋大家自己的幸福！更希望一班的工头先生们，赶快觉悟起来，以王君为模样，急与工人携手，共谋幸福。”

在上海数十万工人中，当时有所谓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广东帮、安徽帮、江北帮之分。为了加强工人之间的团结，李启汉发表《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一文，指出分帮的结果，“连自己也还是不能保护，明明是自己害了自己，好了资本家！”而工人需要有个团体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就是一个产业底下的工人，不分男女、地域，都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

11 月下旬，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的胜利消息传到上海以后，李启汉立即撰文《请看谁打胜仗！》，强调：“我们结合产业的团体，才能够罢工；要联络全路的全体工友们在一个团体，才能够打胜仗，得胜利”。

被捕入狱

李启汉的上述行踪，早已受到租界工部局的注意和监视。1922 年初香港海员大罢工爆发后，李启汉发动上海海员声援这场斗争，因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而遭到拘捕，后经劳动组合书记部

营救获释。

受香港海员罢工胜利的鼓舞，在李启汉等的指导和协助下，1922年3月浦东日华纱厂成立了上海纺织工会浦东分会，李启汉在300多名工人参加的成立大会上发表了演说。4月下旬，李启汉领导上海700多名邮务工人举行罢工，并亲自到邮政大楼找工人谈话，撒传单，斗争取得了胜利，组成300多名邮务工人参加的邮务友谊会。在同年“五一”劳动节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讨论通过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启汉提出的《罢工援助案》，该提案指出：鉴于我国劳工运动能力薄弱，应互相援助，“故工人无论在何地罢工，应当设法援助，以达我工人牺牲奋斗、自求幸福的目的。”

由于工人们经常活动于劳组部机关，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和干涉，从1922年2月起，租界巡捕房查抄劳组部机关，并传讯李启汉。6月初，上海工部局以“煽动罢工”、“扰乱秩序”等罪名，再次将李启汉拘捕。劳组部7月被上海工部局查封后，于8月迁往北京，改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由邓中夏任总部主任。

李启汉被监禁3个月，刑满后又从租界引渡给上海军阀，直到1924年10月才被释放。李启汉出狱时，邓中夏曾作诗庆贺，写道：“阴森黑暗的狱囚，冰冷沉重的镣铐，粗沙巨细的牢饭。哦！哦！我们的战友，苦了你了！……哦哦，我们的战士，准备着迎战！准备着厮杀！”还说：中共党员中，“坐狱最早最苦的同志，要以李启汉同志为第一人。”

16. 苏兆征与香港海员大罢工

苏兆征(1885—1929) 广东香山人。历经20多年的海员生涯后,于1921年3月与林伟民等组建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1922年1月参加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任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海员工会代理会长。1924年在北京加入共产党。五卅惨案后,与邓中夏等领导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兼财政委员长。同时担任海员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和香港运输工会联合会委员长,并连任第三、四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春任武汉国民政府劳工部长,被选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在中共"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后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1928年出席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均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同时为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29年2月病逝于上海。主要著作收入《苏兆征研究史料》。

罢工的中心人物

香港海员长期饱受英国殖民地工头剥夺与种族歧视的痛苦,失业人数经常有上万人之多。有着20多年海员生涯的苏兆征,对此种痛苦感受尤甚。他常年来往于世界各地,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逐步坚定了反帝斗争的信念,"深信只有社会主义的革命,才能完成人类的彻底解放。"并且在海员中广泛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1921年3月,苏兆征与林伟民等联合海员中的觉悟分子,成立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

从1921年9月起,海员工会接连向轮船公司提出普遍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要求条件,但始终未能得到解决。1922年1月,第三次提

出如下要求：一、工资一律加五。二、八小时工作制。三、由海员工会雇用工人。四、改良待遇平等。五、对各埠登岸自由。并且声言：如24小时内不答复，立即罢工。在资方再次拒绝之后，海员们的反抗情绪愈演愈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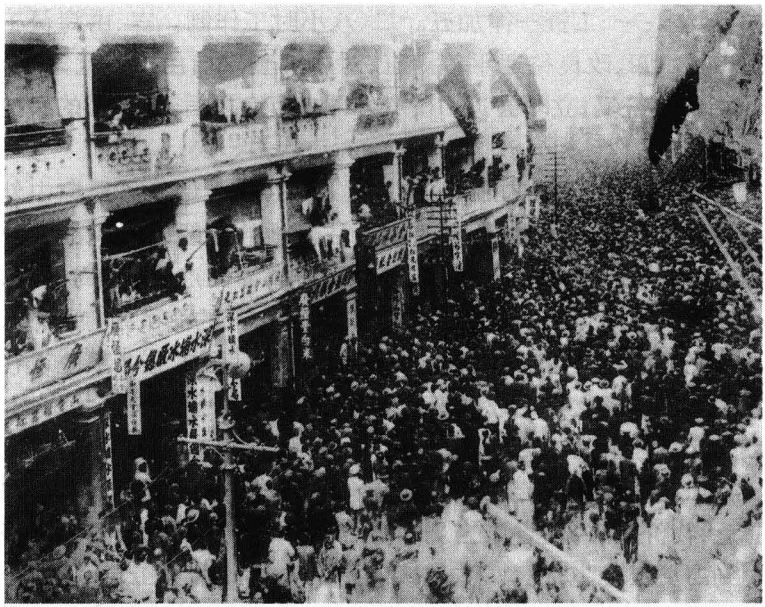
在苏兆征、林伟民的领导下，1月12日，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顿时，所有香港开往内地的轮船以及到港的外国轮船一律完全停驶。次日，罢工海员纷纷离港回广州，一周之内，由1 500人增至6 500人。到月底止，陆续回到广州的海员约有1万人以上。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罢工总办事处设在广州，香港、汕头设立罢工分办事处。此时，海员工会会长虽为陈炳生，但苏兆征实际上是罢工最得力的中心人物。

罢工之后，海员工会决定封锁香港，造成港岛粮食恐慌，日用食品匮乏，物价飞涨，使香港当局十分惊愕。起初，当局先派出华民政务司到海员工会"劝说"："本港政府是不允许此种罢工行动的，你们有条件可交本大人，替你们斟酌办理。你们罢工，不怕饿肚吗？"苏兆征挺身而出，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们提条件已经三次了，而且通知了政府，政府何以早不出来说话？现在我们已经罢工了，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我们的条件。"苏兆征义正辞严，令华民政务司瞠目结舌。"劝告"复工失败后，香港当局又采取威胁和利诱的手段，要求广东政府出面迫使海员回港复工。1月16日，香港当局在宣布戒严令的同时，又提出船主的加薪条件以期缓和罢工，但船主的还价与海员的要求相差甚远，海员工会锐意扩大罢工。罢工得到各地各阶层的广泛同情与声援，捐款救济络绎不绝，香港运输工人27日举行同情罢工，全港罢工人数增至3万人以上。

谈判中挺身而出

2月1日，香港当局下令封闭海员工会和运输工会，逮捕罢工领袖和工人，将工会招牌拆去。苏兆征代表罢工海员严正表示：如果海员提出的加资要求得不到圆满解决，决不回港复工。

华工总会调停失败后，又嗾使绅商集团之东华医院出面调停。



香港欢庆海员大罢工的胜利

在绅商集团的再三要求下，海员工会公推苏兆征等4代表赴港磋商，与香港当局和轮船资方进行谈判。海员工会提出恢复原有海员工会，送还工会招牌为先决条件。2月15日，华民政务司表示："恢复工会是可以的，但要把工会的名称改一下，工会也要搬过一个地方办公。"海员代表反对更改"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字样和另寻地点设立新会，指出："工会招牌——'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一字也不能增，一字也不能减，而且还要给还原有招牌。"苏兆征申明："弟未来港之前，各同人对于海员工会十个字，坚持万众一心，谓若不恢复会名，宁愿一齐死在广州城，都不愿回港。则代表又何敢代为更易"。谈判无终而散。

作为调人的东华医院总理和海员代表到场后，资方表示，可将"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十字恢复，加薪条件，交由公证人判断。海员代表苏兆征等4人陆续返省。其间，因海员工会会长陈炳生涉嫌杀妻案而被拘捕，故推举苏兆征为代理会长。所遣代表一职由林伟民接任。海员4代表第二次赴港谈判，22日回省复命。港督于25日来电称：已允原数每款加二数又五，并邀请工会会长苏兆征到华民政务

司面商。苏兆征回答:“此数与海员提出要求之数相差尚远,因彼等已让步二次,今港所加者仅百分之二分五,彼等未能满意。”又说:“以现在情形观之,香港方面如能再加四五数,此事或可和平解决。”谈判再次破裂。谈判破裂后,香港当局又改变策略,对罢工进行破坏。

在香港海员罢工过程中,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全国各地工人始终给予有力的支援,京奉、京汉、陇海、正太、京绥等各铁路发起“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上海工人成立了“上海香港海员后援会”。2月底,为了声援香港海员的正义斗争,香港各业工人10万余人,举行同情总罢工。3月1日,苏兆征指示驻港海员代表:“先要香港政府完全规复工会,一面再妥定所加之薪金,务得船员满意,然后肯开工,如以上条件不能达到目的,则无磋商之必要,各代表可立刻返省。”

欢呼罢工的胜利

苏兆征在解决罢工过程中,足智多谋,镇静、机智应对事态的变化,屡次挫败了对方施展的种种伎俩。香港当局对于罢工采取欺骗、压迫、调停、破坏等策略手段,均无济于事,于是派遣军警袭击罢工工人,企图以武力威胁复工。

香港10余万罢工工人于3月初陆续步行回广州,4日成群结队途经沙田时,突遭英兵开枪射击,当场4死8伤,酿成“沙田惨案”。惨案发生后,苏兆征等代表中华海员罢工工团联合会办事处向广东英国领事馆严正抗议,称:“凶横若此,民不聊生!”事后,海员更加激愤,誓死与帝国主义斗争到底,香港总同盟罢工继续扩大。

香港当局在一切手段全部失败后而走投无路时,经过广东政府出面调停,才不得不答应海员工会的要求。3月6日,海员代表等与香港当局及各船东等在香港大礼堂磋商后,海员方面所提9条已得到香港当局及各船东允许,原提出索赔全部损失,因香港商团侨民纷纷请求让步解决,故另其赔偿一半。海员主席苏兆征认为:此次斗争已大体解决,然尚未全部解决,故工人不能自行回港开工,须要各问题完全了结,各工团然后作团体的回港开工。这一天,海员群众与全香港工人群众20万人,把香港街市挤得水泄不通,燃放爆竹,高呼

“海员工会万岁!”“工人万岁!”等口号,香港当局将工会招牌恭恭敬敬地挂回原处。8日,双方正式签约,香港当局答应增加工人工资15%—30%;恢复海员、运输两工会;释放被捕工人领袖;抚恤死难者。当天,广州10万余群众热烈欢送苏兆征率领的罢工队伍,从广州返回香港,重新回船工作。

香港海员大罢工历时56天,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次罢工唤醒了广大工人群众的觉悟,显示出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成为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起点。苏兆征是这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在整个罢工期间,他“奔走呼号,没有片刻休息,罢工胜利后他就成为全国海员的中心领导者!”自此以后,苏兆征更加亲近共产党,并于1924年在北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7. 邓培与唐山早期工人运动

邓培(1885—1927)　广东三水人。15岁到天津学徒。18岁考入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做工。五四运动时期,带领唐山工人和学生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0年在李大钊、邓中夏等帮助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建党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春,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民族大会,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回国后,任中共唐山地区委员会书记,先后领导唐山制造厂和开滦五矿大罢工。1923年,当选为京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6月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任中共中央驻唐山特派代表,是中共第三、四届中央候补委员。1925年5月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后赴广州领导开展粤汉、广九、广三3条铁路工人运动。1927年4月,惨遭广东军阀杀害。

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

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唐山铁路机车车辆厂前身),是中国最早建立的铁路工厂之一。该厂工人受英帝国主义分子和封建把头的欺压与剥削,长期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1901年,年仅18岁的邓培考入该厂,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他勤学苦练,很快成为手艺高强的技术工人,并赢得了工人群众的信任与爱戴。

五四运动的洪流迅速波及到唐山,1919年5月7日,邓培率先带领该厂工人,并联合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唐山交通大学前身)学生,共3 000余人,举行爱国游行示威,吹响了唐山地区的第一声革命号角。他在厂内广泛开展宣传活动,向工友们疾呼:“二十一条”要叫咱们亡国灭种,咱们工人不能不管。“五四”期间,邓培还利用假日常到北京大学会见李大钊、邓中夏等,向他们介绍唐山工人阶级的状况,并聆

听李大钊的教诲，使他的革命勇气倍增。邓培回到唐山制造厂后，建立了爱国群众组织“职工同人会”（亦称“救国十人团”），邓培被公推为总干事。

6月3日，北洋军阀政府在北京大肆逮捕爱国学生，消息传来，激起唐山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12日，唐山各界3万余人在火车站前广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由于厂方的阻挠和破坏，唐山制造厂的工人未能参加大会。24日，唐山各界民众再次集会，邓培毅然带领该厂3 000多名工人前去参加，当工人队伍走到厂门口时，机务处副处长孙鸿哲再次阻挠，说：“反对凡尔赛和约的问题是国家大事，你们工人出去干什么？”邓培理直气壮回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参加活动是我们的责任！”孙威胁说：“你们上街游行，不发给你们工钱！”邓培说：“我们工人为的是救国，不光是挣钱！”孙鸿哲无言以对，并气急败坏地追到会场，但在广大工人的责骂之下，又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会后，举行了4个小时的示威游行，邓培带领工人队伍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誓死收回青岛！”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钢铁意志。

这一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开展抵制日货运动，邓培领导该厂“职工同人会”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学生一起，查烧日货，他鼓动工友们说：“帝国主义从咱们国家抢去原料，做成东西，回来再大价卖给我们，咱们能买他们的东西吗？”众人齐声回答：“不买！”邓培笑着说：“光咱们几个不买还不行，咱们要让大伙都不买。”从此，邓培组织了许多宣传队、讲演队，走街串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号召商店不卖日货，市民不买日货。每逢星期天，他还组织几百名检查人员分赴全市各商店，搜查日货，将查收的日本鸦片、香烟、毛巾、布匹、绸缎等货物，一车车运往车站广场，堆成一座“小山”，面对愤怒的围观群众，一把火将日货化为灰烬，广场上的群众个个扬眉吐气，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教育。

站在工人斗争最前列

1920年3月，由李大钊、邓中夏等发起组织的北京马克思学说研

究会成立，并把唐山和长辛店作为开展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邓培很快被吸收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会员。这年五一节，唐山工人首次纪念自己的节日，邓培在厂里召集纪念会，向数百名工人宣讲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意义，宣读并散发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寄来的《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传单。《新青年》出版的“劳动节专号”上，刊登了由邓培提供的《唐山劳动状况》的调查报告。10 月，李大钊等建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一开始就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到铁路员工方面。

在北京共产党小组成员张国焘等帮助下，1921 年春，邓培将“职工同人会”改组为京奉铁路唐山制造厂工会，这是党最早在北方建立的工会之一。工会成立大会在唐山扇面街五号秘密召开，到会代表 30 余人，一致选举邓培为工会委员长。工会成立后，邓培更加繁忙，每天下班后，听取工人汇报，研究情况，开展工会工作。他还发动各工会委员，深入唐山各厂矿和京奉铁路沿线，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与开滦煤矿和启新洋灰公司的工人以及山海关和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一起，声援了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和香港海员大罢工。下半年，邓培由北京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罗章龙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唐山地区的第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北方最早的工人党员之一。

1922 年 1 月，邓培以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身份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远东民族大会，并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和教诲。回国不久，邓培先后介绍阮章、王麟书、许作彬、刘玉堂等唐山地区的一批先进分子，加入了共产党。8 月，在中共北京区委领导下，中共唐山地区委员会成立，邓培当选为书记。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联络工人感情，把工人团结在党组织周围，在邓培和唐山地委指导下，1922 年 2 月 5 日正式成立了唐山工人图书馆，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工人图书馆之一。该图书馆在北京《工人周刊》上发表成立“简章”、“阅览规则”、“干事会议简章”和“通启”，明确表示：“我们这个工人图书馆，就是每人出少许钱，可以得到许多书报杂志来看，并时有专人在那儿，任你们随意阅看，那是多么好呀！”馆内阅览室，除陈列一般书刊外，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以及《新青年》、《先驱》、《劳动周刊》、《工人周刊》等刊物。入馆会员达 100 余人。邓培和图书馆主持人阮章，经

常来这里向工人们灌输新的思想，党、团员常以阅览书报作掩护，汇报工作和领授任务。这里既是工人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的公众场所，也是党组织和工会的秘密联络据点。党中央书记陈独秀6月30日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特意提到了唐山工人图书馆这一新生事物。

领导唐山制造厂工人罢工

1922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颁布“劳动立法大纲”19条，号召各地工会开展劳动立法运动。为响应这一号召，邓培和唐山地委领导唐山制造厂、开滦煤矿、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纱厂等工会，成立了“唐山劳动立法大同盟”，组织唐山工人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并通电国会及全国各团体，要求国会通过“劳动立法大纲”。

这期间，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先后派彭礼和、罗章龙、吴先瑞、邓中夏、王尽美等多次来唐山指导工作。为了增加工资和改良待遇，在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下，9月13日，邓培以唐山制造厂职工会代表的身份，向厂方提出改善工人待遇的5项要求：一、星期及各种假日，须照常发给全薪；二、工人有入厂十余年或七八年未加薪者，应即日加薪；三、以后每年应加薪一次；四、工人在直奉战争期间所受的损失，应发给恤金；五、要求待遇平等。限于3日内答复，但厂方一拖再拖，引起工人的强烈不满。邓培召集工人代表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罢工宣言》，成立了邓培为委员长的罢工委员会，并以“十人团”为骨干组织千余人的纠察队。10月13日，邓培宣布罢工开始，3 000多名工人一起停止工作，工人进厂摘下工牌，将厂房贴上封条，相率出厂，工厂所有大门都由工人把守，纠察队维持秩序。罢工委员会向厂方提交的《罢工宣言》，除前所提的5项要求外，又补充了6项条件：一、铁路当局应承认职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限。二、以后厂中雇用和开除工人，须经过职工委员会通过。三、铁路当局应建筑工人住房和工人俱乐部。四、工人因公受伤或年老不能工作时须养其终身，并照常发给薪金。五、罢工时间工资照发。六、消灭旧包工制度。反动当局和厂方勾结，以各种软硬手段破坏罢工，但未能得

逞，最后不得不答应罢工工人提出的大部分条件。罢工胜利后，邓培在京奉路沿线各站普遍建立起工会组织。

开滦五矿 10 月 23 日爆发同盟大罢工后，邓培发动唐山制造厂、启新洋灰公司、华新纱厂等工人前来援助，26 日在矿局门前，遭遇警察开枪镇压，当场打死 6 人，打伤 57 人，造成唐山罢工斗争以来的第一次流血事件。惨案发生后，邓培和罢工指挥部的成员商定，立即以开滦五矿工友俱乐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第二次罢工宣言，指出开滦血案，“悲号惨目，血肉横飞，有心人不忍卒睹。我们工人对此惨剧，惟有请全国同胞们主持公道，加以援助，以救我们三万苦工人于水火之中。”28 日，邓培又指导启新洋灰公司 8 000 名工人举行声援开滦五矿的同情罢工。11 月 5 日，直隶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指使大批保安队查封了开滦五矿工友俱乐部，劫走了各地捐款、信件，逮捕了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彭礼和等罢工领导人及 8 名工人。京奉铁路唐山工会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随即被查封。在开滦当局 11 月 9 日的 1 份电报中说：“唐山真正的罢工首脑是唐山铁路工厂所雇用的广东机器匠邓培”。邓培由此受到反动当局的监视和查缉，并被迫转入隐蔽工作状态，但他临危不惧，仍奔波于北京、天津、唐山之间，继续在唐山工人中进行革命活动。

邓培对唐山地区早期工人运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23 年初，京奉铁路总工会在唐山秘密成立，邓培当选为委员长。6 月，他以中共北京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18. 何孟雄与京绥铁路工人罢工

何孟雄(1898—1931)　湖南酃县人。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中的活跃分子。1920年3月,参与发起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初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建党后,被派到长辛店、唐山和张家口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北京地委书记,同时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工作,10月发动领导京绥铁路工人罢工。1926年任中共唐山地委书记、中共汉口市委组织部长等职。1930年任上海沪西和沪中的区委书记。在江苏省委工作期间,受到王明"左"倾领导的错误批判。1931年2月于上海英勇就义。1946年中共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何孟雄作出了公正的评价。主要著作收入《何孟雄文集》。

关注京绥铁路工人运动

京绥铁路兴建于1905年,长期为北洋军阀交通系把持,当时与津浦、京汉、京奉、正大铁路,号称全国五大铁路干线,也是全国惟一的国有铁路。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京绥铁路工人就发生过多次自发的斗争。党成立以后,工人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21年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罗章龙任主任,何孟雄是领导成员之一。在罗章龙离北京赴河南指导陇海铁路罢工期间,由何孟雄及其夫人缪伯英主持北方分部的日常工作。罗章龙从开封寄给何孟雄的信中,展望了劳动组合运动的美好前景。何孟雄读后感慨万千,12月11日在《工人周刊》第21号上著文说:"我知道中国劳动组合的运动,从此要大放光彩了。"还说:不管前面有多少障碍,"我望诸位不用畏惧,不怕困难,一直的向前面进行。"并且"望

诸位做事要持得久，眼睛要看得远，还是一直向前面的进行。”其间，京绥铁路工人因路局扣发薪水和局长营私舞弊而罢工风潮不断。

京绥铁路是何孟雄从事早期工人运动的重点地区，他为工人斗争写了《经济学大要》，阐明了罢工的准备、组织和联络，指出这是罢工成功与否3个必不可少的条件。12月20、26两日，何孟雄对京绥铁路工人运动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将考察情况写成《京绥路六日游记》，发表在《工人周刊》第27、28号上，号召工友们起来组织团体，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不要只顾目前的小利，而忘记了后来的大幸福；你们不要只谋自己一人的升迁，而把所办的团体作丧；你们不要自分派别，而与别人以可乘之机；你们须知道，你们的胜利之母在联合，你们的生命寄在团体上面，假使一天没有团体，你们就一天没有生命。”

京绥铁路密查员

1922年5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占领北京后，将交通系看作心腹之患。李大钊利用吴佩孚与交通系之间的矛盾，争取到北洋政府交通部的允许，介绍共产党员张昆弟、包惠僧、安体诚、陈为人、何孟雄、袁子贞，分别到津浦、京汉、京奉、正大、京绥、陇海6条铁路去担任密查员，实际上是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铁路工人运动的秘密特派员，主要任务是帮助工人组织工会和进行斗争，因而奠定了铁路工人运动的基础。

是年夏，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邓中夏、何孟雄、张昆弟到张家口指导工人运动，何孟雄以交通部密查员的身份，常驻张家口铁路，分工负责领导京绥铁路的工人运动。何孟雄到张家口以后，首先在铁路工人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同时组织了“工人文化补习班”和“工人夜校”，开展对工人的教育。他经常同工人们促膝谈心，纵论天下大事，为工人编写课本，给工人阅读《劳动周刊》、《劳动界》、《劳动者》等刊物，使工人觉悟得到迅速提高。1922年六七月间，在何孟雄的具体指导下，首先在张家口、南口铁路机车厂建立了“工业研究所”，以后又在张家口机务工人建立了“精业研究所”，名义上是研究技术的组织，实际上是铁路工会组织。8月，何孟

雄领导京绥铁路南口机车厂工人展开了一场驱逐监工毛有德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在此基础上，10 月，在张家口正式建立起全路车务同人联合总会，李连升为会长，何孟雄为秘书长。车务同人会制订出会章 40 条，提出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提高社会地位，维护工人利益。"

领导京绥铁路车务工人罢工

车务同人会成立以后，向铁路当局进行了 3 次请愿斗争。第一次因路局拖欠工人 8 个月的工资，后来只给全路员司增薪，而分文不给工人增加，激起工人向路局递交请愿书，但路局置之不理。接着，同人会代表工人又向路局递交了第二封请愿书，仍被拒绝。同人会忍无可忍，召集沿线各大站车务工人代表开会，决定由张家口、大同、康庄、北京西直门等站各派两名代表，直接向北京铁路总局局长当面请愿。经过与铁路总局长的谈判，仍毫无结果，失败而返。

在 3 次请愿均遭路局拒绝后，在何孟雄的指导下，无比愤慨的全路车务工人代表在张家口开会，商讨了罢工条件、日期和各项应付措施。罢工前，张家口车务工人同人会还组织了宣传队、纠察队、敢死队，以防敌人的镇压破坏。10 月 26 日，车务工人同人会提出了补发欠薪等 11 项要求，限局方在 24 小时内答复，否则一律罢工。与此同时，工人还选出代表向察哈尔督统陈述罢工理由。经过据理力争，督统只好在回执上签写"你们提出的条件收到了"的字样。于是，车务同人会指示大同、南口、康庄、西直门、平地泉、归绥（今呼和浩特）等 8 个分会，分别在 60 多个车站、1 500 多名车务工人中传达罢工指示。

10 月 27 日晨，爆发了京绥铁路全路车务工人罢工，机务、车务、警务 3 处全体加入罢工，参加者 1 000 余人。当天，京绥铁路车务同人联合总会发布了《罢工宣言》，提出 7 项 11 条要求：一、工人一律加薪，从要求之日起实行。二、节日、星期日，工人加班应发双薪。三、工人因病身亡者，应给家属发 1 年工资；因公身亡者，给全薪 2 年。四、直奉战争期内，工人加班者，补给双薪 1 月。五、承认现在之车务工人同人会有代表车务工人之权。六、开除工人应事先通知车务工

人同人会。七、工人须一律发给制服。罢工开始后，北京至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完全停止开车。预定早7点开往北京去的旅客列车，停放在轨道上，而工人则在张家口主要街道上，游行宣传。罢工不到两小时，美、日驻张家口领事馆出面，要求北京军阀政府保护他们在京绥线上的财产安全。路局还收买工人中的败类将客车开了出来。早有戒备的工人敢死队，在前面一个个躺在半里多地的轨道上，机车被迫停止下来。接着，工人又将机车的一些部件拆卸下来。随后，李连升与当局谈判，迫使交通总长高恩洪和路局全部答应工人罢工时提出的11条要求。罢工两日，取得了完全胜利。

这次罢工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京绥铁路工人中的威望，振奋了北方和全国工人运动，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何孟雄因罢工胜利，心情异常振奋，去天津时拍了照片。回到北京后，他在照片背面写下题记："此像摄于津，正适伯英病。我自己投身劳动运[动]时期，为五路同盟，将他等的台拆散，建树吾们的基本组织。孟雄自志于北京。一九二二，十二，十。"这段话充分表达出何孟雄与北洋军阀势不两立，献身于铁路工人运动的坚强决心和斗争信念。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中共北京区委改组，李大钊任委员长，委员何孟雄任国民运动委员会秘书。京绥铁路总工会1925年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何孟雄被推选为秘书长。

19. 林育南与武汉早期工人运动

林育南(1898—1931) 湖北黄冈人。1919年参与领导了武汉的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2月发起成立利群书社。1921年7月与恽代英、李求实等发起成立“共存社”。下半年领导了粤汉铁路和汉口人力车工人的罢工斗争。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秘书主任。1923年参与京汉铁路大罢工武汉方面的领导工作,同时参与领导全国青年团工作,兼任《中国青年》主编。1926年任湖北区委宣传部部长,兼任两湖党校校长。1927年任湖北全省总工会宣传主任,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调任中共江西省委秘书长,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主持全总日常工作。1930年任全苏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曾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批判和打击。1931年2月,不幸被捕牺牲。

指导武汉工人罢工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成立后,十分重视铁路工人的斗争,派林育南、包惠僧、施洋等到工人集中的徐家棚开展工作。他们深入工人住区,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向工人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的政治觉悟,很快建立起“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

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1921年9月,粤汉铁路300多名小工举行罢工。英人总管对工人的合理要求非但不予理睬,反而下令开除81名罢工工人,引起广大工人的公愤。在林育南、施洋等指导下,以职工联合会的名义,发出了致粤汉铁路当局的《觉书》,揭露路局压迫

剥削工人的罪恶，严正声明："若不允许加小工的工钱，凡机车的工人，也得继起罢工。"10 月 11 日，职工联合会代表全路工人向洋总管提出改善工人待遇的 15 项条件，限 24 小时答复。洋总管对工人提出的条件置若罔闻，于是在林育南的领导下，粤汉铁路机车处 800 多名工人，发出驱逐洋总管的通电，使武（昌）长（沙）铁路全段瘫痪，一步也不能走。罢工第三天，当局无奈，只好同职工联合会代表进行谈判，结果对工人所提的要求，一概应允。为防止洋总管借端报复，粤汉工人代表又提出了 3 条。17 日，粤汉铁路职工联合会下令复工，持续 5 天的罢工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在粤汉铁路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下，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因反对人力车行增加车租的斗争接踵而起。党派林育南、施洋等直接领导了这次罢工，他们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工会"，帮助车夫工会起草了《罢工宣言》和《告各界父老兄弟姐妹书》，向车行老板提出取消加租等 3 项要求。12 月 1 日，汉口租界五六千人力车工人举行罢工。为争取各界的声援，林育南等召开工人代表会议，指导工人组织游行示威。手无寸铁的工人与法国巡捕交战二三小时，后经谈判，车行老板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法领事向中国官厅道歉，允许车夫成立工会，车租暂行不加，免租钱 3 日等要求，车夫罢工取得了完全胜利。

邓中夏对上述两次罢工曾给予高度评价，说："武汉因铁路工人与人力车夫两大罢工，开了当地一个新纪元，职工运动从此有一个顺利的进展。"

领导粤汉铁路工人二次罢工

1922 年 5 月，林育南接替包惠僧，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为了实施劳动组合书记部提出的劳动立法大纲，林育南、施洋等又成功地领导了汉阳钢铁厂和汉阳兵工厂的罢工。在此基础上，他们联合汉阳钢铁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江岸铁路分工会、徐家棚铁路分工会等 20 多个工会，于 1922 年秋组成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林育南兼任该会的秘书主任，主管一切会务。

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后，首先发动领导了粤汉铁路武长段 3 000

余名工人的第二次罢工，发表宣言，提出了7条要求。1922年9月，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接着，组成了由林育南、施洋等参加的罢工指挥总部，负责领导全路罢工。罢工开始后，针对粤汉路鄂段铁路局长勾结湖北督军萧耀南千方百计地破坏罢工的阴谋，林育南等发动工人开展政治攻势，取得明显成效，争取了一部分工人及其家属，卧轨阻车。军警实行镇压，造成流血惨案，徐家棚和岳州两处，共有200余人受伤。惨案发生后，林育南等领导武汉工团联合会，一面由粤汉路罢工指挥部向路局提出4项条件：一、撤退弹压军队，并惩办行凶军警；二、革除并惩办王局长；三、从优抚恤死伤工人及工人家属；四、完全承认工人前次提出的7条件。不达目的，决不上工。一面组织“粤汉罢工后援会”，发动各工团捐款声援罢工，营救被捕工人。随后，工人们在汉口大智门车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铁路当局被迫答应释放被捕工人，抚恤死伤工人及赔偿损失等条件。但因铁路当局食言，京汉路南段工人准备于9月25日晚进行同情罢工，于是铁路当局再次被迫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各项条件。粤汉铁路工人虽付出了巨大代价，但终于取得了罢工斗争的完全胜利。此外，在林育南、施洋等领导下，还取得了汉口英美香烟厂等工人罢工的胜利。

在武汉各界罢工胜利的基础上，10月10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告成立，林育南当选为秘书主任，负责日常工作。为了巩固和扩大工运的成果，林育南和施洋等在汉口创办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机关报《真报》，该报主要发布工团联合会的命令、指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报道工人运动和广大群众的爱国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家的压迫剥削，成为广大工人的“劳动福音”。

在声势浩大的罢工浪潮中，12月10日，在武汉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林育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李立三、路局主任朱少连和汉阳钢铁厂工人领袖许白昊等领导下，成立了汉冶萍总工会，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工会组织，会员拥有3万之众。林育南在成立大会上，呼吁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作成阶级斗争强固的战线，打倒万恶的资本阶级，建立劳动者管理的世界。”

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评价说：“在中国第一次罢工高潮于武汉方面发现一个令人不可逼视的狂潮，以工业中心城

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而“武汉方面所有的罢工，几乎全为当地共产党所领导，未遇见任何竞争者。”

参与领导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林育南参与领导了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在此之前，林育南以《劳动》周刊社记者的名义，出席了1922年8月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并参与总工会宣言和章程草案的草拟工作。1923年1月底，林育南、陈潭秋、李求实等率领武汉30多个工团共160余人，从江岸车站出发，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庆典。

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不顾军阀吴佩孚的阻挠和恫吓，正式宣告成立。当晚，林育南出席了各分会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通过于4日举行全路总同盟大罢工的决议。会后，林育南随同武汉代表返回武汉，积极参加领导各工团在江岸设立的协助京汉铁路总工会临时办公处的工作，并参与起草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全体工人罢工宣言》。从2月4日正午起，京汉铁路全体一律罢工。5日，林育南草拟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言》，号召工友们：“生死关头，时机紧迫，大家一致起来拼命的向军阀决斗呀！”6日，在会上武汉工团各界云集江岸举行慰问大会，林育南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会后万余人结队游行，林育南、项英等领导人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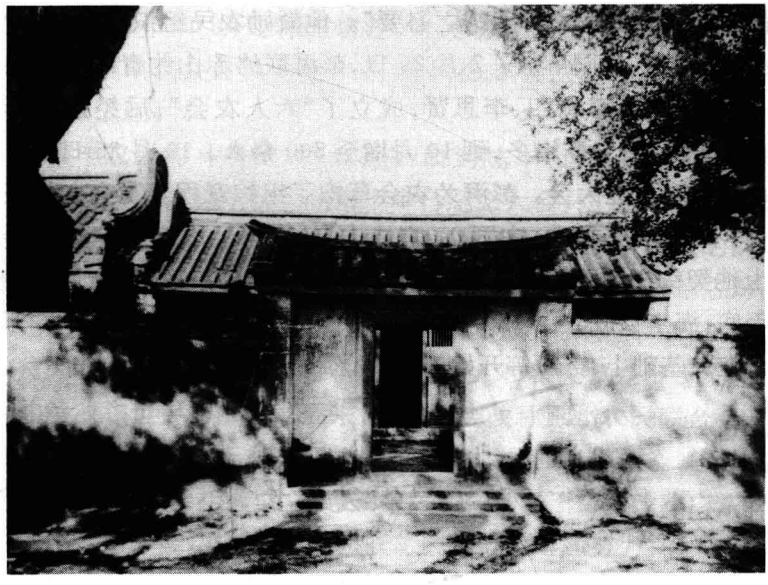
2月7日，江岸发生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军队屠杀工人事件，有37名工人倒在血泊中，著名工人领袖、京汉铁路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先后壮烈牺牲，湖北全省总工团联合会被查封，工会领导人林育南等被悬赏通缉。工会运动遭受暂时的挫折，但林育南等武汉工会领导人继续坚持斗争，以完成烈士的未竟之业。6月，林育南出席了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上发言表示：“工会运动令人乐观。”虽然认为“在南方加入国民党可使我们得以开展工作”。但强调中国革命，“无产阶级必须领导”。

20. 彭湃与海丰农民运动

彭湃(1896—1929) 广东海丰人。1917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21年5月回国,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10月任海丰县教育局长。1922年加入青年团,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元旦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当选为会长;后扩展为惠州农民联合会,任会长;后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任委员长。1924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一、五届主任。1925年任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书记。1926年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随后领导建立了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是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冬调上海,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被捕牺牲。主要著作收入《彭湃文集》。

在家乡组织“六人农会”

彭湃在日本留学4年后,于1921年5月回到了家乡广东省海丰县。此时,海丰农民和全国农民一样,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地主的压迫,常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出身于地主家庭的彭湃,在日本接受了社会主义思想,强烈反对地主的剥削压迫,对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心。他回海丰不久,团结进步学生,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社”及“劳动者同情会”,结交并培养了一批革命青年。彭湃在《劳动者同情会的缘起》写道:“今日的教育,不是图平民福利的教育,乃是专教资本家官僚一班掠夺阶级的教育!”他在《新海丰》创刊号上发表《告同胞》一文,呼唤广大群众:“我们赶快觉悟! 我们赶快结合! 我们赶



广东海丰县赤山约农会旧址

快进行！我们赶快将新社会现在我们的眼前！”10 月，彭湃任海丰县劝学所所长(后改为教育局长)后，对陈旧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1922 年海丰县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盛况空前热烈。5 月 1 日，彭湃高擎红旗前导，带领全县学生举行了纪念游行，沿途散发传单，高呼“劳工神圣”的口号，唱着彭湃编写的《劳动节歌》。随后，当局以教育局长彭湃等在海丰“藉教育以宣传社会主义”为由，迫使他辞去公职。5 月 14 日，彭湃与友人李春涛等创办了《赤心周刊》，宣传社会主义，抨击封建主义，提倡解放工农阶级。6 月 2 日，彭湃在第 4 期上发表《谁应当出来提倡社会主义?》一文，指出：“社会主义并不是主张社会一部分的改良，是主张全体的改造。所以社会主义不是‘个人主义’，‘宗族主义’，‘地方主义’，‘国家主义’，是社会的主义。社会主义，是社会一部分有心人，本着博爱的心肠，对于现代社会制度(组织)，大抱不平；因而发现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来代替他。”

从 6 月起，彭湃开始专心致力于农民运动。无论炎暑还是阴雨，他经常步行数十里，到各乡村演说及调查研究，更多是在龙山庙前做宣传，向农民群众说明“痛苦的原因，及救济的方法，并举出地主压迫

农民之证据及农民应有团结之必要”。他鼓励农民组织起来，实行减租；团结一致，共同解放。7 月 29 日，彭湃联络赤山约青年农民张妈安、林沛、林焕、李老四、李思贤，成立了“六人农会”，后经过耐心引导，请求加入者日渐增多，到 10 月增至 500 余人。10 月 25 日召开了赤山约农会成立大会。彭湃为农会草拟了组织章程。农会会员证上印有“不劳动，不得食，宜同心，宜协力”的字样。农会要把彭湃所有的土地契约送给农民，农民不敢接受，于是将全部的契约当众烧毁。到年底，海丰县成立了 12 个农会，总共 98 乡，2 760 户，会员 1.6 万余人。在此基础上，彭湃等开始筹备成立海丰县总农会。

海丰总农会会长

1923 年 1 月 1 日，海丰总农会召开成立大会，各县代表 60 余人出席会议，选举彭湃为会长，杨其珊为副会长。参加会员达 10 万余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彭湃起草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其纲领是：一、图农民生活之改造；二、图农业之发展；三、图农民之自治；四、图农民教育之普及。宣布“本会以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对付田主和官厅，采取“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的策略，“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2 月 20 日，海丰总农会发布《成立宣言》，指出：“我们农民，几千百年来，世世代代，无日不在无智饥饿压迫的难关恶战苦斗以维残命！而地主虎狼的掠夺，军警无厌的苛勒，日甚一日，惨痛百般，不可言喻！若常此隐忍以往，社会灭亡，不特我农民一个阶级！所以，我们一旦觉悟，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

由海丰总农会发起，于 3 月 3 日召开全县农民新年同乐大会，到者会员 6 000 余人，非会员 3 000 余人。会上，唱歌、舞狮子，鼓乐喧天，燃放鞭炮，热闹非凡；彭湃、杨其珊等发表了演说。13 日，海丰总农会发表《对时局宣言》，指出：在农村饱受军阀侵扰的情况下，“有侵害我们农村的安宁破坏我们农村的秩序者，我们农民，与其无辜坐享摧残，倒不如正当防卫为愈！”此外，海丰总农会办起了 1 个

农民医药房和20余处农民学校，农民享受领药半价的待遇。3月中旬，彭湃率农会会员6 000人，抗议海丰县法庭扣押抗拒加租农民，获得了胜利。

海丰农会的斗争成果，迅速扩展到陆丰、归善（今惠阳）等县。“五一”这一天，3县的会员在海丰举行纪念大会，约万余人参加，沿途散发数万份《“五一”宣言》，写道：“我们相信资本家和田主的财富的增加，是榨取工人和农民的剩余价值而来的。”“资本家日趋恣肆淫奢的生活，而工人和农民则日陷于饥寒压迫无智的地位。所以，社会上由贫穷而发生了种种极大的罪恶。”而工人和农民，“是不得不要求自身的解放和世界的改造。”后来，海丰农会改称惠州农民联合会，彭湃仍任会长。6月下旬，陆丰县总农会成立，彭湃兼任会长。随着紫金、惠来、普宁等农会相继成立，惠州农民联合会又于7月改称广东农会，会址设在海丰，彭湃任执行委员长。经过彭湃等的努力，仅1年时间，农会由一二乡扩至五六县，人数由数十人增至20余万人。当年记载：“东江各属，无论男女老幼，均无不知彭（即彭湃——引者）之名。”在另一份报告中说：“农会的灵魂，就是彭湃。要知道农会是什么，晓了彭湃便得。”

七八月间，海丰连遭强台风大水袭击，受灾极其严重，农产品损失90%，家畜损失40%，房屋倒塌40%，人员伤亡近千人，实为海丰有史以来未曾有之大损失。灾害发生后，彭湃立即组织救灾队，奔赴灾区，并且召集县农民代表会议，发起减租运动，决定“至多三成交租”。

随着农会组织的日渐完备，引起敌对阶级的憎恨，官厅、绅士、田主等便存心要加以扑灭。8月15日，彭湃在海丰召开有2万余人参加的农民大会，会上重申“至多三成交租”。鉴于此，海丰县长王作新决心以武力摧残农会，8月16日带领军警百余人突然围捕会所，当场捕去杨其珊等25人，接着封锁会所，解散农会，通缉会长彭湃等，以及查封农民医药房。为揭露事件真相，农会发表了《海丰全县农民泣告同胞书》，控告反动县长王作新勾结军警的种种罪证。幸好，彭湃、李劳工等10余人逃出，他们为营救狱中战友和恢复农会而往来于香港、广州、潮安、汕头间，日夜奔波，历经艰险。经与陈炯明交涉，杨其珊等于年底全部获得释放。

海丰农民运动的指导者

彭湃为营救被捕战友，在外地漂荡了5个多月，于1924年1月才回到了海丰。这时，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已经实现，彭湃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并于3月16日离开海丰调往广州，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7月，彭湃担任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在广州期间，他仍关心海丰农民运动，经常来海丰检查工作，出席国民党海丰县党部会议、农民协会会议，指导海丰地区的工作。第一次东征胜利后，彭湃以中央农民部指导员名义随军抵达海丰，各界群众3万多人举行欢迎大会；川流不息的父老乡亲们从周围四乡赶来看望彭湃，多达七八千人。

根据上级指示，彭湃暂留海丰工作。自此，从1923年8月被解散的海丰农民协会，才得以恢复。1925年3月，召开了有300余人参加的海丰县农民代表大会，选举彭湃为农会会长，并决定建立海丰农民自卫军。4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彭湃任书记。4月20日，举办了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任所长。6月，彭湃又随东征军回师广州，参加平息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叛乱的斗争。当彭湃再次回到海丰后，10月29日，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改为海陆丰地方委员会，彭湃仍任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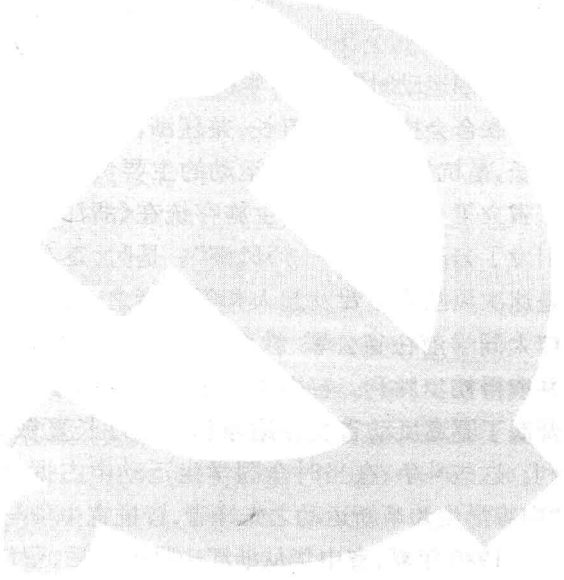
彭湃对海丰农民运动的指导，促进了东江农民运动的发展。到1926年5月，海丰农协会员发展到25万人，约占广东全省农会会员总数的41%。在此基础上，彭湃进一步提出了建立农民武装问题，他在8月18日海丰县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上指出："农民必须有了武装，然后革命才能成功。"强调："我们要打倒敌人，就要先武装自己。所以农民自己就应该出来当农军。"

彭湃在斗争实践中，注意从理论上总结农民运动的经验，1926年1月撰写了《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一书，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关于农民运动的著作。他以亲身的经历，详细、具体、生动地叙述了海丰农民运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阐述了中国农民运动的必然性、重要性和规律性等重大理论问题。该报告先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上连载，后编入《农民问题丛刊》，后更名为《海丰农民运动》。

毛泽东称赞这部书:“给了我们做农民运动的方法,许多人不懂得农民运动怎样去做,就请过细看这一部分。”

第一次国共合作前期,广东农民运动走在全国前列,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工作,实际负责则是共产党员承担。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则是广东农民运动的源头,其出色成绩已载入史册。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全国处于白色恐怖的血腥屠杀中,彭湃受中共广东省委的派遣,从香港回到海陆丰,在东江特委领导 3 次武装暴动的基础上,筹建了红色政权。

彭湃从开展海丰农民运动到领导建立海丰苏维埃政权,凝聚了他的全部精力与满腔心血,积累了丰富经验,并进行了理论总结,真不愧为“农民运动的大王”和“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的光荣称号。



21. 宣中华与浙江早期革命运动

宣中华(1898—1927) 浙江诸暨人。1915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五四运动时为杭州市学生联合会理事长。1919年10月兼任浙江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理事长。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参与创办萧山衙前农村小学,组织农民协会和抗租斗争。1922年初赴莫斯科参加远东第一次民族代表大会。回国后,继续从事农民运动,并创办《责任》周刊。192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国共合作时期,曾出席国民党第一、二次代表大会。任省临时党部执行委员。1926年3月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务委员兼中共党团书记。1927年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不幸被捕牺牲。

领导浙江学潮

五四运动时期,宣中华积极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被选为杭州市学生联合会执行部理事长,兼任浙江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理事长,是杭州和全省学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19年12月,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上发表《非孝》一文,引发了轰动全国的"一师风潮"。是时,正在浙江一师读书的宣中华是这次风潮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1920年3月,他亲自率领广大同学前往省公署、教育厅,同反动当局进行面对面的说理斗争,并取得初步胜利。宣中华趁热打铁,于4月组织领导杭州各校学生,开展了驱逐反动省长齐耀珊和教育厅长夏敬观的斗争,又取得了胜利。这些斗争,在当时全国学生运动中占据显赫的地位,《民报》称:"中等学生为革新运动之先锋者,皆推宣中华与徐白民也。"

1920年夏,宣中华从浙江一师毕业后,留任母校附小教员。这期

间，他在杭州开展工人运动，帮助印刷工人倪忧天等创建了浙江印刷公司互助会和工余补习学校。年底，他与倪忧天、徐梅坤等还创办了浙江第一张工人小报《曲江工潮》，该报每月两期，发行量为200份，共出了十几期。而该报大多数文章，都出自浙江一师学生的手笔。

参与指导衙前农民运动

1921年春，宣中华参加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工作，同时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夏，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沈玄庐在家乡浙江萧山衙前创办农村小学，浙江一师的宣中华和徐白民、刘大白、唐公宪、杨之华等被聘请为教员。宣中华与同事们在一起，经常探讨社会变革和农民革命问题，衙前农村小学实际上成为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心。在沈玄庐的指导和宣中华、徐白民等具体帮助下，9月27日召开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大会，宣中华在会上讲了话。大会公布了《农民协会协会宣言》和《农民协会协会章程》，推举李成虎等6人为协会委员。从此浙江农民运动在衙前最先发轫，尔后又在诸暨、绍兴一带周围几十个村庄展开，成为由共产党人第一次领导的农民运动。

随后，宣中华以浙江农民协会代表的身份与工人协会代表倪忧天，于10月同赴莫斯科出席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参观了克里姆林宫、莫斯科革命博物馆等，还参加了星期六义务劳动。此次苏联之行，宣中华受益良多，认为是自己“平生最光荣，最有革命意义的一件大事”，他亲身感受到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大变化，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迫切需要，于是向中共代表提出了入党申请。

宣中华1922年4月回浙江后，应沈玄庐的邀请，担任萧山衙前东乡教育会总干事，并于11月与徐白民等创办了《责任》周刊，他是主编之一。从创刊到第15期终刊，宣中华共发表18篇文章，深刻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的侵略，明确提出了工人农民是中国进行反帝反封建的主要力量，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他说：“国民能一致奋起，群力共争，那便足以寒侵略者的胆。”他在《农民和革命》一文中指出：“农民因为没有团体的训练，缺乏一致的精神，所

以在事件既发以后，万一来了外力的压迫，或者竟受了强有力的摧残，渠们便不能抵抗，不能坚持了。”“据我个人的意见，农民运动的中心人，当属之乡村里底小学教师；而农民运动的初步，则在给渠们以群众运动的训练。”他还指出革命知识分子是工农革命队伍中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认为他们“到民间去”宣传与组织工农革命力量，是实现革命“最妥当”、“最有力的方法”，农民小学教师，要做“农民运动的中心人”。他撰写的《杀宣统》一文，曾轰动全国，并因此遭到军阀当局的通缉，《责任》周刊被查封。

这些思想和行动进一步表明，宣中华已经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了。1924 年 1 月 10 日，宣中华由徐梅坤等两人介绍，经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讨论一致通过，被批准为共产党员，从此开始了革命人生的新征程。

筹建国民党浙江临时省党部

1924 年 1 月下旬，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负责筹建国民党浙江省各级党部工作的宣中华，以浙江正式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在会上，毛泽东和宣中华等一些代表坚决反对黄季陆提出的“比例选举制”提案，宣中华发言旗帜鲜明地指出：“比例选举制乃资产阶级骗人之物，本席反对黄君之提案。”“本席所以反对本案者，因为本党主张经党造国，以党秉公，比例选举制根本与之不合。”因反对或保留者较多，会议决定将本案保留到明年大会时再作议决。会后，他向浙江国民党员开会传达代表大会开会及改组国民党的经过，并经常奔波于沪、杭两处，经过相当的努力，使浙江省临时党部于 3 月 30 日宣告成立，宣中华当选为临时执行委员，负责组建各县市党部和工农民众运动。

随后，宣中华集中精力领导各县市党部的筹建工作。3 个月内，杭县、萧山、宁波、绍兴 4 县市临时党部相继成立，并先后向平湖、海宁、临海、永嘉等县派出筹备员。12 月 25 日，在宣中华主持下，浙江的国民党各县市组织代表开会，通过了声讨西山会议的通电，否定沈定一（沈玄庐）把持的浙江省党部，成立各县市党部联席会议，代行省

党部的职权。与此同时，宣中华还创办了浙江省临时党部机关刊物《浙江周刊》，他在该刊物上先后发表文章11篇，不断号召人民起来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勇士

1925年7月，在萧山衙前召开国民党临时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宣中华当众批驳戴季陶、沈定一等国民党右派的谬论，他说："国民党的路线，必须符合国共两党共同意图，维护工农利益。外对帝国主义，内对地主和资本家，必须进行阶级斗争！"会议在讨论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人选问题上，沈定一营私舞弊，手段卑劣，为其侄儿沈肃文拉选票，极力排挤共产党员宣中华。真相败露后，进行复选，结果仍决定宣中华为出席国民党二大的浙江省3个代表之一。11月，沈定一在北京参加国民党右派非法召开的西山会议，堕落为"西山会议派"。宣中华对此作出明确表示："我为革命与沈玄庐合作，沈玄庐能劝我加入共产党，但决不能拉我退出共产党。他敢于反革命，我就同他干到底！"

到1925年8月，杭县、宁波、绍兴、萧山、永嘉、海宁等县市均成立正式党部，嘉兴、平湖、奉化等县也成立了临时县党部。但由于沈定一等人的破坏，省党部迟迟不能成立，致使浙江省党务发展缓慢。是时，上海地方委员会改组为上海区委员会，宣中华参加了上海区委党团工作，并于10月担任上海区委闸北部委书记。

1926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中华在会上代表浙江省临时党部作了《浙江党务报告》，他着重谈了两点：一浙江省党务的大概经过情形；二西山会议破坏浙江党务的经过。报告特别提到：由于戴季陶、沈定一等的破坏，浙江正式省党部到在国民党二大后才可以成立。他还明确指出："西山会议完全是反革命的行动"。此时，浙江全省已有23个县党部的组织，党员人数在2 000人以上。经过宣中华等的努力工作，3月，宣中华在杭州主持召开国民党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正式成立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宣中华当选为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主持省党部工作，并由中共上海区委指派，担任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中共党团书记。

22. 高君宇与山西早期革命运动

高君宇(1896—1925)　又名高尚德。山西静乐(今娄烦)人。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加入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少年中国学会等社团。1920年3月与罗章龙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11月与邓中夏等成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被选为首任书记。1922年赴莫斯科出席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回国后,先后担任青年团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兼青年团北京地委书记、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先驱》、《向导》、《政治生活》等刊物的编辑工作,是山西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的主要创建人。国共合作后,任中共北京区委宣传部长、孙中山秘书等职。1925年3月在北京病逝。主要著作收入《高君宇文集》。

心系山西的革命运动

高君宇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后,除在北京从事革命活动外,还时刻心系家乡山西的革命斗争。在北大读书期间,高君宇通过山西先进青年、省立一中学生王振翼,与山西进步学生贺昌、李毓堂等建立了密切联系。他利用假期回太原的机会,召集进步青年举行座谈讨论,向他们介绍北京传播新文化新思潮的情况,揭露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罪恶行径,鼓励和号召爱国青年学生组织起来,坚持不懈的斗争。

五四运动爆发后,高君宇作为北大学生会的负责人,直接领导青年学生进行反帝爱国斗争,他担任"新潮社"干事,并和邓中夏等以北大学生会名义组织"平民教育讲演团"。是时,山西学生和全国一样,也积极起来响应,成立了山西学生联合会。为了推动山西学生运动,

1919 年夏天，北京学生联合会派高君宇回太原做发动学生的工作。在他的指导下，王振翼等创办了山西第一份进步刊物《平民周刊》，通过该刊物，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组织山西学生和全国学生统一行动，使山西学生运动迅速掀起热潮。

在李大钊领导下，1920 年 3 月，高君宇与罗章龙、邓中夏等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介绍王振翼、贺昌等人成为该会的通信会员，为山西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外，高君宇还十分关心山西工人阶级的状况，5 月 1 日在《新青年》和《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两篇有关工人问题的文章，明确提出“要革命必须破坏政权”，“必须获取政权”。是年 10 月，高君宇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后又介绍王振翼加入进来。11 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公推高君宇为首任书记。

成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

受北京党、团组织的委派，高君宇于 1921 年 4 月回太原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母校省立第一中学多次邀请王振翼、贺昌、李毓棠等 10 余人，座谈讨论人生观等问题。高君宇在会上介绍俄国十月革命情况，引导大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划清了共产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指出：“我们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的。不过我们在消灭阶级以前，还是要国家的。而且要有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有建立像苏俄一样的国家，才能彻底进行革命。”随后，高君宇帮助参加座谈会的青年骨干，于 5 月 1 日正式建立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推举王振翼为负责人，主要成员有贺昌、李毓棠等。5 月 15 日，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会议，草拟了团的章程，讨论了今后的工作计划。

高君宇回到北京后，仍十分关心山西的革命斗争。1921 年 8 月，他委托北大学生利用暑假返乡探亲机会，帮助太原青年团发动进步青年以入股方式集资创办了“晋华书社”，经销《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入门》以及《新青年》等各种进步书刊，成为山西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新思想的第一个据点。后因经济困难而无法维持时，高君宇又奔

走于北京、天津等地筹措资金，使书社得以正常维持下去。

为了扩大思想宣传阵地，高君宇和贺昌、王振翼等帮助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组《平民周刊》，加大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力度。《平民周刊》作为山西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对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和山西一批革命青年的培养，起了重要的作用。改组后的《平民周刊》作为太原青年团机关刊物，因革命色彩过于鲜明，引起军阀阎锡山的忌恨，于 1922 年 5 月被勒令停刊。

1922 年 6 月，高君宇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之后，他担任《向导》和《政治生活》、《北京学生会周刊》的编辑工作。10 月，高君宇发动贺昌等在省立一中学生，成立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青年学会”，出版《青年》杂志，团结教育了许多进步青年，使之走上了革命道路。

高君宇在太原的一系列活动，为马克思主义在山西的广泛传播和山西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筹建山西共产党组织

1923 年 2 月，中共领导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由于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武装镇压而失败。为了揭露军阀的罪恶行径，总结罢工的经验教训，高君宇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以最快的速度编印了《京汉工人流血记》一书，高君宇为该书写了“后序”，题为《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指出了罢工失败的两大原由：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他认为：“惟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工人需要于组织工会之外，还组织政党，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并且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只要“努力去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我们损失的马上就会恢复。”

1923 年 9 月，高君宇和王振翼在北京介绍李毓棠加入共产党。随后，李毓棠担任太原团地委书记。不久，高君宇得知《平民周刊》被查封，心急如焚。11 月，他将《平民周刊》编辑部迁到北京，亲自主持

编印，然后秘密运回太原。在《复刊宣言》中指出：恢复后的该刊，“仍抱定为我晋民利益奋斗之宗旨，为了维护人民的利益”，“必挺身而出而维护。”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为筹建山西共产党组织和筹划国共合作事宜，高君宇以中共北京区委执行委员的身份，于1924年5月下旬再次回到山西。在他动身回太原的前一天，张国焘在北京被捕叛变，供出了李大钊、高君宇等的共产党员身份。北京当局下令缉拿归案，但高君宇不顾个人安危，在铁路工人的掩护下，到达太原。他住在太原省立一中的“青年学会”里，加紧进行秘密的建党工作，先成立了山西党小组，由李毓棠任组长。1924年秋，又将傅懋恭（彭真）等一批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正式建立了中共太原支部。高君宇把中共旅莫斯科支部的经验介绍给山西党员，要求他们严格按照旅莫支部的经验建设党组织。

是时，高君宇还利用同学关系，促进山西的国共合作，他亲自联络山西国民党负责人苗培成，组建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筹备委员会。其间，阎锡山很快得知高君宇在太原进行秘密活动，立即下缉捕令。高君宇在群众的掩护下，机警地离开了太原，到上海、广州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25年3月5日，高君宇不幸在北京病逝，年仅29岁。他的密友贺昌在《中国青年》上发表《悼我们的战士——高君宇同志》，悲痛地说：“现在，君宇同志没有了！但他那热烈的革命精神，仍徘徊于吾人之前！”烈士生前曾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下德国诗人海涅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烈士生平的座右铭，也是烈士光辉一生的生动写照。

23. 蔡和森与《向导》周报

蔡和森(1895—1931) 湖南湘乡人。1918年与毛泽东等发起组织“新民学会”。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参与组织“世界工学社”。1921年10月回国,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22年至1925年编辑、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是中共第二、三、四届中央委员。1925年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后被委派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年4月回国,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中央秘书长。1928年当选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继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年底再次被委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初回国,去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8月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杀害。主要著作收入《蔡和森文集》、《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

主编《向导》周报

为了大力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开展国民革命运动,根据1922年8月西湖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于9月13日在上海创办机关报《向导》周报,蔡和森负责编辑工作。他和陈独秀、瞿秋白、高君宇、张国焘、彭述之、毛泽东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都为《向导》周报撰写过许多文章。

蔡和森主编党的理论刊物,实现了自己早年希望创办马克思主义报纸的愿望。他以高度的革命热情和负责精神,全身心地担负起党交托的重任。刚开始时,编辑人手少,条件差,许多具体工作都由蔡和森一人承担。蔡和森身体不好,经常是带病坚持工作。他不仅要写稿,还要组稿、校对,一天忙到晚,十分劳顿。当时负责印行《向导》工作的徐梅坤时常去蔡和森家索取需交付排印的稿子,每次见面

时，见他总是忙得不可开交，连说话都舍不得多占时间，他把稿子收下后，马上又埋头写作。蔡和森经常因赶写文章，通宵达旦，彻夜不眠，甚至在哮喘病发作时，仍伏案编撰，直到天明。这种忘我的工作态度和革命事业心，令人折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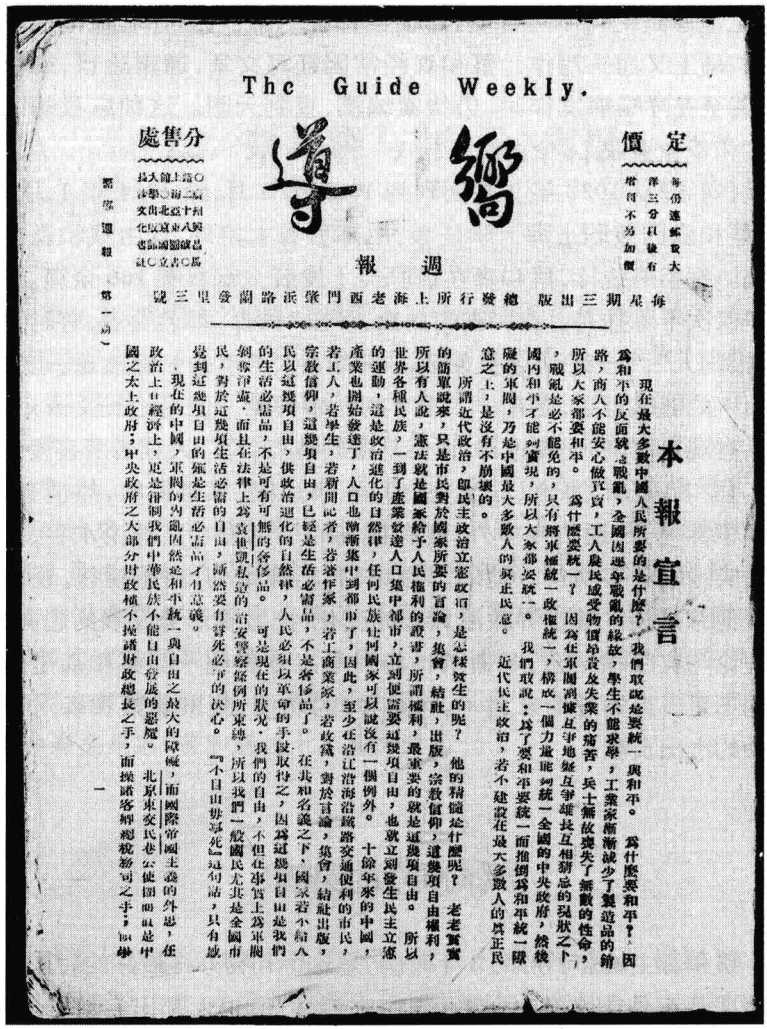
《向导》从1922年9月创刊到1925年5月，除1924年1月至9月，蔡和森因兼职上海大学任教，由陈独秀主持外，均由蔡和森担任主编。据粗略统计，蔡和森在《向导》上发表文章共有160余篇，数量之多仅次于陈独秀。蔡和森的文章，多以“和森”署名发表，有时也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名义发表。既有五六千字的长篇政论，也有二三百字的随感短文，还有一二千字的时事评论。但无论长文或短论，都具有观点明确，说理透彻，通俗易懂的特点，为广大读者所喜爱。

蔡和森沉着、寡言、好学、坚毅，不修边幅，思想锐敏，热情善辩。他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既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有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他的思想深刻，笔锋犀利，高屋建瓴，视野开阔。他总是关注着世界政治风云的变化，把握着形势发展的趋向，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革命精神与科学态度相统一。蔡和森是当时党内不可多得的理论家之一。《向导》的功绩，凝聚着蔡和森对中国革命的杰出贡献。

《向导》的灵魂

蔡和森主编《向导》的3年时间，是这个刊物办得最好的时期。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每期发表的重要文章，也大都出自他的手笔，蔡和森的名字与《向导》结下了不解之缘。毫不夸张地说，《向导》的灵魂就是蔡和森。他主编《向导》，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鲜明的战斗风格，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路线和各项政策、主张。集中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是坚持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蔡和森结合当时的斗争形势，写了大量反帝反封建为主体的文章，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阴谋，大力宣传党的二大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主张。在创刊号《本报宣言》中，旗帜鲜明地向中国人民指明了打倒帝国主



The Guide Weekly.

向導

週報

定價 每份連郵費大洋三分以後有增無減

分售處 ○上海大馬路三馬路○北京大學文化書社○廣州東山十八甫○各埠國貨公司

每星期三出版 總發行所 上海老西門肇嘉浜路蘭發里三號

本報宣言

現在最大多數中國人民所要的是什麼？我們取決是要統一與和平。爲什麼要和平？因爲和平的反面就是戰亂，全國因連年戰亂的緣故，學生不能求學，工業家漸漸減少了製造品的銷路，商人不能安心做買賣，工人農民感受物價增高及失業的痛苦，兵士無故犧牲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爲什麼要統一？因爲在軍閥割據互爭雄長互相猜忌的現狀之下，戰亂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將軍權統一政權統一，軍力遍能統一全國的中央政府，然後國內和平才能實現，所以大家都要統一。我們取決：爲了要和平要統一而推倒貪和平統一障礙的軍閥，乃是中國最大多數人的眞正民意。近代民主政治，若不建設在最大多數人的眞正民意之上，是沒有不崩壞的。

所謂近代政治，即民主政治立憲政治，是怎樣發生的呢？他的精髓是什麼呢？老老實實的簡單說來，只是市民對於國家所要的盲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權利，所以有人說，憲法就是國家給予人民權利的證書，所謂權利，最重要的就是這幾項自由。所以世界各種民族，一到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都市，立刻便需要這幾項自由，也就立刻發生民主立憲的運動，這是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任何民族任何國家可以說沒有一個例外。十餘年來的中國，產業也開始發達了，人口也漸漸集中到都市了，因此，至少在沿江沿海沿鐵路交通便利的市民，若工人，若學生，若新聞記者，若著作家，若工商業家，若政黨，對於言論，集會，結社出版，宗教信仰，這幾項自由，已經是生活必需品，不是奢侈品了。在共和名義之下，國家若不給人民以這幾項自由，供政治進化的自然律，人民必須以革命的手段取得之，因爲這幾項自由是我們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可是現在的狀況，我們的自由，不但在事實上爲軍閥剝奪淨盡，而且在法律上爲袁世凱私造的治安警察條例所束縛，所以我們一般國民尤其是全國市民，對於這幾項生活必需的自由，誠然要有誓死必爭的決心。『不自由毋寧死』這句話，只有喚覺到這幾項自由的確是生活必需品才有意義。

現在的中國，軍閥的內亂固然是和平統一與自由之最大的障礙，而國際帝國主義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經濟上，更是鉗制我們中華民族不能自由發展的惡魔。北京東交民巷公使團團體是中國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財政權不操諸財政總長之手，而操諸洛綽總稅務司之手；每參

蔡和森主编的《向导》周报

义和打倒封建军阀的前进方向，说："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之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在《外报鼓吹国际管理中国之又一论调》中指出："帝国主义不打倒，中国内乱永无停止的希望，欲停止内乱，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在《统一，借债与国民党》一文中指出："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

建的旧势力”。1922 年 12 月，他在党内率先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观点。在《反对“敦请一友邦”干涉中国内政》一文中指出：“外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就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甚么‘友谊’、‘友邦’都是骗人的鬼话。”

二是坚持党的联合战线思想。蔡和森揭露国民党右派的反动性，要共产党人提高革命的警惕性，反复强调：“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同时帮助孙中山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孙中山国民党关于革命问题的模糊认识与错误做法提出善意的批评。针对孙中山在全国发起裁兵运动，以实现和平统一的幻想，他批评说：孙中山希望军阀实行裁兵的思想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断定兵工政策惟有胜利的革命党才能实行，望‘握有兵权者’去实行，不但是与虎谋皮，而且是助虎作伥”。“我们不能不说中山现在调和四派势力的和平统一政策有离开革命立场的危险！”在《国民运动与太上国民运动》一文中，指出为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成立国民革命联合战线，换过说，就是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这样的联合战线，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全国人民，都是必要而有益的。”

三是极力主张发展推动工农运动，唤起广大群众参加国民革命。蔡和森指出：“谁要忠于革命，谁便更应求明白帮助工农阶级发展的意义。”他在《敬告本报读者》一文中就将该报定位是“中国民众的喉舌”，是“中国革命运动中不可少的先锋”，指出：“本报并不像别的报纸一样，只是空发议论。本报所发表的主张，是有数千同志依着进行的。”他称赞“工农阶级是中国革命运动的柱石”，“是政治斗争中最伟大的势力”。1925 年 4 月，他还明确提出了建立“农民运动之武装”的重要性，指出把“领导中国民族达到真正的解放”，作为中国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中国革命的真正向导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机关报，在革命斗争中起了极大的领导作用，真正成了全中国革命的向导。除在国内发行外，还远销国外，影响颇大。最初发行只 3 000 份，供不应求，每期出版后立

即售光，但因经费所限，不能增加印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向导》发行量猛增至3万份，在上海、北京、广州、湖南、河南5个地方分别出版，最高印数达10万余份。《向导》自问世以来，又不断遭到反动派的压迫，被帝国主义当局封闭了10余次，被军阀封闭了无数次。《向导》的命运，可谓“喜忧参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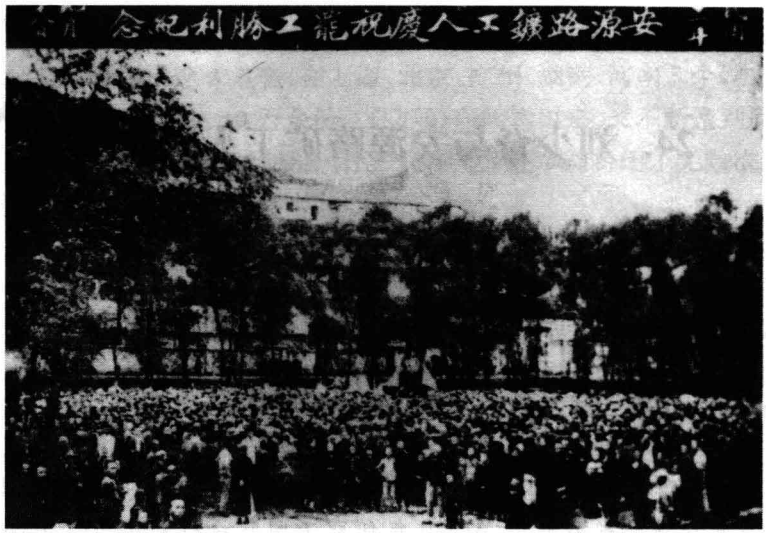
由于该报政治性极强，紧紧围绕宣传党的政治主张与方针政策，一开始就把读者吸引到中国政治事务立场上来，使其在舆论界起了政治领导地位。中国每次重大事件的发生，舆论界总是要注意听取《向导》的意见。上海工部局的一份警察刊物，曾把一期《向导》全部译成英文；北京所有议员到处寻找《向导》。当时有读者称《向导》是“暗黑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是中华民族的“福音”；“唤醒了不少在迷梦中的青年”。远在德国的读者作诗称颂《向导》“笔底警雷万鬼苦，天昏月黑一星赤！”萧三回忆说：《向导》“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斗争中，确实起了向导和灯塔的作用。”

24. 刘少奇与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

刘少奇(1898—1969) 湖南宁乡人。1921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9月参与组织领导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5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参与领导上海五卅运动。1927年1月,领导武汉民众收回汉口英租界,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转入地下工作,1928年任顺直省委特派员。1929年任满洲省委书记。1930年任职工国际执行局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红军长征中,担任红八军团及红五军团党代表和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1936年任中共北方局书记。抗日战争时期,领导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后任中共中原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和华中局书记,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194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是中共第七届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1947年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书记,7月主持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参与了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和外交等重大方针政策的制定。"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1980年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主要著作收入《刘少奇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

参与领导安源罢工斗争

刘少奇赴俄留学届满后,1922年春回上海,被分配到中国劳动组



安源路矿工人欢庆罢工胜利

合书记部工作，后又被派往家乡湖南，担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是时，湖南工人运动方兴未艾，斗争渐入高潮，湘赣两省交界的安源路矿工人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罢工斗争。

安源路矿创办于 1898 年，包括株(洲)萍(乡)铁路和萍乡煤矿两部分，是中国当时最大的产业之一。1908 年，以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为骨干，组成汉冶萍公司，安源路矿成为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拥有 1.3 万余工人，其中矿局工人 1.2 万余人，路局工人 1 100 余人。和全国各地工人一样，安源工人深受帝国主义、军阀和资本家的压迫与剥削，每日工作 12 小时，过着牛马般的悲惨生活。

但是，安源路矿有较好的工人运动基础，工人斗争备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湘区委的关注。1921 年底，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派毛泽东、李立三等从长沙到安源考察。李立三被留在安源，创办工人补习学校，建立青年团和共产党支部。1922 年五一劳动节，宣布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正式成立，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

安源路矿当局勾结萍乡县知事，强令工人俱乐部自行解散，令工人忍无可忍。9 月上旬，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再次到安源路矿了解情况，指示准备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并派刘少奇迅速赶往安源参加领导罢工斗争。9 月

11日，路矿工人俱乐部在“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下，以“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为主要目标，向路矿当局提出了保护俱乐部，路矿两局按月各支付俱乐部100元，从前积欠工人存饷限7日内发清等3项条件，并限于2日内答复，否则即行罢工。同一天，刘少奇带着毛泽东的信赶到安源，信中提出罢工口号和罢工战术问题，要求把罢工斗争坚持到胜利。刘少奇在与李立三会合后，即刻投入了紧张的罢工各项准备工作，成立罢工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秘密策应；刘少奇任全权代表，常驻俱乐部应付一切。

安源路矿大罢工的胜利

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提出的3项条件置之不理。鉴于此，刘少奇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的名义，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揭露了路矿两局的罪行。9月13日晚，党组织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罢工问题，李立三和刘少奇果断地决定立即罢工。俱乐部在操坪召开了群众大会，李立三和刘少奇都登台讲了话。午夜12时，俱乐部下令将工厂关门，矿井封闭，列车停驶。在矿区醒目处张贴着《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的17项条件，写道：“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作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从前一样作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宣言》表达了安源工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强决心。刘少奇严正指出：“工人所希望的在于解决目前生活问题，若路矿两局不派全权代表从磋商条件下手，徒用一句滑稽空言作回答，事实上恐万不能解决。”路矿当局惊恐万状，赣西镇守使署从萍乡调来1个旅的军队到安源，设立戒严司令部，强占工人俱乐部机关，胁迫工人开工。数千工人不为所惧地冲进俱乐部，将军队赶走。

罢工期间，年仅24岁的刘少奇实际上领导了全部工作。罢工第三天，16日，刘少奇作为工人代表亲自前往戒严司令部与路局代表谈判，他坚定自若，临危不惧。17日，刘少奇等俱乐部代表与路矿两局代表会同商绅代表调人磋商，劳资双方就复工条件问题一直争论到深夜。18日早晨，萍矿总局、株萍路局和工人俱乐部三方代表签订正

式条约，承认俱乐部提出的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罢工期间工资照发，每月津贴俱乐部200元等大部分条件。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坚持5天，取得了完全胜利。当天，俱乐部召开庆祝大会，有1万多工人参加，刘少奇主持开会，李立三宣布了13条协议。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根据李立三、刘少奇的决定，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上工宣言》，全路矿工人正式复工。刘少奇与朱少连合著的《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说："这一次大罢工，共计罢工五日，秩序极好，组织极严，工友很能服从命令；俱乐部共用费计一百二十余元；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完全胜利，这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动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

从此，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声望大增，对全国产生重大的影响。罢工胜利后，所有路矿工人都参加了工人俱乐部，会员由罢工时的700余人猛增至1万余人。俱乐部成立了道德法庭，建立了8所小学，开办了消费合作社，以及开展文化工作。共产党支部增至80人，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一个党支部。10月，俱乐部重新改组，选举李立三为总主任，刘少奇为窿外主任。

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

正当安源路矿工人巩固和发展罢工胜利之际，传来了京汉铁路"二七"惨案的噩耗，全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1923年4月，因李立三被调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刘少奇代理俱乐部总主任兼任窿内主任。是时，刘少奇主持工人干部代表会，欢迎毛泽东来安源视察工作。为坚持路矿工人俱乐部这面旗帜，刘少奇改变斗争策略，提出了巩固内部的3项措施：一、努力建设与内部整顿，以稳固并扩大安源团体的基础；二、扩大组织，由安源地方的组织进而为全国的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智识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这年五一节是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刘少奇主持下，工人俱乐部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纪念活动。5月1日，路矿两局都停工1天，全体工友参加纪念大会，会后举行了盛大游行。

在全国工运的低潮期中，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面临着严峻的考

验，安源工人运动不但没有失败，反而得到巩固与发展，安源被誉为“中国的小莫斯科”。刘少奇特为俱乐部创作一首歌，唱道：“世界兮当创造，压迫兮须解除，创造世界除压迫，团结我劳工。”他还为工人写通俗课本《两个工人谈话》，启发工人自强不息。在刘少奇的领导下，经过大力整理内部，讲究斗争策略，使俱乐部各项事业得到进一步发展。正如邓中夏所指出：“在此消沉期中，特别出奇的要算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真为‘硕果仅存’。”“安源煤矿，那时却好似工人的‘世外桃源’。工会仍巍然独存”。

1923 年 8 月，刘少奇正式当选为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此后，刘少奇发表了《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俱乐部组织概况》、《救护汉冶萍公司》、《整顿萍矿意见书》、《“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等文章，对于安源工人运动健康胜利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刘少奇当年回首俱乐部工作说：“我们都是相信社会主义——工人的主义——才到安源来帮大家做事的，我们并且都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命令我们来做事的，我们绝对不是为名为利个人跑得来的，所以大家工友既相信我们做事是帮助大家不致害大家”。

25. 罗章龙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罗章龙(1896—1995) 湖南浏阳人。1918年在长沙参与发起组织新民学会,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1920年初参与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0月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1921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中共北方区委委员,主编《工人周刊》。参与领导陇海铁路、长辛店铁路、开滦五矿、京汉铁路等工人罢工。1927年任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和全总党团书记等职,主编全总机关刊物《中国工人》。是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中央局成员,第四、六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1931年因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而被开除党籍。1934年起,先后在河南大学、西北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任经济学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执教于湖南大学、中南财经学院、湖北大学,为一级教授。1978年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京汉工人流血记》、《中国国民经济史》和《椿园载记》等。

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

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后,即在北京、汉口、广州等地建立了分部,具体组织领导各地工人运动。是年初冬,陇海铁路工人举行罢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动员指导北方分部和武汉分部,联合京汉、粤汉、津浦、京奉、京绥、正太各路的工人,作同情的声援。担任北方分部主任的罗章龙,奉书记部的命令,离开北京前往河南,指导陇海铁路罢工斗争并调查沿途各地工人斗争情况,走到郑州时,陇海铁路工人罢工已胜利结束。书记部又命令罗章龙和汉口分部主任包惠僧,会于开封,遂计划京汉路工会之组织,决定京

汉路从郑州以南，由武汉分部负责组织；郑州以北，由北方分部负责组织。12 月 5 日，罗章龙抵达开封，他乐观地认为："劳动运动，实大有可为，使有恒心，持之以久，数月以内便可将铁路工人组合就绪，一年以内即可将全国铁路工人组织就绪。二三年内各业工人必群众起效力，互相推宕，大势已成，吾人劳动组合的责任，便可告无愧了！"

京汉铁路是北方工人运动的摇篮。早在 1921 年，邓中夏等就在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中开展工作。到 1922 年 6 月，全路已建立起江岸、郑州、长辛店等 16 个工会分会。在此基础上，8 月成立了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制定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1923 年 1 月 5 日，京汉铁路工会筹备会在郑州开第三次会议，决定于 2 月 1 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典礼。根据工运发展的新形势，中共北方区委召开一次会议，总结北方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李大钊在会上宣布，他准备利用寒假去武汉大学讲学，区委工作由罗章龙负责。当时，谁都没有料到眼前事态发展的突然性与严重性。1 月 25 日，罗章龙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准备参加总工会成立大会。是时，参加总工会成立大会的全国各铁路工会代表均已齐集在这里。中共中央派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前往郑州，指导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而后又参与组织领导罢工斗争，是罢工的最高领导者。

参与领导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

京汉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的，各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了大幅广告。军阀吴佩孚闻讯后，即刻下令禁止工人集会，因为京汉铁路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军饷的惟一来源。罗章龙得悉此情况后，立即召集会议，讨论应对措施，参加者有：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震瀛、项英、吴雨铭、李求实等。罗章龙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会议不顾军警的阻挠与恫吓，决定必要时全路政治罢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决计成立大会如期举行。

此时，吴佩孚要求总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书记部北方分部一面公开社会舆论，揭露反动势力的破坏阴谋；

一面派史文彬等5位代表前往洛阳。吴会见代表时态度狂妄，再次扬言不准在郑州开会，彻底撕下其“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于是成为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导火线。

2月1日，郑州全市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按原计划在普乐园剧场召开。吴佩孚竟命令军队占驻会所，封闭会场。在会场已被武装军警的包围下，江岸工会总干事项英，率领工人冲过警戒线，启下会场的封条，代表们鱼贯而入，到会各路代表130余人、来宾160余人。会议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鉴于时局危急，各路代表当晚离开郑州。总工会举行秘密会议，决定4日举行沿线各站工人全体总同盟罢工，以反对军阀的武力压迫，由张国焘、李震瀛、杨德甫、史文彬、高斌5人组成罢工委员会，

罗章龙编写的《京汉工人流血记》

主持罢工事务，并将总工会移至江岸办公。

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于4日上午9时正式开始，参加罢工人数达3万余。正午12时，全路所有的客车货车一律停驶，长达1 000多公里的京汉路完全瘫痪。其间，罗章龙等经常守候在北京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保持联络，还巡视沿途各地罢工情况。4日，罗章龙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通电全国各工团，称："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

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与唆使下，吴佩孚调集3个师的兵力，于7日在长辛店、郑州、江岸等地进行血腥屠杀。7日，罗章龙得知长辛店分工会领袖史文彬、吴雨铭等11人被军警捕去后，立即带领工人立即包围了警署，要求释放被捕工友。敌人向他们开枪，罗章龙负伤倒地，后被纠察队员救出送往医院。当天下午，湖北督军萧耀南派兵包围袭击江岸分工会，打死32人，打伤200余人。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宁死不屈，从容就义。接着，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也遭杀害。这次京汉铁路全线的大屠杀，共有44人死亡，300余人负伤，40余人被捕，1 000余人失踪，是为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的最后一个怒涛，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反帝反封建的伟大力量，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政治威望。

"二七"惨案后，全国各地工会组织遭到严重的摧残，50多个铁路工会被封闭，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会领袖受到通缉，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北方区委仍于3月22日在北京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举行了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到会有5 000余人。

编写《京汉工人流血记》

"二七"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各铁路举行同盟罢工；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各地抚恤伤亡，慰问家属；举行追悼烈士大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移往天津办公。直到1923年6月召开党的三大前，

罗章龙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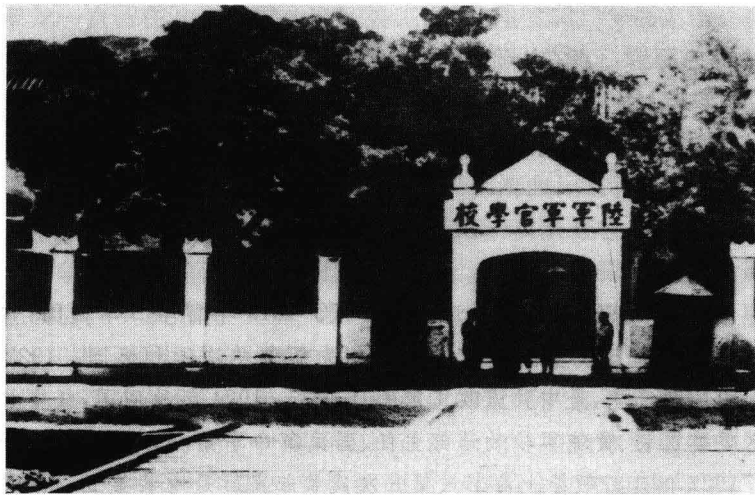
其间，罗章龙组织力量沿线搜集资料、照片，潜心编写总结经验的文章，2 月 27 日他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于《向导》第 20 期上发表了《二七大屠杀的经过》。根据中共中央来信的建议，在此基础上，罗章龙、高君宇又编写了《京汉工人流血记》，该书“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跃登世界革命舞台的伟大斗争”，详细地记述了二七事变始末，有力地揭露了军阀当局的凶恶面目。罗章龙以“文虎”署名为该书作“序”，写道：“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从此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脑筋里也加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将自然而然的向革命的趋向进行了。”“我们惟知道以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的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这本小册子于 3 月底在北京初版，印 5 000 册，曾在中共三大会上散发过，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重印多次，前后约印 5 万多册，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发行，畅销南北，产生过很大影响。至今仍不失为研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珍贵文献。

26. 周恩来与黄埔军校

周恩来(1898—1976)　江苏淮安人。1919年留学日本回国,领导天津学生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先后留学法国和德国。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的负责人。1924年秋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3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是中共第六届政治局常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后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参与红军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1936年12月作为中共全权代表,为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作出了重要贡献。后以中共首席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谈判,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南方局书记,长时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1945年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主席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在发展国民经济、外交、统一战线、科学文化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文革"中,在极其困难的处境中,为保护老干部,为争取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正常进行,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

军校政治部第三任主任

孙中山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效仿苏联红



黄埔军校旧址

军，1924 年 5 月在广州创建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并在军校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机构，使之成为一所新型的军事学校。

中国共产党对于黄埔军校的筹建及政治工作极为重视。应军校总理孙中山和党代表廖仲恺的邀请，先后派出许多共产党员参加了这些工作。在创建初始，担任政治部副主任的共产党员张申府，极力推荐正在德国留学的周恩来出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得到孙中山和廖仲恺的首肯。1924 年 9 月，周恩来从欧洲归国到达广州，初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随即被派往黄埔军校任政治教官，主讲《政治经济学》。11 月，周恩来出任军校第三任政治部主任。前两任为戴季陶和邵元冲，他们都是国民党员。

周恩来上任伊始，正值军校两个教导团成立，政治部工作十分忙碌。他一到职，就尖锐地批评："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今后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周恩来首先雷厉风行地扩大和健全组织机构，政治部增设指导、编纂、秘书 3 个股。为了充实政治部的力量，他从学生队中选调蒋先云、李之龙、王逸常、杨其纲、洪剑雄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治部的见习干事。在周恩来主持下，重新制订了政治教育计划，把政治教育提升到与军事训练同等

重要的地位。政治教育的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除讲授政治课外，经常开设政治训练班和宣传研究班，举办政治演讲会、报告会和讨论会，进行政治问答，以及组织各种宣传活动。政治部除向学生宣传《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还出版发行多种书报期刊，编写大量通俗的辅导教材。这些政治教育活动，使过去死气沉沉的政治工作，真正活跃了起来，逐步建立起一套完善的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教育制度。通过政治教育，着力宣传马列主义和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实质上变成了爱国主义和革命精神的教育，大大激发了全校师生的革命热忱。校长蒋介石对周恩来的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与支持，许多工作都交由周恩来主持。卓有成效的政治部工作，使军校的面目一新。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从事军事活动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

周恩来经常给学员讲课，深入浅出，逻辑性强，又能旁征博引，生动形象，很受学员们的欢迎。他还和学员们打成一片，除了给学员讲课外，亲自参加听课和讨论，及时回答学员们的提问。他经常巡夜查铺，对学员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年仅 26 岁的周恩来身着军装，英俊潇洒，朝气蓬勃，尤其是他对工作认真负责，事必躬亲的作风，谦和诚实的态度，以及严于律己，言传身教的品格，赢得了学员们的敬爱，称他是最好的老师。

周恩来于 1925 年 2 月随第一、二期学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是时，军校设立了前方和后方两个政治部，前方为周恩来，后方由共产党员包惠僧代理。9 月，实行校、军分离，周恩来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但仍以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的身份，继续领导军校的政治工作。1926 年 3 月中山舰事件后，才完全离开军校。周恩来在军校前后近两年时间，他对政治教育工作的杰出贡献，实开黄埔军校的新风。

关心军校的党组织建设

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区委十分关心军校的党组织建设。1924 年秋，军校成立了党的秘密组织——中共黄埔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

军事部领导，由周恩来直接负责。他亲自介绍黄埔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各级党代表的设立，各种人员的选拔与培训，多是由周恩来协助廖仲恺来敲定。

周恩来在广东区委军委工作期间，十分重视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每星期日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召开党小组长以上和积极分子的报告会或演讲会，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毛泽东、邓中夏、彭湃等经常来作形势教育报告。周恩来每次都作有关军事运动和国内革命形势及其他政治报告，鼓励大家努力学习，提高政治思想水平，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

为了团结革命军人，扩大革命势力，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1925 年 2 月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这是以黄埔军校为中心，联合各军事学校和部队进步青年军人的进步团体，会员迅速发展到 2 000 人，蒋先云、王一飞、李之龙、周逸群、徐向前、陈赓、许继慎、左权等，都是该组织的主要成员。这个组织在团结各军，宣传民众，打击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等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

随着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斗争的加剧，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事发后，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给予坚决的斗争，迫使蒋介石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1926 年四五月间，周恩来主持了大佛寺政治训练班，将前被扣押的共产党员集中培训 3 个星期，他亲自担任班主任，并多次讲话，要求学员在军队中起模范带头作用。

开展东征军的政治宣传工作

周恩来率领政治部人员参加第一次东征，政治部总是走在队伍前面，而周恩来又总是走在政治部的先头。政治部在鼓舞官兵士气，瓦解敌军的战斗力等方面，很快树立起政治工作的信誉，使东征军的实力大增。周恩来领导政工人员，常在宿营地组织军民联欢，他亲自出席了东莞、海丰等县欢迎东征军的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他在东莞市民大会上讲话指出：黄埔军校的力量太小，“若无人民援助，仍不足负重大责任。故本校极希望东莞人民通力合作，以促革命成功。”

东征军开展对群众的宣传工作，对于保证东征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周恩来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政治力量超过了敌人，提高了战斗力，保障了军队本身及军队与人民的团结。"

第二次东征期间，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在他的统率下，组织了庞大的政治宣传总队，进行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及一切宣传工作。周恩来为政治宣传总队制定了《战事政治宣传大纲》，明确规定东征军宣传工作的基本任务，对本军，对民众和对敌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都做了详细的部署和安排。经过政治宣传，参战的广大官兵，精神面貌为之一新。周恩来除指挥和鼓动部队作战外，还指挥各地农民协会武装配合，使东征军捷报频传，连克东江地区各县。攻打惠州城，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周恩来以党的名义，密令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终将惠州攻下。参战的苏联军事顾问夸奖说："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都是亲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冲锋陷阵，与广大官兵同甘共苦，身先士卒，言传身教，成为黄埔军校广大师生学习的楷模。周恩来在军校第三期开学典礼上，高度赞扬了以共产党员为代表的黄埔军校师生们的光辉业绩，并且表示：军校的精神，"从诸位的思想行动上，传到全国革命青年的身上，我相信将来中国的革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

27. 杨阆公与四川早期革命运动

杨阆公(1898—1927) 四川潼南人。1917年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920年回国后,在成都从事革命活动。1924年初,与吴玉章秘密组成“中国青年共产团”,发行《赤心评论》。后任共青团重庆地委组织部长、书记。1924年夏加入共产党。1925年先后组织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和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与吴玉章等在重庆创办“中法学校”。同年冬,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书记。1926年1月,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0月兼任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书记,与刘伯承、朱德等策划领导顺(庆)泸(州)起义。1927年4月被捕牺牲。

结识志同道合者

杨阆公早年留学日本期间,攻读军事和革命理论,他阅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1920年秋,杨阆公经上海回到了重庆。1921年冬,又由重庆到达成都,参加了“成都留日学友读书会”。其间,他结识了许多知名人士。1922年夏,杨阆公与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一的童庸生相识,彼此十分密切,不久即加入了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杨阆公还结识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吴玉章,与吴等以成都高等师范为基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一面进行马列主义的启蒙宣传,一面组织进步学生深入到工厂和农村,发动罢工,组织工会和农会。后经吴玉章的介绍,杨阆公又认识了在成都高师担任教师的恽代英。1923年8月,吴玉章介绍杨阆公,与正在成都治伤的川军第一军第2混成旅的团长刘伯承相识。杨阆公对刘伯承极为钦佩,在日记中写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堪当益友之列,并可同行于一个道路。”“伯承乃我最折

服的朋友”。

童庸生、吴玉章、刘伯承等，对忠厚老实的杨阆公，都有极好的印象。杨阆公将这些志同道合者，当作良师益友，引为知己。他和吴玉章、刘伯承等经常聚在一起谈论时事，研究革命问题。由于四川地隅偏远，交通不便，消息隔绝，他们这时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早已成立。

开展各种革命活动

1924 年 1 月 12 日，杨阆公、吴玉章等 20 余人在成都市娘娘庙街 24 号杨闇公的寓所秘密开会，房间里挂有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画像，经过 3 小时的热烈讨论，宣告“中国青年共产团”（起初简称 C. Y.，不久改称 Y. C.）的组织正式成立。会议通过了纲领、章程和各项议案，推举杨阆公、吴玉章等 6 人为负责人。该团体通过的纲领和章程表明：这是一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以反帝反封建、争取实行社会主义、谋求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解放为目标的革命团体。

该组织出版油印刊物《微波》，由杨阆公负责编辑，宣传革命的道理，揭露封建军阀的残暴统治。杨阆公在日记中写道：“欲指导群众，究竟从哪条道路走的好？……刻已认定马氏（即马克思——引者）为主”。“社会主义是为一般人各得其所，都有发展天才的机会，不致受经济压迫，得真正自由。”在杨阆公的积极参与筹办下，该组织于 1924 年 5 月 1 日正式发行了机关刊物《赤心评论》月刊，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罪行。该刊第一、二期分别刊载了“中国青年共产团”的纲领和章程。从第一期起，还连载了《列宁年谱》。

为培养革命骨干，1924 年 4 月 13 日，以王右木领导的成都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为基础，正式成立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共有 70 余人参加。吴玉章在成立会上发表题为《马克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演说。杨阆公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玉章演说词甚善。”“更可喜者，有职工五人也来参加此会，足见被压迫而欲待救于人的，也因自身的关系出而奋斗了。此后善于指挥，会内必能物色些人才来。”

经过杨阆公等人积极筹备，5 月 1 日，“中国青年共产团”同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成都少城公园联合召开纪念“五一”并追悼列宁的

群众大会，5 000 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不顾军阀杨森反动军警的威胁和阻挠，纷纷步入会场。杨阁公主持大会并作了题为《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的讲演，他哀思列宁的逝世，说："当我们还在痛苦地呻吟于资本帝国主义压迫之下急盼解放的时候，忽然失去这样一位革命的巨人、劳动界的救星，我们怎么不痛哭呢!?"他号召广大青年，"顶天立地竖建民族精神与国民革命的大义，系统的宣传，严密的组织，向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进攻，为继承列宁未竟之志而奋斗。"杨阁公极具号召力的精彩演辞，博得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由于军阀杨森不准群众会后游行，为了保护群众，杨阁公经与其他几个主持人商议，决定取消游行。他在日记中写道："'自由'不是空谈可得来的，非泪、血、汗，不能得真正的自由。""五一"群众大会后，杨阁公又到各地讲演，揭露军阀压迫人民的罪恶。

由于反动派对革命人士加紧镇压，吴玉章、刘伯承被迫暂离成都去上海，杨阁公也于 5 月 7 日离开成都前往重庆。到重庆后，杨阁公即刻会见青年团重庆地区组织的负责人童庸生，两人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谈论了今后的任务。在童庸生的赞助和支持下，6 月，杨阁公由重庆来到上海，寻求党的指导。在上海，杨阁公会晤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恽代英。

8 月，杨阁公返回重庆，担任青年团重庆地委组织部长。不久，经童庸生介绍，杨阁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萧楚女以青年团中央特派员的身份，来重庆整顿团的工作并筹建党的组织，很快与杨阁公取得了联系，并一道发动重庆工人、学生和各界爱国群众，建立了"四川反帝大同盟"。10 月，萧楚女和杨阁公领导成立了青年团的外围组织"四川平民学社"，开办平民学校，出版刊物。他们还发动各校进步学生组织各种社团或读书会，引导革命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研究社会问题。

11 月 19 日，日本商船"德阳丸"号走私旧铜币，扰乱市场金融，不仅拒绝有关当局的搜查，还打伤溺死中方检查人员。"德阳丸案"激起重庆各界群众的无比愤慨，萧楚女和杨阁公为"德阳丸案"而奔驰各地，宣传演讲，并通过"四川平民学社"组成"重庆人民外交后援会"，强烈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12 月 13 日，重庆市各界人民举行声讨"德阳丸"暴行的群众集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并到省长公

署请愿，杨阁公被推举为请愿的总代表。不久，杨阁公当选为青年团重庆地委书记。

迎接大革命风暴的到来

在国民会议运动高潮的推动下，经过萧楚女、杨阁公和童庸生的共同努力和指导，重庆地区和全国一样，也蓬勃开展起来。1925 年 1 月 18 日，正式成立了“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杨阁公被推选为总务部副主任。杨阁公于 2 月 7 日主持召开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大会，共有 1.4 万人参加，他在群众大会上报告了促成会成立的经过，阐述了国民会议运动的重大意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其间，杨阁公曾多次带领团员和积极分子到南岸真武山，不辞辛劳地向群众散发传单和发表演说，在一天之内，他曾连续讲演了 8 次之多。

正当国民会议促成会举行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在北京突然病逝，举国哀恸。根据杨阁公的提议，重庆各界组成了“重庆市孙中山先生追悼会筹备会”，萧楚女、杨阁公被推举为负责人。1925 年 4 月 7 日，8 000 余人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杨阁公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热情赞颂孙中山的伟大功勋，宣传他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思想。

吴玉章 1925 年春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写信给杨阁公等，建议宣布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团”，随后该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预示着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为培养党团基层组织的骨干，吴玉章、杨阁公等着手整顿四川国民党的组织，于 9 月共同筹办了中法学校；杨阁公还领导开办了党团员训练班，并且是训练班课程的主讲人之一。

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1925 年冬，在共青团重庆地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委员会（亦称中共重庆地委），杨阁公当选为书记，冉钧为组织部长，吴玉章为宣传部长。从此，杨阁公和四川党的各级组织一起，开始统一领导全川的革命斗争，以战斗的姿态，迎接大革命风暴的到来。

28. 向警予与早期妇女运动

向警予(1895—1928) 湖南溆浦人。1919年参加革命团体新民学会,年底,与蔡畅等发起组织"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并与蔡和森等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初回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共二大后,任中央候补委员,负责党中央妇女工作。1923年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助理,主持妇女运动委员会工作,发起组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是五卅运动中妇女界的领导人。1925年10月,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3月回国,在武汉做妇女和宣传工作,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主任兼《大江》报主笔。汪精卫"分共"后,调到中共湖北省委,转入地下工作。1928年5月在汉口英勇就义。主要著作收入《向警予文集》。

负责党中央的妇女工作

向警予结束了两年的留法勤工俭学生活,1922年初回到上海后,立即投入了党的妇女运动工作。起初,在党创办的平民女校上课并指导工作,为女校编写了教材及反映女工悲惨生活的歌谣。7月,向警予出席了中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负责党中央的妇女工作,兼任上海地区妇女工作。

1922年是中国劳动妇女运动的开端。这一年,全国女工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而发生罢工有18次,工厂共60余个,有3万余人参加,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上海丝厂女工同盟罢工、上海浦东日华纱厂罢工和湖北英美香烟厂罢工。8月,向警予在上海参与领导了闸北44家丝厂2万余女工同盟罢工和浦东日华纱厂3 000工人的罢工斗争。其间,向警予还协助党中央策划全国妇女运动,制订了有关指导妇女运动的各种文件。

向警予在上海女国民大会上演讲

1923 年 6 月，向警予出席在广州举行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为大会起草了《妇女运动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提出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强调必须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会议决定设立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向警予当选为主任。9 月下旬，向警予还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和沈雁冰两人分管妇女工作。

为支持上海丝厂女工罢工斗争，1923 年下半年，向警予撰写了《九姑娘犯了何罪?!》、《告丝厂劳苦女同胞》、《丝厂女工团结起来》等文章，号召广大女工团结奋斗，全体加入丝茧女工团。她在《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中指出："劳动解放与妇女解放是天造地设的伴侣，必劳动解放了妇女才得真正的解放。"1924 年 1 月，向警予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正式委员，后因工作繁忙，又辞去委员职务。这年上半年，向警予连续发表了《从平民教育中划分女子平民教育的我见》、《中等以上女学生的读书问题》、《直隶第二女师学潮在女子教育革新运动上的价值》等文章，阐述了党关于妇女运动的方针政策。为要求男女平等，北京、上海、天津、南京、湖北等地成立了女子参政协会、女权运动同盟等组织。向警予在《中国最近妇女运动》中指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整个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只有推翻剥削阶级，才能实现妇女的真正解放，妇女运动必须与革命运动相结合；文章特别指出知识妇女应该与劳动妇女结合，才能使妇女运动成为群众运动，才能使妇女运动有力量。她高度赞扬"新兴的劳动

妇女最有力量，最有奋斗革命的精神。”她们“不独是妇女解放的先锋，而且是反抗外国掠夺者的国民革命之前卫！”

杰出的妇女领袖

中共创建初期的女党员不多，到1924年6月女党员不过20人，她们逐渐加入了国共合作的妇女运动，在国民党妇女部内，极为努力地从事组织、宣传、平民教育、劳工教育等方面的工作。

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建立最早的执行部，由毛泽东、恽代英、向警予等共产党人实际负责。执行部内设立青年妇女部，向警予任助理，掌理一切事务；共产党员杨之华、王一知，青年团员张琴秋在该部协助向警予工作。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成立后，为有力地指导妇女罢工斗争，决定成立“妇女运动委员会”，会员共有60余人。该委员会名义上是上海执行部领导，实际上由向警予领导。妇女运动委员会针对职业妇女、家庭妇女、劳动妇女及女学生等各种对象，采取不同的方针进行宣传教育，引导妇女们关心社会、国家及妇女本身的问题。

上海为全国女工最多的城市，女工约有20万人。向警予深知妇女部对于女工的组织、联络和教育，负有主要的责任，曾派人参加上海妇女问题研究会和《妇女评论》社等工作。向警予经常深入到上海女工集中的浦东、杨树浦、小沙渡的纱厂、丝厂和烟厂，进行调查研究，宣传鼓动，放手发动群众，组织女工开展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1924年6月，向警予发动和领导了上海14家丝厂、烟厂1.5万女工举行大规模的同盟罢工。为了把各种女工组织起来，根据党的指示，她负责成立了以劳动妇女为主力、团结各界妇女的“妇女解放协会”，这个组织在全国各地很快发展起来，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向警予积极投入了上海和全国的国民会议工作。1924年12月7日，上海21个妇女团体开筹备会议，一致通过组织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并选举钟复光、刘清扬、向警予、杨之华、李一纯等18人为委员，向警予被推定为文牍股主任。她在《国民

会议与妇女》一文中，号召占全国半数的妇女积极参加国民会议运动，使“妇女有发表政见的机会及使国民会议成为全个的人民团体的国民会议”，以“达到妇女本身利益的要求”。12 月 14 日，上海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召开成立大会，推举俞秀松、李立三、刘清扬、向警予等 21 人为促成会委员。大会提出了争取男女社会地位平等、教育平等、婚姻自由平等的要求；指出只有在国民革命成功后才能达到妇女解放。向警予主张人民团体国民会议应参加妇女团体，明确指出：“没有国民运动也便无所谓妇女运动，有了国民运动然后才有所谓妇女运动”。21 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开成立大会，向警予在会上讲话指出：“本会的目的在促成国民会议，和参加妇女独立的团体于国民会议，并且还要使男女人民团体做国民会议组织的主体。”在向警予主持的第一次正式委员会议上，推举刘清扬、向警予、钟复光、张琴秋为执行委员。会后，向警予发表《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在中国妇女运动中的地位》等文章，号召妇女热烈地参加国民会议运动，指出“不独参加而且要做其中的劲旅”。“妇女不独应有各地的组织，而且应有全国统一集中的组织，使全国的妇女运动在同一的目标同一的策略之下有系统有计划的进行”。之后，北京、天津、杭州、广州、温州、南京、保定等许多城市，都组织了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

向警予的上述工作，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赞扬，称赞她能刻苦耐劳且善于作文字宣传，活动能力很强。

五卅运动中的妇女旗手

1925 年 1 月，向警予出席了中共四大并当选为中央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长。根据四大的精神，各地派代表于 3 月齐集北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大会，正式组成全国各界妇女联合会。3 月下旬，经过向警予等积极组织筹备，上海召开“女国民大会”，向警予宣布开会宗旨：一争回女国民主权；二推倒一切压迫女子之制度及势力；三要求修正国民代表会议之条例。4 月，向警予发表了《妇女运动的基础》、《应力争妇女团体参加国民会议》等文章，指出：“国民会议如无妇女

团体代表参加，则所谓废除一切障碍女权发展之法律、另订男女平权并助进女权发展之法律等等主张将无法提出更无法可以实现”。

中国妇女协会5月1日在上海召开成立会，向警予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名闺才媛”之流关心国家社会问题，发起组织“中国妇女协会”，表示异常感动，同时指出：“要为全国妇女争普遍的利益便非少数‘名闺才媛’所能办到”，“而要注意群众，时时为群众利益奋斗。并要热切帮助最多数、最下层、最痛苦的工农妇女大群众。”因为“妇女运动是求妇女的自由平等，然而在中国民族未达到自由平等以前，妇女绝对不会单独达到自由平等的。”

5月15日，日本资本家枪杀上海内外棉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惨案发生后，29日，向警予以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名义，印发传单《上海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为日人惨杀同胞宣言》和《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暴行。五卅惨案后，向警予亲自带领妇女部的人员深入工厂、街道，发动女工参加罢工并到南京路等街头发表讲演，分发传单，做宣传、募捐工作。6月5日，向警予在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代表大会上，提议章程及成立宣言缓发，先讨论对外人惨杀同胞宣言。她对此问题作了报告，提出：撤退武装并解除戒严；释放被捕同胞；容纳工人要求；惩凶道歉；收回租界；罢工、集会、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取消不平等条约等。根据她的提议，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自8日起，凡属本会会员，均须分赴华界散发传单及演讲，劝告坚持到底，一致力争。二、到会各代表自由向亲戚故旧募捐，藉以补助一切。在向警予的领导下，各界妇女在宣传、募捐和声援罢工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正如蔡和森所说：向警予是“‘五卅’运动中有力的煽动者组织者之一”。

29. 王荷波与早期铁路工人运动

王荷波(1882—1927) 福建福州人。1916年在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做工,1921年在该厂组建了“中华工会”,被选为会长。1922年春率该厂工会加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浦口铁路工会,以及徐州、济南、天津3个大站的铁路工会,使津浦路工人运动开展起来。“二七”惨案后,到济南津浦铁路机车厂和青岛四方机厂指导工运工作,任济南机车厂党支部第一任书记。1923年出席党的三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为中央局委员,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1925年出席党的四大,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任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北方局书记。1927年11月,在北京遭奉系军阀杀害。

领导津浦铁路工人运动

早些时候,王荷波到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当钳工,在工人群众中赢得很高的威望。五四运动以后,他投身于工人运动,于1921年在该厂组建了“中华工会”,先后被选为副会长、会长。为了增加工资,王荷波带领该厂的几十名工人进行卧轨请愿斗争,并作为进京谈判代表,只身来北京,与军阀政府交通总长进行说理斗争,迫使当局答应了工人的全部要求。

1921年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由徐州来浦镇开展工作,不幸被交通系抓获。王荷波闻讯后,挺身而出,带领工人前去解围。1922年2月,王荷波率领浦镇机厂工会加入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从此与中共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建立了联系。6月,王荷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津浦铁路的第一个工人党员,又

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成员。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铁路工人运动发展迅速，到1922年，津浦与京汉、京奉、京绥、正太、道清、陇海、粤汉、广九、广三、沪宁、沪杭、南满、中东等铁路，都建立了工会组织。这年10月，组建了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

在王荷波等的领导下，成立了浦口铁路工会。为了加强工会工作，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王振翼担任工会秘书，协助王荷波开展工作。“两浦”（浦镇、浦口）工会，成为津浦铁路最先组织的工会。这时北方处于交通系控制之下，还没有其他很好的工会组织，后来经过王荷波的积极活动，铁路工会组织延至徐州、泰安、济南、德州、天津等，共有会员3 500余人。1923年1月9日，王荷波领导津浦铁路浦镇机厂工人联合浦口码头工人举行罢工，参加者2 000余人，使南段火车停开，工人们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生活条件，取得了相当的胜利。

王荷波作为津浦铁路总工会筹备组的代表，2月1日，到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京汉铁路各工会代表不顾反动当局的阻挠，宣告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同时号召各路工人举行大罢工。次日晨，王荷波离开郑州，到津浦路沿线的天津、沧州、德州、泰安等各站，传达会议决定，向铁路工人揭露军阀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罪行，动员各站工会做好同情罢工的准备。7日晚，王荷波领导浦口工人进行了两天半的罢工。罢工期间，工人们斗志高昂，竟至试图卧轨阻止火车运行。但在军阀的压力下，王荷波立即被浦口厂方解雇和驱逐，工会转入地下，会员损失了三分之一。这时，突然传来“二七”大屠杀的消息，为了保存实力，王荷波果断地决定复工，他本人也被迫离开浦镇，迅速转移。

“二七”惨案后，党不再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活动，各地工会也不能公开活动。王荷波先到济南津浦铁路机厂，在工人中开办读书识字和娱乐活动，通过与工人群众的广泛接触和交谈，成立了山东省第一个工会组织——济南津浦铁路机厂工人俱乐部。不久，建立了机厂党支部，王荷波当选为第一任书记。1923年3月，王荷波受党的派遣，以“五路联合会”（“五路”即京汉、粤汉、津浦、正大、道清5条铁路——作者）的名义，到青岛四方机厂秘密开展工人运动，在工人

群众中做了大量工作，培养了一批工运骨干，促进青岛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起来。

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

1923 年 6 月，王荷波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作了中国铁路工人运动的报告。会上，他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任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后又被选为中央局委员，负责工人运动，直接领导铁路、海员和江苏、上海等地的工会工作。

自“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但党并没有终止对铁路工运的领导，京汉、津浦、京奉、京绥、正太、粤汉等铁路工会仍秘密存在，而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也从未停顿。经过 1 年多的艰难筹备，1924 年 2 月，全国铁路各路代表会议在北京秘密召开，大会通过了《全国铁路总工会成立宣言》和《章程》，正式宣告全国铁路总工会的成立。这是工运低潮期间的重大事件，是“全体铁路工友于痛苦不堪之中得着一颗光芒万丈的救星”。这时，全国有组织的铁路工人已达 4.4 万余人。

是年 6 月，王荷波同李大钊等组成中共代表团出席了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随后，王荷波又同罗章龙等参加了赤色职工国际大会。回国不久，12 月 7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正式建立，李大钊任书记，王荷波为北方局成员。接着，王荷波又出席了 1925 年 1 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根据中央的决定，王荷波与罗章龙共同负责全国铁路总工会的工作。

随着工人运动的恢复和发展，1925 年 2 月，在王荷波主持下，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郑州召开。大会讨论了工人阶级与中国现状，通过了全国铁路总工会工作方针及大会《宣言》，强调工人阶级应当参加国民运动，以达到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目的。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邓培、王荷波等 18 人组成的全国“铁总”执行委员会，王荷波当选为全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铁总”会址设在郑州。5 月，

由全国铁路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等4大工会发起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产生了中华全国总工会。

为了便于集中精力做好“铁总”工作，6月，王荷波携妻女来到郑州。他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参加中共豫陕区委的领导工作，公开身份仍是全国铁路总工会负责人。王荷波与王若飞、张昆弟等共同领导京汉、陇海、道清3条铁路和河南省的工人运动。9月，王荷波以全国铁路总工会来宾的身份，参加了在郑州召开的河南省总工会成立大会和京汉铁路工会代表大会。11月，他还出席了郑州八作工会讲演大会，号召工人阶级参加反奉战争，指出工人阶级乃是反奉战争中之领袖。

在五卅运动高潮中，全国铁路工会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不断发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已在18条铁路建立了60多个工会组织。1926年2月，在王荷波主持下，全国“铁总”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天津召开。会上，由“铁总”总干事王荷波作“铁总”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各路代表报告一年来组织发展及政治活动的成绩。大会讨论了组织、宣传、协作、救济、自卫团等项内容，选举罗章龙、孙云鹏、康景星、王荷波、史文彬、邓培等13人为正式执行委员。“铁总”会址设在天津。会后，王荷波来到大连，视察了南满铁路沿线各站的工作，以了解工会组织的发展情况，表示同意召开铁路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南满铁路工会。不久，王荷波回到上海。8月，担任全国铁路工人运动中央特派员，常驻“铁总”。

在国民政府出师北伐时，铁路工人发扬“二七”斗争的光荣传统，组织了交通队，一面破坏敌人交通，一面又迅速恢复革命的交通，为北伐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为了扩大北伐的胜利成果，1927年2月，全国铁路工人第四次代表大会在汉口举行。大会决定扩大和健全铁路工会组织，并一致决议率领全国铁路工人参加北伐战争。会后选举王荷波、刘文松、袁达时等5人为常务委员，推举王荷波为总书记。“铁总”办公处设在汉口全国总工会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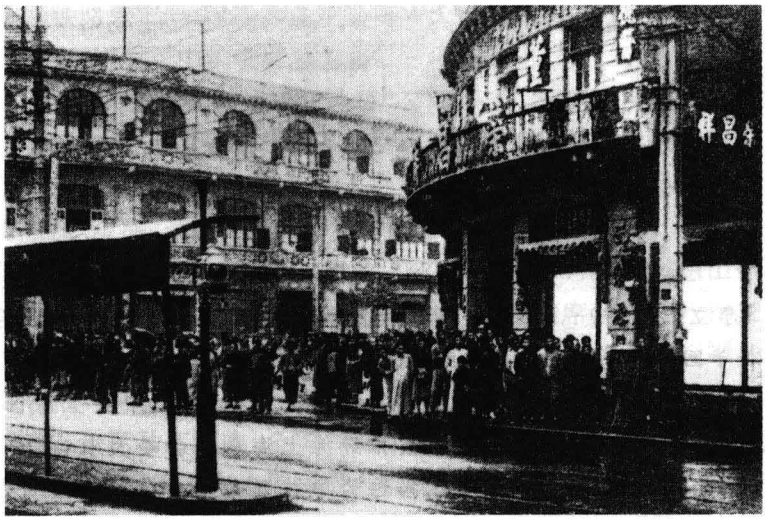
王荷波在其一生大部分时间里，将自己的大部心血用于中国革命的铁道事业，为早期铁路工人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30. 李立三与五卅运动

李立三(1899—1967)　湖南醴陵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参与领导安源工人大罢工。后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中共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被推选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与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1927年当选为中共五大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部长、中央临时常委。南昌起义时,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常委,后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1930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了"左"倾冒险错误,"立三路线"给革命造成重大损失。年底赴苏联学习,并从事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文版的编译工作。1945年当选为中共七大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参加东北解放战争。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劳动部部长、中共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中共华北局书记处书记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收入《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

上海总工会委员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上海的工人运动十分低迷,60名共产党员中只有3名工人,几乎没有任何工会组织,陷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924年3月,李立三被党派往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地委(后改为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4月,党中央批准了李立三提出的关于开展上海工会运动的计划,把上海分为7个区,每个区都创办平民学校和职工夜校。李立三和邓中夏等一起,



五卅惨案发生前，上海南京路上的民众

以上海大学为重要据点，着手实施这项计划。李立三每个星期轮流去各夜校上课1次。同时出版了《上海工人》周报，李立三为编辑，发行量最多时为1 000份。该报纸在教育工人群众、组织工人的日常斗争、准备迎接革命新高潮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工人觉悟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同年夏天，李立三和邓中夏、项英在小沙渡创办了沪西工友俱乐部，拟定了“沪西工友俱乐部章程”。随后，李立三兼任新成立的吴淞工友俱乐部主任。12月中旬起，李立三等着手准备日本纱厂工人罢工，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的口号，并多次召集日本纱厂工会小组代表会议，讨论罢工计划等问题。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李立三虽是上海地区的代表，但因忙于领导罢工，只参加了1次会议。是时，中共上海地委组织以李立三、邓中夏负总责的罢工委员会。2月，在李立三、邓中夏领导下，上海小沙渡的22家日本纱厂4万余工人举行罢工。在2月12日罢工工人会议上，李立三号召“全体工人共同合作，将罢工坚持到日本资本家被迫承认他们的要求为止。”同一天，李立三在各纱厂工会负责人会议上，决定各纱厂已宣布成立的工会一律组织工厂委员会，并准备成立纱厂总工会。斗争坚持22天，取得了胜利，这是上海纱厂工人第一次罢工，也是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

一次罢工。

5月8日，李立三在中共上海地委会议上，报告了小沙渡方面的情况，说明工会会员已达约7 000人。5月15日，日本资本家对工人蛮横无理，令上海内外棉七厂故意停闭工厂，不让工人进厂上工。工人来厂要求照发工资，日本工头枪杀工人领袖顾正红（共产党员），重伤1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于是激起工人的无比义愤，立即罢工抗议，成为五卅运动的导火线。

当天，中共上海地委开会，李立三再次报告小沙渡方面的详情及其应付政策。会议进行中，传来顾正红被杀事件，当即议决派李立三前去小沙渡进行指导。李立三以内外棉纱厂工会代表及2.5万工人的名义，起草了《为日人惨杀同胞顾正红呈文交涉使文》，揭露和控诉日本资本家屠杀中国工人的残暴罪行，印成传单，向全市广为散发。

顾正红事件后，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中共上海地委连日开会，商讨公祭顾正红大会的准备工作。在18日召开的上海总工会筹备会成立大会上，李立三被推举为筹备董事会会长。19日，在中共上海地委和青年团上海地委联席会议上，李立三提出："公祭日人残杀顾正红君，极力宣传运动，联合各学校、各团体作一有力的运动，作一大示威运动计划。"在22日地委会议上，李立三报告了小沙渡工会方面关于追悼大会的准备情况。会议议决：准备分组演讲；临时推举代表，要求严重交涉；运动对日外交会、总商会等电致外交部交涉等。同时因群众发动不够，决定取消前定大游行示威。26日，各工会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成立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任委员长。

"五卅"游行总指挥

5月28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地委召开联合会议，讨论上海政治形势和党的行动策略。会议由陈独秀主持，彭述之、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李立三、王一飞等出席。李立三在会上报告了日本纱厂罢工斗争的形势，提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扩大反日运动范围，不但要包括工人，还要包括学生和全体上海市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稳住罢工形

势，迫使日本资本家接受工人要求。他说："在这形势上要得到胜利，必须扩大社会的运动势力，各团体、各学生起来援助"。李立三支持蔡和森的意见，坚持要在租界组织游行。会议一直争论到深夜，最后通过了蔡和森的提议，即5月30日在上海租界组织反帝大示威，反对工部局提出的压迫华人的"四提案"（即"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法案"），以及援助沪西罢工工人等。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改变了党的斗争策略，把斗争口号由经济斗争转为民族斗争。为了统一指挥，党中央任命李立三为游行总指挥。秘密指挥部设在二马路的一家旅馆里。同一天，李立三、恽代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召集宣传会议，要求学生、工人团结一致举行反帝示威。29日，中共上海地委举行会议，李立三再次报告小沙渡情况，会议讨论了工人具体的要求。

5月30日上午，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2 000余人分散到公共租界进行宣传、讲演，将事先准备的近20万传单全部散发出去。下午1时，学生开始集中在南京路各条主要街道，示威游行。3时许，大批巡捕捕去160余人，关押在南京路老闸捕房。群众愤怒异常，至4时，已有数千群众聚集老闸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者。早有戒备的英国巡捕突然向群众开枪，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被捕53人，是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领导上海全市总罢工

30日晚6时，党中央开紧急会议，根据蔡和森的提议，决定领导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以实际行动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随后，李立三又连夜召集各工人干部开秘密会议，传达党中央指示并部署"三罢"斗争。次日晚，李立三主持召开各工会代表会议，公开宣布上海总工会成立，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兼任总罢工委员会主席。上海总工会会址设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成立后发布第一道命令，宣布6月1日举行总罢工。当时加入上海总工会的有170余个工会、22余万罢工工人。

从6月1日起，全市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的"三罢"逐步全面展

开。4日，在李立三主持下，成立了联合战线性质的公开总指挥机关——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统一领导全上海的反帝运动。6日，党通过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同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并推举李立三等3人为交涉条件审查员。17日，上海总工会等20个团体在闸北召开10万市民大会，李立三在大会发表演说，号召上海人民坚决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

帝国主义的屠杀政策，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加入反帝斗争行列，北京、汉口、长沙、九江、南京、济南、福州、青岛、天津、开封、郑州、重庆、南昌、杭州、广州等地，都有“三罢”斗争发生。整个五卅运动期间，全国各地约有50万余工人参加罢工，1 700万民众直接间接参加了运动，充分展现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和领导者的作用，给帝国主义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促进了国民革命的空前发展。这场运动成为大革命高潮的起点。

五卅运动期间，上海总工会和李立三已成为中外反动派的眼中钉，租界当局决定对李立三等6人实行看管和严处。奉军戒严司令部于9月封闭了上海总工会，并下令通缉李立三。李立三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31. 周士第与铁甲车队

周士第(1900—1979) 海南乐会(今琼海)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广州航空局飞机掩护队队长,广州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队长等职。1926年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南昌起义时,任第25师师长。1934年长征中,任第十五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兼抗大七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等职。1946年兼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48年任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全国解放以后,历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顾问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著有《周士第回忆录》。

改组铁甲车队

为了拱卫大元帅大本营和保障广东省各条铁路的安全,1924年8月,孙中山接受苏联顾问的建议,建立了第一支铁甲车队(亦称甲车队)。11月,中共广东区委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对铁甲车队进行改组,由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负责筹备工作。中共广东区委首先选派12名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到铁甲车队开展工作;接着又从军校选派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另从外面调来廖乾五、曹汝谦共5人,负责具体组织工作。时为见习官的周士第于12月,经徐成章、廖乾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铁甲车队所有人员的配备与调动,都是由中共两广区委决定;铁

铁甲车队到广东广宁县援助农民平定地主武装叛乱

甲车队的工作与活动，也是直接请示区委陈延年和周恩来指导解决。不久，中共从广东、海南等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和青年参加铁甲车队。铁甲车队共有136人，全队编为3个排，每排有3个班，每班有10人。队部设有队长、党代表、副队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军医、差遣、司书、军需上士等。全队领导成员均为共产党员担任，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五，副队长周士第，军事教官赵自选，政治教官曹汝谦。在铁甲车队的党组织，是直属中共广东区委的党小组，廖乾五任党小组长。党员最初只有5名队的领导干部，以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

1925年2月，铁甲车队完成了改组任务，全称为“建国陆海空大元帅府铁甲车队”。改组后的铁甲车队，中共更加重视其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工作，有严格的纪律，要求官兵平等，同甘共苦。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大元帅府所属的队伍，实际上是在中共领导的一支新型的革命武装。

支援广宁农民运动

广东是全国农民运动开展较早的省份之一。1924年4月，中共

广东区委先后派周其鉴、彭湃等到广宁指导开展农民运动，建立了广宁支部。可是，不到3个月，广宁农民运动被反动地主武装镇压下去。为了帮助和支援广宁农民斗争，孙中山发布命令：派铁甲车队支援广宁农民运动，保护农会，剿办匪徒。铁甲车队接到命令后，决定由徐成章、廖乾五、周士第、赵自选4人，率领两个排前去支援。12月12日，铁甲车队赶到广宁，受到广大农民成群结队的热烈迎接，与当地农民举行联欢会，对农民群众深表同情。12月底，在铁甲车队的增援下，农民自卫军参加攻打潭圩地主炮楼的战斗。广宁的反动县长和民团局长阴谋策划一场“鸿门宴”，企图将铁甲车队一网打尽。铁甲车队将计就计，决定徐成章、廖乾五、彭湃3人赴宴，逮捕了民团局长，周士第、赵自选两人带领队伍，则去收缴团保总局的武装四五十支枪。

经过一番周密的准备，1925年2月，徐成章和周士第带领铁甲车队和广宁农民自卫军，先后攻占了反动地主的封建堡垒江家炮楼和黄家炮楼，共缴获六七百支长枪、短枪、土炮、土枪、粉枪等各种枪支、弹药，尔后全部武装了广宁农民自卫军。

铁甲车队在广宁除了打仗外，周士第、赵自选等还被派帮助广宁自卫军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为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工作，由周士第、赵自选等负责主编出版了《广宁日刊》，向广大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后因广州时局一度紧张，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将铁甲车队从广宁调回广州。周士第在支援广宁农民肃清反动武装的斗争中表现出色，被晋升为铁甲车队副队长。

铁甲车队队长

隶属广东革命政府航空局的飞机掩护队，离铁甲车队本部驻地大沙头不远，其任务是负责保卫飞机场。中共广东区委为了掌握这支飞机掩护队，也对其加以改造，经广东政府同意，1925年4月将原队长调走，派铁甲车队副队长周士第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铁甲车队军事教官赵自选任党代表。随后，又从铁甲车队抽调一批队员来飞机掩护队充当骨干。周士第、赵自选到职后，一面与官兵生活上打成一片，一面对下级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使飞机掩护队的状况迅速改

观。改造后的飞机掩护队，不仅成为中共直接掌握的一支革命武装，而且在随后的平息杨(希闵)刘(震寰)叛乱、配合东征军作战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5 年 7 月，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组建后，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周士第调回铁甲车队升任队长，赵自选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是时，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铁甲车队有力地进行了封锁香港的斗争。1925 年 10 月第二次东征时，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陈炯明残部 400 余人在沙鱼涌围困纠察队，捕去纠察队员 10 余人。铁甲车队闻讯后，队长周士第、党代表廖乾五率领 50 名队员前去支援，与罢工工人纠察队于 11 月初在沙鱼涌英勇抗击敌人，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百余人，日夜与 10 倍于我之敌连续激战，因众寡悬殊，周士第率 20 余名铁甲车队员掩护工友突围时，在四山遭敌人扫射，弹如雨下，工人不得不折返 3 次，最后由平山方向冲出，双方死伤甚重。

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广东肇庆建立叶挺独立团，将铁甲车队并入独立团。11 月中旬，铁甲车队由深圳回到广州，除党代表廖乾五调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外，队长周士第和 3 个排长及以下约 100 名队员，均去叶挺独立团工作，铁甲车队的光荣历史从此宣告结束。随后，周士第相继担任了独立团的第 1 营营长、团参谋长、代理团长。

周士第在总结铁甲车队取得显著成绩原因时，指出：一、中共两广区委正确地领导了铁甲车队的工作。二、中共铁甲车队党小组，坚决执行了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正确贯彻了党的政策。三、有广大工人、农民的支援。四、铁甲车队全体官兵，在党的领导下，觉悟提高，斗志昂扬，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认真负责，克服困难，用一切努力，一切方法，去完成党所给予的战斗任务和工作任务。

32. 刘尔崧与广东早期工人运动

刘尔崧(1899—1927) 广东紫金人。五四运动时期,被推选为广东省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1920年参与发起组织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加入广东共产党组织。1922年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工作。年底,组织顺德工人斗争,改组顺德旧工会为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工会组织。国共合作后,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干事。1924年5月当选为广州工代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后领导组建广州工团军,组织广州沙面工人罢工。1925年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工委书记兼广东团区委书记,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是第二、三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1927年4月在广州被反动当局杀害。

发动领导广东工人罢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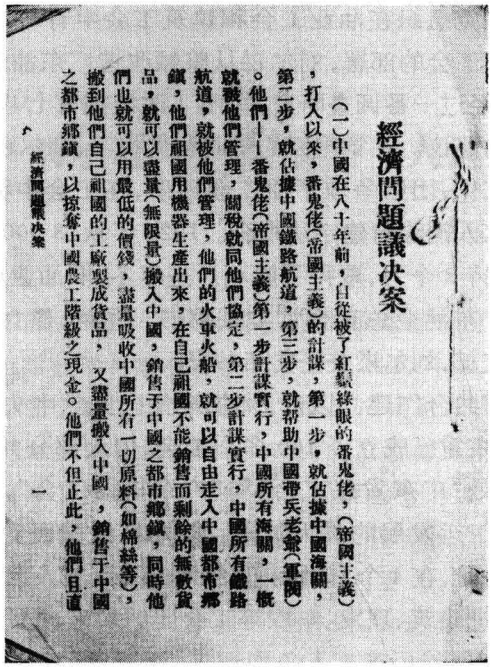
刘尔崧是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1922年9月在广东省甲种工业学校毕业后,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广东分部,协助冯菊坡、阮啸仙等开展工运工作,从此开始了从事工人运动的生涯。年底,刘尔崧受党、团组织的委派,到顺德县开展工人运动,他开办工人夜校,教工人识字、唱歌,宣传革命理论,向工人介绍国内外工人运动状况,揭露资本家对工人压榨的罪恶,使工人觉悟不断提高,而且成立了中共顺德支部。在阮啸仙的支持和配合下,1923年4月,刘尔崧发动大良镇200多名茶酒业工人进行罢工,坚持了两个月,迫使资本家答应工人的要求,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此基础上,刘尔崧进一步发动工人改组顺德工会,驱逐工贼,将会长制改为委员制。改组后的顺德县总工会,成为党领导下的广东省第一个工会组织。

中共广东党组织在油业工会和建筑工会中有一定的基础，根据党关于改组旧工会的部署，刘尔崧从整顿改造广东油业工会着手，深入工人群众，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提出了改组拥有七八千会员的广东油业总工会的建议。在党组织的赞同和支持下，刘尔崧经过3个多月耐心细致的工作，团结争取了原工会理事，在工会中秘密建立了“十人团”，启发工人消除封建宗法观念。1923年秋，3 000多名油业工人举行罢工，坚持3个月，取得了胜利。是年冬，旧油业总工会改组，刘尔崧当选为广东油业总工会常委兼秘书。同时，建立起中共广东油业总工会党支部，刘尔崧兼任支部书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刘尔崧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人部干事。这时，广东省已成立了160多个工会，但大部分并未脱离旧式行会性质，尤其是“广东省总工会”和“广东机器工会”，长期被工贼把持，成为广东工运发展的最大障碍。刘尔崧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工人特派员的身份，在4个月时间里，经常深入到工人家中，动员工人参加进步工会，把建筑、理发、车衣等工会团结起来，把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兵工厂、碾谷厂等工人争取过来，相继发动组织了四五十次罢工斗争，使广州各行业的70多个工会组织，10余万工人，摆脱了“广东省总工会”和“广东机器工会”的控制，改变为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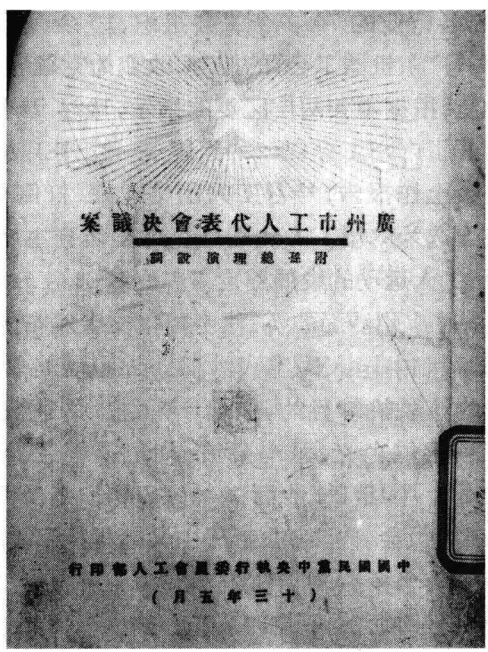
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共两广区委的指示，1924年5月1日，杨殷、刘尔崧主持召开了广州工会统一的组织——广州工人代表会成立大会。刘尔崧在会上作报告，号召工人团结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刘尔崧当选为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广州工代会的成立，为广州工人运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6月30日，驻广州沙面的英、法帝国主义者颁布侮辱中国人民的“新警律”，无理限制中国人民出入沙面。外国侵略者向广州革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这种挑衅行为，引起广大群众的愤慨和抗议。中共决定以广州工代会的名义，派冯菊坡、刘尔崧等领导发动沙面洋务工人举行罢工。7月15日，沙面3 000多名华工离开沙面，举行罢工，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向英、法帝国主义者提出了取消“新警律”等4项要求。经过1个多月的罢工斗争，取得了胜利，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成为中国工人运动自“二七”惨案以来由低潮走向高潮的转折点。



經濟問題議決案

（一）中國在八十年前，自從被了紅鬚綠眼的番鬼佬，（帝國主義）打入以來，番鬼佬（帝國主義）的計謀，第一步，就佔據中國海關，第二步，就佔據中國鐵路航道，第三步，就幫助中國帶兵老爺（軍閥）。他們——番鬼佬（帝國主義）第一步計謀實行，中國所有海關，一概就發他們管理，關稅就同他們協定，第二步計謀實行，中國所有鐵路航道，就被他們管理，他們的火車火船，就可以自由走入中國都市鄉鎮，他們祖國用機器生產出來，在自己祖國不能銷售而剩餘的無數貨品，就可以盡量（無限量）搬入中國，銷售于中國之都市鄉鎮，同時他們也就可以用最低的價錢，盡量吸收中國所有一切原料（如棉絲等），搬到他們自己祖國的工廠製成貨品，又盡量搬入中國，銷售于中國之都市鄉鎮，以掠奪中國農工階級之現金。他們不但止此，他們且直



廣州市工人代表會決議案

附孫總理演說詞

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工人部印行

（十三年五月）

1924 年 5 月，广州市工人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案

组建广东工团军

中共两广区委于1924年8月成立(年底改称中共广东区委),刘尔崧当选为区委执行委员,负责工人运动。此时,广东商团正酝酿一场叛乱,而孙中山对于收缴商团的枪械却犹豫不决。为了反击商团军,8月19日,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广州工人代表会的决议案,决定成立筹备工团军委员会,负责筹办工团军事宜。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广东省长廖仲恺的支持下,通过刘尔崧等共产党人的努力,8月27日,广州市工人代表会组织的广州工团军正式建立,有300余人参加,共产党员施卜担任团长。广州工团军制定了《工团军简章》和《工团军组织大纲》。9月中旬,广州工团军扩建为广东工团军,发表了《广东全省工团军成立宣言》,郑重宣告:工团军"为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而武装,以拥护工人利益补助革命进行为职志,以保护劳工之革命政府下之法律为范畴"。

10月10日,刘尔崧率领广东工团军和广州工人代表会会员,参加广州各界群众五六千人举行的警告商团大会。会后,组织示威游行,遭到商团军的枪击,死伤数十人。商团叛乱发生后,孙中山在中共两广区委的支持下,决心平息叛乱。刘尔崧参加了镇压叛乱革命委员会和军事指挥部工作。在刘尔崧等率领下,工团军和市郊农民配合政府军队和黄埔军校学生军,到商团军驻地西关一带作战,经过1昼夜激战,商团军被全部缴械,终于平定了这场叛乱,使广州的政局得以稳定下来。

广东工团军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在保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肃清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推动广东工运不断发展

1925年春,刘尔崧被任命为中共广东区委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这年五一劳动节,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举行,刘尔崧当选为首届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大会闭幕不久,桂军刘震寰和滇军杨

希闵发动旨在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叛乱。在平定刘杨叛乱中，刘尔崧发动和组织东江、西江、北江工人和广九、广三铁路工人罢工，断绝敌人的电讯联络和交通运输，并率领工团军配合回师广州的东征军作战，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使广州局势转危为安。

为声援上海五卅反帝爱国斗争，6 月 19 日，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冯菊坡、李启汉、刘尔崧等受党的委派到广州沙面发动洋务工人罢工。21 日，3 000 名沙面工人举行罢工，刘尔崧被任命为罢工委员会顾问，他积极动员广州工人全力以赴支援罢工斗争，并亲自率领工团军配合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在珠江三角洲一带巡逻和护卫。

1925 年 11 月，刘尔崧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工人部长。1926 年 1 月，他出席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以工人运动起草委员的身份作了《工人运动的经过》的报告。大会决定组织工人、农民、商民、青年、妇女、宣传等各部报告审查委员会，刘尔崧被推举为工人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在会上，他回答了代表们提出的各种问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工人运动得到迅速发展。到 1926 年 3 月，在广州的 220 多个工会 22 万多会员中，由广州工人代表会领导的工会达 150 余个，会员人数共 19.8 万余人。4 月 1 日，广州召开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来自全省各工人团体的代表 2 500 余人出席，刘尔崧以大会筹备主席的身份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建立广州工人代表大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工人力量。巩固革命基础势力，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以完成民族与阶级的解放”。大会选举刘尔崧继续担任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会后，刘尔崧继续为维护劳工的切身利益而不懈奋斗，推动广东工人运动深入地向前发展。

33. 阮啸仙与广东早期农民运动

阮啸仙(1897—1935) 广东河源人。1918年考入广州甲种工业学校,是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加入广东共产党组织。1923年任青年团粤区书记,组建"新学生社"并任执行委员会书记。还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国共合作以后,是第一至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第三届农讲所主任,先后任广东省农民协会常委、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长、农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1928年被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随后担任江苏省委、辽宁省委的领导工作。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委员会主席。红军长征后,任中共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治委员。1935年3月作战突围时,壮烈牺牲。主要著作收入《阮啸仙文集》。

足迹遍布广东农村

广东省农民运动始于1922年,最初由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发起,是全国农民运动开展较早且较好的省份之一。1923年5月,中共粤区委员阮啸仙当选为团粤区书记,在竭尽全力关注学生运动的同时,兼顾以花县、广宁为重点的农民运动。他强调团粤区委担任农运的同志,应多注意对农村的教育、文化、宣传和组织等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国民党中央成立农民部,由共产党员林伯渠任部长、彭湃任秘书。中央农民部名义上是国民党的,但实际工作都是共产党员去做,农民运动完全控制在共产党手里。从事农民运动的共产党员阮啸仙和彭湃、周其鉴、黄学增,被誉为广东省的"四大农头",他们以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到各地去发动和组织农民运

1926年5月，第二次广东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图为代表们合影，前排右起第五人为阮啸仙

动。阮啸仙深入群众，和农民群众发生密切的关系，足迹遍布东江、西江、北江等广大农村，他努力宣传、训练和组织农民，农民称他是“脚上有牛尿的读书人，不是耕田人像耕田人，我们耕田人把他当成自己人”。

早在1922年，阮啸仙和刘尔崧曾在顺德指导党、团组织的建立。随之，阮啸仙以花县、顺德为重点，深入农村基层，协助当地农运干部，筹建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1924年春天，阮啸仙去花县组织农会，先向农民解释农民协会成立的意义，是保护农民自身和团体之利益，使农民改变态度而赞成加入农会，后协助党支部建立花县农会筹备处。花县农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时，阮啸仙专门书写了一副对联，十分醒目地贴在会场大门两侧，上联“坚韧卓绝为吾人本色”，下联“奋斗牺牲是我辈精神”。他向参加大会的群众讲演：“今天我们成立农民协会，耕田佬要团结起来，拳头要对准剥削穷人的财主佬！”还说：“天下人吃的、用的、穿的，哪一件能离开耕田人？！”阮啸仙在花县成功领导农民运动，受到农民的称赞，农民自编歌谣：“阮啸仙，阮啸仙，农民见他哈哈笑，地主见他哇哇叫！”5月，阮啸仙再次来到顺德县，协助县党支部先后建立起农民自卫军和农民协会。

为加强对全省各地委农委、农运特派员和农民协会工作的领导，1924年8月底，中共广东区委正式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阮啸

仙任书记。

广州农讲所第三届主任

为培养农运骨干力量，1924 年 7 月至 1926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在广州共举办 6 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阮啸仙每届都担任农讲所的教员，而且每届都更换新课，第三届讲授《时事和当前的革命需要》，第四届讲授《怎样做农民运动》，第六届讲授《广东农民运动状况》。

为支持广东各地农民运动，对付反动的商团武装，保卫广东革命政府，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命令，1924 年 8 月下旬，中共广州地委领导人阮啸仙、彭湃、罗绮园等，将第二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 225 名学生编为广东农民自卫军，亦称“广东农团军”，彭湃任团长，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支农民自卫武装。10 月 5 日，阮啸仙给团中央的报告中写道：“此届学生分子很不错，初授以军事教育，差不多有一个多月，即所谓农民自卫军是也。在训练军事教育期间成绩昭著，于纪律及组织方面更见功效”。他强调：“政治训练要与军事教育并重，才能养成全材”。10 月 10 日，阮啸仙以国民党农民部代表的身份，带领农讲所学生和广东农民自卫军 50 余人，出席了有 1 300 余人参加的广宁农民协会成立大会。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于 1925 年 1 月 1 日开办第三届农讲所，阮啸仙任主任。这届农讲所的军事训练，依军队组织编成一连，名曰“农民自卫军模范连”。军事训练教官是由黄埔军校派来的，唐澍任军训总队长。学员每日半天上课，半天训练，晚上开会。3 个月后，应届毕业生有 114 人。阮啸仙在总结农讲所军事训练经验时说：“为养成有组织有纪律之农民运动干员，同时为武装农民之准备，必使学生习惯军事生活及团体行动。”

广东农运的主要领导人

1925 年 5 月，广东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广东

省农民协会，标志着广东农民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6 月，广东省农协由干事局改为常务委员制，选举罗绮园、阮啸仙、彭湃 3 人为常务委员，全权处理会内一切事物。8 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改组，罗绮园任秘书，阮啸仙、彭湃等任组织干事。

10 月，中共广东区委农委负责人阮啸仙和彭湃为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同起草了《关于农民运动议决案》，提出必须撤销民团、商团等地主武装，严惩破坏农民运动的土豪劣绅，迅速组建农民自卫军等急迫问题。“决议案”的通过，对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了指导性作用。11 月，阮啸仙来到东征军攻克不久的惠州城，协助指导成立了惠阳县农民协会。在惠阳县 3 000 余人参加的农民代表大会上，阮啸仙代表省农民协会作报告，并为会议起草了《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宣言》，号召广大群众，“都要一齐起来为自己谋解放去做的，都要一齐团结起来，各界组织好各界的团体，……工农兵商学大联合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为了加强对广东各地农运工作的指导，1926 年 1 月，广东省农协在潮梅海丰、惠州、北江、西江、南路、琼崖设立了 6 个办事处，共产党员彭湃、周其鉴、黄学增分任潮梅海丰、西江、南路办事处主任。中路不设办事处，由阮啸仙负责的省农民协会直接领导。是时，高要县发生豪绅地主指使反动武装民团残杀农协会员的流血惨案，阮啸仙经过调查研究后，于 2 月在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人民周刊》上，发表《高要地主民团屠杀农民之经过》一文，详细揭露了高要地主武装屠杀农民的罪行，指出“此次事变，完全为反动势力集中压迫革命的民众势力”。2 月，广东省农协召开扩大会议，阮啸仙在会上作了《省农民协会成立前后情形》的报告。会议总结了过去工作成绩，检查存在的问题，研究新形势下的新对策。会后，阮啸仙写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扩大会议》一文，系统介绍了这次扩大会议的情形，扩大了对这次扩大会议的宣传和影响。

这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正式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阮啸仙与毛泽东、林伯渠、萧楚女等共产党员，均为委员。5 月 1 日，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 200 余人，阮啸仙代表省农协向大会作了《广东省农民一年来之奋斗》的工作报告，为大会制订的各项决议，提供了理论和政策依据。会上，阮啸仙还宣读了广东省第

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敬告农民书》。大会选举了新的省农协委员会，阮啸仙、彭湃和罗绮园继续当选为常务委员。

1926年上半年，蒋介石相继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国民党右派加紧向农会进攻，革命联合战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对付日趋严重的时局，8月中旬，广东省农民协会召开扩大会议，阮啸仙在会上作了题为《全国农民运动形势及其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的报告，回顾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光辉历程及其发生原因，具体分析了全国各省区农民运动的发展形势，揭露了反革命势力的破坏，坚定地指出：“广东农民运动，绝不因此罢休。”“要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不是靠政府能够成功的，完全要自己去奋斗，要自己努力去造成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还说：“农民运动也不是单靠农民自己去奋斗能够成功的，必须联合革命的同盟者——工人们去扩大全国的革命联合战线才能成功。”并提议“要在广州设立全国农民协会筹备处，以促全国农民大团结之早日实现！”

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广东农民运动持续向前发展。据统计，1925年9月，全省33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农协会员达45万人；到1926年8月北伐高潮时，农协有66个县，会员达80余万人。中共广东区委农委书记阮啸仙，和广东农运工作领导人彭湃、罗绮园等一起，为广东农运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4. 邓中夏与省港大罢工

邓中夏(1894—1933) 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组织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1920年发起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加入北京共产党组织。1921年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和工人俱乐部,担任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1922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起草《劳动法大纲》,先后领导了长辛店铁路、唐山开滦煤矿等工人罢工。1923年4月任上海大学总务长、中共上海区委委员长。1925年参加发动和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任罢工委员会顾问和党团书记。是中共第二、五届中央委员和第三、六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第二至五届执行委员。中共八七会议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先后任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江苏省委书记、广东省委书记。1930年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1932年回上海任互济总会主任兼党团书记。1933年在南京就义。主要著作收入《邓中夏文集》。

赴香港发动罢工

为声援五卅运动,1925年6月初,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和广州各界成立了"工农兵学商援助上海被难同胞联合会"。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提出发动省港大罢工问题。为此,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和广东区委,决定派邓中夏和广东区委监委书记杨殷到香港,进行罢工的准备。是时,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廖仲恺的代表杨匏安也被派往香港,参与其事。他们与中共香港支部书记黄平和香港海员工会委员长苏兆征,共同商讨罢工事宜,并由黄平、苏兆征、邓中夏、杨

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人苏兆征(中)、邓中夏(右)在讨论罢工事宜

殷、杨匏安5人组成中共党团,负责领导罢工。

当时香港共产党和青年团的力量都很薄弱,130多个工会组织五花八门,其中不少是黄色工会。邓中夏、苏兆征等利用和香港工会领袖的交谊,一面依靠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宣传与发动工人群众,一面与香港各工会上层接触,极力说服他们赞成罢工。通过陈延年和邓中夏的努力争取,罢工得到国民党、国民政府的积极支持。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答应每月拨款1万元,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邓中夏后来说:"假若当时不取得国民党帮助,的确罢工不到一星期便要倒台,试问十几万人的伙食经费从何取得?"

根据中共党团的部署,邓中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名义,召集各工会代表开联席会议,通过罢工宣言及组织"全港工团委员会",决定于6月19日举行罢工。《罢工宣言》称:"我全港工团代表联席会议,一致决议与上海汉口各地取同一之行动,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提出拥护上海工商联合会的17个条件和对香港政府的6项要求。与此同时,李启汉、刘尔崧等到广州沙面发动罢工,成立了"广州洋务工团联合会"。

在邓中夏和苏兆征的直接领导下,1925年6月19日晚,香港海员、电车、印务等工会首先发难,宣布罢工;接着是洋务、起落货、煤

炭、机器、船坞等各行工人相继而起。罢工工人纷纷乘火车、轮船离港回广州。两天之后，广州沙面租界的洋务工人也宣布罢工。邓中夏、苏兆征为回广州的数十万香港工人及其家属，妥善安排了食宿。6月23日，香港、广州两地工人和各界群众共10万人举行示威游行，队伍经过广州沙面租界对岸之沙基时，英、法水兵巡捕向民众开枪扫射，造成当场52人死亡，170余人受重伤，轻伤不计其数。沙基惨案发生后，更加激起广东、香港人民的义愤，罢工规模愈益扩大。前后15天内，参加罢工的人数共达25万人，先后有10余万人返抵广州。

中共罢工委员会党团书记

为加强宣传舆论和教育工作，6月24日，由邓中夏主编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机关报《工人之路》特号出版发行，该刊后来成为广州工人大会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最高发行量为每日1万余份。邓中夏为《工人之路》拟定宣传方针和编辑计划，审定重要稿件，先后撰写了各种评论文章75篇。

根据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建议，邓中夏、苏兆征等负责组建了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作为最高议事机关，共计140个工会代表800余人参加。在他们的主持下，6月26日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邓中夏主持起草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并决定由邓中夏负责起草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法。

7月3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了13人组成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作为最高指挥机关，苏兆征任委员长，邓中夏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被聘为顾问。为领导这次大罢工，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了中共罢工委员会党团，作为罢工的领导核心，邓中夏、李启汉任党团正副书记。

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后，中共广东区委还建立了工人武装纠察队。7月5日，工人纠察队正式组建，共有2 000余人，邓中夏任纠察委员会委员兼纠察队训育长，亲自抓队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人纠察队在封锁香港澳门、截留粮食、查缉私货、逮捕工贼走狗、维持罢工秩序等任务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面总结经验教训

自省港大罢工封锁香港以来，英帝国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据统计，经济损失每日达400万元华币，船只由每日的210艘下降至34艘，使昔日繁华的香港一变为满目疮痍的“臭港”、“死港”。

罢工期间，邓中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不断从理论上提高大家的认识。在罢工仅1个月时，他发表《记清三个方法》一文，指出坚持罢工到底、严密封锁粮食和促开国民会议这3个方法，“就是我们准备宣战期内致帝国主义死命的最好方法”。他在《三个月的胜利》一文中，从帝国主义经济的打击；工人阶级地位的提高；世界工人同情的援助；帝国主义相当的让步；国民革命势力的稳固等5个方面，总结了罢工的胜利。他在各界联席大会上发表演讲时称：“香港政府表面上似一只老虎，但这个老虎，各位应知是纸老虎。”

罢工坚持了1年多，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同时，罢工也给广东经济带来诸多困难。由于起初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做法，不利于孤立港英当局，所以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改为“单独对英封锁”的策略。邓中夏认为，这是“省港罢工的中心策略”。“这一政策，其妙用不可胜言。一方面可以打击香港；一方面可以解决广州经济之困难；一方面可以拆散各帝国主义之联合战线；一方面可以使广东商人对外贸易不致停顿。”

1926年3月31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召开第一百次会议，邓中夏在致《训词》中阐明此次罢工胜利的意义：“第一使香港经济受很大的打击；第二提高中国的民族地位，这两个是我们想得到的；第三使广东统一，革命基础巩固了；第四使广东经济发展了，这是以前想不到的。”并且指出获得这些胜利的原因：“第一省港罢工的组织好。第二省港罢工所用的政策很对。”还指出：“我们罢工委员会组织虽然很小，经验着实可贵。省港罢工委员会好像巴黎公社一样，又好像俄国的苏维埃政府一样。”5月，他发表另一篇文章《工人阶级的一首功课》指出：省港罢工委员会“俨然有一个小小工人政府的规模”，是“将来中国工人政府之先声。”他后来还认为，这次罢工，“本有极大的直接胜利的可能性，然而有了三月二十日的政变，这种可能性完

全取消了。”

由于北伐出师，以及经济损失造成的困难，罢工委员会主动提出复工条件。7 月 15 日，香港政府被迫与广东国民政府举行谈判。对此，邓中夏先后写了《中英谈判中的我见》和《中英谈判总评》两篇文章，阐述对谈判的要求与希望，指出：排英既是阶级斗争，又是民族斗争，需要民族团结；各界人士应当全力支持政府的谈判斗争；希望国民政府坚持民族正义立场，对英毫不妥协。10 月 10 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宣布取消对香港的封锁，自动收束罢工。

省港大罢工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持续发展，对促进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共广东区委高度评价说：“你们这种英雄的、有毅力的、长期的斗争，实为中国反帝国主义运动历史上从来所未有的斗争，就是在世界各国的革命史上，亦算是难得的一回伟大的斗争。”

然而，罢工实际上并没有完结。因为罢工委员会一切机关依然存在，直到 1927 年 10 月才真正结束。省港大罢工坚持长达两年零 4 个月之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正如邓中夏所说：“不仅在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中国国民革命史上要大书一笔，就在世界革命史上也要大书一笔。”

35. 杨匏安与广东国共合作

杨匏安(1894—1931)　广东香山(今珠海)人。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在华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北李(大钊)南杨(匏安)”之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代理粤区团委书记，从事青年运动和工人运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中共在国民党的党团书记，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代部长。同时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察委员，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1926年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当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1927年当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监察委员，曾出席党的八七会议。后在港、澳等地开展革命活动。1929年回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做宣传编译工作。1931年8月在上海壮烈牺牲。主要著作收入《杨匏安文集》。

负责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根据中共三大关于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的决议，党派谭平山、杨匏安任中共在国民党的党团正副书记，以统一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出席国民党各种会议的思想与行动。

在国民党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广东区委的指导与帮助下，国民党以广州市党部为改组试点，这不仅关系着广东国民党组织的巩固与发展，也是国民党改组的关键。1923年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决定：将广州分为12个区，重新登记党员，成立区分部。中共广东地委对此十分重视，选派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杨殷等一批党团员积极投入这项工作，而且动员大批青年和工人参加了国民党。11月中旬，杨匏安当选为国民党广州第十区分部执行委员兼秘书，实际负责日常事务，成为改组国民党的骨干力量之一。

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谭平山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杨匏安为组织部秘书，主要工作是：选派人员赴各地负责国民党的改组，推动各地区各部门的党务，以及做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筹备等。因谭平山是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经常要处理国民党内的许多大事，所以组织部的工作实际上由杨匏安负责。杨匏安在组织部工作中，一面要同右派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以维护和发展国共两党的联合战线；一面还要注意团结国民党左派，建立和发展国民党的力量。

1924年秋，中共广东区委成立，杨匏安任监委副书记。他积极参加国共合作的各项活动，特别是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的关系很好，常在杨家祠一起商量工作。是年10月，孙中山为镇压广州商团军叛乱，组成革命委员会，杨匏安和周恩来等参加了革命委员会军事指挥部的工作。11月，谭平山辞去常务委员及组织部长职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以杨匏安代理组织部长。1925年2月，杨匏安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代表，主持召开了广东国民会议促成会第四次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国民会议促成会的各项相关决定。不久，孙中山在北京不幸逝世，国民党中央决定在广州举行追悼大会，指定杨匏安等16人为筹备员。3月15日，有万余国民党员出席了追悼大会，会后3 000余人参加了游行。

参加审讯“廖案”案犯

为了响应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1925年6月13日，杨匏安以广东革命政府财政部长、国民党中央农工部长廖仲恺代表的身份，同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邓中夏一起，赴香港会同苏兆征、杨殷等，共同策划发动工人罢工。邓中夏、杨匏安等到香港后，首先召集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会议，进行广泛宣传发动工作，然后举行全港工团会议，号召各工会工人罢工回省。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指定黄平、邓中夏、杨殷、苏兆征、杨匏安5人组成党团，作为发动罢工的指挥机关。

6月19日，省港大罢工爆发。港英政府对于罢工惊恐万状，千方

百计加以破坏，7 月 1 日以“煽动”罢工的罪名，逮捕了杨匏安等人。杨匏安在香港监狱被关了 50 天，因当局找不到证据，不得不将他释放。8 月 27 日，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 800 多名工人代表欢迎和慰问杨匏安释放回粤。全国总工会组织部长李启汉在省港罢工工人代表大会上说：“杨匏安先生为这次罢工很出力的人”，“我们加入这位有力的助手，更容易操胜算了。”9 月 6 日，杨匏安被聘为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不久又被聘为香港罢工工团宣传学校名誉校长。

就在杨匏安 8 月 20 日出狱的当天，廖仲恺遭枪击身亡。为了审查“廖案”真相，广东革命政府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于 12 月中旬成立“廖案审判委员会”，由李章达、谭桂萼、杨匏安 3 人组成。并组织临时特别法庭，以陈公博、杨匏安 2 人为审判员，负责审理工作。杨匏安视廖仲恺为罢工惟一的保护人，认为廖仲恺被刺，“几乎我们都被刺一样”。他号召广大人民，“以后我们当努力奋斗，誓达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继承廖先生的遗志！”杨匏安积极参加审讯案犯的工作，他主持正义，给国民党右派以沉重的打击。

推动广东国共合作迅速发展

1925 年 11 月，国民党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正式成立了省党部。杨匏安参加了大会“中央党部报告”和“农民运动报告”两个决议案的起草工作。大会选举国民党广东省党部领导人，参加投票选举者 254 人，杨匏安以 218 票的高票当选为执行委员，任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在此前后，在杨匏安的主持和建议下，委派赖先声、彭湃、邓颖超、罗汉、王文明、谭植棠、黄学增等共产党员为各地党部执行委员、特别委员和指导员等要职。

中国国民党于 1926 年 1 月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匏安以国民党广州特别区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大会，担任提案审查委员，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与谭平山、林伯渠组成秘书处，处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日常工作。2 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因事请假两个月，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的杨匏安代理组织部长兼常务委员会秘书。

根据何香凝的提议，2 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开办妇女运动讲习所，杨匏安被指定为 5 人审查员之一，负责审查妇女运动讲习所的章程草案。不久，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遭到打击。由于中共采取妥协让步政策，使谭平山辞去中央组织部长职务，杨匏安也只好离开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

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从 1925 年 11 月 4 日至 1926 年 10 月 21 日，共举行 47 次会议。杨匏安除几次因事未到会外，其余大多数会议都参加了。一般情况下，陈公博担任会议主席，杨匏安作记录；陈不在时，则由杨匏安担任会议主席。其间，杨匏安主持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组织部的工作，十分繁忙，从 1925 年 11 月到 1926 年 12 月，他几乎每月都要向上级作组织工作的书面报告，将有关各县市党部之组织工作、在省执行委员之提案及决议和组织部内部工作等情况，都作详细的说明。

12 月下旬，杨匏安出席了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当选大会主席团成员。会前，他参加了这次大会的筹备工作。会上，他向大会作了《中国国民党广东省组织部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和补充说明，指出：广东省党部成立之后，虽然党员数量增加，组织扩大，民众运动发展了，但党务工作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党员教育训练不够，党内纪律松弛，党内派别纠纷不断，等等。会后，杨匏安再次当选为省党部常务委员和新成立的政治分会委员。

在中共广东区委和杨匏安等的积极努力下，广东省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获得迅速的发展。第一次全省大会时，县、市党部有 46 处，党员为 1.5 万余人，到第二次全省大会时，县、市党部已发展到 97 处，党员人数增至 20 万人，居全国之首。1 年之内，国民党党员数量增长十三四倍，从而奠定了国民党的民众基础。

36. 王若飞与中共豫陕区委

王若飞(1896—1946) 贵州安顺人。1918年入日本明治大学读书。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与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参加法国共产党。1923年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4月回国,被派往河南工作,负责筹建中共豫陕区委,任豫陕区委书记。1926年3月调上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到江浙区委、江苏省委工作。1928年入苏联列宁学院学习。1931年被指派为中共西北工委特派员,途中被捕入狱,先后在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太原监狱,长达5年多时间。1937年5月被营救获释后,先后在西北、华北、华中、西南等地工作。1945年被选为中共七大中央委员。日本投降后,参加中共同国民党的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1946年4月,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主要著作收入《关山渡若飞——王若飞百年诞辰纪念集》。

帮助国民二军开展工作

五卅运动时期,中共河南党组织只有郑州和开封两个地委,党员共300人,整个工作进行得不算顺利,于是中共中央决定,多派一些工作人员去河南开展工作。是时,从苏联学习回国不久的王若飞,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巡视员,根据李大钊的建议,他以全国总工会代表的公开身份到河南,领导党的工作。1925年6月7日,王若飞在郑州出席了群众大会,并发表了演说,这是他在河南首次公开亮相。

王若飞初到河南,先是在开封国民军第二军,开展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帮助河南督办、国民二军军长胡景翼开办军官学校。王若飞在原有学兵营的基础上,开办了1个模范营,派共产党员到学兵营和模

范营工作，发展党员。这时已有30多名苏联顾问来到河南，王若飞便邀请苏联顾问为这两个营进行军事训练。

随后，王若飞开始实施国民二军原定建立北方联合军校的计划，有4个炮兵班、1个通讯班、9个步兵班、2个骑兵班和2个工程班，共计18个班，学员共达2 400人，其规模大于黄埔军校。后因胡景翼去世，继任者岳维峻对中共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不愿执行从前与胡景翼商量好的计划，加上岳维峻和苏联军事顾问的矛盾日趋紧张，河南政局亦由此逆转，北方联合军校中途夭折。此后，中共将军事工作重心转向冯玉祥国民一军。王若飞也根据党的决定，离开国民二军，改做党的地方工作。

关注河南工农运动

为指导河南工作，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曾多次来郑州、开封视察，并作具体安排。1925年7月初，李大钊由于右任陪同来开封做国民二军司令岳维峻的工作。在郑州停留时，王若飞向李大钊汇报了河南党的工作，商谈了郑州地区的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等问题，并提出经费困难及交通不便等问题。李大钊指示：今后要继续做好国民二军的统战工作及发展农民运动，还亲自找岳维峻，要求国民二军帮助解决。接着，共青团中央又派萧楚女、李求实等来河南，协助王若飞开展党的工作。

根据李大钊的指示，8月，王若飞、李震瀛、黄平万等领导郑州豫丰纱厂5 000余工人举行罢工。由于得到各方的支援，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此时，河南全省已拥有5万余工人，王若飞和李震瀛、张昆弟、王荷波、马文彦等一起多次开会，专门商定筹备成立河南总工会事宜。经过多方努力，9月中下旬在郑州举行了河南总工会成立大会。

王若飞还根据李大钊关于重视农民问题的指示，召开区委会议，专门讨论研究了农民问题，决定派大批干部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9月，他派萧人鹄等到郑县、密县、荥阳等地开展农民运动。10月，密县成立了两个区农协会，29个村农会，会员1.2万人。12月，建立了荥阳县农民协会，下辖7个区农协会，68个村农会，

还成立了农民自卫军第一大队。

王若飞除关注工农运动外，也十分重视青年运动。1925 年 7 月共青团开封地委成立后，着手对团员青年进行培养教育，组织留汴学生暑期讲习班，王若飞亲自讲授《帝国主义与唯物史观》的课程，每周两次，全体团员参加听讲。1926 年 1 月，共青团开封团地委利用寒假期间，开办训练班，由王若飞、李求实等讲授《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国民革命》等课程。

中共豫陕区委书记

1925 年九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王若飞出席并汇报了河南的工作。会议作出《河南报告议决案》，肯定了河南的工作“已达到相当的成功”；“在很短的几个月已经把我们的组织扩大了”；“在国民党中我们是占着大多数势力”。同时也指出了不足之处，并决定迅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区委”。

根据中央十月扩大会议决定，10 月下旬，中共豫陕区执行委员会在郑州正式建立，王若飞任区委书记，副书记黄平万，委员有彭泽湘、李震瀛、张昆弟、王荷波、冯品毅、刘天章等。豫陕区委除负责豫、陕两省外，还领导徐州、宿县等地的工作，下辖 3 个地委、7 个特别支部、10 个支部。王若飞住在郑州，负责河南、陕西党的全面工作，主管河南工作；陕西党的工作由黄平万负责。豫陕区委的工作直接归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领导，王若飞要定期向李大钊进行请示和汇报。此外，由萧楚女主编的区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发行量达到 3 000 份。

注重总结斗争经验

王若飞在河南工作不到 1 年。其间，他写了许多文章。1925 年 9 月 1 日，发表《在现时内忧外患交迫之下河南国民军应取的政策》，明确指出：“国民军现时对内的政策，应做一番努力宣传的工作；并积极

赞助民众的一切合理要求，以期取得民众的拥护。对外政策，国民三军应联合一致的立在国民革命旗帜之下，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奋斗。我们当立在这观点上，号召一切的民众前来赞助国民军。”11 月 12 日，在《反奉战争的性质》中，明确指出：这次反奉战争的性质，从表面看去，“固然是两派军阀抢地盘的争斗”，但“实是全国民众争自由的战争。”“全国民众欲求得到解放，必先打翻他第一个最有力的仇敌。”全国民众参与这次战争的目的应该是“从争取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的自由，一直达到召集真正代表人民的国民会议；建立革命统一的民主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12 月 12 日，在《告国民军及河南人民》中，忠告国民军，“倘若他们现在不能减轻一点河南人民的负担，或者在事实上不能表现他真是为谋人民的自由，为谋国家独立而奋斗的军队，则一定要失去民众的同情和信仰”。1926 年 1 月 21 日，王若飞在郑州各界举行的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列宁主义与中山主义之关系》的演讲。当天，中共豫陕区委和共青团豫陕区委发表了《列宁逝世二周年纪念告被压迫同胞》，指明列宁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惟一武器，号召人民去认识列宁主义，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这些经验总结，对于指导河南革命斗争，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6 年 2 月，直系军阀吴佩孚进攻河南，国民二军全线溃败，退出河南，形势急剧逆转。原在河南已经公开的主要领导人，已无法继续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王若飞奉调去上海工作，任党中央秘书长。临行前，他召集会议，部署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农村，发动和组织农民群众，继续开展斗争。

中共中央对王若飞在河南作豫陕区委书记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指出：他“非常努力，并且各方面都有成绩”。可是，就在王若飞暂离河南时，区委会议不等中央的决定，贸然议决停止他的职务。这种做法，受到中共中央北京二月特别会议的批评，指出这“完全破坏纪律”，是“严重的错误”，并特别委派中央候补委员王荷波和豫陕区委解决个别委员问题。3 月初，中共豫陕区委重新改组，汪泽楷接任区委书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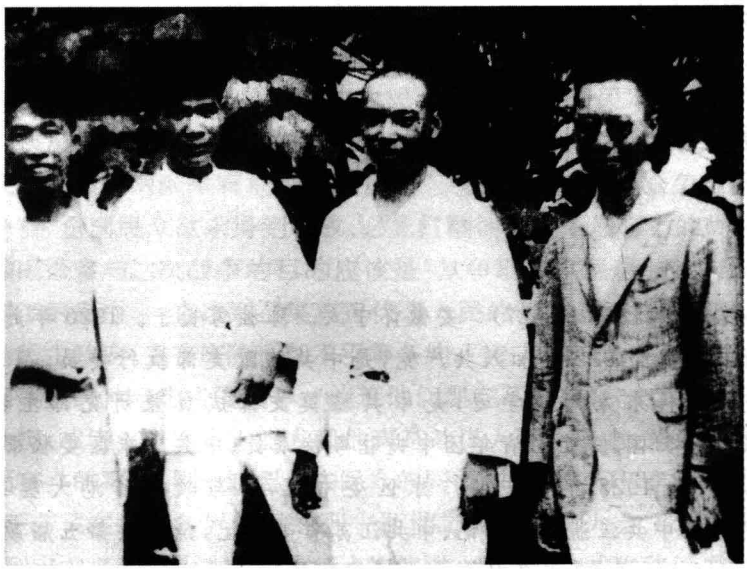
37. 陈延年与中共广东区委

陈延年(1898—1927) 安徽怀宁人。陈独秀长子。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是中共旅莫支部成员兼研究部主任。1924年秋归国,先后任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中共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1925年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参与领导省港大罢工。1927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是中共第五届政治局候补委员。1927年7月在上海被捕牺牲。

参加广东区委工作

陈延年历经3年赴法勤工俭学和1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后,于1924年秋回到广州,被任命为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驻粤特派员。他对粤区团区委进行了改组,在物色干部和筹措经费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绩。10月28日,陈延年写信给团中央负责人邓中夏,报告即将召开的粤区青年团改组大会准备情况和粤区团组织下一步的工作设想。是时,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陈延年和周恩来、杨匏安、阮啸仙、刘尔崧等一起,参加了平叛军事指挥部工作,为广州局势转危为安,革命基地得到巩固,做出了贡献。11月,陈延年和周恩来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廖乾五等共产党员担任铁甲车队的领导工作,以确保党对直接掌握的这支革命武装的领导。不久,陈延年派周士第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对飞机掩护队也进行了改造。

此时,中共广州地委已改称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任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不久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于是党决定调陈



中共广东区委部分区委成员合影。左起第三人为陈延年

延年任广东区委秘书兼组织部长，协助周恩来处理区委的日常工作。为健全区委领导机构，成立了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邓中夏等 12 人组成的区委常委；设立了工人部、农民部、妇女部、青年部和军事部等领导机构，领导开展各种群众运动。陈延年上任伊始，工作一天忙到晚，食宿无定所。他关心党组织建设，领导区委积极发展党员，并坚持在斗争实践中考察和吸收新党员尤其是工农分子的新党员，认为："我们的党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生出来的，更不是从海外飞来的，而是在长期不断的革命斗争中，从困苦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强大起来的。"他还关心黄埔军校中党的工作，1925 年 1 月，和周恩来一起在军校建立了直属广东区委的特别支部。根据广东区委的指示，黄埔军校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进步团体——青年军人联合会。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

1925 年春，周恩来随黄埔军校师生参加第一次东征，改任中共广

东区委常委兼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区委委员长一职由陈延年接任。中共广东区委除负责广东、广西以外，还管辖福建至南洋群岛一带。区委设在文明路75号的一座小楼房。陈延年在三层办公，屋内陈设简陋，办公桌用红布覆盖着，墙壁挂着列宁的遗像，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标语。

中共中央为了加强与国民党政治顾问鲍罗廷的工作联系，5月8日，决定成立广州临时委员会，代表中共中央局就近指导广东地区的工作，指定由谭平山、周恩来、罗亦农、陈延年和鲍罗廷5人参加。但在临时委员会内，只有谭平山、陈延年和鲍罗廷3人进行过工作。由于鲍罗廷与中央的联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临时委员会实际上没有存在多久。

陈延年重视党的组织建设，1925年春派黄平到香港，组建香港支部；派彭湃去海陆丰，建立海陆丰特别支部及尔后的汕头地委；派其他人员赴琼崖、北江、西江地区建立了各地区委及其所属各县县委。下半年，他还派员到广西的梧州、怀集及福建的厦门、漳州等地发展党组织和开展革命活动。到1926年底，广东全省都有了共产党的组织。广东区委定期举办政治报告会，专题报告会，开办党课训练班，陈延年、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邓中夏等领导人经常轮流作报告或讲演，陈延年亲自讲授《党的建设》课；创办以训练基层干部为主的党校，自1925年9月1日党校开学后，从未中断过。

陈延年也重视党的宣传工作，1926年2月创办了区委机关刊物《人民周刊》，张太雷任主编，在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9月又创办出版了内部刊物《我们的生活》，陈延年任主编，并撰写发刊词《告同志》，指出：“广东党部过去虽然做了不少的革命斗争，多少也得了一点苦的经验，然而现在我们还是非常之幼稚。”“因为我们缺乏切实的教育与更好的训练。为推进党的教育与训练，所以我们要印行这个小册子。”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大大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

领导广东工农运动

1925年夏天，广州发生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其间，

陈延年代表区委约见廖仲恺，申明中共对平息叛乱的立场，他和谭平山代表中共广东区委，与廖仲恺、加伦组成“三方委员会”，统一指导平叛斗争，并亲自指挥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坚守大沙头，以掩护国民党中央和革命政府机关顺利撤往广州市珠江南岸，将叛军大部歼灭，取得战斗的最后胜利。

为声援上海五卅运动，中共广州临时委员会着手筹组广州、香港两地的罢工斗争。陈延年积极参与领导了省港大罢工，他与邓中夏、苏兆征、李启汉等 9 人组成罢工“党团”，作为广东区委领导罢工的核心机构。6 月 23 日，在陈延年等领导下，组织广州十几万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沙基惨案发生后，陈延年满腔怒火，立即召开区委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一面与廖仲恺商量，由广东革命政府向帝国主义提出严重抗议；一面与邓中夏、苏兆征等领导省港工人大罢工。

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决议案，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广东区在政治、军事和工农运动方面的成绩，另一方面对广东区没有利用省港罢工时机发展党的组织提出了批评，指出：“粤区虽能在思想上影响工农群众而不在组织上把这种势力巩固起来——吸收工农分子进党及在各种团体里组织我们的党团，这是一种错误。”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广东区委加快发展党员的工作，经过 1 年时间，到 1926 年 9 月，广东地区的党员由 4 000人增加到 5 039 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 38%左右，成为全党最大的一个省区。

广东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所在地，工农运动之激烈，超过全国其他各省。陈延年尤其关注农民运动，1925 年 1 月 5 日，他在致陈乔年、王若飞、王一飞、罗亦农的信中，通报党的四大前夕广东区委的工作情况，指出“农民运动非常重要”。广东区委为此设立了农民部，并向第四次大会提议：“扩张广东农民讲习所为农运大学，由中央在各省送同志来，毕业后分往各省去工作。”后来因政局变动，这项提议并未实行。陈延年热情支持农讲所的工作，并亲自担任兼职教员，多次给学员作报告。在他的提议下，农讲所开设军事知识课，并派唐澍、赵自选等军事干部到农讲所指导学员进行军事训练。1926 年 8 月，陈延年主持召开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执委扩大会议，他在致会议的公

开信中指出:农民解放的问题,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如果不把农民动员起来,“国民革命决没有成功的希望”。在谈到土地问题时,他说:“中国是产业落后的国家,土地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疏忽,是很错误的,我们应该唤起同志来注意这个问题。”

同国民党右派作坚决斗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陈延年同国民党右派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利用各种机会揭露戴季陶的右派言行,曾代表共产党在同意戴季陶被聘任中山大学校长的前提下,向戴提出中共要在党校里抓政治思想工作,要组织政治部并派政治教官等条件,还提议要戴聘任远在上海的鲁迅来中山大学文学院出任院长。1926 年 3 月,针对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陈延年在一次区委会议上,总结指出:“我们对国民党的让步使我们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三二〇事件’(即中山舰事件——引者)是共产党人和左派软弱合作的结果。蒋介石这个穿着军装的戴季陶利用了这一点。此后国民党已不复存在,这是一个空堡垒。我们需要的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国民党,即共产党人和左派的密切联系和合作。”陈延年在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后,立即指示黄埔军校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一个都不要向所在单位国民党部表态,尤其是一向没有暴露中共党员身份的人更应保持常态。”根据这一指示,军校党组织保存了革命实力,为尔后安全迅速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陈延年 1927 年春离开广州去武汉,从此结束了他在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此时,广东地区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 9 000 余人。陈延年领导下的广东区委工作成绩卓著,毛泽东、周恩来称赞他是“党内不可多得的人才”,“广东党开疆辟地的拖拉机”。

38. 陈乔年与北方革命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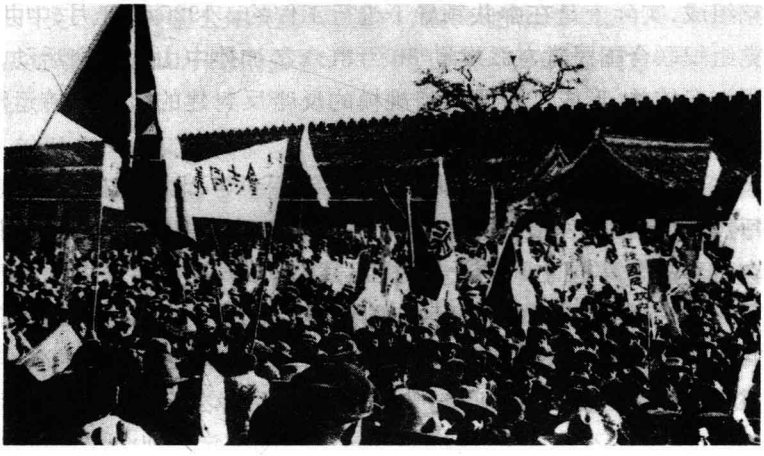
陈乔年(1902—1928) 安徽怀宁人。陈独秀次子。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秋加入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支部执行委员。1923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秋归国,担任中共北京地委(后改为北方区委)组织部长,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革命运动。1926年3月,参与领导北京学生反对段祺瑞的斗争。1927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党的八七会议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后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工作。1928年2月在上海被捕,6月英勇牺牲。

中共北京区委书记

陈乔年1923年从法国勤工俭学转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校期间,就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干,先后担任第四期中共旅莫支部国际状况问题研究会主任、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五期中共旅莫地执委委员兼文化部主任、训练部主任,第六期中共旅莫地执委书记等职。

五卅运动后,国内急需干部人才,中共中央致函中共旅莫地执委,希望组织旅莫学子分期分批回国。陈乔年奉命于1925年秋第一批回国,同行有李富春、林育南、关向应等12人,陈乔年任组长。回国后,陈乔年奉命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书记。此时,李大钊以中央委员身份为中共驻北京代表,负责指导北京党的工作。陈乔年协助李大钊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

为贯彻中共四大关于建立和加强党组织的决定,北京区委兼地委在各地发展党的组织,宣传党的政策。截至1925年9月,已建立了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数十个支部,发展近百名党员,还组织了唐山、保定、天津、郑州、洛阳等7个地委和上百个独立支部。10月



1925 年 11 月，北京各界在故宫神武门前集会的情形

初，根据中共四届执委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指示，北京地委不由区委兼任，北京区委兼北京地委改组，成立北方区执行委员会，负责北方地区党的工作，李大钊任区委书记，陈乔年改任组织部长。新成立的中共北京地委书记由北方区委宣传部长赵世炎兼任。到 1926 年，北方区管辖范围扩大到北京、直隶（今河北）、山西、东北 3 省（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和三特区（绥远、察哈尔、热河）等广大地区。

北京区委十分重视宣传教育工作，从 1925 年秋起，将《政治生活》周刊改为北京区委机关刊物，发行量由 1 000 份增至 3 000 份，该周刊成为北方青年群众中最有影响刊物之一。为了培训北方党团基层干部，1925 年 10 月至 12 月，在李大钊等主持下，北京区委秘密创办了全党最早的一所党校，学员有 50 名，罗亦农任校长，陈乔年担任大部分讲课任务，讲授《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党的建设》、《世界革命形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课程。

参与发动“首都革命”

国民党二大以后，在中共北京区委的帮助下，北方国民党地方组织纷纷建立，党员发展到 1.4 万余人，其中北京所辖 9 个区党部、90 个区分部，党员 2 600 余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名义上由国共

两党组成，实际上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工作的。1925 年 3 月，中共北京党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 30 万群众参加孙中山的悼念活动，散发了许多传单，形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传运动，给民众以深刻的教育和影响。

在五卅运动的推动和影响下，1925 年下半年，北方地区反奉倒段的呼声日趋高涨，发展为波及全国的反奉运动。中国共产党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军阀之间的矛盾，提出武装平民、打倒奉系军阀、废除不平等条约、建立平民的革命政府的口号。11 月初，李大钊主持召开中共北方区委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战略意图，会议决定发动一次推翻段祺瑞政府，建立国民政府的斗争。陈乔年认为，革命时机尚未成熟，群众组织还不够完备，因而不同意区委的决定。但会议通过立即发动“首都革命”的决定，并成立了由赵世炎、陈乔年、陈为人等 5 人组成的临时行动委员会，赵世炎任党团书记。陈乔年并未因个人的意见被否决而消极怠慢。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周密准备下，11 月 28 日，爆发了“首都革命”。数万民众齐集神武门，游行队伍包围了段祺瑞执政府和段宅，挥舞“打倒军阀政府”、“建设国民政府”、“解散关税会议”等旗帜，并散发《北京共产党宣言》、《中共北方区委宣言》、《建国宣言》、《告国民军书》等几十种传单。双方相持了 3 个小时。示威群众提出段祺瑞辞职，解除执政府卫队武装等要求，并决定次日下午在天安门召开国民大会。29 日下午，5 万多群众在天安门前举行大会，要求组织国民政府，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会后举行了示威游行。

“首都革命”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毕竟是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下，北京民众进行的一次夺取政权的英勇尝试，显示出共产党是真正代表民族利益的党，标志着北方民众受共产党宣传教育的新觉醒。

“三·一八”惨案的勇士

1926 年 3 月 12 日，日本帝国主义的军舰帮助奉系军阀，攻击天津大沽口炮台，迫使国民军开炮还击，将日舰驱逐大沽口。事件发生

后，日、英、美等 8 国公使，以此为借口，蛮横地向段祺瑞政府提出所谓“最后通牒”，限 44 小时内答复。这种明目张胆的侵略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针对帝国主义的强盗行为，3 月 16 日，中共北京地委在北大一院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商讨对策。陈乔年、陈为人、陈毅等 100 余人到会，李大钊做报告，要求发动各界群众行动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斗争到底。根据会议决定，国民党北京特别市执委会、北京学生总会、北京总工会等 200 多个团体代表于 17 日在北大三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在通牒限期（18 日正午）未满以前，18 日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联席会议后，与会代表分赴国务院和外交部请愿，有数人被卫队刺伤。

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的组织领导下，3 月 18 日，北京 80 多所学校和 140 多个团体共 3 万余民众齐集天安门广场，召开“反对八国通牒国民示威大会”。会后，2 000 余人举行示威游行，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王一飞、陈为人、陈毅等率领游行队伍行至执政府请愿。段祺瑞不但不予接见，反指使执政府卫队开枪扫射。顿时秩序大乱，陈乔年在带领群众疏散时，胸部被军警刺伤，他忍着剧痛，继续指挥群众撤退，随后才去苏联大使馆请医生包扎好伤口。此次事件，死亡 47 人、受伤 189 人，是为“三·一八”惨案。

“三·一八”惨案，对北京党组织的打击很大，使其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但是，也痛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的反动气焰，提高了广大群众对军阀政府和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事件后，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先后搬进了苏联大使馆。北方区委决定，要揭破“三·一八”惨案之阴谋，继续反段宣传与运动，同时要注意秘密工作，以保存并发展自己的实力。在群众运动的冲击下，3 月 20 日，贾德耀内阁被迫辞职，动摇了段祺瑞政权。

陈乔年在北方区委工作期间，环境十分恶劣，敌人采取高压政策，革命活动难以开展，但他始终朝气蓬勃，以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从容应对。经过陈乔年和北方区委的共同努力，北京党组织发展迅速，至 1927 年 2 月，党员人数在一年内增长了 10 倍，全区拥有党员 3 000 余人，其中北京有党员 1 000 余人，为全国党员人数发展较快的省区之一。

39. 吴玉章与国共首次合作

吴玉章(1878—1966) 四川荣县人。1905年参加同盟会。1913年在法国与蔡元培等倡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回国后,在北京开办留法预备学校。1919年领导四川的自治运动。1922年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年与杨阆公等建立"中国青年共产团"。1925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五卅运动后,回四川从事国共联合战线工作。1926年国民党二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秘书。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毕业后,留在苏联工作。1935年在巴黎主办《救国时报》,宣传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8年回国,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到延安,历任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等职。1946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1948年任华北大学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教育工会主任、中国社会主义学院院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等职。是第一至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第六至八届中央委员。主要著作收入《吴玉章文集》。著有《辛亥革命》、《吴玉章回忆录》。

做四川国民党的统战工作

吴玉章是同盟会资深会员,与孙中山和国民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中国国民党得到迅速发展,但其内部组织仍较为涣散,南方各军阀对广东根据地虎视眈眈,伺机进攻广州。在这种形势下,整顿国民党组织,巩固发展国共联合战线,成为当务之急。1925年春,吴玉章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受党的委派,负责在国民党内做统战工作,他希望能回四川整顿国民党组织,去做基层工作。

出席国民党二大的四川代表。前排左起第一人为吴玉章

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1925 年 6 月下旬，党中央派吴玉章和刘伯承一起由上海赴广州，向廖仲恺汇报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的计划，得到廖的赞同。8 月，吴玉章等回到四川重庆，找到重庆国民党负责人黄负生等，提出了整顿四川国民党的计划，并具体谈及整顿的 3 个办法：第一，要有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组织机构；第二，要培养一批效忠革命的干部；第三，要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活动。认为："做到这三件，我们的整顿工作就算成功了。我计划先办一个学校，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养一批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这时，西山会议派在四川的势力还很大，黄负生等听后，既缺乏信心，又表示怀疑。但吴玉章决心已定，在杨阁公等帮助下，不到两个月，依靠廖仲恺的拨款与自己的股票，在重庆办起了中法学校；把省党部迁到莲花池新址，建立了国民党的各县党部，并选举出席国民党二大的代表，在选出的 7 名代表中，吴玉章和杨阁公等共产党员占 5 人。国共合作在四川进一步活跃起来，表明吴玉章做四川国民党的统战工作很有成效，黄负生惊奇地说："吴玉章的手段真高明，好像有神仙帮助一样。"

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大

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原定于 1925 年 8 月在广州召开，后

延期至9月，又因西山会议派的破坏和阻挠，再次延期到11月15日召开。吴玉章率领四川代表6人到达广州时，各地代表仅四川、湖北和华侨3个代表团约30余人到达，而且大会的一切准备工作还没有开始，所以会议不得不第三次延期至1926年1月1日举行。

吴玉章到广州后，见此情景，心急如焚，想到："这次大会是我们组织力量反击右派猖狂进攻的一次重要会议。假使大会开不成，那就会大大助长西山会议派的气焰，对革命将带来十分严重的恶果。"他立即问及汪精卫，汪很颓丧地说，自从廖仲恺被刺，胡汉民出走，西山会议派又捣乱，恐怕大会是开不成了。吴说："如大会不按时开，则国民党有解体之虞。"过几天，国民党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对策。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组织部长谭平山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提出由吴玉章担任大会秘书长，经汪精卫的同意，12月4日推举吴玉章为大会秘书长，负责大会筹备工作。这时，距开会日期只有20几天，大家都以为无论如何准备不及，非改期不可。吴玉章则坚决反对改期，认为只要大家尽量帮助，一定有把握。在吴玉章等的努力下，调动各方活跃起来，在报刊上极力宣传鼓动，出大会专刊，致电各地推选派代表赴粤。12月下旬，吴玉章连续主持召开了3次谈话会和1次预备会。

国民党二大的一切筹备工作，都是依靠中国共产党进行的。经过吴玉章和谭平山、林伯渠、董必武、杨匏安等共产党人的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国民党二大如期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256人，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明显优势。在开幕典礼上，吴玉章代表大会各代表致答词。在第一次会议上，他向大会报告秘书处组织经过，指出："我们今天能济济一堂，本党最有关系的一个大会，实在是各代表不避艰险，不为谣言所惑，能够继承总理的遗训，努力奋斗的结果。"他还以四川省党部代表的身份向大会作了报告，详细谈到四川的政治、军事、财政、民众、党务等方面的情况，指出四川在国民革命中，"实为一大关键"。大会自始至终开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共产国际和中共虽然作了让步，但大会仍通过了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宣言，开除了西山会议派分子。吴玉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通过这次大会，把孙中山去世后动摇了的国民党稳定下

来，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等，对吴玉章等表示十分感谢，说是共产党员挽救了国民党。

坚决同国民党右派作斗争

国民党二大刚结束，吴玉章匆匆赶回四川，继续整理国民党党务。途经上海、南京等地，发表许多讲演，宣传国民党二大的精神。因劳累过度，多次病倒，到重庆后住进医院。病愈后，吴玉章分工负责整理国民党组织，他决心组织力量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并在中上层和军队中进行活动。最先侧重于做驻南充的川军第5师师长何光烈的争取工作，以减少北伐的阻力，终于将其两个旅争取过来，后来参加刘伯承领导的泸(州)顺(庆)起义。后又将驻川黔军袁祖铭的两个师争取过来，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两军。

1926年8月，吴玉章回到了广州。是时，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蒋介石相继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并先后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使之更加飞扬跋扈，因而国共联合战线潜伏着深刻危机。

根据吴玉章的提议，8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决定，由吴玉章、李筱亭等3人组成四川特务委员会。九十月间，国民党召开执监委员联席会议，成立由徐谦、邓演达、吴玉章等5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并决定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为配合北伐军迅速北上，在联席会议上，吴玉章提议派刘伯承为国民党特派员回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

随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由广州迁移武汉，12月中旬，成立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的身份，经常出席会议。此时，刚刚攻克宜昌后，各军相继进驻，纪律很坏，争执不断，磨擦四起。12月底，武汉国民政府即派吴玉章为特派员到宜昌调解和查办。吴玉章经常发回文电，及时向中央报告鄂西和四川情形，提出解决方略。吴玉章在宜昌住了1个月，着手恢复交通，初步整顿军、民、财政，解决党部分歧，情况略有好转。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原定1927年3月7日召开，但蒋介石则要求推迟到12日开会，吴玉章反对会议延期，他说："开会日期早就通知了，为什么他不来？现在法定人数已足，为什么要让大家等他一个人？"结果会议如期开始，因不少人有顾虑，故把7日开始的会议算作预备会。会上，针对蒋介石推迟开会日期，吴玉章发言指出："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今日到会人数既足，则应开会。"10日开正式会议，吴玉章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并兼任中常会秘书。因迁都之争而引发的提高党权运动，以及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使国民党左派取得了一些胜利，削弱了蒋介石的独裁权力。

"四·一二"反动政变前夕，蒋介石在上海逼迫工人纠察队缴械，吴玉章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上说："简直是反革命的行动，应严重处置。"他还非常关注刘伯承率部坚守四川泸州的情况，主张应即刻制止赖心辉、周西成军队攻打泸州之军事行动，认为："泸州还可以固守，要赶快派人去。"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吴玉章是中共中央派往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在1927年4月之前，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所以对于他一直很信任。4月下旬在武汉召开中共五大时，吴玉章虽是四川省的代表，因怕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而不好在国民党内工作，没有出席大会。会后不久，有人在《向导》上发表一篇文章，说吴玉章是共产党员，从此国民党的要员就对他怀恨在心，对他处处戒备，事事为难。大革命失败后，吴玉章根据党的指示，离开武昌到达南昌，参与组织了武装暴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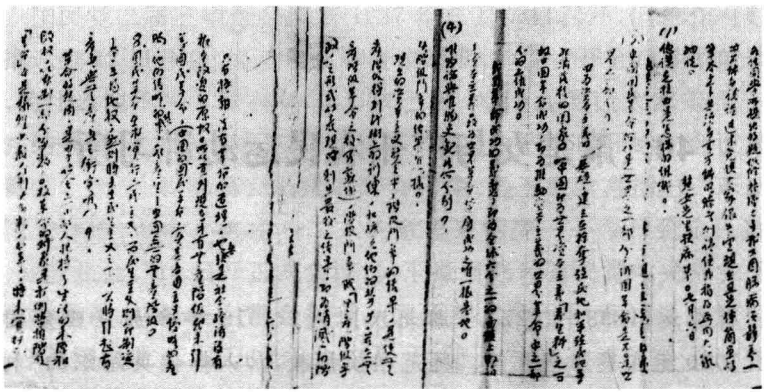
40. 萧楚女与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

萧楚女(1893—1927) 湖北汉阳人。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1920年在襄阳湖北第二师范学校执教,加入恽代英组织的"利群书社"。1921年参加恽代英组织的"共存社",在安徽宣城省立第四师范学校任教。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联合中学任教,并创办重庆公学。1923年先后在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执教,担任《新蜀报》主笔。1924年任中共中央驻四川特派员,发动领导"重庆国民会议促成会"运动。1925年在上海主编《中国青年》,后到河南工作,任中共豫陕区委候补委员,主编《中州评论》。不久回上海,积极投入反戴季陶主义、反国家主义派的斗争。1926年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干事,协助毛泽东编辑《政治周报》,是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专职教员。后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在广州遭逮捕杀害。主要著作收入《萧楚女文存》。

农讲所惟一的专任教员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力量,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提议,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于1924年7月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习期间以1个月为限,学习届满,选派为农民运动特派员。至1926年10月止,共举办了6期。共产党员彭湃、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毛泽东先后负责主持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6年2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设立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萧楚女、谭植棠、林伯渠、阮啸仙等9人为委员。同时决定扩充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名额,共接纳来自全国20个省区的学生327



萧楚女在病中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解答疑难问题的答案。图为学员抄录的笔记

人(毕业时学生为318人)。3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问题,决议请毛泽东担任所长;聘请汪精卫、林伯渠、陈公博、甘乃光、张太雷、萧楚女、邓中夏、阮啸仙、罗绮园等为教员。共产党员恽代英、周恩来、彭湃、安体诚、张秋人等,都在农讲所兼过课。

在第六届农讲所,萧楚女首次来任教,并且是惟一的专任教员,兼代教务主任(教务主任陆沉)工作。早些时候,他参加了第六届农讲所的筹建工作。1926年5月3日,第六届农讲所开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300余人。届时,萧楚女搬到农讲所西斋居住,以坚强的毅力和刻苦的精神,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负责基础理论的教学和学员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讲《帝国主义》(14小时)、《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5小时)、《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9小时)3门课,并且负责编写这3门课程的讲义和解答问题。此外,他还讲授《封建政治问题》、《国际问题与民族问题》等课程。他的讲课,总是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既通俗易懂,又吸引学员,深受学员们的好评。8月,萧楚女率领学员到彭湃领导农民运动的海丰农村参观实习,与该地农运干部直接交谈,使大家增长了丰富的见识。

农讲所采取启发式教学方法,发给学员各种书刊共30多种,凡重要书籍,在阅读之先,由萧楚女于每书要紧部分列出问题,公布出去,然后命学生看书,根究所问,随看随作答案,限期交卷。由萧楚女于

答案中选择数份，加以改正，张贴在墙壁上，作为“标准答案”。然后将所有答卷一律发还学生，令照标准答案自行改正其错误。这种方法，有助于学生掌握与钻研。

编写多科教学大纲

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萧楚女十分认真，尽量占有第一手材料，使教材更真实可靠，编写《帝国主义讲授大纲》时，为了保证统计数字的准确性，他翻阅了《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东方杂志》、《总商会日报》等 20 多种中外书报。

《帝国主义讲授大纲》，共分 3 个部分。第一部：“帝国主义之由来”，着重讲近代国家与资本主义之发生、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制之进展及其矛盾性。第二部：“帝国主义之性质”，着重讲企业膨胀与组织外围之重要、帝国主义之出生。第三部：“帝国主义将来的命运”，着重讲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分赃条约、反帝国主义的联合战线。大纲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弊端及其反帝联合战线，决定帝国主义的存亡命运。

《社会主义概要讲义大纲》，共分 4 讲。第一讲：“资本主义与社会问题”，着重讲资本主义的发生、资本主义制度之特征、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的危机。指出：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不能不向世界上去争夺市场、投资地、原料出产地而发生残酷的国际帝国主义瓜分地球的封建争霸之战。”第二讲：“空想的社会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着重讲马克思和他的反对派、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第三讲：“从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着重讲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后的历史发展、列宁主义的基本内涵。第四讲：“曙光在我们面前”，着重讲共产主义不是乌托邦，并回答当前所有的现实问题。

《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讲授大纲》，叙述了中国近代 80 年来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史实，着重说明运动的起因与结果，分析运动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斗争提供有益的借鉴。讲授者对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认为：太平天国运动的根本动机，“是种族的、单纯的‘排满’思想”；洪秀全、杨秀清等领

导人，都是“不得意之士大夫”；由于太平军无组织无训练，“所以才容易被人击败”；它“是一幕‘农民打农民’的悲剧”。认为：“戊戌政变在实质上，为统治阶级之内讧的斗争”。义和团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是“有价值之民族运动”，“影响中国民族与帝国主义之关系甚大”。认为：五四运动“打破了中国人素来的封建思想及人民不问政治的误谬心理”，是“思想革命”，而五卅运动“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表示力量的运动”，是“真正群众的国民革命运动”。

扶病回答学员的提问

在农讲所期间，萧楚女连夜赶写讲义，带病坚持上课。有一次，他在课堂突然吐血，学员搬来椅子请他坐下，劝他休息，他说：“人也要像蜡烛一样，在有限的一生中，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给人以光明，给人以温暖。”“我是不能休息的，我少上一小时课，你们就要浪费好多小时。”说完，他继续坚持讲下去。

除了学校工作外，萧楚女还要抽出时间，参加许多社会活动，或到各革命团体去讲演，或给省港大罢工工人讲演，或到广东大学讲课和做报告，或到干部训练班、政治讲习班、青年训练班等许多基层讲课。

萧楚女在农讲所的工作，一直十分紧张、辛苦，因过度劳累，引起肺病复发，后来病情恶化，需要静养。在毛泽东的关怀下，住进了东山医院。他躺在病床上，仍支撑着工作。1926 年 7 月 6 日，萧楚女扶病写道：“各位同学所提出的疑纸条积压太多，我又因肺病须静养，一时不能多说话，这未免使大家很失望。现在且先拣简单的笔答于下，其须多言方能明了者，则请俟我稍好再同大家细说。”对学员们提出的疑难问题，比如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如何分别？中国国家主义派历史如何？阶级斗争的结果怎样？帝国主义政策的基础是什么？等等，他都一一作了笔答。在回答“中国国民革命何以是世界革命之一部分”时，写道：“因为资本主义的基础，建立在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国即为世界资本主义‘养生料’之一。故中国革命成功，即为推翻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中之一部分的工作成功。”并指出：“俄国革命成功的意义，即为全球六分之一的面积上取

消了资本主义。故为世界革命发展成功之惟一根基地。”在回答“阶级斗争的结果怎样”时，写道：“阶级斗争的结果，是使无产阶级得到战术上的训练和扩充他们的势力。若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如苏联），阶级斗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之形式以表现时，则其最后之结果，即为消灭一切阶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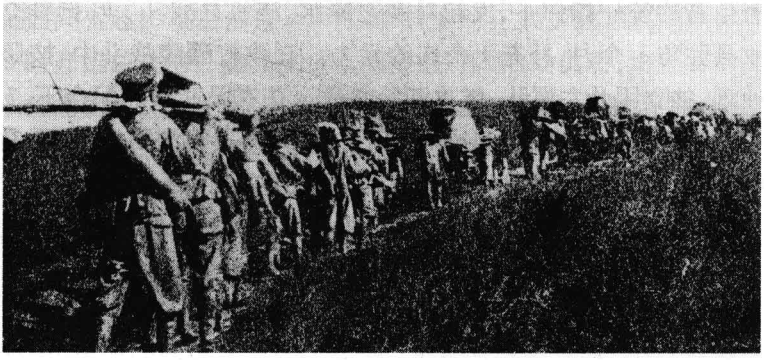
学员们对专任教员萧楚女的敬业精神无不为之感动。数十年后，第六届学员郭绍仪回忆说：“他讲的课程，都有讲义发给学员，他解答的问题，都写成大字报张贴在课堂的墙壁上，让学员们抄写。”毛泽东深情地称赞萧楚女说：“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

41. 叶挺与北伐战争

叶挺(1896—1946) 广东惠阳人。早年就读于武昌陆军学校和保定陆军学校,参加孙中山领导的粤军。1924 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苏联军事学院学习。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回国,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长、团长、副师长等职。叶挺率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在历次重大战役中,奋勇当先,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1927 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第十一军军长;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红军总司令。1928 年后脱离共产党。抗日战争后,出任新四军军长,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与项英、陈毅共同领导创建了华中、华东地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囚禁 4 年多。1946 年 3 月 4 日获释后,请求重新加入共产党,3 月 7 日即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4 月 8 日,因飞机失事在山西遇难。

北伐先遣队威名大振

1925 年秋,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叶挺,根据党的指示,受命组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独立团是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于 11 月在广东肇庆正式组建的,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任团长,故通称“叶挺独立团”。全团约 2 000 人,连以上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团干部的任命、调动和人员补充,都由共产党来决定。独立团设立共产党支部,隶属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叶挺为支部委员。独立团名义上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革命武装。根据党的指示,独立团成立后,经过严格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官兵们在政治思想、组织纪律和军事素养上都有明显提高。



1926 年 5 月，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挺进湖南

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受广州国民政府的派遣，1926 年 5 月 1 日，从广东肇庆、新会出发，开赴湖南前线，执行掩护国民革命军集结和援助唐生智第八军讨伐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任务。在叶挺的率领下，独立团冒着炎夏酷暑，克服行军疲劳，以旺盛的斗志，于 5 月 27 日到达湖南境内。31 日晚，独立团接到唐生智的急电后，冒雨强行军于 6 月 2 日赶赴安仁。叶挺亲赴前方侦察地形，实施作战部署，他在党支部会上表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又是北伐先锋队，我们不但代表革命军，而且代表中国共产党。这是我们北伐的第一次打仗，我们一定要打胜。"3 日，叶挺和第 1 营营长周士第分别率领部队由安仁县城出发，冒雨夜行军，在农民群众的支援下，于 4 日消灭渌田地区的敌人，5 日占领攸县。安仁、攸县首战告捷，极大地增强了广大官兵对北伐胜利的信心，为北伐各军进入湖南创造了有利的条件。第四军军部称赞说："以当时情况而论，我独立团之能击破此路敌人，实为我北伐军之决胜败之最重要关键。"独立团势如破竹，由此威名大振。

两湖战场连战皆捷

军阀吴佩孚所部在安仁、攸县一带失利后，在湖南战场遂取守势。此时，国民革命军在广西之第七军和在粤北之第四军奉命北上入湘。7 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在前敌总指挥、第八军军

长唐生智的统一指挥下，发起对敌之渌水、涟水之战斗。叶挺独立团在攸县驻防1个月，补充1个连的兵力。在攻打醴陵战斗中，按照作战计划，独立团为左翼队，佯攻泗汾之敌。在农民武装的配合下，7月10日占领泗汾、醴陵；12日占领浏阳。独立团占领浏阳后，对兵书颇有研究的叶挺利用间隙时间，组织营、连长学习《孙子兵法》。与此同时，唐生智部于11日攻占长沙城，取得了湖南战场上的决定性胜利。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独立团增设了1个特别大队和1个补充营，从而增强了独立团的战斗力。8月19日拂晓，第四军开始对平江发起总攻击，独立团担任从北、东两面进攻平江城的任务，很快将平江守敌大部歼灭，于当天下午占领平江。苏联军事顾问夸奖说："该城和敌人全部防线的命运，是由叶挺独立团解决的。"8月22日，北伐军进抵湖北通城。在通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在吴佩孚军队未到之前攻打汀泗桥，并由叶挺独立团担任主攻任务。

汀泗桥是鄂南要地，通往武汉的南大门，素有天险之称。敌军以万人以上的兵力，企图负隅顽抗。24日晚，独立团作为前卫，开始向汀泗桥方面推进，26日发起对汀泗桥进攻，35团为先锋队作正面进攻，独立团改为预备队，后仅第1营加入战斗。当天上午35团进攻受阻，下午敌军进至第四军军部附近时，军部急调独立团反击，激战数小时，将敌击退。叶挺根据战前的详细调查，建议第四军从背后攻打汀泗桥。这一建议果然奏效，经过2小时的猛攻，第四军于27日晨占领汀泗桥。当天上午11时，叶挺独立团乘胜追击，先占领咸宁，直趋贺胜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回忆说："汀泗桥一役，叶挺独立团打得最好"。据统计，此役共俘虏军官157人，士兵2 296人，缴获各种枪1 551支，子弹4万余；第四军也有较大损失，伤256人，死134人。

攻占武昌城

敌军在汀泗桥、咸宁失利后，吴佩孚率部赶赴武昌增援，决心对险关贺胜桥拼死防守。吴佩孚亲临贺胜桥督战，表示："昔以汀泗桥一战而定鄂，今以贺胜桥一战而定天下。"在贺胜桥，双方各投入2万兵力。第四军和第七军第二路担任攻击贺胜桥的任务；独立团负责

由正面向贺胜桥攻击前进。8 月 29 日 8 时正式下达攻击命令，30 日晨 5 时开始总攻击。独立团党支部在进行政治动员后，增强了广大官兵取胜的信心。战斗中，他们反复冲杀，猛打猛冲，乘敌混乱之时，冲过铁路桥，使数千敌兵坠入水中，吴佩孚见大势已去，乘车逃回武汉。北伐军于当天 11 时攻占了贺胜桥，打开了攻占武汉的最后一道大门，为迅速占领武汉创造了有利条件。此役双方均有较大伤亡，独立团伤亡共 150 余人。

北伐战争的发展，迫使吴佩孚集中 1.5 万兵力固守武昌城，企图作最后的挣扎。武昌是历史名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9 月 3 日拂晓，北伐军第四军和第七军之一部开始攻城，因敌人炮火猛烈，首次攻城失利。4 日，攻城长官李宗仁、副长官陈可钰发出第二次攻城命令，指定独立团一部为敢死队，担负攻击通湘门至宾阳门的任务。叶挺亲自指挥全团攻城，发动官兵准备了竹梯，并作政治动员，说："不管别的部队怎么样，我们坚决服从命令，以示我们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忠诚。"但 5 日晚攻城，再次受阻，伤亡很大，登梯官兵无一幸免，第 1 营营长曹渊及两个连长壮烈牺牲。独立团被调往南湖，继续作攻城的准备。

接着，北伐军于 9 月 6、7 两日，相继占领汉阳、汉口，攻克武昌已指日可待。10 月 10 日，北伐军对武昌发起总攻。城内守军第 3 师师长吴俊卿作内应，于拂晓打开通湘门、中和门、保安门 3 个城门，独立团由通湘门率先登上武昌城，迅速将敌人打垮。全城 1 万余官兵全部被俘，困守了 40 天的武昌城终于被北伐军攻占。

赢得"铁军"的荣誉

叶挺在总结北伐胜利的原因时，充分肯定了国共两党合作的积极意义，指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合作和他们在组织、动员人民支持军队的工作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北伐是不能得到胜利的。"除此之外，北伐的胜利，还应当归功于独立团广大官兵英勇善战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叶挺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称赞说："叶挺是一个很出色的中共党员"。

北伐中最艰苦的任务，都由独立团承担，从渌田战斗到占领武昌，独立团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为北伐胜利立下战功，赢得了荣誉。但同时作出巨大牺牲，共伤亡排以上干部 60 余人，士兵达 1 200 余人。叶挺在历次战斗中，表现神勇，战功卓著，晋升为少将团长，被人们称誉为“北伐名将”。他所领导的独立团，为其所在的第四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当年粤侨联欢社同人敬赠独立团的一块匾牌赞誉“铁军”：“摧锋陷阵，如铁之坚；革命抱负，如铁之肩。功用若铁，人民倚焉；愿寿如铁，垂亿万年”。叶挺独立团对北伐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面。

为表彰独立团攻城阵亡烈士所作的贡献，在叶挺主持下，武昌洪山修建了烈士墓。墓前竖立着巨大石碑，上端刻着“精神不死”4 个大字，碑上刻有“先烈之血”、“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字句。这是对烈士亡灵的告慰，也是对叶挺独立团的誉载。攻城烈士的墓碑，已成为叶挺独立团北伐战绩的历史见证。

鉴于叶挺独立团北伐的光荣战绩，1927 年 3 月，叶挺升任第十一军 24 师师长，后又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 24 师师长，并兼管武昌卫戍工作。

42. 王一飞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

王一飞(1898—1928) 浙江上虞人。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1924年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曾任中共旅莫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回国后,参加筹建中央军委的工作,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1926年任中共中央军事特派员,随北伐军转战湘鄂赣,巡视北伐战事并负责向中央报告。1927年3月,参与指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秘书长,出席党的八七会议。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代理部长、中共鄂北特委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12月担任长沙暴动总指挥。1928年1月在长沙被捕,英勇就义。

专心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1925年9月,中共中央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一批留学生,经过4年多学习,已届满毕业,聂荣臻、叶挺、熊雄、颜昌颐、张善铭、杨善集等一行26人,由王一飞带队回到上海。陈独秀同他们谈话,讲述国内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并代表中央宣布了他们的分配去向:聂荣臻、叶挺、熊雄等12人往广东;李林等9人往河南;2人去北京;王一飞、颜昌颐等3人留在上海党中央,负责筹建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参加筹建的工作人员共10余人,王一飞为负责的委员,颜昌颐任技术书记。临时工作地点设在闸北宝山路宝山里的一幢普通二层楼房里。

王一飞被分配到军事部工作不过10天,中共上海区委书记尹宽因患肺结核病,无法继续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局决定,暂指派王

一飞任上海区委代理书记，并兼管宣传工作。10 月初，改选中共上海区委，王一飞任新一届区委书记兼宣传部主任。

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上海设立军事委员会（即军事部），成员有：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 3 人（后加入颜昌颐），张国焘兼任军事部主任。军事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和领导军事工作，并向中央提供有关军事问题的情报；武装起义时则变为武装起义的司令部，领导斗争；协调和指导部队和工农中间的一切军事工作；监督同中共合作的各军阀之间的武装分配；制定武装起义计划，拟定军事斗争策略等指导性文件等。

中央军事部从 1925 年 11 月 23 日至 1926 年 1 月 3 日，共召开过 9 次会议，经常参加者有：军事部的张国焘、王一飞、任弼时、颜昌颐等，以及北京、上海、广东、河南等地的特派员。这些会议，曾多次提出解除王一飞的党内工作，使其专心致力于军事工作，并请速派罗亦农来接替王一飞的工作。12 月，中共中央局派罗亦农为上海区委书记，王一飞才回原来岗位，继续参与筹建中央军委的工作。军事部会议还决定，必须尽快开办军事工作人员的训练班，以便在短期内造成一批人才。于是抽掉王一飞和颜昌颐去训练班讲课，王一飞除讲《巷战策略》外，还与颜昌颐合讲《中国军队的组织》。有一段时间，因军事部主任张国焘将赴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军事部主任一职暂由王一飞代理。

向中央作北伐江西战地报告

1926 年 2 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正式决定建立中共中央军事运动委员会，以加强对军事工作的领导。3 月 18 日，北京爆发 2 000 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王一飞作为中共北方区委军委委员，担任这次示威游行的总指挥。随后，王一飞以中央军事特派员的身份，去武汉、南昌、长沙等地，收集到长江流域各省的军阀情报，为广东革命政府决策北伐，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在北伐中，王一飞受中共中央委托，以翻译名义，负责与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进行联络，奔波于上海、武汉、长沙之间，协调工作，

交流情况，商议打倒孙传芳的军事战略。9 月 12 日，王一飞在武昌附近的国民革命军司令部所在地同加伦会面，将最近中共中央有关决议案向加伦做了详细传达，并将中央委托加伦办理的几项工作转告于他。当叶挺独立团即将进攻武汉三镇时，王一飞事先布置武汉党组织做好接应工作。

王一飞以中央军事特派员的身份，于 9 月中旬同加伦一起从湖北出发，赴江西前线视察工作，王一飞向加伦和北伐军总司令部建议先打九江，截断南昌敌军后路。9 月 21 日中秋节这一天，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到江西萍乡，会访了前来视察的加伦和王一飞。27 日，林伯渠偕王一飞还走访了江西新喻县各公团。与此同时，北方的冯玉祥国民军在五原举行誓师大会，成立国民国联军最高特别党部，选举刘伯坚、王一飞、张兆丰等 11 人为执行委员，王一飞为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

北伐军在江西战场的进展引起广泛的关注，但因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指挥失当，导致军队在南昌战役吃了败仗，舆论一片哗然。10 月中旬，国民革命军组织第二次南昌战役，又付出了重大伤亡，国民革命军被迫撤回原驻地，南昌仍控制在敌手。其间，王一飞在江西前线实地考察两个月后，及时向党中央作了详尽的报告。10 月 23 日，他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分析了两次南昌战役遭受挫折的原因，指出：第一次失利，主要是因为入赣各军与总司令关系不好，同时入赣各军相互间的关系也十分薄弱，各自为战，缺乏统一协调。第二次失利的原因，“一则敌已闭城，并用猛烈炮火向我射击，二则我方又不能如计划同时猛攻，彼此有怕损实力，坐等他人牺牲后垂手取功的态度”。报告还指出，在两次南昌战役中，暴露出国民革命军各军之间存在许多矛盾，特别是蒋介石与第四、七、八军之间矛盾更多，表明在北伐战争迅速发展中，国民革命军内部潜伏着危机。

11 月 8 日，江西战场终于传来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国民革命军占领南昌城，孙传芳的主力 10 万余人大部被歼。21 日，王一飞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分析了南昌战役最后胜利的原因，指出：第一，“敌军内部意见复杂，指挥不统一”；第二，“我军的政治工作，虽不能尽人如意，但对于人民及本军兵士，多少是有影响的”，“所以我军兵士在累次打仗中是非常勇敢的”；第三，“民众的帮助国民革命军，到处与孙

军为难”。报告建议党中央派遣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入赣，使江西工农群众运动有一个大的发展，以扩大党对北伐的领导、推进和影响的作用。报告还谈到，经与加伦协商，王一飞向中共中央提出国民革命军今后军事行动计划的建议，认为应先夺取福建，暂时不向安徽江苏方向推进，并赶快派军队肃清鄂西湘西之敌。王一飞的上述几次战地报告，为中共中央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因而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参与指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

王一飞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出色表现，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器重。1927 年 1 月 2 日，王一飞从汉口返回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被留任中央军委（前称中央军事部）秘书。是时，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已由广东秘密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区委军委书记，与罗亦农、赵世炎等共同领导指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2 月 23 日，成立了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在 2 月 28 日特委会议上，瞿秋白建议：“以后让一飞参加本会议”。在 3 月 1 日特委会议上，周恩来宣布：“军委决定添一飞参加军事工作。”王一飞参加特委工作后，经常参加研究军事、工运、宣传等问题，并参与指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工作。为准备召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陈独秀在 3 月 2 日特委会议上说：“关于市民大会组织法，我提议由一飞起详细草案。”在 3 月 5 日特委会议上，中共上海区委代理书记赵世炎提议：“一飞来做宣传工作”；陈独秀也提出上海区委主席团，除增加罗亦农外，“再加派一飞”。3 月 7 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由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王一飞等 8 人组成上海区委主席团，王一飞、尹宽负责区委宣传部。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王一飞代表总指挥部对南市区工人武装起义，作了周密的布置和有力的指导。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动政变后，周恩来派王一飞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上海局势，被留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五大后，周恩来担任中央军人部部长期间，王一飞和聂荣臻、颜昌颐等作为周的助手，协助进行军事工作。

43. 刘伯坚与冯玉祥国民军

刘伯坚(1895—1935) 四川平昌人。1920年赴比利时和法国巴黎勤工俭学。1921年参与发起组织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转为中共党员,先后任中共旅比支部书记、中共旅欧总支书记。1923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任第六届中共旅莫地委书记。1926年9月,与冯玉祥一道回国,任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部长、部长。1928年再次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在中央苏区先后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红军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等职。参与策划著名的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斗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被捕牺牲。

在莫斯科初识冯玉祥

冯玉祥1924年10月发动北京政变,驱逐了贿选总统曹锟,将清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冯自任新组建的国民军总司令。但是,在奉、皖军阀的压迫下,冯于11月被迫通电下野,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此时,中共北方区委开始加强对北方工作的重视和领导,经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的沟通,中共和共产国际与冯玉祥多次接触,关系越来越密切。苏联政府给予国民军大批无偿的军械弹药援助,并派遣顾问团到军中工作;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先后选派30多名共产党员,以国民党的公开身份到冯玉祥部队开展政治工作。经过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冯玉祥的政治思想逐步起了变化。

1925年底,郭松龄反奉倒戈失败,北方时局进一步恶化。政治风

冯玉祥(左1)和刘伯坚(右)在国民军联军五原誓师大会上

云突变,冯玉祥的前途未卜,使其苦闷至极,于是下决心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习考察。经过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努力斡旋和精心安排,1926年3月20日,冯玉祥一行从平地泉乘汽车启程,取道蒙古首都库伦(今乌兰巴托),于5月9日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政要及中国留学生的热烈欢迎。

共产国际希望借冯玉祥访问苏联之机,做进一步团结争取工作,决定委派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等东方大学毕业学生参加接待工作。5月17日,刘伯坚、曾涌泉、武胡景等5人以《前进报》记者的身份,在冯玉祥下榻的欧罗巴旅馆拜访了这位"基督将军"。刘、冯虽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可谓异乡初识成知己。时年31岁的刘伯坚无拘无束地同冯玉祥纵论天下大事,畅谈国际国内时局,给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访问结束时,刘向冯赠送了一套《前进报》。不久,刘伯坚还

特意组织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热烈欢迎冯将军莅临该校参观。

这以后，刘、冯之间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交谈，感情日益融洽。刘经常向冯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红军的建军原则、政治工作方法，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等问题。通过频繁交往，冯对苏联革命和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国民革命的意义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使其“救国、救民、救世界”的抱负更急切，表示“当勇猛直前，以促其实现也”。

促进国民军的新生

1926 年 7 月，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势如破竹，战绩骄人，而国民军则败退南口。冯得知此消息后，心急如焚，在李大钊等的敦促下，毅然决定立即回国。动身前，他主动邀请具有丰富革命理论和实际工作经验的刘伯坚一起回国，以帮助他主持国民军的政治工作。

共产国际即刻满足了冯的要求，8 月 17 日，冯玉祥和刘伯坚等乘火车秘密离开莫斯科。在归国途中，刘每日孜孜不倦地与冯谈话 3 次，每次长达 1 小时半，所谈内容涉及中国国民革命、世界革命，苏俄现状，以及共产党的目的及方法等。这使冯不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而且对于共产党人的勇气和奋斗精神，更敬佩不已，思想认识上产生了新的飞跃。在到达库伦时，刘、冯已初步达成派中共党员速到国民军中工作的协议；刘还为国民军制定了《国民党中央与国民军共同对全国民众的宣言》、《国民军对全国民众宣言》等 7 个文件，从而为共产党人尔后在国民军中开展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此次冯玉祥归国，面临着新败之兵，士气不振，财经拮据，强敌在前等重重困难，但有了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共产党人的帮助，以及苏联大量的军援，使国民军如虎添翼，加上北伐军的节节胜利，令冯玉祥备受鼓舞，兴奋不已。9 月 16 日，冯玉祥到达西北的荒漠小镇五原（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地）。17 日，冯即向全国发布了由刘伯坚参加起草的《五原誓师宣言》，这份长篇《宣言》表示：“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

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今后将国民军建在民众的意义上，完全为民众的武力，与民众要结合。”冯玉祥当天在五原召集高级将领开会，议定成立国民军联军，冯被一致推举为总司令。正午12时，在五原的大校场上举行誓师受旗典礼，冯玉祥宣誓就职。当场还举行了易帜仪式，将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更换为青天白日旗，刘伯坚手持大旗威立阵前。冯、刘两人对广大官兵发表了演说，公开宣布国民军联军集体加入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全力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各军官兵闻后，欢声雷动，雷鸣般的掌声缭绕于耳。五原誓师开始了国民军的新生。

中共中央对在冯军中工作始终保持慎重的态度，10月作出了《中央关于国民军中工作方针的决议》，要求刘伯坚“在冯军中工作，万不可贸然自居指导地位，自定计划”。指出：“我们要用很大的努力使冯的部下能够了解冯，信服冯，使他们相当的愿意执行冯的政策。我们万万不可事事挟冯之威权，强迫其部下多数做他们所不愿做的事。”11月9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西北军工作给刘伯坚的信》中，强调：“此刻我们在冯军中的政治宣传工作，须量力举办万不可只从形式上注意设备完全，而不计其影响效果。”这些决定，为刘在冯军中工作指明了方向。

开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在冯玉祥赴苏之前，国民军中虽有共产党员，但冯本人和他的将领们反对军中开展政治工作。冯归国后，情况大为改观，他主动给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写信，深切地表示：“我本是一个革命者，不过太无学识。所以从前所作，只有几件革命的事实，而无具体的进行。我到了苏联以后，才恍然大悟。所以，我现在毅然归国，从事于革命工作。”信中还请陈独秀经常不断给予政治上的指导。在此前后，中共中央相继派邓小平、王一飞、张兆丰、宣侠父、刘志丹、魏野畴等2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国民军各军中工作，从而加强了中共对冯军的政治指导与影响。

五原誓师后的国民军联军约 12 万人，刘伯坚被任命为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李石曾未到任，1927 年 4 月刘伯坚升任政治部部长）兼宣传处长，因部长空缺，刘实际上领导了国民军联军的党务、政治、宣传、组织、训练等方面工作，开创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的新局面。他一面建立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一面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

为培训基层干部，刘伯坚在五原、包头、银川、兰州、西安等地创办了多处军政干部学校，并亲自给学员讲授《三民主义》、《社会主义概论》、《劳工神圣》、《共产主义 ABC》、《国家与革命》等课程，他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受到学员们的好评。

刘伯坚非常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将《西包头日报》改为《中山日报》，作为他同北方区委联系的纽带。他还主持制定了《国民军联军政治工作大纲》39 条，规定了国民军联军的宗旨、政治工作在军中的地位，以及政治工作的目的、职能和内容。刘伯坚积极向广大官兵宣传革命思想，每逢部队重大集会，他都去演讲，向广大官兵宣传马列主义，灌输“军队政治化”、“军队与民众相结合”，“辅助工农运动”，以及统一战线和爱国主义等革命思想，鼓励官兵克服困难，保持旺盛的斗志。当年军中就流传着“听过刘伯坚演一次讲，当得了三个月的饷”的赞誉。

在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区委的领导与关怀下，经过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使一支旧军阀部队逐步转变为名副其实的革命武装，为尔后驰援陕西，解救西安之围，东出潼关，与国民革命军会师郑州、开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五原誓师到西安解围，是中国共产党和冯玉祥在大革命合作的“蜜月”，刘伯坚功不可没。由于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冯玉祥在大革命最后关头倒向了蒋介石，将对他帮助很大的友人刘伯坚等共产党人“礼送出境”，成为冯政治历史上的一个污点。尽管如此，冯仍对刘伯坚的工作称赞有加，说他“办事极有精神”，“每日工作十八小时，整日孜孜不倦，真是眠食俱废，故工作有特殊成绩。部属同事间对之深为信仰敬佩，我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就抹杀事实，说他不好。是为是，非为非，刘确实有热心，有毅力，有才干，有卓著的工作表现，我即无法不钦佩他。”

44. 刘伯承与泸顺起义

刘伯承(1892—1986) 四川开县人。早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参加过护国、护法、讨伐吴佩孚等战争,有“川中名将”美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与发动领导泸顺起义。1927年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后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任中共长江局军委书记。1932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中央军委总参谋长等职。长征中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第五军团参谋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创建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与邓小平率部千里跃进大别山。1948年以后,参与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西南战役,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西南局第二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总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主要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著有《刘伯承回忆录》。

主持四川军事工作

在五卅运动的推动下,四川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起来。1925年10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后,通过四川国民党左派省党部(莲花池省党部),推动了各项工作的持续发展。

四川的军事形势历来十分复杂,军阀林立,连年混战,为全国之冠。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田颂尧等,是较有

实力的四川军阀，总兵力共20余万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后，四川的一些军阀乘机打起“归附革命”的招牌。中共重庆地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北伐的进展，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军事运动方面。负责四川军事工作的刘伯承，刚加入共产党不久，便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四川的军事活动中去。

刘伯承足智多谋，机警过人，是军中不可多得的人才。他和吴玉章、童庸生等共产党员，利用多种关系，对顺庆（今南充）、合川、泸州、万县等地进行调查，开展军阀部队的工作。刘伯承通过在川军的旧部关系，与泸州的赖心辉部旅长袁品文、团长皮光泽等人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促使赖心辉部旅长陈兰亭与中共党组织建立了联系，使之后来成为泸顺起义的主力。

1926年8月初，中共重庆地委向中共中央呈交了《四川军事调查》和《四川各派军阀的动态》两份报告。随后，刘伯承与吴玉章经上海去广州，又当面向党中央报告了四川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设想和四川的情况，重庆地委建议：“在川军中若果我们要扶起朱德、刘伯承同志，造成一系军队是可能的。”并提出由刘伯承组织旧部，在泸州、顺庆一带发动武装起义的具体设想。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对四川军阀的争取工作，希望利用军阀投机左倾的机会，迅速扩大民众运动，策划川军倒戈易帜，以促使川军早日响应北伐，特指示四川党组织：“我们的军运当注意刘文辉部及杨森部，尤其是杨森方面。”并且预言：“在军事运动上，我们亦有造成自己的一种局面之可能。”

9月中旬，刘伯承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的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的代表谈判，签订了《六条协定》，主要内容包括：川军将领愿一致加入国民党共同努力国民革命；国民政府对川军将领须应给相当名义，与其他国民革命军一律待遇；国民政府对川军予以充分之援助与接济；川军应一律实施政治训练等。《六条协定》，标志着刘伯承等运动四川军阀的工作已取得了初步成效。

川军各路起义总指挥

杨森、刘湘、刘文辉等川军头目从10月起，纷纷“易帜”，归顺国民

革命军。此前，中共北方区委已派陈毅（后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政治部主任）到杨森部队开展工作；陈独秀也派遣朱德（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到万县作杨森部队的工作。

为了钳制川军，保证北伐军迅速北上，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中执监委联席会议上，根据吴玉章的提议，派刘伯承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的名义回四川，全面负责四川军事运动，推动川军将领倒戈易帜，拥护国民革命。

刘伯承接受任务以后，将国民党中央的委任令等密件藏匿在线装书《左传》中，经上海、武汉入川。11月上旬，刘伯承和欧阳钦一行抵达万县，与朱德会面，随后又回到重庆。中旬，刘伯承在紧急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川组织暴动的最后决定和组成重庆军委会的指示。会议决定由杨阆公、朱德、刘伯承3人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军委书记由重庆地委书记杨阆公兼任。

在第一次军委会上，决定努力争取四川所有军阀向革命输诚，倾向国民政府，抑制其出兵东下，威胁武汉；在策略上则是利用军阀内部矛盾，策动一部分军队举行起义，建立自己的武装，以推动和争取更多的军阀武装倒戈易帜，配合北伐进军。

会后，重庆地委初步确定，以顺庆、合川方面的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3部；泸州方面的袁品文、皮光泽、陈兰亭3部举行起义。具体起义方案是：争取驻防顺庆和合川的3个旅首先发动起义，在川北站住脚跟；随即发动驻防泸州的3个旅起义，以相策应。为了加强统一，决定任命刘伯承为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起义总指挥；黄慕颜为副总指挥兼第一路司令。起义时间预定在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一）。

11月中旬，刘伯承、杨阆公到合川，对起义作了最后的检查与部署。25日，国民党四川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在重庆召开，杨阆公、刘伯承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刘伯承在向大会作《军事报告》，介绍了北伐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号召四川方面应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北伐。指出：“四川在革命军势力包围之中，成了瓮中之鳖。四川将领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反革命，就是立刻放弃四川地盘，冲出此包围圈而与破裂有痕直奉系联络，以缓须臾之死；一条是革命，不但可以保留固有地位，且可以图事业之发展。”大会选举杨阆公、刘伯承、朱德等9人为省执行委员。刘伯承的《军事报告》，成为发动泸顺起义

的指导性文件。

举义泸顺

鉴于时局千变万化，泸州起义提前发动，12月1日，袁品文、陈兰亭等率起义军5 000人宣布起义。经过一昼夜激战，于第二天占领泸州城。起义军发出安民告示，陈兰亭、袁品文、皮光泽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四、五、六路司令。3日，又爆发了顺庆起义。4日，秦汉三、杜伯乾指挥起义军约7 000人全部控制了顺庆城。黄慕颜、秦汉三、杜伯乾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第一、二、三路司令。

泸州起义消息传到重庆时，刘伯承奉命准备赶赴泸州，率起义军前往顺庆，随后又传来顺庆起义爆发的消息，遂决定接原计划由刘伯承于5日急赴合川，率黄慕颜部起义。可是，刘伯承于当日傍晚赶到合川时，黄慕颜部已离开驻地驰援顺庆。于是刘伯承率合川起义军2 000余人，于9日到达顺庆。10日，起义军7 000多人举行誓师大会，刘伯承正式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

泸顺起义后，由于川军的包围，未能实现泸州义军和顺庆义军会师的计划。13、14两日，敌人以8个团的优势兵力，分3路向起义军猛攻。根据新的情况，刘伯承提出撤出顺庆，会合泸州义军，整编后入陕的作战计划。16日，刘伯承亲临前线指挥，率领起义军余部2 000余人激战半日，并提议起义军放弃顺庆向开江转移整顿。

起义军经过长途跋涉，于22日到达开江。起义军在开江向广大群众传播革命思想，广泛展开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并且有良好的革命纪律和作风，受到当地人民的称赞与拥戴。

一代名将战孤城

为了巩固起义的成果，1927年1月中旬，中共重庆地委军委在万县召开会议，决定刘伯承即刻赶到泸州，全权指挥泸州起义军；驻开江的起义军由黄慕颜代行总指挥权。

刘伯承受命于危难之际，冲破险阻，于1月下旬赶赴泸州，他采取有力措施，全面进行整顿。1月24日，刘伯承颁发《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明示“从事整理一切”。中共中央陆续调来数十名政治工作人员，分赴各起义部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刘伯承建立了总指挥部，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全面改善税收、财政机构，制定一系列新政策，严厉打击和惩治破坏财政、税收的违纪行为。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理，使原来混乱的泸州面目一新，社会秩序井然。

此时，刘湘等反动军阀在蒋介石的直接指使下，将泸顺起义镇压下去后，又把注意力转向了泸州。其间，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重庆“三·三一”惨案，死200余人，伤700余人，使革命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刘湘、杨森、刘文辉、邓锡侯、赖心辉、刘成勋、田颂尧等联名通电拥蒋反共，川军的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刘伯承为保卫泸州，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宣布全城戒严，召开万人声讨大会，发布《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讨贼檄文》等。《汉口民国日报》称赞：“刘伯承为川中将领之最革命者，其对刘湘之种种反动行为，早已怒发冲冠，有必讨之决心。”5月上旬，刘伯承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他决心率部坚守泸州。起义军虽然多次击退了7万川黔联军的围攻，但因反动军队比起义军兵力大10倍，且对泸州久困长围，在经过41天的泸州守城战之后，刘伯承因孤军无援，于5月16日被迫放弃泸州。刘伯承冲出包围圈后，北越秦岭走出四川，经西安、郑州，脱离敌人重重包围的危险，历经千辛万苦，于7月中旬抵达武汉。刘伯承率领军民坚守泸州的英勇奋斗事迹，被留传“一代名将战孤城”的佳话。

中共中央和四川省委、军委领导的泸顺起义，长达167天。这是党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高举反帝反军阀的旗帜，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掌握武装的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45. 罗亦农与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罗亦农(1902—1928) 湖南湘潭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共党员,任第一、四届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5年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驻粤临时候补委员、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中共北方区委党校负责人、中共上海区委书记等职,与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指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前后,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长江局书记、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在上海被捕就义。主要著作收入《罗亦农文集》。

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

当北伐军在两湖战场取得节节胜利时,北伐战争的主要打击目标由直系军阀吴佩孚转向了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1926年9月初,中共上海区委委员罗亦农最早向区委提议:"上海地方非有一次民众暴动不可,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军事工作"。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昌,进军江西,浙江省长夏超宣布浙江独立,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并令其所部进击松江,准备袭取上海。为响应北伐军占领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决定利用孙传芳军队败退的有利时机,举行武装暴动。10月15日,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全体会议上作政治形势报告时,强调:"我们要准备民众流血,民众暴动,准备武装,以使所有民众都有政治觉悟。"

是时,上海已有工人纠察队2 100余人、国民政府驻沪全权代表钮永建的流氓无产者队伍3 600人、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指挥的商

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合影。前排右起第四人为罗亦农

团500人。但这些武装，缺乏足够的武器和统一的暴动计划与指挥机关。10月17日，中共上海区委决定成立暴动指挥机关，李震瀛为公开总指挥，罗亦农为秘密总指挥。总指挥部设在施高塔路。

起义前，罗亦农除在市区大量活动外，还挤出时间赴外地检查工作。在准备过程中，传来夏超进攻上海受阻，夏军为孙传芳军队击败的不利消息，但上海区委仍决定于24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参加者仅200余工人。因时机不成熟，准备仓促，组织不周密，群众未发动起来，致使起义很快失败。

第一次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连续开会，总结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并决定立即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罗亦农参加了所有的会议，他一面认真总结失败原因和教训，一面对未来满怀信心。10月24日，罗亦农在区委临时主席团会议上说："我们决不因此失败而失望，因我们原为初次尝试的暴动。""我们要对群众大大解释，积极组织，使群众不致对党失信仰，而失掉自信心。"26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上海暴动的第一幕的经过及我们所得的教训》报告，指出："同志不应消极，要更积极的来做革命工作。""同志要利用这个经验，准备第二次更积极而有计划、有组织的暴动，取得相当的成功。"11月12日，罗亦农在区委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东南的军事政治情形及上海自治运动的现状》的报告，指出："我们目前要做继续宣传民众的工作，维持原有的宣传力量，不要只凭主观冲动。"12月18日，罗亦

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进一步提出，今后为促成上海市自治，要积极准备总同盟罢工、罢市、罢课。

是时，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已由广东秘密来到上海，担任上海区委军委书记，与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共同组织领导第二次武装起义。上海区委决定，罗亦农多负军事责任，军事组织要多以民众为主体。罗亦农在1927年2月中旬中共上海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上海区委书记。

为帮助北伐军的胜利，2月19日，上海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令》，发表了《总同盟罢工宣言》，号召全上海工人即日宣告总同盟罢工。短短几天，上海总罢工人数由15万人迅速增至36万人，动摇了旧军阀统治势力。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21日晚，上海区委决定，将总罢工转为武装暴动。22日，区委宣布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罗亦农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委员。但由于未能在罢工斗争高潮时将罢工转为武装暴动，也未能按原计划采取一致行动，加上北伐东路军白崇禧部队奉行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对上海工人援助的请求，所以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告失败。

第三次起义的最高领导成员

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在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继续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为指导这次武装起义，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作为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以应付一切工作。特委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周恩来等8人组成。同时，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等5人（后罗亦农参加）组成特别军委；由尹宽、郑超麟、高语罕等5人组成特别宣委。

罗亦农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过程中，一面同国民政府代表钮永建进行谈判，一面参加并主持上海区委会、部委书记会、特委会、党团书记会、活动分子会等各种会议，每次都要作报告或发言，除总结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外，还要通报当前形势和各方面情况的准备。2月24日，罗亦农在区委各部书记联席会上，强调今后要“集中

力量准备武装暴动”；“注意秘密，加紧宣传工作。”3 月 2 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大会上作《上海总同盟罢工及其前途》的报告，阐述了党领导的总同盟政治罢工及第二次武装暴动的意义，要求更紧张、更猛烈的去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在准备和领导武装起义的过程中，罗亦农已成为反动当局追捕的对象，但他临危不惧，沉着镇定，仍全身心地投入领导罢工和武装起义的各项工作，对武装起义及时给予有力的指导。3 月 5 日，特委会议讨论第三次武装暴动问题，根据罗亦农的提议，决定整个行动由特务会议指挥，紧急时由罗亦农、周恩来、汪寿华、陈独秀 4 人负责。会议还通过了上海市民代表会议名单，罗亦农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市民代表会议。

正当蒋介石走向公开反共的危急关头，3 月 15 日，罗亦农在全上海活动分子大会上，作《关于政治与本党工作方针》的长篇报告，郑重指出：“中国革命运动已经到了历史上最严重的时间，尤其是最近的东南，已为全国革命的第一个重心。我们党要积极取得民众革命领导的地位，领导工农阶级与小资产阶级，很坚决的、很能与右倾的军事势力、改良的资产阶级决斗，直接取得民众政权，实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同时要更加严密我们党的组织，扩大我们党的力量，以接受这正在蓬勃发展的革命高潮，希在很迅速的时期中完成我们党的重大使命。”他还提出在北伐军未到上海以前，“我们应积极为各阶级共同行动作准备，罢工、罢市、罢课与民众的武装暴动”。而在北伐军到上海以后，应“召集市民代表会议，建立上海市民临时革命政府。”大会认为，罗亦农的报告“对于全国及上海革命运动的认识非常得当”。“议决一致拥护并执行”。19 日，罗亦农代表区委下达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预备动员令》和《中共上海区委行动大纲》，拟定了《各部作战计划》。此次行动的总口号是：“罢工、罢市、罢课、武装暴动，打倒直鲁联军，响应北伐军，建立上海革命民众市政府。”

3 月中旬，直鲁联军毕庶澄部接替孙军上海防守司令李宝章部驻防上海。白崇禧部趁机进占上海郊区龙华；南京方面也已打下常州、苏州。在有利的形势下，经过充分准备，3 月 21 日晨，特委决定举行上海总同盟罢工和第三次武装暴动。正午 12 时起，上海总工会颁布第二次总同盟罢工令，80 万上海工人在 3 小时内一致举行罢工，并开

始转入武装暴动。至翌日午后6时止，在南市、沪东、沪西、闸北等全市7个区，经过30小时的巷战，共歼敌5 000余人，终于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

起义胜利的当天，召开上海市民代表大会，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等5名共产党员当选由19人组成的上海临时市政府委员。

“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

第三次武装起义实现后，蒋介石指使白崇禧提出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问题。在此关键时刻，特委会议讨论应对办法。罗亦农在3月26日上午召开的区委会议上，指出：“现在中心问题就是上总的武装纠察队的问题，上总要有纠察队才有说话的地位。因此，就要与右派军事力量发生战斗。”“蒋在江西已开杀我们的同志，所以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挽救这个全国的危机，要严阵以待，集中兵力，并将吴淞及南市大部分的兵力调来，四周布防，保护上总与俱乐部。我们要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这个争斗比这次暴动的意义更大。”在下午召开的活动分子会议上，罗亦农又指出：“如果工人武装被解除，则工人又将入于过去黑暗之域，因此，维持工人武装为目前最重要的问题。”“区委策略，如果右派军队要来缴械，我们绝对武装抵抗不稍退让，如胜则全国政局可大变，如败则我们全上海工人为全国革命而奋斗，也很有意义。”4月6日，罗亦农在活动分子会议上作《目前时局与我们的策略》报告，指出：“蒋与我们争斗的中心问题，为解除上总纠察队武装问题，他要取消上海工人在政治上的地位，此是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的决斗。”我们的策略，惟有与蒋介石争斗，“我们决定不收缴枪械，坚不缴械。”“严取防守态度，无论他们怎样进攻，我们决不投降与退却。”

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勾结下，4月11日，白崇禧发出布告，勒令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和禁止罢工，随后将纠察队全部缴械。同一天，受流氓头子杜月笙的诱骗，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惨遭杀害。接着，蒋介石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四·一二”大屠杀，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成果，毁于一旦。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实行武装斗争的第一次胜利，它的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在中国革命史和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起义失败了，作为上海区委主要负责人罗亦农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认为不要责难中央，因为上海区委过去犯了许多错误。随后，他离开上海赴武汉，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46. 魏野畴与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

魏野畴(1898—1928)　陕西兴平人。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与刘天章等发起组织进步团体“共进社”。1923年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返回陕西后,先后在榆林中学、西安省立第三中学和第一中学教书,发起组织“青年生活社”,为国民党陕西临时省党部负责人之一,创办《西安评论》,并担任中共西安特别支部委员。1926年任中共西安地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协助杨虎城部工作。1927年后,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国民党陕西党部宣传部长、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杨虎城国民党军第十军政治部主任。1928年初,任中共皖北临时特委书记、皖北军事委员会总指挥。4月在率领部队转移途中被捕牺牲。主要著作收入《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

协助杨虎城解西安之围

早在1923年春,李大钊和中共北方区委派遣陕西共产党员魏野畴去陕北榆林中学,开展革命活动。魏野畴在榆林任教期间,结识了靖国军将领杨虎城,两人交往甚密,自此中共北方区委与杨虎城建立了联系。

1925年6月,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聘请魏野畴创办三民军官学校,帮助其训练部队、教育军官。魏野畴任该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刘含初等担任政治教官,并吸收一批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员充任下级军官。

1926年初,中共西安地委正式成立,黄平万任书记,魏野畴任委员,负责宣传工作。4月,国民军撤离北京,退守南口,直系军阀刘镇

华乘机向驻陕西的国民军发动进攻，兵临西安城下。魏野畴得知消息后，深感局势危机，立即赶赴三原，参加了国民三军的军事会议，决定国民二、三军共同坚守西安、三原等地。魏野畴在决策守城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会后，魏野畴等共产党员协助杨虎城组织西安保卫战工作，帮助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系统；发动群众支援守城官兵作战；向军民各界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等。5 月，魏野畴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去渭南、华县等地，发动群众，组织农民武装，配合国民军抗击刘镇华军。8 月，魏野畴协同国民军坚守渭北重镇三原，打退敌军的多次进攻。随后，冯玉祥率国民军联军分七路进军陕西，于 11 月 27 日解西安之围，刘镇华被逐出境，国民军历时 8 个月的守城战斗，最后胜利结束。

西安解围后，李大钊 12 月 5 日致函魏野畴，指出：国民军各军，“必须统一于冯玉祥总司令指挥之下，不可号令歧出不相下，因为指挥不统一，决不能作战。”而且“必须同阎锡山的关系弄好，勿使晋阎助奉张”。同时，“对于二军将领，我们不可从他的言语上去相信他左倾革命，要从实际行动上去看他是否左倾。不可简单的只灌输他以许多不能真正懂得的革命理论，而要有方法的领导他切实做点革命有利的事。”李大钊这封信，进一步指明了国民二军的发展方向。

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

为统一政权和军事指挥，冯玉祥计划依靠共产党人与各界人士积极筹建新的政权机构。在国民军解围西安之时，中共西安地委派魏野畴、史可轩等共产党人帮助国民党左派于右任，在三原开始筹建国民军二、三联军驻陕总司令部。

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于 1927 年 1 月在西安正式建立，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下设参谋长、秘书长、副官长、政治部、政治保卫部、部办公室及民政厅、教育厅、司法厅、建设厅及财政委员会等机构。总部设在西安大街社会路。魏野畴任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部长惠友光徒具虚名）兼《新国民军报》主编。史可轩、杨明轩、雷晋笙、李子洲、许权中、刘天章、王尚德、陈家珍等许多共产党员，也在总部担任了要职。驻陕总部各厅局机关内的共产党

员和青年团员有100余人，起到了领导核心作用。驻陕总部成立当天发布命令，宣布废止陕西督办、省长制，取消省议会，由驻陕总部统管陕西党政军大权。

冯玉祥抵达西安后，2月，公布了《国民军管辖区军政时期临时行政大纲》，规定：国民军各省驻军总司令及省政府，承军总司令之命，分管一切军事民政事宜；各省驻军总司令，得指挥民政事宜。

驻陕总部是临时性的地方军事政府，为陕西省军事民政最高机关。作为以共产党人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权，其中心任务是领导陕西民众进行国民革命的政治和军事斗争。驻陕总部建立后，积极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支持工农革命运动；协助国民党建立各级党部，宣传国民革命；建立所属各军、师、团的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对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负责陕西的民政、军政、教育、司法、财政等各项工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因此得到陕西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

对驻陕总部的贡献

魏野畴利用一切有利条件，选派大批共产党员到驻陕总部所属各级部队，在军、师、旅、团各级建立了政治部，加强官兵的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共产党组织，秘密发展党员。他为驻陕国民军起草的《政治训练大纲》，提出要教育官兵了解“军阀与帝国主义的结合及军阀的反动政策”，熟悉“中国的农民状况”和“农民的要求”，明确认识“中国革命运动最后的目的，不独是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且要在国内脱离本国的剥削者的压迫。”同时还帮助杨虎城开办了军官学校，训练中下级军官，灌输革命思想。这对于提高广大官兵的政治觉悟，起了推动作用。

在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魏野畴除在驻陕总部任职外，还担任国民党的其他要职。1927年1月26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等共产党员被选为常务委员。同时，魏野畴还被选为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执行委员，后兼任宣传部长。3月，中共陕甘区委以国民党省党部和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的名义，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和中山军事学校。这两

所学校的主要领导者，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刘含初为中山学院院长，史可轩为中山军事学校校长，邓小平为政治处主任。负责中共陕甘区委宣传工作的魏野畴经常应邀去作报告。这两所学校为中国革命培养出大批军政干部和群众运动骨干，对陕西革命运动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魏野畴重视农民运动，他在3月初召开的驻陕总部政务会议上作了《农民运动之标准及其活动范围与政府行政之沟通》报告，提出要“保护农民组织：一，保障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二，使农民参政”。会议通过了魏野畴的报告，决定“建立农民事务委员会，办理关于农民的如统一土地税则、减轻佃农田租、改良水利、保护森林、设立农民银行”等。这些规定对于农民运动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7年4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6月，武汉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以于右任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驻陕总部实际上已不再是政权机关。大革命失败后，仅存半年的驻陕总部被勒令解散。是时，魏野畴任中共陕西省委军委书记，继续领导陕西民众，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47. 恽代英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恽代英(1895—1931)　江苏武进人。建党前,与林育南等创办进步社团"利群书社"和"共存社"。1921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在四川泸州建立青年团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三届中央委员。1923年创办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担任主编,先后在该刊发表160多篇文章,是中国青年喜爱的领袖之一。1926年在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初,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同年5月参加讨伐夏斗寅叛变,担任中央独立师党代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宣传委员、财务委员及代理主席。后参加广州起义,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1928年主编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1930年5月在上海不幸被捕,1931年4月英勇就义。主要著作收入《恽代英文集》。

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由广州转向武汉。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培养更多的军事政治人才,国民党决定以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为基础移至武昌,再扩充成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筹建分校工作从1926年10月中旬开始,成立了以邓演达为主席,有共产党员郭沫若、包惠僧、董必武、刘伯垂等参加的招考委员会,并决定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上海、奉天(今辽宁)等处及全国各地招生。经过6 000余人的初试和4 000人的复试,最后录取学生1 181人(其中男生986人,女生195人)。

早些时候,恽代英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时,已积累

了一定的军事院校工作经验。1927 年 1 月 3 日，恽代英奉命由广州经上海回到武汉，就任武汉分校政治总教官。1 月 9 日，恽代英主持召开政治教官第三次会议，研究改进教学问题。会议决定：现有 9 个班次不变；讲授时间为 70 分钟；政治科适用循环教学法；讲授时多给学生留发问或发表意见的时间；学生须参加政治工作和群众运动；每星期至少请中央委员或名流来校讲演 1 次等。

1 月 19 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科正式更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武汉分校设立政治演讲班，恽代英任政治主任教官，郭沫若、周恩来、李富春、李达、张国焘、陈潭秋、项英等共产党员任政治教官。随后，武汉分校发布校令：委邓演达代行校长，顾孟余代行党代表。苏俄铁罗尼担任顾问。

经过 3 个多月的筹备，2 月 12 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开学典礼。全校学生共 1 600 人，包括原来在广州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学生 400 余人和在武汉新招收的第六期政治科学生 1 100 余人。2 月间，恽代英主持召开了教育委员会，对教育和训练问题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其中包括：各学生队毕业的日期；军事教育每日上课 7 小时，政治课每日 1 次；起草各类教育计划等。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继承和发扬黄埔军校的革命精神，实行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并重的原则。学生经常外出宣传革命道理，走街串巷，访贫问苦。校内到处张贴“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等标语。革命气氛异常热烈，号称“第二黄埔”。

武汉中央军校的实际负责人

为了防止蒋介石专断独裁，恽代英在 1927 年 3 月中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提出裁撤由蒋把持的军人部的意见，得到邓演达的赞同，两人配合默契，使全会通过了撤销军人部的决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军事政治学校之决议案》，决定将校长制改为委员制。

根据吴玉章的提议，3 月 22 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简称武汉中央军校），学生共 3 700 人，隶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邓演达、谭延闿、恽代英、顾孟余、徐谦为该校

委员，以恽代英、邓演达、谭延闿为常委。因邓、谭2人忙于其他公务，校常委经常只恽代英1人。政治教官沈雁冰说："真正主持日常工作的是恽代英，他是军校的核心。"军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也称："恽代英是邓的灵魂，邓演达的许多主意，都是恽替他想出的。"恽代英和邓演达合作主持全校校务，使这所国共合作的军校，实际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武汉中央军校自校长制改委员制后，恽代英立即对军校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裁减人员，节省经费，清洗右派分子，招收大批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使军校大为改观。

全校的政治教育由恽代英主持。学校给学员印发《宣言训令研究》、《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本党与农民运动》、《本党与劳动运动》、《各国革命运动概论》等多种科目政治讲义。恽代英除主讲《中国国民党宣言政纲及一切决议》外，每周要集合全体学生亲自讲一次话，内容包括：工农运动，学生运动，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共产党的作用，北伐战争形势，马列主义基本知识等问题。学生左洪涛回忆说："恽代英同志才华横溢，学识渊博，言词生动锋利，鼓动性和逻辑性都很强，在全校学员中威信最高，吸引力最大，是军校实际负责人。"女生队学员胡兰畦回忆说："恽代英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读书又多，真是博学多才。他口才很好，阐述革命的道理，深入浅出，人人听了留下深刻的印象。"

除许多共产党人被聘请担任军校政治教官外，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彭述之、吴玉章等，特约来校作演讲；董必武、张太雷、李立三、张国焘等被聘为特别讲演人员。毛泽东曾应邀到两湖书院为全体师生作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特别演讲。

参加讨伐夏斗寅叛乱

3月10日，武汉军校少数学生在汉口血花世界（今民众乐园）肆意制造了殴打捆绑工人宣传队事件。在恽代英的领导下，军校官兵立即将滋事分子扣留查办，随后清洗了100多名右派学生，狠狠打击

了其反动气焰。恽代英认为，对右派学生严肃查处是完全必要的，4月14日，他在校内务会议上作《最近学校改革之意义》报告指出，如果“让右派胜利，让蒋介石胜利，那，不仅我，大家均必遭殃。因此，我们对付右派及反革命派，不能不采用严厉手段。”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受其指使，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乱，勾结四川杨森，联合偷袭武汉，革命形势顿时出现危机。恽代英大力倡导与支持反蒋斗争，一面与宋庆龄、邓演达等联名发出“讨蒋通电”；一面组织分校师生和市民举行“讨蒋大会”，使武汉中央军校的倒蒋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4月15日，在邓演达和恽代英主持召开欢迎汪精卫大会，通过催请中央即刻开除蒋介石；请中央即刻下令讨伐蒋，同学一致愿作前锋等决议。23日，武汉中央军校各期学生在阅马场举行讨蒋大会，30余万群众参加，会后将坚持反共的杨引之等示众处决，武汉三镇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蒋高潮。

4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第二次北伐后，由于国民革命军大部分已开赴河南前线，后方格外空虚，武汉中央军校决定组织党员志愿兵团，以保卫武汉的安全。5月10日，武汉政府决定将中央军校学生编为中央独立师，侯连瀛任师长，恽代英任党代表。中央独立师配合国民革命军，在武昌卫戍司令、24师师长叶挺统一指挥下，参加了讨伐夏斗寅叛乱的战斗。19日，该师出发抵纸坊，恽代英随军行动，与广大官兵并肩战斗；21日便将夏逆部队击败，俘虏千余敌人。22日，恽代英在咸宁举行的军民大会上，高度赞扬了中央独立师官兵的英勇战斗精神，他说：“我们后方兵力虽少，我们革命军是不跑的，叶师长是不怕死的，带领他们的两团人去拼命冲锋，卒把敌人打败……我们很自信，为保护人民利益而战，一定是胜利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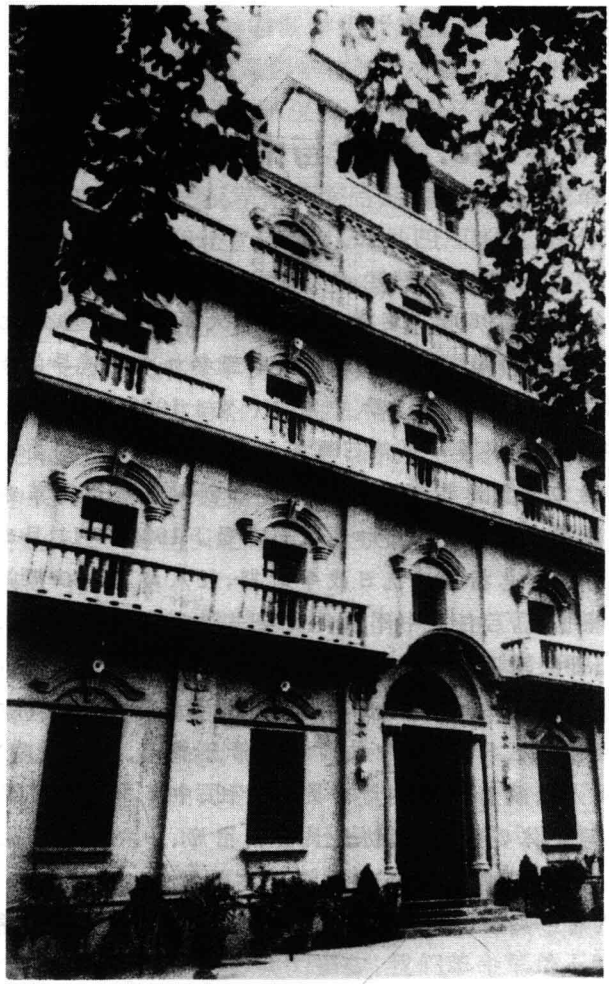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武汉中央军校这支革命力量。1927年5月之前，武汉中央军校共产党组织，由恽代英主要负责，以后调陈毅来专职作党委书记。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恽代英于7月23日离开武汉，奔赴九江，投入新的战斗。25日，武汉中央军校即停办，被强行编入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官教导团。由于恽代英、陈毅等共产党人的努力，这支革命武装力量被保存了下来，成为后来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一支重要力量。

48. 贺龙与南昌起义

贺龙(1896—1969) 湖南桑植人。大革命时期参加北伐战争，历任国民革命军师长、军长。1927年率部参加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任起义总指挥。是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开辟湘鄂边革命根据地，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和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书记。1930年任红二军团总指挥。1934年参加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任湘鄂川黔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1935年11月率部长征，后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师长，开辟晋绥抗日根据地，后任冀中军政委员会书记和冀中总指挥、晋西北军区司令员、晋绥军区司令员等职。1947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司令员，后任西北军政大学校长、西北军区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中革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要著作收入《贺龙军事文选》。

跟着共产党走革命之路

为了挽救大革命的失败，1927年7月中旬，中共乘武汉国民政府欲“东征讨蒋”之机，计划集合革命的武力，依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但此时张已被汪精卫说通，决定实行“分共”政策，令部队中的知名人士退出共产党。张发奎令其所辖叶挺(第十二军24师师长)、贺龙(第二十军军长)的部队，开拔到九江南昌间之德安集结待命。鉴于时局危急，7月20日，聚集在九江的中共



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江西大旅社

领导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叶挺、聂荣臻等开会，商议对策，一致主张叶挺即刻联合贺龙向武汉政府示威。随后，在武汉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采纳了九江方面的意见，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

摆在贺龙面前的当务之急，是迅速作出抉择。本心欲取张发奎之地位而代之的贺龙，决心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他在湖北鄂城

群众大会上表示:“我们要同军阀斗争,我们要帮助工农革命,组织新的真正革命政府。”7 月 23 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后,谭平山未经中央决定,先将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告诉贺龙,探其意向,贺龙表示甚为热烈。24 日,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召开第二次九江会议,决定叶、贺部队于 28 日以前集中南昌,28 日晚举行暴动。

其间,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兼江西省主席朱培德邀贺龙赴庐山开会,对贺百般拉拢。是时,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与贺龙、叶挺等,于 25 日在九江甘棠湖的小划子上会晤,商量对策,决定叶、贺不去庐山开会,部队亦不去德安,而于明后两天开赴南昌。27 日,贺龙率二十军全部集中南昌,指挥部设在中华圣公会教堂内。贺龙刚进入驻地后,立即会见了正在紧张进行起义准备工作的李立三、谭平山、朱德、恽代英、刘伯承、吴玉章等。当有人提议要设法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时,贺龙坦诚地表示:“我们若要拉张则不必干,若要干则不必拉张,因我们此举是张氏不愿干的。”

南昌起义总指挥

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于 7 月 27 日自武汉赶到南昌领导起义,正式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成员有李立三、恽代英、彭湃。28 日,在江西大旅社成立了起义总指挥部,由贺龙、叶挺、刘伯承等负责。当天,周恩来到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将前委关于起义的计划告诉给他,并征求其意见,贺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周恩来代表前委委任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随之,贺龙在刘伯承的帮助下,拟定了起义计划。由于军事准备不及,前敌委员会决定将起义改定为 7 月 30 日晚上行动。

正当起义准备紧张进行时,30 日早,张国焘赶到南昌,代表中央阻劝起义“宜慎重”,并说国际来电指示:“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张国焘还极力主张拉张发奎参加暴动或取得其同意。此时张发奎迭次来电邀贺、叶到庐山开军事会议,并准备近日到南昌。在万分急迫之下,前委立即召开扩大会议,经过辩论,没有听从张国焘的意见,决定于 8 月 1 日晨 4 时发动起义,并由贺龙、叶挺、

谭平山、周恩来4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公开主持暴动。起义命令由叶挺起草，用贺龙代总指挥的名义发布。

贺龙于31日下午召开团以上军官会议，传达了前委关于起义的决定，号召官兵积极参加，并宣布了起义计划：由贺龙的二十军共6个团负责解决省政府和司令部，由叶挺的部队负责解决第六军，并且要求大家回去把那些不可靠的连长都换成共产党员担任，各团要立即作出具体战斗计划。不料，第二十军1团副营长赵某将起义计划泄露，敌人有了严密的警戒。贺龙把这一情况及时报告给前敌委员会，决定南昌全城当晚戒严，并将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

8月1日凌晨2时，在中共前敌委员会领导下，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北伐部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有：第二方面军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7 500人，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24师，1 500人；第五方面军朱德指挥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几百人。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贺龙和刘伯承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经过4个小时激烈战斗，起义部队占领了南昌城，将朱培德、程潜在南昌的3个团兵力全部歼灭，缴获枪5 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鲜艳的红旗在起义军总指挥部的五层大楼上，迎风招展。

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谭平山、周恩来、叶挺、贺龙、宋庆龄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贺龙是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成员之一，也是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参谋团委员之一。当晚，参谋团会议讨论部队回粤路线问题时，出现两种不同意见，贺龙主张取东道走赣州，如失败可回湖南。但他的意见未被会议采纳，决定取道赣西走东江。

起义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兼代总指挥，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未到前由恽代英代理）。下辖3个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廖乾五任党代表；第十一军叶挺任军长，聂荣臻任党代表；第九军朱德任副

军长，朱克靖任党代表。2 日，颁布了《中央委员宣言》、《“八一”革命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文件。下午 2 时，在皇殿侧体育场召开了群众大会，庆祝“八一”起义的胜利。到会群众约 5 万人，会场上彩旗飘扬，欢声雷动。大会主席团由贺龙、叶挺、恽代英及各界代表组成。主席团总主席贺龙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的讲话不时被雷鸣般的阵阵掌声打断。

起义部队按照预定计划，从 3 日起，开始陆续撤离南昌，全部向广东进发。叶贺所部分别于 4、5 两日出发。第十一军副军长兼 10 师师长蔡廷锴及其官兵思想不稳，第 10 师刚离南昌不久，于 4 日在进贤即脱离革命队伍，这同起义后来失败有一定的关系。

起义军 1.5 万人，行军甚苦，粮食难寻。贺部每日行军 60 至 80 里，行至抚州时，已是人困马乏，故改为每日行军 40 至 50 里。25 日在壬田，遭遇敌钱大钧部阻击，贺龙率 1、2 两师及第 3 师教导团5 600 余人攻击前进，激战一天，击退敌军，于 26 日占领瑞金，起义军伤亡 600 余人。30 日，起义军进攻会昌，由贺龙率第二十军主力攻正面，叶挺率部迂回敌左侧背。会昌之役，钱大钧部再遭重创，缴枪 3 000 余支，俘虏 4 000 余人。壬田、会昌两次战役，贺部伤亡官兵约 700 余人。此时叶贺部队共约 1.1 万余人，为保存实力，不与强敌接触，部队未照九江会议决定走赣西的预定计划，直下寻邬，到广东梅县入东江，而是根据贺龙的提议，走赣东，改道福建汀州、上杭，直取潮(州)汕(头)。

在艰苦的行军作战途中，贺龙以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布《告全体官兵书》，指出：“这次南昌举义，实在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阐明了南昌举义的 5 个意义，写道：“本总指挥治军素来不喜多言，但是说了，必定要做，彼此同受党纪军纪的约束。以上五事，我们革命同志必须遵照执行，革命成功，定在不远，愿与诸同志共勉之。”

实现了平生最大的夙愿

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途中，8 月底，中共党组织接受贺龙多次提出的请求，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经过多

年革命斗争的考验，终于实现了平生最大的夙愿。贺龙在瑞金的一所小学里举行了入党宣誓，周恩来在贺龙入党宣誓仪式上讲了话。贺龙后来说："我指挥的军队是党的了，我的脑袋也是党的了，党就是我的生命！"

9月初，起义军仅剩5 000人，转至福建、广东一带，9月下旬占领潮州、汕头。后又被迫放弃汕头，行至汤坑，遭3倍于我的敌军围攻阻击。贺、叶亲自指挥部队轮番猛攻，相持不下，经过两昼夜战斗，起义军战败，伤亡2 000余人，叶贺两军已被敌切断。10月4日，在流沙镇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将部队转移。贺龙余部2 000余人奔往海陆丰，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贺龙离开部队，于11月经香港转赴上海。贺龙表示："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我要卷土重来！"他还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中共中央起初打算派贺龙到苏联学习，可是贺龙再三请求，希望派他回湘鄂西拉队伍。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派周逸群等和他一起回到家乡，从此踏上了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第二方面军的战斗征程。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中共领导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的新时期。贺龙回忆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是由于很早就接近了共产党，是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政治上没有出路，看到国民党革什么命呢？尽是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化堕落，感到个人政治上没有出路，整个军队也无出路。另方面却看到共产党的主张好，有办法，能够救中国，这是最重要的原因。第三我本身出身贫农，家里很苦，穷人的痛苦我知道得很深。"

49. 瞿秋白与八七会议

瞿秋白(1899—1935) 江苏常州人。1917年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1920年以北京《晨报》通信员身份赴苏俄采访。1921年9月任莫斯科东方大学翻译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初回国,任《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同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五卅运动中,任《热血日报》主编。是中共第四届中央局成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大革命失败后,筹备召开八七紧急会议,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犯有"左"倾错误。是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0年8月回国,同周恩来一起主持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左"倾错误。1931年至1934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战线的斗争。后抵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不幸被俘,6月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主要著作收入《瞿秋白选集》、《瞿秋白文集》。

参与八七会议的筹备工作

大革命失败前夕,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1927年7月上旬,陈独秀被停止中央领导职权,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5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这时,在常委中没有瞿秋白,因为鲍罗廷在传达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指示时,曾经提议让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瞿秋白、蔡和森赴海参崴党校。但这个提议,后来并未成行。

瞿秋白和鲍罗廷于7月13日一起秘密离开武汉,前往庐山,共同

八七会议会址：汉口鄱阳街139号

商讨中共中央的改组和计划武装暴动的问题。他们在庐山听取了李立三、邓中夏关于九江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的建议。瞿秋白当即表示完全赞同，并受托回到武汉向中央常委报告九江会议的意见，请中央即速决策。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均表示赞同。25、26两日，中央常委连续召开会议，决定组织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准备南昌暴动。随后又派张国焘以“中央代表”身份赶赴

南昌传达共产国际“若毫无胜利希望，可不进行暴动”等指示。经过前委据理力争，起义于8月1日得以胜利实现。

是时，临时中央常委每次开会，瞿秋白都要出席，实际上已参加了临时中央常委的工作。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以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在瞿秋白主持下，由张太雷、李维汉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参加，对紧急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紧张的筹备。瞿秋白和罗明纳兹参与了会议一系列文件的起草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这份文件，先由罗明纳兹用俄文起草，再由瞿秋白译成中文。会议原定7月28日召开，因筹备工作异常紧张，来不及准备报告，通知开会交通困难，等到8月7日只有湖北、湖南代表及在武汉的上海负责人到会，不得已只能作为一次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

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

八七会议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为鄱阳街139号)一所英国人的公寓举行。出席会议的共25人，瞿秋白以中央委员的身份参加。李维汉担任会议主席，宣布开会，首先介绍了会议的酝酿和筹备的经过，说明到会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只能开一次中央紧急会议。然后宣布了会议的3项议程。

第一项议程：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作关于党过去的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瞿秋白作翻译。罗明纳兹着重说明《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草案的主要内容。国际代表报告之后，李维汉说，常委已经接受了这个报告，现在大家可以发言，但要简单。接着，只准半小时餐饮。午饭后，出席代表毛泽东(候补中央委员)、邓中夏(中央委员)、蔡和森(中央委员)、彭公达(湖南省委代表)、罗亦农(中央委员)、任弼时(中央委员)、李子芬(共青团中央代表)相继发言。之后，瞿秋白发言，他提议草案中应增加如下几点：一、“说明党过去只看见上面的资产阶级领袖没有看见群众。以后仍要与小资产阶级联合，但不能如前之态度。”二、“中央政策与国际政策中加说

我们党团太无作用。”三、“对国民党中应加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并反对第三党的主张。四、“C. P. 对于政权的性质为造成工农民权独裁制，以真正的国民党的旗帜为号召。”在停止讨论后，由国际代表作结论。会议一致原则上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的草案，并责成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 3 人组织委员会对告同志书的草案作文字修改。

第二项议程：由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报告。他指出：“现在事实已经证明国民党已与我们分裂了。我们再不能以退让手段来争得民权，是要以革命方法来争得民权的。”他说：“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已进到最高点，要以我们的军队来发展土地革命，叶挺已如此，在相当时期，北方之张兆丰也应如此。这是一定有胜利的机会的。”还指出：“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的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燃着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报告提出了今后工作的 3 条策略原则：第一，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要注意揭露汪精卫派民权主义的假面具；第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第三，在革命中组织临时的革命政府。报告最后还提出要注意作好团结国民党革命左派的工作，以及注意加强军队和士兵中的工作。

瞿秋白报告后，在李维汉主持下，逐一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和《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在讨论每一个议案时，都由瞿秋白宣读全文，并在讨论后作结论性发言。在讨论农民斗争议决案时，他指出，要号召农民暴动，要实行耕者有其田，革命政府可以在土地革命中得着生命，党的六大应讨论并决定一个农民问题的纲领。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 3 个议决案，并且追认批准了本年 7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等文件。

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

第三项议程：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选出临时中央政治局

正式委员9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7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8月9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3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长、农委主任兼党报总编辑。瞿秋白从此开始主持中央工作。

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纠正并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使党走上了新的道路。八七会议的功绩是主要的，但会议只注意了反对右倾思想，而对中国革命形势和中国资产阶级等问题的认识与分析，都存在一些“左”倾观点，致使“左”倾错误在党内滋长蔓延。

50. 彭公达与湘赣边秋收起义

彭公达(1903—1928)　湖南湘潭人。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后,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共支部书记、中共湘潭地委军事委员等职。1927年先后任中共长沙特委书记、中共湖南区委农民部长等职。出席党的八七会议,被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任新改组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参与领导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年9月下旬,湖南省委改组,再次当选为省委书记。因秋收暴动失败,被"左"倾错误领导免去湖南省委书记职务,改任中共湘西特委书记。1928年7月在安源被捕,8月在长沙英勇就义。

湖南新省委书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计划领导湖南、湖北、广东、江西4省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发动土地革命,建立工农革命政权。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对湖南秋收暴动作出明确规定:准备在近期内建立湘南革命政权,组织以毛泽东任书记的湘南特别委员会,受中共湖南省委指挥。5日,临时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南昌起义,"给了四省暴动以有力的帮助。在此时四省即应给南昌政变以有力的响应"。并要求湖南省委"定出一个秋暴的军事计划"。

8月7日,彭公达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央紧急会议,并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八七会议通过《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强调举行有计划的秋收暴动,是"共产党现时最主要的任务"。为了执行中央的新政策并确保秋收暴动的成功,临时中央政

治局委派毛泽东、彭公达2人负责改组湖南省委，指导湖南秋收暴动。9日，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作出《对于湘省工作的决议》，提出改组省委的3项办法：一、由毛泽东、彭公达负责与旧省委商选新省委名单报告中央。二、新省委以9人组织之。其中至少要有3个工农分子，3个工农运动的负责人。三、指定彭公达为新省委书记。

彭公达临危受命，于8月11日返回长沙，负责召集旧省委及各负责人开会，宣传中央新政策的精神及改组省委。在16日召开的省委会议上，彭公达传达了八七会议的决议，遂改组省委，彭公达任新省委书记，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等9人为委员。因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尚未到，新省委决定将改选结果征得毛泽东的同意之后，再报告中央。

筹划湖南秋收暴动

8月18日，新省委在沈家大屋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常委，讨论秋收暴动问题。彭公达从8月19日至30日，多次主持省委开会，统一对秋收暴动的认识。会上曾出现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等主张缩小全省暴动范围，只有彭公达1人主张全省暴动。经几次讨论，彭公达放弃了个人看法，坚决服从大多数的意见。最后通过缩小暴动区域的新方案，决定只在湘中暴动，中心是长沙，兼及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7县；暴动日期定在8月30日。

彭公达尽力协调各方面意见，使秋收暴动尽可能地符合湖南的具体实际。19日，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湖南秋收暴动办法》向中央的报告提出：一、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夺取整个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二、长沙暴动以工农为主力；三、夺取长沙时即建立革命委员会；四、另组织湘南指导委员会指挥湘南暴动。20日，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郑重地指出：国民党“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再打则必会再失败”；“只有共产党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因此，此次暴动，“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来号召人民起义。23日，中央在接到湖南新省委报告后，函复湖南省委，仍坚持举行全省暴动的意见，要求打国民党的旗帜，并提醒新省委应注意：一不要偏重于军力，搞军事冒险；二不要只注重长沙工作，

而忽略了其他地区的暴动。

彭公达于30日主持召开省委扩大会和省委常委会议，继续讨论暴动的区域、时间等问题。会上，传达中央函复和决议案，讨论结果，同中央意见存在较大分歧。会议决定，由彭公达到武汉向中央报告暴动计划，毛泽东到浏(阳)平(江)的农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和以易礼容为书记的行动委员会，是秋收暴动的两个指挥机关。

9月1日，彭公达动身去汉口向中共中央报告秋暴计划。5日回到长沙，立即召集省委常委会，并吸收各部负责人参加，讨论暴动日期问题。当日毛泽东和安源行委各来1封同样内容的信，约定11日安源发动，18日进攻长沙。彭公达考虑到："一个暴动的发展不能等待，而各处暴动时间太长，则敌人可以有机会准备，来消灭暴动的力量。"于是在常委会上提议，9日破坏铁路，10日各县暴动，13日长沙暴动。但讨论中多数人均不赞成他的意见，省委最后决定："九日开始破坏铁路，十一日各县暴动，十五日长沙暴动，此议决定之后，随即通告各地执行。"

毛泽东根据省委8月30日会议的决定，9月初，在安源张家湾召集军事会议，研究秋收起义的军事部署，将参加起义的革命武装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以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度为师长，下辖4个团，共约5 000余人。与此同时，彭公达在长沙城内召开有五六十人参加的秋收暴动动员会，亲自作动员，部署秋收起义，并鼓动大家勇敢起义，夺取胜利。9月8日晚，以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和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的名义下达了《夺回长沙，建立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命令》，命令16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

决定停止长沙暴动

按照省委计划，湖南秋收暴动从9月9日破坏长(沙)岳(阳)、长(沙)株(州)铁路开始，起义军分三路会攻长沙。在安源方面：10日第2团2 000余人在安源暴动，两次攻击萍乡县城不克，12日占醴陵，组织醴陵革命委员会，后因强敌围攻，退出醴陵，攻克浏阳，17日又从浏

阳突围，兵力损失三分之二以上。在平江方面：第1团11日攻平江长寿街时，因收编的邱国轩第4团突然叛变，第1团腹背受敌，损失惨重，死百余人，部队被迫撤出战斗。在浏阳方面：第3团14日反攻浏阳东门市，又遭失败。11日，长沙农民暴动也未成功。这样，三路进攻长沙的计划只好放弃，以长沙为起点的湖南秋收暴动，中途夭折。起义几经失利，部队减至1 000人左右。

鉴于作战失利，毛泽东当机立断，于14日晚召开第3团连以上干部会，分析敌强我弱的不利条件，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以前委名义通知各路军于19日到浏阳文家市会合，并致信中共湖南省委，要求停止长沙暴动。随后，毛泽东将湖南秋收暴动两个团的余部编为1个团，率部冲破敌军的围追堵截，撤离文家市，开始了向井冈山的战略进军。

为指导湖南秋收暴动，9月9日，中央特派员林育南由武汉到长沙。12日，彭公达向林育南汇报了湖南省暴动中农民及军事方面的力量及准备情况，表示有相当的把握，形势尚可乐观。后因各方面传来起义受挫的不利消息，省委委员易礼容、夏明翰又遭当局通缉，15日晚，彭公达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他和省委认为暴动条件不成熟，决定将原定16日晨长沙暴动的计划延期；省委对于平、浏、醴、株等地农军撤走亦采取放任的态度。应该说，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省委作出停止长沙暴动的决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此时，共产国际驻湖南代表马也尔不顾环境的恶劣，仍坚持举行暴动，指责彭公达“袖手旁观，一些战斗的意志都莫有”。彭公达与省委未予理睬，并批评马也尔“什么都不懂，书生，知识分子，客观条件不好，办不到，他却不知道。”马也尔恼怒指责，停止长沙暴动是“可耻的背叛”，是“临阵脱逃”，并提出派一负责中央委员指导此地的工作，实行改组省委。可是，当中央得悉马也尔的报告和省委议决停止长沙暴动的计划后，指出：“这样事实上等于取消整个的湖南暴动”，认为长沙暴动虽已失去了大好时机，但客观上仍有希望，因此要求省委“应一面命令萍、浏、平一带工农军进攻长沙，一面立即爆发长沙的暴动”。决定特派全权代表任弼时来长沙指导省委执行原定暴动计划。

中央全权代表任弼时从武汉赶赴长沙，于9月25日会见彭公

达，27日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准备鼓动全省第二次暴动，建立工农兵政权。任弼时经过深入调查，在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后，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认为“此时长沙的暴动必大遭失败”，并且说服马也尔，“长沙暂不举行暴动，铁路破坏亦暂停止”。同时，改组省委，彭公达仍任书记。

主动承担起义失败的责任

不久，彭公达再到武汉向中央汇报，他在10月8日《关于湖南秋暴经过的报告》中，总结了秋收暴动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省委停止长沙16日的暴动，不是绝大的错误，省委的根本错误在于：第一，“对于农民的力量没有充分准备，党根本没有注重农民运动，因此各地的暴动起来，纯是一个简单的军事行动。”第二，没有广泛的发动党员和广大农民群众。第三，“本可以全省起来，但是党的主观见解只重湘中数县，在湘中数县暴动，湘南、湘北少去注意。”《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必须以农民为中心”的湖南第二次暴动计划。彭公达作为暴动的主要领导者，勇于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起暴动失败的责任，他在《报告》中说：“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并且认为，“将湖南工作的错误赤裸裸的公开，引起党内及党员群众严格的批评，纠正其错误，这倒是于革命的党的前途一件很有益的事。”

然而，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以彭公达“贯彻指示不力”为由，10月24日，免去其湖南省委书记职务，改任湘西特委书记。11月上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指责湖南省委和彭公达在指导湖南秋收暴动中“完全违背中央策略”，是“军事投机的错误”，因此撤销了彭公达和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职务，并给彭公达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

51. 谢子长与清涧起义

谢子长(1897—1935) 陕西安定(今子长)人。1925年在北京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安定县民团团总。在陕北军阀井岳秀所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中共特别支部,任支部委员。后协助党组织建立了安定县特别支部及县农民协会、学生联合会,领导全县人民参加革命运动。1927年10月,任西北革命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与唐澍、魏野畴等发动清涧起义,后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副指挥。1928年5月,参与领导了渭华起义,后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委员兼第三大队队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任西北反帝同盟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等职。1933年任中共北方代表派驻西北军事特派员。1934年兼任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红二十六军42师政委等职,领导陕北游击战争。1935年2月病逝。

潜入军阀部队秘密活动

谢子长1925年在北京加入共产党后,受中共北方区委派遣回到陕北,潜入到军阀井岳秀所部石谦团秘密活动,组织领导安定地区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是时,绥德党组织利用共产党员李象九与团长石谦的同乡关系,打入石谦部队。于是,谢子长帮助李象九招收了一批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入伍,组成"学兵连",李象九任连长。不久,谢子长所带的民团也编入石谦部第12连,谢任连长。绥德党组织还派许多干部到石谦部,担任班长、排长,从事教育和训练工作。谢子长在石谦团中秘密建立了中共特别支部,连队很快建立了士兵自治会,举办俱乐部等。谢子长趁机向石谦宣讲革命道理,并把许多进步书刊发给官兵们阅读。

石谦团于1927年初改为旅，石任旅长，李象九升任营长。在李象九、谢子长的影响下，石谦旅大多数官兵倾向革命，石谦本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转变，逐渐接受中共的建议，通过在宜川县集义镇进行军事和政治集训，使这支旧军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其间，石谦旅中的共产党组织，由特支改为直属陕甘区委领导的军队支部，谢子长为军支委员之一。谢子长在安定驻防时，建立了党的区委，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公审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直接领导了当地的农民运动。由此，谢子长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之为“谢青天”。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右派开始在全国进行“清党”运动。陕西和全国一样，处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中，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农会、工会和学生会等革命团体被解散，8月下旬，井岳秀将中共的秘密活动据点省立延安第四中学和绥德第四师范封闭，并将同情革命的旅长石谦诱杀，又以调李象九“换防”宜川为名，企图瓦解和消灭这支革命武装力量。

酝酿发动武装起义

为加强对武装起义的领导，中共陕西省委派刚由中央调省委军委工作的唐澍和在西安工作的白乐亭去清涧，向石谦旅中的党组织传达了八七会议决议和省委决定，并着手健全党的组织，抓紧部队训练，积极准备武装起义。是时，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召开党的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并将会议情况向省委汇报。省委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指示部队“立即举行起义”。

为执行八七会议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方针，9月26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实行策略上的转变。会议通过《军事运动决议案》，指出：“我们的军事根据地，除去东南以西北为重要，所以在西北上培植革命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省委指示：绥德党组织发动陕北军阀井岳秀部中党所掌握的李象九营举行武装起义。为贯彻省委的指示，以谢子长营为基础，成立了起义的领导机关——陕北军事委员会，唐澍任书记兼

中共军支书记，谢子长、李象九等为委员，拟定了起义计划。

陕北军委成立后，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召开党员大会和排长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传达了省委关于起义的指示。会议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决定在驻清涧的4个连首先发起暴动，然后会合延川县的另1个连，南下宜川，与宜川其他3个连会师。

10月12日晚，在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的领导下，李象九营举行武装起义，以“为石谦旅长报仇”为动员口号，冲进公安局，收缴警察的武器，捣毁国民党县政府，没收财产，一举占领了清涧县城。翌日晨，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撤离清涧，南下攻克延川，与共产党员王有才的1个连会合后，又连夜赶到延长，收缴了敌两个连的枪械，打死反动营长。19日，起义部队与驻宜川的共产党员李瑞成的1个连配合，里应外合占领了宜川城。这样，3支起义部队在宜川胜利会师。此时，石谦旅的其他连队也参加了起义，起义部队共计1 700余人，3 000余支枪。

西北地区的第一面红旗

清涧起义是中共领导的西北地区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起义爆发后，井岳秀极为恐慌，立即调遣军队围攻起义部队。起义部队处于孤立无援，内部对起义后的行动方针又有较大的分歧。鉴于此，唐澍、谢子长等主张立即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整顿部队，主动出击，消灭敌人，扩大革命力量；李象九则反对上述正确的意见，主张仍沿用11旅的旧番号，必要时接受军阀的收编。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唐澍便去西安向省委请示。唐走后，李象九自作主张，打出11旅番号，亲任旅长，让唐澍任参谋长，谢子长任营长。在敌军围攻之前，谢子长提出，由于陕北交通不便，敌人不可能同时到达，起义部队应主动出击，集中力量，各个击破敌人。可是，李象九不接受谢子长的正确主张，按兵不动，致使起义部队遭受重大损失，于10月24日夜被迫撤出宜川。当起义部队转移到韩城西庄时，李象九脱离了革命队伍，只剩下谢子长营约三四百人。

是时，正在西安的唐澍及省委尚不知宜川失利的消息，省委在听

取唐澍的汇报后，作出了《陕北军事行动与决议案》，指示部队成立党团委员会，唐澍任书记，谢子长、李象九为委员，统一指挥军事行动。为了支援起义部队，省委还决定派许权中（共产党员）旅北上，与起义部队会合，在宜川、延长一带建立陕北军事根据地。而这一切，已经是无的放矢了。

后来，唐澍、谢子长为了准备发动第二次起义，重组军委，并于12月30日，将起义部队谢子长营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约100余人，成立了指挥部，由唐澍、谢子长分任正副总指挥。1928年1月1日，唐澍、谢子长等率部北上，向清涧、安定一带进发，途中又贸然决定攻打宜川，结果部队再次受到很大损失，于1月底到达陕甘边界的豹子川。几经作战，部队只剩下10余人，清涧起义最后失败了。2月，唐澍、谢子长回到省委，汇报了起义失败的经过和经验教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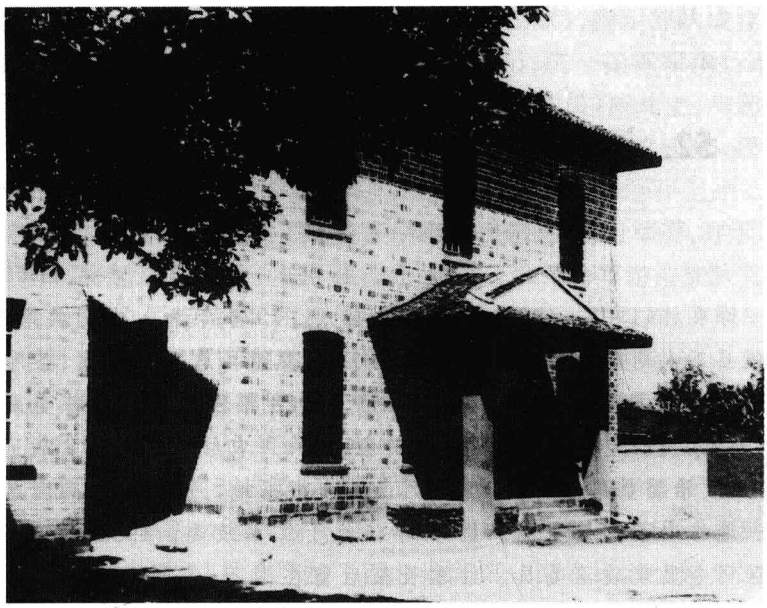
清涧起义虽因敌强我弱及起义领导者缺乏经验等原因而遭到失败，但它的意义重大，从此竖起了西北地区第一面农民武装起义的红旗，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序幕。

52. 谭震林与湘赣边第一个红色政权

谭震林(1902—1983)　湖南攸县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攸县工人纠察队队长。1927年先后任茶陵县总工会主席、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茶陵县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湘赣特委副书记、书记。1929年任职工运动委员会主任、工农红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等职，为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1931年任红十二军政委。1932年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长征后留在闽西，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军事部长，参与领导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第3支队副司令员、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四军第6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苏南区党委书记、中共淮南区委书记等职。是第七届中央委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共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兵团政委、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委兼第七兵团政委、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局第三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等职。是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共第八、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

茶陵县总工会主席

茶陵位于湖南、江西两省的边陲，崇山峻岭，素为兵家必争之地。该区域远离大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大革命时期，茶陵的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成立了中共县党支部，建立了县农协、



江西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旧址

工会、学联、妇联，以及农民自卫军，有比较好的群众基础。但经过“马日事变”的劫难，使这里的一切革命成果都毁于一旦。是时，正在湖南北乡一带进行第二次北伐宣传工作的谭震林，听到这些噩耗，即刻返回家乡湖南省攸县。是时，县城已被敌人占领，与上级领导无法联系，只好将宣传队解散，只身跑到长沙、武汉，仍未与党组织接上关系，于是不得不再回到攸县。因敌人搜索严密，无法立足，转至茶陵，谭震林便在一家书店当装订工，白天做工，晚上隐蔽进行革命活动。

1927 年 10 月，由于湘军唐生智与桂军李宗仁忙于军阀战争，湘赣边界各县的军队大部调离，造成茶陵一带的敌人力量空虚，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利用这一时机，令工农革命军第 1 师 1 团 1 营营长黄子吉、党代表宛希先，率 2 个连攻打茶陵县城。工农革命军在击溃地主武装保安队、挨户团后，一举攻克了茶陵县城，杀了县长，释放了被关进监狱的无辜平民百姓。当天，工农革命军按原计划撤离茶陵县城。

接着，又发生了粤桂军阀战争，前委决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再次攻打茶陵。11 月 18 日，第 1 团团长陈浩和第 1 营党代表宛希先率 1 营和特务连，第二次攻占茶陵县城。谭震林当时目睹工农队伍的到

来，心情激动异常，即刻找宛希先接头，宛对谭说："你是工人嘛，先把工会搞起来！"谭震林按照宛希先的吩咐，团结了一批工运骨干，很快筹备成立了茶陵县总工会，公推谭震林为总工会主席。在茶陵县总工会的指导和带领下，相继成立了店员工会、学徒工会、缝纫工会、铁业工会、磨（豆腐）工会等。此外，谭震林还与茶陵县委密切配合，着手恢复党的组织和组建农民协会。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

打下茶陵后，成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谭梓生任县长。但团长陈浩未能按照前委的指示，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而是仍袭用旧政府的一套办法，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因而新政权未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真正拥护。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从宛希先的汇报中得知这一情况后，回信指示：新的政权不能按国民党那一套搞。要成立工农兵政府，发动群众开展斗争。要求立即撤销县人民委员会，建立真正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农兵政府。在宛希先的参与主持下，组织了工会、农会、赤卫队等，经过充分协商，由工人、农民和士兵各选出了自己的代表，工人代表谭震林，农民代表李炳荣，士兵代表陈伯钧。当讨论政府人选时，大家互相谦让，宛希先对谭震林说："不要推了，我看你既然是工人代表，你就来当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吧！"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这样，谭震林担任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首任主席。

11月28日，茶陵县工农兵政府召开成立庆祝大会，谭震林在大会上讲了话。这一天，茶陵县红旗招展，欢声雷动。"茶陵县工农兵政府"的牌子取代了"县长公署"的漆匾，两旁写着红色对联："工农兵政府"；"苏维埃精神"。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县政府的民政、财经、内务、青工、妇女等部门的负责人。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颁布了《布告》，号召全县人民恢复农会、工会，举行暴动，打倒土豪劣绅。谭震林等决定立即组成工作队下乡，宣传和动员群众，各地迅速掀起加入农会、打土豪分田地的热潮。在此基础上，全县范围内建立了8个区政权。是时，毛泽东指示宛希先送给茶陵县工农兵政府5支枪，帮助建立茶陵地方武装。之

后，谭震林等立即组建一支约30支枪的纠察队，以及乡村赤卫队。敌人对新生的工农兵政府恨之入骨，地主豪绅纠集300余人枪进攻茶陵县城，千方百计想消灭这个红色政权。谭震林立即组织工人纠察队、赤卫大队，紧密配合工农革命军打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

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也是当时全国最早成立的红色政权之一。它的建立为如何实行革命武装和建立工农兵革命政权，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为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跟随毛泽东上井冈山

1927年12月湘桂军阀混战结束后，湘敌第八军吴尚部向茶陵大肆反扑。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谭震林除调茶陵游击队配合工农革命军作战外，还组织工人纠察队和赤卫队积极掩护工农革命军顺利撤出茶陵。谭震林率领茶陵工人纠察队、赤卫队共200余人参加了工农革命军，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1团2营。在部队撤退途中，陈浩对革命发生动摇，将部队拉向酃县湖口，企图投降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在千钧一发之际，毛泽东闻讯后从茶陵赶到湖口，命令部队撤回井冈山，谭震林也率部跟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随后，前敌委员会在砻市召开会议，严惩了陈浩等人。毛泽东发现上井冈山的队伍中没有茶陵县的干部，于是指派谭震林负责茶陵县的工作。一次，毛泽东在对部队讲话中说："茶陵这一仗打得很勇敢，打得很好。可是在茶陵那么久，没有做群众工作，没有筹款，这个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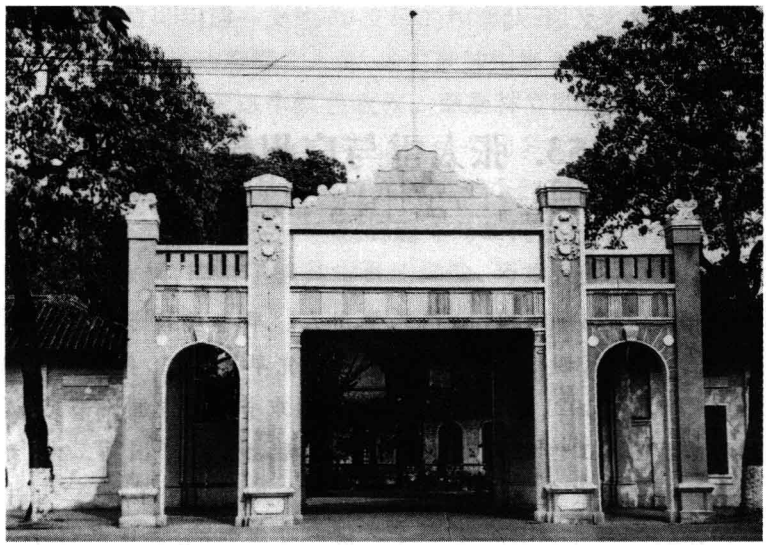
1928年一二月间，遂川、宁冈两县相继建立了红色政权。在此基础上，5月，毛泽东在宁冈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谭震林出席了会议，并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常委，负责新成立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的土地部工作。9月，湘赣边界特委代理书记杨克明生病，无法工作，由谭震林代理书记。10月，谭震林在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井冈山根据地重新组织井冈山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谭震林是5位委员之一，任工农工作委员会主任。

53. 张太雷与广州起义

张太雷(1898—1927) 江苏常州人。早年就读于天津北洋大学,积极投身于五四运动,参加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并筹组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春,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是最早参加共产国际工作的中共党员之一,先后出席共产国际三大、赤色职工国际成立大会和青年共产国际二大。是青年团第一、二届中央委员。1925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后调往广州任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历任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主编《人民周刊》,中共湖北区委书记。是中共第四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八七会议后,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临时南方局书记。参与领导广州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被选为广州苏维埃政府人民海陆军委员、代理主席。起义后遭反动派枪杀,不幸牺牲。主要著作收入《张太雷文集》。

草拟广州暴动计划

八七会议后不久,1927年8月11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张国焘、周恩来、张太雷等7人组成中共南方局,并指定张太雷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日,张太雷到达香港,次日召开广东省委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和拟定各地的武装暴动计划。中共中央接到张太雷的报告后,9月9日致信广东省委,表示大致同意广东的暴动计划,后又指示:广东各地农军应"以围攻广州为主要目标"。"广州城内,即须准备暴动"。广东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连续发出《暴动后各县工作大纲》、《目前应注意之十件事》、《暴动前应注意之点》等通告、文件,派出干部到各地发动群众,积极准备武装起义,以



广州起义总指挥部和苏维埃政府旧址:广州市公安局

配合南昌起义部队的行动。

9月中下旬,张太雷秘密从香港赶到汕头,遂与南昌起义部队会合,向起义部队领导人传达了八七会议决议和成立南方局的决定,与会者推举张太雷为中共南方局书记。由于南昌起义部队10月初在潮汕地区失败,10月12日,中央决定暂时停止广州暴动计划。此时,已回到香港的张太雷,22日又到上海向临时中央报告广东工作计划。23日,中央决定取消南方局,并提出由张太雷代表广东省委出席11月8日在上海召集的紧急会议。

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广州暴动立刻造成一个全省暴动的局面,来完成并保障广州的胜利"。11月17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讨论通过由张太雷等草拟的《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正式决定举行广州暴动,并提出了宣传教育、组织、工运、农运和军队等方面的具体任务。后方事务由新加入中共的秘密党员、第四军参谋长兼教导团团长叶剑英代行管理。

广东局势自大革命失败以来,一直动荡不安。粤系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到达广州后,与桂系军阀争权夺地,11月中旬,爆发了粤桂战争,广州城内敌人兵力空虚,共约5 000人,客观上为举行广州起义

提供了最好时机。于是中共中央和广东省委一致认为，应立即暴动，准备夺取广州政权，指出："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广东省委应全体动员进行这个运动"。然而，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对张发奎仍抱有幻想，认为"暴动是不应该的"，主张同张发奎进行谈判。

为贯彻中央指示和便于发动起义，广东省委机关于11月下旬由香港迁回广州，积极发动群众，紧张地准备暴动的各项技术工作。

起义总指挥

11月26日，张太雷离开上海返回广州。当晚，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广州暴动问题，共产国际代表纽曼参加。会议"决定立即暴动"，并制定了准备起义的详细计划，包括：准备总同盟罢工；组织工人赤卫队；加紧张发奎军队内部的工作；发动市郊农民暴动；海陆丰农民运动即向广州方面移动等。会上，由张太雷、黄平、周文雍3人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发动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张太雷任总指挥，并分工领导省委兼管军事。28日，中共广东省委发表了《号召暴动宣言》，公开号召工人、农民、士兵举行暴动，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广州苏维埃政权。在张太雷的领导下，广东省委还及时出版了《红旗》、《广州工人》，并印发大量传单，积极鼓动广大群众参加起义。

中共当时在广州掌握的武装力量有：由中共广州市委工委书记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约3 000人；由叶剑英兼任团长的第四军教导团约1 300余人；第四军警卫团200余人。第四军教导团担任起义的主力。12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广州暴动计划并作了具体指示，强调"应注意广州市及四郊工农群众之发动"。翌日，张太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讨论了起义的政纲、宣言、告民众书和起义的部署及苏维埃政府各部门的人选。会议决定12月12日举行起义。党提出的口号是："工农兵联合起来要饭吃，要衣穿，要太平"；"一切政权归工农兵政府"；"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土地归农民、士兵"等。

为了做好起义后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事宜，12月7日，张太雷秘密

召开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他在会上作动员，宣读了起义政纲、口号，逐条解释并通过，最后选举通过了广州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执行委员名单。是时，在上海的汪精卫得知共产党准备起义的密报后，即令张发奎迅速解除教导团的武装，镇压工人赤卫队，搜查各工会。鉴于局势突变，张太雷当机立断，于10日召开革命军事委员会紧急会议，他建议先行动手，把起义日期提前在11日凌晨举行。会议决定工人和士兵同时发动，以“暴动——夺取政权”为口令，并对起义各种力量作了周密的分工部署。张太雷激动地说：“夺取政权的时候到了！要勇敢战斗，完成我们党交给的任务！”这时，叶挺由香港秘密潜入广州，主持发动武装起义的军事行动。

为了确保起义计划的顺利进行，张太雷派张善鸣、阮啸仙、周其鉴等分赴省内各地组织农民武装，准备配合起义。在起义前夕，张太雷召集了一系列秘密会议，为准备起义进行紧张部署。他不顾个人安危，废寝忘食，日夜奔忙于大街小巷，每晚都要亲自给官兵作报告，组织群众和宣传群众。12月10日深夜，张太雷和叶挺、徐光英等到教导团驻地北较场四标营，召集全团誓师大会，作起义的最后部署。叶挺在会上宣布了起义的战斗部署和教导团各营的战斗任务，以及各级指挥员名单。张太雷向千余名官兵发表动员讲话，号召大家“为成立广州苏维埃政府而斗争”。

红旗在广州上空飘扬

11日凌晨3时半，教导团打响了广州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发动后，张太雷亲自领导军事行动，叶挺任总指挥，叶剑英任副总指挥，周文雍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等参与起义的军事指挥并起重要作用。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工人共约2万人。起义部队迅速占领了黄沙、广三、广九3个车站，以及公安局、省政府、国民党党部、军事厅、财政厅和第四军军部、广州卫戍司令部、观音山制高点等一切重要机关和军事要隘，解除了反动军警的武装，释放了监狱中全部政治犯2 000人。经过两小时的战斗，除长堤外，占领了珠江北岸大部分地区。起义的总指挥部设在原市公安局，红旗

在屋顶飘扬，张太雷亲手书写的“广州苏维埃政府”的红布横额，高悬在大门口。

当日晨6时，张太雷主持召开政府成员和执委会第一次会议，庄严宣布广州苏维埃政府的成立。会议通过了政府成员16人名单，苏兆征任政府主席，张太雷任人民海陆军委员，叶挺任工农红军总司令。尚在海丰的苏兆征未到，由张太雷代理苏维埃政府主席。当日发表了《广东省委告工人农民》、《广州苏维埃宣言》、《广州苏维埃政府告民众》等文件，颁布了苏维埃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纲。主要政策有：一切工人增加工资，监督生产，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民、士兵，以及失业人民，自由耕种；改良士兵生活；没收官僚地主的房屋财产，救济贫民；取消劳动者的一切捐税、债务和息金；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等。当天出版的《红旗报》在市内主要街巷张贴。

接着，张太雷于12日晨在西瓜园广场主持召开了广东工农兵拥护苏维埃政府大会，有数百人参加。会场上贴着“打倒帝国主义！”“工农兵起来拥护苏维埃政府！”等标语。张太雷以宏亮声音庄严宣布：“同志们！广州苏维埃政府成立了！”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起义胜利后，广州市区革命气氛热烈，红旗到处飘扬，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工人和劳苦大众无不拍手称快，沉浸在胜利的欢快之中。

倒在苏维埃政权火花中

然而，正当人们沉浸在胜利喜悦之中时，敌人卷土重来。12日午间，军阀部队向观音山猛烈反扑，迫近指挥总部。张太雷出席西瓜园大会完毕，午后乘车返回指挥总部，接着又驱车至大北门去指挥战斗，遭敌人伏击，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9岁。起义顿时失去了领导核心，起义军英勇顽强进行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遂撤出广州，向海陆丰退却。13日午后，广州市区完全被敌军占领。这次起义牺牲的工农群众共约2 200余人。

广州起义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是党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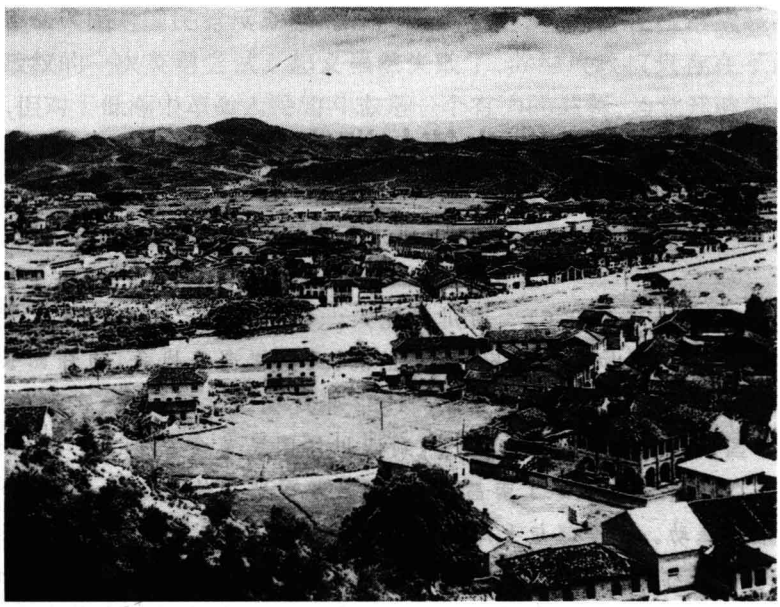
导革命人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一次英勇反击，也是党在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一次英勇尝试。起义虽然失败了，苏维埃政权只存在了两天，但对于低潮中革命人民的斗志是一个有力的鼓舞，为党开辟新的革命道路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所以，广州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一起，被称之为党领导的著名“三大起义”，毛泽东后来说：“这个时期是我们党彻底地认识军队的重要性的极端紧要的时期。”

54. 朱德与湘南起义

朱德(1886—1976)　四川仪陇人。早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加入同盟会，参加反清政府、反袁世凯、反段祺瑞等战争，历任团长、旅长、宪兵司令、警察厅长等职。1922年赴德国学习军事，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国后，到四川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党代表。1927年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任第九军副军长。1928年发动领导湘南暴动。后率部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任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1930年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4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长征途中，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促成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总指挥，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立了丰功伟绩。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二、三、四届全国人大委员长。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第九、十届政治局委员。其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朱德军事文选》。

保存南昌起义的火种

1927年9月，南昌起义军南下进入广东后，前委决定兵分两路：一部由叶挺、贺龙率主力直奔潮州、汕头；另一部由朱德率领第十一军25师留守梅县三河坝。当叶贺主力与敌军在汤坑遭遇时，在三河坝的朱德右翼支队与敌激战3昼夜，虽击溃敌人，但部队伤亡过半，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地点：江西宁冈县砻市

全师只剩2 000余人。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10月6日，朱德和陈毅指挥部队撤出战斗，并将突围出来的部队收拢起来，决定向湘粤赣边转移。朱德在处境极为艰难的情况下，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决心，他认为："八一"起义这面旗帜绝对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

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从粤北饶平，经闽西武平，进入赣南山区。时已入冬，战士们仍穿着破烂单衣、短裤，部队思想混乱，情绪低落，失败主义情绪在军中蔓延，有些人甚至中途开小差逃跑，情况越来越严重。为了克服眼前困难，10月下旬，部队在安远县天心圩进行整顿，朱德在军人大会上说：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他把1927年的中国革命比作1905年的俄国革命，指出："俄国在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还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

勉强。”朱德的这番讲话，增强了指战员的革命信念。粟裕回忆说：“我们的朱德军长，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始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气魄，尽力教育部队和掌握部队。”

朱德当时的最大心愿，是率领余部去湖南找一个可以隐蔽的立足地，开展游击战争。10 月底，部队经信丰进入赣粤边境的大庾（今大余）地区，打垮了地主民团，没收了富人的大米和钱财，这时只剩下八九百人。为了缩小目标，暂时取用“国民革命军第五纵队”番号，朱德任司令员，化名“王楷”，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11 月初，经过艰苦转战，部队到达有较好群众基础的赣南崇义县上堡山区，暂时稳住了脚，经过整顿、训练和群众工作，战斗力有了提高。

此时，驻守湘南汝城的是范石生第十六军。范与朱德是云南陆军讲武堂时的同学，一起参加过辛亥革命。南昌起义前，范石生同中共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当起义军进至上堡后，范派韦伯萃（共产党员）与朱德联系，希望合作。于是朱德、陈毅利用范的关系，与其建立统一战线，以得到物资补充。11 月下旬，朱德亲赴湘南汝城谈判，在坚持部队完全自主的前提下，与范签订了协议。为了便于隐蔽，部队用“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第 47 师第 140 团”作伪装，朱德仍化名“王楷”，任第十六军参议、第 47 师副师长兼 140 团团长。按照协议，起义军开到汝城，得到了休整的机会，并获得一批现款和枪弹、被服、医药等物资补充。同时，张子清、伍中豪率领湘赣边界起义部队第 1 师 1 团 3 营和汝城农民武装，也编入第十六军。党在该军秘密建立了军委，陈毅担任书记。

点燃湘南革命烈火

南昌起义部队的到来，将湘南地区的革命之火迅速燃烧起来。11 月 26 日，朱德在汝城召开的湘南、粤北党组织负责人联席会议上，决定于 12 月中旬举行湘南暴动。不久，湘南特委也制定了《湘南暴动计划》，对暴动前的准备及暴动后的任务，都作了周密的部署。

朱德率部从汝城南下经资兴，12 月 10 日到广东仁化后，接北江

特委转达中央的通知，要起义军立即南下支援广州起义。当部队行至韶关时，始知起义失败，便转移到韶关西北的犁铺头休整、练兵，到农村宣传和发动群众。随后，湖南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派杨福涛到湘南实施暴动计划，建立工农割据。

1928年初，张发奎发觉朱德所领导的起义军隐藏在范石生部，下令立即解决140团，逮捕朱德。可是范石生不忘旧谊，事先通知朱德撤离，于是朱德、陈毅率部迅速脱离第十六军北上，星夜冒雨兼程，重返宜章地区。起义军北上宜章途中，朱德结识了当地有名的富家子弟胡少海，胡在兄弟中排行第五，称作“五少爷”。朱德决定利用胡的特殊身份，拟定了智取宜章的计划，把部队伪装成国民革命军第140团，胡佯称是“副团长”，于1928年1月11日率先头部队进宜章城，官吏劣绅们听说胡家“五少爷”带队伍回来了，都出城来迎接。朱德、陈毅随即率领大队人马大摇大摆开进城内。第二天，宜章县长设宴为“五少爷”洗尘。席间，朱德当场宣布：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并将赴宴的20几名官绅全部扣押。接着，砸开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打开地主的仓库，将粮食、财物分发给劳苦大众。参加起义的共6个团1万余人，除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军2 000余人外，其余8 000人都是湘南农民武装，其中新组建的宜章农军2 000余人。巧取宜章的胜利，揭开了湘南暴动（亦称年关暴动）的序幕。起义军第一次举起了印有锤子、镰刀和红星的红旗，改称“工农革命军第1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

宜章暴动震撼了粤北湘南山区，“马日事变”的刽子手许克祥率6个团，由坪石扑向宜章。朱德、陈毅在广大群众支援下，决定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指挥起义军和宜章农军，主动撤出宜章县城，隐蔽集结在附近山区，伺机把6个团逐个歼灭，重占宜章县城，许克祥狼狈逃往广东韶关。此役共俘敌1 000余人，缴获步枪近2 000支，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

坪石大捷后，年关暴动向湘南纵深蔓延，朱德、陈毅决定抓住大好时机，以使工农革命武装有很大的发展。朱、陈率领工农革命军第1师，北上郴州，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7师。宜章农军改称工农革命军第3师，胡少海任师长，龚楚任党代表，留守宜章。2月6日，诞生了湘南第一个工农苏维埃——宜章县苏维埃政府。16日，直取耒阳

城，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4师。此外，永兴、资兴县相继组建了赤色警卫团、独立团；成立郴县、耒阳、永兴、资兴4县苏维埃政府，打土豪，分田地。为了便于统一领导，3月中旬，在永兴县太平寺召开了湘南工农兵代表大会，选出朱德、陈毅等21名执行委员，成立了湘南工农兵苏维埃政府。

同毛泽东会师井冈山

早些时候，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湘赣边秋收起义部队1个营在大汾遭敌袭击，与毛泽东失掉联系，转移到桂东地区。朱德派人前去联络，得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已经上了井冈山。毛泽东也一直关心南昌起义军的消息，上井冈山不久，便派何长工去找湖南省委及湘南特委联系，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下落。12月下旬，何长工在犁铺头会见了朱德、陈毅，向他们报告了井冈山的情况。随后，朱德派原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军工作的毛泽东的胞弟毛泽覃前去井冈山联系，并委张子清、伍中豪率领的部队先去井冈山。朱德同时希望何长工赶快回井冈山，和毛泽东取得联系。

是时，朱德接到中共中央1927年12月21日和27日两次给他的指示信，得知潮汕失守后，中共中央令湖南省委派人设法与朱德联系，均未奏效。指示信要求：根据八七会议的新政策，以工农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迅速与湘赣边界的毛泽东部队取得联系。“共同计划——发动群众以这些武力造成割据的暴动局面，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如果无法联络，则在湘南与当地党组织“计议发动群众采取适当机会举行暴动”。

在湘南暴动后期，由于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推行“左”倾盲动错误，执行烧杀政策，加上少数反革命分子的煽动，结果脱离了群众，孤立了自己，严重削弱了苏维埃政权的群众基础。1928年3月，湘桂军阀混战结束，湘粤两省敌人集中“会剿”湘南，对工农革命军形成南北夹击之威胁。在险恶的情势下，朱德、陈毅不得不率部退出湘南，向井冈山转移。毛泽东根据湘南特委指示，以师长身份率31团向湘南进发，支援湘南起义。3月上旬，进入桂东、汝城之间，掩护朱德、陈毅

向东转移；同时派毛泽覃到耒阳与朱德联系。4 月，朱德与毛泽东终于在酃县十都会面。

4 月 28 日，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及湘南农军共 1 万余人，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5 月 4 日，在砻市召开庆祝胜利会师大会，朱德在会上讲话指出：我们党领导的两支革命武装的会合，意味着中国革命的新的起点。他希望两支部队会合后加强团结，并向群众保证，红军一定保卫红色根据地，保护群众利益。大会庄严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教导大队大队长，王尔琢任参谋长。部队编为 3 个师，朱德兼任第 10 师师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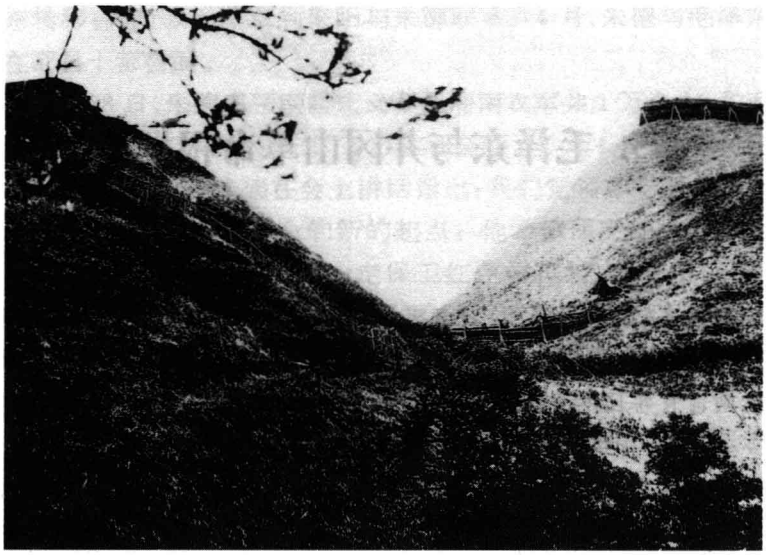
湘南起义历时 3 个月，参加起义的人数达百万之众，暴动波及湘粤两个省的 20 多县，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仁 6 个县的苏维埃政府。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不仅保存了南昌起义的革命火种，而且壮大了工农革命武装力量，为中国工农红军的诞生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55. 毛泽东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1893—1976) 湖南湘潭人。早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与蔡和森等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主编《湘江评论》。1920年筹建湖南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1921年出席党的一大,后任中共湘区委书记,是中共第三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候补中央委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等职。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发动湘赣边秋收起义,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历任红四军党代表、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等职。在遵义会议上确立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6年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时期,提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在延安领导全党开展整风运动。1943年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确定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领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革命和建设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主要著作收入《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

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起义部队1 500余人于9月19日到达湖南浏阳文家市会合。毛泽东以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



井冈山黄洋界哨口。在这里，取得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

份，在里仁学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他主张放弃攻打长沙，退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农村。与会多数人赞同这一主张。会议决定部队沿湘赣边界向湘南转移。21 日，毛泽东等率领工农革命军从文家市出发，取道平江、浏阳、萍乡，沿罗霄山山脉向南退却，开始新的战略转移。23 日，工农革命军在萍乡芦溪镇遭敌伏击，剩下不足千人，总指挥卢德铭英勇牺牲，部队中弥漫着消沉情绪。

25 日，起义部队转战到永新县三湾村，毛泽东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决定将部队缩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师第 1 团（实际只有两个营）；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班有小组，连有支部，营团有党委，连以上各级设置党代表；实行民主制度，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史称“三湾改编”，成为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开端。

工农革命军于 10 月 3 日离开三湾进驻宁冈县古城，毛泽东在文昌宫主持召开有 60 余人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总结了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会议进一步了解到井冈山地区的情况，确定在这一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宁冈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同时确立对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当地农民

武装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以及在茅坪设立红军医院和留守处。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山脉中段，与广东、湖北、江西、湖南接壤，有利于军事割据。这里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良好条件：一、远离大城市，敌人的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二、邻近各县物产丰富，盛产稻米、玉米、番薯、茶、油、木材等；三、地势险峻，峭壁耸立，森林遮天，山上有五大哨口，易守难攻；四、受大革命影响较深，有较好的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五、有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武装可以团结、利用。

改造袁文才、王佐的地方武装

毛泽东在三湾时，曾写信给袁文才，希望能得到支持，袁文才、王佐两人都表示欢迎毛泽东上山。10 月 6 日，毛泽东到宁冈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说服袁同意工农革命军的计划，鼓励袁做好王佐的工作，还答应送给袁部 100 支枪，帮助练兵。袁也以 700 块大洋资助工农革命军，帮助筹建后方医院和留守处。随后，毛泽东经过详细调查，坚定了在罗霄山山脉中段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心，并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等，到袁文才部当连长、排长和教官，又在宁冈步云山对袁部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10 月下旬，工农革命军在遂川大汾遭反动地主武装的袭击，毛泽东率部退至黄坳、荆竹山，与王佐部队取得了联系，送给王部 70 支枪；王佐也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钱财和物资。1928 年 1 月，毛泽东派何长工到王部任党代表。同时，毛还多次找袁、王交谈，经过耐心教育帮助，使其两支地方武装获得了新生，2 月上旬，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 1 军 1 师 2 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 1 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 2 营营长，徐彦刚任参谋长，何长工任党代表。改造袁、王部队，是党改造旧军队的一次成功范例。

毛泽东在改造袁、王部队的同时，十分注意人民军队的建设。1927 年 10 月下旬，部队到达荆竹山时，毛泽东向官兵们宣布了人民军队的“三项纪律”：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打土豪要归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个红薯。12 月下旬，部队在宁冈休整期间，毛泽东总结打茶陵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工农革命军应担负的“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

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1928 年 1 月下旬，毛泽东在遂川李家坪又向部队宣布了“六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不拉伕，请来伕子要给钱；六、不打人、不骂人。到 4 月，毛泽东把部队集中在湖南桂东沙田，正式颁布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建军原则的提出，对于人民军队的建设，正确处理军队内部关系，巩固军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都起了重大的作用。以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解放军战无不胜的泉源。

建立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1927 年 11 月至 1928 年 1 月，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先后在茶陵、遂川、宁冈 3 个县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在茶陵、遂川、宁冈、永新 4 个县建立了县委，以及酃县特别区委和莲花特别支部。1928 年 2 月间，在茨坪正式成立了袁文才任主席的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湘赣边界和各县党组织及工农兵政府的建立，初步形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局面，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军数千人，于 1928 年 4 月下旬到达宁冈砻市。前不久，毛泽东率领前去支援湘南暴动的部队，也回到了砻市。5 月 4 日，这两支部队在宁冈召开了庆祝胜利会师大会，有万余人参加。大会宣布正式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教导大队长兼士兵委员会主任(1929 年 6 月改任政治部主任)。朱毛会师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对井冈山根据地乃至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朱德、毛泽东的率领下，工农革命军先后取得了五斗江、草市坳等战斗的胜利。为了统一边界党的领导，5 月下旬，毛泽东在宁冈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有 60 余人。大会决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并选举特委委员 23 人，毛泽东任书记。

这时，国民党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根据地进行“会剿”。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的领导下，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6 月 23 日取得了

龙源口战斗的胜利，第三次占领永新城，粉碎了敌军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在此基础上，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十六字诀”，开始形成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毛泽东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推动了边区的经济和文化蓬勃发展。

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边界共产党员达到1万余人，红色政权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个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以及遂川北部，酃县南部的广大地域。

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

1928年7月初，湘赣两省敌军向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正当朱德、毛泽东分别率部阻击时，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硬要将部队拉往湘南冒进，致使红28团、29团失利，边界和湘南都遭到很大损失。井冈山地区除大小五井和九陇山外，大部分被敌人占领。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执行盲动错误，造成红四军在湘南和湘赣边界两地的失败，史称“八月失败”。

湘敌乘红四军主力尚未返回之际，8月下旬，以3个团的兵力进犯黄洋界。黄洋界山高路险，悬崖陡壁，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留守井冈山的红31团1营迅速从茅坪撤守井冈山，决心坚守黄洋界哨口，击退了敌军4次进攻，取得了黄洋界保卫战的辉煌胜利，粉碎了敌军的第二次“会剿”，极大鼓舞了边界军民的斗志。

在井冈山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的基础上，10月4日，毛泽东在宁冈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00余人。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草拟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明确指出了红色政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初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思想。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9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谭震林任特委书记。11月6日，根据中央来信的指示，井冈山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朱德、谭震林等5人组成，毛泽东任书记。特委和军委统辖于前委，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前委，写了向中央的汇报《井冈山的斗争》，系统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教训，进一步阐述了

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为了深入进行土地革命，1928 年 2 月和 5 月，毛泽东深入群众，开展社会调查，分别写出《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在此基础上，于 12 月主持制定了党的第一部土地革命的法令——《井冈山土地法》，基本解决了土地、山林的没收和分配，土地税的征收和使用等问题，对土地革命斗争起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五军主力 7 000 余人，经过 3 个月的艰苦转战，1928 年 12 月，在井冈山地区与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会合。在宁冈举行的两军联席会议上，决定将红五军暂编为红四军第 30 团。

红五军与红四军会师后，大大增强了边界的武装力量，促进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发展。此时，蒋介石调集湘赣粤 3 省 21 个团的兵力向井冈山进行大规模的“会剿”，妄图一举歼灭红军。面对严峻的形势，1929 年 1 月上旬，毛泽东在宁冈县柏露村主持召开军队和地方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红五军和红四军第 32 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发展，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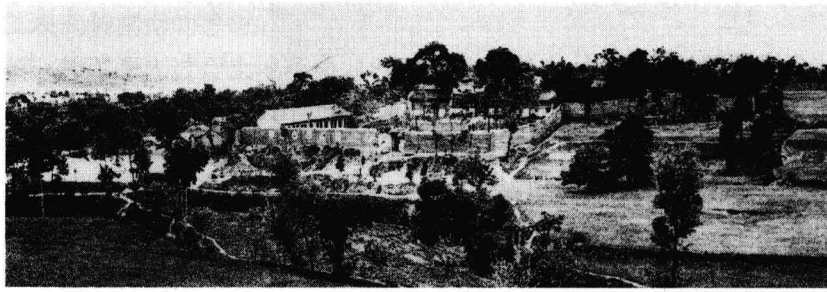
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摇篮，指明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新方向。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胜利，开辟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56. 刘志丹与渭华起义

刘志丹(1903—1936)　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22年在陕西榆林中学读书。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共产党员。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1928年4月,与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渭华起义,先后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后历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陕甘边红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二十六军42师参谋长、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前敌总指挥、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等职,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全国红军北上抗日,作出了重要贡献。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红二十八军军长、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兼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1936年4月在红军东征战斗中牺牲。主要著作收入《刘志丹纪念文集》。

发动领导起义

渭(南)华(县)地区是陕西建立党团组织和开展农民运动最早的地区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这里的党团组织未遭受严重破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西省委进行改组,实行中央提出的"武装暴动,推翻地主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政策。1927年9月26日,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定实行策略上的转变,强调党必须掌握武装力量,组织革命兵变,准备武装起义。省委随即指示渭南区委着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在省委领导下,渭南县委不断发动农民和学生进行反抗,至1928年春,渭华地区的党团员发展到千余人,为党发动和领导武装起义创造了



渭华起义地点：陕西华县高塘镇

有利的条件。

渭华地区的革命斗争，引起反动当局的震惊。1928 年 2 月 28 日，渭南反动豪绅捣毁中共区委机关所在地——宣化观小学，后又封闭了中共活动据点——渭南县中学和渭南东关小学，并相继逮捕党团员和革命群众 40 余人。但是，这并未能阻止革命向前发展，党和群众的斗争有增无减。

早些时候，刘志丹担任省委交通，往返于上海和豫陕间，进行联络工作。此时，陕西省委派刘志丹、唐澍、谢子长等，充实陕西军阀李虎臣部队第 3 旅许权中（共产党员）部的力量。许权中旅是由中共实际控制的一支武装，唐澍任旅参谋长，谢子长任营特派员兼副营长。刘志丹以参谋名义进行活动。为适应起义准备的需要，刘志丹等根据中央和省委指示精神，在许权中旅驻地，帮助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恢复和发展农民协会，成立陕东赤卫队，培养革命武装骨干，开展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迅速扩大革命的影响。

渭华起义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后，1928 年 3 月 22 日，陕西省委召开常委会，决定在陕东举行武装起义，划定临潼、渭南、华阴、华县、五一县为陕东暴动区，建立陕东工农民主政权和以刘继曾为书记的中共陕东特委，制定了暴动实施计划，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全实现”。4 月 6 日，陕东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及许旅的行动计划。决定：整顿党的组织，使其成为起义的指挥部；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的抗粮、抗捐、抗租、抗债和一切摊派；组织苏维埃政权，领导土地革命斗争。省委还指示许权中旅迅速扩大力量，以配合渭华农民起义。由于李虎

臣在反对冯玉祥战争中失败，大大削弱了国民党在陕西的统治，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于5月发动渭华起义。

经过充分的准备，5月1日，渭南东原1 000多农民首先举行暴动。当天，在渭南崇凝镇举行纪念“五一”、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会上，正式宣告崇凝区苏维埃委员会成立。接着，渭华地区的赤水镇、阳郭镇、三张镇和高原镇等地也分别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权，组建约200余人的陕东赤卫队。5月10日，许权中旅在反冯战争中战败，伤亡很大。当晚，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等根据省委的指示，率部向渭华地区进发，部队抵达华县瓜坡镇，进行了初步整编，宣布起义。

建立革命军队和苏维埃政权

部队于5月16日在华县高塘举行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工农革命军的成立。刘志丹、唐澍在会上讲话，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争取武装起义的胜利，建立苏维埃政权。刘志丹强调指出：要想不受穷，只有起来闹革命。大会正式宣布：将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唐澍任总司令，刘继曾任政委，王泰吉任参谋长，全军近千人，编为4个大队，许权中任总顾问兼骑兵分队长，谢子长任第3大队长。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唐澍、刘志丹等即以司令部的名义颁发布告，略称：“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个凶。加以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贪官污吏都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建设苏维埃政权，才能过成好光景。”由于革命军与农民运动相结合，首先起义的崇凝、高塘周围50多个村庄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形成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同时，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镇压反动分子，兴办平民学校、农民夜校等，苏区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革命低落的形势下，渭华起义遭到统治陕西的冯玉祥军队的镇压，从6月上旬开始，冯部先后向渭南苏区发动3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6月19日，在宋哲元指挥下，分左、中、右3路向革命军发动第

三次围攻，唐澍、刘志丹、许权中率领起义部队分路抗击、退却。刘志丹在革命军司令部的前沿阵地镇定自若，一面指挥革命军英勇阻击，一面掩护司令部的伤病员迅速撤退，多次击溃敌人的进攻。后因对形势估计不足，寡不敌众，两个大队全军覆没，唐澍壮烈牺牲。刘志丹、许权中等决定：取消工农革命军和军事委员会，革命军被迫转移蓝田山区，只剩下200人，转入秘密活动。

至此，渭华起义失败了。同时，党在旬邑、礼泉、三原和澄城等地发动的农民起义，也相继失败。7月初，刘志丹在陕东特委军事会议上总结起义失败原因时指出：这是“左”倾政策造成的，主要表现为：光杆斗争，军事冒险，脱离群众和烧杀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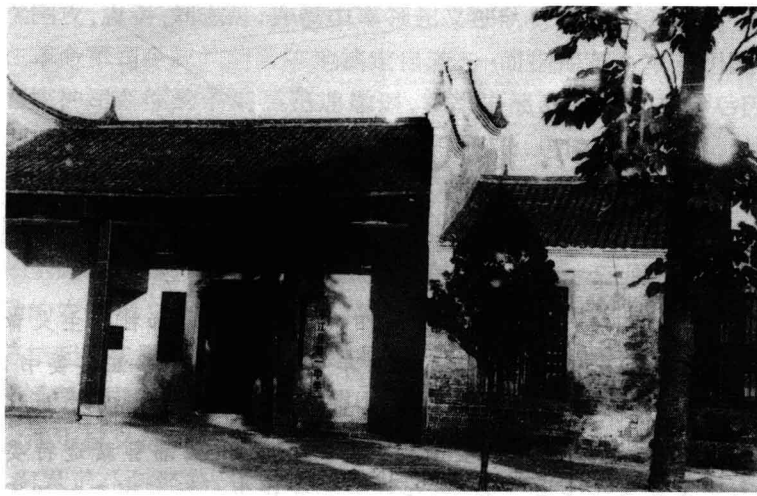
渭华起义是清涧起义的继续和发展。党从失败中吸取了许多教训，积累了斗争经验，这对于陕西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57. 滕代远与平江起义

滕代远(1904—1974) 湖南麻阳人。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先后任青年团平江县委书记、长沙近郊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长沙近郊区区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湘东特委书记兼醴陵县委书记。1928年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与彭德怀等领导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党代表。红五军与红四军在井冈山会师后,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33团党代表。1930年后,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副政治委员兼三军团政委、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1934年赴苏联学习,1937年12月回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后任抗大总校副校长兼副政委、八路军参谋长。抗战胜利后,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后,历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中革军委铁道部部长兼铁道兵司令员、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铁道部部长,为新中国的铁路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1965年任第四届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

赴平江接上党的关系

1927年"马日事变"后,湖南革命势力遭到很大的摧残,但平江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仍坚持斗争,组织了一支游击总队,在平江的东、南各乡,到处袭击反动的地主武装。1928年1月和3月,党中央致信湖南省委,指示:"用极大的力量注意反动军队中的破坏工作,普遍的向士兵进行各种口号的宣传与鼓动。"根据党关于策动兵变的指示精神,中共平江县委在各乡,组织了两次扑城运动,约有10万余武装农民参加。扑城斗争虽然遭到失败,但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平江起义的中心地点：天岳书院

驻防南(县)、华(容)、安(乡)地区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原是唐生智所辖第八军的部队，后归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指挥，1928年6月移驻平江接防，对平江、浏阳进行“会剿”、“清乡”，中共平江县委书记、游击总队党代表罗纳川被捕牺牲。

早些时候，独立第5师1团团长彭德怀由该师政治部秘书长段德昌介绍，于4月加入了共产党，任该团秘密党支部书记。部队中还有李灿、邓萍、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等共产党员。他们在军中做了大量工作，起义前夕已有共产党员9人。党的活动和农民斗争，为平江起义和开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根据湖南省委指示，7月初，湘东特委书记滕代远接任湘鄂赣边特委书记，因为前不久，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郭亮被叛徒出卖而惨遭杀害。滕代远接受新的任命后，以省委特派员身份离开安源赴浏阳、平江寻找党的关系，以便恢复边界特委的工作。行前，省委告诉滕代远，国民革命军独立第5师1团团部有党的组织；如果情况需要，可以相机组织暴动，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以便与井冈山的红四军配合与策应。7月中旬，滕代远找到1团团部副官邓萍，接上了党的关系，被安排在一家叫“镜中天”的旅馆住下。两天后，滕代远与彭德怀、李灿、黄纯一等取得了联系，当即决定以彭德怀团长的名义为滕代远洗尘。在旅馆的“宴会”上，大家相互谈了工作情况，交换了意

见。滕代远传达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并说明他此次来平江，是“专为与部队中的党建立联系，和恢复湘、鄂、赣边特委的领导机关”。

参与领导平江起义

此时，南、华、安特委机关遭破坏，第5师3团3营营长黄公略驻防该地区时，给特委工作人员亲笔写的通行证被破获，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第5师师长周磐密令逮捕法办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3人。危机迫眉，滕代远、彭德怀已来不及请示省委，当机立断，于7月19日在平江县立医院黄纯一病房召集党员紧急会议，一致同意滕代远提出组织武装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动议。会议制定了起义的计划和步骤，决定7月22日午时为起义的日期；通过了起义的10条《政治纲领》：一、彻底消灭平江的一切反动武装，武装工人和农民；二、立即宣布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三、建立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宣布土地政纲，劳动法令；四、释放在牢狱中的一切政治犯；五、建立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与湘赣边苏区、红四军打成一片，建立湘鄂赣边苏维埃政府；六、改善士兵生活，建立士兵委员会；七、没收地主、贪官污吏、豪绅和反动首领的土地；八、宣布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九、武装拥护苏联；十、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罢工等自由。还布置了标语、口号、宣言等有关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大家一致宣誓：坚决在平江武装起义，解除地主武装，武装工农，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帝国主义，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新的红军，响应红四军的英勇斗争。滕代远分工负责政治工作及地方党组织的联系工作，并负责筹组地方革命政府。滕代远《给湖南省委报告》中说：在这紧要时刻，“乘时在平江暴动起来找一条出路，否则党的组织必至消灭，内有的同志亦必至牺牲是无疑义的事。”

是时，滕代远的身份尚未在军队中公开，为了工作方便及确保起义的安全和成功，酒宴以后，滕代远离开“镜中天”旅馆，移居城东郊天岳书院附近的李灿的公馆里，主持组织领导起义的一切工作，这里实际是平江起义的总指挥部。滕代远将研究结果秘密地通知黄公略、贺国中和平江县委，要求他们积极配合起义的行动，要黄公略届

时在嘉义市起义；写信通知贺国中以“打野外”的名义，把在岳阳的随营学校学生带来平江参加起义行列。同时，要求在独立第5师1团积极展开士兵中的活动，大力开展士兵委员会的工作。滕代远对于起义的政治准备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嘉义市的黄公略接到起义通知后，因准备时被第3团团长发觉，故未按起义预定时间，提前行动，7月21日下午率第3团3营宣布起义，全部歼灭了地主武装，率领全营开赴平江。

按原定计划，22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第1团，以士兵“闹饷”的名义发动起义。早饭后，1营全副武装的官兵六七百人集合在天岳书院的广场上，举行誓师大会，士兵会总代表李灿宣布起义，彭德怀向官兵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号召全体士兵勇敢地站起来，参加革命，为夺取工农革命最后胜利而斗争。彭德怀宣读完誓词后，全营官兵，群情激愤，每人都挂上红布领带，作为起义标志，向平江县国民党党部、县政府、县监狱、5师师部等预定目标进发。经过两小时的战斗，控制了整个县城，镰刀斧头的大红旗，在平江上空飘扬。起义部队解决了县城内的反动武装，歼敌2 000余人，缴获步枪近1 000支，子弹百万发，救出了在狱中被关押的工农革命者五六百人。当日，成立宣传队，挨家挨户做宣传工作，宣传共产党的纲领，苏维埃政府的主张，中国工农红军的任务等。

23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随营学校100余学员，也加入了起义行列，赶至平江与第1团会合。

红五军党代表

在滕代远领导下，经过积极的组织筹备，24日下午，各县有组织的几万群众聚集在平江月池塘召开工农兵联欢大会，热烈庆贺平江起义的胜利，庆祝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和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会上，滕代远报告了政治形势，党的主张和成立红五军的意义，并代表中共湖南省委，宣布彭德怀任红五军军长兼第13师师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任军参谋长；正式宣布成立中共红五军委员会，滕代远为书记，彭德怀、邓萍、黄公略、黄纯一、贺国中等为委员。

起义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五军第13师，下辖第1、4、7团，共2 500余人，步枪1 500余支。李灿、黄公略、黄一纯分任3个团的党代表。会上还公审和处决了340余名反革命分子。群众个个兴奋异常，无不拍手称快。

接着，滕代远着手在各团内建立党的支部，各级实行党代表制，团以上设立政治部；同时加强部队中党的建设，发展新党员。滕代远对于军队建立政治工作和党的组织，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7月30日，红五军遭到敌人5路7个团的重兵围攻，经过激战伤亡约200人，黄一纯阵亡，因寡不敌众，红五军放弃平江县城。滕代远、彭德怀召开平江县委和红五军联席会议，决定力争在最短期间，建成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再打通湘东、湘赣边和湘南等地，与朱毛红军取得联系，造成整个罗霄山山脉的割据。八九月间，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转战于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之间。其间，红五军建立了政治部，党代表滕代远兼任政治部主任。他经常下连队和士兵们谈心，鼓励大家要树立革命到底的决心，给士兵们极大的鼓舞。9月17日，滕代远在铜鼓县的幽居，以湖南省委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召开平江、浏阳、修水、铜鼓及红五军的党组织联席会议，推举滕代远、彭德怀、王首道等5人为湘鄂赣边特委常委，滕代远为书记。不久，因滕代远要随军工作，特委书记由王首道代理。

联席会议以后，滕代远、彭德怀率领红五军主力一面转战各地，寻找机会与红四军会合；一面抓紧根据地的各项建设。经过辗转苦战，1928年12月11日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胜利会师，造成罗霄山山脉的整个割据的局面。

58. 陈为人与中共满洲省委

陈为人(1899—1937) 湖南江华人。1920年在上海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工人夜校和组织工人俱乐部。同年冬赴苏联学习。1921年底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在北方开展铁路工人工作。1923年被派往哈尔滨、沈阳、大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时期,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做工运工作。1927年任顺直省委秘书长和组织部长。八七会议后,再次被派到东北地区工作,负责组建中共满洲临时省委,任书记兼秘书长、宣传部长。1928年9月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929年8月调往上海工作。1932年负责党的"中央文库"工作,保存整理党中央的秘密文件,对党在白区斗争做出重要的贡献。1937年3月在上海病逝。

组建中共满洲临时省委

1923年"二七"惨案后,中共中央派陈为人、李震瀛等赴哈尔滨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并于中共三大后,成立了东北最早的党组织——哈尔滨小组。接着,他们又在奉天(今沈阳)、大连等地活动,使这些地区党组织得到一定的发展,为东北三省党的组织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1927年八七会议后,陈为人任顺直省委秘书长,他受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派遣再赴东北,负责传达八七会议并组建满洲省委,以统一和加强东北地区党的领导。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1927年10月14日,陈为人从天津到达奉天。此时,东北党组织几乎完全遭到破坏,大连的组织已全部瓦解,吉林、长春的组织已停顿,哈尔滨的组织也已完全腐化,奉天只剩下三十几个党员,而且各地互不统一,与中央断绝

关系已有半年。在这种恶劣环境下，陈为人奔波于抚顺、本溪、营口、吉林、哈尔滨等地，经与已在哈尔滨工作的中共北满地委书记吴丽石等反复商讨，于10月24日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约集哈尔滨、长春、吉林、奉天、大连等地的党员代表共14人参加，代表上述地区200多名党员。会上，陈为人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和中央关于建立东北党的领导机构的指示。会议讨论通过了《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满洲工人运动决议案》和《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等文件，宣告正式成立中共满洲临时省委，选举陈为人担任临委书记兼宣传部长、秘书长，吴丽石为组织部长兼农运部长，王立功为工运部长。满洲临时省委负责管理奉天(今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的党务。会后，陈为人等离开哈尔滨赶赴省委机关所在地奉天。

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中共满洲省临委于1928年初在奉天召开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陈为人代表省临委作《政治党务报告》。大会改选新的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为人、吴丽石等3人为常委，陈为人任临委书记。会后，各项工作虽有了较大的发展，但由于个别执委被捕叛变，省临委通信机关及长春、哈尔滨、大连党组织遭到破坏，党员人数锐减，党的活动被迫停止，第二次大会的决议未能贯彻执行。4月，中共满洲临委召开第二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陈为人在会上作《政治党务报告》，分析了第二次代表大会以来的政治形势，提出今后工作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强调要加强秘密工作。陈为人带头对原常委在策略和组织工作上的错误进行了批评。会议补选长期从事工运的大连工人领袖唐宏经为省临委执行委员，改选了中共满洲省临委，陈为人继续担任书记，吴丽石任组织部长，唐宏经任工运部长。

为贯彻执行党的六大决议，1928年9月，陈为人在奉天主持召开中共满洲省临委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传达了六大决议。陈为人代表省临委作了《政治报告》、《党务报告》和《职工运动报告》，根据六大精神，着重检查和分析了满洲省临委过去所犯盲动主义错误的原因，指出这种错误脱离了群众，影响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与发展，给工作

造成很大损失。大会通过了陈为人起草的《关于接受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的决议》、《满洲省第三次代表大会政治党务决议案》等文件。确定党在东北地区的主要政治任务是:“加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力量,在反日反国民党反军阀政权号召之下,发动群众的日常斗争,扩大党的政治宣传,提高无产阶级及一般农民贫民的政治觉悟,建立群众的广大组织,以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基础。”大会决定将满洲省临委改为满洲省委,选出正式委员 7 人,候补委员 3 人。陈为人继续当选省委书记。

为东北地区革命做出贡献

省临委首先派出委员到各地抓了各级党组织的恢复、整顿和发展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到 1927 年 12 月,北满地委改为哈尔滨县委和市委,大连已成立市委,长春、吉林、奉天组织了区委。各地组织恢复后,将党的发展与建设当作“党的中心工作”。12 月 1 日,省临委发出《通告第一号》,号召各地党员必须全体动员,努力做好党的工作,确定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军事运动,随时组织斗争与暴动,破坏和推翻军阀统治,建立革命政权。为向各地培养和输送骨干力量,从 1928 年起,先后举办了 4 期党团干部训练班,陈为人亲自讲授《马列主义》和《职工运动》两门课程。省临委还多次发出通告、通讯、公函,以及编发《入党须知》和《支部讨论大纲》等文件,出版《满洲通讯》、《满洲红旗》、《满洲工人》等刊物,及时指导各地党组织的斗争。

满洲省临委十分重视东北地区农民运动。陈为人对农村的阶级斗争形势进行了调查,并亲自为省临委起草了《农民运动决议案》,提出农民“推翻地主军阀的政权与彻底的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一切土地应无代价的分配给农民”等中心口号,将农民斗争划为 4 个区域,恢复农村党的组织,举办数期农运干部训练班。各地党组织领导农民开展了抗租、抗税、抗粮、抗债、抗捐的日常斗争,取得了成效。

东北地区有较为雄厚的工业基础,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经济、军事战略要地。陈为人认为:要想爆发广大的反日运动,只有

工农群众起来，才有可能，所以把发展工人运动当作工作重点。并且确定北满的工运以中东铁路、吉（林）长（春）铁路、哈尔滨城市为主；奉天的工运以兵工厂、铁路工人为主；矿山以抚顺、本溪、鞍山为主；南满的工运以大连沙河口为主。1927 年 10 月，省临委通过《我们在满洲的政纲》，提出一系列反帝反日斗争口号。1928 年 5 月，中共满洲省临委组成反日行动委员会，发出反日宣传大纲第 21 号、第 22 号通告，布置了关于开展反日运动工作问题，号召群众抵制日货。6 月，省临委发出《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告同胞书》，提出“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此外，还散发了数千份宣言、传单和标语，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党组织先后在哈尔滨、长春、吉林等地组织了反日爱国游行示威。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很难找到一处合适的地点，同时中共领导人也需要听一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看法，于是中共六大决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1928 年 4 月，满洲省临委接到中央通知后，组成由唐宏经为团长的 5 人代表团，代表满洲省委准备出席党的六大。因为周恩来等许多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都要往返出入东北地区，陈为人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地，出色地组织了安全的迎接和护送工作。

1927 年至 1928 年间，东北各地党的组织虽屡次遭到严重破坏，但满洲省临委及时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到 1928 年 12 月，已恢复和建立了奉天市委、沈北区委、辽阳区委、关东县委、安东特支、抚顺特支、台安特支、营口支部、沟帮子支部、延边区委、哈尔滨县委和市委等党的组织，党员发展到 270 余人。其间，陈为人曾三度出任中共满洲省临委和满洲省委书记，这充分表明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对他的信任。他在领导东北党组织和群众革命斗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28 年底，陈为人等 14 人在沈阳一工人党员家中开省委扩大会议时，会场被敌人侦破，省委委员除一人逃离外，其余 13 人被警察抓获，省委遭到破坏。陈为人在狱中备受折磨，但坚不吐实。后经党组织营救，于 1929 年 7 月被全部释放。陈为人出狱后，被调往上海工作。

59. 方志敏与赣东北苏区根据地

方志敏(1899—1935) 江西弋阳人。1917年毕业于南昌甲种工业学校。1922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任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长,后任江西省农协常务委员长兼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任弋阳、横峰等5县工作委员会书记和暴动总指挥,1928年1月组织领导弋横农民起义,创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中国工农红军第十军。后任信江苏维埃政府主席、信江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赣东北革命委员会主席。1931年主持召开赣东北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红十军代理政治委员。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任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1935年1月在怀玉山地区被俘,8月在南昌就义。主要著作收入《方志敏文集》。

领导弋横农民起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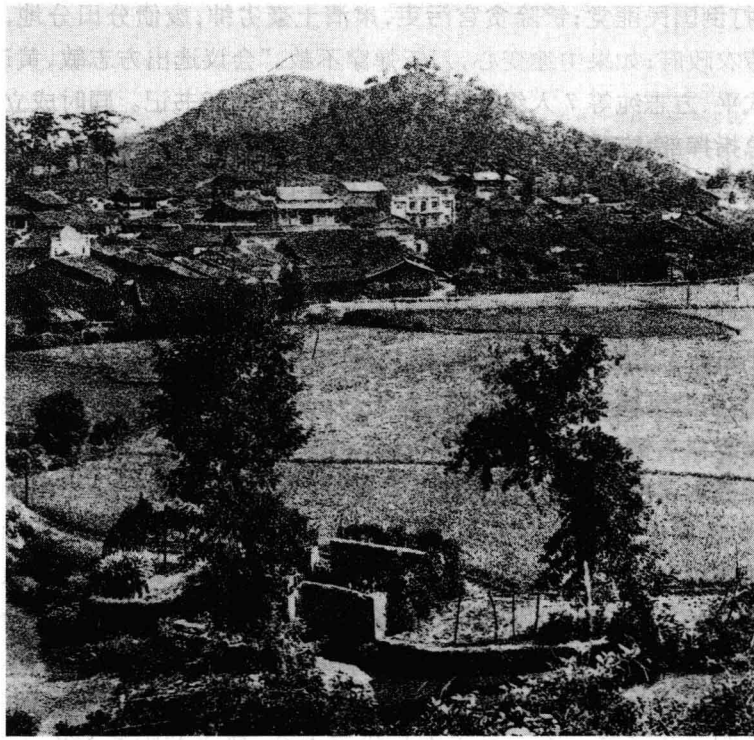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方志敏受党的委派,以全国农协特派员的身份,于9月由南昌回到江西省东北部的弋阳、横峰地区,与邵式平、黄道等建立了20几个党支部,恢复了20多个农民协会和群众团体,重新点燃起弋横地区的革命烈火。11月25日,方志敏在弋阳九区窖头村召集弋阳、横峰、贵溪、上饶、铅山(缺席)5县党员联席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出:“大革命已经失败,但是中国革命要解决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革命形势仍然存在。现在的办法,只有重新革命,组织农民暴动,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会议决定组织农民革命团,举行年关暴动,制定了暴动纲领:“推翻帝国主

义，打倒国民匪党；铲除贪官污吏，肃清土豪劣绅；废债分田分地，建立劳农政府；如果中途变心，刀斩弹穿不赦。”会议选出方志敏、黄道、邵式平、方志纯等7人组成工作委员会，方志敏任书记。同时成立暴动总指挥部，方志敏任总指挥。这是一次重要会议，从此赣东北革命进入了武装斗争的新阶段，为弋横起义作了重要的准备。

在湘赣秋收暴动计划受挫的情况下，横峰区委书记方志敏首先组建起农民革命团，弋阳、横峰的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1927年12月，在方志敏等的领导下，终于爆发了弋阳、横峰起义。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军分五路向外发展，起义很快进入高潮。起义持续了两个多月，区域纵横百余里，参加的农民达六七万人。弋横起义胜利后，农民群众热情地歌颂：“湖塘塌塌岭，出了个方志敏，一心干革命，为的是穷人。”1928年4月，成立了中共弋(阳)、横(峰)、德(兴)中心县委，方志敏任弋阳县委书记。正当弋横起义取得胜利的时刻，江西军阀朱培德派军队前来镇压，起义遭受挫折。根据新的形势，方志敏等决定改变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开始转入以弋阳、横峰、德兴3县交界的磨盘山为中心的游击战争。方志敏、邵式平等领导游击队，与敌人在山上周旋苦斗了一个多月。5月上旬，在弋阳召开了第一次全县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弋阳苏维埃政府。不久，横峰县苏维埃政府也建立起来。

开辟苏区根据地

在敌人残酷搜山“清剿”的情况下，为了明确新的斗争方针，6月25日，在磨盘山主峰方胜峰的古庙里，方志敏主持召开了弋阳、横峰两县常委联席会议，黄道、邵式平、方志纯等20余人参加。经过激烈的争论，宣布正式成立土地革命军第2师14团1营1连。会议决定：一、由邵式平指挥40多名游击队员，打击“清剿”之敌；二、由方志敏负责做争取群众的工作，并带6名游击队员镇压反动首要分子；三、派黄道等去贵溪一带做秘密工作，负责开辟新的割据区域。方胜峰会议，是赣东北党组织继窖头会议后的又一次重要会议，从此，赣东北由游击战争转为创造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新局面。



弋阳起义地点：弋阳县漆工镇

在方志敏等领导下，从1928年6月开始，经过1年时间，连续粉碎敌人4次搜山“围剿”，增强了群众的斗争勇气，扩大苏区100余里，人口8万余。1929年1月，刚刚当选中共江西省委执行委员的方志敏，代表信江特委筹委会在贵溪汪家坪召开干部会议，宣布成立以黄道任书记的贵(溪)、余(江)、万(年)中心县委。2月，方志敏在弋阳九区主持召开信江地区中共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有弋阳、横峰、贵溪、德兴、铅山5县代表40余人参加，成立信江特委，方志敏为代理特委书记。从4月底开始，先后爆发了贵溪的周坊暴动，以及万年、余江的年关暴动，从而扩大了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等县苏区，使几块割据区逐渐联成一片。7月上旬，在周坊召开了贵溪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方志敏在报告中总结了贵、万、余武装起义的经验。会议决定成立贵溪苏维埃政府。会后，方志敏以信江特委委员身份兼任贵溪县委书记。

在弋阳、横峰、德兴、贵溪先后成立县苏维埃政府的基础上，1929年10月初，信江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弋阳漆工镇召开。会议通过了《信江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政纲》，正式成立信江苏维埃政府，方志敏任主席。毛泽东当时十分重视赣东北苏区的斗争经验，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随着军事上的胜利，游击队逐步发展为"江西红军独立团"。1930年2月，赣东北苏区范围迅速扩大到两倍以上，纵横弋阳、横峰、贵溪、余江、万年、铅山、德兴、上饶、乐平等县200里，人口由10万增至40万。3月，召开信江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方志敏连任主席。5月，方志敏兼任信江军委主席。7月，红军独立团一度攻占离苏区较远的"瓷都"景德镇，使苏区扩大到纵横500余里，人口约100万；独立团也从1 000余人发展到4 000余人。

抵制"立三路线"

此时，统治着党中央的李立三执行"左"倾冒险主义，硬要赣东北的红军立即去攻打九江，以配合红一军团夺取南昌，截断长江，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方志敏等对打九江十分怀疑，认为："九江是全国重镇，敌人驻军多，增援也方便。红十军远离根据地，越过鄱阳湖去进攻九江，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主张退出景德镇回师根据地。但是，唐在刚为书记的信江特委未采纳方志敏等人的正确意见。7月下旬，赣东北红军独立第1团扩编为红军第十军，共2 000余人。随后，闽北红军独立团也编入红十军的序列。

红十军出征以后，方志敏留守苏区工作。1930年8月，在他的主持下，赣东北特区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芳家墩举行，选举产生了江西东北特区革命委员会，方志敏为主席。同时信江特委改称赣东北特委，在9月召开的特委会议上，方志敏认为，越湖攻打九江是盲目行动。会议再次作出向九江进军的决议，并成立以唐在刚为书记的赣

东北行动委员会。直到10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停止,蒋介石调集兵力包围苏区,红十军才回师苏区。由于坚持正确路线的方志敏等人的抵制,红十军才未完全执行立三路线。11月,赣东北行委在乐平县召开会议,取消行动委员会,恢复赣东北省特委,决定唐在刚为省委书记,方志敏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邵式平为军委主席。

1931年3月,召开了赣东北特区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赣东北特区苏维埃政府,方志敏继任主席。此时,方志敏还暂代红十军政委,他和军长周建屏一道,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训练,使全军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了一定的提高。方志敏还将红十军对敌作战中的一套战略战术,归纳为7条经验,包括:"诱敌深入,埋伏截击。""围魏救赵。""避实击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有时分散,有时集中,视敌人对我们的分散与集中而言。"等等。4月,红十军开始向闽北进击,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奠定了闽北苏维埃和红军胜利发展的基础。截至5月,在方志敏的领导下,赣东北苏区根据地已横跨闽、浙、皖、赣4省,拥有52个县以及游击区,人口达2 000余万,进入大发展的全盛时期。毛泽东在当年11月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赣东北苏维埃的各项成就予以很高评价,并授予红十军一面"奖旗",授予方志敏"红旗勋章"。

创建"苏维埃模范省"

中共赣东北省委于1931年9月正式建立后,11月召开了赣东北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当选为主席。1932年9月,方志敏率红十军第二次进入闽北,歼敌4个团,打通了闽北与赣东北两个苏区的联系,也使闽北成为联结中央苏区和赣东北苏区的桥梁。12月,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改为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方志敏继续当选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3年1月,红十军改编为红十一军,周建屏任军长,方志敏兼任政委。3月,方志敏在葛源主持召开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他向大会作了《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工作报告》,并继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0月,红十一军扩编为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12月,方志敏接任闽浙赣省委

书记，经过他的努力，停止了“左”倾的土地政策和肃反政策。

方志敏自1930年主持苏维埃政府工作以来，直到1934年从未停止过。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全部心血贡献给了苏维埃和革命事业，坚信“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最后的胜利。”他在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抓紧时机进行经济、文化建设，开办许多工厂、学校和其他文化设施，进行了许多创造性的工作，并总结出苏维埃的5种精神，即民主精神、创造精神、进步精神、刻苦精神和自我批评精神。毛泽东在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称赞赣东北省是“苏维埃模范省”，说：“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他们是革命战争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他们又是群众生活的良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60. 张云逸与红七军

张云逸(1892—1974)　海南文昌人。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第四军25师参谋长。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做广西旧军队的统战工作，先后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广西警备第4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等职，与邓小平等领导了百色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七军，任军长，建立了右江根据地。1931年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合后，先后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等职。红军长征时，任中央纵队的先遣队司令员。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2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校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中共华东工作后方委员会书记、华南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全国解放后，担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兼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七至十届中央委员，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第一至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著有《张云逸军事文选》。

准备武装起义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遭受极大的摧残，斗争被迫转入了地下。右江地区农民领袖韦拔群领导革命群众，转入到东兰、凤山山区，坚持武装斗争，保存了革命力量。以东兰地区为中心的右江农民运动的开展，为百色、龙州起义的胜利和红

军、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1929 年春，蒋桂军阀爆发战争，桂系战败。蒋介石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编遣特派员和编遣分区主任。广西军阀内部矛盾重重，俞作柏想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扩大个人的权势，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其军政机关协助工作。党中央决定抓住有利时机，起初派中央巡视员、广东省委常委贺昌到南宁领导开展工作。9 月中旬，中共中央派遣邓小平（化名邓斌）以中央代表身份到南宁，加强对广西工作的领导。随之，陈豪人、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袁振武（也烈）、李谦等几十名共产党员也先后来到广西，积极配合地方党组织，通过各种渠道，做俞作柏、李明瑞的统战工作，发展革命力量，为武装起义、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作了重要准备。

1929 年 7 月，张云逸从上海经香港到南宁，被俞作柏聘为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兼广西警备第 4 大队大队长。俞还委任其胞弟、共产党员俞作豫担任广西警备第 5 大队大队长。李明瑞根据张云逸的建议，开办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共 1 000 余人，由张云逸负责。张云逸利用各种条件，调共产党员担任连、排长和军事、政治教官。经过两个月，教导总队发展了 300 余名新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张云逸还采取了许多果断措施，调李谦担任广西警备第 4 大队副大队长，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发展新党员，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在第 4 大队成立士兵委员会，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兵运工作；大量吸收工农群众和进步学生参加部队。通过上述措施，使两支旧军队在很短时间内得以掌握和改造。9 月初，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政治议决案》等文件，决定党目前的行动纲领，是要抓紧有利时机，广泛发动群众，准备武装暴动以夺取政权，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然而，俞作柏和李明瑞不听中共的劝告，于 9 月下旬出兵反蒋，广西形势发生突变。张云逸乘南宁城内空虚之机，借口部队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提议不要把教导总队、4、5 两个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后方的任务。俞、李同意了张的意见，只抽调了 300 余人去各师，并由张兼任南宁警备司令。张云逸利用职权之便，在部队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并派 4 大队和 5 大队各一个营，分别去右江和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同时接管了省军械库、金库等机关，获得五六千支

步枪及山炮、机关枪、电台和大量弹药。

俞作柏和李明瑞反蒋，不到10天即告失败。按照原定计划，邓小平决定立即举行兵变，把已掌握的部队开赴左、右江。俞作豫先率领第5大队开赴左江龙州；邓小平率领警卫部队，携带省军械库的武器弹药，由水路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和第4大队由陆路掩护前进，开赴右江百色。因教导总队和第4大队有些人坚持要离开，张云逸耐心地做争取工作，行前，他集合全体学员，说："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结果，在500余人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坚持要离开。

参与领导百色起义

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部队到达右江的政治、经济中心——百色。邓小平在这里召开广西军委会议，决定了准备起义的各项措施，并利用旧有的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俞作豫为左江督办。张云逸命令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解决了经费问题。经过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共同努力，群众反豪绅的斗争情绪十分高涨，部队迅速扩大，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为扑灭警备第3大队这支反动武装，张云逸设下一条妙计：28日，"宴请"第3大队长熊镐到百色公兴当铺"商谈防务"，将其扣押，第二天公审枪决。同一天，百色等地的革命武装，在右江农军和工人赤卫队的配合下，一举歼灭了第3大队1 000余人，缴枪700多支。30日，广西军委改为广西前委，邓小平、张云逸、陈豪人3人组成常委，邓小平任前委书记，负责左、右江的全面工作。

中共中央于11月初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在左、右江建立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中央颁给右江起义部队的番号是红军第七军，左江起义部队为红军第八军；由邓小平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立即召集前委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会议决定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举行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

12 月 10 日，第 4 大队士兵代表会议、工人代表会议、农民代表会议，同时在百色召开，通过了第 4 大队转变为红军及组织苏维埃政府两个决议案。当晚，即在百色扣留了第 5 大队营长、县长及禁烟局长；收缴了公安局、县公署、禁烟局、商会等处的枪支。次日召开广州起义纪念大会，清晨，晴空万里，百色城头红旗飞舞，彩色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各界群众队伍和系着红领带的红军官兵 3 000 余人，从四面八方聚集在南门外粤东会馆的广场上。当大会主席庄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时，全场欢声雷动，锣鼓喧天，人如潮涌，革命情绪空前高涨。大会宣布张云逸任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宣布了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纲》16 条。红七军由第 4 大队、第 5 大队之 5 营一部分、韦拔群所部农军等组成，下辖 3 个纵队，共约 5 000 人。军部设在粤东会馆里。

右江 23 个县的工农兵代表于 13 日在恩隆县平马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有数万群众参加。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当选为政府主席。当天下午，红七军军长张云逸特地从百色乘汽船赶到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平马镇，参加庆祝大会，他在会上宣布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和红七军的成立，并作了重要讲话，说：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是工农群众的一件大喜事。红七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欢迎右江父老兄弟选送优秀儿子踊跃参加红七军。有了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红七军一定会迅速壮大，革命一定胜利。张云逸讲完话，即把 1 个用红布包着的大印交给了雷经天。随后，百色、平马、东兰、凤山等 14 个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

领导红七军转战千里

1930 年初，红七军张贴由政委邓斌、军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陈豪人联名签署的《布告》，申明红七军是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其目的在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以解除民众痛苦为职志”。

在邓小平的领导下，2 月 1 日，龙州起义胜利举行，当天召开万人庆祝大会，庄严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革命委员会诞生。红八军共 3 000 人，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任红八军临时前委书记兼红八军政委，李明瑞任红七军和红八军的总指挥。王逸任左江革命委员会主席。接着，龙州、宁明、上金、明江、崇善、左县、雷平、养利、凭祥等县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至此，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相互呼应，形成一个拥有 200 万人口，包括 20 多个县的红色区域，成为当时全国几个较大的苏区根据地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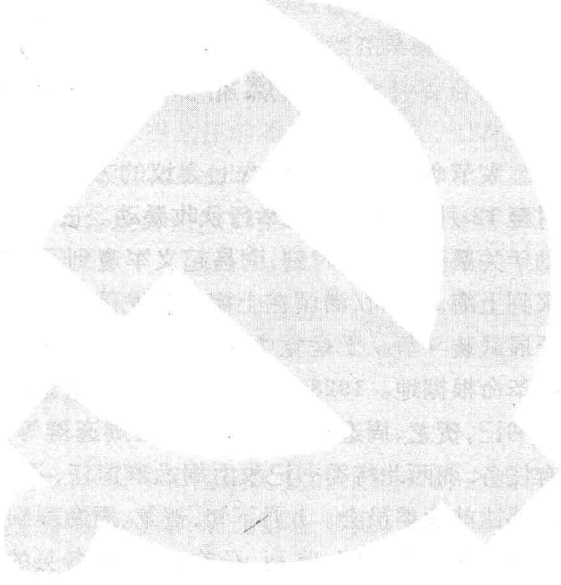
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于 3 月中旬在凤山县盘阳召开会议，决定第 1、2 纵队主力到黔桂边开展游击战，留下韦拔群率领第 3 纵队坚守右江根据地。随后，张云逸、李明瑞率领红七军从盘阳出发，经过河池等地到贵州省边界，转战千里，一举攻克榕江县城，歼灭守敌 600 余人，是红七军成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5 月 1 日，红七军在县城举行庆祝国际劳动节的群众大会，并把没收的土豪、官僚的财产分发给贫苦人民。不久，红七军又闪电般地回师右江，在张云逸的亲自指挥下，第 1、2 纵队指战员英勇善战，于 6 月初收复了百色城。

是年八九月间，正当苏区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李立三“左”倾错误领导主张攻打大城市，强令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去执行攻打柳州、桂林、广州等中心城市，配合红三军团打长沙，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冒险计划。红七军被迫离开右江，奉命北上，右江革命暂时转入低潮。这时，红八军剩余的几百人，从左江地区转战到右江地区，编入红七军。11 月 7 日，红七军在河池举行第一次党代会，会议选举前委，邓小平、张云逸等 9 人为前委委员。会后，部队进行整编，张云逸仍任红七军军长。

在困难的情况下，1931 年 1 月，前委在全州召开会议，讨论部队去向问题，经过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等努力，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2 月，红七军 7 000 人在抢渡乐昌河时，被敌军截为两部，邓小平、李明瑞率 58 团一部，渡河后向江西前进；张云逸率未过河的 58 团大部，转至另处渡河，进入湘赣革命根据地，与中央红军会师。4 月初，两部在江西永新县重新会合。

红七军征战历时 10 个月，途经桂、湘、粤、赣 4 省，前后行程 7 000

里，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到达中央苏区根据地，于7月22日被编入红三军团序列。中央工农政府为了表彰红七军这次远征的功绩，特授予“转战千里”锦旗一面。不久，红七军在永新召开第二次党代会，总结了从广西到江西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宣布红七军与中央红军会合的任务胜利完成。



61. 周逸群与湘鄂西苏区根据地

周逸群(1896—1931)　贵州铜仁人。1919年东渡日本留学。1923年毕业回到上海。1924年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进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倡议组织革命团体"火星社",参与创建"青年军人联合会",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北伐战争时期,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队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政治部主任、第3师师长等职。参加南昌起义,协助贺龙制定起义的具体计划。1928年与贺龙一起赴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任湘鄂边前敌委员会书记,并组织工农革命军。后任鄂西特委书记、鄂西游击总队总队长、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二军团前委书记、军团政委、湘鄂西苏维埃联县政府主席并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等职。1931年5月在洞庭特区突围时,壮烈牺牲。

点燃湘鄂西革命烽火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八七会议的方针,在党的领导下,1927年9月至12月,湘鄂西地区举行秋收暴动。正当鄂西、鄂中等地区准备发动年关暴动的紧急时刻,南昌起义军遭到了失败,周逸群从广东汕头来到上海。此时,滞留在上海的贺龙因去苏联未果,便打算回湘鄂西开展武装斗争。于是党中央决定派周逸群与贺龙一起返湘鄂西,开辟革命根据地。192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组织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等为委员。当周逸群等到达汉口时,因郭亮另有任务,湘西北特委书记改由周逸群担任,并成立以周逸群为书记的湘鄂边前敌委员会。1月下旬,贺龙、周逸群到达监利县境,积极发动了荆江两岸的沔阳、监利、石首、华容等各县的年关斗争。2月底,贺

湘鄂西根据地的中心：湖北洪湖县的瞿家湾

龙、周逸群又来到湘西桑植县洪家关，领导开展湘鄂边区的斗争。经过艰苦细致的发动工作，3 月成立由贺龙统一指挥的工农革命军，共 3 000人。部队进占桑植县城，成立了中共桑植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

工农革命军虽与强敌多次激战，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贺、周两人也被隔开，失去了联系。4 月底，周逸群返回石首，继续领导荆江两岸的武装斗争；贺龙则收拢失散队伍 400 余人，继续在桑植、鹤峰一带开展游击活动。为了统一指挥，湖南省委决定湘西北特委合并于湘西特委，并成立湘西前敌委员会，贺龙任前委书记。不久，工农革命军发展到 1 500 人，正式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军第四军）。是时，周逸群建议集中各地游击队向洪湖地区转移，并带领鄂西游击大队在洪湖沿岸活动。

开辟鄂西苏区根据地

周逸群抵石首后，为统一领导鄂西地区党的组织和游击战争，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重组鄂西特委，周逸群任书记。1928 年 5 月中旬，周逸群集中监利、沔阳、石首、华容各县游击队，一举歼灭了沔

阳峰口之敌，极大地鼓舞了军民斗志，扩大了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月底，设在沙市的鄂西特委机关遭敌人破坏，领导人大部牺牲。周逸群获悉后，立即赶往沙市，组建鄂西临时特委，并将特委机关从沙市迁至宜昌。

周逸群于6月底到上海，向党中央报告鄂西情况，并提出开展这个地区斗争的具体领导方案，得到中央的批准。7月上旬，正式成立鄂西特委，周逸群为书记、万涛为副书记。新特委成立后，在周逸群的带领下，一面克服盲动主义残余和地方主义观念，恢复和整顿党组织及革命武装；一面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政权。1928年秋，鄂西特委已管辖23个县，党员2 000余人，各县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都有较大的恢复与发展。特委还领导军民进行反“清乡”的斗争，到年底，鄂西、鄂中地区的游击武装得到很大的发展。

1929年初，中共六大的决议和井冈山等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传到了鄂西。3月，鄂西特委为贯彻党中央的指示，在江陵的沙岗召开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总结了鄂西工作，仍决定周逸群为书记。在周逸群和贺龙的领导下，创建了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根据地。江陵、监利、石首、沔阳各县大部分地区建立了区乡红色政权，农民协会、赤卫队、妇女会等组织日益壮大，是年夏天，形成了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苏区。周逸群经常来往于湘西和洪湖地区之间，统一领导这两个地区的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同时，鄂西游击队在周逸群、段德昌指挥下，总结出“分散游击，集中指挥”、“敌来我飞，敌去我归，敌多则跑，敌少则搞”和“只打虚不打实，要打必胜，不胜不打”等战术原则。

周逸群与段德昌7月在监利举办了军政训练班，为江陵、沔阳、监利、石首、汉川等县培训了80余名基层干部。周逸群亲自编写政治教材，给学员讲课，内容包括：共产党的性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区别；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要武装工农来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以及怎样当好党代表，怎样访贫问苦，怎样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等。8月，游击队正式扩编，成立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兼党代表，段德昌任参谋长。全军近千人，枪500余支。

在周逸群和鄂西特委的领导下，鄂西地区在武装建设、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游击队发动和依靠群众、经济政策、土地革命等各方面

工作，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在此基础上，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推动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12 月，周逸群在石首的袁家铺主持召开了鄂西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鄂西目前的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以及农民运动、土地问题、苏维埃组织、职工运动、军事问题等 12 项决议。选举新的特委，周逸群继续任特委书记。这次会议，对于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及加强党和红军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

会后，鄂西游击总队改编为红军中央独立第 1 师，段德昌为师长，下辖 3 个纵队，共五六千人。1930 年 2 月，独立师在监利扩编为红六军，孙德清任军长，周逸群兼政委，段德昌任副军长，许光达任参谋长，全军六七千人。红六军的成立，标志着鄂西革命武装由小到大，由分散到集中的转变，适应了游击战争的需要，成为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强大力量。

随后，周逸群率红六军西进，渡过长江，连克华容、公安等县。在游击战争胜利的基础上，4 月，周逸群主持召开了鄂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鄂西江陵、石首、监利、沔阳、潜江 5 县联县政府，周逸群为联县政府主席。根据中央政策精神，联县政府结合湘鄂西的实际，制定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土地革命法令》等文件，切实开展土地革命运动。联县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湘鄂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红二军团总政委

1930 年夏天，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爆发了军阀中原大战，客观上为革命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然而，这时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李立三“左”倾错误，要求红军集中兵力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以“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命令红二军团攻打沙市。鄂西党组织和周逸群虽一度也受到错误路线的影响，但时间不长，损失不大。7 月 4 日，红四军（改称红二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胜利会师，周逸群与贺龙亲切会见。根据中央的指示，两军合编为红军第二军团，约近万人，由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总政委和军团前委书记，孙德清

任参谋长，柳克明任政治部主任。贺、周等主张，先肃清苏区内的反动势力，再向外发展。在特委和周逸群的正确领导下，洪湖地区挫败了敌人第一、二次“围剿”，根据地除江、石、监、沔、潜5县外，扩展到荆门、钟祥、天门、汉川、公安、松滋、华容、南县、安乡等县的部分地区，各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毛泽东曾对洪湖苏区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红军时代的洪湖游击战争支持了数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带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证据。”贺龙在评价这段历史时说：“湘鄂西初期虽也受过挫折，但仍然坚持了斗争，建立了根据地，发展了武装。这就证明以周逸群同志为首的湘鄂西党的领导，基本上是正确的。”

然而，1930年9月，党中央派邓中夏到洪湖，接任鄂西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委职务，进一步推行“左”倾冒险错误。不久，鄂西特委改为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湘鄂西特委书记和军团前委书记。代理军委书记周逸群被调到地方工作，任鄂西联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因邓中夏须随军工作，周逸群代理湘鄂西特委书记，留在后方。中央要求红二军团援助中央红军攻打长沙，遭到周逸群等人的坚决反对，争论很激烈，最后决定打监利后再行过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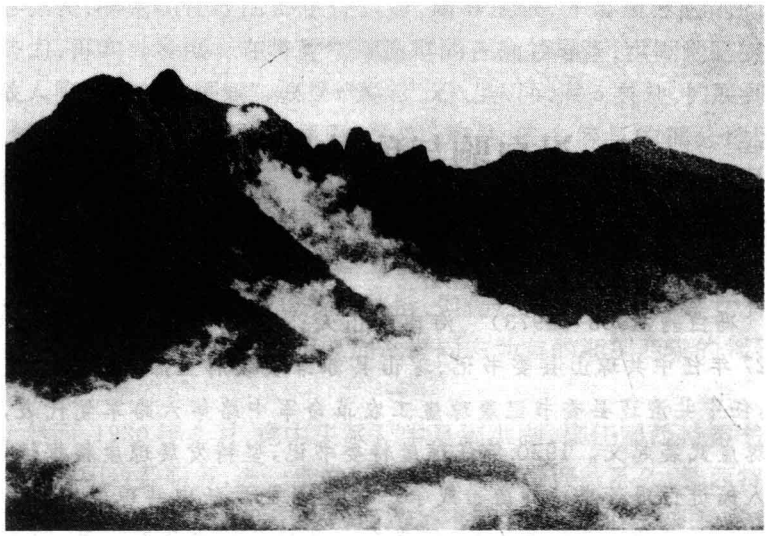
1931年5月，在洪湖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周逸群率领江右军（长江以南）大部下洞庭湖，开辟并直接领导了包括华容、南县、沅江、益阳、湘阴、岳阳等县的洞庭特区。不幸的是，周逸群在由洞庭特区巡视工作返回江北途经岳阳时，遭敌伏击，中弹牺牲。他的牺牲，对湘鄂西党和革命力量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

62. 冯白驹与琼崖苏区根据地

冯白驹(1903—1973)　海南琼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共琼山县委书记、琼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澄迈县委书记兼琼崖工农革命军中路第六路军党代表,参加琼崖武装起义。1930年任琼崖特委书记,坚持发展琼崖根据地,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8年先后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独立总队总队长、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主席、琼崖人民抗日游击独立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琼崖临时人民民主政府主席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海南区委书记、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岛解放后,历任中共海南区委书记、海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海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兼广东省副省长、浙江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候补中央委员。

开辟琼崖苏区根据地

1927年6月,中共琼崖特别委员会派委员冯白驹到琼山县,担任县委书记,负责重建党组织的工作,还兼任新成立的琼山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新的琼山县委确定了加快建立各区委和基层党的支部;组织短枪队,伺机打击敌人;编组武装队伍;开办短期训练班等工作方针。冯白驹在琼山、文昌交界地区走村串户,宣传和发动群众,重新组织农民武装,建立了100余人的农军,并连续捣毁敌人炮楼。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琼崖特委决定,从全岛各县武装中挑选出一部分,统一改编为"琼崖讨逆革命军",共700余人,冯平任总司令,杨善集任党代表。



琼崖根据地区域:琼崖五指山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1927 年 9 月,琼崖特委决定举行 1 周全琼岛的武装总暴动,中心是向大城镇进攻。10 月初,杨善集等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琼崖秋收暴动失败后,根据广东省委的指示,琼崖特委于 11 月在乐会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定进一步扩大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并决定将琼崖讨逆革命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冯平任总司令,王文明任党代表。会上,琼山县委书记冯白驹被选为特委候补委员。12 月中旬,成立了全琼岛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陵水县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万宁、乐会、文昌、琼山、安定、琼东等各县的工农暴动也陆续发动起来。

1928 年初,琼崖出现了第一次土地革命运动高潮。面对国民党广东蔡廷锴部的第一次“围剿”,4 月初,冯白驹领导的中路第六路军和根据地人民,共同奋起抵抗,经过几昼夜的激战,伤亡惨重,终因寡不敌众,撤退到乐会县第四区琼崖特委所在地。

全琼武装暴动的失败,给革命造成重大的损失,琼崖根据地的创始人和红军的领导者杨善集、徐成章、冯平等相继牺牲,琼崖革命转入低潮,但是,斗争并没有停止。1928 年 6 月,中共琼崖第三次党代会召开,选举产生新的琼崖特委,王文明任书记(不久,黄学增接任)。8 月,琼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乐会第四区举行,选举产生王文

明任主席的琼崖苏维埃政府。会议决定在根据地普遍开展土地革命，通过了临时土地法、劳动法、苏维埃组织法、保护工商业条例、惩治反革命条例和税收条例等法令。琼崖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标志着琼崖苏区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下，广东省委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仍强调进攻海口至嘉积市一带重要城市。1928 年秋，琼崖苏区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遭到严重失败。根据省委的指示，冯白驹和琼山县委帮助特委领导机关迁往海口，广东省委派黄学增担任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等为委员。此时，澄迈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陷于瘫痪状态，12 月，特委决定派冯白驹担任中共澄迈县委书记，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他亲自到琼山、定安、琼东等县，恢复和开展那里的工作，经过半年时间，澄迈县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中共琼崖特委书记

1928 年底，全琼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文明和琼崖独立团团长梁秉枢等率领苏维埃机关人员、红军和苏区部分群众，向母瑞山转移，开辟新的苏区根据地。母瑞山位于定安县南端，方圆 200 余里。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决定在母瑞山建立根据地，是明智的正确的选择。1929 年 5 月，在山上成立了大山乡苏维埃政府；6 月成立琼崖红军独立团。

7 月，在海口市的中共琼崖特委机关被国民党军警破获，黄学增等被捕牺牲，革命再次蒙受严重的损失。冯白驹得知这一消息后，一面召开澄迈县委会议，与各县领导人协商重建琼崖党的领导机关；一面到母瑞山找王文明，研究重建特委事宜，并建议：“立即召集各县联席会议，重建特委领导机关。”9 月，冯白驹和王文明在安定县内洞山召开琼崖各县委党组织代表的联席会议，总结了琼崖革命受挫失败的教训，提出要以井冈山根据地为榜样，确定当前工作的要点是：以广大农村为中心，迅速恢复各级党组织；巩固和发展农村山区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巩固苏维埃政权；发展壮大工农红军，坚持武装斗争，扩大红色区域；恢复和发展赤卫队、共青团、农民协会、妇女协

会、劳动童子团等革命群众团体，依靠群众进行长期革命斗争。会议决定成立中共琼崖特委临时委员会，选举王文明任书记，冯白驹为常委。因王文明身患重病(1930 年 1 月病逝)，由冯白驹担任临委书记，主持全面工作。

冯白驹和特委重点抓住 3 件大事：一是发展红军，进行武装斗争；二是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三是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经过近一年的斗争，母瑞山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除红军发展独立团外，还办起了 3 个农场、1 所军政学校、1 所红军医院和军械厂。

冯白驹赴上海参加中共广东省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归来后，在广东省委代表邓发的指导下，1930 年 4 月，在母瑞山主持召开了琼崖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他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和省委的会议精神。大会决定：开展红五月攻势计划，在全琼实行武装暴动；发展和扩大革命根据地，恢复和健全各县苏维埃政权；发展和集中武装组建工农红军独立师；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发动兵变和兵暴；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各种剥削和压迫的斗争。大会还决定将临时特委改为琼崖特委，冯白驹当选为特委书记，这次大会成为琼崖第二次土地革命运动高潮的起点。

母瑞山的艰难岁月

琼崖特委虽然受到“立三路线”的影响，使革命蒙受重大的损失，但时间不长，况且冯白驹和特委注意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没有去打海口、嘉积等大城镇，工作重点放在开展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上面。1930 年 7 月，特委决定将琼崖独立团扩编为琼崖工农红军第二独立师，并建立了女子军特务连(后称“红色娘子军”)。特委还在乐会第四区创办了琼崖高等和初级两所列宁学校。到 1931 年底，红军发展到 2 000 余人，各县地方武装达 6 000 余人。不仅恢复了琼山、文昌、定安、澄迈、琼东、乐会、万宁、陵水 8 县的苏区，还开辟了临高、儋县、昌感等新区。红色政权地区的人口达 100 万，琼崖苏区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

然而，到 1932 年夏秋，敌人继续向母瑞山等地发动大规模“围

剿”。经过10天恶战，红军弹尽粮绝，琼崖特委与省委、党中央联系已中断，党和苏维埃各级组织陷于解体。危局迫眉，特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主力突围。但突围部队遭敌阻击，伤亡惨重。这时，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统治下，琼崖红军从万人下降至100人左右，根据地失去90%以上。琼崖的革命斗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

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留在母瑞山的特委书记冯白驹、苏维埃政府主席符明经等带领100余人，继续坚持斗争。他们缺衣少粮，不得不以野果野菜充饥，以树叶蕉叶作被褥，残酷的斗争和恶劣的环境夺去了许多革命者的生命。但是，他们并没有灰心，始终抱着革命的乐观主义，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山上坚持斗争长达10个月，最后只剩下冯白驹等26人。1933年夏，冯白驹带领20余人突围下山，到达琼山县，开始投入新的战斗。周恩来后来高度评价说：“冯白驹同志是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63. 邓子恢与闽西苏区根据地

邓子恢(1896—1972) 福建龙岩人。早年留学日本。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回家乡从事农民运动,任中共龙岩县委宣传部长。后任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兼任红十二军和红二十一军政委,是闽西苏区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1年后,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财政部部长。中央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守闽西,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部部长、民运部部长,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开辟了豫皖边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4师政治委员、中共淮北区党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华中分局书记兼华中军区政治委员、华中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共华东局副书记兼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共华中局第三书记兼中南军区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南局第三书记兼中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七至九届中央委员。主要著作收入《邓子恢文集》。

从龙岩暴动到创建闽西红军

大革命失败后,闽西的革命运动遭受很大的摧残,而龙岩县的农民运动,在郭滴人、邓子恢等领导下,却依然高涨,全县有三分之二的地区成立了农会,会员达10万人。根据八七会议精神,1927年11月,中共龙岩临时县委成立,罗怀盛任书记,郭滴人任组织部长,邓子恢任宣传部长。12月,平和、上杭、永定3县,也相继成立了县委。而

后，福建各县党的负责人在漳州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会议确定了“争取群众、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的斗争方针。邓子恢对家乡农民说：“要过好日子，只有团结起来，打倒豪绅地主，不要说减租减息，就是不要交租不要还债也有办法。”农民听后，情绪异常激动。

龙岩农民起义地点：闽西龙岩县的后田村

经过缜密的准备，1928 年 3 月 4 日，罗怀盛、郭滴人、邓子恢等领导龙岩县后田村的农民举行暴动，旋即将暴动武装改编为龙岩游击队，这是闽西最早的一支游击队。接着，朱积垒等在平和的长乐，傅柏翠等在上杭的蛟洋，张鼎丞等在永定的溪南，领导各地农民武装暴动，开始了以溪南为中心的闽西最早的武装割据。不久，这些暴动虽被福建军阀残酷镇压下去，但为创建闽西红军和苏区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农民暴动受挫后，根据邓子恢的建议，永定县委将一部分农民武装组建 1 个营，张鼎丞任营长，邓子恢任党代表，这是闽西最早的一支红军部队。7 月 15 日，根据福建临时省委的指示，永定、龙岩、上杭、平和 4 县党组织负责人在溪南召开会议，成立了闽西临时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郭柏屏任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任宣传部长。“暴委”由省委派王海萍任总指挥，邓子恢、张鼎丞、傅柏翠为副总指挥。随即将龙岩、上杭、永定各县暴动武装合编成红军第七军第 19 师，下辖 3 个团。溪南武装编为第 57 团，张鼎丞任团长，邓子恢兼任党代表。从此，闽西革命武装斗争开始统一起来。

溪南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于 8 月中旬举行，建立第一块红色政

权——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张鼎丞任主席。颁布了土地法、劳动法、肃反条例、婚姻条例等新法令。邓子恢分工负责领导分田斗争。分田是群众当时最迫切的要求，在毫无经验和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邓子恢和张鼎丞开座谈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和农民代表共同商议，根据大多数群众提出的意见，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分田政策和办法，主要是：除自耕农土地不动外，其余所有土地全部没收；以乡为单位，以本乡人民现有耕种的土地，作为本乡的土地所有权，归本乡人口（包括地主、富农，但反革命分子除外）平均分配土地；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以各户现耕土地为基础，按全乡每人平均应得的数为依据，有多的抽出来，不足的补给他）去实行分配。这些政策和办法，与后来中央公布的土地法基本相同。

这些土地政策，先在金砂乡作典型试验，然后在全区范围内推广。不到1个月，全区13个乡近2万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1928年底，溪南区苏维埃政府和闽西临时特委被迫转入隐蔽斗争，邓子恢回龙岩指导工作。

中共闽西特委书记

1929年2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3 000余人，从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与闽西地方党和红军密切联系和配合。3月14日，红四军击溃军阀郭凤鸣旅2 000余人，旅长郭凤鸣毙命，占领了长汀县城，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红四军入闽，为创建闽西苏区根据地提供了有利条件。福建省委得知红四军入闽消息后，强调要特别注意上杭、长汀、龙岩、永定4县的工作，以及加强军事工作和建立苏维埃政权，造成赤色区域之势力割据。3月下旬，福建省委决定恢复闽西临时特委，邓子恢任特委书记。

由于军阀陈国辉部主力南进广东地区，准备对粤军开战，造成闽西敌军兵力一时空虚。4月，邓子恢将闽西两年来的斗争历史和敌我情况写成报告，送往在江西宁都的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请求红四军尽快入闽，帮助开展斗争。毛泽东、朱德决定红四军第二次入闽。5月下旬，红四军首克龙岩县城；再占永定县城，建立永定县革命委员

会，张鼎丞任主席。6月3日，红四军再占龙岩城，成立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邓子恢为主席。19日，红四军三克龙岩，全歼守敌陈国辉旅2 000余人；随后又在上杭白砂消灭闽西军阀卢新铭之一部。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各纵队分别在龙岩、永定、连城、上杭、长汀、武平6县进行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帮助建立红色政权。至此，以龙岩、永定、上杭3县为中心的闽西苏区根据地初步形成，闽西革命运动进入了新的时期。

当红四军第三次占龙岩时，已离开红四军前委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对邓子恢说："闽西局面已经大定，特委对各地工作要有个纲领才好。"邓子恢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并结合闽西的斗争经验，起草了一个土地革命斗争纲领，内容包括：取消租债，分配土地，男女平等，自由结婚，保护商店等。7月，由闽西各县地方武装组建的红军第七军19师2 000余人，改编为红军第四纵队，傅柏翠任纵队司令，张鼎丞任党代表。第四纵队配合主力红军开展闽西斗争，取得了许多胜利。

为了指导闽西各县的斗争，7月下旬，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杭蛟洋举行，红四军前委代表毛泽东亲临大会指导。毛泽东在报告中赞扬闽西革命斗争的成就，分析了革命形势，进一步指明坚持和巩固闽西根据地的有利条件，大大鼓舞了与会者的斗争信心。邓子恢代表中共闽西特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回顾了闽西自大革命以来的战斗历程，总结了闽西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进行斗争的经验，指出了闽西党的发展方向。大会通过了邓子恢起草的长达近2万字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以及苏维埃政权、土地问题、共青团、妇女问题等5项决议案，确定了"坚决的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的总路线，为闽西党和人民指明了斗争的方向。大会推举邓子恢、郭滴人、张鼎丞、谭震林等15人为特委委员，邓子恢当选特委书记。

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

在毛泽东、邓子恢等领导下，闽西苏区获得了迅猛发展。1929年下半年至1930年上半年，闽西各县先后举行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

苏维埃政府。闽西苏区范围扩大到龙岩、上杭、永定、武平、连城、长汀6县之间，80万农民分得了土地，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很大发展。此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加紧向闽西根据地发动第二次闽粤赣3省“会剿”。为了打破敌人的“会剿”，12月红四军古田会议后，第四纵队编入红四军，张鼎丞率领红四军撤离闽西征战江西；邓子恢则担负起坚持闽西苏区斗争的主要领导责任。

为了加强对红军和根据地的统一领导，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1930年2月上旬，邓子恢领导召开中共闽西特委第二次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关于工人问题决议案》等提案。原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五、六军及领导所辖各小块红色区域的共同前委，邓子恢等17人为委员，毛泽东任书记。3月18日是巴黎公社纪念日，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隆重举行。这一天，闽西苏区的人民欢天喜地，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庆祝工农政府的诞生。大会通过了《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会议宣言》和军事、经济、财政、文化等5个决议案和16项法案、条例。邓子恢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经济委员会主任。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闽西苏区根据地的正式形成。

为进一步加强地方红军建设，第四纵队随红四军转战赣南后，闽西特委把地方红军和各县赤卫队，依次编为红九军第1至5团，共3 000余人。1930年5月，又将红九军正式编为红军第十二军，邓子恢兼任政治委员，同时兼任新开办的红军学校政委。6月初，红四军第三次入闽时，新组建红军第二十一军，邓子恢任政治委员。

在邓子恢等领导下，闽西苏维埃政府积极采取贯彻土地政策，重新调整土地；平定粮价；设立工农银行，稳定苏区金融；组织劳动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有力措施。6月中旬，毛泽东在上杭南阳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邓子恢在会上介绍了在闽西土地分配上实行“抽多补少”的基础上，又创造了“抽肥补瘦”的经验，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与会者的称赞。会议正式规定：“应该于‘抽多补少’之外还加上‘抽肥补瘦’一个原则。”邓子恢又将这些经验写入这次会议通过的《富农问题》决议里，并为会议起草了《流氓问题》决议。会后，邓子恢担任省委农村巡视员，到莆田、福安、连江、漳州等地工作。

截至1930年7月，闽西苏区根据地的范围，包括龙岩、永定、上杭、长汀，及平和、连城、武平之一部分。全苏区纵横300里，人口约85万，建立了6个县、62个区、557个乡的苏维埃政府；党组织发展为8个县区、53个区委、19个特支、546个支部，党员有1万人左右。闽西苏区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64. 曾山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

曾山(1899—1972)　江西吉安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吉安县农民协会常委。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8年任中共吉安西区区委书记、中共吉水县委书记。1929年任中共赣西特委组织部长、赣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0年任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委员长、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1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内务部长、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兼江西军区政治委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江西坚持斗争。1936年赴莫斯科入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回国,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中共东南局、华中局组织部长等职。新中国建立以后,历任中共华中局组织部部长、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纺织工业部部长、商业部部长、中共中央交通工作部部长、内务部部长等职。是党的第七至九届中央委员。

赣西地区的主要领导人

1927年赣西南各地农民起义失败后,党的活动被迫秘密转入地下。1928年初,中共吉安西区区委书记曾山,经过艰苦的群众工作,先后建立了16个党支部,并领导吉安西路山区的农民举行暴动。在此前后,他还担任过泰和边区区委书记、永福区委书记等职。农民暴动失败后,5月,曾山调任吉水县委书记。

中共赣西特委于1929年春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曾山当选为特委委员。10月,赣西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曾山任委员长。11月,为了营救赣西被捕的党团员,赣西特委准备攻打吉安城,指派曾山兼

任延福区委书记。月底，中共赣西、湘赣边特委合并为赣西特委。在赣西特委领导下，吉安、吉水、峡江、安福、分宜、万安、泰和、永新、莲花、宁冈 10 个县，召开赣西临时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曾山当选为主席。年底，赣西和赣南区域已连成一片，初步形成了赣西南苏区根据地。

1930 年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由闽西回赣西。为了统一和加强对各红军部队和各革命根据地的领导，2 月上旬，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红五军、红六军军委和赣西特委联席会议，曾山以赣西特委代表的身份出席了会议。会议推举毛泽东、曾山、刘士奇 3 人为主席团。会议讨论政权、土地、武装、组织、行动等重要问题。会上，对于土地分配问题争论不休，刘士奇、曾山等主张平分土地；省委委员江汉波、特委委员李文林等主张按耕作能力分配土地。毛泽东根据闽西工作经验，赞成平分土地，以便争取大多数群众。会议以“夺取江西全省”为主旨，确定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工农武装的三大任务。决定将原红四军前委扩大为指挥湘、鄂、赣、闽、粤斗争的共同前委，指定毛泽东、曾山、刘士奇、朱德等 5 人为前委常委，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会议还决定将赣西、赣南两个特委合并，组织赣西南特委，以适应斗争的需要。陂头联席会议为江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会后，赣西县区苏维埃召开联席会议，将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是时，曾山率领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在水南、值夏一带，一举歼灭了进犯苏区的国民党唐云山独立 15 旅，取得了首次攻打吉安的胜利。

赣西南特委对曾山这一时期的实际表现很满意，曾有如下评价：“党的政治主张很明了，而很积极坚决的去干，在实际斗争中得到很多经验，确能独当一方指挥工作。并且接受党的批示非常的迅速。”

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委员长

根据陂头会议的决定，1930 年 3 月下旬，在吉安富田召开了历时 8 天的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山参加了大会决议的起草工

作，是政治、青年两个决议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会议选举产生了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为特委书记，曾山、李文林等17人为特委委员。会议决定召集全省工农兵代表会议，建立江西全省苏维埃政府。根据大会的决议，赣西苏维埃政府改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委员长，机关设在吉安陂头。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设立经济、保险、军事、裁判、交通等部和秘书处，并设立中路、西路、北路、东河、西河5个办事处，作为派出机关。各办事处下属县、区、乡等各级政府。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陂头会议后的半年内，各地纷纷建立起工农革命政权，武装迅速发展，普遍分配了土地，开创了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新局面。曾山因参加前委，随红四军到广东南雄一带作战时，接到被派出席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的通知，即从南雄赶赴上海参加中央会议。7月，他与赣西南苏区另一名代表李文林回到赣西南，曾口头向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传达了会议精神。8月上旬，李文林主持召开赣西南特委第二次全委会议，传达并接受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刘士奇进行错误的批判，撤销了他的特委书记职务。会议改组了赣西南特委，曾山为书记。会后，将赣西南党、团特委合并，成立以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虽然接受了“立三路线”，但仍有许多人在实际工作中坚持正确路线，因而没有造成严重影响。7月之后，曾山以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的名义，接连发布了数十道“通告”、“紧急通知”和“紧急通令”，布置地方武装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做好准备红军主力攻打吉安城的有关事宜。为了配合攻打吉安，赣西南特委和苏维埃政府动员了赣西各县10万工农群众和地方武装，协助红军战斗。

在曾山率领的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配合下，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进占赣西重镇吉安城，这已是第九次攻打吉安了。夺取吉安后，取消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江西苏维埃政府。10月7日，在吉安城召开10万群众庆祝胜利大会，宣布成立江西苏维埃政府，由

曾山、方志敏、毛泽东、彭德怀、陈毅、朱德等53人组成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曾山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在庆祝大会上，发布了江西苏维埃政府《宣布本府成立及政纲》的布告，称："本府为代表江西劳苦群众的利益和要求，完成全省总暴动，争取江西首先胜利，于庆祝赣西南暴动胜利，万众欢腾的盛会当中，宣告成立，公布法令政纲，及对内对外宣言，本府为应付斗争需要，担负完成全省总暴动的一切的任务，系临时组织性质，当于最短期间，召集全省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并颁布了省苏维埃政府的政纲13条，内容包括：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收回九江庐山租界；消灭军阀制度，完成全省总暴动；消灭反动政权，武装革命工农群众，扩大红军一百万；执行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会议所颁布的土地暂行法，完成江西全省的土地分配，等等。省苏维埃政府下设秘书处、军事、财政、土地、教育、内务、外交、劳动、建设、司法等各专门委员会，行使各部门职权。

至1930年秋，赣西南苏维埃区域已发展到34个县，由南丰到永新，由寻乌到峡江，由赣州到吉水，纵横数千里的江西半壁，农会组织有400余万人，赤卫队40余万人，少年队35万人，儿童团30万人，红军预备队12万人，与闽西、东江、湘东、鄂南等几块红色政权相连。赣西南苏区已由原来零星的红色割据区域，发展成为实占江西全省80%左右的革命根据地，从而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65. 王明与六届四中全会

王明(1904—1974) 原名陈韶玉。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中大工作期间,进行过宗派组织活动。1929年3月回国后,在上海从事宣传工作。1930年发表《两条路线》,提出"左"倾政治纲领。同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实际上取得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权。后赴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1937年11月回延安,坚持抗战中的右倾错误主张。先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1月去苏联。是党的第七、八届中央委员。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苏联写了许多反共反华的文章。1974年病死于莫斯科。主要著作收入《王明言论选辑》。

投反"立三路线"之机

1929年4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到达上海,先后在沪东区委和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他将共产国际的旨意奉若神明,抛售其"左"倾思想和主张,以表示自己对于共产国际路线的忠诚。在不到一年时间里,在党内刊物《红旗》和《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

王明1930年1月出席上海工人联合会的一次会议时,共24名与会人员不幸全部被英租界当局逮捕。王明因向巡捕暴露了中共中央宣传部机关而被交保释放,其余被捕的大多数人却牺牲在国民党的屠刀之下。2月下旬,王明出狱后,向党中央承认了错误。党中央决

定给他以党内警告处分，并调他到全总党团任秘书，以作进一步的考查，希望他能真诚地改正错误。5 月，党中央又把王明调回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但是王明执迷不悟，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处心积虑地寻找实现其个人野心的时机。

是时，国民党新军阀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爆发中原大战，客观上加速了革命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党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头脑膨胀，连续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目前已“日益接近新的革命高潮”，“在全国革命高潮下，革命有在一省与几省首先胜利的可能”。王明、博古等曾找李立三和其他政治局领导人谈话，对李立三的主张提出反对意见，但李立三批评王明等人的意见，是“危险的机会主义倾向”。随后，李立三为政治局会议起草了 6 月 11 日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左”倾冒险主义的主张。在 6 月底 7 月初召开的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王明、博古等 4 人又提出反对政治局 6 月 11 日决议和李立三的错误主张。李立三十分恼怒，用“反党宗派活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等大帽子，企图将王明等人压下去，并立即撤销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等一切工作。然而，王明等人因背后有共产国际撑腰，有恃无恐，继续坚持对于中国革命形势与任务的“左”倾意见，结果李立三统治的中央给予王明留党察看 6 个月的处分，将其由中央机关下放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其余 3 人也被严重警告，调往河北、广东等地工作。

“六·一一”决议通过后，不仅遭到王明、博古等人的反对，而且也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可是，李立三因红三军团 7 月底攻占长沙的胜利而冲昏了头脑，于是决定立即举行上海总同盟罢工和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共产国际反对并即刻打来电报制止这一冒险计划，李立三非但公开拒绝共产国际的指示，反而指责国际不了解中国党的内部事务。这引起共产国际大为恼怒，决心把李立三赶下台，扶持王明等人上台。

抛出《两条路线》的“左”倾纲领

为了纠正李立三“左”倾错误，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瞿秋白、周

恩来于1930年8月被派从苏联回国。9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对于结束“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对“立三路线”的实质并没有给予彻底清算和纠正。共产国际以此为借口，大摆其“太上皇”的架势，粗暴地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路线问题，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李立三于六届三中全会后离开了领导岗位，10月初离开上海赴莫斯科。

本来王明、博古等曾表示拥护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但得知共产国际反对三中全会的消息后，曾受过李立三的打击和处分的王明，以为报复和翻案的时机已到，于是接二连三地给中央政治局写信，公然要求撤销其处分。在六届三中全会后，王明公开打出“反对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的旗号，并利用被李立三停止工作的空闲时间，撰写了《两条路线》意见书（后改名《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于1931年2月在上海出版。这本小册子集中火力攻击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把“左”倾的立三路线说成是“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理论与实际”；大批瞿秋白和六届三中全会的调和错误；在中国社会和阶级关系、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党内斗争等问题上，提出更加“左”倾的理论与纲领。王明当时就声称：“的确曾经起过相当的反立三路线及对立三路线的调和态度的纲领作用”。这一小册子，也就成为王明一伙上台的政治资本。

依仗米夫扶持上台

王明与米夫关系密切，由来已久。早在1925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就深得时任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赏识与器重。1927年初，米夫随共产国际代表团到中国时，曾带着尚未毕业的王明担任翻译。米夫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和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后，安排王明参加1928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的工作。王明从此青云直上，成了中山大学支部局的负责人。王明当时不仅是一个教条主义者，而且进行宗派主义活动，他利用其控制的中大支部局，诬陷不赞成其主张的原支部局成员俞秀松等人。王明回国后，与米夫一直保持着密电往来。

正在为解决“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路线”问题而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时，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来华，直接插手中共党内事务，以保证王明上台。米夫到达上海后，单独召见王明，打算为王明翻案。在米夫的压力下，1930 年 12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嗇、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宣布“过去对陈韶玉等四同志的斗争与处分是错误的，现在除正式取消对他们的处分外，并将此错误揭发出来，以加重韶玉等四同志对立三路线之不调和的斗争的责任。”接着，委派王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一瞬间，王明竟变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

在米夫的策划和操纵下，1931 年 1 月 7 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共 37 人出席。会议限定开 15 小时，差不多有 30 余人讲话，所以每人发言不得超过 15 分种。会前，米夫为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全会决议案》，圈定了出席会议的代表，并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名义拟定了改组后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名单。向忠发宣布全会开会后，立即遭到罗章龙等人的反对，他们要求在国际代表领导下，改期召集紧急会议，但被米夫否决。在讨论向忠发所作的《中央政治局报告》时，王明作了长篇发言，重复《两条路线》中“左”倾教条主义的基本观点：一、“立三路线”是“左”倾空谈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消极，在每个问题上都表现得极为明显。二、指责三中全会在接受国际决议的名义下，对“立三路线”公然采取调和态度，实际上是继续“立三路线”。三、提出只撤换几个中央领导人是不够的，必须在全党开展政治斗争，全面彻底地改造党，特别应以反三中全会反调和路线的“斗争干部”、“工人干部”来代替“旧干部”。四、强调全党尤其是要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米夫在作结论时，更对王明等人赞誉有加，说“他们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的”。四中全会实际上批准了王明的“左”倾纲领《两条路线》。为了改造中央及政治局领导机关，会议提交了两份名单：一份是由米夫拟定，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和中央政治局名义提出的；另一份是罗章龙等人策划，由韩连会提出的。表决结果，远东局的名单获得多数通过。选举王明为新的政治局委员，又补选王明为新的中央委员。这样，本来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王明一步登天，竟然进入了党的最高决策领导核心。不久，王明当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名义上向忠发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实际上

大权由王明独揽。

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9 月在上海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王明于 11 月离开上海到达莫斯科，作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和共产国际负责人之一，继续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影响。自王明上台以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党内统治长达 4 年之久，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严重的危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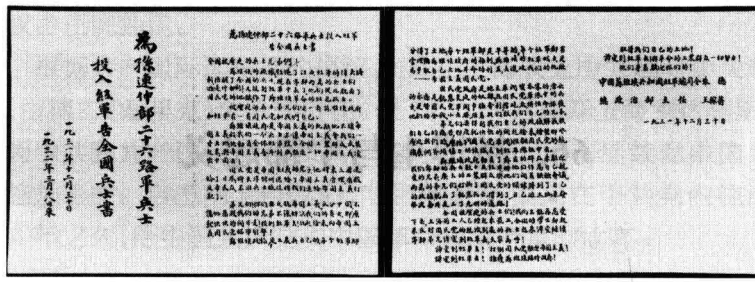
66. 赵博生与宁都起义

赵博生(1897—1933) 河北黄骅人。1917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第六期。在冯玉祥西北军,历任团副、旅长、军参谋长等职,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1931年在孙连仲二十六路军任军参谋长,奉调至江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受苏区革命影响,1931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2月与董振堂、季振同等率二十六路军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部队改编为红军第五军团,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后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屡立战功,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一级红旗勋章。1933年1月在江西与国民党军作战中牺牲。

起义前加入中国共产党

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原属冯玉祥西北军,下辖两个师,约3万人。1930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西北军战败后,被蒋介石收编,驻守山东济宁、菏泽一带。这支武装曾参加过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军中有刘伯坚等一批共产党员做政治工作,广大官兵接受革命的影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强烈不满,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也有一定的认识。

1931年1月,蒋介石令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率两个师2万余人从山东调往江西,对中央苏区实施第二次"围剿"。在"围剿"失败后,蒋介石马不停蹄地加紧布置第三次"围剿",令二十六路军于7月进驻宁都县城。9月,第三次"围剿"又被红军彻底粉碎。第二十六路军广大官兵到江西后,受到苏区革命和共产党宣传的影响,普遍厌倦内战,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赞成中共关于停止内战,反蒋


为张逆伸部二十六路军兵士投入红军告全国兵士书

宁都起义后发布的《告全国兵士书》

抗日的主张，希望早日离开江西前线，返回北方家乡去。

第二十六路军初到江西时，共产党员只有刘振亚1人，开展秘密活动。为加紧开展兵运工作，中革军委派王超为驻二十六路军特派员，联络刘振亚、袁汉澄（血卒）、李肃等地下党员，分头到二十六路军开展活动。一面利用军中各种矛盾，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政治宣传，激发官兵们的爱国热情；一面在军中建立中共特别支部委员会，刘振亚任特支书记，秘密发展组织。起义前，全军已发展共产党员20余人，并控制了一些机要部门，为宁都起义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到江西后，曾两次派人找共产党组织接头，1931年9月终于在宁都找到了党的关系。中共特支指派译电主任罗亚平找赵博生谈话时，赵表示加入共产党的强烈意愿，坚定地表示："我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别看我是参谋长，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10月，经上海中共中央批准，赵博生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使党控制了二十六路军的指挥机关和要害部门，对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的作用。

组织策动部队起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赵博生进一步了解到共产党的抗日反蒋决心和土地革命的主张，更坚定了率部起义加入红军的决心。是时，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特派员王超调回上海途经南昌时，因党在南昌的接头机关被破获，误将特支的机密文件交给了敌人。12月5日，国民党南昌行营密令二十六路

军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3名共产党员，星夜解送南昌行营惩处。因孙连仲到上海休养，电报落到主持二十六路军工作的参谋长赵博生手中，这样，“密令”反成为宁都起义的导火线。

局势万分紧迫，尽快策动全军起义，投奔红军成为当时惟一的选择。赵博生与特支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坚决的行动，与中央苏区取联络；积极准备并扩大暴动。赵博生分工负责应付南昌行营的压力，作好联合第25师73旅旅长董振堂，争取74旅旅长季振同共同起义的工作。赵博生与董、季是保定陆军学校同学，又是河北同乡，他利用这种关系，先联合董，又与董一起争取了季，使党基本上控制了第二十六路军的指挥权。

紧急会议后，一面加紧对学兵连、特务连等4个连的训练和武装的准备；一面派袁汉澄去瑞金向中革军委汇报情况。中革军委主席朱德接见了袁汉澄，并专门召开会议，听取袁的汇报，制定出“尽最大力量争取二十六路军全部起义”；“暴动的时间定于12月13日夜12时”；“起义后部队改编为红军第十六军”等7条对策。赵博生派去的另一名代表郭如岳也到了瑞金，捎给中革军委秘书长刘伯坚的信中表示：“认清了只有共产革命是中国惟一的出路”。刘伯坚于12月7日致信季振同、赵博生、董振堂等，指出：“只有回来高举着苏维埃的红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军阀作一拼命的死战，才能求得中国民族的解放与统一。”并告知，中革军委各负责同志“都十分热烈的期待着诸位同志前来共同携手为革命奋斗”。11日，刘伯坚再复信给季、董、赵3人，转告中革军委对于起义的最后部署，除委任干部外，指示：“暴动时间必须在拾叁号拂晓。”“必须在抓住可能的条件很坚决的说干就干，不容有丝毫犹豫”。

特支在接到中革军委的指示后，12日，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在宁都南山开会，就举行暴动事宜作了周密部署，推举季振同为起义总指挥。晚8时，赵博生、董振堂、李青云、袁汉澄等开党内会议，议决起义的具体部署。赵博生提议，将起义总指挥部及电台、一部分现款搬到74旅旅部，他本人随总指挥部行动，以坚定季振同、黄中岳的决心。赵博生还趁点名发饷的机会，向官兵作了广泛的政治鼓动。为了争取已运到广昌的棉衣和薪饷，季振同主张把起义日期推迟一天。报经中革军委的批准，同意起义时间推迟到14日。

起义胜利实现

根据行动部署，12 月 14 日黄昏时分，赵博生、董振堂等率领第二十六路军 1.7 万官兵举行武装起义。是时，全城调换岗哨，实行戒严，赵博生亲手书写“解放”两字，作为口令。当晚，赵博生以参谋长的名义在耶稣堂牧师住宅开紧急会议，并“宴请”团以上的军官，赵博生发表讲话，称：“现在士兵痛苦到万分，为士兵计，我们应取革命行动，大家去当红军。”当场解除了多名军官武装，宣布全军加入工农红军。季振同、董振堂、李青云、袁汉澄、刘振亚等按计划分头行动，对总指挥部、师部、旅部、电台、电话枢纽、兵站及交通要道等，配备足够的兵力加以监视、控制和占领，缴获步枪 1 万余支。起义胜利实现后，发布了由刘伯坚起草的《原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宁都起义加入红军的宣言》(即《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宣言》)，通电全国，郑重宣告：“我们永远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指挥，永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打倒国民党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完成中国民族的解放和统一。”这一天，江西彭湃(即旧宁都)县城上空，飘荡着印有镰刀铁锤的红旗。

按照中革军委的原定计划，起义部队于次日晨离开宁都县城，开往彭湃县苏维埃所在地固厚。16 日凌晨，刘伯坚代表中革军委，向起义官兵宣读了将起义部队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的命令和毛泽东、朱德签名任命红五军团及所属各军领导人的委任状，季振同任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后又委任萧劲光任军团政治委员，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随后，董振堂、季振同、黄中岳等一批起义领导人，很快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宁都起义是土地革命战争中最大的一次“兵暴”，沉重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气焰，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整个起义中，得到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中革军委领导人的全力支持和正确指导；掌握实权的关键人物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对争取国民党军队转到革命方面来起了决定的作用。

1932 年赵博生领导红五军团在粉碎敌人第四次反“围剿”战斗

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战功卓著，在纪念红五军团成立一周年的时候，12 月 4 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王稼祥、彭德怀签发了《中革军委关于嘉奖宁都暴动干部战士的通令》，指出："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士兵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群众的走向革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目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更加崩溃与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批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是革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并通令各地在广暴纪念中同时举行纪念宁暴，并给予领导宁暴的董振堂、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的最荣誉的红旗章，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暴的五军团全体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

毛泽东十分关心宁都起义。1937 年，他在延安接见了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并在合影上亲笔题词："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这是对宁都起义的最好评价。

67. 王稼祥与红军政治工作

王稼祥(1906—1974) 又名王稼蔷。安徽泾县人。1925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考入红色教授学院。1930年回国后,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红旗》和《实话》总编辑、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等职。1934年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遵义会议后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成员之一。1935年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政治部主任。1937年赴苏联医治伤病期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8年回到延安,先后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华北华中工作委员会主任、八路军军政学院院长。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1947年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宣传部代理部长。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递补为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中共八大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四届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收入《王稼祥选集》。

总政治部首任主任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稼祥主动请求赴苏区根据地工作,3月,他同任弼时、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在艰苦的环境里接受新的锻炼和考验。11月25日,刚成立不久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布组成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朱德任主席,王稼祥任副主席兼任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主持总政治部工作期间,尽管不可避免地受到王明"左"倾错误的影响,但他继承

古田会议精神，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制定和发布了许多有关红军政治工作的指示、决议、条例、训令、文告等文件，并且在百忙中还写了一些文章，对红军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1932 年 1 月 19 日，王稼祥以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出指示信，首次明确提出了“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的概念，他批评过去苏区的党犯有“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的错误，指出：这样做，“结果就取消了红军中政治委员的领导作用，取消了政治机关和军事机关的独立工作”。强调：“党要在路线策略上来领导革命，在执行路线的工作中来领导群众。”“坚决的反对党包办一切及事务主义，加强党的自身教育，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提高并巩固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以及“巩固红军中的纪律”。“这是目前红军中党的最中心任务。”

为了粉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第四次大规模的“围剿”，1932 年 10 月 27 日，王稼祥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关于粉碎敌人大举进攻的政治工作训令》，提出加强政治工作的具体要求：一、在红军中：要求指战员明了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严重性；扩大与巩固红军，增强红军的战斗力；保证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用党的统一意志来领导红军。二、在敌军中：中心任务是争取白军士兵群众，瓦解敌军。三、在地方群众中：应加紧争取白区群众，争取苏区的扩大，优待红军家属，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区域，造成红军极巩固的后方。四、在地方武装中：为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在敌人两翼与后方动作，以破坏敌人的进行准备，阻止和牵制敌军的前进，并消灭更多的敌军，特别要加强在地方武装中的政治工作。11 月 23 日，王稼祥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了《关于在敌军中的政治工作训令》，指出：瓦解敌军，争取敌军中的士兵到红军方面来参加民族革命战争，这是战胜敌人最主要的条件之一。“为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各级政治部在红军战地群众及敌军中进行不疲倦的政治工作。”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总政治部还印发了《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与目前行动任务的宣传大纲》、《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与大举进攻的问题》和《目前宣传鼓动的中心口号》、《告战士书》等文件，作为政治宣传教育的主要材料。

中革军委 1933 年 5 月由前方移至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瑞金，在前方成立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8 月 11 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要求

根据党中央的决议立即在红军中进行政治动员，使全体红色战士了解“为土地而斗争”、“为苏维埃而战”、“为独立自由的苏维埃中国而战”的重要意义；加紧扩大红军动员的政治工作，使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涌入红军中去；健全赤少队这一后备军的组织，加紧军事教育和政治工作；加紧开展游击战争和白区工作等。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总政治部对战时政治工作又作出许多具体规定。9月10日，王稼祥发表《为保证红军在思想上的绝对一致而斗争》一文，指出：“在执行共产党的总路线，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决战中，工农红军有其特殊重要的和光荣的任务；为要使红军能够胜利的完成党给他的任务，必须使红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保证红军尤其是红军中的党在思想上的绝对一致”。他强调：只有“思想上的一致，才能保障行动的一致，才能保障战争中统一意志的实现”。这些训令和文章，对中央苏区红军反第五次“围剿”斗争中统一思想，鼓舞士气，起了积极的作用。

创办《红星》报

为了加强政治工作，王稼祥从实际出发，领导制定了许多重要的政治工作制度。1931年底，他领导总政治部制定并颁布了《各级政治机关编制系统表与组织及其工作纲要》。1932年12月，他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发布关于设立政治战士问题给各级政治部的训令。1933年冬，他领导红军总政治部拟定了《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明确规定了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目的、内容等，这是红军政治工作的第一个正式条例。该文件指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巩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使红军成为强有力的工农革命的武装力量”。“政治工作的目的是巩固红军的战斗力，红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是要靠他的阶级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人、农民，瓦解敌人军队，使广大工农群众环绕于红军的周围，在红军中，无论政治的、军事的和党的机关，都是向这惟一的目的来进行工作”。“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实施无产阶级的教育，使红军战斗员与指挥

员，明了红军之阶级的政治责任，与敌人作战的阶级意义，及对于地方居民之阶级的友爱与仇恨。”该文件共拟订出19个具体工作暂行条例，规定了从政治委员到连队政治指导员的职责，从总政治部到团政治处以及学校、医院、兵站等单位政治机关的工作内容。这一政工条例的制订，使红军政治工作更加完善和系统化。

在王稼祥主持下，1931年12月，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在瑞金创办了《红星》报（1932年1月改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由邓小平负责编辑（遵义会议后改由陆定一负责编辑），以加强对红军的宣传教育和交流工作经验。这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机关报，创刊宗旨是：“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与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大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使《红星》报成为“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红军中党的工作的指导员，政治工作的指导员”。这是中革军委当年惟一的报纸，目前已发现保存下来的有23期。该报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出版，大力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中革军委的各项指示，大量报道红军的重要战斗及中央苏区各地群众的斗争，对于提高红军广大官兵的觉悟，反“围剿”等各项工作的开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1932年至1934年，红军总政治部还出版了《政治工作》、《战士》、《党的工作》、《红星画报》、《政治简报》、《苏维埃政权》等政治性刊物。

主持红军首次全国政工会议

王稼祥在1934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为了总结几年来红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确定将来政治工作的方向与具体的办法，2月7日至12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瑞金主持召开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出席大会代表共258人，王稼祥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代表总政治部致开幕词，充分肯定了几年来红军政治工作的重大成绩，指出：“几年来，中国红军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经过很多的英勇战斗，把红军从游击队变成现在正规的红军，把很小的苏区发展成现在这样很大的苏

区。红军在几年艰苦斗争中坚强了自己，壮大了自己，积蓄了很宝贵的经验。”重申“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的重要原则，指出：“政治工作是我们红军的生命线，一切战争如果没有政治工作的保障是不能达到任务的。我们红军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工农，政治工作就是要提高红军战士与工农群众的积极性。政治工作是提高红军战斗力的原动力。”“我们要以政治工作的武器来巩固我们的部队，更加提高我们的战斗力，去消灭敌人，去完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把苏维埃的旗帜插遍全中国去！”会上，王稼祥还代表总政治部作《目前形势与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明确规定了红军今后政治工作的几项重要任务：一、要进一步巩固红军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巩固思想上的一致，在战争中统一意志，完成战争任务。尤其是各地红军应当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二、政治工作要保障每一个战斗的胜利，在战前所发现的问题要设法克服，战后发现不执行者，政治工作人员也要采取必要的方法来纠正。特别重要的是，政治委员、政治工作人员要保障上级命令的执行。三、要进一步提高军事技术和战术。要求政工人员不要说不了解战术，不了解战术就不配做政工人员。四、要加强红军纪律，这是红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要求做到：“第一，需要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以身作则；第二，需要政治工作人员同战士发生密切关系；第三，需要政治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对战士进行纪律教育，这是执行纪律的先决条件。”会议讨论了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教育、政治工作的作风、战时政治工作等 10 个问题，修订了政治工作条例。这次会议在中国红军建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后来的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的一些理论原则、方针和方法的发展与确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68. 徐海东与红二十五军长征

徐海东(1900—1970)　湖北黄陂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在黄陂地区坚持游击战争。先后任独4师师长、红九军27师师长、红二十七军79师师长、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74师师长、红二十八军军长等职,指挥长岭岗、斛山寨等战役,被誉为"虎将"。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后,改任副军长。1935年初进入陕南,为开辟鄂豫陕根据地和重建红二十五军作出了重要贡献。7月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率部西进甘肃,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和红二十五军政委。9月率部到达陕北苏区,与刘志丹等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军团长。抗日战争后,任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率部参加平型关战斗。1939年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1940年后长期养病。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八、九届中央委员。

撤离鄂豫皖苏区

红四方面军主力1932年10月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鄂豫皖省委决定,将留下来的一部分红军和地方武装,于11月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约7 000余人,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委,下辖两个师,徐海东任第74师师长。1933年2月,徐海东升任副军长兼74师师长。由于鄂豫皖省委执行中央"左"倾盲动错误,5月,红二十五军经黄安(今红安)县七里坪一仗,遭到重创,加上疾病、饥饿和"肃反"等,部队只剩下5 000余人。9月以后,红二十五军的两个师被分割为两部分:75

红二十五军的部分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第三人为徐海东

师由吴焕先率领到鄂东活动;74 师由徐海东率领退回皖西。10 月,74 师在向皖西转移途中,与皖西的 82 师会合,组建红二十八军,共 2 300余人,徐海东任军长,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兼政委。面对 10 万敌军对皖西的"进剿",徐海东等率领部队坚持皖西斗争约半年之久,由于接受了围攻七里坪的教训,先后打了几个漂亮仗,打开了皖西的局面,部队扩大到 3 200 余人。

1934 年 4 月,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会师,省委决定两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并决定在皖西、鄂东开展根据地工作。其间,部队在长岭岗一仗,歼灭东北军 115 师大部,俘敌 3 700 余人。9 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根据地,传达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进军西北,实行战略转移。是时,徐海东正率红二十五军主力在皖西与敌 47 师作战,部队伤亡很大。当徐海东接到中央要他们"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的指示后,无比激动地说:"这是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我们要坚决执行这个指示。"当晚即率部出发西进。部队从皖西到鄂东,冲破敌人的 4 道封锁线,在光山县斛山寨,遭到敌军 4 个师的包围,与敌展开一天的激战,击退敌人多次的进攻,俘敌 4 000 余人;红军伤亡也有数百人。

鄂豫皖省委于 11 月 11 日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举行会议,根据中

央的指示，正式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另辟新的根据地；转移的目标要选择地形好，敌人力量薄弱和群众条件好的地区。以徐宝珊为书记的鄂豫皖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一同西征。军长徐海东在这里见到了中央代表程子华，他听说程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便主动向省委提出，由程子华任军长。省委讨论后，同意了徐的建议，徐海东改做副军长。此时，红二十五军2 900余人，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开辟鄂豫陕游击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11月16日由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踏上了西进的征途，横越平汉铁路，进入鄂豫边的桐柏山区，后向豫西的伏牛山挺进。在西进途中，蒋介石调动30多个团的兵力前堵后追，妄图阻止并围歼红二十五军。其间，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曾多次遇险，在方城县独树镇战斗中，初战受挫，副军长徐海东率部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一次，徐海东一天没有吃饭，天又下着小雨，亲自抬伤员走了5里多路。鉴于在伏牛山区难以立足，鄂豫皖省委决定，直奔豫陕边界的商洛山区。在每次战斗前，徐宝珊和吴焕先总是要徐海东先提出个作战计划。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徐海东建议采取“先疲后打”的方针，省委决定不打硬仗，不拼消耗，打歼灭战。不久，在洛南县庾家河的激烈战斗中，徐海东、吴焕先均负重伤。这已是徐海东第九次负伤了，他昏迷了4天4夜才醒过来。

红二十五军翻越天谷山，于12月上旬进入陕南雒南（今洛南县）地区。全军指战员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冲破20倍于我之敌的围追堵截，历时20多天，长驱1 800多里，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任务。12月10日，省委在庾家河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由徐宝珊任书记、吴焕先任副书记，徐海东等为省委委员。至1935年1月底，红二十五军创建了郧西、旬阳、镇安、山阳4县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同时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郭述申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任游击司令。2月，二十五军重创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

柞水5县，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开创了第二块革命根据地。3月上旬，二十五军相继占领了宁陕、佛坪、洋县华阴镇等地区，创建了第三块革命根据地。至此，红二十五军驰骋于豫陕边、鄂陕边和华阳地区，创建了10个区46个乡的革命政权，先后组织了华阳、雒南两支游击队，初步建成豫陕边游击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4月中旬，蒋介石命令其部对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二次“围剿”。是时，省委在蓝田县葛牌镇召开扩大会议，总结经验，决定以“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为今后的任务。会后，红二十五军继续向东行动，发动群众组织雒南游击队，在洛南、商县、商南、卢氏一带，开创了第四块革命根据地。5月9日，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由吴焕先代理书记。就在这时，敌人以41个团的兵力对根据地分进合击，红二十五军指战员翻山涉水，连续4天急行军，共走了560里，进驻陕南黑山街一带。7月初，红二十五军在山阴县袁家沟口全歼来犯之敌，毙伤300余人，俘虏1 4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 000余支。全体官兵连日向西挺进，翻越终南山（秦岭），威逼西安，彻底打破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

最先与陕北红军会师

自鄂豫皖省委离开根据地后，便与党中央长期失去了联系。一天，从《大公报》上获悉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并有可能北上的消息，令徐海东和全军指战员喜出望外，兴奋不已。7月15日，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红二十五军应即离开陕南西征，陕南留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会议还决定将鄂陕边、豫陕边两特委合并，组成鄂豫陕特委，继续坚持鄂豫陕地区的革命斗争。

为牵制胡宗南的主力，红二十五军3 700余人在“积极前进，迎接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的口号下，7月16日，向甘肃挺进，北渡渭河，截断西（安）兰（州）公路，进占秦安县城。但这时仍得不到党中央和一、四方面军的确切消息，于是省委决定：“如果再打听不到

党中央的消息，就奔陕北，去会合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8月，部队进入宁夏地区，翻越六盘山，在泾川四坡村战斗中，年仅28岁的军政委吴焕先不幸牺牲，徐海东亲自为烈士洗身、穿衣、抬棺送葬。9月上旬，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进入陕北保安（今志丹）县豹子川，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改任政委、代理书记。全军3 400余人。随后，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边区军委主席刘景范等赶来热情会见。9月15日，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与陕北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等会合。至此，红二十五军历时10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4 000多里，胜利完成了第二次战略转移——长征。

红十五军团军团长

红二十五军和陕北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会合后，合编为十五军团，共7 000余人，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了红十五军团成立大会，周围几十里以外的群众都赶来参加，气氛十分热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对于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有着重大意义。

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红十五军团制定了反“围剿”作战计划，经过3天急行军到达甘泉附近。徐海东和刘志丹等察看了地形，并分头带领部队，进入劳山埋伏区。经过6个多小时的战斗，全歼敌110师，击毙敌师长和参谋长，俘敌2 000余人。劳山战役后，徐海东带领部队攻克榆林桥，消灭敌107师4个营。两仗过后，徐海东在率部攻打张村驿时，火速返回红十五军团司令部，与盼望已久的毛泽东、彭德怀会面了。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徐海东连夜赶回前线，指挥部队很快占领了张村驿。11月，红十五军团和中央红军会师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进行了直罗镇战役，歼灭109师全部和106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兴奋地称誉，这一仗是“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69. 张闻天与遵义会议

张闻天(1900—1976) 又名洛甫。上海南汇人。早年在日本东京、美国旧金山学习和工作。1925年加入共产党,1926年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红色教授学院学习。1931年2月回上海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9月被指定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33年迁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任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遵义会议后不久,在党内负总责。为党中央起草遵义会议决议、瓦窑堡会议决议等重要文件。1938年任延安马列学院院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东北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等职,致力于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是中共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主要著作收入《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

不满"左"倾错误的领导

1933年,张闻天从中共中央驻地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即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人民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是年秋,面对国民党百万大军对各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采取分兵把口、与敌人拼消耗的军事战略,使红军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张闻天作为党中央的领导人之一,在对待福建事变中同十九路军联合,广昌战役失败等一些问题上,同博古、李德等产生了歧见,双方往往争得面红耳赤。张闻

天曾不满地对担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说："李德这样指挥怎么行？这样能打胜仗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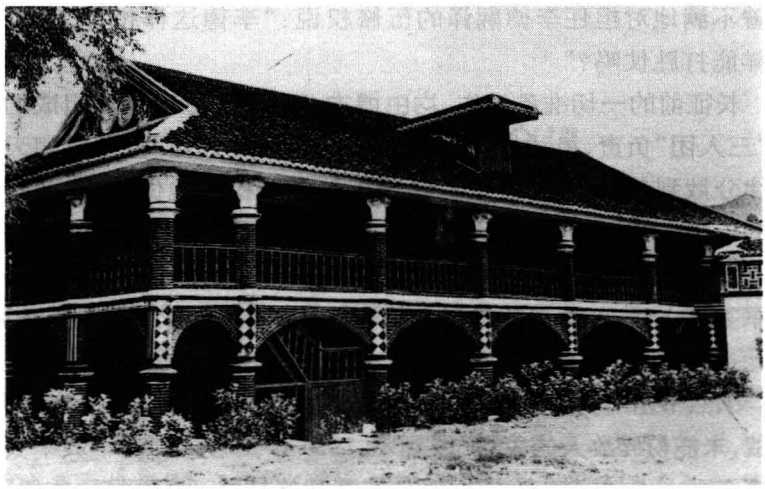
长征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均由博古、李德、周恩来3人组成的最高"三人团"负责，极为绝密。出发前，最高"三人团"要把张闻天等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使这些领导人处于无权的地位，这引起张闻天的不满。有一天，张闻天同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闲谈时，将自己对博古、李德的不满倾诉给毛泽东。从此，毛泽东要张闻天同他和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住在一起，经常交换意见，彼此接近起来。

果然不出所料，18万红军和20万游击队、赤卫队，经过1年浴血奋战，未能粉碎敌人的军事"围剿"。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留下项英、陈毅、瞿秋白等，坚守游击战争。西征开始后，红军通过国民党军的3道封锁线，当冲破第四道封锁线渡湘江时，遭受敌军的顽强阻击，致使红军损失过半，由长征开始时的8万余人减至3万余人。

长征开始后，张闻天与毛泽东、王稼祥3人一起被编在军委一纵队，随军行动，毛、王的身体都不太好，行军时坐担架。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严重损失，引起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对党中央领导层的怀疑与不满，一些曾犯过"左"倾错误的领导干部也开始觉悟起来。最先反对"左"倾错误领导的毛泽东开始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领导错误，并且认为，只要能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于是加紧做王、张转变思想的工作，使他们迅速站到反对"左"倾错误领导的立场上来。张、毛、王的思想渐趋一致，感情愈益亲近，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集团，在政治局内开始反对博古、李德的斗争。三人集团中，毛、王当时还不居于中央核心地位，只有张闻天的职务最高，这对于进行纠正"左"倾错误的斗争，起着特殊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

在湘、桂、黔交界行军途中，从1934年12月开始，"中央队"三人



遵义会议会址

集团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左”倾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批评博古、李德不顾敌情的变化，执意要红军部队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行动方针，也是错误的。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向周恩来提出：蒋介石在湘西已设置重兵，原定中央红军到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先机已失，建议向敌人薄弱的贵州前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对此，一路开会争论。

在12月12日通道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放弃原先决定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提出西进贵州创建新的根据地的建议。这一建议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与会多数人的支持，但遭到博古、李德的反对，所以没有作出新的决定。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黎平会议，对于红军进军方向问题，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支持毛的意见。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从而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问题，事实上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1935年元旦，中央政治局举行猴场会议，重申黎平会

议的决定。会后，在行军途中停止李德的军事指挥权。通过以上3次会议，张、毛、王等人的密切配合，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早在长征开始时，在中央和红军的高级干部中，已经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更换领导的意见。黎平会议后，一次，王稼祥问张闻天：长征的最终目标在哪里？张说：没有个最后目标，接着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当晚，王稼祥将这番话电告给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而后又转告给毛泽东。消息传来传去，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等人也表示支持，于是大多数都赞成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作"反报告"批评"左"倾军事错误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共20人。会议主要讨论两个议题：一建立以黔北为中心的根据地问题；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问题。博古主持会议，并作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极力为临时中央和自己的错误领导辩解，只承认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错误。周恩来作"副报告"，除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外，同时也批评了博、李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王共同草拟的提纲，作了反对中央领导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李的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尖锐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博古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又估计不足，必然会得出客观上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机会主义的结论。毛泽东、王稼祥等也作了发言。张、毛、王的提纲和意见，获得与会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刘少奇、陈云等大多数人的"完全同意"。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指定张闻天负责"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的统治，确立了毛

泽东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张闻天总结说："遵义会议在我党历史上有决定转变的意义。"他归纳了4个方面：其一，"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其二，"遵义会议改变了领导，实际上开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中心的中央的建立。"其三，"遵义会议克服了'左'倾机会主义，首先在革命战争的领导上。"其四，"教条宗派开始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分裂。"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就不会有红军长征的胜利，更不会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接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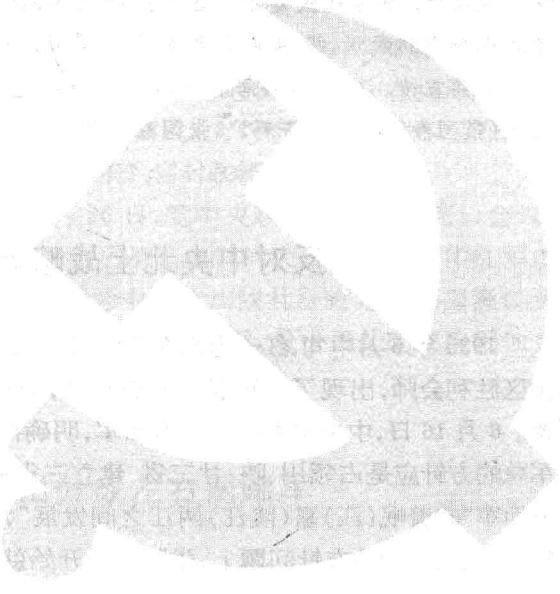
遵义会议后，中央政治局于2月5日在云南、贵州、四川3省交界的云南省威信县的"鸡鸣三省村"开会。会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张闻天在任期内，有时也习惯地称呼他为"总书记"。

2月8日，张闻天在扎西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是张闻天以他在遵义会议上所作的"反报告"为基础，根据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等与会多数人的意见整理形成的。该决议全面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失败的教训，深刻地批评了"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错误，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除客观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由于我们在军事指挥上战略战术基本上是错误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这个决议的起草和被通过，标志着张闻天完全摆脱"左"倾教条主义，彻底转变到正确路线上来。

在通过《遵义会议决议》的当天，张闻天还以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了由他拟定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2月10日，张闻天在扎西向中央军委纵队营、科长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并作了《五次反"围剿"的

总结和目前任务》，受到广大干部的完全赞同和拥护。

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张闻天功不可没。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时指出："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张闻天）、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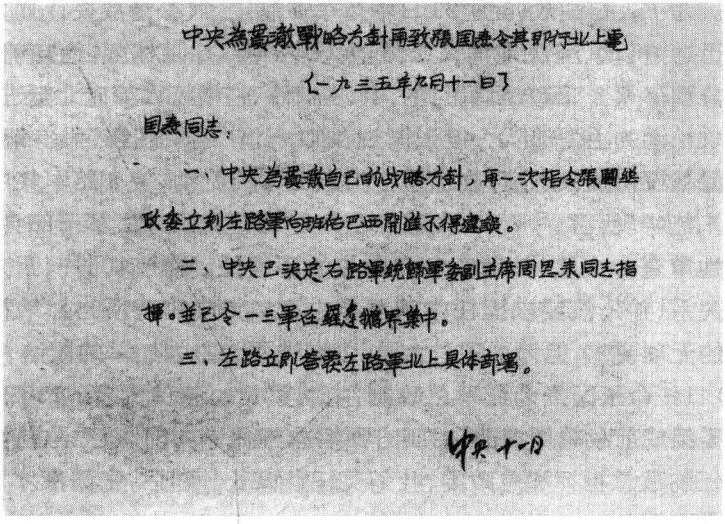


70. 张国焘与长征左右两路军

张国焘(1897—1979)　江西萍乡人。1920年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出席中共一大,当选为中央局组织主任。8月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兼《劳动周刊》主编,领导职工运动。是中共第二届中央委员,第四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担任中央工农部主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回国后,任中共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在鄂豫皖苏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搞"肃反"扩大化,致使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建立川陕根据地。1935年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此后反对红军北上,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后被迫取消。1937年党召开延安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乘祭黄帝陵之机叛逃到武汉,投向国民党,被开除党籍。此后一直为国民党效力,从事反共宣传。1949年移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主要著作收入《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张国焘年谱和言论》。著有《我的回忆》。

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

1935年6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胜利会师,出现了红军长征的新局面,全军上下无不为之欢欣鼓舞。6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四方面军,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要求四方面军"向着岷(江)嘉(陵江)两江之间发展","击破胡宗南之南进"。然而,在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张国焘一开始就同党中央存在着分歧,



中央为蜀敌战略方针用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国焘同志：

一、中央为蜀敌自己的战略方针，再一次指令张周坐致叁立刻左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延误。

二、中央已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并已令一三军在罗边地区集中。

三、左路立即告叁左路军北上具体部署。

中央 十一日

中共中央催促张国焘北上的电文

他不赞成中央的北进方针及部署，力主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提出目前暂时向南进攻更为有利。18 日，中央军委致电张国焘，进一步说明红军不利于西移或南下，必须集中火力先突破平武、松潘，作为向北转移的枢纽，否则红军两大主力经阿坝草地入甘肃、青海，将感到绝大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党中央与张国焘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分歧在于，前者力主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后者则坚持向西向南发展，企图实现其“川康计划”。其实，张国焘的这种行为，绝非偶然。还在会师前，5 月 30 日，张国焘在四川西北部茂县擅自成立了“西北特委”，后又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联邦政府”，自封联邦政府主席。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6 月 26 日，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确定集中红军主力向北进攻，创造以甘肃南部为中心的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口头上拥护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行动时却又动摇，骨子里是向中央闹独立性，态度十分傲慢。

提出分成左右两路军

这时，胡宗南在平武、松潘地区集结 27 个团的兵力，伺机向红军

进攻。为了攻打胡敌，6 月 29 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强调要迅速、机动、坚决地消灭松潘地区之胡敌，并以林彪、徐向前、陈昌浩分别率领一、四方面军的左、中、右 3 路，在岷江西岸向北挺进，作为进攻松潘的主力部队。但张国焘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有解决，对松潘战役持消极态度，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使 3 路军集中的计划未能实现。7 月 7 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非法地审查中央路线，散布对党中央的不信任，挑拨离间一、四方面军的关系，并公然要求担任中革军委主席。党中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的无理要求，但为了顾全大局，以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于 7 月 18 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的总负责者。21 日，中央军委组成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分别兼任前敌总指挥和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随后，张国焘才肯调动四方面军。

由于松潘作战受阻，根据敌情的变化，总司令部放弃了《松潘战役计划》，于 8 月 3 日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规定新的战役目标是：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向东压迫敌人，形成在甘肃南部广大地区发展的局势。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党中央想一、四方面军同时北进，委曲求全，同意了张国焘的提议，决定将一、四方面军部队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规定了左路军经阿坝、右路军经班佑的北进路线，并重新调整了新的部队区分：左路军含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树声），辖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和一方面军之五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倪志亮、政委周纯全），辖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三十二军。左路军由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指挥。右路军含第三纵队（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杨尚昆），辖一方面军之三军、一军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右路军统归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直接指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这样，由一方面军之 4 个军和四方面军之 5 个军混合编成的左右两路军正式形成。随后一、四方面军从分散在纵横 1 500 里的驻地，向毛儿盖和卓克基两地逐渐集中。

为求得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计划的实现，党中央政治局召开沙窝会议，8 月 5 日会议通过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关于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提出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和加强一、四方面军的团结。可是，张国焘会后在四方面军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活动。夏洮战役计划开始时，左路军西进阿坝方向迅速，前敌总指挥部要求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各部北上，强调途中尽量避免与敌决战，速取夏河。

党中央8月15日致电张国焘，指出根据地形、气候、敌情、粮食等各种条件，决定改变夏洮战役计划的重心，提出应由西转向东，即将主力由阿坝转向班佑。根据这一新的行动计划，中央要求将左路军的五军、三十二军调至右路，以加强班佑方面的实力。但是，张国焘提出右路军与左路军联络有困难，左路若不向阿坝攻击，将无粮并多番骑扰害，拒不执行左路军靠拢右路军的决定。

8月2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提出要实现以红军主力迅速占取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地区的战略方针。24日，中央政治局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指出右路军应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然后并肩东进。同一天，党中央发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给左路军的通报》，再次强调主力向东，而不能向西。徐向前、陈昌浩电朱德、张国焘，也提出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这期间，左路军行动迟缓，张国焘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阿坝方向，一直按兵不动。右路军用5天时间走出人烟罕迹的草地，于8月底9月初，先后攻占巴西、阿西、包座等地，为左路军向班佑方向前进，靠拢右路军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张国焘无视中央的决定，借口葛曲河涨水，无法徒涉和架桥以及粮食困难，使左路军与右路军会合向东发展的计划，形势渺茫。

走上分裂红军的道路

在最严重关头，张国焘公开指责中央的北上方针，认为左路军不能在茫茫草地，坐待自毙，将左路军全部撤回阿坝，并要右路军乘胜回击松潘。于是两路军集中班佑，共同向洮河以东发展的北上计划成为泡影。即使如此，党中央始终坚持不分散一、四方面军主力的原

则，认为左路北进为上策，右路南进为下策。可是，9月8日，张国焘密电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中央政治局得知这一消息后，即刻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决定电令张国焘北上，认为“左路军如果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9日，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中央，再次明确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此时，中央对徐向前、陈昌浩耐心作解释工作，并征求他们的意见。徐、陈两人同意中央北上决定，但又不愿意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执行了张国焘的南下命令。当晚，中央再电张国焘，指出：“阅致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不适宜的。”“只有向北是出路”。“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鉴于张国焘拒绝中央命令，并采取要挟党中央和命令右路军南下的形势严峻，9月9日晚，中央政治局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领一、三军单独北进，迅速脱离险境，同时命令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四军、三十军尾一、三军后前进。10日，党中央向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中央的北上方针是惟一正确的，指出“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至此，组建仅1个多月的左右两路军在阿西分离，左右两路军的名称随即亦不复存在。

11日，党中央率一、三军到达俄界，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挥。张国焘不但违抗中央北上命令，反把左右两路军分裂的责任推给党中央。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政治局12日召开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会议还决定将一、三军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党中央认为，由于张国焘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多次违抗中央的命令，引起红一、四方面军的分离；张国焘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负绝对的责任。

一、四方面会合时，四方面军约10万人，粮食给养充足，衣着整齐；一方面军约2万人，经过长途跋涉，衣服破烂，军容不整。张国焘把红四方面军变成他自己的工具，依仗人多枪多，企图以枪指挥党，威胁党，而当他的野心又始终得不到满足时，于10月5日在卓木碉非法宣布另立“中央”，其军阀主义、分裂主义的行径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71. 任弼时与红二方面军长征

任弼时(1904—1950) 湖南湘阴人。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回国,历任青年团中央组织部长、代理青年团总书记、团中央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大革命失败后,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1931年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历任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红二军团政治委员、红二方面军政治委员、中共西北局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中共中央秘书长等职。1944年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协助毛泽东指挥西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参与指导全国土地改革运动,并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名誉主席。主要著作收入《任弼时选集》。

红二、六军团会师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命令,1934年8月,任弼时率领红六军团9 700余人,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撤出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向湘中挺进,从而拉开了战略转移的序幕。8月中旬,在桂东正式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任弼时为中央代表。为加强统一领导,党中央决定成立由任弼时、萧克、王震3人组成的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

红六军团撤出湘赣根据地后,连续突破敌人4道封锁线,抢渡湘

红二、六军团在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图为甘孜远景

江，强渡大沙河，跳出 10 倍于我军兵力的围堵，历时 78 天，跨越赣、湘、桂、黔省境 5 000 余里，于 10 月 24 日与军长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在贵州东部印江县木黄会师，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任弼时在庆祝会师大会上报告了当前形势和红军任务，要求两支红军加强团结，战胜困难，开展新的革命斗争。西征途中，任弼时为中央红军提供转移的路线及报告沿途的地形、民情、敌情等，起到了开路先锋的作用。任弼时除参加作战指挥外，把主要精力放在加强部队政治建设上，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红六军团的面目一新。

两军会师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中央代表任弼时兼任政治委员。两个军团未建立统一的领导机关，以红二军团总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两个军团。是时，红二军团约 4 400 人，红六军团约 3 300 人，两军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和支援，亲如兄弟。

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转移，开辟新的根据地，1934 年 10 月底，红

二、六军团在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下，由黔东向湘西进发，先后攻占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城。是时，在永顺附近的十万坪地区，与敌激战两个多小时，歼敌 1 000 余人，俘敌 2 000 余人，这是两军会师后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为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1 月 26 日，中共湘鄂川黔边临时省委成立，任弼时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川黔边省革命委员会和湘鄂川黔边军区，贺龙兼任省革命委员会主席和军区司令员，任弼时任军区政治委员。12 月，红二、六军团相继占领桃源、慈利县城，结束了湘西攻势，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出 3 个师的兵力阻止红军西进。经过多次粉碎敌人“围剿”的战斗，钳制并歼灭了敌军大量有生力量，为开辟湘鄂川黔苏区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是时，在湘鄂川黔边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下，建立了以塔卧为中心的湘鄂川黔根据地及其永顺、桑植、龙山、保靖、大庸、慈利等地区的革命政权，省委制定了《分田大纲》、《关于土地问题的决定》，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苏区根据地开展。1935 年 2 月，红二、六军团组成革命军事委员会湘鄂川黔分会，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夏曦、萧克、王震为委员，贺龙为主席。

根据新形势的需要，4 月，红二、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首府——塔卧，向北转移。由于中央红军已于 5 月渡过金沙江，因此，二、六军团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牵制敌人，而是如何保存壮大自己，粉碎敌人的“围剿”。两军团经过半年多时间的 30 余次大小战斗，占领过 7 座县城，不仅完成了牵制敌军进攻中央红军的作战任务，给中央红军长征以有力的配合，而且自身得到了锻炼与发展，部队扩大了 1 倍。

组成红二方面军

1935 年 9 月，国民党调集 130 个团约 20 余万兵力，再次向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剿”。鉴于敌我实力悬殊，省委和军委分会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红二、六两军团撤离苦心经营的湘鄂川黔根据地。11 月 19 日，红二、六军团 1.7 万余人由桑植刘家坪出发突

围，开始长征。为了迷惑敌人，红军先向东行，再转向西，强渡澧水、沅江，横扫湘中，进入贵州省。1936 年 1 月上中旬，红六军团占领江口，红二军团占领石矸。在江口、石矸，进行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红军曾两度计划在黔东和黔西建立新的根据地，因国民党调集优势兵力，穷追猛剿，均未能实现。随后，红军以佯攻贵阳姿势，迅速转至黔西、大定（今大方）、毕节地区，改向贵州西北进军。

为执行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2 月 8 日，在大定成立了以贺龙为主席的苏维埃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苏维埃政权建立后，除开展打土豪、分浮财运动外，二、六军团分别补充了 3 000 和 2 000 新兵。不久，黔西、大定相继失守，根据局势的变化，红二、六军团撤离毕节，开始转战千里的乌蒙山区，由于粮食困难，气候严寒，风餐露营，急行军疲劳过度，部队锐减 3 000 人左右，而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这是红二、六军团长征以来处境最困难的时期。

1936 年 4 月底，红二、六军团巧妙地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北渡金沙江，进入中甸雪山地区。在人烟稀少，气候恶劣，给养困难的环境下，红二、六军团分左、右两路，以惊人的毅力，连续翻越海拔 5 000 米的 3 座大雪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7 月 1 日，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5 日，奉党中央电令，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二方面军，同时编入原属一方面军之第三十二军。原二军团指挥部改为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

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作斗争

红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经过任弼时的努力，当晚即与党中央恢复了联系。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应迅速北上，尽快实现与红一方面军会合。此时，任弼时从朱德、刘伯承那里得知张国焘坚持南下，自立“中央”，继续进行反党分裂活动，妄图欺骗拉拢红二方面军共同反对党中央。任弼时坚定地表示：“我不同意张国焘的那一套。”“这种搞法是绝对不允许的。”在甘孜，张国焘提议召开二、四方面军干部联席会议，想以“多数”压“少数”，通过拥护他的声明，遭到任弼时、贺龙、

关向应等的抵制和反对，他们一起商讨对付的办法，使这次干部会议化为泡影。

在行军作战途中，任弼时不顾劳累，分别与在四方面军的领导人朱德、张国焘、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傅钟、李卓然等亲切交谈，了解一、四方面军的分歧情况，同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耐心诚恳地做好党内的团结工作。张国焘派人给二、六军团送来《干部必读》等宣传材料，有攻击党中央、毛泽东的内容，被任弼时下令销毁。任弼时还写信给二方面军领导人，认为“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负有重大责任的”。7 月 10 日，任弼时致电林育英、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领导人，指出：“我深切感觉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为此，任弼时建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分清是非，统一党的最高领导，消除以往的分歧与隔阂。中央同意任弼时的意见。由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等的坚决斗争，张国焘才被迫同意北上，取消第二“中央”，与党中央会合。

党中央对二、四方面军并肩北上也极为关切，7 月 27 日批准成立了中共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任弼时从甘孜一出发，就接受朱德的建议，跟着四方面军总部行动。为了消除一、四方面军分歧与隔阂，任弼时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与统一，对推动张国焘率部北上，作出了特殊的重要贡献。

促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为了共同北上抗日，根据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二、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越过雪山草地，于 8 月到达甘肃南部。这时，任弼时致信贺龙、关向应等，指出：“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顺利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9 月，根据中央提出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为左路，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分头向甘肃会宁推进。10 月 8 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县青江驿

和兴隆县界石铺会师。红二方面军连克4县，渡过渭水，穿越西(安)兰(州)大道，于22日到达静宁县的兴隆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二方面军完成了长征任务，历时11个月零4天，行程1.6万里，为党保存了1.1万余人的红军武装，胜利实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伟大会师。

11月，任弼时在《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途远征经过报告大纲》中，详细叙述了经二、六军团的长征经过，全面总结了长征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指出："这次远征，活动于湘黔滇康广大地区，前后攻占三十余县城，是广泛地传播了党和苏维埃的政策，特别是扩大了抗日反蒋主张的影响，组织和发动一些群众斗争，揭破了国民党卖国殃民的罪恶，再一次证明红军是不可摧毁的力量。"其主要经验是："在不可免的脱离根据地而采取长距离之转移时，为保持有生力量，可采取逐步转进这一策略。""在这种策略下完成远征计划不一定是削弱有生力量，正确的运用甚至可以壮大部队，造成创造新根据地更有利的条件。"后来，毛泽东在陕西保安会见红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称赞二方面军说："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72. 徐向前与红四方面军长征

徐向前(1901—1990) 山西五台人。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队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三十一军副师长、鄂豫边革命委员会军委主席、红一军副军长兼1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军长、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长征中任红军前敌总指挥、西路军总指挥等职,参与指挥川陕根据地抗击"六路围攻"、嘉陵江战役、西路军浴血奋战。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校长等职,指挥冀南春季反"扫荡"、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著名战役。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及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主要著作收入《徐向前军事文选》。著有《历史的回顾》。

撤离川陕根据地

1933年2月,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西征转战至川北后,建立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6月,红四方面军粉碎了四川军阀的三路围攻。10月,川东游击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编入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5个军共8万余人;根据地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肃的静宁、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图为会宁西关

四川军阀刘湘、邓锡侯、田颂尧、杨森等于11月对川陕苏区根据地发动“六路围攻”。根据徐向前的意见，红四方面军分东西两线作战，东线总指挥徐向前，西线总指挥王树声，采取“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在不到1年时间，打垮了川军114个团的进攻，彻底粉碎敌“六路围攻”，减轻了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压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央红军的突围转移。

蒋介石为阻止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合，调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根据党中央指示，红四方面军为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求得与中央红军的会合，并实现川陕甘计划，继广昭、陕南战役后，于1935年3月又发起嘉陵江战役。在徐向前、王树声的统一指挥下，经过24天的战斗，取得歼敌1万余人，连克9座县城的重大胜利，达到了冲破蒋介石的“川陕会剿”计划，扩大川陕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目的，为中央红军北上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可是，张国焘担心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将很快压向四川，在嘉陵江战役胜利后，于4月将四方面军撤至嘉陵江以西，自动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力促一、四方面军的团结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于6月13日在四川懋功达维地区会合，全军上下欢欣鼓舞。徐向前即提出：中央红军“长途跋涉，不无疲劳”，应“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当他得知中央红军长征以来兵员损失较大而干部保存较多时，又与陈昌浩等四方面军领导人，主动向中央建议，抽调红四方面军3个建制团3 800多人充实红一方面军，并从一方面军中选调部分优秀干部到四方面军任职。这一建议，对于两个方面军的相互了解与交流，增进团结，有着积极的作用。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会议决定徐向前为中革军委委员。同时，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分3路北进松潘地区。徐向前率领中路，迂回攻击松潘守敌。

为加强一、四方面军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团结，党中央除加强政治工作外，还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中革军委组织前敌指挥部，由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兼总指挥，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兼总政委，指挥前方一切作战部队。

中央政治局7月下旬在芦花举行会议，总结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经验教训。张国焘作了关于四方面军发展情况的报告。徐向前和陈昌浩分别作了补充报告。徐向前说：“红四方面军工人干部多，军事理论训练少，对战略战术弱，但主要是自己的经验。”在芦花，徐向前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感到格外亲切与欣慰。

这时，胡宗南主力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队也加紧策应行动。为了坚持北上方针，根据敌情变化和地瘠民贫，粮食给养困难等原因，8月初，红军总司令部放弃了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改为制定《夏洮战役计划》，战役目标是：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灭蒋敌主力，形成甘肃部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这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次共同作战行动。为执行这一计划，党中央采纳了张国焘的主张，将主力部队分成左、右两路军：左

路军为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军、三十二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向阿坝方向进展；右路军为一方面军之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向班佑方向进展。党中央和中革军委跟随右路军行动。

拥护中央的北上方针

为了执行北上方针，党中央于8月上旬在沙窝召开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会议增补徐向前为中央委员。沙窝会议后，徐向前和陈昌浩根据《右路军行动计划》，直接部署与指挥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北上的行动。但张国焘会后却召集四方面军干部开会，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

为了统一思想，8月20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提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与会者一致认为，应以右路军为基准而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左路军应马上向右路军靠拢。徐向前发言指出："原则上的问题，以前已决定，当无可争。我们应先从河右岸前进，从泯州方向突破向东。如果不能走时，再从河左岸向东突破。战略方针当然是向东。"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指出：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发展；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8月21日，徐、陈下令右路军出动，兵分两路，向北进发。24日徐、陈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必须左路马上向右路靠进，或速走班佑，以便两路集中向夏、洮、岷前进。"并告诫："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

左、右两路军成立后，徐向前担负更大的责任。在徐向前、陈昌浩指挥下，右路军从8月下旬起，开始征服草地的艰难进军，经过5天到达班佑地区。进军途中，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经过3天激战，发扬"狠、硬、快、猛、活"的战斗作风，歼灭包座守敌及援敌第49师，毙伤俘敌约5 000人。

为集中兵力，火速北进，党中央连电张国焘，要左路军迅速离开

阿坝，横穿草地，向右路靠拢。但张国焘拒不执行中央的命令，对北上决定持消极拖延的态度。徐向前、陈昌浩也多次打电报陈述利害，要求张国焘执行中央决定。9月8日9时，徐、陈致电朱德、张国焘，明确提出："我们意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上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但张国焘竟于当日擅自命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迅速南下，并声称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徐、陈商量，决定由陈昌浩带上电报，如实向党中央汇报。当晚，党中央在周恩来的住地开会，徐向前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以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王稼祥7人的名义，电告张国焘，要他执行北上方针。可是，张国焘9日复电，执意坚持南下。先是陈昌浩改变了态度，同意执行张的南下命令，而徐向前"不愿意把四方面军的部队分开，也只好表示南下"。当晚，毛泽东亲自到徐向前住地征求意见，徐表示："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对于执行张国焘的南下命令，他多年来一直内疚，觉得这是"犯了终生抱愧的错误"。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党中央当机立断，9月10日凌晨2时，单独率红一、三军迅速离开阿西，脱离险境，先行北上，并郑重指出：北上是惟一正确的方针，南下是没有出路的。是时，有不明真相的干部打电话请示是否阻拦，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当即制止，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也表示支持徐的意见，从而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张国焘一意孤行，1935年9月中旬，强令右路军中的第四、三十军南下，并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称主席，公然走上分裂党和红军的道路。随后，徐向前与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人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径。红四方面军南下后，在朱德、徐向前等指挥下，虽然打了一些胜仗，但在名山、邛崃地区与川军刘湘部的战斗中，部队伤亡惨重，至11月，红四方面军从长征初期的8万余人减至4万人。1936年2月，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天全、芦山一带。由于朱德、徐向前等趁机做张国焘的工作，加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敦促，迫使张国焘于6月正式宣布取消第二"中央"，宣告张国焘南下方针的破产。

根据中央的决定，7月上旬，在甘孜会合的红二、四方面军出发北

上。其间，徐向前率领四方面军中央纵队由炉霍出发，向甘南进军，3次过草地，渡过包座河经腊子口、洮州、渭源，至9月攻克通渭。10月上旬，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将台堡会师。至此，红四方面军结束了历时19个月长征的艰苦历程，胜利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

73. 陈毅与粤赣边游击区

陈毅(1901—1972)　四川乐至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共校党委书记。1928年与朱德发动湘南起义,任工农革命军第1师党代表,后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2师师长、红四军军委书记。1930年后,历任红六军政治委员、红二十二军军长、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等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后,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等职,指挥著名的黄桥战役。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理军长、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后任上海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华东局第二书记、华东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七至九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主要著作收入《陈毅军事文选》。

留守中央苏区

1934年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前,中共中央在瑞金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以统一领导中央苏区的党政工作,并规定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目的是保存自己,积蓄力量,实现从正规战到游击战,从集中到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七日
主任 陈毅
副主任 梁柏台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发布的第一号布告

分散，从公开活动到隐蔽斗争的转变。中革军委划定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的地区和最后的坚守阵地。

陈毅和项英临危受命，被留在中央苏区，领导红军和游击队共1.6万余人抗击强敌，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确保红军主力的胜利突围。是时，陈毅在兴国老营盘前线指挥作战身负重伤而手术未愈，仍躺在云石山中央医院分院的病床上。10月13日，项英赶到医院看望陈毅，向他传达了党中央的有关部署和指示。陈毅正视苏区反“围剿”的败局已定，他说：“失败就是失败，应该承认这个失败。承认失败还可以不失败或少失败些。”“承认失败并不是悲观失望，而是政治上坚强的表现。”提出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须转变斗争方式的主张，并提议红24师及各独立团分散到苏区各县去，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14日，中央分局举行第一次会议，陈毅被担架抬到会场，会上

宣布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正式成立。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国民党调集重兵“清剿”中央苏区，留守部队遭受严重损失。10 月下旬，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从瑞金梅坑迁至于都宽田。至 11 月，宁都、瑞金、于都、会昌等地相继陷入敌手，中央苏区大部沦陷，已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的根据地，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之中。12 月上旬，中央分局决定在赣粤边地区新建信（丰）（南）康赣（县）（南）雄临时特委（后改称赣粤边特委）和军分区，为开展赣粤边游击战争创造有利的条件。下旬，为了应付危局，中央分局决定，项英、陈毅、贺昌 3 人保持领导，其余人到各地分散领导。会上，陈毅重申：应迅速转变指导思想，采取正确政策和得力措施，分散部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粉碎敌人的“清剿”。根据陈毅的提议，中央分局确定了“独立自主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12 月底，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机关，又从宽田迁移到黄龙的井塘村。

突围到油山

1935 年春，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苏区的“清剿”，红军在苏区已无法活动。在愈益严峻的形势下，陈毅、项英、贺昌等，经反复商量，不得不率部突围，决定到粤赣边界去，并将这个决定报告给中央。2 月 5 日，遵义会议后的中央书记处发来“万万火急”电报，指示中央分局：应在中央苏区及其邻近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立即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并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区分会，以项英、陈毅、贺昌等 5 人组成，项英任主席。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分局于 2 月中旬召开紧急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由陈潭秋等负责指挥，实行彻底的战略转变，开展游击战争；二、彻底精简后方机关，妥善安置伤病员；三、安排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等年大体弱的领导人先行转移；四、组织部队分 9 路向闽赣、闽西、东江、寻南、三南、赣南、湘南、湘赣等方向突围。

陈毅、项英等在原属中央苏区的赣南地区，坚持了半年之久，夜以继日地开展游击活动，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最后被迫忍痛撤离赣

南，分路突围。2月中下旬，项英、陈毅、贺昌等率领机关人员和各路突围部队约1万人，安全转移到于都南部禾丰地区。不久，部队被打散，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贺昌牺牲，项英、陈毅决定分散行动，改向赣粤边突围。在艰苦转战途中，陈毅、项英身边只剩下百余人，于是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跳出敌人包围圈。

项英、陈毅带少数警卫突围，从此同主力部队失去了接触。幸亏突围中碰上陈毅的老部属、原代英县委书记曾纪财，由他带路，化装下山，机智勇敢地突围。于3月底到达赣粤边游击根据地中心区油山，与赣粤边特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李乐天，特委副书记杨尚奎等会合。4月初，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少共赣南省委书记陈丕显率领赣南军区部分突围部队也到达油山。这里已汇集到3支队伍共1 400余人，陈毅兴奋地说："国民党吹牛说已经把我们消灭在仁风山区了！嘿，我们却在油山上说话啦！"在同中央失去联络的情况下，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等领导赣粤边区军民，在极其艰苦险恶的环境中，从未放弃过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英勇顽强地与国民党军展开三年游击战的殊死斗争。

油山，是粤赣交界处的一座大山，坐落在信丰、大庾（今大余）、南雄3县的边界上。在粤赣边区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先后开辟了油山区（中心区），北山区，信丰、南康、赣县区，南山区，上犹、崇义区共5个游击区。国民党把北山、油山列为"清剿"的重点地区，实行"山砍光、屋烧光、人杀光"的"三光"政策。敌人除了疯狂地屠杀镇压群众之外，还对游击队进行封山封坑、并村，几乎断了游击队的一切正常生活条件。游击队则搭茅棚，睡石板，睡树林，打赤脚，吃野菜，吃草根，来无踪，去无影，陈毅、项英等几乎有两年时间，在深山密林里住棚子，过着山林生活，夜间从未脱过衣服睡觉。游击队依靠群众支援，生死与共，坚持反"清剿"斗争。正如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描述："敌人残暴空前古，人民反抗气更高。"

在极为恶劣的条件下，针对盲动情绪和悲观消极思想，项英、陈毅等亲手编教材，反复开会讲话，做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项英、陈毅经常深入到北山、油山、信丰、南雄等地，听取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汇报，及时指导赣粤边红军游击队，依靠游击区军民，顽强斗争，先后多次挫败了国民党的军事"清剿"和经济封锁。

“北山事件”

4月上旬，项英、陈毅、李乐天、杨尚奎等从油山转到北山，月底，在大庾县长岭村召开了军政干部全体会议，全面部署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陈毅讲话指出：我们要对新的形势有足够的认识，采取新的斗争方式，发展游击战争，积蓄和保存力量。“革命的现实是困难的，现在还不是最困难的时候，更困难的局面还要来临。”并提醒大家：“如果跟敌人硬拼，拼掉一个少一个，正符合敌人消灭我们的意图。”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针。

长岭会议之后，国民党粤军“清剿”北山红军和游击队，敌军进至赣粤边军分区司令部宿营地棚桐村才被哨兵发现。哨兵鸣枪报警，项英、陈毅等安全脱险。后来，项英、陈毅等转移到江西大庾与广东南雄交界之帽子峰以西的山区。10月，龚楚（原中央军区参谋长）叛变投敌后，带领国民党粤军30余人化装成红军游击队，深入到赣粤边游击区后方驻地北山天井洞，以集中开会为名，将30余名游击队员杀害。后龚楚又带粤军“抄剿”项、陈驻地，幸亏警卫人员机智警觉，及时发现，项英、陈毅等才得以安全转移。史称“北山事件”。

敌人穷追不舍，封山封坑，搜山烧山。红军游击队被困在深山老林里，昼伏夜行，风餐露宿，饥寒交迫，环境极其艰难困苦。陈毅回忆说：“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断粮是常有的事，这时就来了一个‘靠山的吃山’，吃竹笋、吃野菜、吃杨梅、吃各种野水果。有时还可以打野猪，打山鸡，或者干脆抓蛇吃，好在山是大山，只要胃口好，吃的东西总不愁的。”

梅岭遇险

1936年冬，陈毅在梅岭被困20多天，生死关头，写下了“绝笔”诗句《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

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可是，由于此时已发生西安事变，粤赣边的形势开始缓和，所以敌人当天没有来搜山。

为了加强指导反“清剿”斗争，决定将领导机关进一步分散。项英到达南雄后，约陈毅到梅岭开兵运工作会议。担任湘鄂赣苏区兵运工作的陈宏在赴会途中被捕叛变，供出项英、陈毅和赣粤边特委的住地。陈宏于1937年5月2日返回梅岭，慌报中央派人来了，要找项英、陈毅谈话。陈毅与梅岭区委书记下山，前往大庾县城接头。项英等留梅岭等待消息。陈毅进城后，发现有诈，即返回梅岭，隐蔽在半山腰的石洞里。陈宏在大庾县城久等不见项英、陈毅前来，急忙带领国民党军包围了梅岭，哨兵随即鸣枪报警，项英急忙隐蔽在茅草丛里，躲过一劫。当天午夜，陈毅与项英会合后，立即撤离。事后，敌军在梅岭搜山5昼夜，仍未找到项英、陈毅和特委领导的踪影，只好收兵。

“南天一柱”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客观上给革命的转变带来了生机。9月，陈毅经与项英商量，决定把握时机，下山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尽快联合各游击区组成一支强大的力量。9月8日，陈毅作为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全权代表，先后到大庾、赣州；项英到南昌，与国民党江西当局进行了3次谈判，取得了成功，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毅等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不仅保存了原有的油山、北山、信康赣游击区，还开辟了以青龙山为中心的三南（龙南、虔南、定南）游击区，为组建新四军，准备抗日贡献了力量。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给予高度评价，指出：“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限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12月25日，新四

军军部在汉口成立，陈毅被任命为第1支队司令员。

陈毅和项英在红军主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英勇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赋予的任务。陈丕显在《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一书中，高度评价陈毅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他是三年游击战争中巍然屹立的南天一柱，是我们游击战士的革命楷模。”陈毅回首当年不无感慨地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

74. 张鼎丞与闽西游击区

张鼎丞(1898—1981) 福建永定人。早年在家乡从事青年运动和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任中共闽西特委组织部长、红军团长,领导闽西农民暴动,任闽西暴动委员会副总指挥,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后任永定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闽西特委军委书记、红四军第4纵队党代表,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土地部长,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留在闽西坚持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闽粤赣边省委书记、新四军第2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7师师长、华中军区司令员。1949年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华东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兼政法委员会主席、第一届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等职。是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著有《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

闽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张鼎丞根据中共中央分局书记项英的指示,以中共福建省委代表的身份回到闽西的龙岩、永定、上杭地区指导工作,开展游击战争。还在几个月之前,毛泽东曾对张鼎丞说:"你还是回到闽西去,那里你熟悉,可以坚持,可以发展。"张鼎丞牢记这一指示,满怀信心地前往闽西,1934年12月抵达长汀四都后,与福建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万永诚见面,并决定以红8团为骨干,布置岩、永、杭地区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1935年2月,张鼎丞抵达永定后,

即派永定县委书记郭义为前去与红 8 团联络。红军独立第 8、9 两团和各县区游击队，是在该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主要武装。

为统一领导闽西党政军民开展游击战争，3 月中旬，红 8、9 团领导干部在永定县西溪召开会议，研究分析当前的形势。张鼎丞讲话指出，现在应当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开展灵活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树立长期坚持斗争的思想。会议决定成立闽西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根据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代表陈潭秋到达闽西时，提议将闽西军政委员会扩大成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并于 4 月在永定赤寨乡主持召开闽西地区党、政、军第一次代表会议。会上，张鼎丞指出："当前的形势是，中央苏区已经失守，主力红军已去贵州、云南。因此，现在还提牵制敌人，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也不可能。况且，项英、陈毅的情况不明，万永诚的情况也不明，苏区已被敌人占领，还提什么保卫苏区？我们要面对现实。当前红军游击队的主要任务不是牵制敌人，而是摆脱敌人的跟踪追击，保存有生力量，坚持游击战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会议讨论和部署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决定成立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任财政部长兼民运部长，谭震林任军事部长。会议还决定军政委员会各委员分别到各县区指导工作，张鼎丞留在永定的西溪、金砂、合溪等地，坚持斗争。

粉碎敌人的"清剿"

1935 年，是闽西游击区极端严重困难的一年。国民党在这一地区集中 8 个主力师及地主武装，对红军进行"清剿"，叫喊要在 3 个月内消灭闽西红军。敌人先是采取集中兵力、分进合击，而后改用"围剿"、"搜剿"、"追剿"并用等战术，给根据地军民造成很大的破坏和困难。敌人组织保甲制度，实行连坐法，遍修公路、筑炮楼和碉堡，以及经济封锁等极其残酷的手段，企图困死、饿死红军游击队。是年 5 月，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率领红军第 24 师 1 个营，从江西突围来到永定地区，与张鼎丞会师。红 9 团此时也转移到岩、永地区，与红 8 团重新会合，以共同对付敌人的"清剿"。

敌我实力对比虽然非常悬殊，但闽西地区仍存在许多有利的条件，如各级党组织依然存在，并保存一些革命骨干和红军游击队；广大群众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教育、锻炼和考验；独立第 8 团和第 9 团建立了基地；闽西有崇山峻岭、茂林密竹，适合开展游击战争等。面对国民党恶毒残酷的“清剿”，张鼎丞鼓励群众说：“有老百姓的地方就有共产党，大家不要灰心，只要坚持斗争到底，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他和邓子恢、谭震林根据主客观条件和毛泽东的政治军事原则，制定了坚持游击战争的方针：“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保存有生力量，争取广大群众，在群众支援下，运用灵活的游击战战术打破敌人的‘清剿’计划。”

在正确方针指导下，张鼎丞等领导红军游击队，一面加强了与群众的联系，努力做争取、宣传和组织群众的工作；一面采取主动灵活的“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游击战术，以 4 000 人的红军游击队与数十倍于红军的敌人作长期的斗争，经常是来无影，去无踪，神出鬼没，打击敌人。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不仅保存了原有的龙岩、上杭、永定、平和、漳平、长汀、连城、宁洋等县老的游击区，而且还发展到华安、南靖和广东大埔、饶平等县的新游击区。

积极开展抗日统战工作

1936 年 1 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在上杭双髻山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决定在闽西南开展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工作，增选邓子恢、谭震林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会议决定把闽西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西南抗日讨蒋军”，并由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联合签署了闽西南抗日讨蒋联合战线的纲领，以及许多文告，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6 月，广东和广西军阀发动“两广事变”，出现有利于反蒋抗日的新形势时，张鼎丞发表《日益成熟的反攻形势》署名文章，指出：“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号召以集会、游行等形势声援西南反蒋，敦促其对日宣战，立即以游击战争阻止蒋介石进攻红军，进攻西南。扩大工农武装，投入抗日讨蒋斗争。”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的统战政策由“抗日反蒋”转

为“联蒋抗日”，10 月，当张鼎丞得知这一变化时，与邓子恢、谭震林立即在永定召开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紧急会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随后，在龙岩白沙召开中共闽粤赣边区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取消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闽粤赣边区省委，以张鼎丞为书记，方方为组织部长，邓子恢为宣传部长，谭震林为军事部长。

张鼎丞与邓子恢、谭震林等一起，率领闽西党和人民坚持三年游击战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主要是保持和发展了红军游击队；保存和发展了共产党组织；保存了广大干部及其与广大群众的密切联系；保住了土地革命果实；打破了敌人多次的“清剿”，配合了南方其他地区的游击战争，支援了红军北上抗日。1938 年 1 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后，闽西南、闽赣边及浙南等地的红军游击队 1 800 余人，统编为新四军第 2 支队，张鼎丞任支队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3 月，即开赴苏皖抗日前线。

毛泽东对闽西三年游击战争曾给予高度评价，在延安，他对张鼎丞说：你们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了这么多干部和部队，还保留了一部分土地革命的果实，这是很大的胜利。教条主义者说我们是“右倾机会主义者”，看来事情还是我们这些“右倾机会主义者”做的。张鼎丞 1982 年出版《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书，总结了闽西三年游击战争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指出：“第一，坚持发展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群众，保存有生力量的方针及其许多具体政策，都是正确的。”“第二，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当‘两广事变’时，我们发表了抗日讨蒋纲领，发表了宣言，提出建立联合战线，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第三，干部地方化是保持党与群众联系的重要经验。”最后作出如下结论：“这些成绩最重要的还表现在巨大的政治影响之上：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是不能战胜的。”

75. 薄一波与山西牺盟会

薄一波(1908—2007)　山西定襄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太原从事学生和工人运动。1928年任中共天津市委兵委书记、北方局军委秘书长。1931年在北平(今北京)被捕，1936年经组织营救出狱后，被派往太原任中共山西工委书记，成功地对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进行抗日救亡统战工作。抗战爆发后，任"山西青年抗战决死队"第一总队政委，配合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任太岳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太岳区党委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副政委。1948年任中共华北局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华北军区政委、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财政部部长、国家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文革"后，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是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两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收入《薄一波文选》。著有《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等。

开展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北平(今北京)爆发"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12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将山西、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地)等省作为红军发展的主要方向，并决定红军东渡黄河，开赴山西，作为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红军渡河东征，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军队，保卫和巩

固了陕甘根据地，同时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以唤起山西人民的普遍觉醒。

在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三方面的巨大压力下，山西实力派阎锡山被逼上“在三颗鸡蛋上跳舞”的难堪境地。是时，为人狡猾的阎锡山为摆脱困境，想利用共产党人的号召力，打着山西的旗号，来抵御日本侵略军的进攻和蒋介石国民党势力的渗透，以应付时局危机，维护他在山西的统治。这给中共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

为了贯彻瓦窑堡会议精神，根据党中央的指示，1936 年春，中共北方局和刘少奇积极开展对阎锡山的政治攻势，在山西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 5 月 5 日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5 月 25 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晓以利害，敦促其“共同抗日”。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推动了阎锡山向“联共”、“抗日”方向转化。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决定接纳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驻山西太原，开始同中共中央建立了直接联系。

8 月，阎锡山派代表来北平，邀请经党营救出狱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工作，“共策保晋大业”，但遭薄的拒绝。刘少奇得知这一情况，即派徐冰向薄转告他的意见，还转达了毛泽东对阎等“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的电报精神，并指示薄：“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

根据中央领导人的意见，9 月，薄一波由北平到太原，先进行 40 天左右的实地考察工作，他认识到山西确已形成推动阎锡山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有利形势，并将考察情况作了详细报告，提出对山西的工作方针：首先要站住脚跟，不做“清客”，踏踏实实地做上层统战工作和群众工作，积聚力量，争取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10 月下旬，北方局委派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均、周仲英 5 人，第一批赴山西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并决定成立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简称“公开工委”），薄一波任书记，直属北方局领导，与由张友清负责的秘密工作的中共山西临时工作委员会（1937 年 10 月后改为中共山西省委）不发生横向联系。公开工委专门做山西抗日救

牺盟会工作人员在山西太原晋祠合影。后边亭阁上右起第一人为薄一波

亡工作和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上层的统战工作。

改组牺盟会

薄一波于11月4日同阎锡山进行首次谈话，明确提出了“三条原则”(即“约法三章”)：第一，宣传共产党抗日救亡的主张，不应受到限制。第二，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利的事情我们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对我们用的人，要保障安全。阎当即表示同意。这次谈话，促成阎锡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为建立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奠定了良好基础。薄一波不是以共产党公开的身份与阎合作，而是以抗日活动家身份助阎抗日，合法地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这就形成了山西特殊形式的统战关系。

在议定的三条原则指导下，阎锡山首先把已经停顿的牺盟会交由薄一波来主持操办。牺盟会原是由阎锡山控制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爱国进步人士发起的，1936年9月18日正式成立时，改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阎锡山任会长。

牺盟会的成立，是阎锡山“守土抗战”思想的充分体现；同时也为山西新派的产生提供了新机。

牺盟会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无法打开新局面。薄一波接手牺盟会后，首先对其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在新的领导班子中，调整了部分顽固势力，保留了进步分子。改组后的牺盟会，名义上阎锡山任会长，但实际工作则由薄一波主持，因此真正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和党秘密领导下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对牺盟会寄予很大希望，把它看成是共产党与阎锡山建立统战关系的重要“纽带”。

牺盟会改组后，在全省范围内迅速掀起群众救亡运动，并且做了大量工作：一是训练村政协助员。薄一波和牺盟会受阎锡山委托，成立民训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各种训练组织。在担任军政训练委员会副主任的薄一波和牺盟会共同努力下，1936 年 12 月开办了两期“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共 2 000 名。经过短期训练，被分派下乡工作。二是举办国民兵军官教导团。从 1937 年 4 月起，共组成 10 个团分别在各县进行训练，各团的政治部主任都由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担任。三是开办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团。两个训练班共招收学员 4 500 人，绝大多数被吸收为共产党员。四是营救被关押在太原陆军监狱的政治犯出狱。薄一波到太原后，即要求阎锡山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经过彭雪枫和薄一波的共同营救，被囚禁 5 年零 7 个月的王若飞和其他 200 余人终于出狱。

到 1937 年 8 月，牺盟会已发展会员达 60 万人，在全省 10 个中心区，105 个县分会中，有 70 个县由牺盟会会员担任县长。随着中共对牺盟会的接办和改组，引起山西反共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薄一波领导山西公开工委运用党的抗日民族统战策略为武器，正确地运用“山西形式”（即戴“山西帽子”）和充分利用这个“官办团体”，采用阎锡山的“口号”和“做法”，打击反共顽固势力，结果牺盟会大踏步地前进，促进了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山西抗日局面的形成。

组建“决死队”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日本侵略者大举进攻面前，阎锡山的旧政权旧

军队顷刻间土崩瓦解。于是牺盟会改组后，组建新军（决死队）的重要工作，提到了议事日程。在中共北方局直接领导下，薄一波向阎锡山提出组建新军，改革旧军的建议。本来就有此意的阎锡山迅即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授权薄一波先组建1个新军团。他以太原军政训练班为基础，1937年8月1日，建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后改称决死第一总队），薄一波任总队政治委员。决死队实行政委制和政治工作制度，政治部主任和大队、中队、分队的主要政工干部，全部由牺盟会委派大多数共产党员担任。决死队名义上是阎锡山建制系统，实际上是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武装。此后，中共北方局决定，公开工委书记薄一波全力抓武装工作，牺盟总会的日常工作则交由牛荫冠负责。

根据山西抗战形势的变化和中共洛川会议精神，1937年11月，阎锡山委派薄一波又组建决死第二、三、四总队及“武装自卫总队”。和牺盟会一样，决死队也具有特殊的统一战线的形式，到1939年夏，发展到9个旅50个团，约5万余人，实际上超过了当时的山西旧军。与此同时，牺盟会会员已达90万人；以牺盟会名义组织的农救会会员达170万人，工救会会员达20万人，青救会和妇救会会员各发展到30万人。牺盟会的各类会员总数已发展到300万人左右，牺盟会的共产党干部还掌握了5个专区70个县的政权组织，全省105个县中，有70个县的县长大都由牺盟会特派员担任。在薄一波等领导下，牺盟会和决死队在晋西北（吕梁山）、晋东南（太行山）、晋东北（五台山）等抗日根据地，配合八路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已成为华北抗战的有力支柱之一，打下了山西抗战的坚实基础。

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发展壮大，引起阎锡山的恐慌。1939年阎锡山发动了“十二月事变”，牺盟会到1940年冬也停止了活动，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而山西新军则加入了八路军的战斗序列，坚持敌后抗日战争。

牺盟会和山西决死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1940年3月，中共北方局指出：在党领导之下的牺盟会，“不仅在山西的民众运动中曾起其领导作用，并且已进入到政府和军队中间，开始了政治机构的改革，创建了新军，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曾起其光辉的作用”。毛泽东在延安称赞薄一波说：“你们几个人搞了这么大个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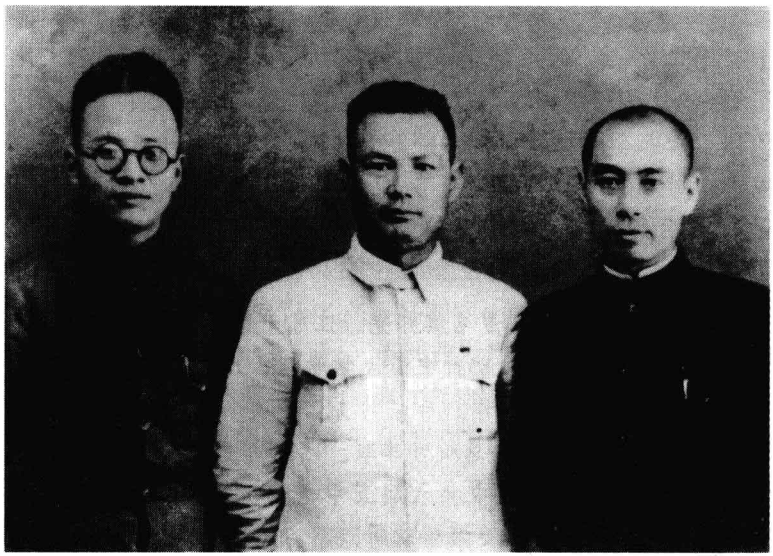
76. 博古与西安事变

博古(1907—1946)　原名秦邦宪。江苏无锡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5月回国后,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做宣传工作。后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共青团中央委员会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等职。1933年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担任党和红军的主要领导期间,积极推行王明"左"倾错误,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遵义会议后,离开中央总负责的岗位,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历任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新华社第一任社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驻南京代表,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1941年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任社长,为党的新闻工作作出重要贡献。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1946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于山西兴县黑茶山。主要著作收入《秦邦宪(博古)文集》。

中共谈判代表成员

1935年9月,中共决定改变对国民党的政策,由"抗日反蒋"转为"逼蒋抗日"。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作为统战工作的重点。在全国各界救国运动高潮之中,受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的感召,背井离乡4年之久的东北军官兵已不愿意打内战,要求抗日;张学良也开始由"剿共"转为"联共"。于是1936年上半年,在西北地区首先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三位一体"联合抗日的局面。

可是,蒋介石仍一意孤行,于1936年12月4日赴西安,亲自部



西安事变后，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右)、叶剑英(中)、博古(左)赴西安参加谈判

署张、杨实施“剿共”计划。在这种形势下，12 月 12 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指挥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临潼华清池捉住蒋介石，并逮捕了在西安城内的陈诚、钱大钧等国民党要员，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兵谏”成功后，张、杨立即打电报给中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张、杨还于当日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 8 项主张。

事变当天，中共中央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一面向共产国际发电报，报告西安事变的相关情况；一面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 3 人前往西安，与张、杨共商大计。

局势变化来得如此突然，各方都缺少思想和心理准备。13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应付事变的对策。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林伯渠等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肯定了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背景，从此完全打破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局面。周恩来作了长篇发言，着重分析了国内外对事变的反应及动向，提出党应取的对策。博古在发言中，起初主

张“审蒋”，但听了张闻天发言后作补充发言，修正了自己的意见，强调应把西安事变看成是抗日的旗帜，而不是抗日反蒋的旗帜。还强调，不应与南京对立，要全国抗日，一定要争取蒋介石部队的大部或全部，否则对抗日的大局是不利的。会议决定采取不与南京对立的方针；在周恩来未到西安之前，暂不公开发表宣言。对蒋介石的处置等一切事宜，均由周恩来到西安后相机处理。

研究应付西安事变的对策

由于事情紧急，中共代表部分人员须先行去西安谈判，调停双方。14 日，周恩来一行从保安启程，17 日乘张学良的专机从延安飞抵西安。当晚，周恩来、张学良进行会谈，两人商定了 5 个条件：一、立即停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成立抗日联军；四、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五、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对外称“红军代表团”。

博古没有随周恩来同行，他要等待党中央进一步研究具体对策，并负责将这些意见带往西安。是时，博古急盼周恩来能尽快把西安的情况送回来，以便将中央考虑的意图带到西安。18 日，中央收到了周恩来介绍与张学良会谈情况的来电。当天，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问题，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建议召开抗日救国会议。

中共中央于 19 日再次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西安事变以来的全国形势。博古在发言中指出：两广事变，特别是最近西安事变的爆发，更明显地表示资产阶级已转到抗日方面来。他说：在当前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各种力量都在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张、杨把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公开举起来作为西安事变的旗帜，在此情势下，只要党的策略正确，就可以使西安事变成为发动全国抗日的起点。毛泽东作会议总结，对有关事变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深刻和明确的阐述。会议决定放弃早些时候提出“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会议通过向国内公开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和向党

内发出的《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示》中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使之彻底实现西安事变的抗日主张。四、为促成全国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的发动，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

南京政府为解决事变并“营救”蒋介石，20 日派宋子文与蒋介石的顾问端纳来到西安。周恩来在同宋子文单独会谈时指出：中共并未参与西安事变的发动，中共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原则下，力主和平解决的方针。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等人也于 22 日飞抵西安。

西安事变谈判，23 日上午在张学良公馆正式开始。参加谈判的代表有：宋子文、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以后宋美龄也参加了会谈。周恩来提出共产党和红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 6 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中共方面要求蒋接受上述 6 项主张，并保证实行。张、杨同意周提出的 6 项主张，并主张即以此为谈判基础。

赴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

为协助周恩来工作，博古带着中共中央的最新意见，与叶剑英一起于 23 日到达西安。博古向周恩来传达了中央最近研究的意见，并一起展开工作，具体分工如下：周负责上层统战和群众团体工作；博主持党内工作；叶参加西北联军参谋团工作。

西安和南京的谈判，24 日上午继续，双方在改组政府，停战撤兵，释放爱国领袖，停止剿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公开等问题上，达成了 6 项协议。当天，周恩来同博古商量后，将上述谈判达成的 6 项协议

的内容，打电报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24 日晚，周恩来由宋子文、宋美龄兄妹引进会见蒋介石。25 日早晨，蒋、周再次会谈，蒋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是张学良、杨虎城决定，于 25 日下午 2 时释放蒋介石。

中共在蒋介石被释放前，未对蒋作过任何许诺。张学良在蒋介石接受 6 项协议后，希望尽快放蒋。但博古赞同在蒋发表改变政策的“公开声明”之前，不应放蒋。他和周恩来一致认为，蒋在走前须有一政治文件表示，也不同意张随蒋同去。但 25 日下午 4 时，张学良在未告知周、博的情况下，自己便决定陪同蒋介石一行秘密飞往南京。

博古到西安以后，除同中共代表团商讨有关事宜外，还围绕事变和平解决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先是做进步人士的思想转换工作。蒋介石被释放后，包括杜斌丞、杨明轩等一些有影响的进步人士在内的很多人一时想不通。第二天，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的人都不去上班了。为了说服大家，周恩来、博古等领导人亲自登门做工作。博古和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员徐彬如去看“西救”负责人杨明轩。见面时，杨正在生气，表示不干了，要到华山当和尚去。博古是杨明轩在上海大学附中时的学生，有意把话题扯到上大附中，杨明轩慢慢消了气，最后终于被说服了。博古还召集干部和民众团体负责人会议，详细解说释放蒋介石的理由。是时，成立了由李一氓负责主持的红色中华社西安分社（后改称新华社西安分社），博古要求该分社加强对西安各界舆论宣传工作，大力宣传党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此外，博古在西北特支书记谢华家里主持开会，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撤销中共西北特别支部，成立贾拓夫任书记的陕西省委。

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后，周恩来与博古于 29 日就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局势交换意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国内政治生活将进入一个新阶段。两人建议中央，采取打击亲日派，巩固以西北为中心的左派，影响与吸收中间派的方针。周、博还及时将中共代表团在西安的活动、关于红军驻地问题和红军作战计划及杨虎城、阎锡山等的动向，电告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1937 年 1 月 30 日，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 3 人在西安与杨虎城和东

北军将领会谈，传达了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张、杨的意见。

由于东北军主和派将领、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被杀害，造成中共和张、杨“三位一体”的局势骤然恶化。经中央研究决定，周恩来暂留西安，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分人员先撤到三原红军驻地。是时，中共中央驻地已由保安迁到延安。2 月 11 日，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会后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中国历史转折的枢纽，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发动。

77. 李先念与西路军

李先念(1909—1992)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早年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黄(安)麻(城)起义。后任中共区委、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红四方面军11师33团政委、11师政委,三十军政治委员。1935年5月率部参加长征。1936年任西路军工作委员会委员。1937年3月西路军失败后,率余部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新四军5师师长兼政委、中共豫鄂边区委书记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原局副书记、晋冀鲁豫野战军副司令员、中原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职。是中共第七届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十和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1983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88年担任第七届全国政协主席。主要著作收入《李先念文选》。

奉命西渡黄河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造成西北抗日局面,逼蒋抗日,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为此决定:准备西渡黄河,夺取宁夏和甘肃西部,建立根据地,打通与苏联的通道。为执行宁夏战役作战计划,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10月11日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领》,规定红四方面军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向西(安)兰(州)通道地区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二是加速完成造

突围后到达新疆的部分西路军指战员

船任务，以 3 个军渡河攻取宁夏，并要求于 11 月 10 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西渡黄河的造船任务，交由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负责。

鉴于任务紧迫，红四方面军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电告三十军副军长（后代理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准备提前行动。李先念看完电文表示："不管刀山火海，坚决完成任务！"即刻赶回三十军军部，与程世才立即召集领导干部会议，分配任务，抓紧进行渡河的准备工作。不到半个月，即造船 16 只，每船可载 10 余人。

10 月 24 日晚，程世才、李先念率领三十军自甘肃靖远上游率先强渡黄河，至 27 日拂晓，九军、五军及方面军指挥部也相继渡河完毕；而三十一军、四军被隔离在黄河东岸，未能过河。

渡河后的 3 个军共 2.1 万余人，组成河西部队，立即向宁夏方向前进，一开始就面临着青海的马步芳，甘肃的马步青，宁夏的马鸿逵，以及国民党胡宗南部队等敌人的阻击。三十军担任前卫主攻，猛打猛进，很快取得一条山、五佛寺、永登、古浪一带的胜利，占领各地区。这时，"二马"（马步芳、马步青）集结 5 个旅向已失去的阵地反扑。李先念组织指挥扼守一条山一线的 3 个团，英勇抗击，经过 4 天激战，终将马家军击退。

河西部队虽然取得了初战胜利，但鉴于宁夏敌人兵力众多，11 月

8日，中央军委仍决定中止《宁夏战役计划》，同时提出了《作战新计划》，命令河西部队向甘北挺进，打下凉州（今武威）、甘州（今张掖），创建河西根据地。根据这一战略变动，11月11日，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由徐向前、王树声分任正副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由陈昌浩任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李先念等9人为委员。

苦战河西走廊

西路军组建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即刻电告共产国际，并依据国际的新指示向接近新疆方向前进，同时要求给予物品接济。从此，红五、九、三十军3个军，开始了在甘肃河西走廊浴血奋战的艰苦历程。

11月中旬，西路军以三十军为右支队，九军为左支队，五军和总直属队随三十军跟进，向甘肃北部进发。中央军委11月11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询问西路军单独西进接通新疆有无把握？如返河东有何困难？陈昌浩召开军政委员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会议决定西进，计划建立以永昌、山丹为中心的根据地。15日，中央复电，同意西路军向凉州前进。李先念、程世才指挥三十军坚守阵地，勇猛抗敌，在四十里铺激战3昼夜，杀伤敌2 400余人，红军也伤亡500余人。紧接着，又连续击退敌人的围攻，攻占永昌、山丹，控制了永昌至凉州西北四十里铺一线。西路军在半个月共毙伤敌6 000余人，给马家军以很大的杀伤，但九军在古浪遭数倍之敌的包围。古浪一仗打得十分残酷，双方各伤亡2 000余人。九军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排以上干部伤亡更大，给整个战局带来极不利的影响。三十军派出部队接应九军剩余部队从古浪突围，到永昌与三十军会合。这时，中央军委命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地带建立根据地。

不久，西安事变爆发，这对于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产生很大的影响。是西进还是东进？党中央踌躇不决。先是令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后提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即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两州。”西路军准备西移，计划九军、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进取甘州、肃州，但根据西路军的实力，很难有把握取胜。

24日军委主席团又提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于是西路军又准备东进。而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时,军委又命令“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12月底,西路军撤离永凉地区,继续西进。红军指战员冒着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忍受饥饿、疲劳、伤病的困扰,越过沙漠、戈壁滩,且战且行。五军为前卫,驻扎高台;三十军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担任后卫,进驻倪家营子。西路军被分割包围在临泽、高台、倪家营子3个孤立的据点,处于极为不利的态势。

随着蒋介石获释和张学良被扣,西安局势又呈不稳之势,1937年1月上旬,中央又命令西路军,暂勿西进,集结临泽、高台地区建立根据地,待机策应河东。此时,“二马”集结了全部主力迅速赶来决战,企图将西路军各个击破。五军在高台坚守阵地,孤军奋战,经过一周的激战,军长董振堂以下2 000余人壮烈牺牲。西路军减至1.4万余人,全部集结在倪家营子地区的43个屯庄里。

血战倪家营子

1月下旬,西路军决定东返,三十军此时实际上成为西路军惟一的主力。在西洞堡地区,三十军遭追敌袭击,李先念和程世才组织部队反击,马家军尾追不舍,被三十军杀个“回马枪”,击溃骑兵旅,全歼宪兵团,缴获枪支1 200余支。因敌在东面防堵,全军又回师倪家营子。

是时,“二马”出动8个旅和数千反动民团共7万余人,将倪家营子团团围住,轮番猛攻。李先念所部与兄弟部队配合,实施坚守防御。在以寡敌众下,指战员们用大刀、长矛、枪托、石头等与敌人肉搏。经过7昼夜的激战,西路军几乎弹尽粮绝。经过一个多月大小数十次战斗,击退敌人八九次大规模进攻,毙伤敌万余人,三十军也伤亡几千人。面临非常危急的境地,李先念率领第265团与敌人激战,一时派不出兵力增援程世才率领的第268团。由于援军迟迟未到,程世才经与李先念商量,部队决定突围。李先念表示:“我派一个营,在突围的方向迎接你们!”程世才问:“你们还派得出人来吗?”此时265

团只剩下了几百人，而且正抗击着数千敌人的进攻，但李先念仍坚定地说："困难是困难，可是你们更困难啊！""我们可以抽出一个营来出击，与你们会合！"程世才被李先念这种高度的阶级友爱精神所感动，几乎流下泪来。最后终于突出包围，两支部队会师了。

2月21日深夜，西路军终于从敌人重围下突围出来。此时，西路军虽然还保持着两个军的番号，但实际上每团只剩下二三百人，全部兵力不足万人，而战斗部队不及五分之二，西路军请求中央速派援兵支援。2月27日，中央及军委一面组成援西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治委员，准备援助西路军；一面由周恩来等寻求"二马"停止对西路军的攻击。

败走祁连山

西路军于3月11日在梨园口与敌遭遇。九军仅剩的1 000余人，绝大部分牺牲，年仅25岁的九军政委陈海松身先士卒，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三十军的264团全部损失，263团也损失大部。徐向前、陈昌浩根据中央指示，指挥所剩3 000人，利用山麓地势，边战边撤，退入祁连山腹地。西路军退到康龙寺南石窝时，仅剩2 000余人。

3月14日，陈昌浩在石窝召集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了3件事：一，部队分散活动，保存现有力量，等待援西军；二，陈昌浩和徐向前离开部队，回陕北党中央汇报情况；三，将三十军所剩1 000余人编为左支队，由李先念、程世才带到左翼大山打游击；九军所剩400余人编为右支队，由王树声、朱良才带到右翼大山打游击。17日，左支队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正式组成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卓然任工委书记，负责政治领导，李先念为委员，负责军事领导，将余部编为3个支队。之后，有两个支队被打垮，只有李先念义无反顾地率领左支队，沿渺无人烟的祁连山向新疆进发。绵亘千里的祁连山，冰雪覆盖，寒风刺骨。左支队翻山越岭，在冰天雪地里，走了整整43天，终于从安西走出山口，4月25日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结束了艰苦悲壮的历程。西路军余部九死一生，最后只剩下420人左右。

党中央对这支部队一直给予极大的关怀，5 月 1 日，中央代表陈云、滕代远等前往星星峡接应，这些英勇将士们乘数十辆汽车，经哈密送至迪化(今乌鲁木齐)。

毛泽东对李先念率领西路军的英勇奋斗精神，曾给予高度评价："李先念是将军不下马的。"徐向前回忆说："李先念同志受命于危难时刻，处变不惊，为党保存了一批战斗骨干，这是很了不起的。"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西路军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浴血奋战 4 个月，歼灭敌人两万余人，其斗争虽然遭到惨烈失败，但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历程和献身精神，在党史、革命史上写下了最悲壮的篇章！

78. 杨靖宇与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杨靖宇(1905—1940) 河南确山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任确山县农民协会会长。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确山农民暴动,任确山农民革命总指挥。1929年被党派遣到东北工作,先后任中共抚顺特支书记、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南满游击队政治委员、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师长兼政委等职。1934年任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积极率领部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给日伪武装以沉重的打击。1938年冬,率领第一路军一部进入长白山密林,在极端困苦的条件下顽强作战。1940年2月因叛徒告密,壮烈牺牲。

从磐石游击队到东北人民革命军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仅3个月内全部沦陷,广大劳苦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呻吟,挣扎在死亡线上。但是,东三省3 000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遍布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抗日武装风起云涌,奋起抗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32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遣省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前往南满磐石、海龙等地巡视工作,整顿抗日武装。杨靖宇通过找党团领导人谈话,召开党的扩大会议,在总结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改为中国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简称磐石游击队)。在海龙,杨靖宇鼓励大家:"我们未死的同志应脚踏着死者血迹

密林中的东北抗日联军战士

上前去，完成革命伟大任务”，又将海龙工农义勇军改为红军第三十七军游击队。

1933 年 1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来《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要求东北建立党领导下的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联合各种抗日武装，坚持反日游击运动。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开始转变路线和策略，提出创造磐石人民革命军，扩大磐石游击区域的中心任务。随后，省委任命杨靖宇为磐石游击队政治委员，兼及指导海龙的抗日斗争。在 5 个月里，磐石游击队在蛤蟆河子、老爷岭等地连续与日军作战 60 次，打退每次数以千计敌人的 4 次“围剿”，击毙日本官兵多名，击破了日军的铁甲车，游击队迅速发展到 250 余人，大大提高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5 月 31 日，杨靖宇给满洲省委写报告，详细介绍了南满目前政治经济情况、游击队情形和党的工作。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决定，1933 年 9 月 18 日即“九·一八”两周年纪念日，磐石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共 250 余人。当天发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成立宣言》，表达了全体指战员“誓与日本强盗及走狗

'满洲国'斗争到底达到收复东北失地"的决心。不久，颁发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斗争纲领》等文件。是年秋，在粉碎日军秋季大讨伐后，杨靖宇率独立师越过辉发河南下，转战辉南、金川、柳河、通化、清源等地，开辟南满游击区。冬季，杨靖宇率部向敌军据点三源浦发动突袭，全歼敌1个连，活捉日军缉查局长。随后又将增援敌军歼灭，敌军头目哀叹："杨靖宇，杨靖宇，到头来，还是我中了你的计。"在杨靖宇的指挥下，独立师成为南满抗日武装力量的核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使日伪军疲于奔命。为了共同对敌作战，很快建立了南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一致选举杨靖宇为总指挥，参加联合作战的义勇军武装力量约5 000余人，约占南满抗日部队的一半以上。

1934年11月，中共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县境内召开。杨靖宇作《关于目前世界、中国、满洲的形势》的报告。会议决定建立中共南满临时特委组织，李东光任特委书记，杨靖宇为特委常委。同时正式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委，下辖2个师，共600余人。到1935年9月，南满抗日游击区由吉林省的8个县境扩展到包括吉林、辽宁两省境内以河里为中心的桦甸、通化、金川、柳河、辑安、桓仁、伊通、宽甸、本溪等20余县，南满游击区已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阵地。

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

1935年5月，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东北党组织与党中央完全断绝了联系，十分艰难地独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在反日军秋季大"扫荡"中，东北人民革命军各部在党的领导下，着手组建抗日联军。1936年2月20日，发表了由杨靖宇、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等署名的《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决定将党在东北领导的人民革命军、反日联合军、反日游击队等所有抗日部队一律改称东北抗日联军。6月，杨靖宇和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等在金川县河里召开南满、东满特委及第一、二军干部联席会议，决定：一、将抗

日联军第一、二军合组为抗联第一路军，由杨靖宇、王德泰分任正副司令，魏拯民兼任总政治部主任。二、建立南满省委，统一领导南满与东满党的工作，魏拯民当选为书记。其间，杨靖宇编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写道："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还作了《中朝民族联合抗日歌》，唱出："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齐觉醒。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此时，第一军的3个师1个警卫团和第二军的3个师1个教导团，两军合计为2 600余人，活动于自通化以西至奉天(今沈阳)、吉林、间岛等各城市的附近长达数千里区域，给日伪军造成极大的威胁。

是年夏秋，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至八军相继改编，杨靖宇任第一军军长。为粉碎日伪军1.5万余人的大规模军事"讨伐"，根据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的决定，杨靖宇率第一军主力西征到辽西、热河，企图打通与关内红军和中共中央的联系，但前进受阻。后于11月又以骑兵部队西征。两次西征，虽未能达到目的，部队损失很大，但打击和牵制了日军，扩大了抗联的活动区域和政治影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巩固和扩大阶段。8月，抗联第一路军发表告东北同胞书，号召："凡是中国人都联合起来！打倒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铲除民族败类——卖国贼！推翻傀儡政府'满洲国'！"到是年底，已建成11个军达3万余人。抗联各军在东三省广阔的原野上开展大规模的游击战争，英勇抗击日伪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抗战。

第一路军活动区域逐渐由西移向东部，包括通化、临江、长白、辉南、濛江、抚松、桦甸、敦化、延吉、汪清、额穆、永吉、宁安、和龙以及朝鲜北部的茂山等地区。1938年6月，杨靖宇率领部队在大蚊子沟战斗中，一举歼灭日军第34团，给敌以严重的打击。日本侵略军到处贴告示，悬赏缉拿杨靖宇，但杨司令在民众心中有极高的威望，只要见到告示就将它撕碎。7月中旬，抗联第一路军总部在老岭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继续西征计划，取消抗联第一、二军番号，统一成立第一、二、三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实行分区作战。8月初，杨靖宇率警卫旅和第一方面军等部在辑安县长岗地区伏击了被日军吹嘘为"皇军剿匪之花"的索旅42团和32团余部。10月

间，部队向金川河里转移，途中遭敌军 1 500 人包围，杨靖宇果敢沉着，带领队伍冲出重围。

由于抗日联军的胜利，敌人更加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和经济封锁，东北抗联的处境愈益艰难。为保存实力，坚持长期抗战，第一路军于 1938 年秋冬之际，不得不将主要游击区转移到辑安东部森林地带。杨靖宇率领第一路军一部 1 400 余人，进入长白山密林地带，转战柳河、金川、濛江等县，不断袭击敌警察分所和“集团部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11 月 5 日发来慰问电，对杨靖宇等率领的东北抗日联军，在冰天雪地与敌人周旋 7 年多的艰苦奋斗，“表示最深刻的同情”，并“致最崇高的民族革命敬礼！”

为抗日救国壮烈牺牲

杨靖宇、魏拯民率领第一路军，于 1939 年春季，袭击桦甸木箕河，全歼伪森林警察队。5 月，该路军部队一举攻克敦化县南部重镇大蒲柴河。根据最近发现的史料显示：5 月 20 日，杨靖宇曾向当年出差在吉林省辑安县老爷岭的爱国人士林延文借款 800 银元，并写下借契：“立借款契约人杨靖宇因抗日钱粮贫乏经中间人爱国屯长姜振周说允今向安东省宽甸县车轱镳泡村大户屯第四牌爱国人士林延文名下借款银元八百元整三分利抗日胜利以后由吾苏维埃农民协会还款。”抗战胜利后，林延文考虑政府经济困难并未要这笔钱。出借人林延文临终前嘱咐儿子：不要向政府索要欠款，借契珍藏留作纪念。

6 月，杨靖宇率领部队又袭击敌重要工矿基地安图县大宝山铜矿，迫其停产 1 年。9 月，日本关东军调集 7.5 万重兵，在通化、间岛、吉林等地区，向抗联第一路军开展大规模“讨伐”。杨靖宇虽率部成功地突围临江，但入冬以后，环境极端险恶，抗联战士缺衣少食，忍饥挨饿，常常冒着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与敌搏斗。为保存实力，避免遭到更大损失，杨靖宇、魏拯民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编成小部队，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分散游击。

杨靖宇率总部直属队在濛江境内，取得歼敌百余人的胜利，由于

叛徒出卖，总部的活动被跟踪，陷入敌军团团包围之中。杨靖宇率一支小部队与敌周旋，转战 50 余天，作战 40 余次，仍未能突出重围，身边仅剩的 6 名战士先后牺牲。1940 年 2 月 23 日，杨靖宇等在濛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三道崴子树林中，只身一人与敌激战，最后壮烈牺牲。残暴的日寇将杨靖宇的遗体解剖，发现他的胃里没有一粒粮食，只有树皮、草根和棉絮。

东北人民怀念这位抗日英雄，传颂他的感人事迹。新中国成立后，为其编写赞美歌，唱道："长白山白似银，银山下边松树林，一片青松数不尽，杨靖宇是功臣。"

79. 罗瑞卿与抗日军政大学

罗瑞卿(1906—1978)　四川南充人。1926年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长征中任中央红军先遣队参谋长,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后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1937年起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1940年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委等职,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太原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1962年被增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75年后,任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主要著作收入《罗瑞卿军事文选》。

从"红大"到"抗大"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1936年6月1日,"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在陕北瓦窑堡正式成立,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又是第一期学员)。红大不久迁至保安(今志丹县),创立之初,规模极小,只有3名教员。学校的物质条件极其恶劣,学生修补几个破石窑当校舍,用几块破砖凑成台子当讲桌,以自己的两个膝盖当书桌。第一期的学员全部是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的团以上领导干部,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与工作经验。红大倡导"团结紧张严肃

抗大第三期教职学员挖窑洞，建校舍。右一为副校长罗瑞卿

活泼”的校风，确立了“少而精”、“理论与实际联系”、“军事与政治并重”、“相互帮助与集体学习”等教育原则，开设《联共党史》、《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军事战略学》等课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培养全国范围的抗日干部，提到了党的工作议事日程。从1937年1月第二期起，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大部分学员跟随党中央迁驻延安，同时在甘肃庆阳设步兵学校。是时，3个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的干部首次会合在一起，还招收边区以外的许多富有远大志向和献身精神的优秀青年学生。8月毕业后，即刻参加到抗日民族解放的事业中，毛泽东为他们的毕业证书题词：“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去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有更多优秀知识青年，怀抱着追求真理的崇高热忱，冲破重重艰难险阻，风尘跋涉，奔赴延安报考抗大。原有的校舍人满为患。罗瑞卿带领千余名教职学员上凤凰山，凭自己的劳力，仅用两个星期，共挖新式窑洞175个，将这些废址改造成整洁的新校舍，解决了近千名学员的住宿问题。同时还建筑了一条4里长的盘山“抗大公路”。

第三期开学不久，1937 年 8 月下旬，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分别被任命为 115 师和 129 师师长，离开学校赴山西前线，校务即由教育长罗瑞卿主持。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38 年 2 月，罗瑞卿升任副校长。在他的具体领导下，加强了学校基本建设，进一步建立和健全了学校的组织机构。罗瑞卿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总结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主持编写了《抗大组织条令》，明确规定了抗大的性质和任务、教育方针和指导思想。此外，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董必武、博古、凯丰、吴亮平等领导人，都曾被邀请来抗大讲课。

根据新形势下培养干部的需要，第四期学员骤增至 5 500 余人（其中知识青年 4 600 余人）。为解决眼前困难，校首长采取校址分散的办法，除在延安附近设立 4 个大队外，还在瓦窑堡、庆阳、洛川、蟠龙，先后分设大队。12 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敌后建立抗大第一、二分校。罗瑞卿在干部会上正式宣布了中央的计划，并阐明成立分校的意义与目的：“一、为着迎接抗战的新阶段与新的斗争环境；二、为着不因战争形势发展而影响到学校的教育事业；三、为着便利于敌后广大青年来校就学；四、为着理论与实践更能打成一片，使教育方针更好的运用与发挥；五、为着毕业同学更便于分配工作；六、同时也更能实际吸收前线丰富的战斗经验。”随后，两个分校从陕甘宁边区出发，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分赴晋东南、晋察冀。

1939 年 1 月，抗大总校第五期开学，共 5 个大队 3 个分校。第一、二、三分校，分设在晋东南、晋察冀、延安。总校和分校学员共达 1.3 万余人，比上期增加了一倍以上。罗瑞卿在开学典礼上曾兴奋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根据党中央关于检查运动的指示，学校成立了检查工作委员会，由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等 9 人组成。经过两个月的全面工作大检查，在行政管理、供给卫生、教育工作、政治工作等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检查工作结束后，罗瑞卿在全校作了抗大工作检查总结报告，

又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认为："在此次检查运动中，我们产生了几十种的工作条例，这对于抗大今后工作走向更加正规化与更加科学化的道路，将起着重大的作用。"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大工作检查总结决议》，充分肯定了抗大的工作成绩，一致同意罗瑞卿报告中对抗大工作的成绩、困难与缺点的估计，以及报告中所提的今后抗大的工作方针，要求全校根据这一报告的方针，深入讨论，以便改进抗大各方面的工作。

为了响应党中央关于大生产运动的号召，罗瑞卿1939年2月在生产动员会上，要求全校教职学员及事务人员总动员，强调共产党员更要作劳动的先锋。全校热烈地动员起来，开荒、下种、施肥、锄草，成绩超过了原定的计划，至4月下旬，全校完成每人开荒2至3亩的任务，共开垦荒地两万亩，解决了第三分校将近一年的粮食。抗大战胜了生活困难，继承和保持了党和红军的光荣优良传统。

1939年6月，抗大隆重举行了成立3周年纪念日的庆祝活动，成立了由罗瑞卿、许光达、张际春、张如心等24人组成的纪念活动领导小组。此次庆祝活动盛况空前，召开纪念大会，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陈云、王稼祥等领导人亲临纪念大会讲演；举办事迹展览；举行运动会和文艺晚会；出版纪念文集和特刊，罗瑞卿在《纪念特刊》上发表了《纪念抗大三周年的应有认识》、《抗大工作的检查总结与今后方针》等文章。

根据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抗大本校、陕北公学本校等移驻晋东南。中央军委强调指出："抗大不是统一战线学校，而是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干部学校"。1939年6月21日，罗瑞卿在学校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宣布了党中央的决定，并指出："我们的东迁，给日本法西斯蒂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总校到华北去，不但可以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同时对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更有其重大的意义"。

为了统一指挥和迷惑敌人，7月抗大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瑞卿率领抗大总校机关及4个大队共5 000余人，离开革命圣地延安东渡黄河，向华北敌后挺进。他对欢送队伍说："敌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去保卫华北，到敌人后方去坚持敌后抗战！"历时两个半月的艰苦行军，经晋西北、晋察

冀、晋冀豫边等地区，行程 2 500 里，于 9 月下旬胜利到达晋察冀的河北省灵寿县陈庄一带，与抗大第二分校会合。

惜别抗大寄深情

1940 年 6 月，彭德怀代表党中央宣布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而副校长一职由军委参谋长滕代远接任。罗瑞卿从此惜别了曾经工作与战斗过 4 年的抗大。

罗瑞卿虽然离开抗大，走向新的岗位，但仍日夜思念着抗大的建设与发展。1940 年 7 月 7 日，罗瑞卿在《论学校的建设问题》一文中指出：抗大“不仅能创造我党军队中一般的中级与初级的干部，还要能创造比较有高深素养的我党军队的上级与高级的干部，不仅能创造普通的军事政治的人才，还要能创造具有专门知识的特殊技术的人才。”并且提出了建设抗大的主攻方向：一是要更加强调与提高学校的党性的教育。二是努力使学校具有更加高级的能力，把教育与培养高级干部的任务，提到学校的中心地位。“我们一定要有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与军事政治的理论家”。三是进一步强化学校的政治工作。继续坚持与发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优良校风。

1941 年 6 月在纪念抗大五周年庆祝大会上，罗瑞卿以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的身份代表上级党委向学校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个要求抗大给我们大批政治坚定、党性强的模范干部。第二个要求是向你们要学术，抗大每一个干部都要下决心，使自己成为一个学者和专家。第三个要求是每个抗大学生都要懂得政策，都能把政策正确的运用到实际中去。他号召大家要爱护抗大，关心抗大，并语重心长地说：抗大是我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宝贵财产，假使不爱护不关心抗大，就是不爱护党，不爱护党的军队。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在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的亲切关怀下，罗瑞卿等奋发努力，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基本上完成了党中央与军委给予抗大培养和创造大量党的军事政治干部的任务，解决了抗日战

争中的最迫切问题，为人民军队的建设，为民族革命和社会解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大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军事政治学校，共办了 8 期，据统计，在罗瑞卿任内的前 5 期，总校共训练干部 2.4 万余人，其中一期 1 063 人，二期 2 762 人，三期 1 272 人，四期 5 562 人，五期 4 962人；3 个分校共培养了 8 000 余人，合计 3.2 万余人。当时全国共 27 个省，除青海、西藏外，每个省都有抗大学子。罗荣桓、罗瑞卿、周士第、谭政、彭雪枫、陈赓、杨成武、张爱萍、王平、杨得志、曾希圣、周子昆、何长工、罗炳辉、赖传珠、胡耀邦、王树声、许光达、王建安、洪学智等红军的中、高级干部，几乎多就读于这所大学校。正如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时所赞扬："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80. 谭政与八路军政治工作

谭政(1906—1988)　湖南湘乡人。大革命时期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入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秘书长、政治部训练部长,红十二军、红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后方政治部主任,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组织领导辽沈、平津战役的政治工作。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四野兼中南军区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中南局第一副书记、华南分局第三书记、华南军区政委、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后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等职。

对军队政治工作的理论建树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创建了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始终视"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到抗日战争时期,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进一步趋于成熟并得到全面发展。

早在1936年3月,正在抗大一期受训的谭政根据瓦窑堡会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撰写了《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认为"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这篇文章,为八路军政治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7年6月,谭政升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8月,中国工农红

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兼主任毛泽东、副主任谭政共同下达了恢复我军政治委员制度的命令。随后,谭政在《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上,发表了《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针》、《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对敌工作的当前任务》、《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等文章,有效地指导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开展。

敌军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方面。1939 年 9 月 5 日,谭政为纪念抗战两周年而撰写的《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针》,明确提出敌军工作的目的与方针:"总的说来,在于削弱和摧毁日本法西斯军队的战斗力,涣散他的组织,消失他的顽强性,用以配合我们军事上的抗击,取得战争的最后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用积极的宣传方针与宣传力量,启发日本军队内部广大士兵群众的阶级觉悟与反战情绪,使其明了侵略战争的本质,了解战争对于他们本身、对于日本人民大众的危害,以改变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到抗战三周年时,1940 年 6 月 5 日,谭政撰写了《对敌工作的当前任务》一文。他在总结对敌工作成绩的基础上,提出:"目前我们对敌工作方针,应是用一切方法积极地有效地减轻和消失敌军士兵对于中国人民中国军队的民族仇恨与民族成见,取得他们对于我们进一步的谅解和接近。"为做好这项工作,指出:"中心的环节在于充实人力,加强对敌的工作部门,保证每个敌军工作干部有日文素养,懂得日本国情,肯于虚心研究,艰苦地进行工作。"

发扬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作风,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39 年 9 月 30 日,谭政代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训令》,批评目前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有其阴暗面和坏的作风,时常追求工作的表面和数字,而对工作的内容与质量则缺乏注意;遇事求简单,求单纯,而把本来复杂问题的解决简单化;各种工作惯于采取同样的公式,而不善于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环境,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方法,等等。10 月 25 日,谭政撰写《论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传统与作风》一文,分析了八路军政治工作之所以取得如此规模与显著特色,一方面在于八路军继承了红军时代的光荣传统;另一方面,在于八路军的各个连队,能够保有共产党的组织基础。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保持并发挥此种传统,应当是我们政治工作头等重要的任务。"并且强调说:"我们的政

治工作，具有革命的物质的泉源，具有政策的基础，而在作风传统上必须是新陈代谢，源源不息，战争的新阶段必得有政治工作的新阶段相适应。”

在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战坚持3周年的时候，谭政发表题为《论革命军队的政治工作》的文章，对八路军新四军抗战的政治工作进行初步总结，肯定了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人民的武装，是中国革命军队有机的组成部分，而且是前进的部分。强调：为着巩固内部，团结人民，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把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起见，八路军、新四军的政治工作，应有其独立性。同时还应该根据抗日和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各抗日阶层、党派、友军及广大群众，共同对敌，反对互相诋毁、倾轧和中途妥协投降。

正确地执行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是谭政对军队抗战政治工作的又一个重要贡献。他认为党在干部问题上的方针：第一，无论提拔和使用干部，都是从党的原则出发，不从私人路线出发。第二，党员干部与非党员干部应一视同仁。第三，既不姑息干部又不迁就干部。第四，用前进的标准作鉴定与依赖干部的主要尺度。后来，谭政发表《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政策》一文，指出：“党的干部不但应当懂得党的基本政策，最主要的应在基本政策的精神上，深入到工作的各方面，除基本政策而外，应当研究各种具体的政策，如军队干部政策，对党员政策，对非党员政策，锄奸政策，对敌伪政策等等。”并且强调无论对待干部、团结干部、培养干部和提拔干部，一律不允许任何私人路线与狭隘的宗派思想。

《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

1942年冬，谭政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为了总结我军的政治工作经验，1944年初，毛泽东召集联防军领导人贺龙、徐向前、萧劲光、谭政等一起商讨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并委托谭政起草相关报告。谭政在进行大量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的初稿，后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作了几次修改，写下许多精辟的论断。周恩来也参与了对报告初稿的

审查修改。

1944年4月，谭政受中共中央委托，代表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著名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全面总结了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论述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方向任务和基本方针、原则，并提出了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阐明了对待政治工作传统应持的正确态度与正确处理好军内外的各种关系。报告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指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而如果没有这种军事工作与政治工作的军队，就不可能是彻底拥护人民利益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能够如此英勇坚持，艰苦奋斗，再接再厉，百折不回，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报告分析了当时存在于军队政治工作中的4种毛病，指出："形式主义的作风、平均主义的作风、空喊的作风与孤立主义的作风，本质上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都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作风。这种作风不是共产党人的作风，不是革命军队的作风。"而"政治工作中存在着这样的作风，就会减弱它的革命性，即使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政治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如果这些作风不改变，仍然无力完成政治工作的任务。"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政治工作是我们军队的生命线"，肃清王明"左"倾路线在政治工作中的影响，发扬了优良传统，提高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提出和解决了我军政治工作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报告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我军政治工作又一重要历史文件，对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设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全党全军重视《报告》

党中央对于这个报告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4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总政治部关于学习该报告的《通知》指出：这个报告"是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工作问题的全面总结，其中关于发扬成绩、纠正缺点部分及组织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军、新四军全体适用的；关于边区经验部分，亦值得全军重视。八路军、新四军连级以上一

切政治工作、军事工作、后勤工作干部，应一律将此文件作为整风文件与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讨论，并须联系实际，改造自己的思想与工作。”《通知》还强调指出：“这一文件，不但特殊地解决了军队政治工作问题，而且也一般地解决了我党历史经验、领导方法与工作作风上的许多问题。为了指导和协助各地军队工作，全党干部亦应研读这个文件。”

为了使《报告》在全军得到贯彻执行，10 月 1 日，总政治部再次发出《对研究谭政同志政工报告的意见》的指示，指出：“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报告，给了各地总结与改造自己的工作以很大帮助。全军各部队应根据这个报告的精神，在检查与改进自己的工作过程中，曾经发现哪些问题，有什么经验教训，盼多作些调查研究，并将典型向总政治部作出详细报告。”之后，总政治部又将各部队执行结果，加以总结，并编印出《连队工作》、《军民关系》、《官兵关系》、《实行群众路线》、《领导方法与领导作风》等专辑，向全军推广。这个报告，开创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思想建设与政治工作的崭新局面，使我军政治工作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全面发展与趋向成熟。

81. 彭雪枫与豫东敌后抗日

彭雪枫(1907—1944) 河南镇平人。1925年在北京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为中共党员,后在北京从事学生工作和农民运动。1928年回到家乡参与领导农民暴动。1930年后任红五军5纵队3大队政委、红八军第1纵队政委、红三军团2师、4师政委、江西军区政委、红军大学政委等职。长征时任红5师师长、军委第一局局长。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中共北方局联络局书记、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河南省委军事部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中共豫皖苏区党委书记,开辟豫皖苏抗日根据地。1939年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任司令员兼政委、八路军第4纵队司令员。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4师师长。后兼任淮北军区司令员。1944年在河南指挥作战中英勇牺牲。主要著作收入《彭雪枫军事文选》。

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关注中原地区的抗战局势,1938年初派八路军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彭雪枫从山西到达河南确山县竹沟,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以加强中原地区党的军事领导。是时,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中,徐州于5月19日陷落。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要求河南省委动员群众,发动游击战争,开辟游击区,进一步动员河南人民投入抗日战争。根据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将工作重心由救亡运动转为武装抗日。6月14日,彭雪枫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一文,指出:“形势这样危机,时机十分迫切,光是提笔单靠开口,

已经不够了，到我们动手的时候了！”“中华民族复兴根据地的黄河流域，是我们消灭敌人的最好场所！失败送给敌人！胜利必为我们所有！”竹沟是中原地区的革命摇篮，河南省委在这里先后举办了党训班、青年干部训练班、地方干部训练班、军政教导大队训练班，彭雪枫亲自讲授《游击战术的几个基本原则》。

根据开封失守和豫东沦陷的新情况，1938 年 9 月，毛泽东电令彭雪枫等，要求先行开展豫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周恩来、叶剑英也指示河南省委将领导重心移向豫东，创造苏鲁皖边抗日的新局面。遵照中央的指示，河南省委决定，将彭雪枫等在竹沟组建的豫东敌后抗日游击队 300 余人，整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张震任参谋长，于 9 月 29 日誓师挺进豫东，开辟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同一天，彭雪枫在竹沟创办《拂晓报》，亲自题书报名，并撰写了发刊词《拂晓报——我们的良友》。10 月上旬，彭雪枫率部在西华县社岗，与吴芝圃领导的豫东人民抗日游击第 3 支队和萧望东率领的东征抗日先遣大队胜利会师，揭开了豫东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3 个支队合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扩大为 3 个大队，共 1 000 余人，彭雪枫任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吴芝圃任副司令，张震任参谋长，萧望东任政治部主任。10 月 10 日，彭雪枫在西华主持召开了中共豫东特委扩大会议，检查过去工作及制定今后工作方针，选举吴芝圃为新的豫东特委书记。为了统一领导豫东工作，组成新四军游击支队军政委员会，彭雪枫任主席。

创造豫皖苏边抗日新局面

整编后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于 10 月 24 日东渡黄河，进入鹿邑境内，27 日在淮阳东北之窦楼遭敌骑兵袭击。彭雪枫率领警卫连，靠 6 挺苏式转盘机关枪与 1 支捷克式步枪，激战两小时，将敌人击溃，取得了挺进敌后的初战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和当地人民的抗战士气。11 月下旬，彭雪枫率部从鹿邑出发，连续通过敌人几道封锁线，顺利到达睢县、杞县、太康 3 县边的砖角楼宿营休整。此时又遭敌人攻击，彭雪枫决定速战速决，几经战斗，取得西陵寺、陈寨、宋庄等战斗胜利，迅速打开了豫东抗日的新局面，为发展豫皖苏边抗日根据

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9年元旦过后，彭雪枫率领游击支队离开白马驿，进驻永城县书案店。接着，粉碎了睢县、杞县、太康、商丘地区日伪军2 000余人的“扫荡”，使游击支队在豫皖苏边站稳了脚跟。游击支队组建了随营学校，以培养抗战有生力量，招收学员百余名，由彭雪枫兼任校长。为了扩大战果，游击支队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彭雪枫率领，继续转战萧县、宿县、永城、涡阳地区，使游击区不断扩大与巩固；一路由吴芝圃率领，征战睢县、杞县、太康一带，扩大游击区。

根据刘少奇进一步扩大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5月，彭雪枫率部开辟淮上地区（淮河以北，浍河以南，津浦铁路以西，宿县至蒙城公路以东地区）。在进军淮上的两个月里，击毙日伪军700余人，俘虏1 100余人，整个淮上地区全部为新四军所控制。同时，支队派人到永城县做国民党鲁雨亭所部“抗日游击支队”的统战工作，争取其960人参加了新四军，被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1总队。与此同时，这个地区的党组织也有了很大发展，使新政权迅速建立起来。

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东进9个月以来，进行较大战斗数十次，毙伤日伪军1 800余人，游击支队发展到3个团、1个总队和睢杞大队，共6 400余人。其间，彭雪枫还发表了几篇总结平原游击战战略战术和作战经验的文章。10月在永城、涡阳边的豫皖苏根据地中心新兴集，成立了豫皖苏边区党委，彭雪枫任区党委书记，还成立了豫皖苏联防办事处，以统一和加强豫皖苏边区的领导。11月，游击支队改称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委。经过一年时间，新四军游击支队由近1 000人发展成为1.2万余人的抗日武装，下辖9个团，成为豫皖苏抗日根据地的支柱。之后，彭雪枫等把游击区扩大为10个县以上的范围。在彭雪枫的领导下，豫皖苏全面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人民抗日救国会纷纷建立，革命武装不断扩大，减租减息的斗争如火如荼，被服厂、肥皂厂、毛巾厂、军需厂，相继建立，新兴集当年就有“小延安”美誉。

总结豫皖苏边的斗争经验

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于1939年10月下旬来到新兴集检查工作，

听取了豫皖苏边工作汇报，部署根据地的斗争方向和任务。彭雪枫立即组织区党委讨论贯彻刘少奇的指示，拟定出地方工作要点。随后，彭雪枫借鉴晋察冀等根据地经验，先后建立了萧县、宿县、永城、夏邑、亳县5县政权和萧西、宿西、砀南3个办事处，根据地工作迅速开展起来。11月11日，国民党顽固派纠集1 800余人阴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竹沟事变”（亦称确山惨案），有200余军民惨遭杀害，新四军第8团留守处自此撤销。为此，彭雪枫在1940年3月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上发表《关于竹沟事变》一文，揭露了事变的真相，指出这是针对坚决抗战的新四军的“有计划有步骤的大阴谋的一部分！”

彭雪枫作为豫东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十分重视军队中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为了培养大量干部，边区创办了“抗大”四分校。彭雪枫、吴芝圃、张震等亲自到校任教。彭雪枫还参加筹划兴建了“精忠堂”，在大礼堂内有座位800个，“还我河山”的醒目横标悬挂于堂内。他坚持定期向干部做时事报告，组建了“拂晓剧团”，与《拂晓报》和骑兵团，被称作为彭雪枫的“三大宝”，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宣传教育和文化活动的开展。

彭雪枫根据两年来豫皖苏边区军队和根据地建设的斗争实践，总结出5条经验：一、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创造新的方式与方法；二、与广大群众血肉相连，随时替群众着想，提高群众的情绪，加强群众的信心，运用群众的力量，配合群众的斗争；三、在斗争中善于灵活提出具体鼓动口号；四、党政军民军事化而又战斗化；五、侦察警戒，是足以为我们所效法。

1940年7月，奉中共中央命令，由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率领的第344旅与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第6支队（欠第4总队）在新兴集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4纵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合计1.7万人。从此，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新的阶段。

彭雪枫率领部队和豫东人民一起，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并肩作战，成为推动华中各根据地建立与发展之榜样。当地至今流传着一首歌谣：“彭司令，真是强，谁提起来谁夸奖。生活艰苦又朴素，关心群众像爹娘。你种地，他帮忙，你打麦子他扬场。日本鬼子大扫荡，抗敌拿起刀和枪。军民团结一条心，打跑鬼子保家乡。”新四军政治

部副主任邓子恢总结豫皖苏边迅速发展的原因时指出："固有其便利之客观环境与主观条件，但与雪枫同志能正确运用党的政策，在党中央与当时中原局领导之下，独立负责，抓住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以及雪枫同志大胆的负责精神，卓越的指挥才能，精密的组织能力是分不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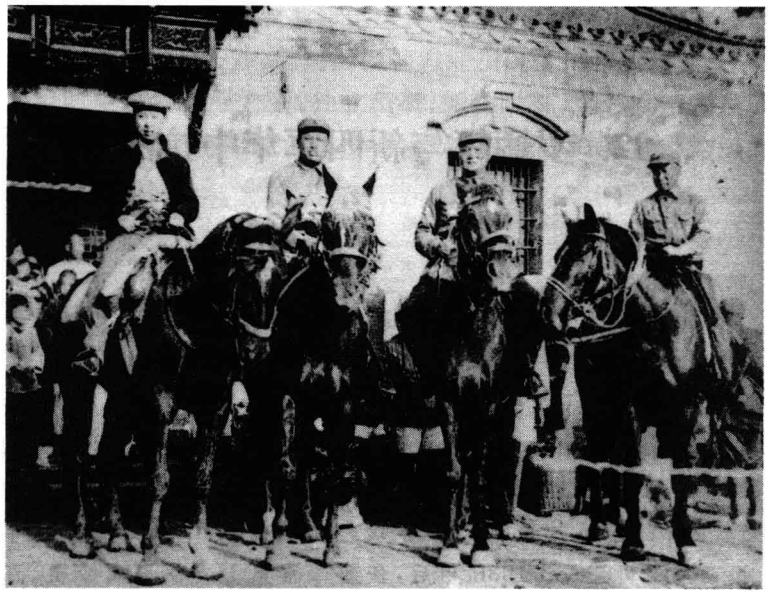
82. 罗炳辉与新四军华中抗战

罗炳辉(1897—1946) 云南彝良人。12岁从军。1915年参加讨袁护国战争。1926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任营长。1929年7月秘密加入共产党,不久领导吉安、吉水、泰和等8县靖卫队起义,参加工农红军独立第5团,任团长。后任红六军第2旅旅长、2纵纵队司令、红一军团第十二军副军长、军长、第九军团军团长等职,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红军长征后,任红三十二军军长、援西军副司令员。1938年后,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5支队司令员、第2师师长兼淮南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2纵队司令员、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6年6月病逝。

奉派到新四军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炳辉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从事军事统战工作。1938年9月,罗炳辉列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确立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总战略方针。会后,他被派到新四军工作,任新四军第1支队副司令员。12月底,罗炳辉抵达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

接着,罗炳辉于1939年春从皖南突破敌军封锁线,北渡长江,东进到达苏南茅山抗日根据地,与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会合。茅山地区处于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城镇密布,交通发达。该支队频繁活动于南京、镇江、金坛、句容一带,不断袭击日伪军,直接威胁敌人心脏——南京,经过东湾、延陵等几次战斗,使茅山战局大为改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员在安徽庐江县东汤池合影。左起第三人为罗炳辉

观，为新四军向苏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由张云逸兼任指挥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后，6 月新四军原第 4 支队整编为第 4、第 5 两支队。7 月，第 5 支队在安远正式成立，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下辖 3 个团，共 2 000 人。根据党中央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罗炳辉等率领部队越过津浦铁路，向东挺进，在长江与淮河间、津浦路南段两侧，打击日本侵略者，很快打开了皖东的抗战局面。

三打来安城

来安县城位于安徽境内的津浦铁路以东，1939 年 4 月落入日军之手。9 月初，罗炳辉乘敌立足未稳，指挥部队英勇作战，激战 3 昼夜，一举击毙守敌百余名，收复来安县城，使新四军军威大振。敌人吃了败仗，疯狂反扑，集中数千人马，进行“扫荡”，11 月再次占据来安

城。罗炳辉避实就虚，巧妙与敌周旋，敌人到处扑空，不仅找不到新四军的影子，还受到新四军的夜间袭击。待敌人被拖得疲劳不堪时，罗炳辉又指挥第5支队反击，共歼日伪军200余人，重新夺回来安县城。经过两个多月，第5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

1940年1月下旬，新四军5支队连续击溃了六合地区日伪军的两次“扫荡”，共歼敌300余人。是时，第5支队进入路东短短5个月，由3 000人增至5 000余人，3个团扩大为4个团，使苏皖抗日民主根据地初具规模。3月，国民党军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部此时乘日伪向定远、盱眙“扫荡”之机，大举进攻游击区。罗炳辉率5支队主力星夜突过铁路以东的封锁线，策援路西的第4支队。经过激烈战斗，击退千余顽军，占领了敌据点滁县施家集。紧接着，第4、5两支队协同作战，乘胜夺取定远，共歼敌2 000余人，取得路西反顽大捷。

正当罗炳辉在路西作战之时，4月，韩德勤顽军又以两个团的兵力突然向第5支队领导机关所在地半塔集进犯。新四军留守半塔的不足千人，形势十分危急，但广大指战员面对强敌毫无畏惧，固守阵地8昼夜，打退了敌军十余次进攻。由罗炳辉率领第5支队、苏皖支队等东援军陆续赶到，全线出击，一举歼灭顽敌3 000余人，取得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千余日伪军于5月下旬第三次占据来安县城，并加固工事，死守不出。罗炳辉则率部设伏待机，以火攻方式发动夜袭，4门放火，第三次攻下来安县城，死伤日军100余人，伪军200余人，缴获甚多，拂晓时又主动撤离，再留空城。

罗炳辉率领第5支队东奔西驰，三打来安城的英勇事迹，迅速传遍淮南、苏皖边广大地区，使新四军军威大振。

开辟淮宝根据地

1940年8月，罗炳辉率部北出三河，进入淮河以北淮(安)宝(应)地区。淮宝地区有几万“小刀会”民众组织被韩德勤收买与把持，宣扬所谓“刀枪不入”的鬼话，并专门以新四军为敌。罗炳辉坚决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对刀会采取分化瓦解。他认为，刀会是

农民的迷信组织，只有个别被敌顽利用的头子是坏蛋，别的都应该争取。只要他们拥护抗日民主政府，一律保障他们的安全，终于把这个地区的刀会降服了。

是时，国民党军两个团突然向来安至盱眙间的半塔镇进攻。留守半塔的只有1个教导队和后方机关，共两三百人。八路军固守了3天3夜，给敌人很大的杀伤，最后罗炳辉调回主力，一举将敌人歼灭。

罗炳辉指挥第5支队经过多次战斗，于8月下旬与南下的八路军第5纵队黄克诚部胜利会师。在罗炳辉的关怀下，组建了中共淮宝县委，成立了县联防办事处。此后，日本侵略军加紧对路东根据地疯狂“扫荡”，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但罗炳辉在根据地人民支援下，运用人民战争的游击战术，与日伪军巧妙周旋，使敌人连新四军的影子都找不到，敌人的“扫荡”化为泡影。第5支队前后共作战75次，歼敌600余人。

经过反“扫荡”斗争的胜利，罗炳辉在苏皖边至淮宝地区开辟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纵横各200里，使淮北、淮南、淮海、苏中、盐阜等抗日根据地联成一片，部分地改变了华中战局。9月，罗炳辉被委任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4、5支队司令员。

迎来华中抗战的最后胜利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重建，下辖7个师和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张云逸任师长的新四军第2师是由第4、5支队和江北游击队及地方武装组建的，罗炳辉任该师副师长兼任新创建的抗日军政大学第8分校副校长。刘少奇称赞罗炳辉等领导根据地群众击退日军的多次“扫荡”，说：“皖东，特别路东根据地工作，与华中其他根据地的工作比较，是最好的！最正规的！”年底，第2师被评为新四军的“全军建军模范”。1942年罗炳辉升任新四军第2师师长。

在根据地内，罗炳辉利用战争间歇时间，发动部队开展了大规模的整训练兵运动，培养出大批军事技术过硬的指战员。3月间，为了打击日军对解放区的“扫荡”和“蚕食”政策，罗炳辉把主力部队掩蔽

起来，在淮南的金牛山阻击敌人，毙敌 200 余人，取得了仪征战斗（金牛山战斗）的胜利。

1943 年 2 月，淮南根据地机构调整，由第 2 师兼淮南军区，第 2 师师长罗炳辉兼任淮南军区司令员。1944 年 5 月，日伪军 2 500 余人向津浦路西定远地区“扫荡”，被罗炳辉率领的第 2 师击退。11 月，日伪军纠集 7 000 人再次“扫荡”，又被第 2 师击退。

在紧张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罗炳辉每天只睡几个小时，得不到休息，他将近一年时间患有肠胃病、高血压，身体刚好便不顾休息，继续指挥部队与敌人展开激烈交战，完全忘记了病痛。1945 年春，日军向高邮湖、洪泽湖中间地区大举“扫荡”，罗炳辉的肠胃病、高血压严重起来，只好依靠担架指挥作战。一次，他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低声呻吟，但当听到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时，令他兴奋不已，希望自己能去（长）江北参加对日军的受降工作。两天之后，他坐着担架又亲临前线指挥作战，收复了六合县城，并且风趣地说：“战斗是百病的良药！”10 月，罗炳辉率领新四军第 2 师北上鲁南，承担了接受日军和伪军投降的使命。

83. 聂荣臻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聂荣臻(1899—1992)　四川江津人。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转至苏联东方大学、红军学校学习。1925年8月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任湖北省委军委书记。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军委书记,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1931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军团政委,参与指挥红军第四、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副师长、政委,参与指挥平型关战斗。后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开辟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参与指挥百团大战、反"扫荡"斗争等。解放战争时期,参与指挥了正太、石家庄等战役。后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新中国成立前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市长。后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56年后,历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是中共第七至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副主席。主要著作收入《聂荣臻军事文选》。著有《聂荣臻回忆录》。

创建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第115师在师长林彪、副师长(后任政委)聂荣臻率领下,1937年9月下旬取得首战平型关大捷后,主力部队继续南下,开辟晋西地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聂荣臻留守山西五台山区,于10月率领独立团等2 000余人,在晋、察、冀3省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创建

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打开局面，各部队相继挺进河北西部、中部和北平（今北京）西部等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开辟抗日游击区。11月7日，晋察冀军区在五台山正式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军分区。随后，聂荣臻率军区领导机关从五台山移到河北阜平。

11月底至12月初，边区部队击退了日军数倍以上兵力的“八次围攻”。在反围攻胜利后，聂荣臻在阜平主持召开了全军区部队的第一次政治工作会议。会后，各部队普遍建立了党的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军区出版了《抗敌报》（后改名为《晋察冀日报》），成立了“抗敌剧社”。至此，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最初只有北岳区，后来包括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5省各一部分，划分为太岳、冀中、冀热辽、平西、平北等行政区。晋察冀边区的创立，作为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给全国抗战军民以极大的兴奋，起到了示范的作用。

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1938年1月中旬，在河北阜平召开历时6天的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49人，代表边区39个县政府。聂荣臻致开幕词指出：今后，只要我们坚持统一战线，广泛地组织和发动群众，坚持团结，坚持持久战斗，就一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大会宣言提出：“为着创立与巩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保持华北游击战争；为着统一与整理晋察冀边区内军事、财政、经济以及一切行政机构，保持持久的必然胜利；为着打击汉奸政权，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徘徊歧途的动摇分子，晋察冀边区有成立临时政权的必要。”强调晋察冀作为华北抗日的堡垒，“将使华北抗战更能持久，更能适合于中央之抗战方针。”大会通过统一全区的军事、行政、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民运工作等各项决议案。经各界民主选举产生了临时行政委员会（即边区政府），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聂荣臻等9人为委员。从此边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聂荣臻兴奋之余，于1938年1月31日在五台山挥笔疾书，满怀信心地写下“为保卫祖国而奋斗到底，誓与华北人民共存亡！”的誓言。

建立模范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制定和实行统一的政策，进行了减租减

聂荣臻(左)与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宋劭文在交谈

息、优待抗属、停征田赋、废除了苛捐杂税。通过开垦荒地、兴办水利、借贷农具种子等措施,使边区粮食生产大大增加,保证了农民的自给和部队的给养。据统计,1938 年和 1939 年,全边区共开垦荒田 6 万余亩,开渠数百道,新区增加灌溉面积达 5 万亩以上。边区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每村设有 1 小学,每专区设有 1 中学。还设立了培养少数民族的蒙藏学校。此外,在聂荣臻的关怀下,开办了 1 所短期的军政学校,造就大批训练有素的抗日军政干部。

晋察冀边区于 1938 年 4 月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聂荣臻在会上作报告,着重阐述了目前中日战争的形势与任务,坚持华北抗战的

意义，冀中平原游击战和冀东挺进游击战以及晋察冀边区在抗战中的地位等。强调指出：晋察冀是“敌后全国惟一统一战线的政府；在敌后创根据地言，此且为先导者，其他区域皆以此为模范；对其他根据地言，此区亦不啻为统一战线实验区，无论政权、政策等各方面皆如是。”5 月，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河北游击队改编为八路军第 3 纵队，成立了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司令员兼冀中军区司令员，王平（后程子华）任政治委员，下辖 4 个军分区。同时成立了吕正操为主任的冀中行政公署。至此，冀中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同时，宋时轮、邓华在（北）平西组成第 4 纵队，宋时轮任纵队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为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宋邓支队于 1938 年下半年至 1939 年春挺进（北）平北、冀东，李运昌在冀东，萧克在平西，相继开展游击战争，建立起冀热辽抗日根据地。

1938 年秋，日军 5 万余人向五台山区和冀西围攻。在历时 48 天的反“扫荡”中，边区军民击破敌军的多路围攻，共进行大小战斗 100 余次，歼敌 5 200 余人，还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大“扫荡”。10 月 5 日，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从延安向聂荣臻和晋察冀军民发电慰勉，称赞：“已经创造晋察冀边区成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这些都在华北抗战中已经和将要尽其极重大的战略作用，而且你们的经验将成为全党全国在抗战中最有价值的指南。”希望“长久保持晋察冀边区是最进步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作为将来进攻日寇最好的前进阵地。”

为了统一领导晋察冀区委、冀中区委、冀热察区委的各项工作，11 月，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成立，彭真、关向应、程子华、聂荣臻 4 人为委员，彭真任书记。1939 年 1 月，晋察冀分局改名为中共中央北方分局。

聂荣臻就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的情况，于 1938 年 11 月向中共中央写了近 10 万字的详细报告，着重叙述了边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等状况。毛泽东看到报告后，提出要聂荣臻补充修改后出版，称这本书“是十分宝贵的”，并为之作序，亲自题写了书名《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还分别作了序。该书 1939 年 5 月在延安、重庆两处公开出版。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曾在晋察冀边区做了半年多考察后，撰写了《华北敌后——晋察

冀》一书，称赞晋察冀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它“象征着中华民族解放的胜利，象征着新中国光明灿烂的前景”。“晋察冀边区是新中国的雏型！”一时间，晋察冀边区已蜚声国内外。

辉煌的战绩

进入1939年后，日军连续不断对晋察冀边区进行残酷的“扫荡”，根据地的处境越来越困难。晋察冀边区部队与八路军120师一部，在反“扫荡”斗争中连战皆捷，令敌人十分沮丧。第120师在师长贺龙、政治委员关向应率领下，于1939年2月开赴冀中，4月，进行了有名的河间歼灭战（又称“齐会战斗”），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和围攻。冀中平原反“扫荡”，共粉碎了日军4万余人，巩固和发展了冀中和北岳区抗日根据地。从10月下旬起，敌军以2万多兵力，分12路合击，举行“冬季扫荡”，一度占领阜平。在艰苦的环境下，聂荣臻命令一部与敌周旋，迫敌又退出阜平。边区部队与120师一部与敌奋战43天，大小战斗达108次，共歼灭日军3 6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11月，在雁宿崖战斗中，歼敌600余人，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亲率敌军1 500余人，进行报复性“扫荡”。聂荣臻指示第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由黄土岭一带全线出击，歼敌900余人，阿部规秀被当场击毙，这是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被击毙的最高指挥官。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黄土岭围攻战的部队，高度赞扬其所建立的丰功伟业。此外，冀中地区在1939年上半年反“扫荡”中，作战200余次，取得了歼敌五六千人的胜利。平西地区在1940年敌7 000余人的“春季扫荡”中，半个月内，毙伤敌军2 000余人。

中共北方局为总结执行党在抗战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经验和体会，1940年8月在彭真主持下，制定了《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20条，规定：在政治上必须坚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在边区政权建设上要充分发扬民主；在经济政策上要保障一切抗日人民的财产所有权，建立严格的经济制度，发展生产，发展商业。此外，在社会福利政策和文化教育方面，都提出许多具体的规定。晋察冀在同敌人进行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同时，还成功地开展了反经济封锁的斗

争。晋察冀边区的文化教育也有可喜的成绩，各村普遍有小学，各专区有1所中学，设立了华北联合大学和抗大二分校。出版了《救国报》、《抗敌三日刊》、《新长城》、《群众》等报刊。

抗日战争期间，有一些国际友人前来晋察冀边区参观、视察或工作。其中，最出名的是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和印度医生柯棣华。聂荣臻分别于1938年和1940年会见过这两位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在晋察冀根据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崇高的形象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自1937年11月成立至1940年3月的两年4个月里，晋察冀边区共作战2 206次，毙伤日伪军5.3万余人，俘敌5 000余人。在此基础上，军区各部46个团兵力，1940年8月参加了百团大战，担任破袭正太路平定至石家庄段以及平绥、平汉、北宁各线等敌主要据点的任务。只用3天时间，就破坏了正太路东段，连克娘子关、井陉等据点，重创日伪军，巩固了抗日根据地，使晋察冀根据地由察南、冀西、雁北发展到冀中、冀东、平西、平北，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面积达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 200万，建立了80余县抗日民主政权，部队发展到10万人。据统计，在百团大战期间，全军区先后有39个团参战，作战535次，歼敌1.2万余人，俘日伪军1 200余人，炸毁铁路80多公里、公路2 900公里，铁路桥22座。我军阵亡1 396人，伤2 602人。

1941年1月，彭真奉命离开晋察冀边区去延安，北方分局又改为晋察冀分局，由聂荣臻代理分局书记。从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实施“铁壁合围”战术，施以大规模“扫荡”和“蚕食政策”，先后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施用了最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晋察冀根据地日渐缩小，进入艰苦困难的时期。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分局和晋察冀军区，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坚持敌后抗战的方针政策，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精兵简政、减租减息，建立“三三制”政权，开展整风运动，发展生产，深入敌后开展反“扫荡”、反“蚕食”斗争，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自1943年转入了恢复和发展的时期。

84. 林伯渠与陕甘宁边区政府

林伯渠(1886—1960) 原名林祖涵。湖南临澧人。早年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从事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以后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兼任农民部长、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赴苏联学习和执教。1932年回国后,任中华苏维埃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财政部部长。红军长征中,任总供给部部长。1937年至1948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权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主要著作收入《林伯渠文集》。

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苏维埃政府正式改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张国焘任副主席,首府延安。边区下辖23个县(1941年重新划为29个县),面积为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作为抗日的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陕甘宁边区是"抗日的及民主政府的模范地区",但又是经济文化落后地区,而且经常受到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攻与封锁。

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率先实行了普遍、直接、平等的选举制,有70%以上的选民参加了普选,行使人民的民主权利,成为真正普选的民主政府。到1937年11月底,边区已成立了县、区、乡各级人民民主政府。此外,在陕甘宁边区,工人90%以上

加入了工会；全体农民加入了农会；绝大多数青年加入了青年救国会；妇女70%以上加入了妇女救国会。为了统一各群众团体的抗日行动，1938年1月，由边区总工会、边区青年救国会、边区妇女联合会、边区农民会、边区文化救亡协会等25个群众团体组成了“各界抗敌后援会”。这些群众团体在完成抗战各项任务中，成为党和边区政府的有力助手。

1939年一二月间，陕甘宁边区召开参议会第一届会议，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抗战十八个月以来，边区政府“为援助前线而贡献了很大的力量。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发扬了艰苦的工作作风，厉行了廉洁政治。”强调边区今后工作的总方针，就是团结边区全体人民，“坚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抗战，保卫边区，保卫西北，保卫全中国，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实现三民主义新中国而奋斗。”还提出：“为要支持长期抗战，应付与日俱增的经济困难，同时建立国防经济基础，改善人民生活，以加强抗战力量，扩大生产运动，成为目前重要战斗任务之一。”他满怀信心地认为，只要全边区人民与政府团结一致，“发扬牺牲奋斗、埋头苦干、百折不挠、一往迈进的斗争精神，同时任何时候不要麻木自己，不要失掉自己的方向，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大会制定和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及6种法规条例，选举高岗为边区参议会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

领导陕甘宁边区建设

林伯渠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初期，同时又被任命为中共驻陕西代表，他经常奔波于延安与西安之间，自1940年11月从西安回到延安后，便以主要精力领导边区的各项建设，使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根据地。

从1941年起，陕甘宁边区进入空前的困难时期。5月，林伯渠公布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亦称《五一施政纲领》），对于团结抗战、健全武装部队、优待抗属、实现“三三制”、发展农业生产、减租减息等各项政策，都有明确的规定。这个纲领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

1941 年 11 月，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政会的全体参议员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为林伯渠

大纲领》的具体化和新发展，是党引导广大群众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陕甘宁边区建设的指南。11 月，陕甘宁边区召开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林伯渠作《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边区的一切政策，是为了进一步巩固边区，发展抗日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以坚持长期抗战，并增进人民的福利。"还说边区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是新民主主义的，正进行着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另一方面，它是处在战争的环境中，它需要用尽一切力量，来支持全国的抗战。会议接受并通过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及 400 多件重要提案。选举林伯渠连任边区政府主席，陕北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副主席。

为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1941 年 9 月，林伯渠主持边区政府专门讨论调查研究的工作会议，对于培养和训练干部，健全和建立调查研究的机构和各种制度，都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12 月，林伯渠又率领边区政府考察团到鄜县、甘泉进行调查研究，搜集许多区、乡基层的具体材料。为了深入了解基层并具体指导基层工作，1942 年 9 月初，林伯渠去延安川口县搜集整理材料，仔细了解县政府的工作，与县长专门谈论领导工作问题达六七个小时；同时还参加了县整风小组的漫谈会，对于新老干部在整风中相互配合等问

题，都作了具体指示。

为响应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3 年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1 月中旬，林伯渠在边区干部联席会议上指出：我们必须以最大的热忱和积极性参加生产。这不单是为了改善后方工作人员的物质生活，保证健康的革命体魄，坚持抗日工作，同时也是对于前线抗日的支持和配合，保证战争的供给。他要求认真总结去年的生产经验，订出今年的详细的生产计划；各机关重要负责同志须亲自参加；提高大家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要利用各种各样的生产方式和方法，抽调强有力的干部从事专门生产。林伯渠除带头制定了个人生产节约计划外，还号召大家参加大生产运动，并亲自深入志丹、安寨两县进行调查，写出《农村十日》一文。

1944 年 12 月召开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林伯渠在会上作《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工作报告，指出：三年来，边区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由于民主政治在各方面的发挥，所以发动了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积极性，也发动了富有者的积极性。”大会通过了关于各级参议会的选举、地权及土地租佃等各项条例和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军事、文化等 48 件重要提案，巩固了三三制政权，进一步推动了大后方人民的民主运动。

陕甘宁边区的大发展

为了支持长期抗战，在中国共产党和林伯渠为首的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边区政府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建设方面，都取得了很大发展。

经济建设：工业生产，建立了纺织、造纸、农具、制药等工业的初步基础。农业生产，取消了过去 42 种苛捐杂税，1937 年至 1938 年，耕地面积增加了 56 万余亩，牛羊增加 30 万头以上。1937 年全边区粮食产量为 111 万余石，到 1945 年增至 160 万石。除积极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之外，还重视发展合作社。从 1940 年起，抗日根据地逐渐进入困难时期。为了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边区军民从 1941 年起开展生产自给运动，并取得了显著成

效。耕地面积1938年为899万余亩,1942年扩大到1 248万余亩,粮食产量1938年为130万石,1942年提高到168万石。其他生活物品和办公用品,也都能全部或大部自给。1943年至1944年,边区开荒约200万亩,耕地比1936年增加了77.4%,粮食自给有余,军民生活逐渐得到丰衣足食,保证了边区军民战胜种种困难,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顺利度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岁月。根据团结抗日的原则,1942年12月,边区政府规定了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并于1944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举行的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讨论通过,成为正式的法律。

政权建设:中共中央1940年3月正式提出了"三三制"原则,即在抗日统战政权中的人员分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根据这一原则,1941年初开始贯彻执行,到1942年12月,全区已有22个县实现了"三三制"政权。这对于团结边区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争取中间势力和全国民主运动的开展,实现巩固与扩大全民族的统一团结,起了积极作用。为了克服敌人"扫荡"和"封锁"造成的困难,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接受李鼎铭"精兵简政"的建议,并发出相关指示。为了贯彻中央的指示,在林伯渠主持下,边区政府就精兵简政问题进行专门的认真研究讨论,决定立即成立编整委员会,拟定编整计划,将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缩编至原有人数的76%。1942年秋边区进行了第二次精兵简政,进一步健全了制度,并于12月通过了《简政实施方案》,明确规定了边区简政的方针和办法,进一步将边区政府机构裁并四分之一。通过精兵简政,基本达到了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和节省人力物力的目的。1943年1月,陕甘宁边区还发布了《拥护军队的决定》和《拥军运动月的工作指示》,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

文化教育建设:边区以抗战教育为中心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开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和自然科学院等;1940年小学增至1 341所,学生4.1万余人;普遍发行《新中华报》、《解放》、《团结》等报刊;创编与演出了许多诸如《白毛女》、《逼上梁山》、《兄妹开荒》、《翻身道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剧目。

政治思想建设: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开展整风运动的部署,

1942 年 4 月开始，陕甘宁边区掀起了整风运动，并取得了巨大成绩。在整风运动的基础上，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 1 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边区地方和部队县团级以上干部 300 多人出席。西北高干会议全面检讨了边区的历史和现状，从思想上清算了“左”倾错误，统一了认识，增强了党的团结。林伯渠致闭幕词指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两大任务——经济建设与加强教育，而领导经济建设又是我们工作的中心之中心”。经过 1942 年至 1943 年的整风运动，边区干部教育的规模有了很大改观，思想觉悟得到普遍提高。

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共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所在地，也是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和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林伯渠在边区工作的出色成绩，赢得了信誉，一直连任边区政府主席。他在领导边区工作中，不仅坚定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光荣完成了作为抗日民主模范根据地的历史使命，而且密切联系群众，关心、信任和爱护干部，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处处遵守各种规章制度，克己奉公。边区副主席刘景范回忆说：“我在边区工作期间，所以在工作中能够取得一些成绩，与林老的热心教育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85. 李富春与大生产运动

李富春(1900—1975)　湖南长沙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3年转为中共党员。1925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代理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等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西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东北军区副政委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副组长、国务院工交办公室主任等职。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著作收入《李富春选集》。

负责领导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加之一些地区连年遭受自然灾害,给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战胜严重的物质困难,坚持抗战到底,中共中央决定在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同时,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1939 年 1 月，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方针，号召边区人民群众和部队、机关、学校全体人员“自己动手，生产自给”。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2 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长李富春代表党中央作了《加紧生产，坚持抗战》的动员报告，阐明了开展生产运动的目的、意义计划和实施办法，指出：生产运动我们以前还没有大规模做过，今天我们要有计划大规模地行动起来，这是目前迎接民族抗战新阶段到来的时候，“党给予我们每个同志新的战斗任务”。还指出发展生产运动，能够解决我们将来财政经济物质上的困难。这不仅是陕甘宁边区应该这样做，从全国看，要克服空前未有的困难，争取最后胜利，也应该这样做。最后提出了 1939 年发展生产的具体计划，号召全体军民，努力生产，克服困难。为了加强对大生产运动的领导，成立了边区生产委员会，作为大生产运动的指挥机关。会后，各单位迅速召开生产运动大会，传达李富春的报告精神，制订了生产计划。4 月 1 日，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督导民众生产勉励条例》，具体规定了对群众生产加强领导的有力措施。边区随即出现了生产高潮。

在大生产运动中，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负责领导这项工作，他反复指出：生产工作一定要从盲目走上自觉，为了实现自觉生产，必须大力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哪些是自己这个地方可以干的，哪些是这里不可以干的，哪些是有效的生产，哪些是无效的生产。1939 年 11 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抗战以来边区经济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关于继续发展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决议》，号召边区人民克服困难，发展经济，奠定全体人民自给自足，丰衣足食的基础。

掀起大生产运动热潮

为了总结一年来开展生产运动的经验，1940 年 2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总结大会，李富春作了《生产运动总结与新的任务》的报告，阐明了生产运动中的必要与可能、自力更生与力争外援、

统一领导与独立工作、生产任务与政治任务配合起来等 4 项基本原则。他指出:一年来,后方各机关、学校、部队将近 5 万人和全边区 200 万民众在生产战线上苦战恶斗,胜利完成了伟大艰巨的生产任务,“我们是何等的喜悦、我们是何等的兴奋!”此外,为了扭转边区财经上的困难局面,提高生产能力,中共中央根据李富春的建议与筹划,这年初,成立了自然科学院,李富春担任院长(1941 年初徐特立接任)。1940 年 11 月,中共边区中央局作出了《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指示:“各级党委必须以开展经济建设,当作当前最迫切的实际中心工作之一。”指出:“没有有效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边区的巩固与发展是不可能的。”党的各项政策,很快初见成效,经过一年的努力,到 1940 年底,边区军民共开荒地 170 万亩,畜牧业也有了发展,牛、驴增加了 5 万多头,羊增加了 60 万只。

1941 年至 1942 年,中国抗战进入最艰苦的阶段,也是解放区最困难的时期。边区 150 万人口给财经造成了巨大的压力。1942 年 10 月,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议确定:“边区党今后的基本任务是建设,而建设的任务就是生产与教育两大工作,其中生产更有决定性。”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组织起来”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机关、部队、学校、农村各界人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向荒地开战,迅速掀起了大生产运动的高潮。

在党中央“以农业为第一”的方针下,李富春提出了机关、部队、学校、生产的种类“以农业生产为主,分别进行农工商运输及畜牧业”的原则。除集体开荒、种粮、种菜外,还创办农场、牧场、菜园,逐步实现粮、菜、油、肉的半自给或自给。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开展生产竞赛,大生产的热潮持续不断,使边区的农业、工业、手工业、畜牧业和运输业等都得到迅速发展,渡过了难关。

1943 年以后,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直属机关和学校经济工作人员会议,李富春在会上作了《丰衣足食,为改善物质生活而斗争》的报告,提出了 1943 年生产自给、丰衣足食的目标。在大生产运动中,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与人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以身作则,亲自参加生产劳动。3 月,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警卫团举行纺线比赛,周恩来、任弼时、李富春等,也都披挂上阵。9 月,李富春率领中直机关各

生产委员会主任到南泥湾了解屯垦情况，学习他们的生产建设经验。这一年边区军民在生产自给、丰衣足食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机关、学校达到粮食自给15%至40%不等，蔬菜接近全部自给。

在大生产运动中，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于1941年至1942年，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先后分4批全部开进延安东南的南泥湾。此前，李富春曾多次到南泥湾做调查。359旅到达后，李富春又来到这里，希望王震率部用劳动改变这片荒凉的土地。王震率领全旅官兵，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战，终于把荒无人烟的黄土高原改造成为“陕北江南”。1941年，全旅开荒1.12万亩，达到粮食自给1个月，经费自给78.5%。1942年，全旅开荒2.68万亩，达到粮食自给3个月，经费自给92.2%。1943年，达到粮食和经费全部自给。1944年，不仅粮食和经费全部自给，还积存1年的储备粮，上缴1万石公粮。

大生产运动的巨大成就

1944年1月下旬，召开中央直属生产运动总结会。李富春所作的会议总结报告，受到毛泽东和广大干部的高度赞扬。报告指出：大生产运动在丰衣足食，减少财政负担；提高生产力，改善供给制度；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等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收获。整个边区，从1939年到1941年，共开荒209万多亩；从1942年到1944年，共开荒200多万亩。耕地面积由1941年的1 213多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 425多万亩；粮食产量由1941年的45万多石，增加到1943年的181万多石；棉花产量由1941年的100万斤，增加到1944年的300万斤；畜牧业中牛的产量由1939年的15万多头，增加到1943年的22万多头。边区实现了自给自足并有节余。边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带动了工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到1941年底，边区厂矿数达到111个，职工人数达到6 400多人。到1945年，边区职工人数已达万余人。

在生产劳动实践中，边区涌现出以吴满有、赵占魁、刘建章、杨朝臣为代表的数百名劳动英雄。1944年12月，边区召开了劳模代表受奖大会，表彰先进集体与个人。李富春在参与领导陕甘宁边区大生

产运动中，充分显示了他的领导才干，做出了成绩，被中直机关一致推选为特等劳模代表。

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是一个伟大创举。它战胜了抗日民主根据地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促进了人民军队建设，增强了军民团结，培养了一批通晓经济工作的干部，带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特别是边区军民所发扬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培育了被后人称之为艰苦创业的延安精神。

86. 罗荣桓与山东前期抗战

罗荣桓(1902—1963) 湖南衡山(今衡东)人。早年在青岛大学读书,从事学生和农民运动。1927年春加入共青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是年9月在鄂南率部参加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1930年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并代理师长。开辟山西吕梁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率部挺进山东,相继开辟鲁西南、鲁南、鲁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43年先后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115师政治委员兼代理师长、中共山东分局书记。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兼中南军区政委。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以及解放包括海南岛在内的中南各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检察长、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主要著作收入《罗荣桓军事文选》。

开辟泰西根据地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中央指示山东省委,应以"发展游击战争与建立抗日根据地为中心任务"。中央军委决定派115师去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根据党中央的决定,1939年3月,八路军第115师代理师长陈光与政治委员罗荣桓率领师部机关和686团(杨勇任团长兼政委)共2 000余人,组成"东进支队",从晋西出发到达山东西部郓

罗荣桓在山东泰(山)西东平湖召开的高干会议上作形势报告

城地区。此时,山东抗战已有一年多时间,并于 1938 年 12 月组建了由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共 2.4 万余人。因此 115 师的到来,与山东纵队成为山东抗战的两大主力。

罗荣桓率部进入鲁西后,袭击敌人据点,首战告捷,歼灭敌军 1 个团,俘团长以下 570 余人。3 月 12 日,罗荣桓在东进支队排以上干部会议报告中提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在泰山西端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依山(泰山)伴湖(东平湖)向外发展。还指出: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帮助发展一切抗日的地方武装;帮助发展地方党组织;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随后,罗荣桓率主力进入泰西,与山东纵队第 6 支队会师。统一领导鲁西地区的斗争,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

罗荣桓曾出席 1938 年 9 至 11 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1939 年三四月间,他分别在泰西地区抗日活动积极分子大会和高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着重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5 月初,罗荣桓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报告指出:“创建泰西抗日根据地的两个基本问题——武装问题、政权问题。解决了这两个基本问题,泰西根据地的创造才能有相当的基础。”还提

出:在武装方面,要有计划地发展和扩大武装,提高质量,加强党的领导。在政权方面,要争取泰西地区行政上的初步统一,改善民生,开放民主,动员更多的人力、财力帮助军队。

5月上中旬,日本侵略军8 000余人分九路围攻泰西地区,115师师部、部队和鲁西区党委机关共3 000余人陷入包围圈内。此时,陈光与在外地的罗荣桓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率部在肥城县陆房周围与敌激战,歼敌1 300余人,八路军伤亡300余人,最后胜利突围。8月2日,罗荣桓和陈光指挥部队在梁山地区伏击日军,歼敌300余人,大大树立了八路军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中央军委特发来电报,祝贺此次战斗胜利。

创建鲁南抗日根据地

罗荣桓于9月率领115师师部、686团和津浦支队,越过津浦路,由鲁西进入鲁南地区,计划建立以抱犊崮山区为中心的鲁南抗日根据地,之后再向东北发展,与山东纵队活动地区连成一片。10月,中共山东分局进行改组,朱瑞接替郭洪涛任书记,罗荣桓、徐向前等为委员。此时,位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4省边界的"湖西地区",发生了"肃托"事件。这里从1938年8月开始肃清"托派"工作,在未向上级请示的情况下,将400余名党员、干部关押起来,100余名干部被杀害。由于大搞逼供信,造成人人自危。10月,党派罗荣桓、郭洪涛等处理湖西"肃托"事件。罗荣桓得知这一情况后,命令立即停止捕杀行为,听候处理,并亲自带领工作人员星夜奔赴湖西,调查事件真相,他果断地将被关押的几百名"囚犯"释放出来,制止了对干部、党员的乱捕乱杀,为被害者昭雪,挽救了湖西"肃托"造成的危局,使湖西党组织和湖西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罗荣桓10月27日在抱犊崮附近大炉召开的师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政治形势及任务的报告,着重指出:"中央指出当前时局最大的危险,是反共现象与倒退现象,这是资产阶级动摇分子准备投降的步骤,我们要协同全国一切爱国同胞,动员群众切实执行三大口号: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

退。”12月下旬，罗荣桓回到鲁南。是时，第115师已进入抱犊崮山区，先后建立了6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罗荣桓在鲁南抗日根据地，除狠抓武装斗争外，还大力进行统一战线以及党和政权的建设工作。12月26日，他在115师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目前我师的任务是创造抱犊崮山区，使之成为八路军在山东的单独的根据地，配合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40年4月，日伪军8 000余人向抱犊崮山区“扫荡”。5月，在罗荣桓等指挥下，八路军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历时20天，经大小战斗32次，歼敌2 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扫荡”，保卫和巩固了鲁南根据地。10月，罗荣桓和朱瑞、陈光等在鲁南天宝山区桃峪村召开历时3周的旅以上高干会议，罗荣桓在会上作了115师在山东工作的总结报告，指出115师进入冀鲁边、苏鲁豫、鲁西、鲁南等地区后，开辟了根据地，给这些地区输送了近300名干部，帮助建立了一批县级政权，扩大了我军的力量，建立了2个军区、6个军分区。他还生动概括了对敌顽斗争的“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会议决定将115师和部分地方武装统一编成6个教导队，分布于苏鲁豫皖、鲁南、滨海、鲁西、湖西、冀鲁边等地区。罗荣桓等领导115师在山东的工作，得到了党中央的首肯，毛泽东、朱德等10月18日来电称：“一一五师有极大成绩，你们的总路线是正确的”。

渡过最困难的日子

1941年进入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此时，山东武装力量已达8万人，其中115师近3.7万人。为统一山东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组成新的山东分局和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山东分局委员、军政委员会书记。根据中央的指示，山东军政委员会作出《关于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建立统一指挥的决定》，将两个指挥机关靠拢，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115师师直机关由滨海区移至沂蒙区。到年底，115师和山东纵队经过50多天的150余次作战，歼灭日伪军2 000余人，粉碎了敌人对山东最大的一次“扫荡”，坚持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15师和山东纵队自身伤亡1 400余人，群众被抓

被杀 1.4 万余人。

在抗战最困难的时日，1942 年 4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从苏北新四军军部回延安途中，受党中央委托，到山东视察工作，在山东分局和 115 师驻地分别同罗荣桓等山东党政军负责人交谈。在刘少奇的领导下，通过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统一军事领导和妥善地处理“抗敌自卫军”，使山东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从 8 月起，活动于津浦路以东和陇海路以北的山东纵队正式改为山东军区，下辖鲁中、滨海、鲁南、冀鲁边、清河、胶东 6 个军区、20 个军分区。

为指导敌后抗战渡过难关，罗荣桓在 1942 年发表了许多文章，对抗日游击战争战术原则的论述，颇有建树。8 月 1 日在《斗争生活》发表《坚持我们的边缘游击区》一文，指出：“坚持着我们边缘游击区，使其成为我们外围的扩张线、活动的跳板，以打破敌人紧缩政策，建设起通向敌占区或越过严密封锁线之潜渡桥梁，这对我们克服最艰巨的一段过程，是有特殊意义的。”同一天，罗荣桓在《战士》月刊发表《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的根据地》一文，指出我们要组织一切力量，“向着敌人占领区内部去活动，把敌人的紧缩包围封锁圈拉破口子，使敌人对纵深点面的控制有不牢固的环节，使我们有条件地向着敌人占领地带上打击它的虚弱。这是我们当前对敌斗争的方针。”

罗荣桓对军队政治工作情有独钟，注重从思想理论上提高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在敌后战斗频繁的艰苦环境中，他亲自给山东分局党校和直属机关干部讲授《联共(布)党史》及《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他多次主持召开全师政治工作会议，在 1942 年 3 月召开的连队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阐明了连队政治工作的职责、作风、方法等问题，指出连队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主要是以政治工作的手段来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政治工作必须通过艰苦耐心地说服教育与发扬较多的民主，启发战士的自觉；连队政治教育要实事求是，切忌任何抽象的东西，一切问题要从战士能领会讲起。1943 年 1 月主持召开第 115 师政治工作会议并作《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的报告，强调：“政治工作要从关心军事技能、技术及战术之改进上达到集中于战斗精神的关注，求得以小的牺牲去换得大的胜利。”要求部队进一步加强连队政治工作，巩固党支部

的堡垒作用，普遍开展对敌政治攻势。

为指导山东抗日战争的发展，1942 年 10 月 1 日，山东分局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作出了《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充分肯定山东抗战 4 年来所取得的成绩：一、建立了相当大的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扩大了 115 师，坚持了山东抗战。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开辟了游击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实施了抗日的各项政策。三、初步组织了群众，部分发动了群众的自卫武装和民兵。四、建立和发展了山东的党，创造和领导了各种抗日事业。五、部分地协助华中的坚持和发展，部分地策应了其他各根据地的斗争。同时也指出了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和错误。

罗荣桓在山东抗战前期，虽身患肾病，过度疲劳，一度经常便血，但仍以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一直带病坚持工作，并取得了卓越成绩。1943 年 3 月，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兼 115 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从此，他继续肩负起山东后期抗战的领导重任。

87. 彭德怀与百团大战

彭德怀(1898—1974) 湖南湘潭人。北伐战争时任国民革命军代理团长、团长。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率部发动平江起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开辟了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1930年先后任红三军团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红一方面军副总司令、中革军委副主席。长征后期,任陕甘支队司令员、西北军委副主席、红一方面军司令员。1936年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开辟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秋,在华北组织发动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后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是中共第七届政治局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对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作出卓越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西北局第一书记。1950年至1952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是中共第八届政治局委员。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1978年得以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主要著作收入《彭德怀军事文选》。

提出大破袭战的设想

日本侵略军在停止了对中国正面战场的进攻后,1940年将其兵力重点转移到华北,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进行"扫荡",并强力推行

百团大战期间，彭德怀在前线指挥

所谓“治安强化”政策，尤其对晋东南实施其“囚笼政策”。是时，一方面形成日趋严峻的抗日局面，使之根据地面积不断缩小，八路军给养愈加困难；国民党顽固派更加动摇，投降危机愈趋严重。另一方面，日伪军深入根据地后，造成交通线空虚，敌后守备薄弱，给八路军进行大规模破袭战役提供了契机。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总部决定组织一次大破袭战役，击毁敌人重兵守护的交通线，以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最先酝酿并形成发动一次出奇制胜破袭战役设想的，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他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左权和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的赞同。

从1940年7月上旬，八路军总部开始部署交通大破袭战。直接参加的兵力为晋察冀军区、129师和120师共22个团，重点破袭正太路，其次是平汉路、同蒲路和白晋路。任务划分为：太行山区是从娘子关起至太谷，从石家庄起至新乡；五台山区是从石家庄起至卢沟桥，娘子关至石家庄，以及南口东西段；晋绥区是从太原以北到雁门关北；太岳区是白晋路全段；冀南区和冀中区是从石家庄至德州全段。原定于8月上旬乘青纱帐旺盛时节进行。

定名为“百团大战”

八路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左权于1940年7月22日向120师、129师、晋察冀军区发布破袭正太路的《战役预备命令》，同时报中央军委。命令提出：为打击敌人“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敌对晋察冀、晋西北及晋东南‘扫荡’较为缓和，正太沿线较为空虚的有利时机，大举击破正太路。”“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配合正太铁路战役之成功。”命令要求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之总兵力不少于22个团，定于8月10日前完成侦察、器材准备、部队调动等准备工作。各区接到此部署后，积极行动，提早准备和进入预定地域。8月8日，朱、彭、左向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邓小平又发出破袭正太路的战役行动命令。命令要求聂集团以10个团破袭平定东至石家庄段正太

线，刘、邓集团以主力8个团破袭平定至榆次段正太线，贺、关集团以4至6个团破袭同蒲线北段。同时要求3个集团均以一部分兵力对华北其他各铁路及公路进行宽正面的破袭。

为了防止敌人发觉，保障各地同时突然袭击，未等军委批准，即于8月20日晚8时战斗正式打响，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各部按预定时间发起攻击，迅速扑向敌控制的据点、车站、桥梁、碉堡、隧道、电线设施。在各地战场，枪炮声、爆炸声、喊杀声，连成一片。彭德怀一夜没有合眼，等待着前线的消息。战斗取得了一些胜利后，各根据地不少武装自动参加战斗，至8月22日，投入的兵力已达105个团，约40万人的兵力。当天中午，彭德怀、左权发出致各兵团电，首称“这次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

奇袭的巨大成功

在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下，依靠群众的配合，百团大战进展得比较顺利，破坏铁轨，平毁路基，爆破车站、桥梁、隧道和通讯设施，以及工矿设备。整个战役表现出作战不同的3个阶段。

战役打响后，彭德怀以同时发动，分散出击，使敌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境地，巧妙而又大胆地将正太、平汉、同蒲等各铁路段进行严重破坏，截断华北敌军全部交通。这种奇袭式的交通总破击战，打击重点为正太路。经过22天奋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正太、同蒲、白晋、平汉、平绥、津浦、北宁各铁路捷报频传，毁坏“大动脉”正太路的三分之二，严重破坏井陉煤矿，两度攻占娘子关。歼敌6 700余人，破坏铁路600余里，公路1 500余里。8月23日，八路军总部电令嘉奖部队指出：“‘百团大战’是抗战以来在华北战场上空前未有的、自主积极的向敌寇进攻大会战，对于全国抗战形势与华北整个战局均有伟大意义。”这是战役的第一阶段，于9月10日基本上结束。

从9月20日开始，战役进入第二阶段。彭德怀等决定在继续破袭交通线的同时，将重点放在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各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进行了涞(源)灵(丘)、榆(社)辽(县)、任(丘)河(间)、大(城)肃(宁)等几次战役。129师攻克了晋东南的榆社、辽县等县城。

当百团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立即致电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可组织一两次？"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应仿效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江苏、山东、安徽、河南境内之八路军，为配合百团大战，亦各自发动破击战。

战役第三阶段始于10月6日。日军开始对晋东南、晋西北和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的报复"扫荡"，八路军总部下达反扫荡作战命令，先后在晋东南太北区、平西区、晋西北、雁门区、晋察冀边区、太岳区、太南区、冀中、冀南、大青山等区，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战。反扫荡作战至1941年1月24日结束，历时41天，共进行战斗217次，歼日伪军2 500余人。

整个百团大战，自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历时105天，八路军几乎动员了全部主力在华北各省广阔的地区，进行大小战斗共1 824次，歼敌伪军2.5万余人，俘敌1.8万余人，缴获枪支5 600余支，破坏铁路940余里，公路3 000余里，毁坏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破坏煤矿5所，捣毁敌伪据点2 993个；一度收复了四五十座县城；相当严重地破坏敌人在华北的7条铁路和15条公路的交通运输，正太、平汉铁路一个多月才通车；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和武器弹药，是抗日战争中缴获最多的一次。

书写抗战史上的辉煌一页

百团大战进行11天后，8月31日，彭德怀即向新华社记者谈了此次战役的意义，他说："已经证明了八路军的力量，已经证明了八路军对于国家民族的贡献。""我们希望其他抗日军队以'百团大战'为榜样，继续'百团大战'的精神，开展新的战斗，争取新的胜利。"12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在《百团大战总结战绩》中指出："百团大战实为我国抗战以来空前未有之大创举！"

百团大战打破了"囚笼政策"，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气焰，动摇了敌伪政权；极大地提高了华北人民群众敌后抗日的胜利信心，并且给蒋管区人民以很大兴奋，同时也提高

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声望，粉碎了国民党制造的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专打友军不打日军”等谣言。12 月 22 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给彭德怀电报说：“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新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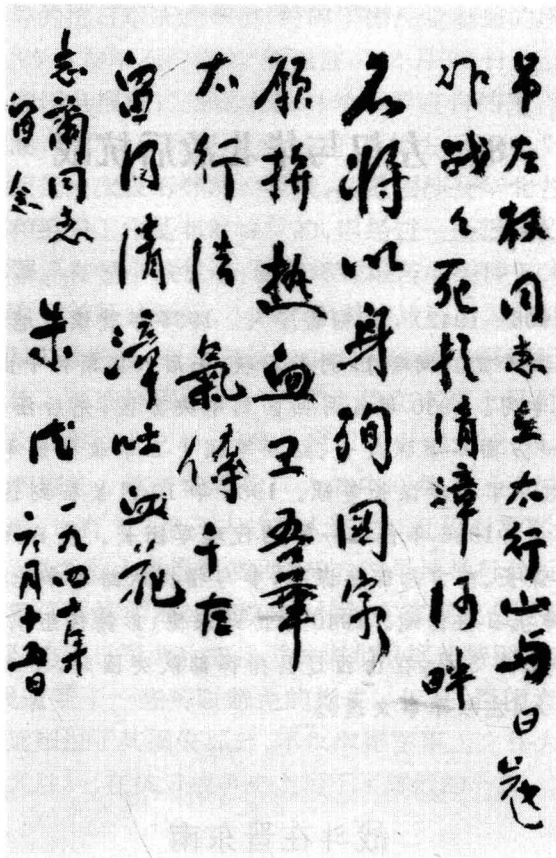
百团大战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战役，其范围涉及华北各省，其战役的准备工作和组织工作是非常艰巨的，但经过一个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战役部署。在整个战役中，彭德怀在艰苦的条件下，时常废寝忘食，运筹帷幄，冒着枪林弹雨，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亲自观察战场情况，指挥部队英勇作战，充分表现出彭德怀独特的军事胆略、指挥艺术和作战风格。彭德怀回忆说：“百团大战在军事上是打得好的，特别是在打了反磨擦战役之后，必须打反日的百团大战，表示我们是为了抗日才反磨擦的。这才能争取广大的中间势力。”不过八路军、决死队在此役中，也有 2.2 余万人的重大伤亡。此役对敌军进攻方向估计也有失误，以为敌人是要进攻西安的，过早地举行此役，所以推迟了日军打通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时间，在客观上起了援助蒋介石的作用。同时迫使日军调兵加强了对华北根据地特别是对太行山区的进攻，人民遭受了一些可以避免的损失。但是，百团大战的胜利，实际意义远远超过了其损失部分，不仅取得军事上之伟大胜利，也有政治上之伟大胜利，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88. 左权与华北敌后抗战

左权(1906—1942) 湖南醴陵人。1925年就读黄埔军校第一期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赴苏联,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6月回国到中央苏区,先后任闽西新十二军军长、红一方面军参谋处长、红五军团十五军政委兼军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一军团参谋长等职。1935年10月长征到达陕北,参加了东征和西征。1936年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参与指挥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1940年协助朱德、彭德怀组织和指挥了百团大战。1942年5月,在山西辽县指挥部队突围时,不幸中弹牺牲。主要著作收入《左权军事文选》。

战斗在晋东南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左权任八路军副参谋长。9月,左权随八路军总部,从陕西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辅佐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左权在辗转深入太行山,途经晋东南稷山县时,9月18日致信叔父左铭三,写道:"我们将以游击运动战的姿势,出动于敌人之前后左右各个方面,配合友军粉碎日敌的进攻。我军已准备着以最大的艰苦斗争来与日本周旋……在持久的战争中必须能够吃苦,没有坚持的持久艰苦斗争的精神,抗日胜利是无保障"。11月太原失守后,八路军总部决定敌后分兵,除一小部分留在晋察冀坚持战斗外,主力3个师的大部转移到汾河流域、晋南、晋西北、晋东南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2



朱德悼念左权的诗文

月3日，左权在洪洞写给母亲的信，表示："现全国抗日战争，已进到一个严重的关头"，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也决心与华北人民共艰苦，共生死。不管敌人怎样进攻，我们准备不回到黄河南岸来。"

1938年2月，日军4万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分三路向临汾大举进攻。面对严峻的形势，左权对朱德说：我们"如果避而不战，总部是可以安全转移，避免危险；但是，如果能阻止敌人前进，就可以使临汾的军需物资运走，总部背后的友军可以安全转移……这一仗，看来非打不可！一定要拖住它！"朱德完全同意左权的分析，当机立断，迎击敌人。交战之初，八路军失利，朱德即派左权前去指挥，最后击退了敌人连续不断的进攻。罗瑞卿在评述临汾遭遇战时

指出:“左参谋长躬身前哨侦察,侧击致胜,迄今军中称道不已。”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3 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在长治县城附近召开会议。会后,八路军总部举办政治训练班和游击战术训练班,左权向学员多次讲授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原则,并阐明了中共坚持敌后抗日的正确主张。

日军于 4 月初又以 3 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八路军总部驻地发动大举围攻,妄图围歼八路军于武乡、辽县、榆社地区。根据左权与朱德、彭德怀等制定的作战计划,八路军在武乡县长乐村经过 14 小时的激战,赢得了战斗的胜利。反“九路围攻”的胜利,共歼敌 4 000 余人,收复辽县、黎城等 18 个县城,把日军全部赶出了晋东南,奠定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并为向冀南、豫北平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左权高兴地说:“我们打了胜仗,现在大家准备好,把司令部的牲口牵出来,去运伤员和胜利品。”

不久,朱德、彭德怀赴延安出席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左权留守晋东南主持八路军总部工作。12 月中旬,左权在潞城北村主持召开了晋东南参谋长联席会,总结了八路军司令部工作的经验,他起草了《八路军各级司令部作战条例》,建立了司令部的组织机构及确定工作规划,又编写了《八路军的战斗教练工作》。

1939 年 6 月,在朱德、彭德怀和左权指挥下,粉碎了敌人 5 万兵力对晋东南根据地的最大规模的第二次“九路围攻”。经过 50 多天的激战,与敌交战 70 余次,歼灭敌人 3 000 余人。在此前后,左权发表了《论坚持华北抗战》、《论敌人大举围攻晋察冀边区及晋察冀边区反对敌人大举围攻斗争中之经验教训》、《埋伏战术》等一批军事文章。正如周恩来所说:左权是一位“有理论修养,同时有实践经验的军事家”。

面对国民党、日军和伪军向八路军三面夹击的严峻形势,1940 年 2 月,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向部队发出整军训令,共整训两期,每期 4 个月,整训 50 个团。2 月下旬,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朱怀冰、冀察战区副司令石友山等部,在日军密切配合下,向以八路军总部为中心的太行区大举进犯。为加强统一太南、豫北作战指挥,成立了八路军第 2 纵队,左权兼司令员、黄克诚任政治委员。是时,八路军总部和 2 纵主力都在太行山,2 纵奉命去冀鲁豫,左权因工作需要不能和 2 纵一起去。当朱怀冰率国民党军向太行山根据地大举进攻时,担任前

敌指挥的左权率部，于3月初全歼朱怀冰两个师，打退了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巩固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

参与指挥百团大战

1940年8月，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共同发起指挥了著名的百团大战。此前，左权有几个月时间，为制定这一战役的计划倾注了全部心血。他经常面对作战地图，废寝忘食，运筹帷幄，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聚精会神地周密思考着战斗部署。战斗打响后，左权与朱、彭正副总司令，于晋东南八路军总部，不断发布作战命令。在大破袭战进行到第10天之日，左权撰写了《论"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一文，指出百团大战的胜利，"这对于全国抗战形势之好转，对于保卫西北，对于敌后华北抗战的坚持，都具有极大的意义。"这一胜利的到来，是由于华北的八路军"坚决的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敌后抗日与坚持新的抗日根据地"。"坚持执行了正确的战略战术，这就是以游击战为主，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一战役的胜利，"证明了共产党与八路军真正忠诚于国家民族，而且为国家民族建树了不少成绩。""证明了共产党与八路军的抗战主张是完全正确的"，还证明了八路军已"成为华北抗战的主要支柱"。经过20多天的奋战，胜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破袭正太路的任务。与此同时，在华北其他铁路沿线也纷纷告捷。在战役的第三阶段，左权协助彭德怀把守被日军包围的关家垴和柳树垴一带，在关家垴战斗中，他临危不惧，指挥战斗取得了胜利。之后，左权写了《百团大战第三阶段的新胜利》一文，指出敌人的"扫荡"和"囚笼政策"，是能够击破的。

1941年11月，敌人突然向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进攻。这个兵工厂是左权和八路军军工部长刘鼎等苦心经营的制造兵器的设施，是八路军最大的枪炮军工厂。经过1年的努力，黄崖洞兵工厂每年可生产供16个团的装备，有力地向华北前线的八路军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在黄崖洞保卫战中，左权沉着对应，指挥部队将机器设备掩埋好，使工人们安全转移，负责保护兵工厂的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在团长

欧致富指挥下，进行了黄崖洞保卫战，歼敌主力近 2 000 人。中央军委誉此役为“1941 年以来反扫荡的模范战斗”，并被八路军总部授予特务团以“黄崖洞保卫战英雄团”的光荣称号。

血染太行

日军扫荡太行失败后，加紧推行“蚕食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1942 年 5 月在晋东南集结 3 万兵力，采取“铁壁合围”的战术，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大“扫荡”。是时，八路军总部已转移到山西省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镇。左权心系周围的整个党、政、军机关的安危，立即召集紧急会议，部署了行动和作战计划。他在会上指出：这次华北的敌人拼了老本，妄图把我们消灭在太行山上。为了吸引敌人，配合跳到外线的我军主力行动，我们的目前处境是相当艰难的。北方局、总部、党校和整个后方机关都在我们周围，首长和几千名同志的生命都担在我们肩上。一定要掩护他们安全转移，跳出敌人的“铁壁合围”。5 月 25 日中午，左权根据首长会议精神，命令部下立即把彭德怀安全护送出去。彭被劝说走后，敌人紧缩了对辽县十字岭的包围圈，敌机在上空不停地狂轰滥炸。根据左权的提议，总部分三路突围，他不顾自身安危，十分镇静地指挥司令部各部门向外突围，当冲到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他发现担文件箱的战士没上来，就叫警卫员马上回去找。警卫员刚走敌人又扑了上来，不料，一颗炮弹飞来，弹片击中左权的头部，不幸殉国。

左权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阵亡的最高将领。他戎马一生，从军校到战场，有近 20 年的军旅生涯，在抗战以来的 5 年中，从未离开前线。他的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尤其是对于八路军和敌后人民，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哀讯传来，震动了八路军全体将士，华北敌后广大人民无不为之动容。中共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野战政治部颁发《关于追悼左权同志的决定》，号召全军将士继承左权遗志，坚持华北敌后更加艰苦的斗争，直到抗战的最后胜利。1942 年 6 月，朱德为纪念左权烈士特作诗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7 月 3 日，聂荣臻在《晋察冀日报》

上作《祭左权同志》一文，对这位多年朝夕相处的老战友，表达了无限的悲伤与思念，呼唤“左权同志精神不死！”发誓“我们一定要报仇！”1943 年 9 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辽县命名为左权县。10 月将左权公葬于涉县，并在涉县石门修建了左权陵墓和纪念塔。彭德怀亲笔题写墓志铭：“隆冢丰碑，永昭坚贞不拔之毅惊魄”。1950 年 10 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左权灵柩自涉县石门山麓移葬于邯郸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89. 项英与皖南事变

项英(1898—1941)　湖北武昌人。早年做工并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任京汉铁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参与领导"二七"大罢工。1924年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湖北省总工会组织部长、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等职。是中共第三至六届中央委员。1928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当选为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历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任中共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与陈毅等领导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革命武装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为组建新四军作了大量工作。在皖南事变中,不幸殉难。主要著作收入《项英军事文选》。

蒋介石预谋聚歼皖南新四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改编而成的新四军,于1938年1月在江西南昌正式成立,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下辖4个支队,共1万余人。为加强对新四军的领导,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任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7月,新四军军部移至安徽泾县云岭。在叶挺、项英率领下,新四军纵横大江南北,与日顽作战奋勇当先,表现出十分活跃旺盛的战斗力,打退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新四军的英雄气概和迅速发展,引起蒋介石国民党的极大恐慌,蓄意要消灭这

途经安徽茂林镇的皖南新四军

支抗日武装，于是决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

受蒋介石的指使，1940 年 10 月 19 日，国民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第十八集团军正副总司令朱德、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即“皓电”)，大肆诬蔑八路军、新四军，限令我军于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随后，项英召开军分会和东南局会议讨论，同意北移，并着手北移的准备工作。11 月 9 日，中共中央以朱、彭、叶、项的名义答复何、白(即“佳电”)，有力驳斥了国民党对我军的种种污蔑，同时为顾全大局挽救危亡，决定让步，公开表示可将江南新四军部队渡江北移。

其间，蒋介石紧锣密鼓地实施对皖南新四军的围歼计划，密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调集兵力，于 12 月底以前秘密推进到南陵、泾县、茂林、铜山一线，完成对皖南新四军的袋形包围部署。随后，国民党各部队 7 个师近 8 万人集结于皖南，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统一指挥，封锁新四军部队经苏南北移的去路，准备包围聚歼。

项英对北移踌躇不决

北移方针是中共中央经过长期考虑的重要决策，虽多次指示新

四军要迅速北渡，但其决心并非始终如一和明确坚决，曾计划“应以一部北移，留一部坚持游击战争”。甚至一度将新四军北移作为向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砝码。中共中央 11 月 21 日指示叶挺、项英：“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但须认真准备北移”。直至 12 月 24 日，中央军委才命令项英，新四军必须准备于 12 月底开动完毕，一切问题须在 20 天内处理完毕。

项英本来就缺乏北移的思想准备，踌躇不决，曾屡次向中央请示：“我们的行动应如何？”12 月 13 日项英致电中央，强调敌情困难，目前很难求得迅速北移。由于项英多次坐失良机，延误了北移时间，26 日，中共中央对项英滞留皖南提出尖锐的批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但“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同一天，毛泽东、朱德指示项英必须销毁一切机密文件。

皖南新四军从驻地北移，当时有三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是向东开，这是日寇和国民党军的交错防区；另一是向北开，这基本上是日寇的防区；再一是向南开，这是国民党的防区。以项英为首的新四军军分会分析认为，前两条路线的“情况紧张”，最后选择了第三条路线。为避免冲突，12 月初，叶挺与顾祝同面商，同意新四军由皖南动身，经苏南渡江移往苏北的路线。事实上新四军江南部队大部已于 12 月 5 日开始出动，陆续经苏南渡江北上。所剩只皖南军部、直属部队及后方机关等万余人。中旬，顾祝同又令新四军改变路线经皖南北渡。28 日，军委会决定，皖南部队全部以战备姿态，绕道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之宁国、朗溪到苏南溧阳，伺机北渡。然而，这条南进路线，恰恰落入了国民党的圈套，无异于自投罗网。

项英是在中央严厉督促下，才决定皖南新四军开始转移的。1941 年 1 月 1 日，他向中央表示：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布置未完即突进，并采取游击作战姿态运动。3 日，中央复电叶、项：“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开动，是完全正确的。”其间，叶挺虽两次提出

改变路线，但项英均以原路线是经中央同意和顾祝同以人格担保安全为理由，拒绝叶挺的意见，延误了及早突围的有利时机。

4日晚，叶挺、项英率领皖南新四军6个团9 000余人，由驻地云岭出发，按照中央已同意的路线开始北移，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部队疲劳不堪。5日，部队行至泾县以南茂林地区时，停了下来。根据军事会议决定，7日，皖南部队分别占领了丕岭、球岭、高岭，但是遭到实力悬殊于我五六倍的国民党军队5万人的重围、伏击。

皖南部队奋起抵抗

在敌军三面包围之下，皖南部队被迫英勇自卫，头3天将国民党军队击退，但项英临阵处置失当，使敌人得以从容地紧缩包围圈。项英在紧要关头又犹豫动摇，8日晚，他和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带几个警卫员不告而走，擅自离开指挥岗位，造成极不好的影响。项英等突围被阻于大蠢山中，未能冲出敌包围圈，于10日晨又折返石井坑军部。项英走后，中央决定其职务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接任，新四军皖南部队由叶挺、饶漱石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挺下。是时，皖南新四军约5 000人，叶挺亲临前线阵地指挥，士兵大振，奋战一昼夜，将敌全部击退。项英归队当天，即向党中央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他还同叶挺一起向毛泽东、朱德报告，坚定表示："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没。"项英归队后，随军行动北上。

12日下午，国民党军队向东流山的新四军发起第三次总攻击，许多阵地相继失守。是时，固守石井坑的新四军已是弹尽粮绝，处境极危。从东流山后撤的新四军余部，一齐拥向石井坑。黄昏，顽军又向石井坑四面发起总攻。在紧急关头，13日凌晨，叶挺、项英决定，离开军部石井坑，分两路分散突围，叶挺和饶漱石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和周子昆为一路。但未能突围出去，不久两路又在西坑会合。叶挺下令，要求各部想办法突围，并率领部队于拂晓赶到大康王，但坑口道路已被敌人封锁。根据中央的意图，为摆脱困境，保存力量，14日，饶漱石要叶挺下山与上官云相谈判，不料，国民党背约，当天下午将叶

挺扣押，并对新四军余部加紧搜查围剿。

至此，经过七昼夜激战，除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傅秋涛率领约千余人分散突围脱险外，皖南新四军 7 000 余人全部被歼，其中被俘 3 000 余人。这就是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项英惨遭谋害

逃散的项英、周子昆等十几人会合后，准备同地方党取得联系。项英十分难过地说：“部队遭到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此时，20 余人分住赤坑山的深山中，4 处相距均为三四里，项英、周子昆 4 人住在一个叫“蜜蜂洞”的山洞里，隐蔽约半个月。1 月 14 日凌晨，正在熟睡的项英、周子昆，被身边的副官叛徒刘厚总，开枪谋杀。

项英同叶挺、陈毅等一起，认真执行党中央的各项决定，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是有贡献的。3 年之中，迅速组织新四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已发展到 8.7 万余人，对日伪军作战 2 200 余次，毙俘敌人 2.3 万余人，使新四军成为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正因如此，1940 年 5 月 23 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南局和军分会，肯定“在项英同志领导下的东南局与军分会，在三年抗日战争中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由于项英对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缺乏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对国民党过分信任，使新四军的发展丧失了很多的有利时机，尤其在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问题上，项英既低估了敌情的严重性，对蒋介石的阴谋丧失警惕；又过高估计了自身的力量，缺乏必要的准备。作为新四军的主要领导人，项英对新四军的惨重损失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

皖南事变是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大阴谋。事变后，蒋介石于 1 月 17 日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为对抗这一反动命令，中共中央以强硬的态度提出抗议，并于 1 月 20 日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这是给蒋介石国民党的当头棒喝。28 日，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新四军又以崭新的阵容，继续独立自主地坚持抗战到底。

90. 陈潭秋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潭秋(1896—1943)　湖北黄岗人。1920年秋，与董必武等发起建立湖北共产党组织，参与组建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事建党工作和工人运动。大革命时期，先后任中共武昌地委委员长，中共武汉地委书记，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兼组织部长。是中共第五届候补中央委员。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中共顺直省委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秘书长、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粮食人民委员等职。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任中央分局委员。1935年赴苏联学习。1939年回国后，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为新疆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1943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由于消息隔绝，1945年仍被选为第七届中央委员。主要著作收入《陈潭秋文集》。

中共驻新疆代表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为了维护其统治，一度表现进步，邀请中共到新疆帮助其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为了团结新疆各民族人民一致抗日，派遣100余名干部到新疆工作，决定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并帮助盛世才制订了“反帝、亲苏、民平、清廉、和平、建设”的“六大政策”，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5月，在苏联莫斯科学习并工作的陈潭秋奉调回国，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准备转赴延安。7月，党委派陈潭秋接替邓发，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是时，陈潭秋化名“徐杰”，在《新疆日报》上发表《要作一个新政府领导下的新青

年》一文，提出“必须认真了解六大政策和实行政策”；“必须忠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忠实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必须具有热烈的勇敢富于牺牲的精神”。他与毛泽民、林基路等一起领导党员和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他们通过建立文化促进会，创办文化馆、俱乐部，组织群众进步团体“反帝会”，出版《新疆日报》、《反帝战线》等报刊，以及开展戏剧歌咏活动，普及农民教育，举办夜校和干部训练班等多种方式，发展了各民族的文化教育，向各族人民传播了马列主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战政策，为新疆各族人民的解放事业及经济和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陈潭秋初到新疆时，一面充分利用盛世才表面进步的招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一面对盛世才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展开了极为复杂的斗争。陈潭秋对即将离开新疆的邓发说：盛世才“就其出身，是个野心军阀；就其思想，想当土皇帝；就其行为，是个狼种猪（又狠又蠢）”。陈潭秋还多次教育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要保持革命警惕性，随时准备应付形势的逆转。他说：“天山戈壁，插翅难飞，我们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每个同志都必须有足够的精神准备。”8 月 12 日，他在给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的信中说：因为新疆条件特殊，绝不能实行与国内一样的政策，共产党人要在新疆开展工作，“只有拥护和坚决贯彻执行六大政策。因为六大政策是最适合于新疆特殊条件的革命政策。”党在新疆工作的任务，“不在于发展组织或宣传主义，也不在于扩大自己的力量，而是要巩固六大政策的政权。”他要求共产党员，“对工作要有光明前途的信心，要有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坚毅勇气，不要见胜利虚骄，见困难则消沉。”

由于法西斯德国 1941 年进犯苏联，直逼莫斯科，加上蒋介石的百般拉拢，盛世才的政治态度开始向右转，即由亲苏联共转为反共亲蒋。11 月 28 日，陈潭秋向中央书记处汇报新疆情况时说：“新省情况近来未见改善，仍继续逆转”，并揭露了盛世才利用阿山哈族事件，阴谋陷害杜重远、赵丹、茅盾等进步人士。

与军阀盛世才作斗争

“新兵营”是由西路军转战到新疆后留下来的 400 余名指战员组

成的。陈潭秋来到“新兵营”驻地后，恢复了“新兵营”的政治部，改善了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并抓紧“新兵营”的野营训练，查看地形地物，与“新兵营”完全生活在一起，并亲自给战士们上政治课、党课和党史课。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和训练，指战员有了很大提高。在陈潭秋的缜密计划与妥善安排下，“新兵营”除少数人坚持工作外，其余300多名指战员于1940年1月胜利返回延安，奔赴抗日前线。随后，陈潭秋由新兵营驻地移往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南梁第三招待所。

陈潭秋在新疆工作期间，始终牢记新疆的特殊经济条件和政治环境，1940年2月20日，他在写给新疆工作人员的指示信中，重申：“帮助巩固六大政策是最适合于新疆目前条件的进步政策”，“我们要隐蔽自己的面貌，不能有独立的或与六大政策对立的主张。这种对立，只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6月20日，陈潭秋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汇报新疆政治危机日益严重，指控盛世才逮捕进步分子，诬陷中共干部等种种反动行径，分析原因，提出拯救办法。

在苏联学习的张子意、马明方、方志纯等人1941年2月回国参加抗战，被盛世才阻挠不准回延安。在他们到达迪化的当天下午，陈潭秋冒着严寒，来羊毛湖招待所看望大家，他在听完汇报以后说：“目前情况比较复杂。你们暂时不能回延安，要继续留在这里学习，不能满足已经学到的东西，还要联系实际，学习我国抗日战争情况下的政治和军事。”

这期间，还有一批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共产党员被盛世才扣留在新疆。陈潭秋几乎每星期都要来看望大家，并勉励说：“盛世才把我们软禁起来，存心不良。我们要团结一致，要求回延安。万一我们被逮捕了，我们要坚持斗争，把监狱变成学校，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7月7日，以陈潭秋为首的留新疆全体人员为纪念党成立20周年致中共中央贺电，表示坚决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以实际行动为实现这一政策而奋斗。11月6日，陈潭秋致电中央书记处，汇报盛世才背叛六大政策，实行反动统治及排挤打击中共干部黄火青、林基路等。

随着苏德战争爆发和国内形势的变化，新疆局势渐趋恶化，盛世才终于撕下了假面具，公开拥蒋反共。这时，陈潭秋镇静地率领全体共产党员，坚守工作岗位，同盛世才的种种倒行逆施展开坚决

的斗争，并作好应变准备。1942 年 5 月，中央书记处决定在迪化成立调查分局，陈潭秋为主任，负责研究大后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问题。

当陈潭秋从新华社的广播中得知党开始进行整风运动时，1942 年 6 月底，在新疆的全体同志成立了整风学习总学委会，陈潭秋任主任，张子意任副主任，参加整风学习的共有 117 人。在陈潭秋指导下，大家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等科目，陈潭秋每天都到会讲课。在困难面前，他根据延安整风精神，领导全体同志，进行以革命气节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整风学习，为尔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惨遭杀害

新疆上空，乌云密布。1942 年反动军阀盛世才捏造了所谓“共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逮捕入狱，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破裂。六七月间，中共中央几次复电陈潭秋，同意除留 4 人外，准备将在新疆工作的 136 人全部撤回。陈潭秋制定了分三批撤退的计划，他自己和办事处工作人员最后走。有人要求陈潭秋第一批走，但陈不同意，他说：“党交给我的任务，是把大家全部安全地撤出去，只要这里还有一个同志，我就不能走！”在撤退计划尚未实现时，9 月初，盛世才将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全部集中于八户梁。17 日，盛世才派来一个副官，以“盛督办邀请谈话”为名，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 3 人抓走。陈潭秋早有思想准备，临行前泰然自若，将工作任务向张子意交代完后，系好领带，穿上西装，从容不迫地和在场战友们一一握别。

在盛世才的黑牢里，陈潭秋以监狱为战场，以法庭作讲坛，和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党曾经设法营救他们，但没有成功。在长达 40 多天的审讯中，反动派威逼他招供所谓“阴谋暴动”的内幕，他历数共产党在新疆的丰功伟业，义正辞严地申明：“我党给新疆人民办的好事有口皆碑，任何人也抹煞不掉！有罪的是破坏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和盛世才本人！”敌人诱惑他在“脱党声明”上签字，他严词拒绝；敌

人对他施以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顽强斗争。敌人最后一次审讯的笔录记载："问：现在再给你几分钟时间，你考虑一下。答：我没有考虑的余地。问：为什么别人能讲出事实？答：我以前把他们看成同志一样，现在他们没有良心了。我要求政府法庭研究，为什么他们失去良心？我想法庭一定能够研究出来的。问：你还需要考虑什么？答：我用不着考虑。"陈潭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1943 年 9 月 27 日深夜，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 3 人，惨遭敌人杀害。当狱中战友得知陈潭秋等遇害后，举行了追悼会，并作《追悼歌》，写道："瞑目吧，光荣的同志！你们的英名，将永垂不朽！它鼓舞着后继者的我们，向黑暗作英勇的斗争！"

91. 彭真与国共争夺东北

彭真(1902—1997)　山西曲沃人。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中共山西党组织,是华北地区工人及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1924年以后,任中共太原特支书记、石家庄市委书记、天津地委组织部长、顺直省委工人部长、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等职。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6年。1935年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北方局组织部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书记、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共中央城市工人部部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抗战胜利后被派往东北,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政法小组组长。连任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第二至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文革"后,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主要著作收入《彭真文选》。

先机进入东北

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东北地区,辖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物产丰富,幅员辽阔,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总人口的九分之一,并且有较好的工业基础和便利的交通条件,与关内相比,拥有4倍的工业,3倍的电力和铁路。这片广袤富饶的黑土地,在经济上、军事上无疑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早在1945年党的七大时，就提出了争取东北的问题。因为取得东北，可以改变同国民党斗争的基本态势。而国民党政府同样如此，根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取得了战后率先接收东北地区主权的条件后，也将迅速占领东北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计划。所以日本投降以后，东北地区成为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双方都想抢先独占，以填补这一“真空”地带。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东北的时局有利于中共而不利于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在东北无一兵一卒，短时间难以派兵进入；而中共在河北、山东的部队则距离东北最近，可乘虚而入，加上苏联出兵东北迅速摧毁了日本关东军，为八路军进入东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所以，战后的东北时局，对中共的发展极为有利，可谓“千载一时之机”。还在日本投降前夜，1945年8月11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所部，待命由现地，向热河、察哈尔及辽宁、吉林进发。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除冀热辽军区外，从山东、冀鲁豫、冀中、陕甘宁、晋绥等军区，抽调9个团，由吕正操、林枫率领去东北。30日，李运昌率冀热辽军区的先遣纵队1.3万人挺进东北，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了山海关。继之，攻占兴城、绥中、锦州等城。9月9日到达沈阳，成立了以曾克林为司令员、唐凯为政委的沈阳市卫戍司令部。11日，中共中央急电山东军区，指示：“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之巩固地位”。决定从山东抽调2.5万至3万人，分散经海路进入东北活动。

然而，国民党并未袖手旁观。国民党政府颁行《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将东三省划为9省；在长春设立东北行营，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国民党以受降为名，调动大批军队向北推进，从海、陆、空抢占战略要点和主要交通线，企图独占东北全境。这种态势，预示着国共两党在东北必有激烈的一搏。

力争控制东北

为了解中共对东北的意图和政策，苏联决定派代表到延安与中

共中央联系。9月14日，苏军代表在曾克林的陪同下，从沈阳飞抵延安。这时，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已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刘少奇被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任中共中央代理主席。苏方对中共表示：苏联红军未撤出东北之前，蒋介石军队及八路军均不得进入东北；苏军不久即将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刘少奇在听取曾克林关于东北工作情况的汇报后，说：我们掌握了东北，就可以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

为实现争夺东北这一战略任务，9月14日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中央局，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彭真立即赴沈阳，统一领导和筹划东北地区的工作。会后，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出指示，说明进军东北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指出："目前我党对东北的任务，就是要迅速的、坚决的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党强大的力量。"要求华北、华中应派遣100个团的干部，分批迅速开赴东北。

彭真、陈云、叶季壮、伍修权等与曾克林及苏军代表，9月17日搭乘苏联军队飞机离延安赶赴东北，途经山海关因飞机故障，改乘火车、汽车，于18日赶赴沈阳。东北局即日正式成立。因为苏联军队有军衔，为了交往和工作方便，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授予彭真、陈云、叶季壮中将军衔，伍修权少将军衔。

刘少奇19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征求毛泽东同意后，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迅速派兵进入东北，打破国民党独占东北的企图，为争取和平、制止和应付内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共中央下达《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障中国人民的胜利。"同时决定派张闻天、高岗、李富春、林彪、罗荣桓等赴东北工作。

同一天，彭真、陈云主持召开东北局首次工作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心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会议确定了东北局的任务是：力争控制全东北，组织部队接管城市，控制交通线，粉碎国民党抢占东北的计划；加紧剿匪工作，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生产；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等。10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区司令部，作为临时性的军事指挥机关，对

外不公开，暂以程子华为司令，彭真为政委，伍修权为参谋长。

国民党军队在美军协助下，10月中旬，准备从关内转运东北，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由于东北情况紧急，10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我党方针是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于在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改变过去分散的方针。"23日，中共中央又指示东北局："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

根据中央的指示，10月26日，彭真在沈阳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的任务是争取全东北。"我们怎么做？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接收政权，积极收集、保管资材，建立根据地。"强调："工作要放手，要武装工人、农民，在政权问题上实行东北人民自治，武装问题上实行东北人民自卫。"31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部队迅速发展到30余万人，相继建立了10个军区。随后又建立了东满、北满、西满、南满4个大军区。

"让开大路，占领两厢"

从11月2日至12月2日，苏联红军分3期全部撤离中国东北。此时，中共中央在"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方针下，加紧对增兵东北的部署，明确指出："战争重心将转入东北，必有一场恶战。"

中共中央曾考虑过控制并独占东北的方针，但由于11月16日山海关失守，独占东北已不可能，于是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为此，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11月19日电示："速从城市及铁路沿线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0日又电示，决定改变10月19日以来拒阻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方针，指示："你们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只要"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争取胜利。"11月26日，国民党军攻占锦州的同一天，东北局作出《关于撤退大城市工作的指示》，指出：退出大城市，是为了照顾大局，为了求得和平，为

了求得创造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按照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11 月 28 日，彭真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了《今后工作的新方针》，指示东北人民自治军主动撤出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大城市。指出：“我在东北已有了相当大的部队，已取得了先机。这就造成了我党进一步开展东北工作及对国民党进行斗争之有利条件。”“现在由于情况的变化，必须把工作重心放在南满、北满、东满、西满，即放在沈阳至哈尔滨一线及长春路两侧的广大地区中，以中小城市及次要铁路线为中心”。东北局指示部队撤离沈阳、长春等大城市，要求干部深入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开展工作。根据新的方针，东北局也于 11 月底撤离沈阳，迁往本溪。

截至 1945 年 11 月底，从山东、华东、陕甘宁、冀中、晋绥、冀鲁豫等解放区陆续到达东北的部队约 10.8 万余人，党政干部 2 万人，包括 10 名中央委员（其中 4 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 10 名候补中央委员，总计近 13 万人。这些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部队和干部，为我党我军在东北发展，开辟和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国民党即将接收沈阳、长春前夕，1945 年 12 月 5 日，彭真等向中央军委提出：我军仍可集中 3 至 4 万主力争夺沈阳，并可集中 1 万主力威胁长春。对此，中共中央及时向东北局指出：“我们企图独占东北特别是独占东北一切大城市，已经是肯定的不可能。因为苏联为了照顾与美国的关系，不能完全拒绝蒋军进入东北和接收大城市，我们亦不能阻止蒋军进入东北。”“因此，我们目前不应以争夺沈阳、长春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而应以控制长春路两侧地区，以准备明年春天的大决战为目标来布置一切工作。”12 月 24 日电示东北局：“你们今天必须放弃争取东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图。”“你们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可靠的根据地，站稳脚跟。”

12 月 28 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发给东北局《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东北部队在距离国民党军队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将工作重心放在群众工作方面。东北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形势的变化，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南满，壮大力量，坚决执行中央提出的分散的方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中共东北局部署，东北人民自治军退出大城市，迅速分散到西满、北满、东满广大地区，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建立地方武装和人民

政权，创建根据地。

彭真全力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在为中共东北局起草的诸多指示中，在工作重心、政权建设、群众工作、党的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设性的真知灼见。

为了加强领导，中共中央于1946年6月16日改组东北局，决定以林彪、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5人组成东北局常委，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4人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继续全面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和根据地建设。

92. 叶剑英与军事调处执行部

叶剑英(1897—1986) 广东梅县人。北伐战争时,历任参谋长、师长等职。1927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2月参与领导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副指挥。1928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历任中革军委总参谋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工农红军学校校长、瑞金卫戍司令员、闽赣及福建军区司令员等职。红军长征中,任军委第1野战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人民解放军总部参谋长、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华北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1949年任北平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军区代司令员、中共中南局代理书记、中革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武装力量监察部部长、训练总监部代部长、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委、高等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文革"后,任国防部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等职。是中共第七至第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八、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和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著作收入《叶剑英选集》、《叶剑英军事文选》。

"军调部"中共代表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经过谈判,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为履行《纪要》中所规定的各项计划,

军调部三委员举行会议。左起第六人为中共代表叶剑英

双方同意组织军事三人小组。按照协议规定，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由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总统特使三方委员组成。12 月 15 日，美国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上将以杜鲁门总统特使的身份，启程来华，以“调解”国共争端。16 日，叶剑英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由延安飞抵重庆，他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待国共谈判与协商会议中若干重要问题有了具体解决后，再参加政府组织的三人军事小组会议，根据决定去讨论实现决定的细则问题。

1946 年 1 月 5 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规定停战令于 13 日午夜起生效，并决定由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中共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组成“三人会议”，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1 月 10 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

按照协议，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代表罗伯逊（任主席）所组成，负责监督执行停战协定。1 月 13 日，叶剑英、郑介民、罗伯逊一行 15 人，从重庆飞往北平。14 日，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平正式成立，受重庆军事“三人会议”领导，其任务是：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返日俘日侨回国和监督双方停战协议等。

军调部三方委员为最高领导，下设三方参谋长和 6 个业务处，为

基层领导。根据实际需要，全国各战区设立若干执行小组和交通小组。参加军调部的人员，美方为125人，国共双方各170人，后来实际上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目，最多时达到9 000余人（中共方面仅600余人）。叶剑英曾多次请示延安党中央，要求尽快抽调人员，组建机构，开展工作，并就近从晋察冀、北平地下党等选调一批人员到军调部，迅速开展工作。中共主要负责人除委员叶剑英外，还有参谋长罗瑞卿，秘书长李克农，顾问饶漱石、滕代远、徐冰，以及宋时轮（执行处长）、耿飚（交通处长）、陈士榘（整军处长）、黄平（新闻处长）、冯铉（秘书处长）、伍云甫（行政处长）等。

派遣执行小组或交通小组，是三方解决发生冲突地区各种问题的斗争焦点。针对复杂的斗争形势，叶剑英确定中共方面争取派遣小组的原则是：一、我军力量薄弱的地区，要争取派遣执行小组，防止敌人进攻；二、蒋军集结兵力的地区，要配置执行小组，以监视敌军的调动；三、敌人可能利用的港口，应争取派小组，以防对方通过港口运兵；四、敌人准备进攻的重点地区，必须派出小组，制止敌人的进攻和揭露敌人的阴谋。叶剑英多次在同国民党和美国方面的代表谈判斗争中，始终坚持上述原则，使对方占不到太多便宜。为调处军事冲突，回击国民党和美国方面提出的要中共部队撤退的要求，叶剑英还提出，停战以后双方必须恢复1946年1月13日24时的位置，谁非法侵占对方的地盘由谁退出。

与国民党据理力争

当时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地区，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东北、中原、绥远（今内蒙境地）、广东等地。为此，军调部先后成立赤峰、德州、徐州、济南、张家口、大同、新乡、太原、泰安、归绥（今呼和浩特）、淮阴、石家庄、武汉、广州等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该冲突地点进行调处，监督停战命令的执行。经过多方调处，上述地区的冲突，或明显减少，或已完全停止。随后，监督华北、华中交通之恢复及遣送华北日俘、日侨。军调部陆续派往各地流动执行小组共达36个（其中执行小组29个，交通小组7个）。

在调处恢复交通问题上，国共双方的斗争同样异常尖锐。国民党提出恢复交通，目的是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准备发动内战。叶剑英对此则提出：恢复交通要有利于和平建设事业的发展，不能把它变为战争的因素。经过军事三人小组会谈，最后达成一项恢复交通的协议。军调部以《和字第四号命令》下达双方部队执行，并确定在华北、华中等8条铁路上，设立7个交通小组。后来，针对国民党方面的破坏和责难，叶剑英反驳说：抗战开始，国民党把整个华北丢掉。许多铁路工人自愿留在解放区，坚持抗战到胜利。现在要恢复铁路交通了，国民党竟要另任新人，取代对抗战有功的铁路员工，这种做法是极不合理的。经过中共方面叶剑英等据理力争，迫使国民党方面同意中共在铁路、邮政所委派的人员继续留任。

自2月14日起，由国民政府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正式组成“军事三人小组”，与先前的“三人会议”合二为一。军调部开始受军事三人小组领导。3月上旬，叶剑英等军调部三方委员随同军事三人小组赴华北、华中各地视察停战和恢复交通等情况，加速了军调部工作的节奏。经过叶剑英多方努力，军调部三方委员于3月22日共同签署的命令，明文规定：国共双方军队必须立即退回1月13日24时以前所在位置。这符合中共方面所始终坚持的原则。军调部于3月底虽派出4个执行小组赴东北调处，但效果不佳，冲突仍不断升级。

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军调部中共代表团驻地的破坏和捣乱，屡屡发生。2月20日，发生国民党特务捣乱北平军调部事件。一小撮暴徒来到军调部大门口示威“请愿”，高叫反共口号，并要中共代表叶剑英出来见面。叶剑英闻讯后安详步出门外，从容不迫地回答了所提出的问题。但少数暴徒仍冲入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办公室，并辱骂殴打办事人员。当天，军调部罗瑞卿参谋长就此严重事件向《新华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表示：中共代表团“绝不因外来阻力而停顿工作，定用一切努力克服困难，完成任务，以实现全国人民之愿望”。4月3日晨，国民党北平军警当局出动数百人，突然包围并搜查了军调部叶剑英的军事顾问滕代远寓所及《解放》报编辑部和新华社北平分社，抓捕40余名工作人员。事发后，滕代远、叶剑英怀着极大的愤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要求立即惩办肇事者，公开道歉。次日，被

捕人员全部获释。

5月29日夜间，北平《解放》报和新华分社等75家新闻机构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叶剑英亲赴警察总局，以示抗议。30日，叶剑英在慰问《解放》报和新华分社工作人员时讲话指出："国民党反动派虽然猖獗一时，但在人民的力量面前，终会自食其法西斯暴政的恶果。中国的和平民主事业一定会胜利！"31日，叶剑英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谈话，严重抗议国民党当局摧毁舆论的反动暴行，此种暴行，是中国第二次"七七事变"，严正指出："中共在北平的机关报《解放》报及其通讯社——新华社，一贯地反对内战、呼吁和平而努力，对好战分子的内战阴谋，经常给以无情的揭露，因此，反动的好战分子视之为眼中钉，不断的给我们《解放》报及新华社以压制和破坏。今天，当着他们坚持在东北继续扩大内战，企图造成全国规模的大内战的时候，他们公然强迫我们《解放》报新华社停刊以至查封，这是对全国和平事业严重的打击。"明确表示：中共将严重关注这一事态，动员所有舆论，"来制止国民党这一反动措施，挽救陷入危机中的中国民主。"

全国内战爆发后，1946年7月12日，叶剑英向国民党代表郑介民提出《致国民党政府代表的备忘录》，就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提出抗议，严正表示："此次战争以及各继续进攻所引起之一切恶果，完全归政府方面负责。"不久，7月29日在河北省香河县安平镇，发生美蒋军队联合进攻解放区的严重事件。冀东八路军防地被迫自卫还击，战斗持续4个多小时，双方部队均有伤亡。8月1日，军调部三方决定成立一个特别小组前往实地调查。在问题得不到公正合理解决时，9月9日，叶剑英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发表了《关于安平事件调查结果的声明》，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公布了《军调部第二十五特别小组中共代表关于安平事件冲突调查报告书》，声明和报告书澄清了"安平事件"的真相，粉碎了敌人借此事件反共的阴谋。叶剑英向美方提出4点要求：一、美军应正式向我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二、立即把安平镇交还我方；三、驻华美军应全部撤出中国；四、美国政府必须停止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援助。此后，叶剑英组织中共人员开始分批撤往解放区，只留下少数人坚持工作。

完成光荣使命

随着内战逐渐扩大，军调部中共代表不断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监视和逮捕，叶剑英一面率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机警地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一面建议对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进行精简。到1946年11月下旬，军调部关内各小组的中共代表，已全部撤退完毕。11月27日，叶剑英乘坐一架美方代表提供的飞机，亲自由北平飞往沈阳，解决东北8个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的撤退等问题。叶剑英就当局非法封闭长春分部中共代表团电台及监视中共工作人员，向国民党和美国方面提出严重抗议。这是他在军调部完成的最后一项工作。

1947年1月，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随即返回美国。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解散军事三人小组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叶剑英率领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最后一批工作人员，从北平返回延安。临行前，他对欢送的各界人士坚定地表示："我们离开北平只是暂时的。我相信，过不了几年，我们一定会回来的！"以叶剑英为首的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在延安机场受到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的热烈欢迎。

叶剑英在军调部度过了整整400天，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完成了党赋予他的光荣使命。中共代表团通过军调部的工作，从全局上有力地配合了对国民党的斗争，使党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为解放区军民准备反击国民党的大举进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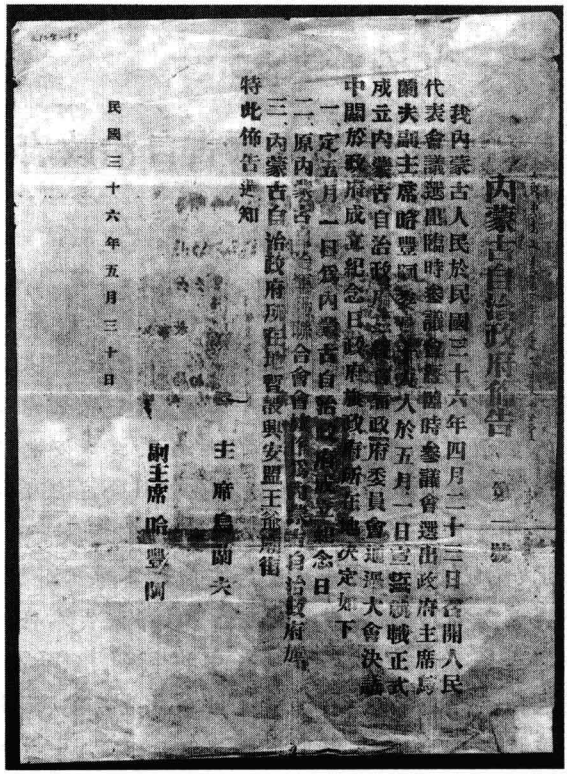
93. 乌兰夫与内蒙古自治政府

乌兰夫(1906—1988)　又名云泽。蒙古族。内蒙古土默特旗人。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同年10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任中共西蒙工作委员会书记。1936年在百灵庙举行武装暴动,后任蒙旗保安总队政治部代主任。1941年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历任蒙绥政府主席、中共内蒙古工委书记、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兼军事部长、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兼政委、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内蒙古分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内蒙古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政协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四、五、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五届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主要著作收入《乌兰夫文选》。

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的情况十分复杂。当时的自治运动多数是自发的,受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很少。一些官僚政客和王公贵族等蒙疆政府的上层分子,企图搞"内蒙古独立"和"内外蒙古合并"等活动,以维护其封建统治。所以初期的工作是很艰难的。

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把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作为实


内蒙古自治政府布告 第一號

我內蒙古人民於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召開八民代表會議選舉臨時參議會議體時參議會選出政府主席烏蘭夫副主席哈豐阿參議會人於五月一日宣告成立內蒙古自治政府委員會並派大會決議中國於政府成立紀念日政府施政綱領決定如下

一、定五月一日爲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紀念日

二、原內蒙古自治政府

三、內蒙古自治政府現在暫設興安盟王爺廟

特此佈告週知

主席烏蘭夫

副主席哈豐阿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三十日

烏兰夫主席发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第一号布告

现民族团结统一、争取和平民主的主要工作任务，并决定派乌兰夫去张家口，统一领导内蒙古自治运动。早在 194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就责成乌兰夫和中共中央及晋察冀中央局、晋绥分局联系，以筹划共同的行动方针及统一步骤，蒙古干部也统一由乌兰夫分配。

首先是 1945 年 9 月在内蒙西部锡林郭勒盟西苏尼特旗德王府，出现了一个“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事关重大，党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指派乌兰夫负责处理此事。乌兰夫、奎壁等于 10 月到达西苏尼特旗后，积极宣传党的民族平等政策，注重做青年工作，并对封建上层分子进行争取、分化。乌兰夫经过同苏蒙联军代表商谈，重新召开了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改组了“临时政府”，选举乌兰夫为政府主席。

10 月 23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内蒙工作方针给晋察冀

中央局的指示》，指出："内蒙在战略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适当的解决内蒙民族问题，不仅关系内蒙民族本身的解放，而且能够建立我党我军巩固的后方及和苏、蒙军取得直接联系的有利地位。"提出对内蒙的基本方针，在目前是实行区域自治，要放手发动与组织蒙人的地方自治运动，建立自治政府。强调要加强广泛的统一战线，对德王等民族上层，"应采打击、分化与孤立政策。"决定由乌兰夫负责拟定中共部队进入蒙区及对蒙人的纪律及必须注意的事项。

根据中共中央和晋察冀中央局的指示，乌兰夫和张策、奎壁、吉雅泰、刘春、王铎等，统一领导开展内蒙的自治运动，正式提出了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主张和具体方案。11 月 26 日，乌兰夫在张家口主持召开了内蒙古西部地区各盟旗代表会议，讨论领导机构和确定内蒙古自治运动的方针，正式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并在各盟、旗建立分会。乌兰夫任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这次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内蒙古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联合会成立以后，乌兰夫等积极贯彻党的民族政策，解决民族的平等自治，对上层分子采取宽大政策，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许多旗的政权经过改造，削弱了封建阶级的特权，提高了农民、牧民、妇女的政治地位。经过宣传教育，扩大了党的影响，广大群众的觉悟明显提高，认清中国共产党是蒙古民族最真诚的朋友。于是，"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被取消了。

统一东蒙和西蒙

长期以来，内蒙古民族处于东西两部被分割的局面。1946 年 1 月，东部地区召开了东蒙古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东蒙古自治政府，并制定了《施政纲领》。但因内蒙古东部的自治运动掌握在封建上层分子手中，对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东蒙各集团之间仍存在分歧。为迅速开展东蒙的工作，中共中央又派出乌兰夫和刘春等组成东蒙工作团，前往处理那里的争端，并研究解决内蒙古东西部自治运动统一问题。

为达到东西蒙的统一，在中共的领导和推动下，1946 年 3 月，西蒙的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的人民自治政府，各派代表在承德举行关于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筹备会。会上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乌兰夫等西蒙代表既批驳了东蒙的错误主张，又采取了团结上层的统一战线政策，逐步统一了认识。在此基础上，4 月 3 日，东蒙和西蒙代表在承德举行正式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蒙代表乌兰夫、刘春等和东蒙代表博彦满都、哈丰阿等，共 14 人。经过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主要决议》，确认内蒙古民族运动的方针“是平等自治，不是独立自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内蒙古人民党停止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撤销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分会，以领导东部地区的自治运动；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为公开的统一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内蒙古的武装部队；选举乌兰夫为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兼军事部长；决定以赤峰为内蒙古临时中心。“四三”会议是内蒙古自治运动发展的重要转折点，结束了内蒙古民族长期被分割的局面，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为了推动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发展，乌兰夫等还做了大量工作，如广泛深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除奸反霸和减租减息；开办军政干部院校；吸收蒙古族上层参加自治运动联合会；加紧进行建立民族武装的工作；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等。1946 年 11 月，组建了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第 1 支队。12 月又发展建立了 700 余人的蒙古骑兵独立旅。

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内蒙古自治区的条件日趋成熟。1947 年 3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内蒙古自治诸问题的意见》，决定成立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为此，中共中央派乌兰夫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去，组织筹备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其间，乌兰夫曾去哈尔滨，出席了东北局会议，研究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有关问题。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经过周密的策划，4 月 3 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在王爷庙胜利召开。出席代表 392 人。乌兰夫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总结和分析了内蒙古自治运动的历史经验和自治运动一年多的工作，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起草的《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明确规定：自治区域是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要团结自治区内的蒙、汉、回各族人民，坚决粉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国民党封建买办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为实现内蒙古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5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宣告成立，乌兰夫任自治政府主席。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历史上第一个内蒙古人民的自治政府。从此，内蒙古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真正获得了多年以来没有达到的民族自治与民族解放。

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第一个省一级的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直辖呼纳、兴安、哲里木、昭乌达、锡林郭勒、察哈尔 6 个盟，面积 60 余万平方公里，人口 230 余万。5 月 19 日，毛泽东、朱德致贺电指出："曾经饱受苦难的内蒙古同胞，在你们领导之下正在开始创造自由光明的新历史。我们相信，蒙古民族将与汉族和国内其他民族亲密团结，为着扫除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建设新蒙古与新中国而奋斗。"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内蒙古自治运动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光辉胜利。它大大加强了蒙汉民族的团结，表明党指引的革命道路是各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解放的正确道路。

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民族政策，1947 年 5 月 3 日，正式组成内蒙古共产党工作委员会，乌兰夫任工委书记，隶属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从此内蒙古民族革命与人民解放，有了明确的领导核心，保证了党对内蒙古自治政府和内蒙古各项工作的领导。统一的内蒙古党组织成立后，在广大的农牧区进行土地改革，废除封建特权，以及建立了一支人民骑兵，并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积极配合各兄弟部队作战，为争取内蒙的早日解放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作出了贡献。

94. 陈云与东北解放战争

陈云(1905—1995)　上海青浦人。1925年参加领导商务印书馆罢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任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长征时,任红五军中共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1935年赴苏联列宁学院学习。1937年回国,任中共中央驻新疆代表,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共北满分局书记兼北满军区政委,领导创建北满根据地。1946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后任中共南满分局书记兼辽东军区政委、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商业部长、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副主席,第九至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收入《陈云文选》、《陈云文集》。

开辟北满工作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北地区是国共两党争夺的焦点。为了创建东北根据地,1945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等为委员的东北局。17日,彭真、陈云等一行6人

乘飞机离开延安，于18日赶赴沈阳。陈云在10月9日东北局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的斗争利于持久，不能轻易进行没有把握的决战。要利用苏军尚在东北的有利条件，迅速打击国民党的内应势力，迅速扩兵。随后，他离开沈阳，经长春赴哈尔滨。

是时，国民党在美国帮助下正加紧向东北运送部队，而苏联也要求中共退出中长铁路沿线及各个城市。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为控制北满各地，于11月16日正式组建北满分局，陈云任书记，成员有高岗、张闻天等。随后，陈云率领中共北满分局等机关，撤至哈尔滨以东50公里的宾县一所教堂内。

中共北满分局于11月30日召开会议，通过了由陈云主持起草、以陈云、高岗、张闻天3人名义给东北局的电报《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总结了我军进入东北后3个月来的斗争经验，提出了党在东北工作的基本方针。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还指出："我们今天必须大胆主动地撤退，同时迅速地把我撤出以后三大中心城市的工作放在应有的地位。""北满工作的中心，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几个根据地的建立。"强调："必须防止干部中以为不经过严重斗争而可以取得全满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苏联的援助上，以苏联对我们援助一时增减而发生盲目的乐观或悲观的情绪。"电报发出后，立即得到党中央和东北局的完全赞同。

1946年初，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下辖东满、南满、北满3个军区。北满军区，由高岗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2月下旬，中共北满分局致电东北局，重申："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央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迟阻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

北满部队在松花江南岸攻歼郭家屯之敌

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带领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依靠的根据地”。4 月 20 日，陈云为北满分局起草了给东北局并转中央的报告《北满根据地建设的进展状况》，认为“必须将北满建设成为全东北的大后方和最巩固的根据地。”并提出积极主动地肃清残匪；把发动群众看成是一切工作的根本；使北满成为兵源及练兵的基地等 3 项任务。在陈云领导下，北满分局在组织军队，剿匪斗争，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巩固后方等各项工作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北满部队在苏军撤出哈尔滨后，进占该市。5 月下旬，东北局由长春迁至哈尔滨，同北满分局合并。6 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东北局，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7 月初，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扩大会议，并于 7 月 7 日通过了陈云起草的《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澄清了在和战问题上的错误思想，强调：“创造根据地是我们工作的第一位。”当前“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去取得和平。”工作重点要放在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中心任务是发动农民群众求得翻身解放。还指出：“适应长期战

争和创造根据地的方针，必须在军事、剿匪、民运、土地、财经、后勤、兵工、交通、城市工作、文化和建党、建政等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规定各种政策，时时注视工作进展，根据工作经验，作出扼要的总结，并使各地经验迅速交流，提高工作效率，提高干部能力。”11 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决议并作了部分的修改。扩大会议后，东北局决定设立东北财经办事处，陈云任主任。

陈云于 7 月 13 日出席了西满分局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发动农民是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关键》的报告。报告分析了东北地区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了以发动群众为中心的 6 项任务：一、纠正干部中的混乱思想，建立长期战争观点。二、深入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三、提出正确的斗争口号，发动群众为此而斗争。四、实行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方针。五、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六、纠正工作中的盲目自流现象。他满怀信心地指出：“东北的斗争是艰苦的，但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发动群众，在东北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来，我必胜。”

坚持南满根据地

蒋介石国民党为了和共产党争夺东北，制定了“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1946 年 10 月中旬，集中 8 个师 10 余万人的兵力，分三路向南满临江地区发起进攻。在紧急关头，为贯彻东北局制定的“坚持南满，巩固北满，南打北拉，北打南拉”的战略方针，陈云主动提出到南满主持工作。为统一领导对敌斗争，10 月底，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将原辽东军区、辽宁军区合并，成立南满分局（即辽东分局），并委派陈云兼任分局书记、辽东军区政治委员，萧劲光任辽东军区司令员。

陈云等于 11 月下旬抵达辽东军区所在地临江。12 月 11 日，辽东军区在临江附近的七道江前线指挥所召开党委会议，讨论军事指挥方针和战术问题。陈云没到会，会议由萧劲光主持。会上，就坚持南满还是北上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会议开了两天，几种意见僵持不下。由于敌人已开始进攻，军区党委决定会议提前结束，并打算在这之前，请陈云来参加会议，听一听他的意见。陈云冒着风雪连夜从临江匆匆赶来，14 日即主持会议，先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然后就

坚持南满斗争的战略意义，作了重要讲话。他强调：坚持南满斗争，可与北满成犄角之势，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如果撤到北满，敌人不仅会追来，而且由于没有了南满的牵制，一定会全力压过来，北满也可能保不住。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振作精神，鼓足信心，艰苦奋战，以新的姿态与敌人斗争到底。经过认真讨论，统一了思想，最后确定了坚持南满，坚持敌后，扩大根据地的方针。

七道江会议结束后，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呼应，于1947年1月2日越过松花江作战，开始了“三下江南”的战役，在吉林、长春以北地区，共歼敌1.5万余人。在北满部队的配合下，陈云同萧劲光当机立断，指挥部队在吉林临江地区勇猛杀敌，萧劲光在前方指挥作战，陈云在后方主持地方工作，在3个半月内连续粉碎国民党军的4次大规模进攻，取得了“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共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收复城镇11座，挫败了国民党“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方针，扭转了东北战局，迫使敌人由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有力地促成了南满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

创建东北解放区

陈云圆满完成了坚持南满的任务之后，于1947年底回到了哈尔滨。此后，陈云以大部分精力，参与领导创建东北解放区的工作。

1948年4月16日，陈云向中央写报告，在肯定土改工作成绩的同时，批评说：“由于运动扩大过分迅速，阶级划分不清，没有巩固地团结中农，对佃富农与旧富农不加区别，许多地方把富农与地主一样对待，保护工商业的政策没有严格执行，以及一度打风盛行，死人过多，犯了很多‘左’倾错误。”报告总结了辽东一年来土改工作的教训，分析了犯错误的原因并提出纠正的办法。

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于8月在哈尔滨举行。会上，陈云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作了题为《关于中国职工运动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他指出：当前全国职工运动的总任务，乃是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大会决定恢复中华全国总工会，陈云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

是时，兼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席的陈云，于1948年8月1日为东北局起草了《关于合营企业中职员问题的决定》，分析了两年来所接收的企业中的工人和职员的现状，提出了解决办法，指出：在处理工人与职员关系问题上，个别企业曾犯过右的和“左”的错误。8月下旬，他又为东北局起草了《正确处理新接企业中的职员问题》的决定和《把财经工作提到重要位置上来》的向中央的书面报告。认为东北的财经工作，必须积极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平衡，稳定物价，保障铁路运输畅通。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支援东北的解放和向全国胜利进军。强调：“在目前情况下，需要把财经工作放在不次于军事或仅次于军事的重要位置上。”

10月27日，东北局决定委派陈云为全权代表，负责接管沈阳的工作，并组成以陈云为主任的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陈云在动员会上就接管的意义、方法、注意事项等作了详细说明。11月2日，在解放沈阳的当天，陈云率领干部1 200人进入沈阳市区，开始接收工作，陈云任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伍修权、陶铸任副主任。接收沈阳的重点是：兵工厂、机车厂、冶炼厂、机器厂、电器厂、汽车厂、桥梁厂、橡皮厂等“八大工厂”。同时抓紧着重解决恢复电力供应；解决金融物价；收缴枪支；宣传党的政策；妥善解决工资等在政治上、经济上有助于恢复秩序、稳定人心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并要求参加接管的部队和干部，执行政策，遵守纪律等。11月28日，陈云在写给中共中央的《接收沈阳的经验》报告中，全面总结出7点主要经验，将接收方法概括为：“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并且强调“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中共中央批示，陈云接收沈阳经验的报告“甚好”，于12月14日将这个“经验简报”，转发给华北、华东、中原、西北等各中央局，以大力推广接管沈阳的成功经验，并要求各级党组织做好接管工作。

95. 邓小平与千里跃进大别山

邓小平(1904—1997) 四川广安人。1920年留法勤工俭学。1922年加入旅欧少年共产党。1924年转为中共党员。1926年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初回国,任冯玉祥所部中山军事政治学校政治处长。1929年参与发动百色起义,创建红军第七军,任政委和中共前委书记。1930年参与发动龙州起义,建立红军第八军,兼任政委。是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1931年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宣传部部长,主编《红星》报。红军长征时,历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第129师政委,参与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后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晋冀鲁豫军区政委。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1947年6月,与刘伯承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创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新阶段。1948年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政委。参与领导淮海战役,任总前委书记。后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军区政委。1952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第八届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59年任国务院副总理。"文革"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等职。主要著作收入《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军事文集》。

鲁西南大捷

从1947年春夏开始,人民解放军在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9个

战场，相继展开了战略性反攻。此时国民党军对山东和陕北的重点进攻，已是强弩之末。而介于这两个东西战场之间的鲁西南、豫皖苏边直至大别山地区，因敌人兵力十分空虚，为解放军实施战略进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是时，在延安的毛泽东没有等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以后，立即抓紧有利时机，果断地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部队向中原进军，实行中央突破，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在内外线的密切配合下，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根据党中央的计划部署，为加强对南下战略行动的统一领导，1947 年 5 月 16 日，成立了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中共中原局。6 月 30 日夜，刘邓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第一、二、三、六纵队 12 万人，以雷霆万钧之势，强渡黄河，一举突破敌军防线，粉碎了敌人“黄河战略”的神话。发起鲁西南战役，就像一把尖刀刺穿敌人的心脏。第二天，邓小平在各纵队首长会议上说：“毛主席指出，我们到大别山可能有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退了回来；二是付了代价站不稳，在周围坚持斗争；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我们要力争第三个前途，克服一切困难，坚决为跃进到大别山，并在那里站稳脚跟而斗争。跃进大别山，解放中原，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第一步棋，下一步棋，就是以中原为阵地，再来一个跃进，打过长江，解放全国。”7 月上旬，野战军连克郓城、定陶等县城，蒋介石亲临开封督战，调集 20 多万人马，企图将我军“歼灭”在黄河南岸。下旬，刘邓野战军发起鲁西南战役的最后一次战斗——羊山集战斗，全歼国民党守军 1.4 万余人。至此，历时 28 天的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 5.6 万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揭开了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

鲁西南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军的 13 个整编师 30 个旅被吸引到鲁西南战场，敌人的后方兵力更加空虚，于是蒋介石继续调集 14 万人的兵力向刘邓大军进击。

在鲁西南战役尚未结束时，中央军委 7 月 23 日作出军事部署：刘邓野战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在大别山建立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邓小平在河南光山县干部会议上作报告

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根据中央军委的部署，刘邓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休整半个月，准备于8月15日直出大别山。不久，收到了毛泽东万分火急的绝密电报，提出“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刘邓心领神会，二话没说，立即复电，表示半个月后行动，跃进到敌人后方去，直出大别山。随即提前结束休整，实际上不到10天。8月7日，突然南进，主力跳出合围圈。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在“走到大别山就是胜利”的口号下，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无后方作战的十分艰险的战略任务。

8月中旬，刘邓率领主力4个纵队11.5万余人，以坚强的战斗意志，越过陇海路，徒涉人烟罕迹的黄泛区，抢渡涡河、沙河，进入豫皖苏解放区。在行军途中，天气闷热，时常下雨，部队每天从黄昏走到天明，疲惫不堪，有些地方不能骑马，刘邓首长和战士们一起在污泥中跋涉前进。过汝河时，邓小平对野战军首长说：“情况就是这样，现在除了坚决打过去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今天过不去汝河，后面敌人就赶到了。过不去就得分散打游击，或者转回去。这就是说，我们完不成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我们的战略任务。你们要把情况和任务向部队交代清楚，在最紧急的关头，正是考验我们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的

时候，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不惜一切代价，坚决打过去。”8 月 26 日，刘邓大军渡过了最后一道险关——淮河，敌人的追击计划完全失败。这样，刘邓野战军经过 22 天的艰苦跋涉和激烈战斗，以超人的毅力和勇气，胜利地进入大别山，威震大江南北，完成了千里跃进的战略展开任务。

中央军委认为：刘邓南进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为协助刘邓“经略中原”，8 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小河（扩大）会议决定，原计划西渡黄河向陕甘宁边区的陈（赓）谢（富治）集团，改为渡河南进，挺进豫西。陈（毅）粟（裕）野战军主力，从山东打出来，在豫皖苏边展开。于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中央突破，两翼牵制，三军挺进，互为犄角”的战略进攻态势。从此，我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开始了全国性的战略进攻。

在大别山立住脚跟

大别山，雄峙于鄂豫皖 3 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著名的革命根据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革命传统。刘邓野战军初入大别山时，面临着粮食匮乏、疟疾流行、严重减员、生活不习惯、群众不敢接近等重重困难。但野战军领导认为，这些困难是能够克服的，胜利是有把握的。关键是能不能站得住，站得住就是胜利。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8 月 27 日，邓小平为中共中原局起草报告说：“今后的任务，是全心全意地义无反顾地创造巩固的大别山根据地，并与友邻兵团配合，全部控制中原。”还说：“实现此历史任务，要经过一个艰难困苦的过程，发展半年以上的时间，如不大量歼灭敌人和充分发动群众，要想站稳脚跟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切勿骄躁，兢兢业业，上下一心，达成每一个具体任务。”又指出：“大别山区有长期的革命传统，且保存有游击战争的基础，我们有许多本地干部。特别是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全军上下一致的决心和信心，胜利是有把握的。虽有困难也是能够克服的。”8 月底，邓小平政委在一次直属队干部会议上说：我们已到了大别山，完成了战

略任务第一步，这是蒋介石战略上的失败。强调："重建鄂豫皖解放区的任务是非常光荣的，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我们的决心是十分坚定的，解放区一定要建立起来，困难一定要克服，共产党的特点是越困难越有劲，越团结。我们要有信心克服困难，我们一定要站住脚，生下根。"

刘邓大军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同时，特别强调要严肃军纪，积极发动群众，大力开展宣传工作。9 月下旬，邓小平在另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越是在困难的时候，高级干部越要以身作则，鼓励部队坚决勇敢地歼灭敌人。并且强调部队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党的路线和政策的体现，关系到野战军在大别山能否站得住脚。

敌人乘刘邓大军立足未稳加强了围攻，企图将野战军赶出或消灭在大别山。刘邓率主力寻机歼灭敌人，于 9 月底歼敌正规军 6 000 余人，占领了大别山的大部分地区，初步完成了战略展开。10 月下旬，在高山铺战斗中，歼敌 1.2 万余人，迫使蒋介石重新调整围攻大别山的军事部署。至此，刘邓大军共歼敌 3 万余人，解放县城 24 座，建立县政权 33 个，初步立住了脚跟。

随后，国民党的兵力增加到 30 万人，而留在大别山的刘邓部队只有七八万人。在兵力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坚持大别山的斗争越来越困难和危险。一次，邓小平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河以北去指挥全局。"于是决定刘伯承等率部向淮西转移，向外开辟新区；邓小平等率部坚守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打击和分散敌人。邓小平在写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此次为我反攻后之最大考验，处境确有困难。"在邓小平领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战斗，共歼敌 1.3 万余人，收复了太湖、英山、金寨等 10 余座县城，取得了大别山斗争的初步胜利。

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刘邓野战军主力在大别山区胜利完成了战略展开，站稳了脚跟，从根本上扭转了全国战局。在此期间，陈谢集团已挺进豫西，陈粟野战军也进入豫皖苏平原，切断陇海、津浦两铁路。刘邓、陈粟、陈谢 3 路大军在中原辽阔大地，布成"品"字形的阵势，驰骋于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直接威胁着敌人的腹地南京和武汉，实现了中共中央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战略部署。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为世人瞩目。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在《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中写道："我阅历过多次战争，但却未见过比共产党这次和以后强渡黄河更为高明出色的军事行动。"邓小平本人回忆说："在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是解放战争的三年。那时我们的装备很差，却都在打胜仗，这些胜利是在以弱对强、以少对多的情况下取得的。"

96. 林彪与辽沈战役

林彪(1907—1971)　湖北黄冈人。1924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1纵队司令员、红四军军长、红一军团军团长,参加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战役。长征到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师长,率部在平型关取得抗战中的第一个胜仗。1938年赴苏联治病。1942年回到延安。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东北解放战争,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后参与领导并取得平津战役的胜利。继任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时,率部解放了中南及海南岛广大地区。1949年后,历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军区司令员、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5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被授予元帅军衔。1958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年任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文革"中,林彪因其反革命集团阴谋败露,于1971年9月13日仓皇出逃,在蒙古境界机毁身亡。1973年,中共中央将其永远开除出党。

对南下作战顾虑重重

1946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任命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在林彪的指挥下,1947年5月至1948年3月,东北解放军发动的夏、秋、冬三季攻势,都取得了胜利,致使东北地区的97%土地和86%人口获得解放。到8月,东北解放军已发展

到70余万人，加上地方部队33万人，总计达105万人，东北战场发生了有利于解放军的根本变化。1948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北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刘亚楼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此时部队士气旺盛，武器装备得到明显的改善，军力和经济力都超过了国民党，完全掌握了东北战场的主动权。

在我军“三季攻势”取得胜利后，国民党军队共损失57万人，处境极为困难。蒋介石为了摆脱被动局面，曾多次修订战略方针，并三易其东北主帅。卫立煌是第三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他在遭受连续打击后，将东北国民党军队整编为4个兵团，总兵力55万人，被分割和压缩在沈阳、锦州、长春3个互不相连的孤立据点，分别由卫立煌、范汉杰、郑洞国负责防守。这样，东北野战军同国民党军进行大决战的条件已经具备。

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早在1948年2月，毛泽东致电林彪、罗荣桓等，指出：要预见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这样，既关闭了东北大门，切断了东北之敌与关内的联系，在战略上又是中间突破，使两翼卫立煌和傅作义均相互孤立。林彪起初复电表示：“今后一切作战行动，当以此为准。”可是，时隔两个多月，林彪在对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并以南下北宁线或入山海关作战，道路和补给均有困难等为由，认为“目前只有打长春的办法为好”，提出先进行半月时间的军事教育和战术练兵，然后集中兵力“攻长春和打援”的建议。毛泽东早就断定攻打锦州是东北战场的关键，多次明示或暗示林彪南下北宁线，4月22日虽复电批准了先打长春的建议，但同时委婉地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之后，攻打长春没有达到预想的结果，虽然在长春外围作战中歼敌5 000人，占领了西郊飞机场，但自身亦付出了3 000人伤亡的代价。林彪等在实战中发现，目前即攻长春难度较大，无把握，又改变想法，认为用2至4个月时间，对长春采用“久困长围”，然后攻城则是目前应采取的最佳方案。

根据东北战局的发展，东北局7月20日讨论决定，放弃勉强打长

林彪(中)、罗荣桓(右)、刘亚楼(左)在前线指挥作战

春的计划,而执行南下作战的决策。中央军委7月22日回电,同意东北野战军改为以主力南下作战的新建议,指出"向南作战具有各种有利条件",现在你们"看出其种种有利的条件,这是很好的和很必要的"。同时批评说:"在你们准备攻击长春期间,我们即告知你们,不要将南进作战的困难条件说得太多太死,以致在精神上将自己限制起来,失去主动性。"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华北军区以第三兵团出击绥远,以第二兵团出击张家口至北平一线,以钳制傅作义部队,使其不能抽兵增援东北。

但是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对南下作战的困难条件仍顾虑重重,缺乏胜利信心,并未迅速实施南下行动。8月9日,中央军委严肃地批评说:"你们不要被敌人的伪装所迷惑,你们应迅速决定并开始行动。目前北宁线正好打仗,你们所谓你们的行动取决于杨成武(时任华北第三兵团司令员——引者)的行动,这种提法是不正确的。"8月12日,毛泽东又批评说:"两个月以来你们是否执行了我们这一指示一字不提。现据来电则似乎此项准备工作过去两月全未进行,以致现在军队无粮不能前进。"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严厉批评下,8月下旬,林彪才开始拟定南下作战的具体计划,直到9月30日,林彪方率领指挥机关离开哈尔滨附近的双城南下,10月5日到达锦州附近。而此时,敌人已向葫芦岛大量增兵,林彪担心攻打锦州时被来自沈

阳、锦西、葫芦岛的援军三面夹击，于是在给中央军委的加急电报中，又要求回师打长春。

发起辽沈战役

经过中央军委与东北野战军反复磋商，9月上旬确定了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即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首先截断北宁线，封闭国民党军在东北，然后采取攻锦(州)打援的手段，争取将卫立煌集团就地各个歼灭。9月10日，东北野战军制定了辽沈战役的具体实施计划。随后，按照“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作战要求，作了加强并调整指挥关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发布政治动员令，进行大兵团攻坚战训练和战术技术练兵，做好后勤保障与支前等各项准备工作。

辽沈战役从9月12日攻打锦州开始。战前，中央军委指示林罗等，必须将作战重心放在攻占义县、锦州、锦西这3点上面。因为位于北宁线上的锦州是连接东北和华北的一个战略要地，打下锦州是整个战局的关键。中央军委反复强调东北野战军“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要预先涉想继续打锦州、山海关、唐山诸点，控制整个北宁路(除平津段)于我手，以利尔后向两翼机动。”

10月1日，林罗等向部队发出准备夺取锦州，全歼东北敌军的战斗动员令。同一天，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以北的义县，全歼守敌约万人，切断北宁线，完成对锦州国民党军的包围。可是第二天，当林彪获悉华北之敌将由葫芦岛大举增援锦州时，因敌情变化，对攻打锦州之既定方针又发生动摇，想丢下锦州不打，去打长春。林彪向军委提出两个作战方案：一是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二是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3日，林彪致电中央军委，最后才定下了“仍攻锦州”的决心。对此，军委多次复电批评说：“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应“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接着，林彪等

立即向军委作了检讨和说明，表示“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鉴于林彪在较长时间内没有明确作战重点，没有把部队主力配置于北宁线，形成了南北平分兵力的状况，10 日，毛泽东在给林罗等电报中，再次强调：“你们的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只要攻克了锦州，你们就有了主动权，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0 月 14 日，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城发起总攻击。经过两天激战，15 日全歼守敌，战斗胜利结束。此役毙伤敌 1.9 万人，俘虏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及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等以下约 8 万余官兵，奠定了夺取辽沈战役全胜的坚实基础。东北野战军也付出了伤亡 2.4 万人的代价。中央军委给林罗等电报中称：锦州之战，“部队精神好，战术好，你们指挥得当，极为欣慰，望传令嘉奖。”东北野战军在夺取锦州的同时，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东进兵团”和“西进兵团”向锦州的增援。其中，著名的塔山阻击战，是整个锦州战役中打得最惨烈、最精彩的一幕。在方圆不到 20 公里的范围内，经过 6 天 6 夜鏖战，歼敌 6 000 余人，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主力部队攻克锦州，乃至整个辽沈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个决战胜利

攻下锦州，东北野战军造成对国民党军“关门打狗”之势。10 月 15 日，蒋介石飞抵沈阳，坐镇指挥，严令长春守敌向沈阳突围。但长春守敌担心突围时被歼，未敢轻举妄动。以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的第一兵团，早已兵临城下，长春守敌已被围困 5 个月之久。在我军“久困长围”方针的打击下，加上对守城国民党军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迫使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 2.6 万官兵毅然起义；新七军军长李鸿率部投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最后放下武器。长春和平解放。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乘胜前进，集中主力展开辽西会战。东北野战军将国民党军廖耀湘兵团共 10 万人合围在黑山、大虎山约 120 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在短短两天中，于 10 月 28 日将敌全歼，其中包括被称为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新一军和新六军，

生俘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新六军军长李涛等高级将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电贺林彪等，称赞辽西大捷对于全国战局贡献极大，并激励全军再接再厉，为全歼东北国民党军，解放沈阳而战！

在林彪等指挥下，11 月 1 日，东北野战军对沈阳发起总攻，并于当天全部解决守城敌军。2 日，沈阳这座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获得解放，歼敌共 13.4 万人，俘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以下将官 106 人。随后，攻占营口、锦西、葫芦岛等，东北全境均获解放。

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通过林彪、罗荣桓等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野战军领导人的组织和指挥，辽沈战役取得了伟大胜利，历时 52 天，歼敌共 47.2 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东北解放军亦付出了重大代价，伤亡共 6.9 万余人。

辽沈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有决定意义的三大战役之首。这一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为整个解放战争的发展和全国的解放奠定了基础。1948 年 11 月 3 日，中共中央电贺东北全境解放，指出：东北解放，“奠定了在数年内解放全中国，然后将中国逐步建设为工业国家的巩固基础。”

97. 粟裕与淮海战役

粟裕(1907—1984)　湖南会同人。1926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任工农红军第二十二军64师师长,后兼该师政治委员。以后历任红四军参谋长、红十一军参谋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闽浙军区司令员等职。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第2支队副司令员、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副指挥,参与创建苏浙敌后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1师师长兼政委、苏中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苏浙区党委书记,开创了浙西抗日根据地。抗战胜利后,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参与指挥著名的苏中战役。后任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代理司令员和代理政治委员,参与指挥了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后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南京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等职。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主要著作收入《粟裕文选》。

建议举行淮海战役

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地区,位于苏、皖、鲁、豫4省交界,地域辽阔,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解放军一旦掌握了徐州以及淮河以北平原,实际上等于控制了长江以北,直接威胁国民

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和上海。

1948 年 4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研究如何发展战略进攻问题。会议采纳了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的建议，作出暂不渡江南进，而先集中兵力于中原黄（河）淮（河）地区打大仗，尽可能多地把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的决策。这实际上是淮海战役的最初设想。会后，决定陈毅去中原军区任第一副司令（仍兼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由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

在中原野战军（简称中野）的配合下，六七月间，粟裕指挥豫东战役，创造了我军在一个战役中歼敌 9 万余人的新纪录，活捉敌兵团司令区寿年。由此表明，粟裕关于集中主力在长江以北歼敌的战略构想的正确性。

粟裕、谭震林指挥华东野战军（简称华野）打济南时，曾考虑攻克济南后，部队下一步的行动方向问题。粟裕分析了敌我实力、人力、物力、地理位置等多种因素，认为应出兵苏北、苏中作战，为渡江创造条件，比回师中原更为有利。8 月 23 日，粟裕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联名向中央军委建议："俟两月以后我们即可举全力沿运河及津浦南下，以一个兵团攻占两淮（淮阴、淮安，今淮阴市）及高邮、宝应，则苏北局势即可大大开展。"还提出：济南战役结束后可以不必休息，立即出动，以免"失去适宜作战秋凉气候和济南失守后加于敌人之精神压力。"

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粟裕于 9 月 24 日致电中央军委并转华东局、中原局，正式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设想该战役可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第二阶段两淮作战结束前后，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

中野领导人赞同粟裕的建议，9 月 25 日电告中央军委并告粟裕："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并表示"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当日，中央军委在研究了华野和中野领导人的意见后，复电："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指示三期作战目标：第一个作战就以歼灭黄百韬兵团于新安、运河之线为目标；第二个作战应歼灭两淮高宝地区之敌；第三个作战应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强调进行这 3 个作战的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敌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分兵力去

中共淮海战役总前委领导成员合影。左起第一人为粟裕

保卫长江，而利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要求部队“做好有关这一战役的充分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批准华野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后，复电粟裕，指出：“望你们召集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及其他可能到会之干部开一次讨论行动问题的会议，以最后斟酌的意见电告我们审查。”28 日，中央军委指示华野：“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

制定战役的作战方针

攻克济南后，华北与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徐州国民党军刘峙集团已处于华野和中野的夹击之中。国民党统帅部为避免刘峙集团重蹈东北卫立煌集团的覆辙，除决定命令副总司令杜聿明全权负责指挥刘峙集团 70 万人进行徐（州）蚌（埠）会战外，还以白崇禧 23 万兵力钳制中原野战军。刘峙集团分置于津浦铁路徐州至蚌埠两侧，以拱卫南京、上海，并准备必要时放弃徐州。

中央军委这个方案与粟裕的方案在行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

所不同的只是，粟裕设想以华东野战军四分之一的兵力攻两淮，四分之三的兵力在徐海线上打援；而军委的方案，战役一开始就实施大规模的阵地攻坚战，打新安镇。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充分研究并采纳各方意见与建议之后，于10月11日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19日，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主力向陇海路挺进，22日攻占郑州，24日开封守敌撤退。中野主力4个纵队乘胜东进，加入徐蚌作战。31日，粟裕向中央军委提议："这个战役的规模很大，请陈(毅)军长、邓(小平)政委统一指挥。"11月1日，中央军委接受了粟裕的建议，命令"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参加淮海战役的作战部队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约36万人，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约15万人，加上华东、中原、华北三大解放区的地方部队，总兵力共计60万人。国民党军方面，徐州刘峙集团连同从华中增援的黄维兵团等部，约80万人，多数为蒋介石精锐嫡系。此时，中野、华野连战皆捷，士气旺盛，思想统一，纪律严明，华东、华北两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有了必要的后勤保障，人民解放军歼灭刘峙集团的条件已经完全具备。

淮海战役的巨大胜利

按照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在总前委指挥下，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以雷霆万钧之势，向徐州东、西两面的国民党军发起进攻。粟裕开始提出的淮海战役设想比较小，仅是消灭淮阴、淮安和海州地区之敌，后来形势有了变化，战役打响的第三天，11月8日，粟裕召集华野负责人开会研究下一步作战问题，指出：现在东北全境已经解放，解放战争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仗怎么打，怎样能更快地给蒋介石以决定性的打击。他根据大家的意见，建议中央，采取措施，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不再向两淮进攻，而以主力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把敌人逐步削弱和歼灭于徐州周围。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立即同意粟裕等人的建议。这样，淮海战役的范围、规模、参战兵力，都比原计划要大得多。13日，粟裕给中央军委等的电报，提出了包围黄百韬兵团，阻击并歼灭邱清泉、李弥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

为统一指挥淮海前线作战，11 月 16 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 5 人组成中野、华野两军总前委，刘、陈、邓 3 人为常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总前委的成立，对于贯彻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和作战方针，赢得淮海战役的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整个战役分 3 个作战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敌军在徐州战场上，最初有 8 个兵团。而钳制徐州援敌，歼灭黄百韬兵团，是“全战役的中心目标”。中野攻占徐州至蚌埠间之重镇宿县，全歼守敌 1.2 万人，切断徐蚌线，完成了对徐州的战略包围。华野在中野的配合下，发扬“猛打、猛冲、猛追”精神，连续持久战斗，曾以一夜 120 里至 140 里的急行军追击逃敌。在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经过 7 天激战，11 月 17 日全歼黄百韬兵团近 10 万人，黄本人自杀身死。全歼黄百韬兵团，对保证整个战役的全胜，具有决定的意义。第一阶段取得了歼敌 21 个师，共 17.8 万余人的辉煌战果。

第二阶段：围歼黄维兵团。黄百韬兵团覆灭后，杜聿明所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 3 个兵团 20 万人向徐州西南方向撤退，野战军占领战略要地徐州。中野在华野的配合下，野战军指战员忍饥耐寒，不顾疲劳，不怕艰苦。12 月 15 日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全歼黄维兵团共 12 万余人，生俘第十二兵团司令黄维以下多名高级将领。同时包围了杜聿明指挥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此前华野还成功地阻击了北犯的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

第三阶段：围歼杜聿明集团。全歼黄维兵团后，为策应正在进行的平津战役，野战军从 12 月 16 日起，进行了 20 天休整。华野在中野的配合下，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于 1949 年 1 月 6 日向陈官屯地区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不到 4 天，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邱清泉，仅第十三兵团司令李弥化装逃跑。第三阶段共歼敌 25 万余人。

淮海战役自 1948 年 11 月 6 日至 1949 年 1 月 10 日，历时 65 天，是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会合，共同作战，坚决、迅速、干脆、彻底地全歼大量敌人，共歼敌刘峙集团主力和白崇禧 1 个兵团，计有国民党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黄

百韬、孙元良、黄维、邱清泉、李弥5个兵团，22个军，55个师等，其中包括蒋介石“五大主力”之第十八军和第五军（按：“五大主力”之另3个是：新一军、新六军、整编第74师），共55.5万人。其间，国民党军有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孙良诚、黄子华、赵壁光等率部起义。人民解放军付出了伤亡13.4万余人的代价。

这次战役的胜利，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国民党军队遭受致命的打击，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已丧失殆尽，其南线兵力所余无几，蒋家王朝已穷途末路，从而奠定了渡江南进以及夺取全国胜利的基础。正如中央军委所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解决。”

淮海战役的胜利，充分体现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英明的战略决策和正确的战役指挥。粟裕在整个战役中也展现出其远见卓识和指挥才干，从战略高度提出的若干重要建议，为夺取战役的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粟裕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没有煮熟的夹生饭，硬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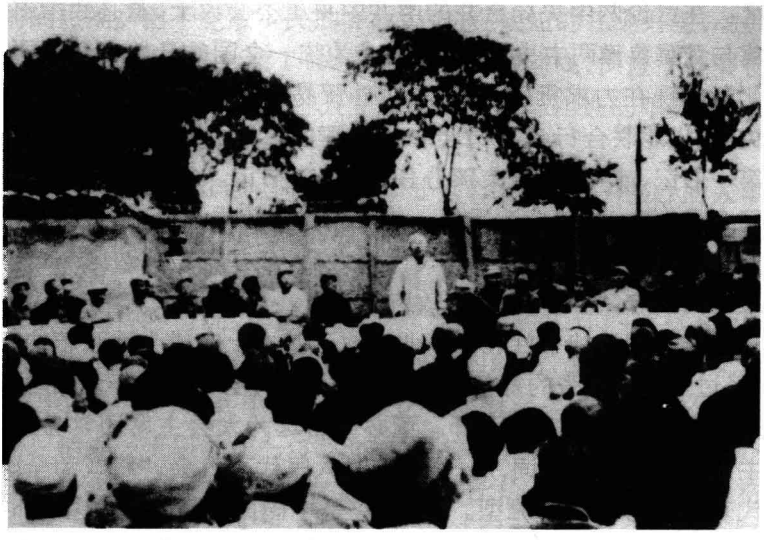
98. 董必武与华北人民政府

董必武(1886—1975) 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辛亥革命,赴日本法政大学学习。1920年参与筹建武汉共产党组织。1924年任中共汉口地委书记。1927年任湖北省农工厅厅长。1928年赴苏联学习,1932年回国,1934年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党校校长、代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等国民党统治区,参与领导党的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参加国共两党谈判,1947年3月撤回延安。后任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华北行政联合委员会主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法委员会主任、第一届全国人大最高法院院长、第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主席、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自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起为历届中央委员,自七届一中全会起为历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是中共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主要著作收入《董必武选集》。

关注华北财经建设

进入1947年,人民解放军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原来被分割的华北各个解放区已经或即将连成一片。是年3月,董必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工委常委后,随工委书记刘少奇、常委朱德等,离开延安到达晋察冀边区的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立即投入了统一华北各解放区,准备筹建华北人民政府的繁忙工作。

为了统一华北各解放区,更好地支援解放战争,中共中央首先抓紧财政经济与发展生产的工作,于4月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办事处,董



1948 年 8 月，董必武在河北石家庄召开的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上讲话

必武任主任。不久，董必武在邯郸召开的华北财经会议上指出：必须积极促进财经工作的统一，但不可操之过急，要真正做到把几个解放区的财经统一起来，还要做很多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在《我们的财经任务与群众战线》中强调指出：今后财经工作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它将成为爱国自卫战争能否长久支持，并赢得最后胜利的关键。8 月，董必武拟定了《华北财经办事处组织规程》，明确规定华北财经办事处的任务是："制定华北各解放区国民经济建设的方针；审查各解放区的生产、贸易、金融计划，并及时作必要的调剂与管理；掌握各解放区的对敌经济斗争；筹建中央财政及银行"。他提出的这些《规程》，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为实施上述任务，董必武先后召开一系列相关会议，初步完成了统一华北财政经济的任务，并为华北人民政府的筹建作了先行的必要准备。

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为了实现华北的完全统一，1948 年 3 月，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解放区与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

放区。在讨论两中央局合并的中共中央工委会议上，董必武指出：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中央局合并，应成为统一全国的开始。合并两局，华北财办现在力求货币、银行和对外贸易的统一。5月，成立了华北中央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兼任第一书记、薄一波、聂荣臻分任第二、三书记。华北军区由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任主席，负责筹备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合并晋察冀边区与晋冀鲁豫边区两政府，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的工作。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和华北解放区基本上完成土地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几个月紧张的筹备，1948年8月7日至20日，华北临时人民政府代表大会在石家庄召开。董必武当选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他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说：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前奏和雏型。因此，它是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中划时代的一次大会，在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将占有光荣的篇章。”“我们这个人民代表大会，体现了我们解放区的政权是革命的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会议宣告华北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董必武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薄一波、蓝公武、杨秀峰为副主席。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统一了华北各解放区的领导。下辖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绥远5省及北平、天津两市。

董必武于9月26日率各部、会、行、局负责人及全体干部就职视事，他在就职大会讲话中说：没有解放军两年来连续不断的胜利，特别是把战争引向蒋管区的胜利，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是不可能的。同时，没有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解决，华北人民政府的成立，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华北应负起支援各方面野战军歼灭敌人的责任。他感到责任的重大，信心十足地说：“我所以敢于担负这个责任，首先因为有我们党的支持；再则人民信赖我，另外还可依靠各位副主席及各位工作同志。大家过去工作都有很多经验，把经验总结一下，好的保留，坏的去掉，工作便会做得更好。”

领导华北人民政府工作

在华北人民政府的号召下，整个华北立即掀起了空前的生产和

支前的热潮。由于党政军民的齐心协力，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动员和组织了4 700余万人力和1 700余万畜力支援前线，供应了各类物资8.7亿余万斤，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军南下与西进的军需供应，保证了解放大军的胜利进军。

中央工委与中共中央于1948年5月合并后，作了部分的人事调整，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华北财经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财经部，董必武兼任部长。他带领干部审查了各解放区的财经政策，研究了执行财经政策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统一各地区财经工作的方法和步骤。为尽快统一华北、西北、华东3个解放区的财经、金融、贸易、交通等工作，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财经委员会，董必武兼任主任。他进一步研究统一3区的方法与步骤，决定成立华北银行；将华北货币与山东、西北原有货币，固定比价，互相通用；后又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3家银行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人民银行券等，初步实现了华北、西北、华东3区财政、金融、贸易的统一。

董必武重视人民政权的建设工作，在多次讲话中，要求通过普选的方法，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建立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在华北人民政府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华北地区普遍进行了村、县、市人民代表会议和同级人民政府的选举工作，为人民政权的建立积累了重要的经验。1948年10月16日，董必武在人民政权研究会上作《论新民主主义政权问题》的报告，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权，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很多人总不喜欢专政这个名词，在革命时期，反革命不镇压下去，革命秩序就建立不起来，就难以发扬人民民主。"

董必武十分重视法制建设，明确指出：新的政权建立以后，就要创建新的法律、法令、规章、制度，来维护新的社会秩序。他多次号召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司法制度，并亲自领导司法部门举行司法干部训练班。为了促进新中国法学研究，他还发起建立了以他为领导人的中国新法学研究会。

董必武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工作，反复强调：小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首先从整顿中、小学入手，搞好教育改革。1949年6月，发起成立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董必武当选为主任委员。他在7月召开

的中华教育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必须服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方针，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他还大力提倡开办冬学和民兵夜校以及干部学校，为接管大城市做好充分的准备。

董必武在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期间，领导华北人民政府，为支援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1949 年 2 月，随着北平（今北京）的解放，华北人民政府移至北平办公。新中国成立后，华北人民政府于 10 月 31 日结束了历史使命，所辖 5 省 2 市归中央直属。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

99. 李维汉与新政协召开

李维汉(1896—1984) 又名罗迈。湖南长沙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与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23年4月起,任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是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27年7月,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主持党的八七会议,并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江苏省委兼上海市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江南省委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1931年赴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后,任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等职。红军长征中,任军委第二野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1937年以后,历任中共陕甘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群众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央党校代理校长、陕北公学校长、中央干部教育部副部长、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兼任政务院秘书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第二、三、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主要著作收入《李维汉选集》。

主管新政协的筹备工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以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各阶段阶层人民联合起来,巩固与扩大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并且提出了各党派、团体和各界人士"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图为会议会场

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同时，中共中央还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商讨有关问题。随后，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表通电与声明，赞同中共中央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八九月间，各民主党派一些有代表性人士，分别陆续抵达中共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和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哈尔滨。为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中共中央统战部同在李家庄的民主人士符定一、吴晗、周建人等商讨，提出《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并报送中共中央。文件草案的主要内容包括：新政协召集问题；新政协参加者；新政协时间、地点；新政协讨论等事项。10月初，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城市工作部改组为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任部长，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

10月至11月，中共中央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的文件草案发给中共东北局，请他们向在哈尔滨的民主人士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等7人征询意见，进行广泛的协商。随后，中

共中央又征求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李济深、何香凝、周新民、马叙伦等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的意见。同时再次邀请尚在香港、上海的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政治协商会议。11 月 25 日，中共中央与各民主党派人士，最后就《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问题》达成 4 项协议：一、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及赞成中共“五一”口号之 23 个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组成。二、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是：负责邀请各方代表人物参加新政协，负责起草新政协的文件和负责召开新政协的正式会议。三、预拟新政协参加的单位共 38 个，每单位代表人数为 6 人。四、新政协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任务。这个协议，成为新政协召开的政治基础。

成立新政协筹备会

李维汉于 1949 年 3 月 10 日达到北平后，逐个走访了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谭平山、周建人、马叙伦、蔡廷锴等 20 多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向他们分析形势，介绍情况，阐明中共的方针政策，并回答所提出的问题。经过反复协商和交换意见，在一些根本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从而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作了充分的准备。3 月 21 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在北平的民主人士在六国饭店举行茶会，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会上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他谈到关于新政协的问题时说：新政协要通过一个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各民族的联盟，这是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毛主席说的民主集中制。经济政策是十六个字，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文化教育政策就是要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要争取、团结、改造旧知识分子，培养新知识分子。此外，还要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民族政策、外交政策等。

新政协筹备会议原计划 1948 年秋季在哈尔滨举行，因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改为 1949 年在北平举行。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6 月 15 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共

23个单位,134人参加。李维汉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的成员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21人,宣告新政协筹备会的正式成立。当晚,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常务委员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会议还决定在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分别设立6个小组,进行各项具体工作事宜。李维汉被推举为第一小组组长,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人数。

提出参加新政协会议之单位及其各单位的代表名单,是一件非常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李维汉为此花了大量精力,倾注了全部心血。他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广泛协商,调查研究,使代表名单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和广泛性。第一小组成立后,先后由各单位磋商,然后又拟出了一个草案,在第一次小组会上,全体组员一致通过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6月19日举行第三次会议。李维汉代表第一小组在会上作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他指出:"对于代表名额的分配,是根据这样原则考虑的:考虑到将来新政治协商会议的规模,考虑到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各单位的代表性,我们觉得应该在分配代表的时候强调'各单位的代表性',而不强调'各单位的代表人数'"。还提出:各单位代表名单除因特殊情形经常务委员会同意外,须于7月15日以前向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提出。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决定如下:一、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为45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其代表分配如下:(甲)党派代表142人;(乙)区域代表102人;(丙)军队代表60人;(丁)团体代表206人。二、每一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以上者,得推候补代表2人,不满10人者,得推候补代表1人。候补代表得列席新政治协商会议。三、除45个单位外,另设一特别邀请单位,其代表资格、名额与人选,均由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协定之。

在筹备新政协工作期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成由21人参加的新政协筹备会党组干事会,由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徐冰、李立三5人组成干事会常委,周恩来任书记。周恩来、林伯渠、李维汉、齐

燕铭4人，被分工负责党派工作。

8月18日，李维汉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单位首席代表座谈会上作了《新政协代表名单协商经过情形》的发言，指出："新政协任务重大，筹备会规定了参加单位四十五个，另设一特邀单位，范围很广泛，这是由于：(一)此次会议是首届会议，是一个历史的总结的会议，故其范围包括一切参加奋斗的方面，直到最后对地方性的和平解放有贡献者均包括在内；(二)这次会议要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要制定宪法性的纲领与组织法。由于整个革命战争的发展具备了今天的条件，在去年的情况下，召集像今天这么大规模的会议是较困难的。今天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开这个包括各方面、各地区，范围很广的会议，这是根据政治环境的发展和需要来决定的。"他还说："按照新政协的章程不能有反动分子参加，此为一原则性的界限，必须严格尊重。我们在工作中也极力注意此问题"。

李维汉为筹备新政协做了大量工作，8月下旬，他因腿跌伤住院，秘书长职务由林伯渠代理。周恩来在总结新政协筹备工作时说："维汉同志出力最大。"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新政协筹备工作，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新政协筹备工作完满结束，最终确定了662位代表的名单。这份政协代表名单受到毛泽东的称赞，他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包罗万象的天书。

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

渴望已久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于1949年9月21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代表635人，来宾300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郭沫若、马叙伦等8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林伯渠为大会秘书长。毛泽东致开幕词。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自即日起北平改名为北京；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元采用公元，今年为1949年；还通过了国歌为《义勇军进行曲》和国旗为五星红

旗，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的名额等。会议选举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李维汉当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之后，召开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等为副主席。李维汉当选为常务委员和秘书长。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空前大团结的盛会。它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是旧中国灭亡和新中国诞生的里程碑。

100. 陈赓与南部边疆追歼战

陈赓(1903—1961)　湖南湘乡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1926年赴苏联学习,1927年回国。1928年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特科的情报工作。1931年后,任红四军团长、红四方面军师长、红军彭杨步兵学校校长等职。红军长征后,任红一军团团长、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129师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太岳纵队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历任晋冀鲁豫军区第4纵队司令员,取得晋南六战六捷的胜利。1947年与谢富治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开辟豫陕鄂解放区,配合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逐鹿中原。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参与指挥南疆的3次追歼战。1950年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战争。1951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兼政委。1952年回国后,历任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后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部副部长等职。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主要著作收入《陈赓军事文选》。

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

1949年2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在河南省漯河正式组成,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十三、十四、十五3个军。陈赓兵团原定任务是攻占并接管南京,但因战争形势发展神速,第三野战军胜利渡过长江,南京国民党反动政权实际上开始土崩瓦解。第二野战军命令陈赓兵团直出上饶、弋阳地区,尽早切断浙赣线,隔断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陈赓即率部兼程南进,于5月初占

领浙赣沿线各城镇。陈赓又命令一部南进，占领闽北，主力则由浙赣路沿线西进，5 月下旬占领江西省会南昌。

渡江战役胜利以后，国民党残余部队大部分猬集在华南和西南，余汉谋、白崇禧、胡宗南 3 个集团约 100 万兵力，分别据守在广东、广西和西南的云、贵、川 3 省，进行顽抗。为迅速歼灭这些残余军队，毛泽东指出：必须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强调对西南作战，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根据毛泽东的战略决策，首先以二野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等部，占领广州，歼灭余汉谋集团；然后第四兵团进入广西南部，配合四野主力，形成对白崇禧集团的大包围，并歼灭之；最后，由二野主力歼灭胡宗南集团，第四兵团再由广西进军云南。这是一个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这时，决定陈赓兵团暂归四野指挥（五兵团第十八军归四兵团指挥）。

解放两广

从 7 月起，陈赓兵团参加了湘赣战役，进击白崇禧集团。中央军委指示，对白崇禧部队作战，“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陈赓的 3 个军和四野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的 2 个军，统由陈赓率领南进。中共中央为加强对两广地区的统一领导，8 月，任命叶剑英为华南分局第一书记。

9 月上旬，中央军委指示：陈赓、邓华两兵团，应争取于 10 月下半月占领广州。根据这一指示，陈赓率部队集结在江西南部，一面准备进占广州；一面进行进军两广、云南的准备工作。14 日，陈赓在江西赣州主持召开兵团党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军委的作战计划。会议根据陈赓的提议，作出反对骄横的决议，号召部队进一步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练兵运动，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战术技术水平。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时刻，陈赓兵团由赣南挺进广东，协同第十五兵团突破敌人在粤北的 3 道防线，先后攻占南雄、始兴、曲江（今韶关）、翁源等地，各部队不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不顾疲劳，昼夜

兼程，每天都以130里以上行进，两路直扑广州。10月14日，左路军十五兵团攻入广州，消灭余汉谋集团约12万人，提前完成了作战计划。是时，陈赓对所属部队作出了两项规定：一把公路、大路让给友邻，自己部队趟小路、山路；二把城市让给友邻部队去占领，自己部队一律不准进城。在广东战役的祝捷大会上，叶剑英高度评价了陈赓的这种高贵品德和高尚风格。

还在广州解放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右路军四兵团一律不进广州，马不停蹄地顺北江南下，一夜行进160里，控制了广州到广西的要道，追歼向广西逃窜之敌。10月下旬，从赣南出发的四兵团经过半个月的作战，部队已相当疲劳，但传达了毛泽东乘胜直追的指示后，士气高昂，以一天150里以上的行程，进行了5天的大追击，终于在阳江、阳春地区将逃敌团团包围，全歼敌军4万余人，胜利结束了广东作战。

广东战役经过1个月，共歼敌5.8万余人，解放了除海南岛、雷州半岛等以外广东大部分地区，为进入广西歼灭白崇禧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1949年11月，叶剑英在一次会议上，高度评价陈赓的指挥才能，表扬陈赓兵团是英勇坚强，具有高度阶级觉悟的部队。

广东大部解放后，陈赓所部陈兵雷州半岛，堵住敌人向海南岛的逃路，形成了南北夹击白崇禧集团的有利形势。11月下旬，陈赓兵团沿着粤桂边和广西的海岸线，全体指战员以惊人的顽强意志，忍受疲劳与寒冷，猛烈追歼敌人，配合四野主力，在追歼敌第三、第十一、第十三兵团的残部时，活捉敌华中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张淦。在向钦州方向追歼中，穿越崎岖难行的小道，4天行程600里，歼灭了钦州之敌。接着，又以一部分部队分路插入十万大山，寻歼残敌。

广西战役从11月7日至12月11日，历时35天，二野陈赓第四兵团配合四野主力，将白崇禧集团的16.8万人全部歼灭，其中陈赓兵团歼敌7万余人。歼灭白崇禧集团，是执行毛泽东关于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计划的伟大胜利。

挺进滇南

陈赓兵团在配合四野5个军完成广西作战以后，即进占云南，又

完成了对贵阳的包围。11 月，二野主力进入贵州，解放贵阳后，既切断了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的联系，堵住敌人退入云南。随后相继解放了贵州、四川广大地区，使胡宗南集团陷入二野主力和十八兵团的夹击之中。12 月 9 日，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宣布起义，云南和平解放。

但是，盘踞在滇南的国民党第八、第二十六军，继续负隅顽抗。此时，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台湾飞回云南，将敌第八、第二十六军组编为第八兵团，自兼兵团司令，于 12 月中旬，悍然进攻昆明，被解放军击退至蒙自、个旧地区。陈赓兵团主力协同兄弟部队，1950 年 1 月，迅速进入歼灭蒙自地区之敌的战斗。本来汤尧计划将敌二十六军空运到台湾去，留下第八军在滇西顽抗，但野战军经 14 昼夜行进 1 800里的路程，占领了蒙自机场，已集结蒙自的敌军慌忙南逃。陈赓兵团十三军配合滇桂黔边纵队强行歼敌，先后在个旧、屏边地区和元江、镇源地区歼灭敌第二十六军和第八军，活捉汤尧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最后解放了西康省会西昌，将胡宗南集团的残部歼灭。1950 年 2 月，陈赓、宋任穷率领第四兵团进驻昆明。这次进军滇南，解放云南的战斗，是陈赓兵团挺进南疆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最后一次作战。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陈赓率领第四兵团在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50 年 2 月的 4 个月的作战中，部队行程 8 000 里，歼敌约 15 万人，俘虏敌将校级军官达千人以上。在第二野战军的指挥下，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配合四野胜利完成了祖国南部边疆的广东、广西、滇南 3 次追歼战的任务。陈赓在《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灭战》一文中，深有体会地说："指战员在作战过程中越来越认识到毛主席的这个方针的伟大意义，而随着这种认识的加深，也就越来越发扬了顽强奋战的精神，取得了胜利。"

参考书目

文献·资料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987年版。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11册),1979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2—18册),1985年。

赵朴:《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1—6),《党史研究》1981年第2、3期,1982年第1、3、4期,1983年第2期。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一大"前后》(第1—2册、第3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984年版。

《五四爱国运动》(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五四运动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民众运动),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共产主义小组》(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衙前农民运动》,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

《安源路矿工人运动》(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版。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北

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史料》(第 1—3 册),北京出版社 1979 年版、1980 年版、1981 年版。
《赵士炎生平史料》,《文史资料选辑》第 58 辑。
《青运史资料与研究》(第 1—3 集),1982 年、1983 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工人运动》,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苏兆征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北方地区工人运动资料选编(1921—1923)》,北京出版社 1981 年版。
《海陆丰革命史料(1920—1927)》(第 1 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
《李立三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
《中国工运史料》1960 年第 2 期。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中国工会历史文献》(第 1 卷),工人出版社 1958 年版。
《中国历次全国劳动大会文献》,工人出版社 1957 年版。
《中国工会历次代表大会文献》(第一卷),工人出版社 1984 年版。
《中共中央关于工人运动文件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纪念向警予同志英勇就义五十周年》,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广东区党、团研究史料(1921—1926)》,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广东农民运动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资料选编》,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1983 年。
《省港大罢工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忆杨阁公同志》,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陈钧、丁艾编著:《纪念杨阁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李坚编:《杨匏安史料与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
《关山渡若飞——王若飞百年诞辰纪念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版。
《中共中央北方局》(北方区委时期卷),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版。
《国民革命军北伐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 年版。
《泸顺起义》,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武汉临时联席会议资料选编》,武汉出版社 2004 年版。
《黄埔军校史料(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黄埔军校史料(续篇)(1924—1927)》,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1 年版。
《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秋收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广州起义资料》(上、下册),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南昌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
《平江起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4 年版。
《红四军入闽》,福建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浙江省党务报告》,《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14 期。
陈豪人:《七军工作总报告》,《中共党史资料》第 26 辑。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宁都起义》,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宁都暴动档案资料》,《中共党史资料》第 11 辑。
《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盛仁学编:《张国焘问题研究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红军长征·文献》,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
《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抗战中的中国经济》,抗战书店 1940 年版。
《抗战中的中国政治》,抗战书店 1940 年版。
《抗战中的中国军事》,抗战书店 1940 年版。
《抗战中的中国文化教育》,抗战书店 1940 年版。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百团大战史料》,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2 年版。
《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概况》,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版。

选集·文集

《毛泽东选集》(第 1—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毛泽东文集》(第 1—5 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 1—5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 1—3 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1993 年版。
《陈云文选》(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 1983 年版。
《陈望道文集》(第 1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赵世炎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李达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陈独秀文章选编》(上、中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4 年版。
《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彭湃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李春涛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向警予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阮啸仙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杨匏安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萧楚女文存》,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希伯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李大钊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恽代英文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方志敏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林伯渠文集》,华艺出版社 1996 年版。
《陈潭秋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乌兰夫文选》(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董必武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年谱·大事记

杨树升等:《李大钊年谱》,《河北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逄先知主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王向立、力平主编:《朱德年谱》,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刘崇文、陈绍畴主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杨瑞广、章学新主编:《任弼时年谱(1904—195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上册),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册),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聂菊荪、吴大羽主编:《董必武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中共郑州市党史大事记》,《郑州党史通讯》1985年第7期。
《中共河南党史大事记》(上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陕西大事记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李勇、殷子贤:《红军长征编年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版。
郝宏涛等:《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辛玮等主编:《山东解放区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姚夫等:《解放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
王健英:《中国共产党组织史大事纪实》(1—4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5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回忆录

(美)舒衡哲:《张申府访谈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罗章龙:《椿园载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版。
《许德珩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李伯刚:《回忆李汉俊》,《党史研究资料》1982年第7期。
《九旬忆旧——徐梅坤生平自述》,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3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

《张国焘关于中共成立前后情况的讲稿》,《百年潮》2002 年第 2 期。
《郑超麟回忆录(1919—1931)》,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6 年版。
郑超麟:《怀旧集》,东方出版社 1995 年版。
《回忆蔡和森》,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怀念蔡和森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年版。
《黄埔军校回忆录专辑》,《广东文史资料》第 37 辑。
《世纪之履——李默庵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 年版。
《周恩来同志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记录》,《中共党史资料》第 1 辑。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筱林:《陈延年印象记》,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等编:《陈独秀研究通讯之三》,2005 年。
冯玉祥:《我的生活》(下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 年版。
《魏野畴传略·回忆·遗文》,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王一知:《回忆张太雷》,《近代史研究》1983 年第 2 期。
贺晋年:《谢子长同志革命活动史实》(上),《党史研究》1980 年第 2 期。
唐韵超:《回忆东北地区的工人运动》,《革命史资料》(第 6 集),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年版。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滕代远:《回忆平江起义》,《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24 期。
方志敏等:《回忆闽浙皖赣的革命斗争》,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莫文骅:《回忆红七军》,广西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 1 辑),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陈毅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二),《中共党史资料》第 2 辑。
陈丕显:《赣南三年游击战争》,《中共党史资料》第 2 辑。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册),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成仿吾:《长征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77 年版。

程世才:《悲壮的历程》,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 年版。
李志民:《革命熔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版。
《聂荣臻回忆录》(中册),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
《回忆陈潭秋》,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1 年版。
《解放战争回忆录》(增订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 年版。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薄一波同志关于山西新军问题的一封信》,《党史通讯》1985 年第 3 期。
《薄一波同志关于山西"决死队"性质问题的批示》,《党史通讯》1985 年第 8 期。
《薄一波同志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二日给邓小平同志和党中央的报告》,《党史通讯》1985 年第 8 期。
薄一波:《牺盟会和山西新军斗争历史的回顾》,《中共党史资料》第 21 辑。
薄一波:《有关山西新军的几点回忆》,《中共党史研究》1991 年第 2 期。
乌兰夫:《内蒙古各族人民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作用和贡献》,《中共党史资料》第 16 辑。
刘春:《内蒙古工作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第 17 辑。
陈赓:《在祖国南部边疆的三次追歼战》,《人民日报》1977 年 9 月 14 日。

传　记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1—60 卷),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0—1996 年版。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 61—85 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2005 年版。
《中国工人运动的先驱》(第 1—3 集),工人出版社 1983 年版、1984 年版。

《革命烈士传记资料》,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
杨里昂主编:《革命名人自述》,花城出版社 1998 年版。
杨里昂主编:《学术名人自述》,花城出版社 1998 年版。
姚仁隽:《赵世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版。
陈秀萍:《俞秀松评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
余世诚、张升善:《杨明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
《李达自传(节录)》,《党史研究资料》1980 年第 8 期。
宋镜明:《李达传记》,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元邦建:《谭平山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任建树:《陈独秀传——从秀才到总书记》(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林健柏、李致宁:《李启汉》,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罗绍志等:《蔡和森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
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898—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不朽的战士——浙江革命英烈传》(第 1 集),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山西革命烈士史料》(第 1 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62 年版。
《浩气长存——河北革命烈士史料》(第 1、2 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李曼村等主编:《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
《冯玉祥自传》,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余沈阳主编:《王一飞传略·文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
顾永忠等:《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
陈铁健:《瞿秋白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沈学明、郑建英主编:《中共第一届至十五届中央委员》,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
王健英:《中国红军人物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吕芳文:《陈为人传》,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版。

(美)艾格妮丝·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79 年版。
曹仲彬、戴茂林:《王明传》,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年版。
李志英:《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徐海东:《生平自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2 年版。
胡石言等:《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庄春贤:《陈毅在油山》,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年版。
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0 年版。
范青:《陈昌浩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版。
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章学新主编:《任弼时传》(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版。
张麟主编:《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黄瑶等:《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1 年版。
王焰等:《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
魏巍等:《聂荣臻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版。
范硕、丁家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5 年版。
少华、游胡:《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著　　作

李新、陈铁健总主编:《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第 1—12 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 1 卷)(上、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廖永武:《天津现代革命运动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邵有民主编:《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康裕震主编:《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1919.5—1949.10)》,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曾庆榴主编:《中国共产党广东地方史》(第 1 卷),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王修身主编:《中国共产党北京历史》(第 1 卷),北京出版社 2001 年版。
梁志祥、张国祥主编:《中国共产党山西历史(1924—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
蒋伯英主编:《福建革命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稿》,巴蜀书社 1994 年版。
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 年版。
余世诚、刘明义:《中共山东地方组织创建史》,石油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叶左能、蔡福谋:《海陆丰农民运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
曾庆榴:《共产党人与黄埔军校》,广州出版社 2004 年版。
曾庆榴:《广州国民政府》,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任建树、张铨:《五卅运动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胡允恭:《金陵丛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陈石平:《泸州顺庆起义》,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匡珊吉等:《顺泸起义》,四川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
阎稚新:《李大钊和冯玉祥》,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
张光宇:《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吴玉章:《八一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 年版。
吴志渊:《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地位》,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
房成祥、黄兆安主编:《陕甘宁边区革命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盖军主编:《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陈绍畴等:《白区斗争纪实》,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0 年版。
杨树标等:《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史稿》,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古堡等:《湘鄂西苏区历史简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张鼎丞:《中国共产党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孔永松等:《中央革命根据地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夏道汉、陈立明:《江西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姜思毅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史》,解放军政治学院出版社 1984 年版。
严帆:《中央革命根据地新闻出版史》,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徐彬如:《六十年历史风云纪实》,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1 年版。
李义彬:《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金紫光、靳思彤主编:《伟大的长征》,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美)埃德加·斯诺:《红色中华散记》,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美)海伦·斯诺:《延安采访录》,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阎景堂主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版。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 1—3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袁伟、张卓主编:《中国军校发展史》,国防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马洪武主编:《华中抗日根据地史》,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年版。
何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罗焕章、支绍曾:《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李良明:《项英评传》,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3 年版。
陈枫:《皖南事变本末》,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房列曙:《皖南一九四一》,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9 年版。
肖甦、周炳钦:《两种命运的决战》,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

论　文

朱成甲编:《中共党史研究论文选》(上、中、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王树棣等编:《陈独秀评论选编》(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工人运动史料委员会编:《五卅运动六十周年纪念集》,1985 年。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年版。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
《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8 年版。
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任武雄:《历史的悲剧:李汉俊——中共在创建时期与李汉俊的思想分歧》,《党史与党建》(上海)2005 年第 1 期。
任武雄:《党史研究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版。
李坚主编:《杨匏安传论稿》,《广东党史资料丛刊》2003 年第 1 期。
王迪先:《关于上海外国语学社和赴俄学习的几个问题》,《党史研究资料》1985 年第 1 期。
(日)石川祯浩:《青年时期的施存统——日本"小组"与中共建党的过程》,《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
(日)石川祯浩:《中共创立时期施存统在日本的档案资料》,《党史研究资料》1996 年第 10 期。
王奇生:《取径东洋　转道入内——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6 期。
刘达潮:《香港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成立的经过与海员大罢工的情形》,《工运史研究资料》1981 年第 6 期。
廖鑫初:《建党时期湖北的工人运动》,《楚晖》(第 2 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崔永阁、赵云云:《中国共产党旅莫组织始末》,《党史研究资料》1999 年第 12 期。
安振泰等:《中共满洲省委组织演变概况》,《党史研究资料》1982 年第 10 期。
芦振国、姜为民编:《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丰碑——贵州省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集》,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研究文集》(第 4 集),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张天荣等:《长征新探》,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版。
抗大总校政治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简史》,《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 6 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82 年版。
田仲德:《一九四八年中共接收沈阳情况概述》,《党史研究资料》1988 年第 10 期。
韩先楚:《辽沈战役与东北战场》,《党史研究资料》1986 年第 1、2 期。
姚杰:《论辽沈战役中的林彪》,《中共党史研究》1990 年第 4 期。
宋川、何善:《南昌起义中的贺龙》,《中共党史资料》第 46 辑。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综述》,《中共党史资料》第 25 辑。
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编委办公室:《刘邓大军南下和大别山解放区的建立与坚持》,《中共党史资料》第 24 辑。
南京军区《淮海战役综述》编写组:《淮海战役综述》,《中共党史资料》第 21 辑。
王刚等:《李维汉同志对统一战线工作的卓越贡献》,《中共党史资料》第 18 辑。
李鸿文、王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中共党史资料》第 15 辑。
晓春:《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巩固与发展》,《中共党史资料》第 15 辑。
陈红军:《百折不挠　红旗不倒》,《党史研究》1980 年第 5 期。
张久令:《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概况》,《党史研究》1986 年第 2 期。
宁教奎:《彭公达是秋收起义的重要领导人》,《中共党史研究》1989 年第 2 期。

刊物·其他

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编:《党史资料》(1953 年第 1—7 期,1954

年第1—10期,1955年第1—3期)。
《党史资料丛刊》(上海)(1980年第1、3辑,1981年第1、2、3辑,1982年第1、2、3辑,1984年第2、3辑,1985年第1、4辑)。
《革命史资料》(上海)1986年第2辑。
《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2、4期。
《黄埔》纪念专刊:《黄埔情缘》,黄埔杂志社2004年版。
《红旗飘飘》(第5集),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陕西文史资料》(第10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俞秀松烈士日记(摘录)》,《上海党史》1991年第7期。
《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革命烈士书信》,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版。
《革命烈士书信》(续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
马连儒编:《激扬文字——中共建党时期诗文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世纪出版